、於1949年完成
探討與概念的形
及其本質。

殊性和民族國家
檢視歐洲帝國主
主義運動與支配
暗示著現代草眾
。本書可說是對

出複雜而精緻的
的洞識。

極權主義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原著／漢娜・鄂蘭
譯者／林驤華
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
033

極權主義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原著／漢娜・鄂蘭　譯者／林驤華



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
033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Hannah Arendt

譯者簡介：

林驤華，上海復旦大學副教授，
1951年生，任職復旦大學出版社。
主要著作有《現代西方文論選》(1983)、
《西方文學批評術語辭典》(1989)、
《當代英國文學史綱》(1993)等。
1988年獲上海市青年文學獎中的翻譯文學獎。

封面照片／Credit to the Hannah Arendt Literary Trust
封面構成／姜美珠

極權主義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原著／漢娜·鄂蘭　譯者／林驤華

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
033
時報出版



極權主義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著者 漢娜・鄂蘭

譯者 林驤華

當代思潮系列叢書

033



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

033

極權主義的起源

原著／漢娜·鄂蘭
譯者／林驤華

ISBN 957-13-1678-4

目　錄

第一部　反猶主義

第二部　帝國主義

第三部　極權主義



出版的構想

郝明義

二十世紀，人類思想從亙古以來的激盪中，在各個領域都迸裂出空前的壯觀與絢爛。其影響所及，不論是強權、戰爭及均勢的交替，抑或經濟、科技與藝術之推陳，水深浪濶，無以復加。思想，把我們帶上了瀕臨毀滅的邊緣，思想，讓我們擁抱了最光明的希望。

回顧這一切，中國人的感慨，應該尤其特別。長期以來，由於客觀條件之貧弱，由於主觀禁忌之設定，我們從沒有機會能夠敞開胸懷，眞正呼應這些思想的激動。

《近代思想圖書館》，是爲了消除這些喟嘆而出現的。

我們的信念是：思想，不論它帶給我們對進化過程必然性的肯定，還是平添對未來不可測的驚懼；不論它呈現的外貌如何狂野，多麼審愼，其本質都是最深沉與執著的靈魂。我們必須開放心胸，來接納。靈魂中沒有這些深沉與執著，人類的歷史無從勾畫。

我們的目的是：以不同的思想領域爲架構，將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對人類歷史與文明發生關鍵性影響的思想著作，不分禁忌與派別，以圖書館的幅度與深度予以呈現。

我們希望：對過去一百五十年間這些深沉思想與經典著作的認識，不但可以幫助我們澄清過去的混沌，也更能掌握未來的悸動。

在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前夕，前所未有的開放環境，讓我們珍惜這個機會的終於到來，也警惕這個機會的必須把持。



《極權主義的起源》導讀

蔡英文（東海大學歷史系及政治研究所副教授）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於1949年寫成，於1951年出版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初版的名稱爲《我們當前的負擔》（*The Burden of Our Time*），在1958年的修訂版，鄂蘭增加了一篇類似結論的文章，題名爲〈意識形態與恐怖統治〉，分析極權主義政制跟過去的專制政體本質上的差異，書名也改成現在的名稱。

《極權主義的起源》是鄂蘭生前出版的第一本主要著作，一如其他所有的論著，如《伊赫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論革命》（*On Revolution*）與《人間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這本著作所建立的極權主義理論，及其歷史根源的解釋與敍述，激發學院的歷史與政治學學者的嚴厲評論。儘管如此，鄂蘭的論述構成理解西方現代之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現象的一重要的解釋觀點。

鄂蘭的這本論著結合了歷史的解釋、敍述與概念之形構（即：建立極權主義之理論）。在了解《極權主義的起源》，我們必須以這兩個層面爲方向。

依鄂蘭的解釋，極權主義是史無前例的新的統治形態，過去任何專制獨裁制，無論如何殘暴，都沒有如極權主義一般，把人區分成「理應消滅的人種或階級」，而以「集中營」或「勞改營」爲場所，進行集體的改造與屠殺；過去的專制政權僅止於迫害反對此政體的「政治敵人」，但極權主義毫無留情地殲滅服從它的「順民」；過去沒有一個政體公然取消人的道德信

條，如「你不應殺人」與「你不能做僞證」，而把殺人與說謊轉變成公民應該服從的法律命令；過去沒有一個政權的領導者如此狂妄地認爲人的力量無比偉大，而得以從事人性的改造，跟這相對，過去也沒有一政權的領導者那麼謙卑自稱是執行「歷史或種族必然法則」的工具。

這樣嶄新的政權，鄂蘭進一步解釋，乃是建立在一套「意識形態」(ideology)的統治支配，這套「意識形態」，在極權主義者的運用下，表示一套講求前提與推論必須首尾一貫的演繹邏輯，這套邏輯以不證自明的「種族鬥爭」與「階級鬥爭」爲前提，而對人類整體發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做全盤的解釋，同時認定人類整體的歷史意義在於一終極目的，意即「無階級社會」或「純粹人種」，的實現。極權主義者運用這一套「意識形態」塑造或者改造生活世界的「事實」或「現實」，在講求首尾一貫之一致性之邏輯推論，此「意識形態」拒絕實質之經驗與事實的否證，其結果把它支配的世界砌造成一封閉的「虛構世界」；同時，爲了確實實現這套「意識形態」所揭示的歷史之究竟意義或目標，極權主義者自認是這一人類偉大的目標的執行者，但他們也知道這個目標並非一蹴可即，而是爲「百年大計」，執行此目標的任何階段也都不會是絕對完美的，因此，「意識形態」的法則，不論是歷史的或者是種族的法則，必然是動態的，在此動態的運動法則的支配下，極權主義者名正言順地摧毀一切阻撓此運動的既成制度與憲政的結構，掃除人間世界的任何法律與道德倫理的界線；偏執於絕對之歷史目的之達成，極權主義者不斷在他們發動的所謂運動的歷史過程，尋找與肅清偏離或顛覆此運動法則與過程的「危險分子」。據此，在鄂蘭的解釋，極權主義的本質乃是抹平人間世界的所有界線，以及把人之多元性壓縮成單調如一的集體同一性，俾能釋放非人性的自然或歷史之勢力。

這套「意識形態」顯現在極權主義者身上的性格，一方面是表現「凡事皆可爲」的虛無作風，一種認爲人的力量無比偉大的狂妄；另一方面則是自認爲執行歷史或自然之動態法則的工具，一切作爲因此不是自發性的，

或是自律性的，而是法則支配下的傀儡，這造成極權主義者全然喪失「政治責任」的理念與承擔。

在《極權主義的起源》1958年版的〈意識形態與恐怖統治〉一文，鄂蘭從理論反省的層次，表述極權主義的本質，但整部著作的重點在於解釋極權主義如何可能在西方現代社會中形成：極權主義的以邏輯演繹與歷史目的論為宗旨的「意識形態」如何可能塑造社會之力量，得以蠱惑人的心思，願意放棄一己之私奉獻於它不斷造成的運動？作為一位猶太人，鄂蘭特別關注：基於甚麼歷史條件，猶太人成為納粹的「民族社會主義」決意整體剷除的對象？對於這些基本問題的解釋構成《極權主義的起源》的複雜、精微，且不時閃現高度之歷史想像的敍述整體。

就歷史敍述體的構成，鄂蘭在此書的第一部分，〈反猶主義〉，從西方現代「民族國家」與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歷史形成，解釋猶太人——這沒有建立一政治共同體而飄泊無根的民族——如何取得金融掮客的地位，成為歐洲金融界的顯赫人物；但是作為一無國籍民，猶太人無法培養政治意識與參與政治事務的能力，造成猶太人政治冷感與被動反應政治現實的習性（這是鄂蘭解釋猶太人現代命運的基本論點，也是激起她同胞之嚴厲批判的觀點）。生活於非他們所屬的國度裡，猶太人不是成為政治社會的邊際人物，就是戮力躋身上層社會的暴發戶。在西方現代早期的發展，由於國際間金融借貸的需求，這無國籍的猶太人，因這性格，可以替各國政府穿梭引線，解決金融之問題，是為各國政府所需要的「有用之物」，同時，在講求人權與法治的現代民族國家裡，猶太人可以獲得社會政治地位的保護，但猶太人所置身的安全處境只是暫時性的。到了十九世紀，西方的現代政治社會產生了無可化解的危機，猶太人喪失了他先前享有的安全穩固的地位。

鄂蘭把猶太人的命運與西方現代性的發展及其危機相互關聯，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的第二部分，鄂蘭探討西方現代性的進展中，「潛伏的暗潮」

如何導致人本主義與啓蒙之文明的崩潰，以及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造成納粹的「民族社會主義」的興起。她的論述不像學院之歷史家探討如「法國大革命之歷史起源」的方法，她不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的特殊歷史處境，去尋求納粹之極權主義的根源，而是把它視之爲可以表露西方現代性之陰暗底層的「巨大事件」，基於這樣的解釋立場，鄂蘭也把史達林的共產主義的極權統治，由於它奠基於馬克思式的意識形態，解釋爲西方自啓蒙以來的現代性之產物，依此，我們可以說：鄂蘭探討極權主義的歷史起源，在某種程度上，是對西方現代性之困境的反省與批判。

關於極權主義的起源，鄂蘭思考的問題是：到底是甚麼勢力蘊藏於西方現代文明之社會，而導致極權主義可以把人性轉變成動物族類的屬性？鄂蘭以資本主義的經濟生產體系的運作爲起點，說明資本主義如何把人固定的、滿足其生存之必需的「私產」（property）轉化成不斷投資和再投資之無限流動的「資產」（wealth），這種轉化也是孕育「資本主義意識」的過程，爲擴張資產之原故而進行無休止的資產之擴張，以及以征服全地球爲目的，構成了此意識的本質。

資本主義的無限擴張一方面動搖了有一定疆域與憲政法治之一定結構的現代「民族國家」體制，使國家逐步喪失在它治理的疆域裡保障公民權與超越人種族羣之上的功能作用；另一方面，執行資本主義擴張的所謂「帝國主義」在亞非的殖民經驗中，孕育出「種族主義」，藉此合理化他們對殖民地的征服，同時，「種族主義」讓他們確立以人之生物屬性爲本的政治共同體理念，而侵蝕了「民族國家」的政治公民權。除此之外，這些「帝國主義者」在執行資本主義的擴張原則時，所扮演的若不是以行政命令取代法治的官僚，就是隱匿身份的秘密特工，他們作爲的取向即是破壞既定的法律或道德原則，這種帝國主義殖民經驗塑造出另一種態度與理念：否定或隱藏自己的認同身份，以及認爲自己的使命是服務歷史與生物之必然性的潛藏的勢力，此種心態與理念（包括殖民地的「種族主義」）成爲二十世

紀中葉極權主義運動的動力資源。

在解釋與論述從資本主義之擴張和帝國主義心態之形塑轉向極權主義運動與支配的歷程，引人興趣的說明主題是二十世紀的羣眾社會與極權主義之支配兩者的關聯，鄂蘭的論述表現了她對人之道德心理的洞識。依鄂蘭的分析，資本主義的「資產積累」的生產方式與不斷擴張的原則造就了西方現代社會一大羣「孤單」、自覺「多餘無用」，以及跟生活世界疏離的「羣衆」，拚命地追求物慾之滿足，充滿物慾之激情，罔顧公共事務，但是生活之支離與意義的喪失，使他們成爲絕望之存有，他們既無法彼此結合成政治的團體，共同參與政治之事務，更甚者，他們隔絕了其他人，也隔絕了使他們生活有意義的共同世界，在這種「隔絕」(isolation)與「孤單」(loneliness，意即：喪失生活之共同世界）的存在處境，他們不但喪失了現實感，也喪失了合理健全地判斷經驗的能力，他們極易被任何勢力所鼓動。從羣衆出來的激進分子（所謂的「暴民」）在十九世紀中葉跟「帝國主義者」串聯，在無法治的「蠻荒世界」從事各種巨大的罪行，而被動的「羣衆」則受各種運動的「意識形態」所蠱惑，帝國主義的「暴民」在亞非地區的罪行，以及「羣衆」在歐洲大陸熱衷信服各種「意識形態」，這樣的經驗間接地造成孕育極權主義的溫床，最後，極權主義的封閉的邏輯推論系統與自稱能解答人類歷史之究竟意義的「意識形態」，終究能在這共同世界喪失與個人「單原子化」(atomization)的現代處境吸引「羣衆」，他們服膺這套「意識形態」至少讓他們認爲身屬某一聲勢浩大的「部落團體」，不論是自稱「人種之主宰」或者自稱「歷史必然性之領導」的「部落團體」，而能感受到生活的一點點尊嚴。

猶太人的命運隨著這樣的歷史的轉變逐步被推向深淵。護衛他們之政治社會地位的「民族國家」，其憲政法治結構受帝國主義擴張而動搖，以及它所保障之人權與法律之平等抵擋不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及隨之而起的民族或種族歧視之壓力，在這種處境下，猶太人具有的文化特殊性及他們

在現代歷史中跟「民族國家」的緊密關係，遂變成種族之歧視與仇恨的顯著目標。

扼要地說明《極權主義的起源》的論述主題，提供讀者簡略的綱領，希望有助於讀者閱讀這部被視爲西方現代經典名著。最後，讓我們思考的問題是：鄂蘭在這部著作中處理1890年代西方現代的困境與極權主義的本質與歷史根源，對我們能提示甚麼反省之資源？細讀這部論著，不難發現：鄂蘭透過歷史的解釋與敍述，說明西方現代之「民族國家」（它的契約論式的個人主義基礎、它對人權之保障與形式之平等的承諾……等被視之爲西方現代性之成就）本身具有的脆弱性格，如上所說，「民族國家」的憲政法治結構經不起經濟的無限擴張，更甚者，它抵擋不了各種以血緣關係、語言文化、區域認同爲基礎組合成的「族羣」所揭示之「政治認同」的意識形態的攻擊，最後，代表啓蒙理念、法治倫理與寬容原則的西方現代性是否如我們想像的如此根基穩固？同時，西方現代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與科技所承諾的繁榮富庶，是否證明祇是夢想？如果說西方的現代性在某種程度上構成我們的傳統，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的深刻反省是值得我們去閱讀與理解的。

它既不歸結於過去，也不歸結於未來。
它只是走過，一切都存於現在。

——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

初版序

一個世代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其間一系列局部戰爭和革命從未間斷過，其後被征服者未得到任何和平條約，勝利者也未得到休養生息，卻以預料剩下的兩個超級大國之間可能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而告終。這一等待的時刻就像喪失了所有的希望之後的平靜。我們不再期望最終能恢復那種舊世界秩序及其一切舊傳統，也不再期望五大洲的人們重新統一團結；他們被扔進由戰爭和革命的暴力產生的混亂之中，而這一切的日益衰微仍被忽略了。我們看到同一種現象在極不相同的條件下和全然相異的環境裡發展——精神上的無家可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飄流無根的心緒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對未來感到無法預料，我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依賴各種政治力量，我們無法相信它們會遵從常識和自我利益的法則——如果根據本世紀以前的標準來判斷，這些是瘋狂的政治力量生命。人類似乎分裂成兩種類型，一種人相信人無所不能（他們認爲，只要懂得如何組織羣眾，那麼一切都將是可能的)，而另一種人則認爲，他們生命中的主要經驗是無力感。

在歷史眼光和政治思考的層次上，流行著一種含糊不清的共識，即一切文明的本質結構已經到了崩潰的臨界點。儘管文明在世界的某些地方比其他地方保持得更好，但是它在任何地方都無法引導本世紀的可能前途，或對其中可怕的事件作出適當反應。絕望的希望和絕望的恐懼往往比起平穩

的判斷和審愼的洞悉，更接近上述事件的中心。比起那些魯莽地一頭鑽進樂觀主義的人來，那些全然相信世界將不可避免地毀滅的人會更善於忘卻我們時代的各種中心事件。

本書的寫作背景就是針對這兩種魯莽的樂觀和輕率的絕望態度。我認爲，進步(Progress)和毀滅(Doom)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它們都是迷信的見解，而不是信念的結果。我相信應該有可能發現一種隱形機制——我們的政治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全部傳統因素根據這種機制都溶入一種積澱，使一切都顯得失去具體價值，而人類卻無法靠理能力來辨認它，也不能利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屈從於唯一的解體過程，這是一種不可抗拒的誘惑，因爲它不僅假設了「歷史必然性」的虛假輝煌，而且也使除它以外的一切都開始顯得無生命、無血色、無意義，而且不眞實。

有一種信念認爲，地球上發生的一切事物必定都是人可以理解的，這會導致以平庸的觀點來解釋歷史。理解(comprehension)並不意味著否定暴亂，援引先例來演繹史無前例的事實，或者用類比和概括來解釋現象，以致令人不再感到現實的衝擊和經歷的震動。相反，理解意味著有意識地檢視和承負起本世紀壓給我們的重擔——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壓下卑躬屈膝。簡言之，理解意味著無論面對何種現實，總要坦然地、專心地面對它、抵抗它。

在此意義上，就必然可能面對和理解一種暴亂的事實，即猶太人問題。它是一種很小的（而且在世界政治中很不重要的）現象，但是反猶主義卻成爲先是納粹運動，接著是世界大戰，最後建立死亡集中營的觸發原因。還有，原因與結果之間如此奇特地不相稱，引發了帝國主義時代，其經濟困境在幾十年時間裡導致了全世界政治狀況的深刻轉變。還有，極權主義運動玩世不恭地發誓遵奉「現實主義」，而它們卻明顯地蔑視現實的本質，這兩者之間構成了奇怪的矛盾。還有，現代人實際的權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

大，足以使他向自身存在其中的宇宙挑戰，但是現代人無能居住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的世界，並理解其意義，權力與無能之間的不相稱令人沮喪。

極權主義企圖征服和統治全世界，這是一條在一切絕境中最具毀滅性的道路。它的勝利就是人類的毀滅；無論在哪裡實行統治，它都開始摧毀人的本質。然而若想躲避本世紀的各種毀滅性的力量，又幾乎是徒勞無功。

問題是，我們的時代是好壞交織的奇怪時代，即使沒有帝國主義的「爲擴張而擴張」，世界也永遠不可能變成一個；即使沒有資產階級「爲權力而奪權」的政治手段，也永遠不可能發現人類力量的界限；即使沒有極權主義運動對世界的虛構，在其中無比明確地驅除我們時代種種重大疑惑，我們也可能在毫未意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時就已被趕到了世界末日。

假如在極權主義的最後階段眞的出現了絕對的惡（說它絕對，是因爲從人類可理解的動機來看無法再惡化了），那麼如果沒有它，我們就不可能懂得「惡」的眞正的、徹底的本質是什麼，這也是眞的。

反猶主義（不僅僅是仇視猶太人），帝國主義（不僅僅是征服），極權主義（不僅僅是專政）——一個接著一個、一個比一個更野蠻，這說明人類尊嚴需要一種新的保障。這種保障只有在一種新的政治原則，在一種新的世界法律中才能找到。這一次，它的有效性應該包括整個人類，而它的權力應該受到嚴格限制，在新界定的地域統一體中扎根，並且受到控制。

我們不再能接受過去好的部分，簡單地稱之爲我們的傳統遺產，只拋棄過去壞的部分，簡單地認爲它是一種已死的重負，會被時間埋葬在遺忘中。西方歷史的潛流終於浮上了水面，取代傳統的尊嚴。這就是我們所生活的現實。這也就是爲什麼想逃避嚴酷的現在、懷舊地躲進對仍然原封不動的過去，或者在遺忘中預先奔進一個更好的未來的一切努力終將徒勞。

漢娜・鄂蘭

1950 年夏

第一部 〈反猶主義〉序言

反猶主義(Antisemitism)是一種世俗的十九世紀意識形態。它的名稱——雖然不是它的爭論之處——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之前還不爲人知曉。它同宗教方面由於兩種不同的教義互相敵對而煽動起來的仇視猶太人(Jew-hatred)明顯地不是一回事；甚至連反猶主義是否從仇視猶太人獲得理論根據和感情緣由，也還是個問題。從羅馬帝國末期到中世紀、近代和現代，猶太人連續不斷地遭到迫害、驅逐和屠殺，有一種觀點認爲，反猶主義只不過是中世紀普遍迷信的一種世俗翻版，❶這種觀點常常掩飾著一種謬論，它無異於(儘管它的有害程度比不上)一種相應的反猶主義說法，說是有一個秘密的猶太社會，自古以來一直統治著，或者有野心去統治世界。從歷史上看，中世紀晚期到近代，猶太人事務的間斷比古羅馬到中世紀之間的斷裂更顯著，也比從中世紀早期到災難性的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之間的鴻溝（這常被認爲是猶太人歷史上走向散居〔Diaspora〕最重要的轉折點）更明顯。因爲中世紀晚期到近代的間斷持續了將近兩個世紀，從十五世紀一直到十六世紀末，期間猶太教與異教之間的關係(Jewish-Gentile relations)降到了有史以來最低點，猶太人「對外部世界條件與事件的漠不關心」卻達到最高點，而猶太教成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封閉的一種思想體系。」就在此時，猶太人在並無外來干涉的情況下開始思考「猶太民族和各民族之間的差異不在於教義和信仰，而在於內在天性」，猶太人同異教徒之間古老的二分法，「與其說是教義爭執，不如說是種族根源。」❷這種對猶太人異種特徵的評價只是到了較晚的啓蒙時期(Age of Enlightenment)才在非猶太人中盛行，並且明顯地是產生反猶主義的必要條件，重要

的是必須指出，它首先產生於猶太人的自我解釋，當時歐洲基督教世界分裂成許多種族臺體，它們在政治上各自進入近代國家的體系。

反猶主義的歷史同仇視猶太人的歷史一樣，是在猶太人散居的條件下猶太人同異教徒之間關係的長期纏結之重要部分。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前，人們對這段歷史實際上不感興趣，這種興趣的產生是在反猶主義興起時，及狂怒地反對解放和同化猶太民族之時——這明顯地是建立可信的歷史紀錄的最壞基底。❸自從那時起，猶太的和非猶太的歷史著作都一樣荒謬地——儘管大多數出於各種相反的理由——將源自基督教和猶太教的敵對因素孤立起來，強調一系列災難、驅逐、屠殺切斷了猶太歷史，正如他們強調歐洲歷史被各種武裝的和非武裝的衝突、戰爭、飢饉、瘟疫切斷了一樣，更無須補充說，正是猶太歷史著作以強烈的理論偏見來追述基督教歷史上仇視猶太人的記錄，而又是反猶分子在追蹤和古代猶太權威在知識上並非太不同的記錄。當基督徒和異教徒之間經常性的暴力衝突的猶太傳統公諸於世時，「一般猶太公眾不僅憤怒，而且眞正感到了震驚，」❹猶太傳統的代言人如此成功地使他們自己和每一個人都相信一個非事實，猶太人的隔離狀態完全出於異教徒的仇視和缺乏啓蒙。現在主要是由一些猶太歷史學家在堅持這樣的觀點：猶太教一向高於其他宗教，因爲它相信人類平等和寬容。這種自信的理論，以及相信猶太人一向是被動在基督教迫害下受難，事實上延長了關於上帝選民的古老神話，並且使這種神話現代化，這勢必結束在一種新的、往往是非常複雜的隔離情況，註定要支撐古老的「猶太—異教」的兩分法。這似乎是爲了那些不管出於何種原因，都試圖潤色和竄改政治事實與歷史記錄的人所積聚的反諷之一。因爲如果猶太人在任何一點上同他們的非猶太人鄰居一致擁護他們新近宣稱的平等的話，那麼正是在宗教上命中註定互相敵視的過去歷史，是和其最高層次的文化成就，及在未受教育的大眾層次上無限的狂熱和野蠻的迷信，同樣豐富。

然而，這種猶太歷史書寫中令人不快的刻板印象也還是建立在歷史事

實的堅實基礎上，而不是基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歐洲猶太民族過時的政治與社會需要。猶太文化史遠比當時假設的情況複雜，在不同的歷史情況和地理環境中，災難的原因也各不相同，事實上他們在非猶太的環境裡的差異也比在猶太羣體裡更大。迄今爲止在猶太歷史著作中仍流行的錯誤概念，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在猶太神廟被摧毀以後，他們就不曾再擁有自己的領土和國家；他們總是依靠非猶太當局的保護才得以存身，儘管「直至十三世紀，猶太人在法國和德國」允許採取一些自我保護的手段，有權攜帶武器。❺這並不意味著猶太人一向被剝奪了權力，但在事實上，在任何一次暴力的爭鬥中，不管出於何種原因，猶太人不僅脆弱無能，而且孤立無援，所以很自然，在幾個世紀裡，在完全疏離的情形下起而爭取政治平等之前，一切突發的暴力在他們的體驗中只是一種重複。再者，在猶太傳統中，災難被理解爲殉道(martyrology)，在紀元第一世紀就有此歷史基礎，當時猶太教和基督教都曾反抗過羅馬帝國的威力；在中世紀，是否選擇以免遭迫害，這是猶太人依然面臨的問題，即使暴力的原因不是宗教，而是政治和經濟。這些事實整體助長了一種幻覺，從此以後使猶太和非猶太歷史學家們痛苦不堪。歷史書寫「到目前爲止還在論述基督徒從猶太人的分離，而不是相反，」❺於是便抹煞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事實——猶太人脫離異教世界，尤其是脫離基督教環境，主要同猶太歷史有關，而不是相反。這裡有一種明顯的原因：人們作爲一個一致的整體，其生存取決於自願的隔離狀態，而不是像目前假設的那樣，取決於基督教和非猶太人的敵視。只有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在獲得解放和到處同化之後，反猶太主義才在民族的保存中發揮作用，因爲只有在此時此刻，猶太人才渴望被非猶太社會接納。

當十九世紀全歐洲受過教育的階級中普遍流行反猶太情緒時，除了很少的例外，反猶主義作爲一種意識形態，在總體上一直是瘋狂者的特權，而具體上則處於瘋狂邊緣。甚至連猶太教義辯護中一些含義不明的論點，儘

管從未使人信服除了那些原就已相信的人，但其中那些氣勢恢宏的博學例子和研究文獻，和猶太教的敵人所提供的歷史研究不相上下。❼戰爭結束以後，我爲寫此書而收集材料，查閱跨越十幾年的文獻資料和精采的手稿，竟然不見有一篇全面論述這一主題的文章夠得上歷史學術研究的基本標準。自那以後，情況也無甚改觀。近來猶太歷史研究比以往多了，但要想全面地、眞實地論述猶太歷史，這一點就更値得探索了。二十世紀的政治發展將猶太人驅趕到了各種事件的風暴中心；猶太人問題和反猶主義在世界政治中相對上並不是一種重要現象，卻首先成了納粹運動興起和建立第三帝國(Third Reich)組織結構的觸發因素——第三帝國的每一個公民都必須證明他**不是**一個猶太人——隨後觸發了史無前例的世界大戰暴行，最後又造成了西方文明中亙古未有的種族滅絕。對我而言，這一切不僅只感到悲哀及提出譴責，更應該有一種全面的理解。所以，我這本書就是嘗試去了解那些乍看之下就只是令人憤怒的事情。

當然，理解並不意味著不能從已有的結論中大膽地推論出前所未有的結論，或者用類比和概括的方法解釋如今不再被體驗的現實的衝擊和令人震驚的經驗等等現象。反而是要有意識地檢視和承擔歷史事件賦與我們的重任——旣不否定它們的存在，也不卑順於其沉重性質，似乎事實上發生過的一切都只是歷史的必然。總之，理解意味著不先入爲主、認眞地面對並抗衡現實——不管它可能是什麼，或曾經是什麼。

要作全面理解，對十九世紀歐洲猶太歷史和反猶主義發展的情況的某種熟悉程度是必不可少的，雖說當然還是不夠的。下面各章論述十九世紀歷史中實際上屬於「極權主義的起源」的各種因素。反猶主義的全面歷史也有待於寫出，但這不屬於本書的範圍。只要還存在這一塊空白，就完全有理由（即使只從學術研究的目的出發）發表下列各章，作爲一部更全面的歷史著作中的獨立部分，雖說我原先只想將它當作極權主義先期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再者，反猶主義的歷史落入非猶太的狂想者和猶太辯護者

的手上，却被著名的歷史學家們小心翼翼地迴避了，其眞相「已作了必要修正」，也成爲表現在後來的極權主義現象中的幾近所有成分；它們很少受到智識者和輿論的注意，因爲它們屬於歐洲歷史中的一股潛流，既未公開，亦未受到啓蒙了的人們的關注，它們已經能夠集合成一種完全使人預料不到的毒素。

由於只有最後集中爆發的災難才使這些潛流浮現並受到大衆關注，於是出現了一種傾向，將極權主義簡單地等同於其成分和起源——似乎反猶主義或種族主義(racism)或帝國主義(imperialism)等等每一種發生形態都可以說成是「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這種謬誤會導致在尋找歷史眞理時誤入歧途，在作政治判斷時得出有害結論。極權主義政治遠非單純的反猶主義或種族主義或帝國主義或共產主義，它使用或妄用自己的各種意識和政治成分，直至實際現實(factual reality)的基礎完全消失爲止——而意識形態是從這些基礎上產生力量和宣傳價值，例如階級鬥爭的現實，或者猶太人同他們的鄰居之間的利益衝突。低估純粹種族主義在美國南部各州政府的角色將會是一種嚴重錯誤，不過，如果由此得出結論說，美國的很大一塊地區一百多年來一向在極權主義統治之下，這將會是更嚴重的謬誤。十九世紀反猶主義運動眞正直接的結果不是納粹主義(Nazism)，相反倒是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至少根據它的西方意識形態形式來看，它是一種反意識形態(counterideology)，是對反猶主義的「回答」。這並非說猶太民族的自我意識是反猶主義製造出來的；即使只是粗略地了解猶太歷史，知道自從猶太人被驅逐出巴比倫以後，他們的中心問題一直是如何在全面分散的困境下爭取生存，也就應該打破這樣一種最近的迷思——這是自從沙特以「存在主義」觀點解說**這些**由別人來看待和下定義的猶太人之後，在知識界頗爲流行的迷思。

對先期極權主義與極權主義的反猶主義之間的區別及聯繫的最佳描述或許就是那個關於「錫安長老們的草案」(Protocoles of the Elders of

Zion)的荒謬可笑的故事。納粹利用這一僞說作爲征服全世界的教科書，這當然不是反猶主義歷史的組成部分，但是只有這一段歷史才能解釋爲何這個不可能發生的故事卻好像頗有道理，被反猶太宣傳一開始就利用。另一方面，它不能解釋爲何極權主義要想統治全世界，卻要用一個秘密會社(secret society)的成員和方法來實行，這竟能成爲一種吸引人的政治目標。這種從政治（並非宣傳）方面有更多關係的作用，其根源一般是在帝國主義中，特定而言則是在歐洲大陸所產生的爆發形式，即所謂的「泛—運動」(pan-movements)。

本書所述的時空與主題都很有限，所分析的中歐與西歐猶太歷史的時間跨度也只從宮廷猶太人到德雷富斯事件(Dreyfus Affair)，因爲後者同反猶主義的產生有關，並且受反猶主義的影響。反猶主義運動十分牢固地根植於「猶太—異教」關係中特有的各種現實，即猶太人一方面在民族國家的發展中、另一方面在非猶太社會裡所扮演的角色。最初的反猶主義出現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而八十年代則標誌著利益衝突和明顯的經驗的有限實際基礎已被超越，一條道路打開了，它一直通向「最後解決方案」(the final solution)才告終。從那時起，在帝國主義時代，緊接著是極權主義運動和極權政府時期，這就不再可能使猶太人問題或反猶主義意識形態孤立於事實上幾乎完全與猶太現代歷史現實無關的問題之外。而這不僅僅是、也不主要是因爲這些事情在世界事務中有很重要的作用，而是因爲反猶主義本身現在被用於其他的目的，雖然這最終使猶太人成爲其主要犧牲品，但是這些目的却將關於猶太和反猶太的一切具體問題都拋開了。

讀者將在本書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見到二十世紀反猶主義分別在帝國主義和極權主義中的表現形式。

漢娜・鄂蘭

1967 年 7 月

註釋

❶這種觀點的最近例子是諾曼・科恩(Norman Cohn)的《種族屠殺的許可：關於猶太人世界密謀的神話與「錫安長老們的草案」》(*Warrant for Genocide: The myth of the Jewish world-conspiracy and the "Protocoles of the Elders of Zion"*)(紐約，1966)，作者從一開始敍述起，就暗含著對猶太人歷史的徹底否定。在他看來，猶太人是「分散居住在從英吉利海峽到伏爾加河的整個歐洲的人，除了堅守著猶太教以外，很少有共同點」(15 頁)。相反，反猶主義者也可以指稱從中世紀以來「猶太人一直被視作撒旦的代表，他們崇拜魔鬼，是人形的惡魔」(41 頁)，穿越時空的、不可分割的直接血統世系。而《追尋千福年》(*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的那位學識豐富的作者在一舉概括的說法中唯一符合事實之處，是他論述到「反猶主義最致命的一面，造成了屠殺和試圖實行種族滅絕」(16 頁)。此書相當費力地想證明「德國人民大眾從未眞正瘋狂地反對過猶太人」，他們的滅絕「主要由專職的國社黨徒和黨衛軍組織和執行的，」屍體「絲毫不能代表德國社會典型的剖面」(212 頁及其後)。這種說法如何能稱得上是公正地敍述事實！這使此書讀來彷彿是四十年前一位過於機靈的反猶運動組織(Verein zur Bekämpfung des Antisemitismes)成員寫的不愉快的回憶錄。

❷此處引文皆出自雅考伯・凱茨(Jacob Katz)《排他性與容忍：中世紀與近代的猶太人與異教徒關係》(*Exclusiveness and Tolerance: Jewish Gentile Relations in Medieval and Modern Times*)，紐約，1962，第 12 章。此書係獨創性研究專著，作者盡了最大努力，本應像書封面上宣稱的那樣探討「當代猶太人孕育的許多觀念」，然而並未做到，因爲它幾乎被一般人完全忽略了。凱茨屬於年輕一代的猶太歷史學家，他們之中許多人在耶路撒冷大學執教，用希伯萊文發表著作。他們的著作爲何沒有較快地在美國翻譯並發表，這是一個謎。薩洛・貝隆(Salo W. Baron)將近四十年前竭力反對的這種猶太歷史的「悲哀」寫法事實上隨著他們而告終了。

❸有意思的是，十九世紀中葉用德文寫作的近代第一位猶太歷史學家約斯特(J. M. Jost)比一些傑出的後繼者們更不會有世俗猶太歷史文獻中的普遍偏見。

❹凱茨，前引書，196 頁。

❺同上，6 頁。

❺同上，7 頁。

❸唯一的例外是反猶主義的歷史學家沃爾特・弗蘭克(Walter Frank)，納粹帝國新德國歷史研究所(Reichsinstitut für Geschichte des Neuen Deutschlands)所長，九卷本《猶太人問題研究》(*Forschungen zur Judenfrage*, 1937-1944)的主編。至於弗蘭克個人的作品也大有參考價值。

第二部 〈帝國主義〉序言

一個歷史時期的開始是很少能有精確日期的，而同時代的觀察家也極少有機會目睹它的確切終結，但是對帝國主義時期而言卻做到了這兩點，帝國主義產生於殖民主義(colonialism)，是在十九世紀最後三分之一的時間裡由民族國家(nation-state)制度同經濟與工業的發展不相適應而引起的，到了 1884 年左右，開始其爲擴張而擴張的政治，這種新形式的權力政治與邊界戰爭的民族征服不同，更不同於羅馬帝國建立的方式。在印度宣告獨立「陛下的帝國」滅亡成了既定事實之後，——這是邱吉爾曾經拒絕主導的——它的終結也就不可避免了，英國自願結束在殖民地的統治，這也是二十世紀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此以後，沒有哪個歐洲國家能夠擁有海外殖民權。唯一的例外是葡萄牙，當歐洲其他殖民霸權國都不得不放棄殖民地時，它有奇怪的能力去繼續戰鬥，這也許應歸因於它的民族落後性而不是薩拉扎爾(Salazar)的專制統治；不光出於一代人經歷的兩次屠殺性大戰後的虛弱與疲憊，也出於已開發的諸民族國家的道德顧忌和政治理解力，使他們反對使用極端手段，而是使用有可能擊破印度的非暴力抵抗運動的「行政屠殺」(administrative massacres)(卡西爾〔A. Carthill〕語)；而反對繼續實行對「臣屬種族的統治」(government of subject races)(克洛默〔Cromer〕勛爵語)，是因爲非常恐懼會造成使君主國自食其果的影響。當法國——幸好當時戴高樂的權威尚未受損——最終敢於放棄阿爾及利亞這塊「屬於法國一部分」的領地時，歷史趨勢就永遠不可能回頭了。

如果反對納粹德國的熱戰之後不緊隨著出現蘇聯和美國的冷戰，那麼

不管歷史的希望有什麼優點，人們在回顧時，會將最近二十多年的時間看作是兩個最強大的國家在互相競爭，搶奪歐洲國家以前統治過的同一些地區。人們會以同樣的觀點看待蘇聯與美國之間十分勉強的新緩和其實是出現了中國這個潛在的第三個世界超級大國的結果，而不是在斯大林死後蘇聯非極權主義化健康而自然的結果。假如歷史的發展能證實上述嘗試性的假設，那就意味著從歷史角度來看，在一個非常大的範圍上，我們將回到開始時的起點，即回到帝國主義時代，走上曾經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衝突的道路。

經常有人說，英國是在心不在焉的情況下取得「大英帝國」的，這是自動潮流的結果，完全出於可能性和嘗試性，而不是刻意建立的政策結果。如果這是眞的，那麼通向地獄之路很可能在無意間鋪成，就像俗話所說無意中走上天堂之路一樣。而在今天，客觀事實可能會造成回到帝國主義政策的趨向確實十分強烈，令人相信至少在半眞半假的宣言中，美國和蘇聯雙方空洞保證的善意——美國對不可能發生腐敗與無能狀態的「承諾」，蘇聯關於民族解放戰爭的假革命言論——都經不起檢驗。落後地區民族建設的過程缺乏民族獨立的一切先決條件，加上猖狂而毫無結果的沙文主義成正比，造成巨大的權力眞空，致使超級大國對之爭奪愈演愈烈，隨著核武器的發展，暴力手段直接對峙作爲最後「解決」一切衝突的途徑，似乎必定失效。在這些廣袤的地區，不僅是未開發的小國中間的衝突——例如越南的內戰或中東的民族衝突——即刻吸引了超級大國潛在的或事實上的干涉，而且它們的衝突，至少是衝突發生的時間，很値得懷疑是受到操縱的，或由操縱者的利益引起的，而和該地區的衝突與利益本來毫無關係。帝國主義時代強權政治最主重的特點，是地區性的、有限的、因而也是可預料的民族利益的目標轉爲無限地追求強權，漫遍全世界並使之變成荒原，在民族和領土方面無特定目標失卻可預測的方向。在意識形態的層次上，這種倒退也很明顯，根據著名的多米諾理論(domino-theory)，美國的外交政

策認爲，在一個國家裡發動戰爭是爲了其他國家的內在統一，即使這些國家並非鄰國，這明顯地只是舊的「偉大遊戲」(Great Game)的新翻版，其規則容許甚至導控將所有的國家當作踏腳石，或者當作棋盤上的兵卒，用今天的話來說，是爲了富國之間爭奪對第三個國家的統治權，這反過來又成了強權擴張和積聚財富的無休無止的過程中的踏腳石。這種連鎖反應正是帝國主義強權政治的內在本質，它最恰當地表現爲人類中的特務形象，對此，正如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小說《基姆》(*Kim*)中說的：「直到每一個人都死去，偉大遊戲才結束，在這之前則不會。」然而他的預言不會實現，唯一的理由是有憲法對民族國家的約束，今天我們唯一希望它在將來也不會實現，就是根據美國的共和憲法的約束，外加核武器時代的技術約束。

這並非否定帝國主義政策及方法會在條件和環境極大地變化的情況下，出人意料地捲土重來。發動海外擴張的禍首從英國和西歐轉到美洲，而發動地緣上緊密相連地區的擴張不再起始於中歐和西歐，而必定是蘇聯無疑。帝國主義政策比起其他單一因素來，更是引起歐洲衰弱的原因，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們預言，兩個巨人分別從東邊和西邊威脅歐洲，它們是昔日歐洲強權的繼承人，終將會變成事實。誰也不會以「白種人的負擔」(the white man's burden)和「擴大部落意識」(enlarged tribal consciousness)來統一種族起源類似之人民這兩種理由，再爲擴張辯護；相反，我們聽到的是對附屬國的「責任」、強權的責任及支持革命的民族解放運動。「擴張」(expansion)這個詞從我們的政治詞彙中消失了，現在用「延伸」(extension)或者關鍵性的「過分延伸」(overextension)來涵蓋非常相同的含義。政治上更重要的是帝國主義發展初期最重要的動作——國外私人投資——如今被政府直接提供的軍事外援和經濟外援所取代。(僅在 1966 年，美國政府的經濟援助和對外信貸達四十六億美元，外加從 1956 年到 1965 年這十年中每年的軍事援助十三億美元，而私人資本的外流在 1965

年是三十六億九千萬美元，在 1966 年是三十九億一千萬美元。）❶這意味著所謂金元帝國主義(dollar imperialism)，尤其是政治上危害最小的二次大戰前的美國式帝國主義無疑已成過去。私人投資——「成千家美國公司在上百個國家從事的活動」和「集中在外國經濟中最現代的、最有戰略意義的、發展最迅速的部分」——製造了許多政治問題，即使它們未受國家力量的保護。❷但是對外援助即使出於純粹的人道主義原因，它的性質仍是政治的，因爲它的動機不是追求利潤。幾十億美元花費在政治和經濟的荒原上，那裡的腐敗和無能使這些援助在未能開始做一些有效事情之前便已消失，這些錢不再是原本可以在國內有效投資和利用的「過剩」資本，而是富國的富有者有能力損失的、純粹膨漲瘋增的多餘資金。換言之，利潤動機對於帝國主義政策的重要性在過去經常被高估，而現在卻完全消失了；只有非常富有和非常強大的國家才能承受帝國主義會造成的巨大損失。

要自信地分析和確定這些晚近的趨勢，也許還爲時過早，並且也超出了我的思考範圍。甚至在目前是明顯，却也令人不愉快的是，某些似乎無法控制的過程之力量正要摧毀在新國家內建立憲法的一切希望，並破壞舊國家內的共和體制。這樣的例子不計其數，但是直到最近才揭發出來的秘密機構成爲「隱形政府」(invisible government)，影響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以及文化、教育、經濟等各個部門，這種過於不祥的預兆令人無法默然置之。毋庸置疑，艾倫·杜勒斯(Allan W. Dulles)先生指出說，美國的情報機構自 1947 年以來「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更有效地對政府具有影響力，」❷同樣也沒有理由去相信，自從他在 1958 年說了這番話之後，這種影響力會減弱了。常常有人指出「隱形政府」對「有形政府」機構構成了致命危險；也許人們不太知道帝國主義政治、「隱形政府」統治、特務這三者之間傳統的密切關係。如果信以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在國內創建一個特務系統是直接針對蘇聯特務網對美國民族生存的威脅，這就錯了。戰爭將美國推到世界上最強國家的地位，正是這個世界強國，而不是民族

生存問題，才受到由莫斯科指揮的共產主義革命力量的挑戰。❹

無論美國上升爲世界霸權的原因何在，外交政策的刻意追求或任何統治全球的主張，卻不在原因之列。美國最近仍在走向帝國主義強權政治方向，它的政府形式與任何其他國家的政府形式不大相符，這一點或許也是實情。西方國家同世界其餘國家之間的巨大鴻溝，不只而且主要不在於財富，而在於教育、技術、以及總體能力的差距，分裂了自從眞正的世界政治開始以來的國際關係。這道鴻溝在最近幾十年傳播系統迅猛發展終使地球上距離縮短的壓力下，並未趨向弭平，反而不斷增擴，現在快到了眞正令人驚覺的地步。「未開發國家的人口增長率是已開發國家的兩倍，」❺僅此因素足使它們有必要向有剩餘食品、剩餘技術和政治知識的國家求援，也正是這一因素使一切援助失敗。很明顯，人口越多，每人得到的平均援助越少，而事實眞相是，在二十年大規模援助計劃之後，一切從開始起就未能自助的國家——例如日本——就更窮了，而且比以往更加處於經濟上、政治上不穩定狀態。這種情勢對於帝國主義來說是一些機會，使它們在恐懼中改變看法，認識到一條簡單的道理：數目眾多絕不可等閑視之。南非少數白人實行暴君式的統治，人數少到以一比十，如今恐怕是最安全的情況了。是客觀情勢將一切外國援助轉化爲外國控制的工具，並將一切需要這種援助以挽回其日見減少的生存機會的國家推向一種選擇：要麼接受某種形式的「對臣屬種族的統治」，要麼迅速淪入無政府的衰亡。

本書只論述嚴格定義的歐洲殖民帝國主義，它的終結以英國放棄對印度的統治爲標誌。它道出了民族國家的解體，包含了後來產生極權主義運動和極權主義政府的幾乎全部必要成份。在帝國主義時代以前沒有世界政治，而若沒有世界政治，極權主義宣布要統治全世界就毫無意義可言。在這段時間裡，民族國家制度既無力制定新規則，處理已轉變爲全球事務的外交事務，也無力對世界實行羅馬帝國統治式的和平。它在政治上的狹隘性和目光短淺必定走向極權主義的災難，它那前所未有的恐怖掩蓋著可怕

事件，以及更可怕的精神狀態。學術界的研究幾乎毫無例外地集中在希特勒的德國和斯大林的蘇聯，而不顧他們的爲害較輕的先驅們。帝國主義的統治，除了用來當作名稱之外，似乎呈半遺忘狀態，因此，爲什麼這是很可悲的，主要理由是近年來它和許多當代事件的關係已變得非常明顯。於是，關於美國對越南不宣而戰的論爭從兩方面進行，或者將它類比成慕尼黑事件，或者從三十年代借用例證，當時的極權主義統治確實非常明顯，非常突出地具有危險性，但是今天政策的威脅在言論和行動中更是明顯，同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行動和言辭辯解驚人地相似，一個邊緣地區的微小利益成爲一顆小小的星火，便會引發起一場全世界的戰火。

強調這個半被遺忘的時期和各種當代事件之間不愉快的聯繫，當然並不意味著我們已不可挽回地進入帝國主義政策的新時期，也不是說在一切情況下帝國主義都必然結束於極權主義的災難。無論我們能從以往歷史中學得多少，都不能使我們預知未來。

漢娜・鄂蘭

1967 年 7 月

註釋

❶統計數字引自萊奥・莫德爾(Leo Model)，〈私人國外投資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rivate Foreign Investment)和肯尼思・考夫曼(Kenneth M. Kaufman)和海倫娜・斯篤爾森(Helena Stalson)，〈1956-1965 美國對不發達國家的援助〉(U. S . Assistance to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1956-65)，(皆刊於《外交雜誌》〔*Foreign Affairs*〕1967 年 7 月)。

❷莫德爾的前引文章（641 頁）對這些問題作了非常有價值的中肯分析。

❷根據戴維・懷斯(David Wise)和托馬斯・羅斯(Thomas B. Ross)，《隱形政

府》(*The Invisible Government*)(紐約, 1964 年版, 2 頁)所說, 這是杜勒斯先生 1957 年在耶魯大學的演講。

❹據杜勒斯先生所言, 政府必須「以火對火」, 接著這位前中央情報局局長坦率地解釋, 中央情報局參照蘇聯國家安全局的樣式而建立, 後者「超過一個秘密警察組織, 超過一個間諜與反間諜組織。它是一種**顛覆、控制、暴力的工具, 秘密干涉別國的事務**。」(重點係作者所加。見杜勒斯《情報技術》〔*Craft of Intelligence*〕, 紐約, 1963, 155 頁。)

❺見奧維爾・弗利曼(Orville L. Freeman), 〈馬爾薩斯、馬克思、北美產糧地區〉(Malthus, Marx and the North American Breadbasket), 載《外交雜誌》1967 年 7 月, 此文富有指導性意義。



第三部 〈極權主義〉序言

一

《極權主義的起源》最初的手稿完成於 1949 年秋天，這是在希特勒德國失敗之後四年多，在離斯大林去世還有不到四年的時候。本書初版於 1951 年。回顧往事，我從 1945 年開始寫這本書，這幾年似乎是幾十年來的動盪、混亂、恐怖之後第一個相對平靜的時期。在那幾十年裡，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發生了一系列的革命，極權主義運動興起，破壞議會政府，緊接著是各種各樣的新暴政，法西斯主義(Fascist)和半法西斯主義(Semi-Fascist)，一黨專政與軍事獨裁，最後是表面上牢固地建立在羣眾支持基礎上的極權主義政府❶：1929 年的俄國，現在常常將這一年稱爲「第二次革命」，以及 1933 年的德國。

隨著納粹德國的失敗，故事的一部分就結束了。看來這是第一次能在適當的時刻用歷史學家的回顧眼光和政治學家的分析熱情來看待當代各種事件的時候了，這也是第一次有機會嘗試敍述和理解已經發生但尚未經過研究的歷史，儘管帶著悲哀與痛苦，帶著感傷的傾向，然而畢竟不再處於無言的憤怒和無能的恐怖之中了。(我在這個版本中保留了初版序言，意在顯示那些歲月裡的心緒。)無論如何，在這個時刻有可能提出和思考一些問題，我們這一代人曾經不得不努力度過自己的成年人生活：**發生了什麼事？爲什麼發生？是怎樣發生的？**德國的戰敗，留下了一個廢墟中的國家，一個感到自己墜入歷史上「零點」的民族，原封未動的文件堆成山，還有希

特勒在十二年裡努力維持的「千年帝國」(Tausendjähriges Reich)的各方面數不淸的文件資料。對這些一直未被出版和硏究、「豐富得無從選擇」的資料首次作粗略選編，連同 1946 年「紐倫堡審判主要戰犯」，開始出現在十二卷《納粹陰謀與侵略》(*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中。❷

當我這本書的第二版 (平裝本) 於 1958 年出版時，在圖書館和檔案館裡可以見到更多的文件和資料了。當時我掌握的材料足以引起興趣，但是對我原先著作中的分析和論述幾乎沒作實質上的修改。比較可行的是在註腳中補充和更換引文，因此就擴大了文本。但是這些還都只屬於技術上的修改。1949 年，紐倫堡審判文件只有部分以英文譯本披露，1933 年至 1945 年之間德國出版的大量書籍、小冊子、雜誌還無法借閱。另外，在一系列補充中，我敍述了斯大林去世後的一些比較重要的事件——他的繼任者的危機，以及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在第二十次國代會上的報告——還包括最近出版物中關於斯大林政府的新消息。所以，我修改了第三部和第二部的最後一章，而第一部〈反猶主義〉和第二部〈帝國主義〉的前四章保留不動。再有一些嚴格地屬於理論性質的洞見，與我對極權控制諸因素的分析密切有關，這些在寫完初稿時還不曾有過，當時的結尾是很不像結論的「結語」。這一次出版本用〈意識形態與恐怖〉來取代這些「結語」，但因它們仍然有效，所以就轉併到其餘各章中去。我在第二版中增加了一篇「跋」，簡短地論述了蘇聯的制度引進衛星國以及匈牙利革命。這一段論述很晚才寫就，與全書主調不同，因爲它論述當代事件，而在許多細節上已經過時，所以我將這一部分去掉，與第二版相比，這一次版本僅此一點實質性的改變。

很明顯，戰爭的結束並未促成蘇聯極權主義統治的結束，相反的，東歐的布爾什維克化(Bolschevization)接踵而至，極權政府蔓延，和平只提供了一個具有意義的轉折點，從而得以根據前後兩個極權主義體制來分析它們機構上和方法上的相同點與不同點。具決定作用的不是戰爭結束，而

是八年以後斯大林去世。回顧往事，他的死亡似乎不單是引起了繼承者危機和暫時的「解凍」，直到一個新領袖宣布繼位，而是一種正式的、雖然從未明確聲稱過的非極權主義化(detotalitarization)過程。因此，從事件的角度看，現在也沒有必要更新這一部份內容；就我們所了解的這個探索中的時期而言，它並未有劇烈的變化值得本書作廣泛的修改和補充。德國希特勒用戰爭來發展本來就是完全極權的政府，相比之下，蘇聯在戰爭時期暫時中止了全權控制。根據我的寫作目的，從1929年到1945年，隨後是1945年到1953年，這兩段時間是我的興趣所在，我們對這兩段時間的情況所知甚微，而它們的性質和1958年、甚至1949年完全一樣。以前沒有發生過、或者說將來也不會發生什麼事情，能像納粹德國的例子一樣，為我們提供同樣明確的結局，或留下令人恐怖的、無可辯駁的證據。

唯一重要的補充是《斯摩稜斯克檔案》(*Smolensk Archive*)的內容(由默爾·費恩索德〔Merle Fainsod〕於1958年出版)，它顯示出以前對這段時間俄國歷史的全部研究在缺乏最基本的資料和統計材料方面達到了何種嚴重程度。這批檔案（由德國情報機構在斯摩稜斯克共產黨總部發現，後來由美國占領軍在德國繳獲）包含二十萬頁文件，從1917年到1938年實際上都未曾啓封，但是提供的情報數量之少令人吃驚，即使從1929年到1937年「關於大整肅的材料豐富得難以處理」，但是並不包含受害者的數字，或任何重要的統計資料。凡有數字之處，其相互矛盾性質使人失望，各種組織機構各有一套數字，唯一所知而且明確無疑的是，許多人即使未被處決，也由政府下令管制。❸同樣，這批檔案也不包含各種權威機構之間關係、「黨、軍隊和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或者黨和政府之間關係的情報，而且隻字不提通訊和指揮的渠道。總之，我們絲毫不知蘇聯政府組織結構的情形，不像對納粹德國的情形那樣一清二楚。❹換言之，人們一向知道蘇聯的官方出版物是為宣傳目的服務的，因此完全不可靠，現在看來，它的可靠資料和統計材料也許從來就不存在。

更嚴重的問題是，對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是否能忽視在中國曾經發生和仍在發生的情況。關於這一方面的情況，我們所知的比蘇聯三十年代的情況更不可靠，部分原因是這個國家在革命成功之後又成功地將自身與外國孤立起來，部分原因是中國共產黨高層的叛變者還未求助於我們——當然，這本身的意義也已足夠了。十七年來，我們對之所知甚微，無疑指出非常相關的差異：在最初相當規模的流血之後，專政統治第一年裡受害者的數目大致估計是一千五百萬人，占 1949 年人口的百分之三，比斯大林的「第二次革命」導致的人口損失少得多。當反對派組織消失之後，在中國的恐怖沒有增加，不再屠殺無辜，沒有「客觀的敵人」，沒有公開審判，只有大量的公開告白和「自我批評」，而沒有公開的罪行。毛澤東在 1957 年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百花齊放」的誤譯標題而異常出名，當然他並不呼籲自由，但是承認了階級之間、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共產黨專政下人民和政府之間的「非對抗性矛盾」。對付反對派的方法是「思想整頓」，一種精心設計的過程經常地訓練和重鑄人的大腦，全國人民似乎或多或少都須服從。我們從來不知這一切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行，誰能逃避它——也就是說，誰執行重鑄(remolding)——而且我們也不知道「洗腦」的結果究竟如何，它是否持久地、並且在事實上造成了人的個性變化。人們如果相信中國領導人當時的宣言，那麼它所造成的是很大範圍的虛僞，成爲「反革命的溫床」。假如說這是一種恐怖（它本身其實就是恐怖），那麼可以說這是一種不同類型的恐怖，無論它的結果如何，它畢竟不會使人口大量減少。它明確地承認國家利益，允許國家和平地發展，利用從前統治階級的後代們的能力，並維持學術的和職業的標準。總之，毛澤東「思想」明顯地並不遵從斯大林（或希特勒）的路線，毛澤東不是一個本能的屠夫，他的民族主義情感明顯地和一切從前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造反起義一樣，其強烈程度足以使全面統治(total domination)受到限制。這一切似乎不符合本書寫到的某些恐懼（見本書 444 頁）。

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在取得勝利之後立即將目標對準「組織上國際化、意識形態全面化、政治野心全球化」(見本書547頁)，也就是說，它的極權主義跡象從一開始起就表現了出來。隨著中蘇衝突的發展，這些跡象表現得更明顯，儘管衝突本身可以說是民族問題，而不是意識形態問題。中國人堅持要爲斯大林恢復名譽，譴責蘇聯的非極權主義化是試圖偏向「修正主義」，這已有足夠的預兆，更有甚者，伴隨發生的是一種完全無情的、因而也更加難以成功的國際政策，它的目標是派代表滲透進一切革命運動，在北京的領導下復興第三國際。對這一切發展跡象，目前還很難判斷，部分原因是我們知道的情況還不夠，部分原因是一切事物還處於流動狀態中。由於目前情勢的不確定，我們又加上自己所設置的障礙。我們從冷戰時期繼承而來的官方「反意識形態」、反共產主義，也是一種全球性的野心，引導我們虛構自己的故事，因此拒絕了從原則上區分在現實中面對的各種共產主義一黨專政(one-party dictatorship)，以及它可能在中國發展成的眞正極權主義政府——儘管後者的形式不同——的差別。當然，這並非說共產主義中國與共產主義蘇聯不同，亦非說斯大林的蘇聯與希特勒的德國不同。酗酒和無能，這是對蘇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情況的典型的描述，而且至今仍在流行，而這種描述却不能用來描述納粹德國的情況。那種在德國集中營和死亡營裡無法表述的殘暴，看來大多並不見諸於蘇聯的集中營，後者的囚犯並非死於酷刑，而是死於被遺棄。蘇聯的統治從一開始起就顯出腐敗，這在納粹統治的最後幾年也曾出現過，但在革命之後的中國則完全未出現。這一類的區別很多；這些區別很有意義，它們構成了不同國家的民族歷史的組成部份，但是並不直接構成爲政府的形式。西班牙、法國、英國、普魯士的絕對君主統治(absolute monarchy)無疑是另一種很不同的事物；這種統治仍以同樣的形式在各處出現。我在本書中論述的關鍵問題是，極權主義政府同專政與暴政不一樣，它們之間的區別絕不是可以安全地留給「理論家們」討論的學術問題，因爲全面統治是唯一一種政治力

量不可能共存其中的政府形式。因此，我們很有理由嚴格地使用「極權主義」這個詞。

在過去十五年裡，純粹同關於極權主義政府新的事實知識來源之匱乏和不確定相比，我們發現研究各種新的專政形式——無論其極權與否——的論文大量增多了。當然尤其在對納粹德國和蘇聯的研究方面確實如此。現在有許多著作就這一主題作了集中探索和研究，因此我也相應地增補了舊有的參考書目。（第2版平裝本中未附書目。）只有一類文獻，即前納粹將軍和公務人員們在戰爭結束後發表的大量回憶錄，除了少數例外，其餘的我都放棄了。（可以理解，這一類辯解式的回憶錄並不忠實可靠，我們必須考慮到這一點。但是這類回憶錄對於發生的事實，以及作者本人在事件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缺乏理解，這確實令人吃驚，除了他們的心理使人感興趣之外，其他全無意義。）我還在第一部和第二部的閱讀書目中增加了一些新的重要項目。最後，爲了方便起見，參考文獻目錄像本書內容一樣，分成了三個部分。

二

就引用史實而言，雖然本書構思和成書較早，却不見得會構成缺陷，關於納粹類型和布爾什維克類型的極權主義兩方面的材料亦然。當代人過早地嘗試寫極權主義「歷史」論著，這的確奇怪，根據學術原則，「歷史」研究會因爲缺少翔實的資料來源，和情緒上過於投入而失敗。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的希特勒傳和鮑里斯・蘇伐萊恩(Boris Souvarine)的斯大林傳記都在三十年代寫作和出版，卻比艾倫・布勞克(Allan Bullock)和艾薩克・多伊切(Issac Deutscher)分別著寫的標準傳記在某些方面更精確，而且幾乎在所有的方面更中肯。這裡也許有很多原因，但是其中一條無疑是簡單的事實：兩者的文獻資料能夠證實和補足出自眾所周知著名的

極權主義之叛逃者和目擊者的敍述。

說得果斷些，我們無需赫魯曉夫的「秘密演說」也已知道了斯大林的罪行，或者說，這個據說「剛愎多疑」的人曾經決心信任希特勒。至於後面一條，沒有什麼比這種信任更能證明斯大林的並非病態；他總有藉口懷疑他想清除或準備消滅的一切人，也包括黨和政府最高層內的每一個人；他很自然地相信希特勒，因爲他不希望希特勒生病。關於斯大林，赫魯曉夫的令人震驚的坦率承認其實也是掩蓋多於揭露——他和他的聽眾們都完全地捲入過眞實事件的全部過程——不幸的是，在許多人看來（當然也包括對官方資料來源有職業興趣的學者們)，他們縮小了斯大林政權的巨大罪行，其中沒有包括對幾百名甚至幾千名著名政治人物和文學家的誣陷和謀殺，這些人尚可在死後得到「昭雪」，但是無法用筆墨來形容的幾百萬被處決的人根本沒有從事過「反革命」活動，連斯大林也無法懷疑這一點。赫魯曉夫正是用掩蓋某些罪行的方法來掩蓋這個政權整體上的罪惡性，也正是出於反對目前蘇聯統治者——他們都在斯大林治下受過訓練並得到提拔——的欺瞞與虛僞，年輕一代的蘇聯知識分子現在起而進行幾乎是公開的反抗活動。他們知道關於「大整肅以及對各民族人民的驅逐和滅絕」等等必須知道的眞相。❺再說，赫魯曉夫在解釋罪行時勉強承認斯大林病態的多疑性格，卻掩蓋了極權主義恐怖的最典型方面，即，極權統治者要等到一切有組織的反對派都被撲滅、他不再需要害怕時才放手。蘇聯發生的事情就完全證明了這一點。斯大林開始他的大規模整肅運動的時間不是 1928 年，當時他相信「我們內部有敵人」，事實上他確定有理由感到害怕——他知道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將他比作成吉思汗，布哈林相信斯大林的政策「會使國家陷入飢饉、毀滅和警察統治」，❻而事實的確如此——整肅運動開始於 1934 年，當時原先的反對派全都「承認了他們的錯誤」，而斯大林自己在第十七次黨代會(據他自稱是「勝利者的大會」)上宣布說：「在這次大會上……看來無需再證明什麼，無需同誰作鬥爭。」❼對於蘇聯和整

個共產主義運動來說，蘇共二十大的轟動性質和具有決定意義的政治重要性都是無疑的；但其重要性是政治方面的，後斯大林時期來自官方的少量消息揭示了先前發生的事情，但這並沒有說明眞相。

就我們所知的斯大林時代情況而言，我在前面提及的費恩索德所發表的斯摩稜斯克檔案至今依然是重要的出版物，在尙無其他內容廣泛的資料出版以前，可惜這第一批隨意編選的資料之後，沒有更多資料出版。根據費恩索德的書來判斷，我們可以從二十年代中期斯大林的奪取權力活動學到的還很多：我們現在明白了共黨的地位多麼不穩定，❽不僅因爲一種公開反對的情緒在全國瀰漫，而且因爲腐敗與酗酒之風氣；而公開的反猶主義又出現在幾乎所有的爭取自由的要求；❽從 1928 年開始的集體化和反富農(dekulakization)事實上破壞了國家經濟計劃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以及本來已開始出現人民與政府之間的妥協；❽整個農民階級團結起來激烈地抵制國家政策，他們認定「與其加入集體農莊，還不如不要出生」，❽並且拒絕被劃分成富農、中農和貧農以反對鬥爭富農❽——「有人比富農還壞，只計劃著如何盤剝人」；❽而在城市裡，情況也不見得好多少，工人們拒絕和黨控制的工會合作，並且稱管理人員爲「養尊處優的惡鬼」、「僞善的斜眼者」等等。❽

費恩索德正確地指出，這些文件不僅淸楚地顯示了「羣眾的普遍不滿」，而且缺乏任何「充分組織的反對派」來反對整個體制。但是他未能看到一點，這據我看來同樣有依據可證明的是，對於斯大林掌權並將一黨專政轉化爲全面統治，當時還可以有另外一種選擇，即奉行由列寧發起的新經濟政策。⓯再者，斯大林的措施，加上他在 1928 年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那時他在黨內幾乎完全取得了控制權，這證明了從階級轉變爲羣眾以及隨之淸除一切小團體，這些都是極權統治的必要條件。

從 1929 年開始，斯大林對蘇聯的統治無可爭議，斯摩稜斯克檔案能夠證實我們先前從較不十分可靠的資料中獲知的一切，尤其是其中的一些缺

漏，例如在統計資料方面。這缺漏只證明了斯大林政府一貫的無情統治，全部事實都說明蘇聯官方材料的虛假：農作物的收成、犯罪率，與後來的陰謀作僞明顯不同的所謂「反革命活動」的事實眞相——都不能當作事實來看待。這一類的全部數據資料並非由莫斯科向全國各地廣泛搜集，而是首先通過《眞理報》(*Pravda*)和《消息報》(*Izvestia*)公布發表讓地方知道，或者通過莫斯科的其他官方機構，使蘇聯境內每一個地區接到官方虛構的統計數字，就像攤派給它們五年計劃的虛構指標一樣，這的確完全符合極權主義蔑視事實和現實的本質。⑯

我想簡單列舉幾個更能吸引人的要點，對這些內容，以前只能作假設，現在可以文件爲證。我們一向只是懷疑，但是現在知道，這個政府絕不是「獨一的」(monolithic)，而是「依層疊的、複製的、平行的功能，有意識地構築而成」，這種奇特的雜亂結構賴以凝聚的是我們從納粹德國發現的同一「領袖原則」(Führer principle)，即所謂的「個人崇拜」(personality calt)。⑯這個政府的具體執行部門不是黨，而是警察，它的「行動並不通過黨的渠道來規定」；⑯被政府成百萬地消滅的無辜者，用布爾什維克的語言來說是「客觀上的敵人」，完全知道他們是「無罪的罪人」；⑯正是這種新的敵人——他們不同於較早的眞正敵人，例如謀殺政府官員者、縱火犯、匪徒等等——作出了和我們熟知的納粹恐怖下受害者行爲類型完全相似的「絕對被動」的反應。⑯毫無疑問，在大整肅期間這股「互相譴責的洪流」對極權統治者強化權力十分有利，對國家經濟和社會福利更是災難，但是我們現在才知道斯大林如何推動了這一「可怕的連環譴責運動」，⑯他在1936年7月29日正式宣布：「**在目前條件下，一個布爾什維克最重要的特質應該是，有能力識別出黨的敵人，不管他僞裝得多麼巧妙。**」⑯正如希特勒的「最後解決方案」事實上意味著發出「你們必須殺人」的命令，要納粹黨的菁英們服從一樣，斯大林的聲言可以說是：「你們必須作僞證，」以此作爲布爾什維克全體成員的行爲準則。人們仍然可能懷疑目前理論中的

大量眞實性，這些理論認爲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的恐怖是實行工業化和發展經濟必需的「代價甚高的苦難」，但所有的懷疑在初看眞實事態和某一具體領域的事件進程時，這些都被擱置一邊了。㉓恐怖並未導出這一類結論。文獻準確記錄的反富農運動、農業集體化和大整肅的後果不是進步或迅速工業化，而是饑饉和食物生產的混亂條件，以及人口減少。這些後果構成一種長期危機，不利於發展農業，妨礙了人口增長，導致西伯利亞後方國土開發與殖民的失敗。再者，正如斯摩稜斯克檔案詳細披露的，斯大林的統治方法摧毀了十月革命以後國家發展所需的任何一種能力和技術。這一切都確實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極大代價」，不僅造成苦難，而且也給一部分往往並非只是「政治文盲」的人造成了進入黨和政府官僚機構的職業機會。㉔事實上，極權主義統治付出的代價是如此之高，以致於德國和蘇聯都迄今尚未償清。

三

我在上文提到斯大林死後的非極權主義化過程。在 1958 年，我還不能肯定「解凍」是只是暫時寬鬆的局面，是否一種由於接班人危機而採取的應急措施，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極權主義控制那樣鬆懈的情況。即使在今天，我們也無法知道這種過程是否命定不可逆轉的，但是可以肯定，它絕不是臨時措施和權宜之計。因爲無論人們如何看待 1953 年以後蘇聯令人迷惑的曲折政策路線，龐大的警察帝國消失了，大多數集中營撤銷了，不再有針對「客觀的敵人」的整肅運動，新的「集體領導」成員之間的衝突現在消解於降級和逐出莫斯科，而不是實施公開審判、告白或謀殺，這些都是不可否定的事實。無疑地，斯大林死後的歲月裡新統治者使用的方法仍然緊追隨列寧死後由斯大林制定的方式：又一次出現了被稱爲「集體領導」（斯大林於 1925 年創造了這一概念）的三頭馬車式執政。經過四年時

間的密謀和角逐權力，再現了斯大林的1929年政變，即赫魯曉夫於1957年掌權。從手法上來看，赫魯曉夫的政變和他那已死的並受他譴責的主子十分相像。他在爭奪黨內繼承權時也需要外力支持，因此他利用了朱可夫(Georgi Zhukov)元帥和軍方力量，這一點恰似三十年前斯大林在繼位鬥爭中利用了他同秘密警察的關係一樣。㉕正如在斯大林的例子中一樣，政變以後，最高權力仍在黨內，而不在警察部門，所以在赫魯曉夫政變中，「到了1957年底，蘇聯共產黨在蘇聯生活的各個方面都達到了無可爭議的最高權力地位」；㉕正如斯大林從不猶豫整肅他屬下的警察部門的幹部、消滅他們的首腦一樣，赫魯曉夫也隨即在黨內採取行動，將朱可夫驅逐出蘇維埃最高主席團和黨中央委員會，而朱可夫是在政變之後以及憑他在軍隊中的最高指揮權而被選入這兩個機構的。

可以肯定，當赫魯曉夫向朱可夫請求支持時，軍隊地位上升，超過了警察，在蘇聯已成爲既定事實。這是打破警察帝國之後自然產生的結果之一，警察部門曾統治蘇聯的大多數工業、礦業、地產業，改由管理者集團繼承，後者突然發現他們解決最嚴重的經濟競爭對手。軍隊地位的自然上升更加具有決定性意義；它現在獨霸暴力機器，用以解決黨內衝突。赫魯曉夫的精明在於他比他的同僚們早一步洞察並掌握這些結果。但是無論他的動機如何，在權力遊戲中，重點從警察轉移到軍隊的結果影響重大。確實，許多暴政的特點標誌是秘密警察地位上升壓倒軍隊機構，這並非極權主義的獨有現象；然而在極權主義政府的情況下，警察的優勢不僅符合鎮壓國內羣眾的需要，而且也符合統治全世界的意識形態主張。很明顯，凡是將整個世界視爲它們的未來領土者，都會加強對內的暴力機構，都會不用軍隊、而用警察來作爲對被征服地的統治手段。因此，納粹使用了黨衛軍(SS)（它其實是一支警察力量）來統治甚至去征服外國領土，它的最終目的是使軍隊與警察融合，置於黨衛軍的管轄之下。

另外，這種變化的意義在於權力制衡，這已表現在用武力鎮壓匈牙利

革命時。革命遭到血腥鎮壓，本身是一種可怕的嚴重後果，鎮壓不是由武裝警察、而是由正規軍隊來完成，其結果完全不是典型的斯大林式的解決方式。雖然軍事行動之後是處死一批領導人，將幾千人投入監獄，但是並未將人民全面驅逐出境；事實上也並無企圖要減少這個國家的人口。而且，既然這是一場軍事行動，不是一次警察行動，那麼蘇聯可以向戰敗國輸送足夠的援助，以防普遍飢餓，並且防止隨後可能出現的經濟完全崩潰。斯大林倘若遇到同樣情況，他肯定也只是這樣做。

當然，從術語的嚴格定義上說，不能再稱蘇聯爲極權主義國家，最明顯的跡象是過去十年中各種藝術令人驚訝地得到迅速的和豐富的恢復。可以肯定，要替斯大林恢復名譽，並且鉗制學生、作家、藝術家中間一波又一波地產生對言論和思想自由的要求，這兩點如果不以全面重建恐怖秩序和警察統治，就不會成功，或者說不可能成功。蘇聯人民無疑被剝奪了一切形式的政治自由，不光是結社的自由，而且是思想、觀點和公開表達的自由。看來似乎什麼都沒變，但在事實上一切都變了。斯大林去世之時，沒有作家和藝術家；如今有一種文學是以手稿流傳，畫家在畫室裡實驗各種現代化繪畫，即使不公開展出，也已名聲在外。此言並非要縮小暴政檢查制度與藝術自由之間的差異，只是爲了強調一個事實，即地下文學和無文學之間的差異是一與零相比的差異。

還有，反對派知識分子會受到審訊(儘管不是公開的)，他們可以在法庭上陳述意見，並且取得外界支持，無需徹底坦白以求恕罪，這一事實顯示出，我們在此討論的已不再是極權統治。1966 年 2 月，作家西尼耶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和達尼埃爾(Yuli M. Daniel)受審判，原由是在國外出版了在蘇聯境內不能發表的作品，他們分別被判處七年和五年苦役，根據立憲政府的法律標準，這當然屬於肆無忌憚的行爲；但是他們的法庭陳述卻傳遍了全世界，不會被人遺忘。他們並未在極權主義統治者爲反對派設置的洞裡湮滅消失。赫魯曉夫本人試圖扭轉非極權主義化進程的最具

野心的嘗試歸於徹底失敗，這件事鮮爲人知，但是更有說服力，他在 1957 年倡導一種新的「反對社會寄生蟲的法律」，這可能引起政府重新實施大規模流放政策，重建大規模的苦役集中營，以及對於全面統治最重要的一著——組織大規模的羣眾性譴責運動；因爲「寄生蟲」會是由人民自己在羣眾大會上選出的。但是，這條「法律」遭到蘇聯司法界的抵制，並在它遞交通過之前便遭棄置。㉗換言之，蘇聯人民從極權主義統治的噩夢中走出而進入一黨專政多方面的苦難、危險和非正義；而這種現代形式的暴政根本不能保證一個遵從憲法的政府，「即使在承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前提下，蘇聯的一切權力最終也是非法的，」㉗因此這個國家能在一天之間，不發生重大反抗的情況下，再度成爲極權主義國家，同樣地，這個在一切新的政府形式中最可怕的政府——我將要分析它的歷史淵源因素——在斯大林死後的蘇聯不折不扣地走向它的終結，正如極權主義在希特勒死後的德國壽終正寢一樣。

本書論述極權主義的起源及其種種因素，而它在德國和蘇聯產生的後果，只是在有助於我們思考先前發生的情形時才會討論到。所以，與本書範圍有關的只是戰後斯大林統治的時代，而不是他死後的時代。在那八年間，自從 1945 年到 1953 年，和自從三十年代以來的一貫情形，並無衝突，亦未增加新的因素。勝利以後發生的一切事件，在戰爭期間的暫時寬鬆之後，蘇聯以及引進極權主義統治的衛星國，爲了重新確定全面統治而採取的措施，都符合我們已知的遊戲規則。各衛星國的布爾什維克化都從統一陣線的策略和假議會制度開始，迅速發展成公開建立一黨專政，他們消滅了原先被容忍的其他政黨領袖與黨員，然後發展到最後階段，被莫斯科有理或無理地懷疑的當地共產黨領袖也遭到粗暴誣陷，在黨內最腐敗、最無恥的統治之下被迫受到公審、酷刑和處決，這些無恥之徒原先並非共產黨人，而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莫斯科似乎急於重現從十月革命到極權主義專政的一切階段。難以言述的恐怖故事一再重演，在一個衛星國裡發生的事

情幾乎同時也在從波羅的海直到亞得里亞海的所有其他衛星國裡發生。在衛星國以外的地區則不同。波羅的海國家直接同蘇聯聯合，它們的情況比其他衛星國還糟：五十多萬人被從三個小國家裡驅逐出境，而「大批俄國居民湧入」開始威脅到當地居民，使他們在自己的國家裡變成了少數民族。㉙另一方面，自從柏林圍牆突兀出現之後，東德才慢慢地併入衛星國羣，在這之前，它一直只被當作被占領地，只有一個傀儡政府。

在這本書裡，蘇聯的情勢發展（尤其是日丹諾夫〔Andrei Zhdanov〕神秘地死去和發生「列寧格勒事件」的 1948 年以後）具有比較重要的意義。這是自從大整肅以來斯大林第一次大批處死高級和最高級官員，我們知道這是精心策劃的又一次全國性整肅的開端。這次整肅以「醫生的陰謀」為觸媒，但不牽涉到斯大林的死亡。一批醫生（其中大多數是猶太人）被指控為「陰謀消滅蘇聯的一些主要領導人」。㉚ 1948 年至 1953 年 1 月（即「醫生的陰謀」被「發現」時）之間蘇聯所發生的一切，都帶有引人注目的預兆跡象，與三十年代大整肅的準備階段十分相似：日丹諾夫之死與列寧格勒整肅，吻合 1934 年基洛夫（Sergei Kirov）同樣神秘的死亡，以及隨即發生一種有預謀地整肅「留在黨內的一切前反對派」運動。㉙再者，對醫生們的荒唐指控，說他們將會謀害身居全國主要領導職位的人，這必然會使一些人內心充滿恐懼的預感，這些人深知斯大林指控一名假想之敵的方法，他所指控別人的正是自己打算犯的罪行。（最著名的例子是他指控圖哈恰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i〕和德國密謀勾結，而斯大林自己此刻正謀劃與納粹結盟。）很明顯，在 1952 年，斯大林的身旁的同志比三十年代時聰明多了，他們悟出了他的話的眞正含義，而關於陰謀的指控肯定在政府的所有高官中間引起了普遍恐慌。這一恐慌也許最能說明斯大林的死因、圍繞著斯大林之死的神秘情景、以及出現繼承危機的最初幾個月裡黨內的陰謀和勾心鬥角。儘管我們對內幕所知甚少，但足以證明我原先的看法，即例如大整肅這種「破壞性操作」不是孤立事件，它並非這個政權在非常情

況下的過火行爲，而是一種恐怖制度，它會定期發生——當然，除非這種政權本身的性質改變。

斯大林在晚年策劃的這後一次整肅中最富於戲劇性的新成份是意識形態方面的重要轉變，即提出了猶太人世界陰謀的問題。多年來，這一變化的基礎早已埋伏在各衛星國的一系列審判事件中——匈牙利的拉吉克審判案(Rajk trial)，羅馬尼亞的安娜•鮑克事件(Ana Pauker affair)，捷克斯洛伐克 1952 年的斯朗斯基審判案(Slansky trial)。在這些有預謀的審判案中，挑選來做犧牲品的黨內高級官員都由於「猶太資產階級家庭出身」而被指控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罪；這一指控漸漸地變成了和臭名昭彰的非猶太復國主義機構有牽連（尤指美國猶太人聯合分配委員會〔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目的在於指控一切猶太人都是猶太復國主義者，而一切猶太復國主義團體都是「美帝國主義走狗」。[32] 說猶太復國主義是種「罪行」，這當然毫無新意，但是隨著整肅運動的進展，開始集中到了蘇聯猶太人身上，發生了另一種重大變化：猶太人現在被指控的罪不是猶太復國主義，而是「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從這種標語中衍生的指控類型比以往更接近於納粹關於錫安長老們的猶太世界密謀的說法。它如今令人驚愕地淸楚顯示出這種納粹意識形態對於斯大林的深刻影響——這跡象在希特勒與斯大林締結條約之後就很明顯了——可以肯定，部分原因是這在蘇聯及其所有的衛星國裡有明顯的宣傳價值，反猶情緒到處瀰漫，反猶宣傳比比皆是，另一部分原因是，這一類虛構的世界陰謀爲極權主義尋求世界性統治提供了更合適的意識形態基礎，遠勝於反對華爾街、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這種公開無恥地採用全世界皆知的最著名的納粹標記，是斯大林贈給他的已故同伙和極權統治競爭對手的最後恭維，他很遺憾沒能和那個人達成永久的協議。

斯大林像希特勒一樣，在恐怖事業未竟的中途便死去了。當這一切發生時，本書所要敍述的事情，以及它要努力理解的各種事件，至少都暫時

有了結尾。

漢娜·鄂蘭

1966年6月

註釋

❶毫無疑問，極權主義政府及其令人無法容忍的公開罪行是由羣眾支持的。所以毫不奇怪，學者們和政治家們常常拒絕承認它，前者相信宣傳與洗腦的魔力，後者簡單地將它否定，例如阿登納(Konrad Adenauer)就曾反覆這樣做。最近出版了一本由海因茨·鮑伯拉哈(Heinz Boberach)主編的、由德國黨衛軍保安部發布的關於戰爭期間(1939—1944)德國民眾輿論的秘密報告集(《帝國報告：1939—1944年黨衛軍保安部關於形勢的秘密報告選集》〔*Meldungen aus dem Reich. Auswahl aus den Geheimen Lageberichten des Sicherheitsdienstes der SS 1939—1944*〕，瑞威德與柏林，1965)在這方面作出了有力的揭示。首先，它指出德國民眾完全在事先知道一切所謂的秘密——在波蘭屠殺猶太人，準備進攻俄國，等等——其次，「宣傳對象們仍然有形成自己獨立見解的可能程度」(18-19頁)。然而問題的關鍵在於獨立見解絲毫不會削弱對希特勒政權的總體支持。十分明顯，羣眾對極權主義的支持既非出於無知，亦非洗腦的結果。

❷從一開始時起，文件資料的研究與出版以與犯罪活動有關爲主，選擇的目的一般出於對戰爭罪犯作判決的需要。結果，大量很有意義的資料被忽略了。註釋❶中提到的那本書非常受人歡迎，是一個例外。

❸默爾·費恩索德(Merle Fainsod)，《蘇維埃統治下的斯摩棱斯克》(*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劍橋，1958)，210、306、365等頁。

❹同上，73及93頁。

❺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3)期間的受害者人數估計爲九百萬到一千二百

萬，還應加上大整肅的受害者人數——估計有三百萬人被處決，五百到九百萬人遭逮捕和流放。（見紐約 1965 年版羅伯特·塔克爾〔Robert C. Tucker〕著關於 1938 年莫斯科審判的詳細報導《大整肅審判》〔*The Great Purge Trial*〕新版本，紐約，1965 的重要引論〈斯大林、布哈林和陰謀歷史〉〔Stalin, Burkharin, and History as Conspiracy〕。）但是這些估計好像還不符合實際數字，它們還未包括鮮爲人知的大規模屠殺，後來「德國占領軍在維尼茨雅（Vinnitsa）市發現了一處墓坑，裡面是 1937 年和 1938 年處決的幾千具屍體。」（見約翰·阿姆斯特朗〔John A. Armstrong〕，《極權主義政治：1934 年迄今的蘇聯共產黨》〔*The Politics of Totalitarianis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from 1936 to the Present*〕，紐約，1961，65 頁）。毋庸贅言，這一最新發現使納粹制度和布爾什維克制度看來更像從一個模型中產生的兩個變種。——斯大林時代的大規模屠殺的程度可以從對西尼雅夫斯基（Sinyavsky）和達尼埃爾（Daniel）的審判中看到：1966 年 4 月 17 日《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發表了主要內容，我在此處援引的數字和例證均出自該處。

❻塔克爾，前引書，17-18 頁。

❼引自默爾·費恩索德，《蘇聯是如何統治的》（*How Russia is Ruled*）（劍橋，1959），516 頁。——阿卜杜拉赫曼·阿夫托爾哈諾夫（Abdurakhman Avtorkhanor）（《斯大林的統治》〔*The Reign of Stalin*〕，以筆名烏拉洛夫（Uralov）於倫敦發表，1953）敍述了黨中央委員會在最初的公開審判之後於 1936 年召開的一次秘密會議，據說布哈林在會上指責斯大林將列寧的黨改變成一個警察國家，他的發言得到了三分之二以上中央委員的支持。這件事情，尤其是所謂布哈林在中央委員會中受到強有力的支持一說，聽來不太可信；但即使是事實，考慮到這次會議召開時大整肅運動已經大規模展開，那麼這件事情並不表明是一次有組織的反對派活動，而是相反的情形。費恩索德正確地指出，事實眞相看來是「普遍的不滿情緒」已經蔓延，尤其在農民中間，直到 1928 年，「在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時，罷工……還很常見」，但是這種「反對情緒從未集中以任何形式向政權挑戰」，在 1929 或 1930 年，「每一種形成組織的可能性都消失了，」

儘管它們以前存在過。(見《蘇聯統治下的斯摩稜斯克》, 449 頁)

❽費恩索德指出:「奇蹟並非產生於黨的戰無不勝, 而是它從根本上要設法生存下去。」(38 頁)

❽同上書, 49 頁。——有一份 1929 年的報告敍述了在一次集會上爆發了反猶主義暴力行爲; 而康姆索穆爾人「靜靜地旁觀。……這給人以一種印象: 他們都贊同反猶主義言論」(445 頁)。

❿ 1926 年的全部報告顯示了一種有意義的「所謂反革命暴動的衰微, 這一暫時停戰措施是政府和農民一起制訂的。」和 1926 年相比, 1929 年到 1930 年的各項報告「讀起來就像戰爭火線上的公報」(177 頁)。

❿同上, 252 頁。

❿同上, 240 及 446 頁。

❿同上。引文見蘇聯格別烏(GPU)報告。但是這些話在 1934 年大整肅開始後就明顯減少。參見 248 頁註。

❽同上, 310 頁。

❿這種可能性在研究文獻中通常被忽略了, 因爲出於一種可以理解、但從歷史角度難以立足的觀點, 認爲從列寧到斯大林之間的發展是比較平穩的。當然, 斯大林似乎總是以列寧的口氣來說話, 因此有時看來這兩個人之間的唯一區別是斯大林的性格粗暴或「癲狂」。無論這是否斯大林的謀略, 事實正如塔克爾所正確地指出的:「斯大林在這些列寧主義的舊概念中注入了明顯的斯大林主義新內容……主要區別特徵在於完全非列寧主義式地強調當今時代的特點是**共謀**。」參見塔克爾, 前引書, 序言, 16 頁。

❿參見費恩索德, 前引書, 365 頁及其後。

❿同上書, 93 頁和 71 頁。典型的例子是, 各級文件都習慣地強調「對斯大林同志負責」, 而不是對政府、對黨、或對國家負責。或許沒有什麼能比伊利亞・愛倫堡(Ilya Ehrenburg)等一批斯大林主義知識分子爲自己的過去辯護, 或者坦陳他們在大整肅期間的眞實思想, 更能令人信服地突顯這兩種制度的相像之處。「斯大林不知道這些針對共產黨人和蘇維埃知識分子的無情暴力,」

「他們向斯大林隱瞞事實」以及「如果有人將眞相告訴斯大林」等等，或者認爲罪人根本不是斯大林，而是各地警察首腦。(引自塔克爾著作前言，13 頁。)這也正是德國戰敗後納粹分子必說的話，這一點無需多補充了。

⑱見前引書，166 頁及其後。

⑱這些話來自一個「階級異己分子」於 1936 年寫的申訴書：「我不想成爲一個無罪的罪人。」(229 頁)

⑱蘇聯國家保安局 1931 年的一份報告很有意思地強調了這種新的「絕對被動」行爲，這種由漫無目的地對無辜者濫施恐怖而產生的可怕冷漠。報告中還提及一種很大的區別，過去逮捕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時，「一個被捕者由兩個武裝人員押送，」而在大規模逮捕時，「一個武裝人員可以押送一羣人，他們平靜地往前走，無人逃跑。」(248 頁)

⑱同上，135 頁。

⑱同上，57-58 頁。關於這些羣眾性譴責中歇斯底里情緒愈演愈烈的情形，可參見 222 和 229 頁及其後。在 235 頁上有一個很可愛的故事，有一位同志認爲「斯大林同志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集團的態度太軟弱，」當時所指的是直接驅逐出黨一事。但是很不幸，下一個發言者指控那人企圖貶低斯大林「政治立場不堅定」，那人趕忙承認自己的錯誤。

㉓奇怪的是，費恩索德從大量會指向相反方向的例證中仍然得出結論。更奇怪的是，這一領域內的許多作者也都一樣誤用事實證據。當然，艾薩克・多伊切(Issac Deutscher)精心爲斯大林辯護的傳記不會這麼說，但是許多人仍然堅持認爲「斯大林的無情行動是……一種創造新的力量平衡的方法」(阿姆斯特朗，前引書，64 頁)以及考慮提供「一種粗暴但是連貫一致的方法，解決從列寧主義的神話中繼承而來的基本矛盾」(理查德・洛文薩爾〔Richard Lowenthal〕頗有價值的《世界共產主義：一種塵世信仰的解體》〔*World Communism: The Disintegration of a Secular Faith*〕，紐約，1964，42 頁)。只有少數人能擺脫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殘餘思想，例如塔克爾(前引書，序言，27 頁)，他明確地說，蘇維埃「只要不發生事實上極大地破壞了蘇聯社會運作的那場大整肅運動，它的制

度將會更好，它將能更好地武裝起來以應付即將發生的全面戰爭的考驗。」塔克爾認爲這一點駁斥了我關於極權主義的「想像」，但我認爲那是誤解。不穩定性是全面統治的功能要件，它建基於意識形態的虛構並假設一場運動，而不是政黨，掌握了權力。這種制度的特點是代表整個國家物質力量和利益的實際力量經常屈從於有組織的權力，正如一切事實真相屈從於意識形態一致性的要求一樣。很明顯，在物質力量同有組織的權力之間、或事實與虛構之間的競爭中，後者總會失敗，蘇聯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德國都是如此。但是沒有理由低估極權主義運動的力量。正是對永久不穩定性的恐怖促成組織了衛星國體系，也正是蘇聯目前的穩定、它的非極權化，一方面極大地增加了它目前的物質力量，但在另一方面又引起它失去對衛星國的控制。

㉔參見費恩索德（前引書，345-355 頁）關於 1929 年整肅運動的有趣細節。一場清算「反動教授」的運動實際針對反對共產黨者、康姆索穆爾人和學生團體中的反對派，因爲他們認爲「毫無理由要撤換那些優秀的非黨教授」；當然馬上就有新的報告「學生團體中有大批階級異己分子」。大整肅的目的之一就是爲新的一代提供職業機會，這是一向眾所周知的。

㉕阿姆斯特朗（前引書，319 頁）爭論說，朱可夫元帥介入黨內鬥爭的重要性被「高度誇張」了，赫魯曉夫「無需軍方介入就取得了勝利」，因爲他有「黨的機構支持」。這看來並非事實。但是「許多外國觀察家」認爲如此，由於軍隊在支持赫魯曉夫反對黨的機構中所起的作用，使他們得出錯誤的結論，認爲軍方的力量最終不斷地增強，黨的力量受到削弱，似乎蘇聯正要產生一種從黨的專政轉向軍人專政的變化。

㉖同上，320 頁。

㉖同前，325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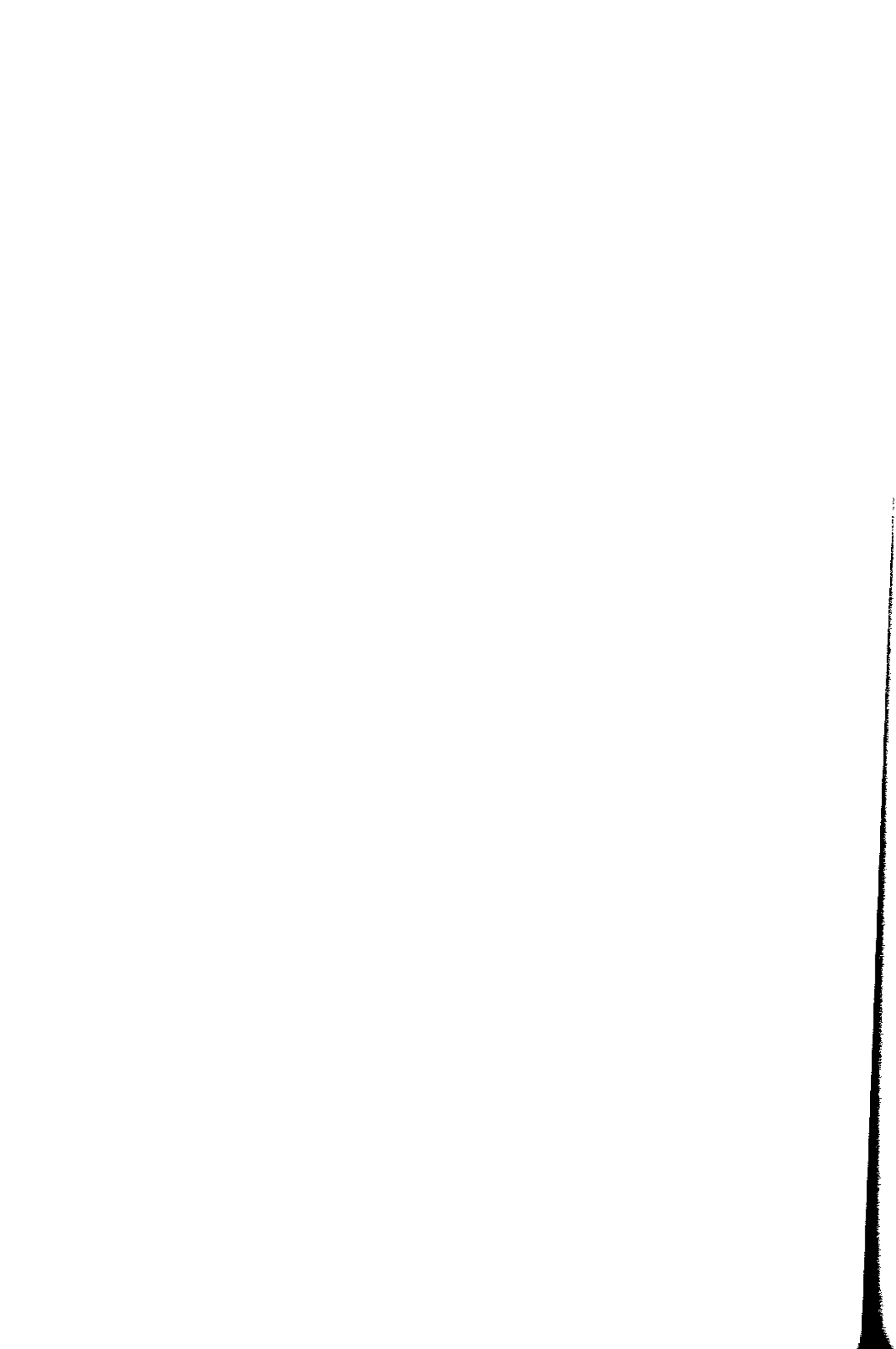
㉖同前，339 頁及其後。

㉖參見斯坦萊・瓦爾第斯（V. Stanley Vardys）〈幾個波羅的海共和國在蘇聯〉（How the Baltic Republics fare in the Soriet Union），載《外交季刊》1966 年 4 月號。

㉚阿姆斯特朗，前引書，235頁。

㉛見費恩索德，前引書，56頁。

㉛見阿姆斯特朗，前引書，236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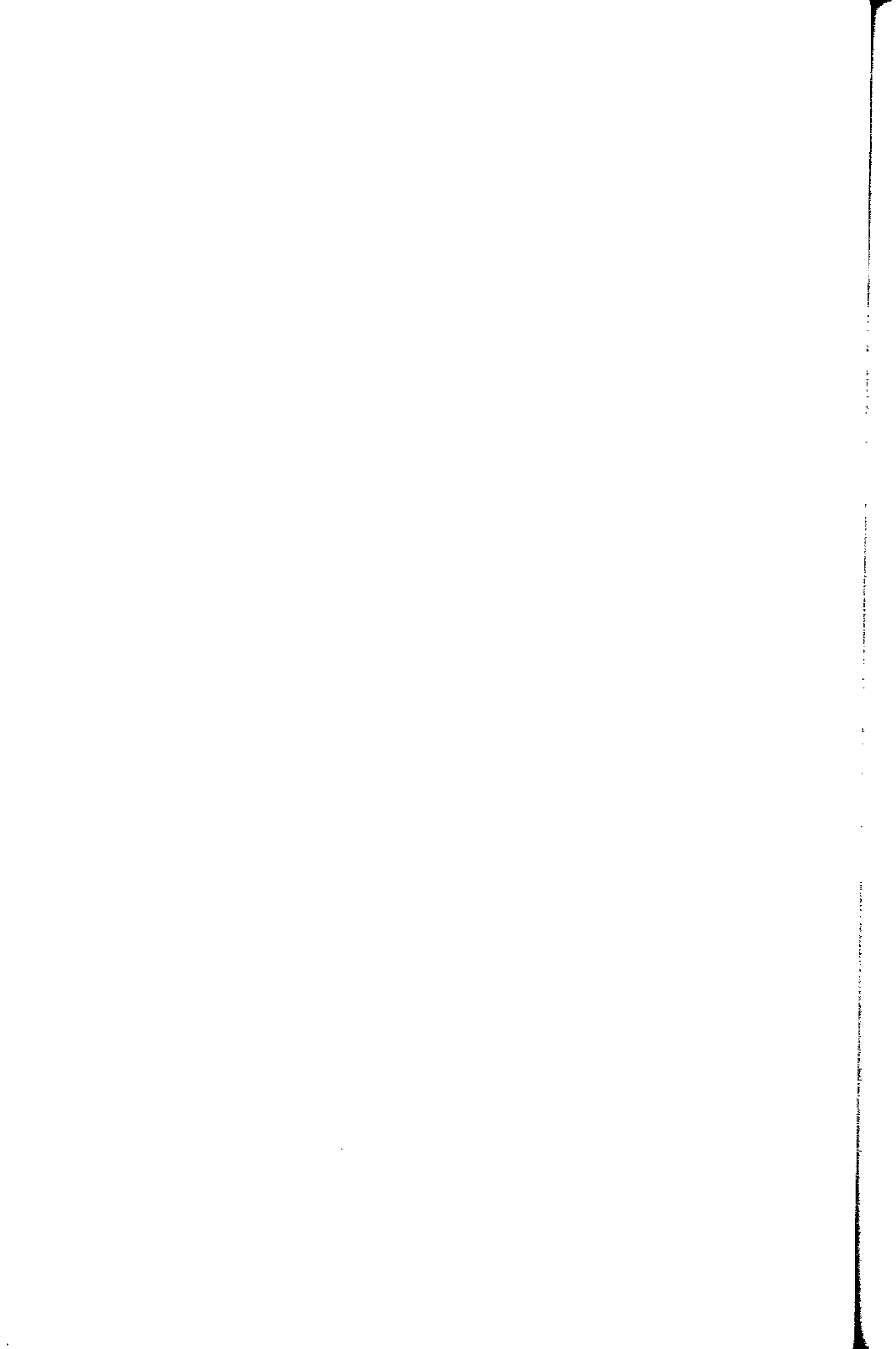


第一部

反猶主義

這是一個值得注目的世紀，以革命開始，卻以交易收場！或許它會被稱爲一個一無是處的世紀。

——羅杰・馬丁・杜伽德
(Roger Martin du Gard)



第一章
蹂躪常識的反猶主義

許多人至今仍以爲，納粹意識形態集中於反猶主義，納粹政策一貫堅持以迫害並最終消滅猶太人爲目標，其實這僅僅出於偶然。只有最後大災難的恐怖，甚至只有當倖存者無家可歸(homelessness)並且失去了根基(uprootedness)，才使「猶太人問題」在我們的每日政府生活中顯得重要起來。納粹所宣稱的主要發現——猶太人民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以及他們的主要興趣——迫害全世界的猶太人——一直被輿論認作贏得羣眾的藉口或有趣的蠱惑手段。

忽略納粹自己所說的話，導致以上認識偏差。在當代歷史上，幾乎沒有哪一個方面比這一事實更令人憤慨、更帶有神秘性質，亦即，本世紀懸而未決的全部重大政治問題中，這個似乎無足輕重的猶太人問題居然有此曖昧的榮耀，能啓動整部地獄機器。這種原因與結果之間的脫節擾亂了我們的常識，更不用說歷史學家關於平衡與和諧的觀念了。與反猶主義事件本身相比，一切解釋似乎都是倉促的胡編亂造，只是爲了掩蓋問題，嚴重威脅著我們的衡態感受與明智願望。

這些倉促的解釋之一，是將反猶主義等同於猖狂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以及仇外情緒的爆發。然而，事實上現代反猶主義是在傳統的民族主義衰朽時生長起來的，並且恰恰在歐洲的民族國家制度及其權力失衡被摧毀時達到了頂峰。

人們早已注意到，納粹並非單純的民族主義者。他們的民族主義宣傳針對「同行者」，而不是他們信任的成員；相反，他們絕不允許後者無視政治上一貫的超國家觀點。納粹的「民族主義」和近來蘇聯的民族主義宣傳

一樣，是多方面的，都是用來培植羣眾的偏見。納粹一向眞正蔑視狹隘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地方主義，他們一再重複說，他們的「運動」像布爾什維克運動一樣，是國際範圍的，這一運動對他們來說比對任何國家都重要，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只侷限於一塊具體的領土。不光是納粹，還有五十年的反猶主義歷史，都明顯證實反猶主義和民族主義不是一回事。十九世紀最後幾十年裡一批最初的反猶主義政黨也是在國際上最早聯合的組織。從一開始起，它們就召集了國際會議，關注國際的——至少是在歐洲範圍內的協調行動。

類似民族國家紛紛衰落和反猶主義的生長這樣的總體趨勢，單獨用一條理由或一種原因很難作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在大多數這一類例子中，歷史學家面對一種非常複雜的歷史情景，他簡直可以任意孤立——但這意味著迷失方向——出一種因素作爲「時代精神」。但是有幾條有益的一般規則。其中對於我們的目的最有用的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舊政權與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第二卷第一章裡論述的偉大發現，即法國革命爆發時羣眾對貴族階級的狂暴仇恨的動機——這種仇恨啓發了伯克(Edmund Burke)，他說革命與其說關注國王的體制，不如說關注「紳士的狀況」。托克維爾認爲，法國人民比以前更仇視即將失去權力的貴族，恰恰因爲貴族迅速地喪失眞正的權力並不伴隨著大量喪失財富的事實。只要貴族還擁有無邊的司法權力，他們就不僅被人容忍，而且還受人尊敬。當貴族失去特權，尤其是喪失剝削和壓迫的特權時，人們覺得他們是寄生蟲，在統治國家方面不起任何作用。換言之，剝削和壓迫都不是他們引起怨恨的主要原因；而沒有可見的政治作用卻擁有財富才是最不可容忍的，因爲誰也不理解無功爲何受祿。

當猶太人同樣地喪失了他們在公共事務中的作用和影響，除了財產之外一無所有時，反猶主義就達到了頂峰。希特勒執掌政權時，德國銀行早已幾乎全是猶太人(judenrein)了(在銀行業，猶太人控制了主要的地位已

有一百多年)，德國的猶太人在經過社會地位和數量上的逐步增長之後迅速衰落；統計學家們預言，它將在幾十年之內消失。當然，統計數字並不一定指向眞正的歷史過程；值得注意的是，對一個統計學家而言，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和滅絕，似乎無情地加速一個過程的進行，一個無論如何會到來的過程。

在西歐各國，情況幾乎也都一樣。法國的德雷富斯事件的突發並非在第二帝國治下——當時法國猶太人正處於繁榮的頂峰，並且產生了很大影響。這件事發生在第三帝國時期，當時猶太人儘管擁有一切，但是從重要的地位上消失了(雖然並未從政治場景中消失)。奧地利的反猶主義之演成暴力，並非在梅特涅(Clemens Metternich)和弗朗茨・約瑟夫(Franz Joseph)統治時期，而是在戰後的奧地利共和國，當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 monarchy)垮台後，其他羣體都很明顯地並不像猶太人那樣失去影響和聲望。

迫害無權的或失權的羣體也許是一幅令人不愉快的景象，但是這不僅僅產生於人類的卑劣行爲。認識到權力應有的作用和廣泛用途的理性本能，一方面使人服從和容忍眞正的權力，另一方面使人仇視那些無權卻有錢的人。即使剝削和壓迫都仍能使社會運轉，並能建立某種秩序。唯有那種無權但是有錢，或者高高在上而提不出政策的人，才使人感到是寄生的、無用的、反叛的，因爲上述情形割斷了人與人之間的一切聯繫。非剝削的財富甚至缺乏那種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聯繫；高高在上而沒有政策甚至也不意味著剝削者對被剝削者最小的關心。

西歐與中歐猶太人總體的衰落只構成了一種氛圍，發生後來的各種事件。衰落本身很少能解釋這些事件，正如貴族權力的喪失不能解釋法國大革命。意識到這類通則，有一點很重要，即可以駁斥那些常識的說法，它使我們誤信暴力仇恨或突發的反抗必定產生於巨大的權力和巨大的虐待，而後來產生的對猶太人的仇恨只是對他們的重要性和權力的反動。

由於問題只訴諸境遇較好的人，所以有另一個更嚴重的常識性謬誤：因爲猶太人是一個毫無權力的羣體，它遇上了時代中普遍和難以解決的衝突，背負罪責，最後被當作一切罪惡背後的黑手。在許多自由派分子的心目中，對這種說法的最出色描述——也是最出色的反駁，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流傳的一個笑話：一個反猶主義者聲稱，是猶太人引起了戰爭；有人回答說，是的，猶太人和騎自行車者引起了戰爭。有人問：爲什麼是騎自行車者？另一個人反問：爲什麼是猶太人？

關於猶太人總是代罪羔羊(scapegoat)的說法，意味著其他任何人也都可能成爲代罪羔羊。這種看法堅持認爲受害者是完全無辜的，說他無辜，暗指他不僅未曾作惡，而且根本未曾做過與面臨的問題有關聯的任何事情。事實上，純粹獨斷形式的代罪羔羊一說從未見諸文字。但是，每當堅持此說者苦心孤詣地試圖解釋爲何代罪羔羊的形象如此適恰，他們總會指出，他們已拋棄此等說法，轉向通常的歷史研究——在這種研究中，所發現的只是歷史由許多羣體創造，而出於某種原因才單列出某一個羣體。所謂代罪羔羊，必然不會再是那種無辜受害者，整個世界都將其一切罪愆歸咎於他、並通過他而意欲逃避懲罰；它變成羣體中的一個羣體，而所有的羣體都和這個世界的事務有關。不只僅因爲它成爲世界之不義和殘酷的犧牲者，就不再要共同負責。

直到最近，代罪羔羊論的內在破綻足以證明它是一種逃避主義(escapism)的說法是應該被拋棄的。但是恐怖(terror)作爲政府的主要武器的趨向上升，又使它比以往更能令人置信。

現代專制政體同過去一切暴政之間的根本區別在於，恐怖不再用作一種手段來壓迫和威脅對手，而是作爲一種工具，用以統治十分恭順的民眾。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恐怖是事先沒有任何挑動便實施打擊，它的受害者即使從壓迫者的眼中似乎也是無辜的。這就是在納粹德國發生的情況，全部恐怖都對準了猶太人，即針對和他們的具體行爲無關的共同性格。蘇俄的情

況更混亂，但不幸事實卻很明顯。一方面，布爾什維克制度不像納粹，它在理論上從不承認可以對無辜的人民實施恐怖，儘管根據某些實踐來看，這種說法好像很虛僞，但是這畢竟有區別。另一方面，俄國的實踐在某種範圍內比德國更「先進」：任意實施的恐怖甚至不偏限於種族差異，當一些舊階級類別早已被遺棄之後，遂使俄國的任何人都可能突然變成警察恐怖下的受害者。我們在此不討論恐怖統治的最終結果——任何人，甚至是恐怖的實施者，也難逃恐懼之心；本書只討論選擇受害者時的任意性，在這一點上，關鍵在於他們在客觀上是無辜的，無論有沒有做，他們都可能被選中當作受害者。

初看起來，這一點好像是對舊有的代罪羔羊的說法遲來的證實，而且事實上現代恐怖的受害者確實顯示出代罪羔羊的一切特徵：他在客觀上絕對是無辜的，因爲無論他有無行爲，都與他的命運無關。

因此，這就誘使我們回到一種自動解除受害者責任的解釋：這足以說明一種現實，即正是被恐怖機器抓攫的個人完全無辜，以及他們絕對無力改變自己的命運，才有力地打動了我們的心緒。然而，恐怖只是在它的最後一刻才發展成純粹的政府形式。爲了建立一個極權政權，恐怖必定表現爲執行某種具體意識形態的一種工具；而這種意識形態必須贏得許多人的堅持，那怕這批人只占少數，才能使恐怖得到固定。對於歷史學家來說，猶太人在成爲現代恐怖的主要受害者之前，就已是納粹意識形態的中心。而一種必須說服和動員民眾的意識形態無法任意選擇受害者。換言之，如果一種公然的僞說，例如「錫安長老們的草案」，被許多人信以爲眞，它可以變成一場政治運動的內容，那麼歷史學家的任務就不再是揭露那種僞說。當然，這並非要製造一些解釋，用以抹煞事件中的主要政治和歷史事實：僞說爲人們所相信。這個事實比（從歷史角度來看是次要的）它是一種僞說的情形更重要。

因此，代罪羔羊的說法仍是主要的企圖之一，旨在迴避反猶主義的嚴

重性，以及猶太人被驅趕到事件的風暴中心這一事實的意義。同樣流傳甚廣的還有關於「永恆的反猶主義」(eternal antisemitism)的對立信條，據此，仇視猶太人只不過是對歷史僅賦予或多或少之機會的正常的、自然的反應。突發事件無需特別解釋，因爲它們是一個永恆問題的自然結果。這一信條之爲專業的反猶分子所信奉是當然的；它爲一切恐怖提供了最好的不在場證明。假如人類不停地屠殺猶太人已有兩千多年歷史是事實的話，那麼屠殺猶太人就成了一種正常的、甚至是符合人性的職業，仇視猶太人也就無需爭執地被合理化了。

這種解釋還有一個更令人吃驚的方面，即永恆的反猶主義，許多並無偏見的歷史學家，甚至更多的猶太人都接受了此說。這一奇特的巧合使理論變得危險與混亂。在兩種情況下，它具有一致的逃避主義的基礎：正如反猶主義者明顯希望逃避他們行爲的責任一樣，受攻擊而處於防守地位的猶太人更可理解地不希望在任何情況下討論他們那一部分的責任。然而，在猶太人，更多地是基督徒，其正式辯解的逃避傾向都基於更重要的、較不理性的各種動機的基礎之上。

現代反猶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中伴隨著和交織著猶太人的同化(Jewish assimilation)問題，以及猶太教舊有宗教價值與精神價值的世俗化和消失。實際發生的情形是，大部分猶太人同時受到來自外部物質消滅和來自內部精神解體的威脅。在此情形下，關注自己生存的猶太人會以一種奇怪的、絕望的錯誤解釋，附會一種安慰式的觀念，認爲反猶主義畢竟可能成爲一種使猶太人保持結合的手段，因此，永恆的反猶主義的假設更能暗含對猶太人生存的永恆保證。這種迷信是在世俗化地拙劣摹仿內在於猶太人是上帝選民的信念和救世主願望的永恆觀念，而事實又強化了這種迷信，即許多個世紀以來，猶太人經歷了基督教的敵視，這確實是使猶太人在精神上和政治上能維持的有力因子。猶太人將現代反基督教的反猶主義誤解爲舊日宗教上的仇視猶太人——而由於他們被同化，更使這一切在無知狀態

下同基督教在宗教和文化方面擦肩而過。面對基督教衰弱的明顯著徵兆，他們因此會天眞無知地想像，這是一種中世紀（所謂「黑暗時代」）的復興。無論他們對以往歷史的無知還是誤解，都部分地造成了他們對眼前事實上前所未有的危險作出致命的低估。但是同樣必須記住，缺乏政治能力和判斷是由猶太歷史本身的性質引起的，一個未曾有過政府，未曾有過國家，也未曾有過一種正式語言之民族的歷史。猶太歷史提供了一個民族的獨特的景觀：獨特，因爲一個民族的歷史開始於十分明確的歷史觀念，並且有意識地決定要在塵世達到一項目標明確的計劃，後來卻在並未放棄這種觀念的情況下，兩千年來避開了一切政治行動。結果使猶太民族的政治歷史比其他民族更加依賴於無法預見的偶然因素，因此猶太人躊躇於不同的角色之間，對任何事情都不負責任。

從最終使猶太人瀕臨種族滅絕的邊緣的災難來看，關於永恆的反猶主義的話題比以往更具危險性。今天，它比任何人所能想像的都要更輕易地赦免仇視猶太人的罪惡。反猶主義遠非那種使猶太民族獲得生存的神秘保證，而是淸楚地揭示成爲種族滅絕的威脅。然而這種反猶主義的解釋就像代罪羔羊論一樣，並基於類似的原因，並未遭到現實的駁斥。畢竟它以不同的論點、並且同樣頑固地強調了那種完全的、非人道的無辜，驚人地指出現代恐怖的受害者的特徵，因此好像得到了事件的證實。它甚至比代罪羔羊論更有利，它或多或少地回答了那個令人不愉快的問題：在所有的人中間，爲什麼獨獨是猶太人遭到滅頂之災？——僅此問題的回答便是：永恆的敵視。

非常明顯，唯一兩種嘗試解釋反猶主義運動的政治意義的說法，否定猶太人的一切責任，並且拒絕以特定的歷史出發來討論問題。根據這種對人類行爲意義的根本否定，這些說法很像那種用任意的恐怖手段取消了人類活動的可能性的現代政府形式及實踐。猶太人在種族滅絕的集中營裡慘遭殺害，這多少符合這些對猶太人爲何遭仇視的解釋：無論他們做或未做

什麼事，無論他們是惡還是善，情況都將如此。再者，劊子手們只聽從命令，並且爲他們冷酷無情的效率感到驕傲，也完全像是「無辜」的工具，由永恆的反猶主義信條支配他們去執行非人道的、非個人化的事件過程。

這一類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共同點本身並不顯示歷史眞理，儘管它們顯示了這種觀點的「時代」性質，解釋了它們爲何在大眾似乎如此合理。歷史學家的關心只是出於它們本身是其歷史的一部分，並出現在其追尋史實過程中。他和同時代人一樣受到這些共同點的說服力的影響。對硏究現代史的歷史學家來說，尤爲重要的是小心處理那些宣稱解釋總體歷史潮流普遍被接受的觀點，因爲上一個世紀產生了大量的意識形態，似乎都是解開歷史之謎的鑰匙，但無非都在竭力逃避史學家的責任。

古代的柏拉圖在同詭辯學派(Sophist)的論爭中發現，他們的「普遍手法是用論辯來迷惑思維」(《斐德若篇》〔*Phaedrus*〕261)，與眞理無關，但是旨在產生一些本性上不斷變化的觀點，而它們只有「在一致時，並且在維持一致時」才有效。(《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172)。他還發現在世間眞理的不確定性，因爲「信念來自意見(opinion)，而非來自眞理」(《斐德若篇》260)。古代與現代的詭辯論者之間的最主要區別是，古代人滿足於犧牲眞理而取得辯論的短暫勝利，而現代人則以犧牲現實去換取長久的勝利。換言之，一個摧毀人類思想的尊嚴，而另一個則摧毀人類行動的尊嚴。舊時的哲學家關心如何控制邏輯，現時的歷史學家關心的是控制事實。由於歷史本身被摧毀了，它的可理解性——其基礎是由人設定、因而被人理解——也處於危險之中，事實不再構成過往和當今世界的組成部分，並被誤用來證明這種或那種意見。

可以肯定，如果拋棄意見，傳統也不再毫無疑問地被接受，那麼，無法言喻的事實迷宮將很少能有導遊者。然而，我們的時代充滿了大動盪，它們深刻地影響了西方的人類歷史結構。這種歷史撰寫中的困惑無關大局。它們的直接結果是揭示我們至今尚未察覺的歷史組成部分。這並不意味著在

這場危機（它也許是西方歷史上自羅馬帝國崩潰以來最深刻的危機）中被摧毀的只是表面，儘管許多事物被揭示出來只是表面，而僅在幾十年前還被我們認爲是不可摧毀的本質。

同時發生的歐洲民族國家的衰落和反猶主義運動的發展，以民族形式組成國家的歐洲之崩潰和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之間的巧合，而其前置作業是反猶主義在和一切與之競爭的主義爭奪公眾輿論主導權的鬥爭中大獲全勝，這被看作反猶主義根源的嚴重徵兆。應該在民族國家發展的較普遍的框架中來觀察現代反猶主義，同時應該從猶太歷史的某些方面，尤其是上幾個世紀裡猶太人所起的作用方面去尋找它的根源。在解體的最後階段，如果反猶主義口號被證明是激勵和組織大量民眾以實現帝國主義擴張、摧毀舊的政府形式的最有效手段，那麼先前歷史上猶太人與國家的關係必然包含著某些社會羣體和猶太人之間日益增長的仇恨的基本線索。我將在下一章裡說明這種發展的狀況。

更進一步說，如果現代社會的暴民——即各個階級中失去地位者(déclassés)——逐步增多，而產生出領袖，他們並未被猶太人是否重要到應成爲政治意識形態的焦點上來考慮的問題所困擾，而是反覆在猶太人身上看到「歷史的關鍵」和一切罪惡的中心原因，那麼猶太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先前歷史必然包含暴民同猶太人之間關係的基本跡象。我將在第三章裡論述猶太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

第四章評述德雷富斯事件，這是我們時代的一種演出之前的彩排。由於它提供了一種奇特的觀察機會，在一個短暫的歷史時刻，使我們看到本來隱匿的反猶主義潛在力量在十九世紀的政治範圍以及它那相對平衡的精神狀態中，成爲一種主要的政治武器，所以第四章詳細地評述這個案件。

當然，下面三章只分析先期因素，它們直到民族國家淪衰、帝國主義發展到登上政治舞台時，才完全表現出來。

第二章
猶太人、民族國家與反猶主義的產生

㈠曖昧的解放和猶太國家銀行家

民族國家在十九世紀發展到頂峰期時，允諾它的猶太居民享有平等權利。更深刻、更古老、更致命的矛盾隱藏在抽象的、明顯的矛盾背後，猶太人從政府那裡接受公民地位，這些政府在世紀演變過程中使民族性(nationality)成爲公民的先決條件，使全體居民的同質性成爲政體的顯著特點。

跟隨著 1792 年法國敕令，遲疑地開始了一系列解放敕令，並伴隨著民族國家對待猶太居民的曖昧態度。封建秩序的崩潰使新的、革命性的平等概念得以興起，這種平等使「民族中的民族」不再被容忍。對猶太人的限制和享有的特權必須和其他具體權利和自由一起被廢止。但是，這種平等的發展大多取決於一種獨立的國家機器的發展，它或者是啓蒙的專制政治，或者是一切階級和政黨之上的立憲政府，在出色的獨立狀態下發揮功能，實行統治，並且代表民族的整體利益。所以，從十七世紀後期起，在國家威望和經濟與商業利益的新擴張兩方面產生了前所未有的需要，而歐洲居民中沒有一個羣體打算增加國家的威望或積極參與國家商業的發展。因此很自然地，猶太人由於世世代代充作放債人的經驗，以及他們同歐洲貴族階級的聯繫——時常尋求貴族階級的地方庇護，並爲貴族階級處理金融事務——而會應邀幫助發展商業；很明顯，正是出於新的國家商業的利益需要，才允許猶太人享有某些特權，並將他們當作另一個羣體對待。無論在何種

情況下，國家都無法將他們看作與其餘人民是完全同化的，這些人拒絕信任國家，不願意進入國有商業，而是循從私人資本主義企業的日常商業活動。

因此，十九世紀歐洲民族國家制度所允准的猶太人的解放具有雙重來源，也具有一種無時不在的曖昧含義。一方面，由於新政體的政治與法律結構只有在政治與法律平等條件下才能發揮作用，政府爲了自身利益起見，不得不盡可能迅速、徹底地消除舊秩序下的不平等狀態。另一方面，由於猶太人具體特權逐漸擴展的明顯結果——這些特權最初只允准給個人，後來通過他們而允准給富裕的猶太人小團體；只有當這種有限團體已無法再靠本身去處理國有商業不斷增長的需要時，特權最終才擴展到全體西歐和中歐的猶太人。❶

於是，在同一時間和同一國家裡，解放意味著平等**和**特權，意味著摧毀舊的猶太羣體自治**和**有意識地使猶太人保留爲社會中的一個隔離羣體，意味著取消特別限制和特別權利**並**將這類權利擴展到一個正在成長的、由個人組成的羣體。新政體的前提曾經是各族人民享受平等條件，而這種平等眞正實行時，至少是做到剝奪舊統治階級的統治特權、並剝奪舊壓迫階級的受保護特權，與此過程同時；階級社會(class society)產生，它像舊政體一樣有效地從經濟上、社會上分離各民族。法國大革命時雅各賓黨人理解的平等條件只有在美國才成爲現實，而在歐洲大陸，它即被純粹形式上的法律之前的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所取代。

一個以法律之前的平等爲基礎的政體，和一個以階級制度的不平等爲基礎的社會之間的基本矛盾，阻礙了共和政體的功能的發展，也阻礙了新的政治層級的誕生。作爲社會條件難以平等的事實，歐洲大陸的階級成員資格是落實於個人的，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還幾乎都以出身爲準，這種社會條件無法超越的不平等，却仍能和政治平等共同存在。只有像德國這樣政治落後的國家才保留了一些封建殘餘。貴族階級的成員從總體上正

在將自身轉變爲一個階級，他們擁有特權政治地位，因此可以作爲一個羣體和國家之間保留某種特殊的關係。但是這些也都是殘餘。發展完備的階級制度意味著，一概使個人地位由他在自己階級內的成員屬性與他和另一人的關係來界定，而不是根據他在國家中或在國家機器中的地位來確定。

這條通則的唯一例外是猶太人。他們自己並不構成一個階級，他們於所在的國家內也不屬於任何一個階級。作爲一個團體，他們不是工人，不是中產階級，不是地主，也不是農民。他們的財產似乎使他們構成中產階級的一部分，但是他們並不與中產階級共擔資本主義發展之責任；他們很少代表工業企業，在他們處於歐洲歷史的最後幾個階段時，如果他們大批地成爲雇主的話，那麼他們只雇用白領職員，而不雇用工人。換言之，儘管他們的地位由於他們是猶太人而確定，也不是透過他們和另一個階級的關係而定。他們受國家的特殊保護（無論以公開特權的舊形式，還是其他團體不需要的、針對社會敵視而時時必須加強的特別解放敕令）以及他們爲政府所作的特殊服務，妨礙他們加入階級制度和自身建立成爲階級。❷因此，當他們被接納進入社會時，他們成爲一個界限明確的貴族階級或資產階級，在一個階級中自我保存的團體。

毫無疑問，民族國家有意將猶太人當作一個特殊團體保持下來，並且防止他們與階級社會同化，同樣地，猶太人也有意通過自我保持而達到族羣生存。假如沒有這種巧合，政府的企圖很可能會落空；國家需要一切公民平等，社會需要每一個個人進入階級以達到合作，這是強有力的傾向，這兩者都明顯地包含著要猶太人完全同化，但只有通過政府的干涉和自願的合作兩者結合才能奏效。官方的猶太民族政策畢竟不總是一貫的，不像我們在只考慮最後結果時那樣認爲它是不變的。❷猶太一貫忽視他們從事正常的資本主義工商企業的機會，的確令人驚訝。❹然而沒有政府的興趣和實踐，猶太人幾乎不可能保持他們的團體認同。

和其他羣體相比，猶太人本身和他們的地位是由政體(body politics)

確定的。但是既然這一政體並無另外的社會實在，那麼從社會角度來看，他們是懸空的。他們的社會地位不平等現象與階級制度下的不平等截然不同；這仍然主要是他們同國家的關係的結果，因此在社會上，身爲猶太人，既意味著他在政府的特別保護之下有過多的特權，也意味著缺少某些權利和機會——爲防止他們同化而不讓他們獲得——而變成喪失特權者。

歐洲民族國家和歐洲猶太民族同時興衰的架構輪廓在下列各階段中可略見端倪：

㈠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民族國家在絕對君主制的監護下發展緩慢。個別的猶太人在各處從極其卑微的地位上升，進入有時榮耀的、但經常是具有影響力的宮廷猶太人地位，他們從財力上支持國家事務，替他們的君主管理金融業務。這一發展情況影響了仍在封建秩序下生活的羣眾，但是對猶太人總體而言影響甚微。

㈡法國革命之後，整個歐洲大陸的政治狀況發生突變，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出現了，它們的商業活動需要相當大量的資本和信貸，遠遠超過了以往宮廷猶太人被要求置放在君王控制下的數目。只有當西歐和中歐猶太人中更富有的階層將財富集中起來，交給某些著名的猶太銀行家用於上述目的，才足以滿足政府的新需要。這一時期的允准特權授與了較大的富裕階級(在此之前只有宮廷猶太人才需要有此種授與)，使他們在十八世紀內成功地占據了比較重要的城市金融中心。成熟的民族國家全都頒布了最終解放敕令，只有幾個國家是例外，那裡的猶太人人數和當地普遍落後狀況使他們無法組成一個獨立的團體，因此也無法發揮經濟功能，從財政上支持政府。

㈢既然政府和猶太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基於總體上資產階級政治上的冷漠和具體上對國家財政的不關心，這一個時期到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崛起時就結束了，擴張形式的資本主義商業若無國家積極的政治援助和介入，便

無法再擴張。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破壞了民族國家的基礎，將商業集團的競爭精神引入了歐洲國際禮讓的慣例。在這一發展的最初幾十年內，猶太人在具有帝國主義頭腦的商人面前失去了他們在國家商業中的專有地位；作為一個羣體，他們失去了重要性，儘管一些個別的猶太人仍然以財政顧問和歐洲國家之間的中間人的身份保持著影響力。然而和十九世紀的國家銀行家相比，這些猶太人甚至不很需要猶太社羣，他們不像十七和十八世紀的宮廷猶太人，因此，他們常常完全脫離猶太社羣。猶太社羣不再是一種經濟上的組織，雖然一些身居要職的猶太人在異教世界的眼中仍然是猶太民族總體上的代表，但是在這表相背後幾乎沒有物質的實在性。

(四)西方猶太民族作為一個羣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幾十年裡就和民族國家一起解體了，戰後歐洲的迅速衰落使猶太人發現他們早已被剝奪了先前的權力，分化成了一羣富裕的個人。在帝國主義時候代[illegible]猶太人的財富變得不具意義；對於一個缺乏各國之間的權力平衡感和內[illegible]的歐洲而言，這種非國家的、內在歐洲的猶太成分，變成了普遍仇恨的對象，因為他們的財富已經無用，他們也成了蔑視的對象，因為他們沒有權力。

第一個需要正常收入和財政保證的統治形式是君主專制(absolute monarchy)政府，民族國家在此政制下成形。封建君主也需要錢，甚至也需要借貸，但只出於特定目的和當時行動的需要；即使在十六世紀，當富格爾家族(Fuggers)將自己的貸款交給國家掌握時，他們也未想過建立一種專門的國家信貸。專制君主起初提出財政需求時，部分通過戰爭和掠奪的舊方法，部分通過壟斷稅收的新方法。這破壞了貴族階級的權力，搗毀了財富，却無法緩和人們越來越嚴重的敵對情緒。

長期以來，專制君主們在社會上尋找一個階級作為可靠的依賴，一如封建君主們依賴貴族階級。自從十五世紀以來，法國一直存在著行會和君主之間的不斷鬥爭，君主想將行會併入國家體系。這些實驗中最有意思的

莫過於重商主義(mercantilism)的興起，以及專制國家嘗試絕對壟斷全國工商業。所造成的災難，新興資產階級一致抵制而引起的破產，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了。❺

在解放敕令頒布之前，歐洲的每一個君主和每一個王室都已有一名宮廷猶太人替他們掌管金融事務。在十七和十八世紀，這些宮廷猶太人總是一些單個的個人，他們在歐洲國家之間建立聯繫網，掌握歐洲國家之間的信貸，但是不組成一個國際金融體。❻當猶太人作爲個人以及最初的猶太富人小社團比在十九世紀任何時候都有力量，這些時代的特點是大家能坦率地討論猶太人的特權地位和權利，❼而政府當局也小心翼翼地證實他們爲國家服務的重要性。他們提供的服務和允准的特權之間的關聯無疑是淸楚的。享有特權的猶太人接受貴族的稱號，這在法國、巴伐利亞、奧地利和普魯士幾乎都是事實，所以從外表上來看，他們不只是富人。羅斯希爾德家族向奧地利政府申請貴族封號的艱難情形（他們於 1817 年申請成功）表明這一整個時期結束了。

十八世紀末期，各個國家裡沒有一個等級或階級願意或能夠成爲新的統治階級，表明自己認同政府，就像貴族階級在過去幾個世紀裡那樣。❺君主專制未能在社會上找到一個替身，導致民族國家的充分發展，它宣稱高於一切階級，完全獨立於社會及其利益之外，是民族整體的唯一眞正代表。這在另一方面導致民族的政體賴以建立的國家與社會之間分裂日益加深。如果不是爲了上述原因，就不需要——或者說甚至沒有可能——在平等條件下將猶太人引進歐洲歷史。

當國家想和社會上的一個主要階級結盟的一切嘗試全都失敗後，它就選擇建立自身成爲一個龐大的商業財團。這當然只是出於管理國家的目的，但是金融與其他方面的利益，以及花費的巨大代價，使人不得不承認從十八世紀以來國有事業（state business）特殊領域的存在。國有事業獨立發展的起因是和當時各種強大的金融力量的衝突，以及和資產階級的衝突

——資產階級正在從事私人投資，避開國家的介入，拒絕積極地從金融方面參與可能「沒有生產力」的企業。因此，猶太人是居民中唯一願意用財政支助國家開辦事業、並將他們的命運繫結於它的發展的一部分人。他們因有自己的貸款和國際金融連繫，處於有利位置，能幫助民族國家躋身於當時最大的企業和雇主的行列。❾

很大的特權——猶太人生存條件的決定性變化——是要他們完成這些服務的必要代價，同時，也是對他們巨大冒險的報酬。最大的特權是平等。普魯士的腓特烈欽定「金錢猶太人」(Münzjuden)或奧地利皇帝冊封宮廷猶太人，通過「一般特權」和「專有權利」獲得的地位，正是半個世紀以後，普魯士的所有猶太人解放和平等權利之名所得到的地位；在十八世紀末，柏林猶太人達到了財富的頂峰，他們設法防止了東部省份猶太人的湧入，因為他們不願意和貧窮的同族兄弟們共享平等，不承認他們和自己是平等的；在法國國民會議(French National Assembly)期間，博爾多(Bordeaux)和亞威儂(Avignon)的猶太人極力抗議法國政府賦予東部各省猶太人平等權，很明顯，至少猶太人不是以平等權利，而是以特權和具體自由來思考。因此毫不奇怪，享受特權的猶太人和政府的商業有密切聯繫，並且意識到其地位的性質和條件，他們不願看到一切猶太人都得到自由這份禮物——這是他們貢獻服務的代價，他們自己是如此計算的，所以不應該是一切人都可以享受的權利。❿

直到十九世紀末，帝國主義又崛起，有產階級才開始改變他們原先對國有商業無利可圖的估計。帝國主義的擴張隨著暴力工具的不斷完善和國家對暴力機器的絕對控制，使國家具備一種有利可圖的商業地位。當然，這就意味著猶太人慢慢地、但是自動地失去了他們排他性的獨特地位。

但是，猶太人的豐厚財富以及他們從卑微地位上升到具有政治意義的地位，如果在發展中的民族國家仍然侷限於商業功能，就會更早地結束。十九世紀中期，一些國家已有足夠的信心擺脫對猶太人向政府信貸的財政支

持的依賴。⓫再者，國民們漸漸意識到，他們的個人命運越來越緊繫於國家命運，這使他們隨時準備向政府提供更多的信貸。平等本身的象徵是能獲得政府的各種債券，而公債最終被認爲是最保險的資本投資形式，因爲國家能夠發動民族戰爭，它是事實上能夠保護公民財產的唯一機構。從十九世紀中期起，猶太人猶能夠保持其顯著地位，僅僅是因爲他們還有另一種重要的關鍵角色，這種角色和他們參與國家的命運密切相關。他們沒有自己的國土和政府，他們一向只是歐洲國際間的成分(inter-European element)；民族國家必然保留這種國際地位，因爲猶太人的金融服務必須依靠它。但是，即使當他們的經濟作用耗盡了，猶太人的歐洲國際間地位在民族衝突與戰爭中對於民族來說仍然十分重要。

當民族國家對猶太人的服務的需要程度慢慢地、合乎邏輯地從歐洲歷史的總體環境中發展時，猶太人的政治和經濟重要性不斷上升，這對於他們自己以及他們的鄰居來說都是既突然，又出於意料之外。在中世紀後半期，猶太貸款人失去了先前的一切重要性，在十六世紀初期，猶太人已經被逐出城市和貿易中心，只能在鄉村間活動，因此對他們的統一保護從高層當局改變爲由地方小貴族提供不甚安全的地位。⓫在十七世紀裡出現了轉折點，三十年戰爭期間，正因爲猶太人分散在各處，這些地位低下、作用不大的小貸款人可以保證向遠方地區軍閥的雇傭軍隊提供必要的軍需供應，並可借助小販們的力量從各省購買糧草。由於這些戰爭仍然是半封建性質的，或多或少只是和君主的私人事務有關，不牽涉其他階級的利益，也得不到人民的援助，猶太人從中獲得的地位就非常有限，而且幾乎看不出來。但是由於此時每一個封建王室都需要一個宮廷猶太人之類的角色，所以宮廷猶太人的人數就增加了。

只要這些宮廷猶太人替作爲貴族的封建小領主服務，並不有志於代表任何中央權威，他們就只是社會上一個羣體的僕人。他們管理的財產、出借的金錢、供應的物資，都只能看作是主人的私有財產，所以這些活動都

不會將他們牽連進政治事件中去。無論猶太人被仇恨或受寵幸，他們都不會變成重要的政治問題。

但是，當封建領主的作用產生了變化，當他地位上升至君主或國王，他手下的宮廷猶太人作用也隨之改變。猶太人作爲一疏離分子，對他們所處環境的這種變化不甚感興趣，總是最後一個意識到自己地位已提高的人。就他們而言，他們繼續管理私人商業，他們的忠誠仍然屬於私人問題，和一切政治考慮無關。忠誠意味著誠實，它並不意指在衝突中站在哪一邊，或爲了政治理由保持眞實。向軍隊提供物資，提供食物和衣服，借錢給領主雇用軍隊，這些都只意味著對商業伙伴的利益興趣。

猶太人和貴族的這種關係是猶太團體和另一個社會階層保持關係的唯一一種。這種關係在十九世紀初消失以後，再也未被其他關係取代過。它的唯一殘餘對猶太人而言是對貴族頭銜的嗜好（尤其是在奧地利與法國），對於非猶太人來說，一種自由派反猶主義(liberal antisemitism)的觀點將猶太人與貴族階級湊在一起，說他們以某種金融聯盟的方式反對正在上升的資產階級。這種說法在普魯士和法國很流行，只要猶太人還未獲得總體上的解放，總顯得有某些道理。宮廷猶太人的特權的確很像貴族擁有的權利和自由，事實上，猶太人也很害怕失去特權，因此也會用同樣的論點來反對和貴族階級成員一樣，平等。這一似乎有理的說法在十八世紀更爲人所接受，當時大多數享有特權的猶太人都獲得了小貴族的頭銜，在十九世紀初，和猶太社羣失去連繫的猶太富人便尋求新的社會地位，並開始模仿貴族階級。但這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結果，首先因爲貴族很明顯已在沒落，而相反的，猶太人的地位則不斷上升。其次是因爲貴族本身（尤其在普魯士）恰恰變成了第一個產生反猶主義思想的階級。

猶太人在戰爭中曾經是君王們的軍需供應者和僕人，但是他們本身並不想、也沒有介入衝突。當這些衝突擴大成爲民族之間的戰爭時，他們仍然保持國際分子的身份，他們的重要性和有用性恰恰基於不束縛於任何民

族原因。猶太人不再是銀行家和戰爭軍需商（由猶太人金融支持的最後一次戰爭是 1866 年的普奧戰爭，勃萊赫羅埃德〔Gerson Bleichroeder〕在俾斯麥拒絕普魯士國會的貸款後出資幫助了他），他們成了和平條約的金融顧問與助手，並且以一種組織不嚴密的、無規定的方式成了消息提供人。最後兩次不用猶太人幫助而簽署的和平條約是維也納會議和大陸霸權們與法國的條約。勃萊赫羅埃德在 1871 年德法和平談判中的作用比他對戰爭的幫助有意義得多，⓭在七十年代末期，他還提供了更重要的服務，通過他同羅斯希爾德家族的聯繫，他爲俾斯麥提供了一條通向英國首相本杰明・狄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的間接消息渠道。凡爾賽和約是猶太人扮演重要顧問角色的最後一次。沃爾特・拉德諾(Walter Rathenau)是以國際猶太人關係網而在民族舞台上出名的最後一名猶太人，他是魏瑪共和國的命舛運蹇的外交大臣。正如他的同儕們在他死後所說的，他貢獻出了自己在國際金融界的聲望，到處支持在國際舞台上沒沒無聞的猶太人進入新的共和國擔任部長職務，爲此付出了一生。⓮

反猶主義的政府顯然不會在戰爭與和平事業上起用猶太人。但是在國際舞台上清除猶太人比起反猶主義來更具有普遍的、深刻的意義。正因爲猶太人曾被當作非國家成分來使用，他們在戰爭與和平中顯示價值，只要是每一個人在戰爭中都試圖有意識地保持和平的可能性，只要每一個人的目標都是妥協中的和平和權宜之策的重建。一旦「非勝利即死亡」成爲決定性政策，戰爭事實上以徹底消滅敵人爲目標，猶太人就不可能再產生作用了。這種政策在任何情況下都驅使著毀滅他們的共同生存，儘管在政治舞台上消失、甚至滅絕一個特殊的羣體生活並不必然導致他們實質上的毀滅。但是，不斷重複出現一種說法：只要允許猶太人加入納粹運動，他們就會像德國公民一樣輕易地成爲納粹分子，正如他們在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種族立法之前曾經加入意大利法西斯黨，這只有一半是眞的。只有在牽涉到個別猶太人的心理時，這才會是事實，當然，它和周圍環境的心理氛

圍差別不會太大。但從歷史意義上說，這很明白是錯的。即使沒有反猶主義，納粹主義對歐洲猶太人的生存也是致命打擊；贊同納粹主義意味著自殺，不必然是針對猶太血統的個人，而是對於作為一個民族的猶太人而言。

除了第一個矛盾，即平等與特權（或說是以特權的形式、出於特權的目的允准的平等）的矛盾，決定了歐洲猶太民族在前幾個世紀裡的命運，還有第二個矛盾：猶太人是唯一一個非國家的歐洲民族，歐洲民族國家制度的突然垮台使他們比別的民族受到威脅更大。這一情形初看起來很矛盾。歐洲民族的代表們，無論是從羅伯斯庇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到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之流的雅各賓黨人，還是從梅特涅到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這樣的中歐反動政府的代表，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都認眞地關注歐洲的「權力平衡」。當然，他們試圖將這種平衡轉為對各自國家的利益，但是他們從未夢想過控制歐洲大陸，或完全消滅他們的鄰居。為了在這種變動不定的平衡中取得利益，猶太人被利用，甚至成了歐洲各國共同利益的一種象徵。

因此，猶太人遭到大災難，之後是歐洲各民族災難性的失敗，這就不是偶然的了。消滅猶太人這一著很容易使歐洲權力平衡解體，同時也很難使人理解消滅猶太人比異常殘酷的民族主義或「舊有偏見」在不恰當的時候復活涉及更多的問題。當災難發生時，猶太人的命運被看作一種「特例」，它的歷史是根據例外的規律，因此，它的命運和一般情況無關。歐洲團結的破產立即反映在全歐洲猶太人團結的破裂。當德國開始屠殺德國猶太人時，其他歐洲國家的猶太人發現，德國猶太人是例外，和他們的命運不一樣。同樣地，德國猶太羣體的崩潰之前，自己就先分裂成了無數小派別，每一個派別都相信並希望它的基本人權會受到特權的保護——應有特權，因為他們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士兵，是參戰士兵的子女，父親在戰場上作戰犧牲的榮耀子女。看來似乎一切猶太血統的個人遭到絕滅都起始於猶太民族的冷酷的毀滅和自我分解，似乎猶太民族的生存都繫結於其他民族

以及其仇恨。

猶太歷史還有一個最動人的方面，即猶太人的積極進入歐洲歷史的起因是，他們在眾多發展的或已存的民族國家的世界中是一種歐洲國際間的、非國家的成份。他們的這種作用比他們作爲國家銀行家的作用更長久、更重大，這是猶太人在藝術和科學方面新的現代型創造力的物質原因之一。他們的垮台與一種制度和一種政體的敗亡——無論這政體是否有其他方面的缺陷，總需要並且容忍一種純粹歐洲的成份——相伴隨，這並非有失歷史公正。

我們不應該忘記猶太人在歐洲的一貫輝煌的生存，哪怕在過去幾個世紀裡猶太歷史無疑有許多不光彩的方面。少數意識到「猶太問題」這一方面的歐洲學者，對猶太人也不會有特殊的同情，只毫無偏見地評估整個歐洲情勢。其中有法國十八世紀唯一的哲學家狄德羅(Denis Diderot)，他對猶太人並無敵意，認爲猶太人是不同國籍的歐洲人之間有用的聯結；還有威廉・馮・洪堡德(Wilhelm von Humboldt)，他通過法國革命而目睹了猶太人的解放，他說當猶太人變爲法國人時，就會失去他們的普遍性地位；[15] 最後還有弗里德利希・尼采，他出於對俾斯麥的日耳曼帝國的厭惡，而杜撰「好歐洲人」(good European)一詞，這使他有可能正確地評估猶太人在歐洲歷史上有意義的作用，也使他免於落入廉價的愛猶主義(philosemitism)和自視優越的「進步」態度的陷阱。

儘管這種評估在描述表面現象時十分正確，但它忽略了體現猶太人奇特的政治歷史中的最嚴重的弔詭。在歐洲各民族中，猶太民族是唯一一個沒有自己國家的民族，而且恰恰因爲這個原因，他們一向很期望、並且適合於與任何國家和政府結盟，無論這些政府和國家可能代表什麼。另一方面，猶太人沒有政治傳統和政治經歷，他們很少意識到社會與國家之間的張力，對於其新角色所面臨的明顯的冒險性和權力可能性也很少有所意識。

他們提供的少數政治知識和傳統實踐，首先始於羅馬帝國，那時他們受羅馬士兵的保護，後來在中世紀，他們尋求並接受遙遠的君主和教會當局的保護，以抵禦人民和地方統治者的傷害。他們從這些經歷中多少得出了結論，即當局，尤其是高層統治當局，對他們是有利的，而低層官吏，尤其是普通人，對他們是危險的。這種偏見雖表達了一種確定的歷史事實，但不再符合新的情況，此一偏見深深地植根於大多數猶太人的共同心理中，就像對猶太人的偏見爲異教徒普遍接受一樣。

猶太人和各國政府之間的關係，歷史上有大量例子可資說明，猶太銀行家的效忠對象如何迅速地從一個政府轉變到另一個政府，即使在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以後亦是如此。1848 年，法國的羅斯希爾德家族幾乎在不到二十四小時裡，就從路易·菲利浦(Louis Philippe)政府轉向爲新的、短命的法蘭西共和國服務，後來又轉向拿破侖三世。同樣的過程重複發生在第二帝國垮台之後和第三共和國建立之時，儘管轉向速度稍微緩慢一些。在德國 1918 年革命之後，這種突然的輕易轉變象徵地一方面發生在那些戰爭堡壘的金融政策上，另一方面表現在沃爾特・拉德諾不斷變換的政治野心上。⓯

在這一類行爲中牽涉的問題多於簡單的資產階級模式所涉及的問題，資產階級的方式一向假定，只有成功了的才是眞正的成功。⓰如果猶太人是普通意義的資產階級(bourgeois)，那麼他們可能正確地估計了其新角色權力可能性，扮演起那種秘密世界力量的虛構角色，能製造或破壞政府，而反猶主義者正是千方百計這樣指責他們的。然而，事實畢竟是事實。猶太人對政治權力既無所知，又無興趣，最多只會出於自衛的微弱目的而施加溫和的壓力。這種缺乏雄心的表現使猶太銀行家和商人們被同化了的下一輩甚感不滿。他們有一些人像狄斯累利一樣，夢想能有一個他們可以從屬的秘密猶太社會，但是這個秘密社會從未存在過，另外一些人像沃爾特·拉德諾一樣，他們比較了解情況，也反對發表一些半反猶主義的激烈言論，

反對既無權力又無社會地位的富有猶太商人。

非猶太的政治家和歷史學家從來就不能理解這種天眞行爲。另一方面，猶太人的代表們和作家們對這種脫離權力的情形也習以爲常，因此他們從不談論權力，最多只在遇到對他們有荒謬懷疑時才表達一下驚愕。十九世紀的許多政治家在回憶錄中，都肯定地說戰爭不會發生，因爲倫敦、巴黎、維也納的羅斯希爾德不要戰爭。即使像 J. 霍布森(J. A. Hobson)這樣淸醒而可靠的歷史學家，在 1905 年時也只能這樣說:「是否有人認眞地假設，如果羅斯希爾德家族及其商業網絡抵制的話，有哪個歐洲國家能夠承擔一場較大的戰爭，或簽署一筆巨額政府貸款?」⑱這種錯誤判斷非常有趣，它天眞地設想每一個人都一樣，正如梅特涅眞誠地相信「羅斯希爾德家族在法國政府中的作用比在任何外國政府中都重要，」或者他在 1848 年奧地利革命前不久，信心十足地對維也納羅斯希爾德家族預言:「假如我失敗了，你們會跟著我一起失敗。」事實眞相是，羅斯希爾德家族沒有任何政治概念，就像其他猶太銀行家不知要在法國有何作爲，更不用說有什麼明確的目的，足以暗示發動一場戰爭了。相反，他們像其他猶太同伴一樣，絕不和任何一個具體的政府結盟，而是和許多政府結盟，和權威結盟。如果他們在這時或那時顯示出明顯地傾向於君主專制政府、反對共和政體，那只是因爲他們正確地懷疑共和政體在很大程度上以人民的意志爲基礎，而對於人民的意志，他們是本能地不信任的。

猶太人對國家信任到何種程度，他們對歐洲的實際情況無知到何等地步，這從魏瑪共和國的最後歲月中可以看出，當時他們早已對未來感到恐懼，終於在政治上一試身手。他們在幾個非猶太人士的幫助下建立了中產階級政黨，名爲「國家黨」(Staatspartei)，這個名稱本身充滿了矛盾。他們天眞地相信，他們的「黨」在政治鬥爭和社會鬥爭中應該代表他們，應該成爲國家本身，但是他們從來不明白政黨和國家的全部關係。假如有人認眞花費心思來思考這個由受人尊敬的、令人敬畏的紳士組成的黨，他只

會得出一個結論，不計代價表現出的忠誠只不過是一面表相，背後各種邪惡力量陰謀接管國家。

如同猶太人完全忽略了國家與社會之間越來越緊張的關係一樣，他們也不會明白是客觀情勢迫使他們進入了衝突的中心。所以他們不懂如何評價反猶主義，或者說，分辨不出社會歧視變成政治爭端的時刻。一百多年來，反猶主義慢慢地發展到幾乎歐洲所有國家的所有社會階層，直到它最後作爲一個問題突然出現，而對此幾乎達到了一個統一的觀點。這個過程發展的規律很簡單：每一個和國家發生衝突的社會階級都變成反猶主義者，因爲看來代表國家的唯一社會團體是猶太人。而唯一證明不受反猶主義宣傳影響的階級是工人，他們投身於階級鬥爭，對歷史作出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從不直接和國家發生衝突，只和另一個社會階級發生衝突，即資產階級，而猶太人當然不代表資產階級，他們在其中從來不構成一個有意義的組成部分。

十八世紀末在某些國家裡對猶太人的政治解放，以及在中歐和西歐對這個問題的討論，首先導致了他們對國家的態度上一種決定性的轉變，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羅斯希爾德家族的崛起爲象徵。宮廷猶太人最早變成了有實力的國家銀行家，當這些猶太人不再滿足於通過他們和其他國家的宮廷猶太人的國際關係而服務於某一特定的君王或政府，而決心自身建立國際網絡，同心協力地同時服務於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和奧地利政府時，他們的新政策就成形了。這一史無前例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羅斯希爾德家族對猶太人眞正解放的危險的一種反應，眞正解放以及伴隨而來的平等會威脅到猶太民族，會在各個國家裡被國家化(nationalized)，而摧毀猶太銀行家的地位基礎的他們在歐洲各國之間的優越條件。羅斯希爾德家族的創始人老梅厄·阿姆切爾·羅斯希爾德(Meyer Amschel Rothschild)必定認識到，猶太人在歐洲各國之間的地位不再安全了，因此他最好在自

己家族中嘗試實現這一獨特的國際地位。他確定分派五個兒子去五個歐洲金融首都——法蘭克福、巴黎、倫敦、那不勒斯、維也納——作爲他面對令人尷尬的猶太人解放的一條靈活的出路。⑲

羅斯希爾德家族成了黑森選帝侯(Kurfürst of Hessen)的金融僕從這一引人注目的職業，是當時最傑出的貸款人之一，他教會他們如何從業，並向他們提供了許多客戶。他們的最有利條件是住在法蘭克福，它是從不驅逐猶太人的唯一大城市，在十九世紀初，猶太人占了城中居民人口將近百分之十。羅斯希爾德家族一開始便是宮廷猶太人的，不受君主或自由市的統轄，而是直接受遠在維也納的皇帝的管轄。因此，他們綜合了中世紀猶太人和當時猶太人地位的一切優點，比其他宮廷猶太人更少地依賴貴族或地方當局。在此以後，家族的金融活動、他們聚積的大量財富、以及從十九世紀初起這個家族象徵性的名望，都已廣爲人知。⑲在拿破侖戰爭的最後幾年裡，他們進入了大企業的舞台，從 1811 年到 1816 年，英國對歐洲大陸列強的經濟援助幾乎有一半經由他們之手。拿破侖戰敗之後，歐洲大陸到處需要設立大量政府公債，以重新組織國家機器，因此出現了羅斯希爾德家族仿照英國銀行而建立的金融結構，由此在管理國家公債方面幾乎獲得了獨占權。這一情形持續了三代人，在此期間，他們在金融界成功地擊敗了一切猶太和非猶太的競爭對手。正如卡帕菲格(Jean Capefigue)所說，「羅斯希爾德家族成了神聖同盟的財政大臣。」⑲

羅斯希爾德家族國際地位的確立及竄升，超過了其他一切猶太銀行家，這就改變了猶太人國家企業的結構。當個別猶太人精明地利用獨特的機會，在一個人的生命時間裏頻繁地上升到巨富的峰巔，又跌入貧困的深淵時；這樣的個人機運幾乎不觸及作爲整體的猶太民族的命運，除非這些猶太人有時充當遙遠社羣的保護者和請願者；無論富裕的貸款人有多少，也無論宮廷猶太人個人有多大影響力，其實也並無明確界定的猶太羣體發展的跡象，不能集體地享受具體特權和提供具體的服務；在這些情況下，無計劃、

無組織的偶然發展一去不復返了。恰恰是羅斯希爾德家族壟斷了政府公債的發放，使它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從總體上抽調猶太人的資本，將猶太人財富的大部分轉入國家商業的渠道，因此爲中歐和西歐猶太人的新國際凝聚力提供了天然的基礎。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各國猶太人之間未經組織的網絡，至此由一家公司將分散的機會有系統地集中起來，以所有重要的歐洲資本形式出現，經常和各個部分的猶太人接觸，完全掌握一切相關的信息和一切能組織起來的機會。[22]

猶太人舊有的宗教和精神傳統的聯繫，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慢慢地鬆弛，這是猶太民族的存在首次受到了威脅，但是羅斯希爾德家族在猶太世界中的獨有地位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那種舊聯繫。對於外界來說，這個家族也成了猶太國際主義在一個以民族國家和由民族構成的世界中活動現實的象徵。的確，一個家族有五個不同國家的國藉，到處聞名，至少與三個不同的政府（法國、奧地利、英國）緊密合作，它們的經常衝突却從不動搖國家銀行家的利益聯結，還有什麼樣的奇異概念能比這更好地證明一個猶太世界政府(Jewish world government)的存在嗎？現實本身比一切宣傳都有效地創造出一種更有利於政治目的的象徵。

根據普遍的看法，猶太人和其他民族相比，更是依靠血緣和家族的紐帶來保持緊密的聯繫，這種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這樣一個家族的現實引起的，它實質上代表了猶太民族整體的經濟和政治意義。其結果必然是，當爲了一個在和猶太人問題毫無關係的原因，種族問題被提到政治舞台的前台來時，猶太人最能適合於那些以血緣紐帶和家族特點來界定一個民族的意識形態和說法。

然而，另一種並不很偶然的事實證明了這種猶太人的形象。爲了保持猶太民族，家族所產生的作用遠比除貴族以外的任何西方政治和社會團體更大。家族紐帶是一種最強有力、最頑固的因素，猶太人靠它來抵制被同化和分解。正如沒落的歐洲貴族加強他們的聯姻和宗法一樣，西方的猶太

人在幾個世紀內精神和宗教解體時也更強調家族意識。他們沒有舊日的彌賽亞救世的期盼，也沒有傳統的宗親的堅實基礎，因此過於敏感地意識到，他們的生存是在異族的、往往是敵視的環境中取得的。他們開始將家族內部圈子看作一種最後的堡壘，並且在行動上將自己團體內的成員看作一個大家庭內的成員。換言之，猶太人由血緣紐帶緊密地聯結成如同一個家族，而反猶主義對此的描述在某些方面和猶太人的自我描繪如出一轍。

這一情形在十九世紀反猶主義的最初興起和繼續發展中是一種重要因素。哪一個民族團體會在特定國家的特定歷史時刻裡轉向反猶主義，取決於當時的總體環境使他們隨時準備以暴力和他們的政府對抗。但是論點和形象驚人的相似性，一再自發地被複製，和他們所歪曲的事實有著密切聯繫。我們發現，猶太人總是代表了一種國際貿易組織，一個世界性的家族以及他們在到處都一致的利益，一種王冠背後的秘密力量，它將所有的有形可見的政府都降爲一種表面之物，被後台操縱的傀儡。由於他們和國家權力來源的密切關係，猶太人就無一例外地被指認爲權力，並且由於他們游離於社會之上，集合在家族圈子內，所以總被人懷疑是在毀滅一切社會結構。

(二)早期反猶主義

有一條明顯常却被人遺忘的規律：只有當反猶情緒能同一個重大政治問題吻合，或者當猶太人羣體利益公開和社會上一個主要階級的利益發生衝突時，它才和政治有關。我們從中歐和西歐國家所知的現代反猶主義，其起因是政治而不是經濟，而複雜的階級條件導致了在波蘭和羅馬尼亞，對猶太人的普遍暴力仇恨。由於政府無力解決土地問題，無法通過解放農民而使民族國家獲得最低限度的平等，因此封建貴族不僅成功地維護了它的政治統治，而且也成功地防止了中產階級的正常興起。這些國家裡的猶太

人——在數量上占優勢，但在其他每一個方面都很虛弱——似乎符合中產階級的某些功能要求，因爲他們大多是店主和商人，是作爲一個團體而處於大地主和無財產階級之間。然而，小產業主既能在封建經濟，也能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存在。猶太人在到處都不能或不願隨工業資本主義路線發展，所以他們的活動結果僅僅是一個分散的、效率較差的消費組織，而無足夠的生產系統。猶太人的地位對於正常的資本主義發展是一種阻礙，因爲他們外表看來好像只有他們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期待，事實上却無能完成。由於他們的出現，使人感到猶太人的利益和那些可能正常地從中產生中產階級的人口部分相衝突。另一方面，政府試圖在不消滅貴族和大地主的前提下，半心半意地扶持一個中產階級。他們唯一認眞的嘗試就是從經濟上清除猶太人，這部分地是由於大眾輿論的要求，部分地是因爲猶太人仍是封建舊秩序的一部分。幾乎世紀以來，猶太人處於貴族和農民之間，而現今他們在生產方面不履行任何功能就構成了中產階級，實際上卻成了一種阻礙工業化和資本主義化的因素。㉓然而，這些東歐的情況雖然構成了猶太人問題的本質，在本書的脈絡上並不重要。他們的政治意義只限於在落後國家內，其對猶太人的仇恨卻無所不在，致使他們的政治意義就作爲達到具體目的的武器而言幾乎無用。

1807 年普魯士敗於拿破侖之手，這就立即煽動起了最初的反猶主義，「改革派」改變了政治結構，使貴族喪失了特權，中產階級贏得了發展的自由。這場改革是「自上而下的革命」，將普魯士在啓蒙時代以後專制政治的半封建結構改變成多少是現代的民族國家，它的最後階段就是 1871 年的德意志帝國。

儘管當時柏林的大多數銀行家是猶太人，但是普魯士的改革並不需要他們給予任何可觀的經濟支助。普魯士改革家們對猶太人公開表示同情，鼓吹解放猶太人，這是使一切公民獲得新平等、取消特權、提倡自由貿易的結果。他們並無興趣出於特定目的而將猶太人作爲猶太民族保存下來。關

於在平等條件下「猶太人可能不再存在」的爭論，他們的回答總是：「任其自然。政府只問他們是否成爲好公民，他們是否存在與政府有何相干?」㉔再者，解放猶太人一事相對地並不觸犯別人，因爲普魯士剛剛失去擁有大量貧窮猶太人口的東部幾個省。1812 年的解放法令只涉及富裕的和對社會有用的猶太羣體，他們早已享有特權，享有大部分民權，在普遍取消特權之後，他們反而在民權地位上遭受嚴重損失。對於這些羣體來說，解放意味著只是一般地從法律上確定現狀罷了。

但是，普魯士改革者對猶太人的同情不止是他們的普遍政治企圖的邏輯結果。大約十年後，反猶主義興起之際，威廉·馮·洪堡德宣稱：「我只是愛全體的猶太人；而在個別情況下我寧可避開他們，」㉕當然他是站在公開反對流行習慣的立場上，當時的社會普遍地喜歡個別猶太人，而從整體上歧視猶太民族。洪堡德是一位眞正的民主人士，他希望解放一個受壓迫的民族，而不是將各種特權賜予個人。這一觀點也符合舊普魯士政府官員們的傳統，在十八世紀，他們一貫堅持改善猶太人的條件和教育，他們的觀點也時有所聞。他們支持猶太人，並非僅僅出於經濟或國家利益的原因，而是很自然地同情一個身處國家領域之內、卻站在社會體之外的唯一社會羣體，儘管它是由各種完全不同的原因造成的，一名文官所受的教育是他應該忠誠於國家，不受政府更迭的影響，並切斷其階級連帶，這是舊普魯士國家的傑出成就之一。這些官員在十八世紀的普魯士是一個有決定作用的羣體，事實上也是改革派的前驅；在整個十九世紀，他們仍是國家的中流砥柱，儘管在維也納會議之後，他們對貴族的影響力已大部分失去。㉕

通過改革派的態度，尤其是通過 1812 年的解放敕令，國家對猶太人的特殊興趣以一種奇怪的方式明顯地表現出來。原先坦率承認猶太人有用(普魯士的腓特烈二世在聽說他們可能集體改變信仰的時候喊叫說:「我希望他們別做這種魔鬼勾當!」) 的態度不見了。㉕解放是根據原則宣布的，而根據當時的時代心理，任何指涉特殊猶太人服務的想法都是褻瀆。導致解放

猶太人的特殊條件雖然是每一個關心此事者都知道的，此刻卻被掩蓋起來，似乎這是一樁巨大而可怕的秘密。另一方面，解放敕令本身從某種意義上被看作是最後的和最輝煌的成就，它將一個封建國家改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使這個社會從此不會再有特權存在。

貴族階級自然作出痛苦的反應，這個階級受到最慘的打擊，於是突然出人意料地爆發了反猶主義。它的意見表達得最清晰的代言人、保守思想最著名的奠基人之一路德維希・馮・德・馬爾威茲(Ludwig von der Marwitz)向政府遞交了一份長篇請願書，他在其中說，現代猶太人會成為唯一享受特殊利益的羣體，並說到「舊日的令人敬畏的普魯士君主政治轉變爲一個新型的猶太國家」。這一政治上的攻詰伴隨著一種社會的抵制力量，幾乎在一夜之間改變了柏林社會的面目。因爲貴族曾經最早和猶太人建立友好的社會關係，並在世紀交替之際使那些猶太女主人的沙龍大大揚名，在短時間內就聚集成混合的小社會。確實，在某種程度上，這樣不帶偏見是猶太貸款人努力作出服務貢獻的結果，他們幾百年來被排除在一切大商業活動之外借錢給那些傾向於改變自身生活狀況的人，從這種經濟上並非生產性的、沒有意義的、但是在社會上卻是重要的貸款行業中找到了自己的唯一機會。無論如何，值得注意是，當君主專制政體及其更多的金融可能性使私人貸款業和小宮廷猶太個人成爲歷史，那種社會關係卻留存了下來。一個貴族自然會因爲不願在緊急情況下失去一種有價值的援助，由此使他想娶一位猶太富人之女爲妻，而不是去仇恨猶太民族。

貴族階級中爆發反猶主義也不是猶太人和貴族之間密切接觸的結果。相反，他們都直覺地反對中產階級的新價值觀，這種態度產生於相同的根源。在猶太人的家庭裡和在貴族家庭裡一樣，個人首先被看作家庭的一個成員；他的責任首先由家族確定，家族高於個人生活和個人重要性。猶太人和貴族都既是無國家(a-national)的，又是歐洲國際的(inter-European)，各自了解另一方的生活方式，在這種生活方式下，忠於民族

是次要的，忠於家族才是第一位的，而家族又往往分散住在歐洲各地。他們都有一種共同觀念，認爲目前與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聯繫都不重要。反猶主義的自由派學者都指出了這一奇特的相同原則，他們得出結論說，或許只有首先擺脫猶太人，才能擺脫貴族，這不是因爲兩者的經濟聯繫，而是因爲兩者都妨礙「內在人格」(innate personality)的眞正發展，即自尊的意識形態，自由派的中產階級正是以此來反對關於出生、家庭、世襲等等舊觀念。

這些有利於猶太人的因素，使貴族階級長期以來的反猶主義政治論爭更具意義。在貴族階級公開地反對平等式民族國家的情形下，經濟紐帶與社會親和性都顯得無足輕重。在社會上，對國家的抨擊會將猶太人與政府等同；中產階級除了事實上在經濟方面和社會方面從改革中獲得較多的眞正收益之外，在政治方面很難責難他們那種舊有的輕蔑冷淡態度。

維也納會議之後，在神聖同盟之下，多年來的和平反應期間，普魯士貴族贏回了它對國家事務的大部分影響力，暫時地變得比它在十八世紀時更顯赫，貴族的反猶主義就立刻變爲沒有政治意義的溫和的歧視。[28]同時，在浪漫主義知識分子的幫助下，保守主義發展到頂點，成爲政治意識形態之一，在德國對猶太人採取了一種頗具特點和獨創性的相應態度。從那時起，具有保守觀點的民族國家在它們需要的和不需要的猶太人之間劃了一條明確的界線。以「國家的根本特徵是基督教」爲藉口，（這與開明君主是多麼不同！）而公開地歧視正在成長的猶太知識階層，卻又不損害銀行家和企業家的事業。這種歧視——不讓猶太人進入高等學校的大門，將猶太人排除在文官隊伍之外——有雙重好處，指明民族國家重視特殊服務甚於一般平等，其次防止或至少延遲產生一個新的猶太人團體，因爲它明顯地於國家無用，甚至可能溶入社會。[29]到了八十年代，當俾斯麥針對斯多克爾(Adolf Stoecker)的反猶主義宣傳而保護猶太人時，他遇到了很大麻煩。他明確地表示他只反對攻擊有錢的猶太人，「有錢的猶太人……他們的利益

繫結於我們國家機構的長治久安」，而他的朋友、普魯士銀行家勃萊赫羅埃德對一般地攻擊猶太人並無意見（也許他根本不關心），只對攻擊富裕的猶太人不滿。㉚

一方面是政府官員們反對猶太人享有平等（尤其是職業上的平等），或抱怨猶太人在輿論界影響太大，另一方面又「眞誠地希望他們在各方面順利」，㉛這種看來曖昧的態度比改革派起初時的熱情更適合國家利益。畢竟，維也納會議將貧窮的猶太民眾居住了幾個世紀的那些省份歸還給了普魯士，除了少數知識分子以外，誰也不會夢想法國革命和人權宣言會考慮給他們與那些富裕同胞相等的地位。富裕的猶太人最不願意宣布平等，因爲他們從中得到的只是損失。㉛他們和每一個人一樣淸楚地懂得，「每一條解放猶太人的法律或政治措施，都必然導致他們在政府中和社會上地位的衰落。」㉛而且他們比任何人都更淸楚，他們的權力在多大程度上依賴於他們在猶太社羣中的地位和名聲。所以他們很難採取別的政策，而是「熱中於使自己有更大的影響力，使猶太同胞們繼續處於民族孤立狀態，假說這種隔絕狀態是他們宗教的一部分。爲什麼？……因爲其他人會更加依賴他們，掌權者就可以無一例外地將他們當作『我們的人』而加以利用。」㉛這樣的結果是，在二十世紀，當解放對猶太民眾第一次成爲事實，享有特權的猶太人就消失了。

於是，利益的恰當和諧建立在有權的猶太人同國家之間。猶太富人想要取得對猶太同胞的控制權，並且和非猶太社會隔離；國家可以將對猶太富人的仁慈政策和從法律上歧視猶太知識階層並進一步實施社會隔離結合起來，在關於國家的基督教本質這一保守理論中即表現如此。

當貴族階級的反猶主義依然沒有政治結果，並在神聖同盟年代迅速消退時，自由派分子和激進知識分子們在維也納會議之後立即發起和領導了一場新運動。自由派反對梅特涅對歐洲大陸的警察統治，劇烈地攻擊普魯士反動政府，迅速引起了反猶主義的爆發，各種反猶主義的小冊子如洪水

氾濫。和貴族馬爾威茲十年前的情形相比，正因爲他們很少坦陳直言，所以他們攻擊猶太人，而不是攻擊政府。他們主要關心平等機會，最憎惡恢復一切貴族特權，因爲貴族特權阻礙他們介入公共事務，所以他們提出區分個別猶太人（即所謂「我們的同黨」）和猶太人羣體，從那時起，這種區分就成了左派反猶主義的標記。雖然他們不完全懂得政府在強制獨立於社會時，爲何以及如何將猶太人作爲一個分離的羣體保持和保護起來，但是他們很明白，其中有某些政治關係，猶太人問題遠不止是一個個別猶太人和人類寬容的問題。他們杜撰了民族主義的新名詞「國中之國」、「民族中之民族」等等，前一個說法明顯地是錯誤的，因爲猶太人沒有自己的政治野心，只是唯一一個無條件地忠於國家的社會羣體。後一個說法只對了一半，因爲猶太人作爲一個社會體而不是政治體，事實上並無在一個民族之中自成獨立的團體。㉟

在普魯士——儘管不是在奧地利和法國——這種激進的反猶主義和早先貴族的反猶主義一樣，幾乎是短命而無結果的。激進分子越來越被經濟上正提升的中產階級所吸收，大約二十年以後，中產階級遍布整個德國，他們在議會裡大喊大叫要解放猶太人，實現政治平等。由此建立起一種理論上（甚至在寫作上）的傳統，其影響可見諸年輕的馬克思一些反猶太的著名論文。馬克思常常被不公正地指責爲反猶主義。卡爾・馬克思這位猶太人可能和那些反猶的激進分子一樣寫作，但這只是證明了這種反猶太的論證和成熟後的反猶主義很少有相同之處。馬克思作爲個別的猶太人，不會爲這些針對「猶太人」的論調感到窘迫，不像尼采對他攻擊德國的論調那樣受窘。的確，馬克思在晚年絕不在書面或口頭表達對猶太問題的意見；但是這很難歸因於任何一種思想上的根本改變。他唯一關心的是階級鬥爭作爲社會內部的一種現象以及資本主義生產的問題，在此中，猶太人的角色關係還不如勞動的買方和賣方，他完全忽略政治問題，這自然妨礙他進一步檢視國家結構以及猶太人的角色。馬克思主義對德國勞工運動的強烈影

響是德國革命運動極少顯示反猶情緒跡象的主要原因之一。㉟在當時的各種社會鬥爭中，猶太人的確無足輕重。

現代反猶主義運動在各地的起始是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三分之一時間裡。在德國，它又一次出人意料地發生在貴族中間，1871 年以後的普魯士君主專制轉變爲完全的民族國家，再次引起貴族和國家站在對立面。德意志帝國的眞正締造者俾斯麥，自從擔任首相以後就一直和猶太人保持密切關係；此時，他被譴責爲依賴猶太人和接受猶太人的賄賂。他嘗試在政府中清除封建殘餘，並且取得了部分成功，但是不可避免地造成和貴族階級的衝突；他們在攻擊俾斯麥時，說他不是無辜的受害者就是接受了勃萊赫羅埃德的好處。事實上他們的關係正相反：勃萊赫羅埃德無疑地受到俾斯麥的高度信任，並從俾斯麥手裡領取豐厚津貼。㊱

封建貴族雖然仍有足夠力量影響公眾輿論，但是它要像在八十年代開始的那樣發起一場眞正的反猶主義運動，本身旣無力量、又無重要地位。他們的代言人，宮廷教士斯多克爾，自己出身於一個中產階級下層家庭，作爲保守利益的代表，和他的前驅者——浪漫主義知識分子——相比才遜一籌，那些人在五十多年前就奠定了保守意識形態的主要原則。再者，他之發現反猶主義宣傳的有用性，並非通過實踐或理論思考，而是出於偶然，他在一位非凡的煽動天才的幫助下，發現塡補空白這一著極其有用。但是他不僅沒能理解自己的突然成功，作爲宮廷教士、作爲皇家和政府的雇員，他幾乎無法恰當地利用它們。他的熱情聽眾們無一例外地是中產階級下層的小店主、小商人、工匠和舊式手藝人。而這些人的反猶情緒——當然不是絕對——還未被和國家的衝突煽動起來。

㈢第一個反猶主義政黨

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裡在德國、奧地利和法國作爲嚴重的政治因素而同時興起的反猶主義，是由一系列金融醜聞和騙局開始的，起始是現成資本過量產生。法國的大多數議員和無數政府官員很快地深陷於欺騙和賄賂的勾當，使第三共和國在成立之後最初幾十年間失去的聲望再也無法恢復。奧地利和德國的貴族都是最容易妥協的人。在這三個國家裡，猶太人只充當中間人，從無一個猶太家族從巴拿馬事件(Panama Affair)和虛設公司騙局(Gründungsschwindel)中獲得永久的財富。

然而，除了貴族、政府官員和猶太人之外的另一羣人卻嚴重地捲入了這些異想天開的投資活動，其可望獲得的利潤變成了無可估量的損失。這一羣人的主要成分是中產階級下層，他們由此突然轉向反猶主義。他們所受的深重傷害甚於其他任何一個羣體：他們用畢生的小小積蓄來冒險，換來永久的破產。他們之易受欺騙有其重要原因。資本主義在國內的擴張會越來越多地清除小的有產者，他們面對的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必須快速地擴張其所擁有的少數，否則就可能失去一切。他們漸漸意識到，如果不能成功地向上爬，成爲資產階級，就會淪爲無產階級。幾十年的總體繁榮相當明顯地遲緩下來(儘管發展趨向並未改變)，致使他們的驚慌心理早已形成。在這段時間裡，中產階級下層的焦慮恰恰印證了馬克思對他們將會迅速解體的預言。

中產階級下層，或謂小資產階級，係手工業和小商業行會的後裔，幾百年來依靠一種禁止競爭的封閉制度的保護才防止冒險生涯，他們最後只指望國家的保護了。他們將自己的不幸歸咎於曼徹斯特制度(Manchester system)，它將他們推向艱難的競爭社會，並剝奪了他們原先從社會當局獲得的一切具體保護和特權。因此，他們最早提出「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的主張，期望在緊急情況下得到庇護，而且使他們保有世代承襲的職業。既然自由貿易時代的顯著特點使猶太人走向各行各業，那麼毫無疑問，即使事實上並無多大進展，人們也會認爲猶太人是「將曼徹斯特制度推向極端應用」的代表了。㊳

從某些偶爾將抨擊資產階級和抨擊猶太人結合起來的保守派作家的文章中，我們首先看到了這種衍生的不滿情緒，當那些期待政府援助或指望奇蹟的人必須接受了銀行家們遲疑的幫助時，這種不滿情緒更是受到了刺激。在小店主們看來，銀行家剝削他們，就像大工廠剝削工人一樣。但是當歐洲工人從自身經驗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導出發，懂得資本家有一種雙重作用，既剝削他們，又給予他們從事生產的機會時，小店主們卻發現無人教導他們懂得自己的社會命運和經濟命運。他的命運要比工人的命運更惡劣，根據他的經驗，銀行家是寄生蟲和掠奪者，但是他不得不和銀行家合夥，即使這個銀行家不同於製造商，與他的商業毫不相干。因此不難理解，與通過長期生產過程而獲得利潤的人相比較而言，一個直接將他的錢用來產生更多的錢的人更容易遭人痛恨。由於當時人只要有辦法——當然不會是小商人——絕不會向銀行家貸款，所以銀行家似乎是並無工作和生產能力的剝削者，是製造痛苦和不幸的人。

這批銀行家中間有許多是猶太人，更重要的是，出於歷史原因，銀行家的形象總是帶有猶太人特色。因此，中產階級下層的左派運動與整個反對銀行資本的宣傳多多少少變成了反猶主義的性質，這一發展趨勢在工業化的德國並無重大意義，但是在法國，以及在程度稍輕些的奧地利，卻關係重大。一時之間，猶太人似乎第一次在並無國家介入的情況下而和另一個階級產生了衝突。在民族國家的範圍內，政府的功能是由超越各個競爭階級的統治地位所界定，這樣的衝突即使很危險，也可能是一條使猶太人地位正常化的道路。

然而，除了這一社會經濟因素之外，很快又加上後來證明是更預兆不

祥的因素。猶太人作爲銀行家的地位並不依靠對在困擾中的小人物的貸款，而主要依靠發放政府貸款。小額貸款業務留給小同行去做，後者藉此準備走向和他們的同胞們一樣富裕、一樣榮耀前途無量的事業。中產階級下層針對猶太人的那種社會不滿情緒轉變爲一種高度爆炸性的政治因素，因爲這些遭人切齒痛恨的猶太人被認爲是中產階級下層人士通向政權道路上的障礙。他們在其他方面和政府的關係不也是衆所週知的嗎？另一方面，社會與經濟仇恨又以即將喪失的暴力衝動強化了政治爭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有一次說過，他那個時代的反猶主義運動是由貴族充當主角的，而伴唱則是小資產階級暴民們的咆哮。不僅在德國是如此，奧地利的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和法國的反德雷富斯派(Anti-Dreyfusards)也是如此。在所有這些情況下，貴族階級在垂死掙扎中企圖聯合教會的保守力量——奧地利和法國的天主教會，德國的新教——其藉口是用基督教的武器來同自由主義作鬥爭。暴民(mob)只是他們用以增強自己地位的手段，使他們的聲音聽上去更宏亮。很明顯，他們既不可能、也不想組織暴民，而且一旦達到目的，便會將之驅散。不過他們發現，反猶主義的口號在發動更多階層的民眾時高度地有效。

宮廷教士斯多克爾的追隨者們在德國並未組織起最初的反猶主義政黨。一俟出現反猶主義的口號，激進的反猶主義分子們立即脫離斯多克爾的柏林運動，去從事全面反對政府的鬥爭，並建立了政黨，它們的代表在德國國會內和最主要的反對黨——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s)——一起在主要的內政問題上投票。[39]他們很快地擺脫了和一些舊的政治力量妥協的最初同盟；第一個反猶的國會議員波凱爾(Otto Boeckel)因黑森農民的支持而當選，他爲了其選民而投票反對「容克貴族(Junkers)和猶太人」，亦即反對擁有過多土地的貴族和貸款給農民的猶太人。

雖然這些早期的反猶主義政黨規模都很小，它們迅即和一切政黨分離。

它們從一開始起就宣稱，它們不是和其他政黨一樣的政黨，而是「在一切政黨之上」(above all parties)的政黨。在有階級和政黨的民族國家裡，只有國家和政府宣稱過超越一切政黨和階級，代表全民族利益。政黨是獲得承認的團體，其議員代表其選民的利益。即使他們爭奪權力，也被明確地理解為這是為了政府能在各種衝突的利益和它們的代表之間建立一種平衡。反猶主義政黨宣布「在一切政黨之上」，清楚地表明它們旨在成為全民族的代表，獲得一切權力，擁有國家機器，以自己來取代國家。另一方面，既然它們仍然組織為政黨，那也就很清楚，作為一個政黨，它們謀求國家政權，以使它們的投票人事實上控制整個民族。

當任何一個團體都不再單獨掌握全部政權時，民族國家的政體就開始形成，因此政府執掌實際政治統治，不再依賴社會和經濟因素。左派革命運動為社會條件的激進變革而戰鬥，從不直接觸及最高政治權威。它們只向資產階級力量及其對國家的影響挑戰，因此總是隨時在外交事務方面順從政府的領導，因為這關係到一個假定是統一民族的利益。但是，反猶主義團體的無數計劃從一開始起主要重點便是外交事務；它們的革命動力直接針對政府，而不是針對一個社會階級，事實上它們以黨派組織為手段，目的在於摧毀民族國家的政治格局。

宣稱一個政黨超越其他一切政黨，其中的重要含義遠甚於反猶主義。如果這只是一個如何擺脫猶太人的問題，那麼弗里希(Theodor Fritsch)的建議就會很快見效。㊵在早期的一個反猶主義大會上，弗里希並非提議創建一個新的黨派，而是主張廣泛宣傳反猶主義，直至最後，使一切現有政黨都敵視猶太人。但是事實上，無人理睬弗里希的建議，因為在當時，反猶主義早已成為一種工具，不僅用來清除猶太人，也用來清除民族國家的政體。

反猶主義政黨的宣言與帝國主義的初期階段相符合，並在大不列顛——英國並不加入反猶潮流——及歐洲大陸反猶情緒高漲的泛歐運動中，

的某些傾向中找到確切對應的內容，這並非偶然。㊶只有在德國，這些新傾向才直接產生於反猶主義本身，而且反猶主義政黨比純粹帝國主義團體——例如泛德聯盟(Alldeutscher Verband; Pan-German League)等等——的形成更早並且維續較久，而後者也都聲稱自身是超越一般政黨團體的。

事實上，同樣在組成政黨時並不積極反猶——它們避開反猶政黨的虛妄的部分，所以一開始時似乎擁有最終獲勝的最好機會——的政黨，到末了不是銷聲匿跡，便是被反猶運動擊敗，這種情形對於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是一個很好的提示。反猶分子們相信，他們謀求取得的全面統治，只不過是猶太人事實上已經達到的，這給他們的國內計劃帶來好處，這樣的條件使人爲了贏得政治權力而必須進入社會鬥爭的舞台。他們可以假裝和猶太人作鬥爭，就像工人和資產階級鬥爭一樣。這樣做的好處是，猶太人被認爲是政府背後的秘密力量，用攻擊猶太人的方式，他們可以公開攻擊國家本身，而帝國主義社團組織只是以溫和的方式反對猶太人，卻難於和當時的重要社會鬥爭發生聯繫。

新的反猶主義政黨的第二個最重要的特點是，它們立即著手建立歐洲所有反猶團體的超民族(supernational)組織，向流行的民族主義主張公開表示反對和蔑視。它們以倡導超民族組織的方式，清楚地表明它們的目標不僅在於對本民族的政治統治，而且早已計劃好下一步建立「高於一切民族」(above all nations)的全歐政府。㊶這第二種變革性的因素意味著從根本上改變現狀；這一點常常被人忽略，因爲反猶分子們部分地出於傳統習慣，部分地出於他們有意撒謊，在宣傳時總是使用反動政黨的術語。

猶太人生存的奇特條件和這種組織的意識形態之間的密切關係，在超越民族之上的團體組織中比在創建一個政黨之上的政黨中更引人注目。在國家化的歐洲裡，猶太人很明顯地是唯一的歐洲國際性成分。所以唯一合乎邏輯的是，他們的敵人必須根據同樣的原則組織起來，才能和一切民族

政治命運的秘密操縱者鬥爭。

當這種論點作爲一種宣傳肯定可以令人信服時，超民族反猶主義的成功取決於範圍更廣的考慮。在十九世紀末，尤其是普法戰爭以後，越來越多的人感到歐洲的民族組織已經陳舊不堪，因爲它再也不足以應對新的經濟挑戰。這種感覺使國際社會主義組織獲得強有力的理論支撐，並且反過來因後者而強化。在羣眾的信念中，廣泛認爲全歐洲都有相同的利益。㊸而國際社會主義組織依然很消極，對一切外交政策問題不感興趣（也許正是在這些問題上，他們的國際主義將受到檢驗），反猶分子們從外交政策問題開始，甚至還許諾以國際問題爲基礎來解決國內問題。如果較少地看重意識形態的表面價值，較多地觀察各個政黨的實際計劃，就能發現社會主義者們比較關心國內問題，比反猶分子們更能適應民族國家的需要。

當然，這並非說社會主義者的國際主義信念不眞誠。相反，他們的信念更強烈，而且更早於發現衝破民族國家疆域的階級利益。但是，對階級鬥爭絕對重要性的覺察導致他們忽視一種傳統，即法國革命給工人政黨的遺產，僅憑這種遺產便可能使他們獲得一種清楚明白的政治理論。社會主義者含蓄地保留了「民族中的民族」的原始概念，一切民族都屬於人類大家族，但是他們從未發現一種方法，用以將這種觀念轉變成在一個由主權國家組成的世界裡有用的概念。結果，他們的國際主義仍然只是一種每一個人共有的個人信念，而他們正常地不關心國家主權卻轉變爲一種十分不正常、不現實的對外交政策的漠然。既然左派政黨在原則上不反對民族國家，而只反對國家主權；再者，既然它們自己無法言喩的希望是建立聯邦結構，最終根據平等條件統合一切民族，並多少以一切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自由和獨立爲條件，那麼它們就能夠在民族國家的框架內運作，甚至在民族國家的社會和政治結構衰落時，作爲全體民眾中唯一一個不陷於擴張主義幻想、不打算摧毁其他民族的團體而出現。

反猶分子的超民族主義(supranationalism)從完全相反的觀點出發

走向國際組織問題。他們的目標是達到一種統制一切的超結構，以摧毀一切土生土長的民族結構之類。即使當他們準備摧毀自己民族的政體時，也會沉溺於極度民族主義的言論(hypernationalistic talk)，因爲部落民族主義(tribal nationalism)赤裸裸地渴望征服，是強行衝破民族國家及其主權的狹隘謹愼界限的主要力量之一。㊹沙文主義宣傳愈有效，就愈容易說服輿論關於超民族結構的必要性，超民族結構要用普遍權力壟斷和暴力工具，由上而下、不分民族界線地實行統治。

猶太民族歐洲國際間的特別條件無疑可以爲社會主義的聯盟(socialist federalism)主張服務，也至少可以爲超民族主義者的有害陰謀服務。但是社會主義者如此關注階級鬥爭，如此忽視自己的傳統觀念的政治結果，因此，只有當他們面對在國內政治舞台上膨脹的反猶主義這個嚴重的競爭者時，他們才意識到猶太人的存在是一種政治因素。這時，他們不僅還未準備將猶太人問題歸入自己的理論，而且事實上根本害怕觸及這個問題。就像在其他國際問題上一樣，他們將這塊陣地讓給了超民族主義者，使他們在當時似乎成了唯一能解答各種世界性問題的人。

在世紀交替之際，七十年代的騙局依然在生效，而一個繁榮和普遍福利的時代使八十年代那些早熟的激動終歸匿跡，德國的情形尤其如此。誰也無法預見，這個結局只是暫時的，而一切未解決的政治問題與一切無法平息的政治仇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都只會引起暴力倍增。德國的反猶主義政黨在取得最初的成功之後，又變得微不足道；它們的領袖在激起公眾輿論的短暫騷動之後，便從歷史的後門消失了，消失在妄想的混亂和救世騙局的黑暗之中。

㈣左派反猶主義

在我們經歷的時代裡，若無反猶主義的可怕後果，我們可能還不會注

意到它在德國的發展。十九世紀的反猶主義作爲一場政治運動，可將法國當作最佳研究對象，在將近十年時間裡，反猶主義控制了法國的政治舞台。在奧地利，反猶主義作爲一種意識形態力量，在和其他比較受人尊重的意識形態競爭孰能爲輿論接受時，達到了最清晰的形式。

在奧地利，猶太人對國家的巨大貢獻，別處無可比擬。奧地利的各民族僅由哈布斯堡家族的雙重君主國(Dual Monarchy)才維繫一起，那裡的猶太族國家銀行家和歐洲其他國家的同類相比，在君主專制垮台後卻能留存下來。正如它在十八世紀初的早期發展一樣，塞繆爾·奧本海默(Samuel Oppenheimer)的信貸和哈布斯堡家族的信貸一樣，因此「奧地利信貸最終成了一家信貸機構——羅斯希爾德銀行——的信貸」。[45]雖然這個多瑙河邊的君主專制國家並無同源人民——進化到民族國家最重要的先決條件——但是它也無法避免使受啓蒙的專制國家轉變爲立憲君主國家和產生近代文官制度。這意味著它必須採用某種民族國家的體制。原因之一是近代階級體系是沿著民族路線成長的，所以某些民族開始等同於某些階級，至少等同於某些職業。日耳曼人變成統治民族，就好比資產階級在民族國家裡變成統治階級。匈牙利土地貴族所產生的作用比其他國家的貴族所產生的作用更深刻，但是本質上是類似的。國家機器本身極力和社會之間保持同樣的絕對距離，超越一切民族之上實施統治，就像民族國家統治各個階級一樣。猶太人的結果是，猶太民族不能和其他民族融合，它自己不能成爲一個民族，正如它在民族國家內未能和其他階級融合，或者自己變成一個階級。就像猶太人因爲和國家的關係特殊，他們在民族國家內與社會中一切階級不同，他們在奧地利由於和哈布斯堡專制君主的特殊關係，而與其他一切民族不同。而且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樣，每一個開始和國家發生公開衝突的階級都轉向反猶主義，在奧地利，每一個從事全面擴展的民族鬥爭，而且也和專制統治發生公開衝突的民族，都以攻擊猶太人作爲戰鬥的開始。但是，在奧地利發生的這些衝突與在德國和法國發生的衝突之間有

明顯的區別。在奧地利，衝突不僅更尖銳，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每一個民族，亦即社會的每一個階層，都反對國家，所以比西歐和中歐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更能使民眾積極參與反猶主義活動。

這些衝突中比較突出的是日耳曼民族的國家敵意不斷上升，在帝國建立之後，上升趨勢加速，並在 1873 年的金融崩潰後發現反猶主義口號的有用性。當時的實際社會情勢在德國是一樣的，但是爲了爭取中產階級選票的社會宣傳立即致力於更激烈地抨擊國家，而且公開聲稱不忠於國家。肖納勒(Georg von Schönerer)領導下的德國自由黨(German Liberal Party)起初是下層中產階級政黨，同貴族毫無關聯，也不受貴族約束，持左翼觀點。它從未獲得眞正的羣眾基礎，但是在八十年代，它在各所大學裡取得顯著成功，以公開的反猶主義爲基礎組織了嚴密的學生團體。肖納勒的反猶主義起初幾乎全力對準羅斯希爾德家族，這使他獲得了勞工運動的同情，將他看作是眞正激進的誤入歧途者。[45]他的有利之處主要是可以根據看得見的事實來作反猶宣傳：作爲奧地利國會議員，他曾爲奧地利鐵路國有化而奮鬥，因爲奧地利的大部分鐵路掌握在羅斯希爾德家族手中，並獲得從 1836 年至 1886 年的政府許可狀。肖納勒成功地徵集了四萬人簽名，反對這份許可狀日期繼續延長，由此引起了大眾對猶太人問題的興趣。當政府在明顯地不利於國家和民眾的條件下試圖延長這份許可狀時，羅斯希爾德家族同專制君主的經濟利益之間的密切關係就變得非常明顯了。肖納勒在這件事情上的鼓動變成了奧地利反猶運動的明確開端。[46]這場運動與德國的斯多克爾的反猶鼓動相比，是由一個無疑很眞誠的人發起和領導的，因此一直用反猶主義作爲宣傳武器，但是發展迅速，成爲一種泛德意識形態，比德國的其他反猶主義更深刻地影響了納粹主義。

肖納勒發起的運動雖然長期獲勝，但是有一段時間敗於另一個反猶政黨，即呂格爾(Karl Lueger)領導的基督社會黨(Christian-Socials)。當肖納勒抨擊天主教及其對奧地利政治的巨大影響，其程度就像他抨擊猶太人

一樣時，基督社會黨是一個天主教黨派，它從成立之初起就嘗試和一些反動保守勢力結盟；這在德國和法國已證明是有用的。由於他們作出了較多的社會讓步，所以比在德國和法國更成功。他們和社會民主黨在專制君主垮台後仍然生存下來，並且在戰後的奧地利成了一個最有影響力的團體。但是，早在奧地利共和國建立以前，在九十年代，當呂格爾靠反猶運動當上維也納市長時，基督社會黨早就採取了典型的曖昧態度來反對民族國家中的猶太人——敵視猶太知識分子，惡劣對待猶太商業階級。經過與社會主義工人運動爭奪權力的艱難血腥鬥爭之後，當奧地利回歸日耳曼民族，建立民族國家時，他們接管了國家機器，這完全不是偶然的。他們變成唯一能產生這種作用的政黨，即使在舊的專制制度下，也能靠他們的民族主義來贏得人心。既然哈布斯堡家族是一個日耳曼家族，並能使他們的日耳曼臣民得到某種優勢，所以基督社會黨從來不抨擊君主專制。他們的作用是爭取日耳曼民族的大多數去支持一個實際上不得人心的政府。他們的反猶主義仍然沒有什麼結果；呂格爾統治維也納的幾十年是猶太人實際上的黃金時代。爲了贏得選票，不管他們的宣傳偶爾會多過分，他們從來就不能與肖納勒及那些泛日耳曼主義者一齊宣稱，「將反猶主義看作我們民族思想的主流，看作眞正流行信念的最本質的表現，因而也看作本世紀最主要的民族成就。」㊽儘管他們像法國的反猶運動一樣，大多受到宗教界的影響，但是他們在抨擊猶太人時必然更多限制，因爲他們並未抨擊專制君主，不像法國反猶分子抨擊第三共和國那樣。

這兩個奧地利反猶政黨的成功與失敗表明社會衝突和時代的長遠問題並無太多的聯繫。和動員一切反政府力量相比，獲得下層中產階級的選票只不過是一種暫時現象。的確，肖納勒運動的骨幹分子都在那些說德語的省份，那裡根本沒有猶太人，從不存在和猶太人競爭或仇視猶太銀行家的事。泛日耳曼主義運動及其劇烈反猶活動在各個城市中心消退後，仍然能在這些省份存在，僅僅出於一個事實，即這些省份從未達到過戰前時代使

都市民眾能和政府妥協的普遍繁榮程度。

完全缺乏對他們自己的國家及其政府的忠誠（泛日耳曼主義者代之以對俾斯麥的帝國的公開忠誠），以及因此產生的觀念——民族性(nationhood)即獨立於國家與領土——導致肖納勒的團體產生貨眞價實的帝國主義思想，其中的發展線索是從暫時微弱到最終強大。這也就是爲什麼泛日耳曼政黨在德意志（「泛德聯盟」）從不越過普通沙文主義的界線，仍然十分狐疑、不願伸手援助奧地利的日耳曼主義者兄弟們的原因。奧地利的這場運動的目標不僅在於作爲一個政黨崛起掌權，也不僅在於擁有國家機器。它想在中歐徹底重新組織秩序，使奧地利的日耳曼人同德國的日耳曼人聯合，並得到後者力量的增援，變爲一個統治民族，使這個地區的其他民族都處於一種同樣的半奴役狀態，就像奧地利的各個斯拉夫民族一樣。由於這一點同帝國主義密切相近，以及它使民族性的概念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因此我們暫緩討論奧地利的泛日耳曼主義運動。至少在它的結果方面，它不再是十九世紀的一場純粹預備性的運動，它超過了其他各種口號的反猶主義，完全屬於二十世紀的事件進程。

法國反猶主義的情形恰恰相反。德雷富斯事件使十九世紀反猶主義的其他一切因素在純粹意識形態和政治方面都公開化了；它是從民族國家特殊條件下產生的反猶主義的集中表現。然而，它的暴力形式預示了未來的發展態勢，因此這一事件的主要當事人們好比是在舉行一場大型舞台彩排，準備在三十多年後演出。它匯集了一切公開的、潛藏的政治或社會原因，將猶太人問題帶到十九世紀的主要地位；另一方面，問題過早地成熟爆發，致使猶太人問題處在典型的十九世紀意識形態框架之內，儘管它歷經各屆法國政府和各種政治危機而存在，但是不能十分適應於二十世紀的政治條件。在 1940 年戰敗之後，法國反猶主義在維希政府的統治下獲得了最好的機會，然而德國的納粹作家們從來不忘記指出，它的性質明確無疑是過時的，

而且對於一些主要目的來說根本無用。[49]它對納粹主義的形成毫無影響，而在那場最終的大災難中，也僅僅自成意義，並非一種積極的歷史因素。

這些整體侷限性的主要原因是，法國的反猶政黨雖然在國內甚爲暴烈，但是不具備超民族主義的期望。它們畢竟從屬於歐洲最老的、最充分發展的民族國家。法國反猶分子中間無人試圖認眞組織「政黨之上的政黨」，或作爲一個政黨攫取國家政權而目的只在於政黨利益。少數人曾試圖發動政變，這須依靠反猶分子和軍隊高級將領聯手，但却是難以做到的，而且圖謀明顯。[50] 1898 年，有十九人通過反猶運動被選爲國會議員，這已是他們的事業高峰，不僅此後再未達到過，而且還從此迅速地走向下坡路。

另一方面，作爲其他一切政治議題的催化劑，這的確是反猶主義的最初成功例子。這可歸因於第三共和國缺乏權威，遂使這批人稍微得到多數便能進入國會。在羣衆的眼裡，國家隨同專制君主的消失而失去了名望，抨擊國家不再是一種褻瀆行爲。法國較早突發的暴力，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地利和德國兩個共和國興奮鼓動的狀況有極類似的面貌。納粹專政常常被所謂「國家崇拜」(state-worship)牽扯在一起，甚至連歷史學家們也盲目地信以爲眞，事實上納粹是趁了國家崇拜完全崩潰之機，這種崇拜原出於崇拜靠上帝恩典穩坐王位的君主，而這在一個共和國裡是很少發生的事。在法國，早在中歐諸國受這種普遍權威失落影響之前五十年，對國家的崇拜早已遭受到許多次貶損。在法國同時攻擊猶太人和政府，要比在中歐諸國爲了攻擊政府而先攻擊猶太人要容易得多。

再者，法國反猶主義比歐洲各國反猶主義歷史更長，因爲法國之解放猶太人早在十八世紀末業已實施。爲法國革命做準備的啓蒙時代的代表人物理所當然地排斥猶太人；他們認爲猶太人是中世紀的封建餘孽，貴族階級的金融代理人，因而仇視他們。法國猶太人的朋友只有一批保守派作家，他們譴責反猶態度是「十八世紀鍾愛的論題之一」。[50]自由派和激進派的作家幾乎形成了一種傳統，告誡應將猶太人看作仍然生活在家長制形式的政

府中，不承認其他國家的野蠻人。❺在法國革命期間和革命之後，法國宗教界和法國貴族也加入了反猶陣營，儘管只是出於別的物質方面的理由。他們指責說，革命政府命令教會出賣財產，以支付「政府欠猶太人和商人們的債款」。❺這些陳舊的論調在法國教會和國家之間從不休止的鬥爭而繼續生效，支持了普遍的暴力和痛苦，而在十九世紀末由其他各種更現代的力量觸發。

主要由於宗教界強烈支持反猶主義，法國社會主義運動在德雷富斯事件上最後決定採取反對反猶主義宣傳的立場。然而直到此時，十九世紀法國的左派運動還一直公開表示厭惡猶太人。他們只是追隨十八世紀啓蒙運動的傳統，那是法國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的來源，並且認爲反猶態度是反教權(anticlericalism)的組成部分。左派的這些情緒起初由於一個事實而得到強化，即阿爾薩斯省的猶太人繼續以借錢給農民爲生，這種作法早已促成拿破侖制訂 1808 年法令。等到阿爾薩斯省的情況發生變化以後，左派反猶主義在羅斯希爾德家族的金融政策中找到了新的力量來源，這一金融政策在波旁王朝的財源中占了大部分，同路易·菲利浦國王保持密切關係，在拿破侖三世治下又臻繁榮。

反猶主義態度的這些明顯的、相當表面的刺激背後，存在著一種深刻的原因，它對於法國特殊的激進主義的整個結構是很關鍵的，而且幾乎成功地使整個法國左派運動轉向反對猶太人。在法國的經濟中，銀行家比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裡強大得多，法國的工業發展在拿破侖三世統治期間一段短暫的上升期之後，遠遠落後於其他民族，以致於前資本主義階段的社會主義傾向繼續產生著相當大的影響。德國和奧地利的下層中產階級只是到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才變成反猶的階級，當時他們早已絕望，致使他們會被反動政治以及新的暴民政策利用。法國的下層中產階級早在五十年前就反猶，他們在工人階級協助下，發動 1848 年革命，取得了短暫的勝利。在四十年代，當圖森納爾(Alphonse Toussenel)發表了《猶太人，時代之

王》(*Les Juifs, Rois de l'Epoque*)這本在眾多反對羅斯希爾德家族的小冊子中最重要的一本，受到整個左翼出版界——當時革命的下層中產階級的喉舌——的熱誠歡迎。圖森納爾所表達的他們的情緒，雖然不很明確，也不很成熟，但是和青年馬克思的情緒並無多大區別，而圖森納爾對羅斯希爾德家族的抨擊和十五年前波爾納(Ludwig Boerne)的《巴黎書簡》(*Briefe aus Paris: 1830—1833*)相比，論點差不多，只是少了一點天才，多了一點精心斟酌。❺❹這些猶太人也都錯把猶太銀行家當成資本主義制度的中心人物，這個錯誤在至今的法國仍然對市級以及市級以下政府官僚們產生著某種影響。❺❹

但是，這種由猶太銀行家和絕望的客戶之間經濟衝突醞釀出來的普遍反猶情緒的爆發，作為一種重要的政治因素，和出於經濟的或社會的原因而發生的類似爆發相比，持續的時間並不長。拿破侖三世統治法蘭西帝國的二十年是法國猶太人的繁榮安全年代，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二十年的德國和奧地利一樣。

法國唯一的一種反猶主義帶有一種普遍的仇外情緒，事實上依然很強，而且比一般反猶主義，也比反宗教的知識分子嘲諷態度持續時間更長。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外國猶太人變成了一切外國人的範型。在所有的西歐和中歐國家裡，都對當地猶太人和從東方「侵入」當地的猶太人作了區分。德國和奧地利對待波蘭和俄國猶太人的方式，與法國對待羅馬尼亞和德國猶太人的方式完全一樣，正如德國的波森(Posen)猶太人、奧地利的蓋利西亞(Galicia)猶太人和法國的阿爾薩斯猶太人受到同樣勢利的嘲笑一樣。但是只有在法國，這種區別才在國內顯得十分重要。這也許歸因於一個事實，即羅斯希爾德家族從德國移民到法國，比起在其他國家來，更容易成為反猶主義攻擊的大目標，所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猶太人很自然地被懷疑為同情民族的敵人。

民族主義的反猶主義和各種現代反猶派別相比顯得無害，在法國絕不

會控制反動分子和沙文主義者的獨占力量。在這一點上，作家讓・紀羗鐸(Jean Giraudoux)(達拉第〔Edouard Daladier〕戰時內閣宣傳部長)完全同意[55]貝當和維希政府的立場，無論如何竭力取悅德國人，也無法打破這種定型的嫌惡猶太人的侷限。失敗的結局十分明顯，因爲法國產生了一位傑出的反猶分子，他懂得那種新的反猶武器的全部內容及其可能性。根據法國的國情特點，此人本應成爲著名小說家，在法國一般的反猶主義從來不曾落入和歐洲其他國家一樣的社會名聲和知識界名聲一片狼藉的地步。

路易・斐迪南・塞利納(Louis Ferdinand Céline)有一篇簡單的論文，獨到，而且包含比較理性的法國反猶主義所缺乏的意識形態想像，他宣稱說，猶太人阻礙了歐洲進化爲一個政治實體，引起了自公元 843 年以來的一切歐洲戰爭，還用挑起相互敵視的方法陰謀敗壞法國和德國。塞利納對歷史作出如此奇異的解釋，在慕尼黑條約期間寫了《死亡教育》(*Ecole des Cadavres*)，並在戰爭的最初幾個月內出版。先前同一主題的一本小冊子《大屠殺，小伎倆》(*Bagatelle pour un Massacre*)(1938)雖然對歐洲歷史並無新解釋，但方法已屬十分現代的；它避免限制性區分當地猶太人和外國猶太人、好人和壞人，也不會耗在提出各種法律角度的意見(這是法國反猶主義的具體特點)，而是開門見山地要求屠殺所有的猶太人。

法國主要的學者都十分贊賞塞利納的第一本書，他們一半爲它攻擊猶太人而高興，一半相信它只是一本令人感興趣的文學想像之作。[56]法國本土的法西斯主義者出於完全同樣的原因，並不認眞將塞利納這本書當作一回事，儘管事實上納粹分子們一向知道他是法國唯一眞正的反猶分子。法國政治家天生的良好感覺和他們根深蒂固的尊嚴感阻止他們接受騙局和空想。結果，即使德國人心裡明白，也不得不繼續使用道利奧特(Jacques Doriot)這樣不夠格的支持者(此人追隨墨索里尼和貝當，是一個老牌法國沙文主義者，不懂現代問題)，徒然試圖說服法國人相信，滅絕猶太人將能

救治太陽底下的一切事情。在法國官方、甚至非官方都準備和納粹德國合作時，這一情勢發展的方式清楚地表明，十九世紀反猶主義對於二十世紀的各種政治目的來說是多麼無效，即使在某個國家裡它發展到最充分的地步、在大眾輿論方面一直未消退，即使像愛多亞德・德魯芒(Edouard Drumont)這樣能幹的十九世紀新聞記者，甚至像喬治・伯爾那諾(Georges Bernanos)這樣偉大的當代作家，他們投注於一種大多由空想和欺騙構築的事業，也毫無關係。

出於各種原因，法國從未發展出一個完全的帝國主義政黨，這成了一種決定因素。正如許多法國殖民政治家所以指出的，[58]只有法德聯盟才能使法國在瓜分世界時同英國競爭，並且成功地參與爭奪非洲。然而法國無論如何從未受誘惑加入這種競爭，只有喧鬧地嫌惡和敵視大不列顛。法國曾經是、並且仍是——儘管重要性下降了——大陸上的優秀民族(nation par excellence)，甚至連它那些虛弱的帝國主義企圖通常也由於新的民族獨立運動的誕生而告結束。再者，既然其反猶主義主要產生於法國與德國之間純粹民族性的衝突，猶太人議題就幾乎自動地不在帝國主義政策中發揮較大的作用，只有阿爾及利亞的情況例外，它的居民中當地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混雜，這就會提供一個絕佳的機會。[58]德國的入侵簡單粗暴地摧毀了法國的民族國家，在德國占領和法國戰敗的基礎上可笑地建立的德法聯盟，也許可以證明這個優秀民族從輝煌的歷史帶到我們當今時代的自身力量何其渺小；這並沒有改變它根本的政治結構。

(五)安全的黃金時代

從反猶主義運動衰落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其間只有二十年時間。這段時間足以被稱爲「安全的黃金時代」(the golden age of security)，[58]因爲只有在其中生活過的少數人才能感覺到一種明顯過時的政治結構的內

在弱點，儘管各種預言都說它壽終正寢就在眼前，它卻以虛假的光輝繼續產生作用，而且頑冥不化。俄國不合時宜的君主暴政，同樣還有奧地利腐敗的官僚體制、德國愚蠢的軍國主義、法國危機不斷中不怎麼認眞的共和國，明顯地以同樣的穩固性並存——它們仍然都處於不列顛帝國全球霸權的陰影之下——都設法維持現有的政治結構。這幾個政府之中沒有一個能得人心，全都面對著國內日益增長的反對力量；然而也沒有一個國家似乎存在一種認眞的政治意志去徹底改變政治環境。歐洲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階層都太忙於經濟擴張，誰也不認眞對待政治問題。因為無人關心，所以一切都能維持。或者用契斯特頓(Gilbert Keith Chesterton)一針見血的話來說，「一切事物都靠否定它的存在而繼續存在。」[61]

工業與經濟能力的巨幅增長造成純粹政治因素逐步弱化，同時在國際權力遊戲中，各種經濟力量占了主導地位。人們總認為權力等同於經濟能力，之後又發現經濟與工業能力只是現代權力的先決條件。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力量能左右政府，因為政府和普通商人一樣相信經濟，商人們使政府相信，國家的暴力手段必須無一例外地用於保護商業利益和國家財富。在一段很短的時間裡，沃爾特・拉德諾所說的關於「三百個互相認識的人將全世界命運掌握在他們手裡」確有幾分眞理。這種奇特的情勢一直持續到 1914 年，但是由於戰爭的事實，使大眾對經濟擴張之神佑性質失去了信心。

與歐洲其他各民族相比，猶太人更易受「安全的黃金時代」表象的欺騙。反猶主義似乎成了以往的歷史；政府愈是失去權力和威望，就愈是不注意猶太人。每當國家扮演了更狹隘、更空虛的代表角色時，政治表現就成了一種素質參差的戲劇表演，直到最後，奧地利的劇院卻變成了民族生活的中心，它的社會意義無疑超過了國會。政治世界的戲劇性質如此明顯，致使劇場能以現實世界的面目出現。

大商業對國家的影響越來越多，國家對猶太人之服務的需求越來越低，

這威脅到猶太銀行家的生存，迫使猶太人的職業發生了某些轉變。猶太銀行家族衰落的最初跡象是他們在猶太社羣中喪失名望和權力。他們不再能有力地集中並在某種程度上控制猶太人的總體財富。越來越多的猶太人離開了國家金融業，轉向獨立商業。從向軍隊和政府運送糧食和服裝中產生了猶太人食品和穀物貿易業，不久之後，他們在各國的服裝行業中迅速取得了顯著地位；鄉間小鎮的典當業和雜貨業發展成城市中的百貨業。這並非意味著猶太人和政府的關係中止了，而是個人的介入減少了，因此這一時期結束時，我們所看到的情景幾乎與開始時一樣：處於重要金融界地位的少數猶太人和猶太中產階級廣大階層很少有、或幾乎沒有聯繫。

比獨立的猶太商業階級的擴展更重要的是在職業結構方面的另一種變動。中歐與西歐猶太人在經濟財富方面達到了飽和點。這也許是顯示他們事實上是「為錢而要錢」或「為權而要錢」的時候了。為了前一個目的，他們會擴展商業，傳給後輩；為了後一個目的，他們會更堅決地投身於國家商業，以大商業和大工業的影響力來和政府抗爭。但是這兩方面的事情他們都沒有做。相反，富商的子孫，或者說銀行家的子孫，都背棄了父輩的職業，尋求自由職業或前幾代人未能進入的純粹知識事業。民族國家曾經十分害怕的事，即猶太知識分子的誕生，此時以一種驚人的速度出現。猶太富人的兒子們湧入文化職業，這一現象在德國和奧地利十分明顯，大部分文化機構——報紙、出版業、音樂、戲劇——變成了猶太人的事業。

猶太人傳統對知識職業的偏愛和推崇，其結果造成和傳統的決裂及西歐和中歐猶太人的知識同化和民族化。從政治角度來看，這表明猶太人從國家保護下解放了出來，增長了與周圍居民共同命運的意識，在相當程度上鬆懈了使猶太人成為歐洲國際間成分的紐帶。從社會角度來看，猶太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羣體，是第一批需要被非猶太社會接納的人。他們的父輩不關心與異教社會的交往，視社會歧視為小事一樁，但對於兒輩知識分子們來說，卻是天大的問題。

這個羣體爲了尋找進入社會的途徑，被迫接受以前一些個別猶太人的社會行爲模式，這些猶太人在十九世紀曾被社會承認是歧視統治中的例外。但是他們很快發現了一種能打開一切大門的力量，「輝煌的名聲力量」(radiant Power of Fame)（斯蒂方·茨威格〔Stefan Zweig〕語），百年來對天才的崇拜使之變得不可抗拒。猶太人追求名聲和當時的一般崇拜名望之間的區別，是猶太人對名聲感興趣並非爲了自己。生活在名譽的氛圍中要比成名更重要；因此他們成了出名事物的評論者、批評者、收藏者和組織者。這種「輝煌的力量」是一種社會性很強的力量，沒有社會地位的人藉此可有一個地位。換言之，猶太知識分子努力地（並在某種範圍內成功地）變成一種有力的紐帶，使著名的個人同名流社會聯結起來，達到一種國際社會性質的、超越民族界域的精神成就。政治因素的整體弱化，二十年內引起的一種新情勢，現實與表象、政治現實與戲劇表演很容易互相模仿，使他們變爲一個朦朧的國際社會的代表，而民族偏見在這個國際社會裡看來不再有效。很吊詭的，這個國際社會似乎是唯一的既承認民族化、又承認它的猶太成員同化的社會；一個奧地利猶太人在法國比在奧地利更容易作爲一名奧地利人而被接納。這一代人的虛假世界公民身份，一旦提及他們的猶太血統，他們便宣布自己的虛構國籍，已類似那種護照，是允許持有者有權僑居任何一個國家，除了頒發這本護照的國家之外。

從其本質來說，只有當猶太人能夠證明他們在表象世界裡的活動能使他們感到滿意和快樂，他們作爲一個羣體事實上需要的既不是金錢、也不是權力時，這些情況才能使猶太人獲得名聲。當嚴肅的政治家和宣傳家對猶太人問題感到自從解放他們以來最不會引起麻煩時，當反猶主義幾乎完全從公開的政治舞台上消失時，猶太人變成了社會的象徵，也變成了一切不被社會接納的人的仇恨目標。反猶主義一旦失去了它在十九世紀曾經影響其發展的特殊條件，出現由謊言和欺騙來隨心所欲地編織眞假參半和荒唐迷信的奇怪混合，出現在 1914 年以後的歐洲，是充滿一切挫折和憎惡成

份的意識形態。

既然猶太人問題從它的社會角度轉變爲一種社會動盪的觸媒，直到最後，一個分崩離析的社會圍繞著可能屠殺猶太人的問題，才在意識形態上重新結聚，所以我們有必要勾勒十九世紀資產階級社會解放猶太人這一段社會歷史的某些主要蹤跡。

註釋

❶照現代歷史學家們看來，十七至十八世紀時允准給宮廷猶太人的權利和自由可能只是平等的前奏：宮廷猶太人可以隨意擇地而居，他們可以在受轄制的國土上自由旅行，他們獲准攜帶武器，有權要求地方權力機構的具體保護。事實上這些宮廷猶太人——很典型地在普魯士被稱爲「全權猶太人」(Generalprivilegierte Juden)——不僅比其餘幾乎仍然生活在中世紀約束下的猶太人生活條件更好，而且比他們的非猶太人鄰居們好得多。他們的生活水準大大高於同時代的中產階級，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特權也多於其他商人。這些情況都引起了同時代人的注意。十八世紀普魯士人、猶太民族解放的傑出鼓吹者克利斯蒂安・威廉・道姆(Christian Wilhelm Dohm)迫於腓特烈・威廉一世時代以來的社會壓力，對上述情形也頗有微詞，認爲特權允准的猶太富人享有「各種好處和支持」，常常「犧牲並忽略了勤勞的合法（即非猶太人的）公民的利益」。（見《當代紀事》〔*Denkwüdigkeiten meiner Zeit*〕，萊姆哥，1814—1819，第4卷，487頁。）

❷雅考伯・萊斯金斯基(Jacob Lestschinsky)在早年的猶太人問題研究中指出，猶太人不屬於任何一個社會階級，並談到一種「階級插入」(Klasseneinschiebsel)（見《世界經濟文獻》〔*Weltwirtschafts-Archiv*〕，1929，第30卷，123頁），但是他只看到這種情形在東歐的不利一面，沒看到它在西歐和中歐有很多有利之處。

❸例如，在七年戰爭之後的腓特烈二世治下，普魯士作了一次決定性的努力，將猶太人併入一種商業制度。1750年通行的「猶太規章」(Juden-reglement)被一種常規許可制度取代，這種制度針對那些將相當多財產投入新製造業的人。但是這同在其他地方實行的類似制度一樣，政府的這一類企圖往往完全失敗。

❹費利克斯·普利巴奇(Felix Priebatsch)(〈十七和十八世紀君主專制政體的猶太政策〉〔Die Judenpolitik des fürstlichen Absolutismus im 17. und 18. Jarhundert〕)，載《中世紀與近代歷史研究》〔*Forschung und Versuche zur 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Neuzeit*〕，1915)引用了一個十八世紀初的典型例子：「奧地利南部紐豪斯的一家製鏡工廠因管理不善而停產拍賣，猶太人威特海默(wertheimer)給皇帝一筆錢去買下它。有人要威特依默接管工廠，他拒絕，說他的時間要花在金融交易上。」

另見麥克斯・科勒(Max Köhler)，《經濟與思想文化史研究》(*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Wirtschaft und Geisteskultur*)中〈論中世紀猶太經濟革新：城市和鄉村中的猶太人〉(Beiträge zur neueren jüdisch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Die Juden in Halberstadt und Umgebung)，1927，第3卷。

這種傳統使富有的猶太人遠離資本主義的眞正權力地位。1911年巴黎羅斯希爾德(Rothschields)公司出售他們在巴庫(Baku)油田的股份給皇家殼牌石油集團(Royal Shell group)，本來除了洛克菲勒(Rockefeller)之外，羅斯希爾德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巨頭。理查德·路易松(Richard Lewinsohn)在《他們如何擴大和興富》(*Wie sie gross und reich wurden*)(柏林，1927)中報導了這一事件。

安德烈·賽約(André Sayou)在他同維納·宋巴特(Werner Sombart)辯論的文章(〈論猶太人〉〔Les Juifs〕，載《國際經濟評論》〔*Revue Economique Internationale*〕，1932)中說，宋巴特錯誤地將猶太人與資本主義發展混爲一談，他指出了一條一般規則：「羅斯希爾德家族和其他以色列人幾乎全都從事國家信貸和國際資本活動，根本不想……創辦大工業。」

❺然而，關於重商主義實驗對未來發展的影響絕不能高估。唯獨法國不停地試驗重商主義制度，結果比較早地振興了製造業，這歸功於國家的介入；在此之後，法國再也未能恢復到那種程度。在自由企業時代，法國資產階級在地方工業中避開了風險投資，而法國的官僚制度——它同樣是重商主義制度的產物——也避免了崩潰。儘管官僚制度也喪失了它的全部生產功能，它在今天卻更是國家的特色，但卻比資產階級更會阻礙國家元氣的恢復。

❻在英國，自從伊麗莎白女王的馬拉諾(Marrano)銀行家和克倫威爾軍隊的猶太金融家以來，情況就是如此，後來，十二名猶太經紀人之一被接納進倫敦證券交易所，據說當時政府公債的四分之一是由他經手的（見薩洛·勃隆〔Salo W. Baron〕，《猶太人的社會與宗教歷史》〔*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1937，第2卷，〈猶太人與資本主義〉〔Jews and Capitalism〕）；在奧地利，僅僅在四十年（1695—1739）時間裡，猶太人借貸給政府三千五百多萬弗羅林（金幣），當塞繆爾·奧本海默(Samuel Oppenheimer)於1703年去世時，引起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國家和皇帝都受到影響；在巴伐利亞，1808年政府公債的百分之八十由猶太人簽發和談判（見格倫沃德〔M. Grunwald〕，《塞繆爾·奧本海默及其社團》〔*Samuel Oppenheimer und sein Kreis*〕，1913）；在法國，重商主義的環境條件尤其對猶太人有利，考爾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早已贊揚他們對國家極其有用（見前引勃隆著作），在十八世紀中期，法國國王感激萬分地封德國猶太人里夫曼·卡爾默(Liefman Calmer)爲男爵，贊賞他對「吾國吾民」的服務和忠誠（羅伯特·昂切勒〔Robert Anchel〕，〈里夫曼·卡爾默，十八世紀法國的一位猶太男爵〉〔Un Baron Juif Français au 18 e siècle, Liefman Calmer〕載《回憶與科學》〔*Souvenir et Science*〕，第1卷，52-55頁）；在普魯士，腓特烈二世册封了「金錢猶太人」，到十八世紀末，四百個猶太家族構成了柏林最富有的羣體之一。（對柏林的十八世紀末社會與猶太人在其中的角色最出色描述之一，可參見威廉·狄爾泰〔Wilhelm Dilthey〕，《施萊爾馬赫的一生》〔*Das Leben Schleiermachers*〕，1870，182頁）

❼在十八世紀初期，奧地利猶太人成功地阻止了埃賽門格(J. A. Eisemenger)的

《發現猶太人》(*Entdecktes Judentum*) (1703) 的出版，到了十八世紀末，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在柏林只有在劇前加一段向猶太觀眾道歉的告白後才能上演。

❽唯一無關的例外可能是那些稅務官，在法國稱爲「包稅人」(fermiers-genéraux)，他們向國家租賃收稅權，保證向政府交納一筆固定稅金。他們依靠君主專制而掙得大量財富，並且直接依賴君主專制，但是他們人數太少，本身在經濟影響力方面過於孤獨。

❾促成政府商業同猶太人建立聯繫的迫切性可從一些情況中估量出來，反猶太的官員也不得不執行這一政策。俾斯麥年輕時曾作過幾次反猶演講，當他做了帝國首相之後，卻與勃萊赫羅埃德(Gerson Bleichroeder)成了親密朋友，並在宮廷教士斯多克(Adolf Stoecker)在柏林發起反猶運動時成了猶太人可信賴的保護者。威廉二世身爲君主，亦是反猶太的普魯士貴族中一員，在八十年代非常同情一切反猶運動，後來卻改變了他的反猶信念，當他繼承皇位時，一夜之間拋棄了他所保護的反猶分子。

❿早在十八世紀，凡在整個猶太羣體富有到足以對國家有用的地方，他們享受到集體特權，並且作爲一個羣體，即使在一個國家內，也同他們那些不富裕、不太有用的同胞們隔離開來。法國博爾多和貝榮(Bayonne)的猶太人像普魯士的「被保護的猶太人」(Schutzjuden)一樣，在法國革命以前很久就享受平等待遇，在 1787 年，他們甚至還應邀在全國三級會議(Convocation des Etats Cénéraux)上同其他第三階級的代表一起提出抱怨和建議。

⓫讓·卡帕菲格(Jean Capefigue)在《金融發展史：第 3 卷：銀行、貨幣、公債》(*Histoire des grandes opérations financière*, Tome III: *Banque, Bourses, Empruntes*) (1855) 中指出，在七月王朝期間，只有猶太人，尤其是羅斯希爾德家族，預定了一筆可觀的以法蘭西銀行爲支撐的政府信貸。他還說，1848 年的事件造成了羅斯希爾德家族的活動成爲多餘。拉斐爾·斯特勞斯(Raphael Strauss)在〈中歐經濟演變中的猶太人〉(The Jews in the Economic Evolution of Central Europe) (載《猶太社會研究》〔*Jewish Social Studies*〕，第

3卷，第1號，1941)中也說，1830年後，「公債已不再是冒險，因此基督徒的銀行開始逐漸採取措施從事這項業務。」和這些解說相反，羅斯希爾德家族同拿破侖三世維持良好關係，但是當時的一般趨勢已不容懷疑。

⑫參見普利巴奇前引書。

⑬根據他的所有傳記作家忠實報導的一件軼事，俾斯麥在1871年法國戰敗後說：「首先，勃萊赫羅埃德應該去巴黎，去與他的猶太同伴們一起，同銀行家們討論這件事（五十億法郎賠款）。」（見奧托·約埃林格〔Otto Joehlinger〕，《俾斯麥與猶太人》〔*Bismarck and die Juden*〕，柏林，1921）

⑭見沃爾特·弗蘭克(Walter Frank)，〈沃爾特·拉德諾與金髮種族〉(Walter Rathenau und die blonde Rasse)（載《猶太人問題研究》〔*Forschungen zur Judenfrage*〕，第4卷，1940）。弗蘭克儘管當過納粹官員，但是很注意資料來源和研究方法。他在這篇文章中的引文來自關於拉德諾的訃告刊在1922年出版的《以色列人家族譜》(*Israelitisches Familienblatt*)、《時代》(*Die Zeit*)、《柏林人日報》(*Berliner Tageblatt*)中。

⑮洪堡德，《日記》(*Tagebücher*)，里茲曼(Leitzmann)主編，柏林，1916—1918，第1卷，476頁；《百科全書》(*Encyclopédie*)(1751—1765)，第9卷中〈猶太人〉(Juif)條目可能是狄德羅寫的：「……（猶太人）在我們這個時代就分散開來……成爲相距最遠的國家之間的溝通的工具。他們就像龐大建築物上的釘子和凸榫，將各個部分聯結起來。」

⑯沃爾特·拉德諾是魏瑪共和1921年的外交部長，德國新的民主意志的優秀代表之一，他在1917年宣布他的「深刻的君主政治信念」，根據他的說法，領導一個國家的只能是「天意選定者」，而不是「幸運職業的暴發戶」。見《論新生事物》(*Von Kommenden Dingen*)(1917)，24頁。

⑰但是，不應該忘記這種資產階級方式。如果它只是個人動機和行爲方式，那麼羅斯希爾德家族的處事方法和他們的異教同事們當然不會有太大的差別。例如，拿破侖的銀行家歐佛哈德(G. J. Ouvrard)在以金融手段支持了拿破侖了的百日戰爭以後，立刻又爲捲土重來的波旁王朝服務。

⑱霍布森,《帝國主義》(*Imperialism*)(1905), 57 頁。

⑱羅斯希爾德家族如何懂得他們的力量源泉, 這一點顯見於早年家族的一條規定, 據此, 女兒們和女婿們不准涉足家族的事業。家族允許女兒們(在 1871 年之後甚至鼓勵她們)嫁給非猶太人的貴族: 男性後裔無一例外地必須娶猶太女子, 如可能, 則娶家族中的女子爲妻, 尤其在第一代人中一般都是如此。

⑱參見科爾蒂(Egon Cesar Conte Corti),《羅斯希爾德家族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紐約, 1927。

⑱見卡帕菲格, 前引書。

⑱我們一向不可能判斷羅斯希爾德家族在他們自己的商業來往中使用猶太人的資本到何種程度, 他們對猶太銀行家們的控制力有多強。這個家族從不允許學者們進入他們的檔案室從事研究工作。

⑱見詹姆斯·派克斯(James Parkes)《1878-1939 年猶太人問題的產生》(*The Emergence of the Jewish Problem, 1878-1939*)(1946), 其中第 4 章和第 6 章毫無偏見地簡要論述這些情況。

⑱克里斯蒂昂·威廉·道姆,《論猶太人民權的改善》(*Über die bürgerliche Verbesserung der Juden*)(柏林, 1781), 第 1 卷, 174 頁。

⑱《威廉與卡羅琳·馮·洪堡德的書信》(*Wilhelm und Caroline von Humboldt in ihren Briefen*)(柏林, 1900), 第 5 卷, 236 頁。

⑱對這些身處不同國家但在本質上並無不同的文官們的出色描述, 可參見昂利·皮亨納(Henri Pirenne),《從外族入侵到十六世紀的歐洲史》(*A 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Invasions to the XVI Century*)(倫敦, 1939, 361-362 頁): 「沒有階級偏見和對那些藐視他們的大貴族特權的仇恨,……並非國王通過他們說話, 而是凌駕一切之上的匿名君主使一切都屈服於它的權力。」

⑱見《以色列趣味實用小年鑑》(*Kleines Jahrbuch des Nützlichen und Angenehmen für Israeliten*)(1847)。

⑱當普魯士政府於 1847 年遞交一份新的解放法令給聯邦議會時, 幾乎所有高層貴族都贊成解放猶太人。見艾伯根(I. Elbogen)《德國猶太人史》(*Geschichte*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柏林，1935），244 頁。

㉙這就是普魯士國王們爲何如此關心嚴格地維護猶太人風俗和宗教禮儀的原因。1823 年，腓特烈・威廉三世禁止「最微小的革新」，他的繼位者腓特烈・威廉四世公開宣布在他的王國裡「國家不能在任何事情上使猶太人和其他居民之間進一步發生種族混合的情形。」見艾伯根，前引書，223 及 224 頁。

㉚見 1880 年 10 月致文化大臣帕特卡默(Puttkammer)的信。亦見俾斯麥 1880 年 11 月致梯德曼(Tiedemann)的信。這兩封信見沃爾特・弗蘭克，《阿道夫・斯多克與基督教社會運動》(*Hofprediger Adolf Stoecker und die christlich-soziale Bewegung*)（1928），304 及 305 頁。

㉙奧古斯特・伐恩哈根(August Varnhagen)對腓特烈・威廉四世的一句話評論如下：「國王被問及他想對猶太人做什麼。他回答說：『我希望他們在各方面順利，但是我要他們感到自己是猶太人。』這些話是解釋許多事物的關鍵。」見《日記》（*Tagebücher*）（萊比錫，1861），第 2 卷，113 頁。

㉙實施對猶太人的解放會違反猶太代表人物們的意願，這在十八世紀是人們的共識。米哈波(Honoré Q. R. de Mirabeau)在 1789 年國民議會(Assemblée Nationale)之前就提出：「先生們，難道因爲猶太人不願成爲公民，你們就不宣布他們是公民？在你們所希望建立的政府裡，一切人都應該是人；你們應該驅逐一切不是常人或拒絕變爲常人的人。」約斯特(J. M. Jost)報導過十九世紀初德國猶太人的態度。見《1815-1845 年以色列人革新史》(*Neuere Geschichte der Israeliten: 1815-1845*)，柏林，1846，第 10 卷。

㉙見亞當・繆勒(Adam Mueller)1815 年致梅特涅的一封信（見巴克撒〔J. Baxa〕主編《論文選》〔*Ausgewählte Abhandlungen*〕，1921，215 頁。）

㉞見保勒斯(H. E. G. Paulus)，《猶太民族起源、發展及轉變之後的隔離》(*Die jüdische Nationalabsonderung nach Ursprung, Folgen und Besserungsmitteln*)（1831）。

㉙沃德瑪・古里安(Waldemar Gurian)的〈現代德國的反猶主義〉(Antisemitism in Modern Germany)一文清楚而又可靠地敍述了十九世紀德國

的反猶主義。見平森(K. S. Pinson)主編《反猶主義論文集》(*Essays on Anti-Semitism*)(1946)。

㉟德國唯一重要的左派反猶分子是歐根·杜林(E. Duehring),他概念混亂地發明了一種關於「猶太人種」(Jewish race)的自然主義解釋,見《猶太人問題作爲民族的生存傳統及文化中種族毀滅問題:暨一個世界經濟史的答案》(*Die Judenfrage als Frage der Rassenschädlichkeit für Existenz, Sitte und Cultur der Völker mit einer weltgeschichtlichen Antwort*)(1880)。

㊱見庫爾特·沃齊納克(Kurt Wawrzinek),《德國反猶主義的產生:1873-1890》(*Die Entstehung der deutschen Antisemitenparteien: 1873-1890*),「歷史研究」叢書第168冊,1927。

㊲奧托·格拉高(Otto Glagau)《國家自由主義的破產及其反應》(*Der Bankrott des Nationalliberalismus und die Reaktion*),柏林,1878;《金融交易與虛設公司騙局》(*Der Börsen- und Gründungsschwindel*)。(1976),係當時反猶主義最重要的小冊子之一。

㊳見沃齊納克,前引書。對這一切事件的描述,尤其涉及到宮廷教士斯多克爾,可參見弗蘭克,前引書。

㊴這一建議於1886年在卡塞爾(Cassel)提出,德國反猶聯合會(Deutsche Antisemitische Vereinigung)在此地成立。

㊵關於「政黨之上的政黨」以及各種泛歐運動問題的進一步討論,請見第8章。

㊶「第一屆國際反猶太大會」於1882年在德累斯頓舉行,大約三千名代表,來自德國、奧匈帝國和俄國;在辯論中,斯多克爾被激進分子們駁倒,這些人一年之後在欽尼茨(Chemnitz)聚會,建立了「全世界反猶同盟」(Alliance Anti-juive Universelle)。前引沃齊納克的著作中對這些會議和大會,以及它們的計劃和討論內容,都有詳盡的敍述。

㊷工人運動的國際團結,就其發展情況而言,是一種國際現象。他們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一致性也是一種自我保護,用以反對各自國家內當代帝國主義政策,並且避免參與其中。只要同經濟利益有關,就會很明顯,法國、英國或荷蘭民族

的每一個人都會強烈地感受到，巨大的衝擊不光來自資本家和銀行家們的垮台，而且來自他們的帝國的沒落。

㊹可參照本書第 8 章內容。

㊺參見保羅·埃姆登(Paul H. Emden)，〈維也納信貸機構史話〉(The Story of the Vienna Greditanstalt)，載《聖燭雜誌》(*Menorah Journal*)，第 28 卷，第 1 期，1940。

㊻見紐夏弗爾(F. A. Neuschäfer)，《蓋奧爾格·利特爾·馮·肖納勒》(*George Ritter von Schönerer*)，漢堡，1935，以及愛德華·皮切爾，《蓋奧爾格·肖納勒傳》(*George Schönerer*)(1938)，六卷。即使到了 1912 年，當肖納勒的鼓動失去意義已經很久時，維也納《工人報》(*Arbeiterzeitung*)還充滿感情地提到他，並且引用俾斯麥有一次評論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的話：「即使我們互相開火，我們仍然應該在槍戰之間公平地承認，他的確是一條漢子，而其他人則都像老女人。」(紐夏弗爾，前引書，33 頁)

㊼見紐夏弗爾，前引書，第 22 頁；皮切爾，前引書，第 1 卷，236 頁。

㊽引自皮切爾，前引書，第 1 卷，26 頁。

㊾尤見沃爾弗賴德·弗倫夫特(Walfried Vernunft)，〈論法國反猶主義的背景〉(Die Hintergründe des französischen Antisemitismus)，載《國家社會主義月刊》(*National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1939 年 6 月號。

㊿請參見本書第 4 章。

(51)見梅斯特(Maistre)伯爵《聖彼得堡之夜》(*Les Soirée de St. Petersburg*)(1821)，第 2 卷，55 頁。

(52)查理·傅立葉(Charles Fourier)，《新世界工業》(*Nouveau Monde Industriel*)(1829)，載《全集》第 5 卷，421 頁。傅立葉的反猶理論亦可見埃德蒙·西爾伯納(Edmund Silberner)，〈查理·傅立葉論猶太問題〉(Charles Fourier on the Jewish Question)，載《猶太社會研究》，1946 年 10 月號。

(53)見報紙《法蘭西愛國者報》(*Le Patriote Français*)，第 457 期，1790 年 11 月 8 日。引自克萊門斯·奧古斯特·霍伯格(Clemens August Hoberg)，〈近代

法國反猶主義的精神基礎〉(Die geistigen Grundlagen des Antisemitismus im modernen Frankreich)，載《猶太人問題研究》，1940，第 2 卷。

㊿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的論著是人所共知的，無需再引述。波爾納的話由於是單純論爭性質的，缺乏理論性，如今已被人遺忘，所以此處引述他發自巴黎的第 72 封信（1832 年 1 月）中的話：「羅斯希爾德吻了教皇的手。……上帝創造世界時設想的秩序終於實現了。貧窮的基督徒吻教皇的腳，有錢的猶太人吻教皇的手。假如羅斯希爾德向羅馬的貸款利率不是百分之六十五，而是百分之六十，並贈送侍從長一萬多金幣，他們就會允許他擁抱聖父。……如果所有的國王都退位，讓羅斯希爾德家族登上寶座，這豈不是全世界最大的幸運麼?」（見《巴黎書簡 1830—1833》）

㊿西賽爾•龍伯羅索(Cesare Lombroso)的著名反猶著作（1899）前由市議員保爾•勃羅斯(Paul Brousse)撰寫的前言中清晰地描述了這種態度。下列引文係代表性論點：「小店主們需要貸款，我們知道現在信貸組織得很糟，貸款利率很高。這裡的小商人也靠猶太銀行家負責任。一直到工人——只有工人不清楚科學社會主義的概念——爲止，每一個人都認爲，假如從總體上應剝奪資本家，那麼首先應該從剝奪猶太資本家開始，因爲他們最典型，大衆最熟悉他們的名字，而這樣才能加快革命。」

㊿法國反猶主義的論調一致令人驚奇，例如可以比較兩個人的說法，查理•傅立葉描述了猶太人「伊斯卡利奧特」(Iscariote)帶著十萬英鎊來到法國，在一個鎮上和六位同行競爭，擊敗了所有的競爭家族，獲得巨富回到德國。（見《四個運動理論》〔*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1808，《全集》，88 頁）紀堯鐸描述 1939 年的事情：「幾十萬名北歐猶太人(Ashkenasim)逃離波蘭和羅馬尼亞的猶太居民區，以滲透的方式進入我們國家，我徒勞地無法探出其中的秘密……他們排擠掉了我們的市民，同時敗壞了我們的職業習慣和傳統……而且使我們的一切統計調查、稅收和勞動者落空了。」（見《論普通政體》〔*Pleins Pouvoirs*〕，1939）

㊿尤見《法國新評論》(*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1938 年 2 月號馬塞爾•阿蘭德(Marce Arland)的重要文章，他宣稱塞利納的觀點「很有力」。安德烈•紀

德(André Gide)(1938年4月號)認爲塞利納只描述了猶太人的「具體的」方面，他成功地描畫的不是現實，而是現實引起的幻覺。

㊿參見雷納·皮農(René Pinon)，《法國與德國》(*France et Allemagne*)(1912)。

㊿阿爾及利亞猶太人問題的某些方面在筆者的文章〈克里米亞公告爲何被廢除〉(Why the Crémieux Decree was Abrogated)(載《當代猶太檔案》〔*Contemporary Jewish Record*〕雜誌，1943年4月號)中有論述。

㊿這是茨威格在《昨日世界：自傳》(*The World of Yesterday: An Autobiography*)(1943)中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年代描述。

㊿契斯特頓，《唐·吉訶德的歸來》(*The Return of Don Quixete*)直到1927年才出版，卻是「在戰前構思並寫完一部分」，其中對英國的情況有出色的描寫。

第三章
猶太人與社會

猶太人在政治上的無知，使他們能適應其特殊角色、紮根於國家的商業圈、對人民有偏見和對權威趨炎附勢，能對反猶主義的政治危險視而不見，對一切形式的社會歧視則過於敏感。當政治爭端和純粹反感同時發生時，很難看清兩者之間的關鍵區別。然而，問題在於它們恰恰產生於解放猶太人中的對立面向：由於猶太人是一個隔絕的羣體而產生政治上的反猶主義，而社會歧視則產生於猶太人與其他一切民族羣體之間日益增長的平等。

條件之平等雖說無疑是正義的基本要求，然而是現代人類最大的、最難確認的冒險之一。條件愈平等，人際事實存在的差異就愈難得到解釋；而因此個人之間和羣體之間就更不平等。當平等不再是因爲無所不能的上帝和在不可避免的共同命運，亦即死神的緣故，這種糾纏複雜的結果就明白顯示出來。每當平等本身變成一種世俗的事實，沒有一種衡量或解釋的尺度，那麼只有百分之一的機會，可能被承認爲一種簡單的政治組織操作原則，在這之中，在其他方面不享平等的人可以有平等權利；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機會中，平等會被錯誤理解爲每一個個人的天性，如果他同別人一樣，他就是「正常的」，如果他同別人偶然不一樣，他就是「不正常的」。平等從政治概念到社會概念的這種逆轉，在社會幾乎不給特殊羣體和個人留出空間時尤其危險，因爲在這種時候，它們之間的區別特別觸目。

現代面臨的巨大挑戰，以及這種挑戰的特殊危險，在於人在首次在沒有區別的環境與條件的保護下而與人競爭。正是這種新的平等觀念使現代化種族關係變得十分艱難，因爲我們要解決的是一種天然差異，而又不可

能用可以想像的條件變化來使這種差異略爲削弱。這是因爲，平等要求我承認每一個個人都和我一樣平等，出於各自的理由，團體之間不願意承認對方有這種基本的平等，所以不同羣體之間的衝突才採取了如此可怕的殘酷形式。

因此，猶太人的條件越平等，他們之間的差異越令人吃驚。這種新的意識導致社會嫌惡猶太人，但同時又被他們的奇特之處所吸引；這種雙重反應決定了西方猶太民族的社會歷史。然而，歧視和吸引在政治方面都不會產生結果。它們既不會產生反猶政治運動，也不會以任何方式保護猶太人不受敵人侵害。但是，它們毒化了社會環境，顚倒了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的一切社會交往關係，並對猶太人的行爲造成了特定的影響。猶太人風格是由特別的歧視和特別的受惠這兩者構成的。

社會對猶太人的反感，加上各種形式的歧視，在歐洲諸國並不造成很大的政治傷害，因爲眞正的社會平等與經濟平等從未達到過。從一切表象上，新階級發展成一個團體，其成員是生而從屬這團體的。無疑只有在這種框架內，社會才能迫使猶太人自己建立一個特殊集團。

如果是在美國，天經地義的平等條件會使情形完全相反；如果社會的每一個成員——無論屬於哪個階層——都堅信他憑能力和幸運就可以成爲一個成功者，也會使情形大不相同。在這種社會裡，歧視成了唯一的區別手段，一種普遍法則，各種羣體據此發現自身被排擠在民權、政治、經濟的平等範圍之外。當歧視不光涉及猶太人問題時，就會變成一場政治運動的結晶點，這種政治運動想用暴力、暴民統治(mob rule)和純粹粗俗的種族觀念來解決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天然困難和衝突。美利堅共和國的居民結構和歷史是世界上最不均等的，它敢於在此基礎上實行平等，這是它最有希望而又最危險的弔詭之一。在美國，社會的反猶主義總有一天會變成一場政治運動的非常危險的爆發點。❶然而在歐洲，它對於政治上反猶主義的興起卻幾乎沒有什麼影響。

(一)在賤民與新貴之間

民族國家從社會和政治兩方面所依托在社會和國家之間不穩定的平衡，引起了一條奇特的規律，決定猶太人被接納進社會這一問題。在猶太人眞正生活在歐洲各民族中間——並非相鄰而居——的一百五十年間，他們一向必須爲取得社會地位的榮耀而付出政治苦難的代價，爲取得政治上的成功而遭受社會的侵擾。同化，其意義即被非猶太社會接受，唯一的條件是他們必須明顯地區別於猶太羣眾，即使他們仍受同樣政治條件的限制和羞辱，或在完成解放和造成社會隔離之後，他們的政治地位已受到反猶運動的挑戰。社會在面對猶太人應享有政治、經濟和法律平等時，表現出沒有任何一個階級打算承認他們的社會平等權利，只接受他們中的一些例外人物。那些猶太人聽到這種奇怪的恭維，說他們是例外，是特殊猶太人，他們心裡十分明白，正是這種模稜兩可的說法——意即他們是猶太人，但假定上不**像**猶太人——向他們打開了社會的大門。如果他們希望得到這種相互關係，那麼，他們就會嘗試「成爲一個猶太人，但又不做猶太人」。❷

事實上，表面上的弔詭有一種堅實的事實基礎。非猶太社會所要求的是新進入者必須「受過教育」，而且儘管他的行爲不像一個「普通猶太人」，但是，他畢竟是個猶太人，他必須同「普通」猶太人兩樣，做出非同一般的事情。一切關於解放的鼓吹同時又主張同化，亦即根據社會要求來作出調整，並被社會接受，這種情況或者是解放猶太人的先決條件，或者是一種自然的結果。換言之，每當那些人以實際行動嘗試改善猶太人的條件時，都試圖從猶太人的角度來思考猶太人問題，並且立即只從社會方面來考慮問題。猶太民族歷史上最不幸的事實之一是，只有它的敵人——而且幾乎從來沒有一個朋友——才理解猶太人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

解放的衛護者傾向於將解放猶太人當作「教育」問題提出，這個觀念

原先旣用於猶太人，也用於非猶太人。❸兩者中的先進分子理所當然地包括受過特殊教育的、寬容的、有文化的人。當然，特別寬宏大量的、受過教育的、有文化的非猶太人才會煩擾例外地受過教育的猶太人。當然，受過教育的人們要求廢除偏見，這很快地變成了一樁一厢情願的事情，直到最後，只有猶太人被促使教育自己。

但這只是問題的一面。猶太人被勸告接受足夠的教育，以使行爲表現爲不同於普通猶太人，但是另一方面，僅僅因爲他們是猶太人，因爲他們作爲外人的請求(foreign, exotic appeal)，他們才被接受。這種情況在十八世紀的根源是新人文主義，它公開要求「人類的新人種」(new specimens of humanity)（赫爾德〔J. G. Herder〕語），與他們的交往可以看作是和各種人建立可能的親密交往的範例。對於門德爾森(Moses Mendelssohn)時代經過啓蒙運動的柏林來說，猶太人可以作爲「一切人都是人類」的活證據。對於這一代人，與門德爾森或馬庫斯·赫爾茲(Markus Herz)的友誼是人的尊嚴的不斷更新顯示。由於猶太人是一個受蔑視、受壓迫的民族，因此在這個問題上，他們是更純粹、更有典範意義的人類範型。正是赫爾德這位公開替猶太人說話的朋友第一次使用了後來被誤用和誤引的說法：「被驅逐到我們地區來的亞洲陌生人」。❹他和一些人文主義者都歡迎這些「人類的新人種」，十八世紀「尋遍大地」爲的是尋找他們，❺卻就在老鄰居中找到了。他們熱切地強調人類的團結，想指出猶太人的祖先比實際上更屬異種、外方人，以使顯示人道作爲普遍原則可以更有效。

十八世紀末的幾十年裡，法國的猶太人早已得到解放，而德國的猶太人對此還幾乎不抱希望，普魯士受過啓蒙的知識分子使「全世界猶太人注視著柏林的猶太社羣」❻。(而不是巴黎的猶太人！）這大多歸因於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智者拿坦》(*Nathan the Wise*)一書的成功，或者說是對它的誤釋，它認爲，「人類的新人種」因其成爲人類之典範，所以應是一些更集中的個人。❸米哈波(Honoré Q. R. de Mirabeau)

受此思想的強烈影響，常引用門德爾森作爲例子。❽赫爾德希望受過教育的猶太人應該更加不受偏見左右，因爲「猶太人不受某些政治判斷的影響，而我們卻很難或者不可能拋棄這種政治判斷。」他反對當時允許「向新的商業利益讓步」的習慣，建議以教育作爲將猶太人從猶太教、從「不合時代、不合憲法的陳舊自傲的民族偏見、習慣等等」解放出來的眞正道路，以使猶太人變「純粹人性化」，服務於「科學和人類整體文化的發展」。❽幾乎與此同時，歌德在關於一本詩集的評論中寫道，作者——一個波蘭猶太人——「至多只達到一個基督教的純文學學生的水平」，並且埋怨說，凡是他期待看到一些眞正的新東西的地方，本應該有一種超過膚淺的陳詞濫調的力量，卻只發現普通的庸才。❽

人們不難估計這種對新近西方化的、受過教育的猶太人寄予過分良善願望的災難性後果，以及它對猶太人的社會地位和心理狀態的衝擊。他們不僅面對道德墮落的要求，要他們成爲自己民族中的例外，承認「他們與別人之間的明顯差別」，並請求政府將這種「分離……也合法化」；❽他們甚至被期望成爲例外的人種。而既然這一切（不是海涅所說的轉變）構成進入歐洲社會文化的眞正「入場券」，那麼這些猶太人和以後幾代猶太人除了竭力嘗試討好任何一個人，又能做些什麼呢？❽

在進入社會的最初幾十年裡，當同化還不是必須追隨的傳統，而只是少數有特殊天賦的個人的事情時，確實進行得很順利。法國最先承認猶太人的公民資格，成爲猶太人政治上的光榮之地，這時的普魯士正在走向一個輝煌的社會。受過啓蒙運動洗禮的柏林是門德爾森結交當時許多名人的地方，柏林只是一個開端。他和非猶太社會的關係大多只是歐洲歷史上各個時期猶太教和基督教學者的那種關係。其中包含的新成份卻令人驚奇，亦即門德爾森的朋友們利用這些關係來達到非個人的、意識形態的、甚至是政治上的目的。他自己明確地否認一切此類不可告人的動機，再三表明他對自己的生活環境完全感到滿意，似乎他預見到自己例外的社會地位和自

由與某種事實有關，亦即他仍然屬於「(普魯士國王）領土上最低層的居民」。⓭

這種對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的漠然，使門德爾森與同時代有識和開明人士之間的純潔關係得以保持；這種漠然後來也被帶進了猶太婦女沙龍，她們聚集在一起，形成柏林有始以來最出色的社會團體。直到 1806 年普魯士戰敗後，在德國廣大地區引進了拿破崙立法，使解放猶太人的問題提上公開討論的議程，才使這種漠然變爲徹底的害怕。「解放」即解放受過教育的猶太人，同時也包括「落後的」猶太人，他們的平等會消除那明確的分界線，他們十分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社會地位正是立基於這種區分之上。當解放法令最終通過時，大多數同化了的猶太人轉入基督教，他們明顯地發現解放之前作爲猶太人情況尚可容忍和無甚危險，解放之後情形就不同了。

上述沙龍中最有代表性、而且是她們在德國組織的眞正混合型的團體是拉合爾·伐恩哈根(Rahel Varnhagen)的沙龍。她富有創造性的、健康的、非傳統的智慧。她既有對人的興趣，又有眞正激情的天性，這使她成爲這批猶太婦女中最優秀、最有意思的人物。拉合爾「頂樓」(Garret)上不鋪張但很著名的晚會聚集了「開明的」貴族、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和演員——亦即一切像猶太人一樣不屬於上流社會的人。因此拉合爾沙龍根據其本意，建立在社會的邊緣，而且不帶陳規陋習和歧視偏見。

値得注意的是，猶太人與社會同化緊隨著歌德在他的《威廉·麥斯特》(*Wilhelm Meister*)中關於教育的箴言，這部小說後來成了中產階級教育的典範。在小說中，年輕的市民受到貴族和演員的教育，以使他學會如何顯示和表現他的個性，於是從地位很低的市民之子上升到貴族階層。對於中產階級和猶太人——亦即事實上處於貴族上流社會之外的人——來說，一切取決於「人格」(personality)和表現人格的能力。知道如何扮演一個人的實際角色，這似乎是最重要的事情。在德國，猶太人問題被認爲是一個教育問題，這一奇特的事實與其較早形成有密切聯繫，而造成猶太人與

非猶太人的中產階級在教育方面的市儈習氣，也造成猶太人湧入自由職業。

早期柏林沙龍的魅力在於除了個性、獨特人格、才智和表現之外，其他一切實際上無關緊要。唯有人的獨特優點才構成無邊的人際溝通能力和無限制的親和能力，這是身階、金錢、成功或文壇名聲都不能取代的。眞正優秀人士的短暫相遇，霍亨索倫（Hohenzollern）親王路易·斐迪南（Louis Ferdinard）與銀行家亞伯拉罕·門德爾森（Abraham Mendelssohn），或政論、外交家弗里德里希·根茨（Friedrich Gentz）與當時的激烈現代浪漫派作家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Friedrich Schlegel）——這些人都是拉合爾「頂樓」沙龍的著名訪客——到1806年就結束了，根據拉合爾的說法，這個獨特的聚會場所「解散，就像一條滿載最高生命享受的船沈沒了」。浪漫派知識分子和貴族一起走向反猶主義，儘管這完全不意味著這兩個羣體會放棄它們所有的猶太朋友，但是天眞與輝煌卻一去不復返了。

德國猶太人社會歷史的眞正轉折點不是發生在普魯士戰敗那一年，而是兩年以後，在1808年，政府頒布了國內法，給予猶太人以完全的公民權——儘管不是政治權利。根據1807年的和平條約，普魯士失去了它的一些東部省份和它的猶太人口的大多數；而留在其領土內的猶太人都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受保護」的，亦即他們早就以個人特權的形式享有公民權。國內法中所說的解放只是使這些特權合法化，並在時間上比1812年的一般解放法令更久；拿破侖戰敗以後，普魯士收回了波茲南（Posen）及其猶太民眾，實際上廢止了1812年法令，這就意味著連貧窮的猶太人都享受政治權利，卻使國內法保持原樣。

就猶太人的地位得到實際改進而言，儘管在政治上幾乎毫無意義，但是最後的解放法令與失去由大部分普魯士猶太人居住的東部省份卻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後果。1807年以前，普魯士受保護的猶太人在猶太人口總數中只占有百分之二十。頒布解放法令時，他們占了大多數，而「外國猶太人」（foreign Jews）只占百分之十。此時與富裕的、受過教育的、地位突出的

「特例的猶太人」(exception Jews)相對的貧困、落後的猶太人已不復存在。這種背景對於社會成功和心理上的自我尊重，是重要的比較基礎，卻不再像拿破侖時代以前那樣。1816 年收回波蘭省份時，過去「受保護的猶太人」(此時登記爲持猶太信仰的普魯士公民) 仍占百分之六十左右。⓮

從社會角度而言，這意味著其餘普魯士猶太人失去了本地背景，本來他們是藉這種背景而被認爲是特例的。此時他們自己構成了這樣一種背景，但是以一種契約的方式，個人藉此必須以雙倍的約束才能出人頭地。「特例的猶太人」仍然只是猶太人，並非例外於一個受蔑視的民族，而是作爲這個民族的代表。同樣糟糕的是政府干預造成的社會影響；不僅是各階級和政府對抗，因此引起公開敵視猶太人，而且社會的一切階層都或多或少地意識到，他們認識的猶太人並不是羣體成員中特例的個人，受到國家的例外待遇。而這正是「特例的猶太人」一向所害怕的。

柏林社會使猶太人沙龍迅速發展，至 1808 年，這些聚會已被官僚貴族和上層中產階級家族取代。人們從當時的無數書信往來中可以看到，知識分子與貴族開始將對那些他們幾乎不熟悉的東歐猶太人的蔑視轉向他們十分熟悉的、受過教育的柏林猶太人身上。後者再也無法獲致從自認爲特例的猶太人的集體意識中產生的自尊；因此他們每一個人都必須證明，雖然他是一名猶太人，然而他又不是猶太人。這也不再足以使自己和「落後的同胞」無名的羣眾區別開來；作爲有幸成爲一個特例的個人，他必須從「猶太人」中顯突出來，而因此也就脫離了民族整體。

社會歧視 (並非政治上的反猶主義) 發現了「猶太人」(the Jew)的鬼影。將個別猶太人和「猶太人整體、到處存在而又到處不在的猶太人」作出區別的第一個作家，是一個不出名的政論家，他於 1802 年寫了一篇文章，辛辣地諷刺猶太社會，以及它渴望接受教育、著魔似地冀求一般社會的接納。猶太人被描述成一個是市儈(philistine)和暴發戶社會的「根本」。⓯這篇相當卑瑣的文章不僅在拉合爾的沙龍中一些十分著名的成員中興高采烈

地傳閱，而且間接地啓發了一位浪漫派大詩人克萊孟斯・馮・布倫塔諾(Clemens von Brentano)寫了一篇充滿機智的論文，其中又一次將「菲利斯丁」(市儈)與猶太人混爲一談。⓯

有些事物隨著早先田園牧歌式的混居社會而一起消失，在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不再復返。任何社會團體都不再以自由思想和胸懷來接納猶太人。即使與猶太人友好相處，也是因爲對自己的大膽和「邪惡」感到興奮，或者因爲反對將同住的公民看作賤民。但是，凡是猶太人不再成爲政治上和公民權利上的外黜者的地方，猶太人確實被當作社會上的賤民。

值得牢記的是，作爲一種羣體而同化的現象只存在於猶太知識分子中間。第一個受過教育的猶太知識分子莫西斯・門德爾森(Moses Mendelssohn)也是第一個從低下的社會地位被接納進入非猶太社會的人，這並非偶然。宮廷猶太人和他們的後繼者——西方猶太銀行家和商人——從未被社會接納，而他們也不想離開範圍非常狹窄的隱形的猶太聚居區。起初他們像一切未變壞的暴發戶一樣，爲自己出身的苦難與貧困的不幸背景感到自豪；後來，當他們在各方面受到攻擊，他們就對於羣眾的貧困甚至落後有既定的利益，因爲它變成了一個爭論的問題，變成了他們自己安全的表徵。他們漸漸地帶著許多疑慮，被迫離開了猶太法律的嚴格要求——他們從未全部脫離宗教傳統——猶太法律仍然要求猶太羣眾嚴守正統。⓰猶太共體自治的瓦解，使他們更加熱切地想保護猶太社羣，對抗當局，同時又在國家的協助下統治它們，因此有一種說法，指出貧窮的猶太人「雙重地依賴」「政府和他們的富有的同胞」，這完全反映出當時的現實。⓰

猶太著名人物(the jewish notables)(十九世紀時人們如此稱呼他們)統治著猶太社羣，但是在社會上、甚至在地理上，他們不屬於猶太社羣。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盡可能像遠離異教社會一樣，遠離猶太社會。既然有了出色的個人事業，又經主子允准各種特權，他們構成了一種特例的

社羣，但是社會機會十分有限。他們很自然地受宮廷社會蔑視，缺乏和非猶太中產階級的商業聯繫，他們的社會接觸遠離社會法則，就像他們經濟上的崛起是獨立於同時代的經濟條件之外一樣。這種孤立和獨立常常使他們具有一種權力感和自豪感，十八世紀初流傳的一則故事對此作了描述：「某位猶太人……，當一位高貴而又有教養的醫生溫和地責備他說，猶太人當中儘管沒有君主，在政府裡也沒有位置，但是太傲慢了……這位猶太人傲慢地回答說：我們不是君主，但是我們統治君主。」[19]

這種驕傲是階級傲慢的反面，它漸漸地在特權猶太人中間產生。他們像專制君主一樣統治自己的民族，認爲自己是「族中長者」(primi inter pares)。像「全猶太民族的特權教士」(priviledged Rabbi of all Jewry)或「聖地之王」(Prince of the Holy Land)這類稱呼，比他們的主人可能賜給的任何名號都更使他們自豪。[20]直到十八世紀中，他們都會同意荷蘭猶太人說的：「而且我們從不臣屬於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但是無論在當時還是後來，他們都不會完全理解一位「受過教育的基督徒」的回答：「但是這只意味著少數人的幸福。被看作一個『集體』的人卻到處惶悚，不能自治，屈從於外族統治，無權力，無尊嚴，在全世界到處流浪，在各處都是異鄉人。」[20]

只有當國家銀行家在各國建立了商業聯繫時，才產生階級傲慢；主要家族之間的聯姻繼之而起，在眞正的國際階層制度中爬升，這在當時的猶太社會中還不顯著。由於這是在舊的封建等級迅速地消失在新階級中間時發生的，所以在非猶太的旁觀者眼中更加輝煌。有人錯誤地得出結論說，猶太人是中世紀的遺物，而未看到這種新的等級是最近才誕生的。它到十九世紀才完成，數目上還不到一百個家族。但是，既然這些家族引人注目了，猶太人就在整體上被看成了一個等級。[20]

所以，儘管宮廷猶太人在政治史和導致反猶主義兩點上產生了重大作用，社會歷史仍然很容易忽視他們，除非是因爲他們與猶太知識分子有共

同的心理跡象和行爲模式，畢竟這些知識分子通常都是商人的兒子。那些著名的猶太人想控制猶太民族，因此不希望脫離它，而猶太知識分子的特點是他們想離開自己的民族，被社會接納；他們都有一種共同感覺，即他們是猶太人中的特例，這同他們對環境的判斷是完全一致的。「特例的猶太人」中的富人自認是在猶太民族的共同命運之外，而政府認爲他們特別有用；「受過教育」的猶太人認爲自己是一種特殊的猶太人，也是人類中的特例而得到社會承認。

無論是否極端地發生變化，同化對於猶太人的生存絕不是一種眞正的威脅。㉓無論他們受歡迎或被拒絕，都因爲他們是猶太人，並且充分意識到這一點。第一代受過教育的猶太人仍然眞誠地想丟棄猶太人的身份，波爾納曾十分尖刻地寫道：「因爲我是猶太人，所以有些人汚辱我，有些人稱讚我，有些人原諒我，但是都因爲想到我是猶太人。」㉔他們經受十八世紀思想的薰陶，渴望有一個既無基督徒又無猶太人的國家；他們獻身於科學和藝術，卻發現各國政府給一個猶太銀行家以特權和榮譽，卻讓猶太知識分子挨餓，因此心理受到極大傷害。㉓在十九世紀初，改宗的原因是害怕與猶太羣眾混同，後來卻爲每日的麵包而必須改宗。這種丟棄個性才能獲得報酬的情形迫使整整一代猶太人苦澀地和政府與社會對抗。「人類的新人種」如果是名副其實的話，都變成了反叛者，既然當時一些最反動的政府都得到猶太銀行家的金融支持，於是他們對自己民族的正統代表反對尤烈。若非根據富裕猶太人和猶太知識分子之間的這種衝突，就不可能正確地理解馬克思和波爾納的反猶批判。

然而這種衝突只在德國才充分存在，但並未逃過本世紀的反猶運動。在奧地利，十九世紀末之前談不上有什麼猶太知識分子，它在世紀末才直接感受到反猶主義壓力的整體衝擊。這些猶太人像他們的富裕同胞一樣，寧可將自己托付給哈布斯堡王朝的保護，而且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社會民主黨執政，他們才成爲社會主義者。這條規律之外最有意義的例子之

一是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他是海涅、波爾納、馬克思的思想傳統中最後一名代表。克勞斯一方面譴責猶太商人，另一方面譴責有組織地崇拜名人的猶太新聞界，他的批判比前驅者們更嚴厲，因爲他更爲孤立地生活在一個從來未發生過猶太革命的國家。在法國，解放法令經歷了政府與權力的一切更迭，爲數甚少的猶太知識分子們既非一個新階級的先驅，在知識生活中也不特別重要。文化本身，以及作爲一種計劃的教育，在法國都不像在德國那樣構成猶太人的行爲模式。

在德國猶太人的歷史上有一個短暫時期，猶太人同化問題顯得具有決定性意義，但是在其他國家卻從無類似情形，使一個民族中的先進分子不僅接納猶太人，甚至還奇怪地願意與他們合作。這種態度在德國並未完全消失。這種跡象最終很容易被辨識，這顯示出和猶太人的關係從未被認爲理所當然。它充其量是一種計劃，但是至少也是一種新奇的、令人興奮的經驗。俾斯麥的名言「德國公馬配猶太母馬」只不過是一種流行觀點的最粗鄙的表達。

很自然，這種社會情勢雖然從第一批受過教育的猶太人中間造就了反叛者，但長期以來會產生一種順民，不會有效的反叛傳統。㉕要順從一個歧視「普通」猶太人的社會（同時在這個社會裡，受過教育的猶太人一般比同樣條件的非猶太人更容易被時髦的社交界接納），那麼必須清晰地使自己有別於「一般猶太人」，正如清楚地指明他們是猶太人一樣；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不能就在鄰居中間消失。爲了使他們自己也不完全理解的模稜兩可狀態合理化，他們可能裝扮成「在街上是男人，在家裡是猶太人。」㉖這在事實上積澱成一種在街上與其他人不同的感覺，因爲他們是猶太人，而在家裡又與別的猶太人不同，因爲他們不像「普通猶太人」。

同化了的猶太人的行爲模式，由於不斷地致力於使自身和其他人區別開來，創造了一種到處都能被辨識出來的猶太類型。猶太人不是被國籍或宗教信仰所界定，而是被轉化爲一種社會羣體，它的成員共同具有某種心

理屬性和反應，其總體可假設爲一種「猶太性格」(Jewishness)。換言之，猶太人變成了一種心理特性，猶太人問題對於每一個猶太人個人來說則變成了涉及私人的問題。

新型的猶太人在他通過差異化和區別來順從社會的悲劇性努力中，與他們害怕的「一般猶太人」毫無共同之處，也不同於「先知的後代和在大地上永遠主張正義的人」，每當一位猶太新聞記者受到攻擊時，猶太辯護士們就用這些話來回答。猶太辯護士們的一些特質是賤民的特權和生存於社會邊緣的猶太反叛者擁有的特質——人道、和善、擺脫偏見、對不義之事敏感。麻煩的是，這些都與先知們無關，更糟糕的是，這些猶太人通常既不屬於猶太社會，也不屬於非猶太社會的時髦圈子。在被同化的猶太人歷史上，他們只扮演了不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一般猶太人」照專門仇視猶太者的描述，顯示出想成爲暴發戶必須具備的特性——非人性、貪婪、專橫、奴顏卑膝、拼命向前的意志。問題在於這些特性仍與民族性格無關，再說，這些猶太商業階級類型幾乎沒有與非猶太社會同化的傾向，在猶太社會史上只有很小的作用。只要存在惡名昭彰的人與階級，暴發戶及賤民性格就會由每一代人在猶太社會和其餘各處單調地重複出現。

但是，就十九世紀歐洲社會裡猶太社會史的形成而言，「在某種程度上產生決定作用的是每一代猶太人中的每一個人，在有時必須決定他究竟是繼續做一個賤民而完全站在社會之外，還是變成一名暴發戶，不是掩蓋自己的血緣，而是以自己的血緣秘密，揭露其民族的秘密。」㉘在這種敗壞道德條件下順從於社會，後一條道路實際上是很困難的，因爲這些秘密並不存在，他必須假裝有這些秘密。自從拉合爾・伐恩哈根獨特地在官方社會之外建立一種社會生活的嘗試失敗之後，賤民與暴發戶的道路同樣都是極端孤獨的，而順應社會的道路又時常令人後悔。所謂普通猶太人的心理情結便是在一種曖昧矛盾的情況基礎下，發展爲一種很現代的敏感性。猶太人同時感到，賤民後悔未成爲暴發戶，而暴發戶背叛民族的這種壞心，以

平等權利去換取個人特權。有一點很明確：若想避免其社會存在中的一切模稜性質，就必須承認這樣的事實：做一個猶太人，意味著要麼附屬於一個特權過多的上層階級，要麼從屬於毫無特權的羣眾，在西歐和中歐，這種隸屬只能通過知識上人爲的團結而達成。

普通猶太人的社會命運是由他們永遠缺乏決定造成的。社會當然不會強迫他們作決定，因爲正是情勢與性格的模稜兩可使社會和猶太人的關係引人注目，大多數同化了的猶太人因此生活在恩寵與不幸前景難明之中，而且明確地知道，成功與失敗都糾結於他們是猶太人這一事實。對他們而言，猶太人問題永遠地失去了一切政治意義；但是它給他們的私人生活帶來陰影，專橫地籠罩著他們一切個人決定。「在街上是男人，在家裡是猶太人」這句格言從痛苦的角度來理解：當猶太人試圖用內在經驗和私人情感的手段來解決政治問題時，政治問題被歪曲到皈依問題；私人生活被毒化到非人性的地步——例如在通婚問題上——具有公開意義而未解決的問題使本應由感情的無法言喻的法則、而不是由深思熟慮的政策來統治的私人生存背上沉重的負擔。

想要不像「一般猶太人」然而又仍是猶太人，實屬不易；假裝不像猶太人，但要以足夠的明證來顯示自己是猶太人，又談何容易。既非暴發戶又非「具有意識的賤民」(conscious pariah)（伯納德·拉查爾〔Bernard Lazare〕語）的普通猶太人只能強調一種空洞的差異感，而這在其一切可能的心理方面和從內在疏離感到社會異化各方面又需進一步作解釋。只要世界還算和平，這種態度就不會導致壞結果，甚至會變成世世代代的生活態度(modus vivendi)。集中關注人爲地複雜化的內心生活，可以有助於猶太人對社會的不合理要求作出反應，可以表示新奇和激動，可以建立某種自我表現和表達的密切關係，這種態度原先只屬於那些被社會半拒斥半豔羨的演員和藝術家。同化了的猶太人爲自己的猶太血統而半自豪半羞愧，明顯地屬於這一範類。

資產階級社會從它的革命傳統和記憶的廢墟中發展起來的過程，爲經濟飽和安逸和對政治問題普遍地漠不關心，添上一道疲頓、黑色陰影。猶太人變成了人們希望借用來消磨一點時間的人。人們越是覺得他們不是平等的同類，就越是感到有吸引力和樂趣。資產階級社會在個人身上尋找娛樂和它的激情興趣，覺得只要與常規不同，就是眞正的人，它發現每一件事物的吸引人之處在於神秘的邪惡和秘密的凶殘。正是這種狂熱的選擇使社會向猶太人敞開了大門；因爲在這個社會的範圍內，猶太人性格在被歪曲到一種心理特性之後，可以輕而易舉地轉變成一種惡行(vice)。啓蒙運動之眞正的寬容精神和對人的一切事物的好奇心轉變爲病態地渴求異態的、反常的、不同的事物所取代。社會的幾種類型一種接一種地代表了異態的、反常的、不同的事物，而其中沒有一種和政治問題有任何聯繫。因此，在這個沒落的社會裡，只有猶太人的角色能夠樹立起一種超越社會事務狹隘範圍的形象。

我們在追蹤那些引導著名的或臭名昭著的「特例的猶太人」在世紀末的法國進入福伯格・聖吉曼(Faubourg St. Germain)的沙龍的奇怪方式之前，須先回憶那個由「特例的猶太人」的精心自欺所產生的唯一偉大人物。看來每一種普通的念頭都至少使一個人能有一次機會達到通常所稱的歷史的偉大意義。這個「特例的猶太人」中的偉大人物就是本杰明・狄斯累利。

(二)權勢奇才㉙

本杰明・狄斯累利生活中的主要興趣是作爲比康斯菲爾德(Beaconsfield)勛爵的事業生涯，此人的出名原因有二：第一是他的神佑天分，現代人通俗地稱之爲好運氣，在其他各個時代則稱爲獲得幸運女神青睞；第二，除非說成是與幸運女神的關係密切令人驚羡，否則便無法解釋，他極其無

憂無慮的天眞頭腦和想像力，使人簡直無法說此人是位野心家，儘管他除了野心之外從來不認眞思考任何事情。他清楚地懂得，感到自己失去社會地位會是多麼愚蠢，而「用穿著不同服裝，梳理奇異髮式、言語措詞風格奇特」來表明他是一個猶太人，這對於他自己和別人會是多麼興奮，對於實現他的野心是多麼有用。㉚他比其他猶太知識分子都更熱情地、無恥地關心如何進入社會的最上層；猶太知識分子中間唯有他一人發現了如何保持好運氣的秘密，創造賤民階級的天然奇蹟，他從一開始起就懂得，為了「不斷向上爬」，就絕不應該低頭。

他玩弄政治遊戲就像演員在劇院演戲一樣，角色扮演得如此出色，連自己都信以為眞了。他的一生事業傳記讀起來就像童話一樣，他在其中扮演的是王子——將浪漫故事中的藍色花朵（即英國帝國的歡樂）獻給他的公主(即英國女王)。英國的殖民主義事業造就一處日不落的仙境，它的都市是神秘的亞洲德里，是王子想和他的公主避離多霧的、缺乏詩意的倫敦而要去的地方。這聽起來好像很愚蠢、很幼稚；但是比康斯非爾德公爵夫人寫給丈夫的信中說：「你知道你是為了錢而和我結婚的，而我也知道，如果你再結一次婚，你就會為愛情而結婚，」㉛在違反一切常規的幸福面前，人會沉默。這一個人開始時將靈魂出賣給魔鬼，但是魔鬼不要他的靈魂，而諸神卻給了他這塊土地上的全部幸福。

狄斯累利生於一個完全同化了的家庭；他的父親是一位開明紳士，他使兒子受洗，因為他想讓兒子擁有普通俗人的機會。他和猶太社會很少聯繫，而且不懂猶太宗教和風俗。從一開始起，猶太只是一個血緣事實，他可以對它任意修飾，用實際知識來清除障礙。結果，他看待這一事實的方式就像一個異教徒一樣。他比其他猶太人更清楚地懂得，作為一個猶太人，他可以像殘疾人一樣獲得許多機會。他不同於他那單純而謙恭的父親。他想要變成一個普通人，變成一個「高於一切同時代人的人」，㉛他開始訓練自己「棕黑色的眼睛」，直至「有力的前額——當然不是基督徒的前額——與

眾不同。」㉝他清楚地知道，一切事情都取決於「他與單純俗人之間的分野」，取決於強調他那幸運的「奇特性」(strangeness)。

這一切都顯示出對社會及其規律的獨特理解。有意思的是，正是狄斯累利所說的「在眾人之中是罪(crime)在少數人之中只不過是惡(vice)」㉞——或許可以說是對十九世紀發生的社會逐漸漸墮落到暴民和黑社會道德深淵的每一種原則的最深刻見解。既然他知道這條規律，那麼他也知道，猶太人在任何地方都不會比在社交圈子裡有更好的機會，即使社交圈子是排外性的，會歧視他們；這些由少數人組成的圈子和羣眾一樣，認為猶太特性即罪，這種「罪」隨時可能轉變為引人注目的「惡」。狄斯累利所展示的異族情調、陌生事物、神秘現象、巫術魔法，及來自神秘源頭的權力，都準確地對準了社會中的這一特性。他對社會遊戲的鑒別能力使他選擇了保守黨(The Conservative Party)，在議會中贏得了一個席位，得到了首相職位，最後還有重要的收穫——社會的長久欽佩和一位女王的友情。

他的成功原因之一是真誠地投入政治遊戲。他給不懷偏見的同時代人留下的印象是他的行為奇怪地混合著「絕對真誠和絕對坦率」。㉝這只有靠真正的天真才能達到，這部分是因為他生自一個排除猶太民族一切具體影響的環境。㉝然而狄斯累利的良知也歸因於他生為一個英國人。英國不知有猶太羣眾，也沒有貧困的猶太人，在猶太人於中世紀遭驅逐之後的幾百年裡，一直接納著他們；十八世紀從葡萄牙到英國定居的猶太人都是富人和受過教育者，直到十九世紀末，俄國造成了現代猶太人外移的計劃，貧困的猶太人才進入倫敦，隨之產生了猶太羣眾與他們的富裕同胞之間的差別。在狄斯累利的時代，歐洲大陸式的猶太人問題尚不存在，因為只有受國家歡迎的猶太人才住在英國。換言之，英國「特例的猶太人」並不像在歐洲大陸的猶太兄弟們那樣意識到自己的例外地位。當狄斯累利嘲笑「人的天然平等問題是有害的現代教條」時，㉝他是在有意追隨柏克的「偏好英國人的權利(rights of Englishman)而非人權(Rights of Man)」，但忽

略了實際情勢，即少數人的特權已取代所有人的權利。他對猶太民族中的實際狀況如此無知，過於相信「猶太人種對現代社羣的影響」，以致坦率地要求猶太人「接受北歐與西歐種族給予的一切榮譽和恩惠，這在文明和高尚的國家裡，應該是那些受到公眾贊賞和增進他們好感的人的命運。」[38]由於英國猶太人的政治影響是圍繞著羅斯希爾德家族在英國的分支而產生的，他爲羅斯希爾德家族協助擊敗了拿破侖而感到非常自豪，但是並不明白自己爲何不能以一個猶太人的身份公開闡說自己的政治觀點。[38]作爲一名受過洗的猶太人，他當然不會是任何猶太社羣的正式代言人，但是他的確是在他的世紀裡，他那種猶太人之中，唯一一個努力盡自己的所知來從政治上代表猶太人的人。

狄斯累利從未否定過「(他的) 基本事實是，他是一個猶太人，」[40]以他對猶太人的無知，他所發現的一切猶太事物都能得到他的讚美。一切新近同化的猶太人的特點就是對這些事物產生一種無知與自豪感混雜的感情，狄斯累利和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區別，他對猶太人的歷史和現狀所知更少，因此凡是別人在恐懼和傲慢支配下猶豫支吾的話，他都敢公開說出來。

狄斯累利靠一個正常人的政治靈感來衡量猶太民族的各種可能性，這種能力會導致嚴重的政治後果；他幾乎自動地製造了一整套關於猶太人的影響和猶太人組織的理論，我們通常在更可惡的反猶主義形式的理論中才會發現這些論點，首先，他確實認爲自己是「上帝特選種族中的特選人」(the chosen man of the chosen race)，[40]他自己的事業生涯就是明證：一個既無名聲又無財富的猶太人，只靠幾名猶太銀行家的幫助，就取得了英國天下第一人的地位；從議會裡的普通議員上升到首相，在那些長期以來「認爲他是騙子，將他當賤民看待」的人中贏得了眞正的名聲。[40]政治上的成功從未使他滿足。被倫敦社會承認要比征服下議院更困難、也更重要：被選爲格列利翁(Grillion)聚餐會俱樂部成員，這當然是一個偉大的勝利——「一個精選的小團體，它慣常造就兩黨政治家中地位上升的明星，但凡遭

到社會反對的人都被嚴格地排除在外」[43]——比當女王陛下的大臣更重要。女王的眞誠友誼更是這些甜蜜的勝利之中令人興奮的、出人意外的高峰，因爲如果說英國的君主政體是在一個嚴格控制的立憲民族國家裡喪失它的大部分政治特權的話，那麼它贏回和保持的是在英國社會裡無可爭議的優先權。在評估狄斯累利的巨大勝利程度時，應該記住羅伯特•塞西爾(Robert Cecil)勛爵——狄斯累利在保守黨內的著名同僚——在1850年前後仍能發起特別嚴厲的攻擊，指出他只是「說出了每一個人在私下裡議論、而在公開場合不便說出的關於狄斯累利的話。」[44]狄斯累利的最大勝利是，人們最終在公開和私下場合都只說使他高興的奉承話。正是唯利是圖和鼓吹特權的政策，才使狄斯累利獲得生來是一個猶太人的眞正獨一無二的名譽的上升。

狄斯累利的幸運部分在於：他總是適應時代，而使無數位寫他傳記的作者對他的理解比對其他大多數偉大人物的理解更全面。他是野心的生動化身，顯示出一個世紀裡發展起來的強力激情似乎不應消失或改變。卡萊爾(Thomas Carlyle)根據十九世紀關於英雄的理想來詮釋整個世界歷史，當他拒絕從狄斯累利手裡接受稱號時，他明顯地錯了。[45]按照卡萊爾的標準，該時代無人可稱爲英雄，除了狄斯累利；按照卡萊爾的概念，一切具體的成就都稱不上偉大；所有的人都不能確切地符合十九世紀晚期關於塵世天才的要求，只有狄斯累利這個騙子認眞扮演角色，表演出「偉大人物」的偉大部分，帶著眞正的天眞，令人無法抗拒地展現異想天開的花樣，八面玲瓏的取悅能力。政治家們卻愛上這個騙子，他將沉悶的事務變成東方色彩的夢想；當整個社會從狄斯累利的精明手腕中感受到邪惡魔法的氣派時，這位「權勢奇才」(potent wizard)實際上已贏得了那個時代的人心。

狄斯累利要使自己有別於其他人的野心，渴望進入貴族社會，這是當

時英國中產階級的典型思想。他加入保守黨，追隨那種永遠「以輝格黨(Whigs)爲敵人，以激進派爲盟友」的政策之原因，既非政治理由，也非經濟動機，而是實現其社會野心的動力。⑯中產階級在歐洲任何一個國家裡都不曾以足夠的自尊使其知識階級與其社會地位協調，因此貴族階級得以在已失去一切政治意義的時候，能繼續決定一個社會位階。痛苦的德國小市民發現他的「內在人格」(innate personality)在和世襲特權的驕傲絕望地掙扎，其起因是貴族的沒落和針對資產階級的金錢而保護貴族頭銜的必要性。模糊的血統論與嚴格控制婚姻在歐洲貴族歷史上還只是相當新近的現象。狄斯累利比德國小市民們更清楚地知道，應該以什麼去迎合貴族階級的需要。資產階級爲達到社會地位而作的一切嘗試，都不能表現出貴族式的驕傲，因爲資產階級依賴的是個人，缺乏階級自負的最重要因素，亦即貴族特權是憑出身而不是憑個人的努力和功績來獲得。「內在人格」無法否認它的發展需要個人經受教育和作出特殊努力。當狄斯累利「召喚起一種種族自豪以對抗階級的自豪」時，⑯他知道，猶太人的地位無論怎麼說，總是取決於出身，而不是依靠成就。

狄斯累利甚至走得更遠。他知道隨著時間一年一年過去，貴族階級不能不看到大批富裕的中產階級人士出錢買貴族頭銜，同時會認眞地懷疑它自己的價值。所以他用相當陳舊但流行的想像去挫折他們，毫無畏懼地描述英國人如何「產生於一個暴發的和混血的種族，而他自己則出身於歐洲最純的血統，」「英國貴族的生活規範是阿拉伯法律和敍利亞風俗，」「猶太女人是天上的王后」或「猶太民族之花現在仍在上帝的右手掌中。」⑯而當他最後寫道「事實上現在英國已經沒有一個貴族階級，因爲動物性的人的最高優點乃是一種貴族本性，」⑯他實際上觸及了現代貴族種族(aristocratic race)理論的弱點，這在後來成爲資產階級與暴發戶的種族觀之起點。

猶太民族的猶太教(Judaism)只在同化了的猶太人中間退化爲一種與

出生有關的簡單事實。起初它只指一種具體的宗教，一個具體的民族，共有的具體記憶和具體的希望，即使在特權猶太人中也是如此，至少指的是共享具體的經濟利益。猶太知識分子的世俗化的和同化改變了自我意識和自我詮釋，使舊有的記憶和希望蕩然無存，只剩下屬於一個上帝特選民族(chosen people)的意識。狄斯累利儘管不是唯一的不信上帝有特選和遺棄、但相信自己是被特選的「特例的猶太人」，但是唯有他才從關於歷史使命的空洞概念中想出了一條成熟的種族理論。他隨時都會斷言說，猶太原則「代表了人類本性中一切精神方面，」「歷史變遷找到了它們的主要答案——一切問題都是種族問題」，這是「歷史的關鍵」，無關「語言和宗教」，當然「只有一種事物造就了種族，那便是血緣」，只有一個貴族階級，那就是「天性貴族」(aristocracy of nature)，它由一個「第一流組織的非混合血緣的種族」構成。[50]

我們無須強調這種理論和更現代的種族意識形態之間的密切關係，而狄斯累利的理論發明又一次證明這些意識形態很能用於抗拒社會自卑感。假如種族理論最終是用於有害而直接的政治目的，那麼，這些理論的說服力大多在於，它讓任何一個人感到自己是一個貴族，他在出生時就已被選定，依靠的是「種族」資格的力量。這些新的特選民不屬於菁英，精選的少數——這畢竟是貴族引爲豪的地方——而是必須和人數日益增多的民眾共享特選(choseness)的資格，這種情況從本質上不會損害種族理論，因爲不屬於特選種族的人在數量上也以同樣比例在增長。

然而，狄斯累利的種族理論像同化了的猶太人的具體世俗化一樣，是他對社會規律的特殊深刻觀察的結果。一般世俗化過程不光使猶太知識分子捲入，它在十九世紀早已失去了啓蒙運動的革命性魅力和對獨立的、自我信賴的人性的信心，因此依然無法防止先前眞正的宗教信仰轉變爲一種迷信。猶太知識分子也受到那些試圖將民族宗教改變爲宗教派別的猶太改革者的影響。爲此，他們不得不改變猶太教中的兩種基本成分——期待救

世主的希望(Messianic hope)和關於以色列人是上帝選民的信念，而且他們還從猶太教祈禱書中刪去了猶太復國的幻想，以及關於在世界末日猶太民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結束種族隔離狀態的虔誠預言。若無期待救世主的希望，關於上帝選民的觀念就意味著永久的隔離；若無關於選民的信念，即指定一個具體的民族擔負起拯救世界的責任，那麼，期待救世主的希望就會在一般的博愛思想與普濟主義中煙消雲散，這變成典型的猶太人的政治熱情。

猶太世俗化中的最重大因素是上帝選民的概念和期待救世主的希望之間的分離，而在猶太宗教中，這兩者是上帝拯救人類計劃的兩個方面。從期待救世主的希望中產生一種走向政治問題最後解決的傾向，目標無非是建立一個塵世樂園。從關於上帝選民的信仰中產生奇異的迷思，連不信特選說的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也都相信，猶太人天生比別的種族更聰明、更好、更健康、更適於生存，是歷史的動力和社會的中堅。猶太知識分子熱情地夢想塵世樂園，確信能夠擺脫一切民族羈絆和偏見，但在事實上比父輩們更遠離了政治現實，上一代人祈求救世主降臨，使猶太人能重返巴勒斯坦。而在另一方面，沒有任何熱忱期待的同化主義者們說服了自己，認爲自己是人類中堅，比起父輩來，他們以塵世想像有效地使自己和國家分離，比父輩因法律的藩籬而隔開更爲有效，一般堅信，法律將猶太人和異教徒分開後，會在救世主降臨時遭毀滅。「特例猶太人」過於「開明」而不相信上帝，並且以在各處的特殊地位爲基礎，迷信自己，「特例猶太人」的想像實際上扯斷了猶太人與人類其他民族之間虔誠希望的有力紐帶。

因此，世俗化最終導致的弔詭對現代猶太人心理具有決定性作用，由此使猶太人的同化——消除民族意識，將民族宗教轉變爲一個懺悔教派，以同樣模稜兩可的手法和心理詭計去應付國家與社會模稜兩可的要求——產生出一種非常眞實的猶太沙文主義，這裡所指的沙文主義是一種扭曲的民族主義，用契斯特頓的話來說，「個人將自己當作崇拜對象；個人成了自己

的理想，甚至成了自己的偶像。」從此以後，舊的宗教觀念中的特選民不再是猶太教的本質：它變成了猶太特性的本質。

這種弔詭最生動有力地體現在狄斯累利身上。他是一個英國的帝國主義者，猶太人中的沙文主義者；但是，人們不難諒解一個只玩弄想像的沙文主義者，因爲畢竟「英國是他想像中的以色列」；❺❶也不難原諒他的英國帝國主義態度，這種態度和一心堅決地爲擴張而擴張的態度大不一樣，因爲他畢竟「從來不是一個完全的英國人，而且對此頗感自豪。」❺❷這一切奇怪的矛盾清楚地表明這位權勢奇才從不認眞地看待自己，一向扮演某個角色，去贏得社會，贏得名聲，增加獨特的魅力，這使他的言辭中注入了一種暴發戶式的熱情和白日夢的成分，使他完全不同於他那些帝國主義政策的追隨者。他很幸運地，能在曼徹斯特體制和商人們都還未有帝國之夢，甚至還在尖銳激烈地反對「殖民主義冒險」時，有其夢想和行動。他迷信血緣和種族——其中混雜著他那種舊式的浪漫主義民間傳說，以爲黃金與血緣之間可以有一種強有力的超民族聯繫——卻不懷疑到非洲、亞洲和歐洲本土上會有可能的屠殺。開始時他以一個並無多少天賦的作家身份出現，後來卻一直作爲一名知識分子，由機遇使之成爲國會議員、黨內領袖、首相，及英國女王的朋友。

早在狄斯累利還是一名單純的作家，還未開始他的政治生涯時，他就有了關於猶太人的政治角色的觀念。所以，他在這方面的一些思想不是實際經驗的結果，而是在他以後的生活中堅定不移地固守而成的。

在他的第一部小說《愛爾羅依》(*Alroy*)(1833)中，他寫到過一個建立猶太帝國的計劃，由猶太人作爲一個嚴格隔離的階級來統治。小說顯示了當時關於猶太人可能掌權的流行幻想，以及年輕的作者對他那個時代實際權力狀況的無知。過了十一年，在國會裡的政治經驗以及和著名人物的交往，教狄斯累利懂得「無論猶太人以往的目標是什麼，在他那個時代，他

們的目標大多不與任何形式的民族政治發生關係。」[53]在小說《康寧斯比》(*Coningsby*)中，他放棄了關於猶太帝國的夢想，但是展示了一種異想天開的計劃，說猶太人的金錢主宰著各個王朝的浮沉，在外交上統制一切。在他的一生中，他從未放棄第二種想法，即上帝特選種族的特選民具有秘密的和神秘的影響，這一想法取代了他早先關於建立一個公開的神秘統治階級的夢想。這成了他的政治哲學的中心。他歆羨猶太銀行家，因爲他們向政府放債，賺取佣金，他以一種外人的不理解目光來看待整個事情，以爲對權力毫無野心的人可以日復一日地操作這種權力可能性。他無法了解的是，一個猶太銀行家會比他的非猶太同行對政治興趣更少；他理所當然地認爲，猶太人的財富是猶太政治的唯一手段。關於猶太銀行家們在商業事務中功能良好的組織及其國際情報信息交流，他了解得越多，就越相信他在對付一個秘密社會，它在人們毫無覺察的情況下已將全世界的命運抓在手中。

眾所周知，關於猶太秘密社會中共有一個陰謀(Jewish conspiracy)的說法，對反猶主義宣傳無疑是最有用的材料，甚至還有流傳全歐洲的傳統迷信說法：猶太人用魔法殺人，投毒下井。最有意思的是，狄斯累利出於完全相反的目的，並在誰也不會認眞想到秘密社會的時候，卻得出了同樣的結論，這淸楚地表明此類編造的謊言在何種程度上起因於社會動機和怨懟，而能夠比起碼的事實更振振有辭地解釋各種事件與政治經濟活動。在狄斯累利的眼中，就像在他之後的許多不如他出名的暴發戶們的眼中一樣，全部政治遊戲都是在秘密社會之間玩弄的。不光是猶太人，其他每一個團體也都一樣，它們的影響不是從政治角度產生的，它們也不和整個社會政治制度對立，凡屬此類者，都被狄斯累利看作是幕後力量。1863 年，他認爲自己目擊了「秘密社會和歐洲百萬富翁們之間的一場鬥爭；羅斯希爾德家族至今仍是贏家。」[54]，而「秘密社會宣稱服從人的天性和取消財產」；[54]直至 1870 年，他仍然很認眞地談論「隱而不見的」力量，而且眞誠地相信

「秘密社會及其國際能力、羅馬教會及其主張和方法、科學與信仰之間的永恆衝突」，有效地決定了人類歷史的進程。[56]

狄斯累利那份令人難以置信的天眞，使他和猶太人中一切這樣的「秘密」力量建立了聯繫。「最初的耶穌會會士(Jesuits)是猶太人；引起西歐警覺的那場神秘的俄羅斯外交是由猶太人組織和以猶太人主導的；一場強有力的革命，此刻正在德國醞釀，將在事實上成爲第二次和更偉大的改革……完全是在猶太人的主持下開展的，」「在每一個(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團體)的領導人中都有猶太人。上帝的信徒與無神論者合作；最善於積聚財產的人與共產黨人結成同盟，上帝特選的種族與歐洲的下層社會攜手！而這一切都因爲他們希望摧毀那麼不知感恩的基督教，它的名稱、它的暴政都使他們無法繼續容忍。」[56]在狄斯累利的想像中，整個世界都變成了猶太人的世界。

在此幻想中，甚至可以預見最坦率的希特勒的宣傳技巧，宣稱猶太資本家與猶太社會主義者之間秘密聯盟。不可否認，整個計劃儘管都是想像和幻想，卻有它自己的邏輯。如果誰像狄斯累利一樣，假設猶太百萬富翁是猶太政治的締造者，如果當眞以爲猶太人幾百年來受侮辱(這確有其事，但是猶太辯護士們的宣傳刻意誇張則更顯愚蠢)，如果見到猶太百萬富翁之子成爲工人運動領袖(這情形很常見)，而又根據經驗知道猶太家庭紐帶是如何緊密，那麼狄斯累利所謂猶太人對基督教各民族的精心報復的說法就不會太牽強。當然，事實上猶太百萬富翁的兒子傾向於左翼運動，恰恰是因爲他們的銀行家父親從未和工人發生過公開的衝突。因此，銀行家們完全缺乏任何一個普通資產階級家庭的兒子理所當然地具有的那種階級意識，而在另一方面，恰恰出於完全相同的原因，工人們並不懷有其他每一個階級確實對猶太人顯示出來的或隱或顯的反猶情緒。明顯地，大多數國家裡的左翼運動爲民族同化提供了唯一眞正的可能性。

狄斯累利堅持喜歡用秘密社會的說法來解釋政治，所根據的經驗後來

使許多歐洲一般知識分子信服。他的基本經驗是，要在英國社會占有一個地位，比在國會裡贏得一個席位還困難得多。他那個時代的英國社會紛呈時髦的俱樂部，它們是沒有政黨之分的。這些俱樂部雖然對於形成政治菁英是十分重要的，卻避開了公共控制。外人必然覺得它們十分神秘。說它們秘密，是因爲並非每一個人都可以加入。只有當其他階級的成員要求加入，或者被拒絕，或者經過無數次意想不到的、明顯不合情理的困難之後才被接納時，才變得很神秘。任何政治榮譽都不能代替與特權者密切連繫能獲得的勝利，這是毫無疑問的。狄斯累利的野心即使在晚年遇到過幾次嚴重的挫折，也並未導致他政治上的失敗，因爲他仍然是「倫敦社會最威風的人物」，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58]

狄斯累利天眞地確信秘密社會的至高無上重要性，他是進入那些新的會社階層的先驅者，他生於社會的範圍之外，從來不能恰當地理解其規則。他們發現，自己身處在社會與政治的界線經常混淆的環境中，儘管表面看來情況很混亂，獲勝的總是狹隘的階級利益。局外人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只有目標明確而又有意識地建立的一種制度，才能獲得如此顯著的結果。事實上，社會遊戲從整體上只需要一種堅定的政治意志，以便將一種介於有意與無意之間的利益遊戲和實質上毫無目標的運作轉變爲某種特定的政策。在法國的德雷富斯事件期間、在德國的希特勒掌權之前十年間所發生的情形大致如此。

然而，狄斯累利不僅是英國社會的局外人，也是猶太社會的局外人。他幾乎不懂得他所佩服至深的那些猶太銀行家的心理，如果他了解到這些「特例的猶太人」儘管被排斥在資產階級社會之外（他們從未眞正考慮進入這個社會），卻共同遵奉一種政治原則，認爲政治活動的中心是保護財產和利潤，那麼他一定會對他們感到失望。狄斯累利所看到的、並且印象很深刻的只是一個沒有外在政治組織的團體，它的成員仍然由似乎無限的家族和商業紐帶聯接著。每當他必須和他們交往，並且發現一切都得到「證實」的

時候，他的想像力就活躍起來——例如，當亨利・奧本海(Henry Oppenheim)提供的消息——他知道埃及的土耳其總督急於出售蘇伊士運河的股份——使英國政府取得運河的股份，而這場買賣又通過列奧納爾・羅斯希爾德(Lionel Rothschild)貸款四百萬英鎊來完成。

總而言之，狄斯累利的種族信念與關於秘密社會的理論都產生於一種想解釋某種看來很神秘的事物的願望，但實際上是一種幻想。他無法從「特例猶太人」的想像中看清政治現實；但是他能夠而且確實做到了將幻想變成羣眾的恐懼，使沉悶的社會從一個十分危險的童話中得到了娛樂。

以一種種族狂熱者的堅持，狄斯累利不屑那些「現代新型的民族感情原則」。㊾他仇視民族國家基礎上的政治平等，並且害怕猶太人在這種條件下的生存。他幻想種族可以從社會和政治角度逃避平等化。由於他對當時貴族的了解遠遠超過他一向對猶太民族的了解，所以毫不奇怪，他只根據貴族階級的等級概念來鑄造種族概念。

這些關於社會上無特權者的概念無疑可能是太過分了，但是，假如這些概念不遇到眞正的政治需要，可用來適應各種政治目的——例如在爭奪非洲的過程中——那麼在歐洲政治中就會顯得毫無意義。資產階級社會願意相信這些概念，這就使狄斯累利成爲十九世紀唯一一個獲得了眞正名聲的猶太人。而說到底，使他獲得天大好運的傾向最終竟引起他那個民族的巨大災難，這並不是他的過錯。

㈢在惡與罪之間

巴黎曾被準確地稱爲「十九世紀世界之都」（沃爾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語）。充滿希望的十九世紀是從法國革命開始的，一百多年來，經歷了反對使公民墮落爲資產者的毫無希望的鬥爭，在德雷富斯事件中降到了最低點，引起緊接著十四年的病態延期。第一次世界大戰仍然可以由具

有雅各賓黨人氣質的克萊孟梭(Georges Clemencean)——法國最後一位大革命之子——領導而獲勝，但是「優秀民族」的輝煌世紀畢竟走到了盡頭，⑩而巴黎失去了政治意義和社會魅力，只留給了各國的前衛知識分子。就在狄斯累利死後，始於爭奪非洲和競爭歐洲的帝國主義控制權的二十世紀，法國只扮演了一個很小的角色。因此，部分由於其他國家的經濟擴張，部分由於內部分裂，所造成的衰落其形式和規律可以說是民族國家固有的。

在某種程度上，法國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發生的一切，三十年或四十年後在歐洲所有的民族國家裡都發生了。除了年代差異之外，魏瑪共和國和奧地利共和國的歷史與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歷史十分相似，德國和奧地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某些政治與社會格局幾乎在有意識地參照法國世紀末的方式。

十九世紀的反猶主義在法國達到了頂峰，它的失敗是因爲仍是國家內部問題，而未觸及當時當地尙未存在的帝國主義潮流。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在德國和奧地利這一類反猶主義的主要特徵重新出現，而它對各自境內的猶太民族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卻幾乎相同，儘管不那麼囂張和極端，並且較多地受到其他各種影響的干擾。⑩

但是，選擇福伯格•聖-吉曼的沙龍作爲猶太人在非猶太社會中所產生的作用的例子，主要原因是這個社團規模之大使其他社團無法望其項背，而且它有忠實的活動記錄。作家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本人有一半猶太血統，急於證實自己是猶太人，他著手追憶「逝水年華」，實際上寫出的作品，正如一位欽佩他的批評家所說的，是一部自我辯護之作(apologia pro vita sua)。這位二十世紀法國最偉大的作家，一生全是在社會中度過的；一切事件在他看來都是社會的反映，卻又通過個人重新思考，因此，反映和再思構成了普魯斯特的世界中的具體現實。⑩貫穿《追憶逝水年華》(*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中的個人及其再思，都是屬於社會的，即使當他隱退到不問世事的孤獨狀態（普魯斯特本人最後也

因決定寫這部巨著而最終匿跡）時也是如此。在孤獨中，他的內在生命不斷地將塵世間發生的一切轉化為內心體驗，使之變成鏡子，折射出眞理的可能外貌。內心體驗的沉思者與社會的旁觀者相像，兩者都不直接和生活溝通，而只觀察反射中的現實。普魯斯特生於社會邊緣，儘管是局外人，但仍屬於它無疑，他將內心體驗擴大到包含一切方面，使它們向一切社會成員顯現，並通過一切社會成員反映出來。

的確，當社會使自身完全從羣眾的關注中得到解脫，當政治本身變成社會生活的一部分時，對這一時期的見證莫過於此了。資產階級價値觀對市民的責任意識的勝利，意味著使政治問題分解為使人眼花繚亂的、令人感興趣的對社會的反應。必須補充的是，普魯斯特本人就是這個社會的眞正代表，因為他與社會的兩種最時髦的「惡」都有關，他這個「猶太教非猶太化(dejudaized Judaism)最偉大的見證人」和「為西方猶太教所作的有史以來最負面的比較」有牽連：❻將猶太人之「惡」與同性戀之「惡」作比較，兩者在它們的反映和個人再思中變得的確非常相像。❻

狄斯累利發現惡只不過是罪在社會中的相應反映。人類的邪惡如果被社會接受，就會從一種有意行為變成一種固有的心理特質，人對此無法選擇或拒絕，它是從外部強加於他並且加以控制，就像藥物控制著有毒癮的人一樣。在將罪同化或改變成惡時，社會否認一切責任，建立起一個宿命的世界，使人在其中無法掙脫羈絆。時髦的社交圈子通常將背離規範視為一種罪的道德主義式判斷，認作是狹隘的和市儈氣的，這種理解如果顯示出自卑的心理，至少也表現出對人類尊嚴的極大尊重。如果罪被理解為一種宿命，那麼每一個人最終都可能會有一種特定的天數。「懲罰是罪人應得的，」但如果（用普魯斯特的話來說）「法官假定並且傾向於寬恕同性戀中的謀設和因種族命運而發生的猶太人的叛國，」那麼罪人就逃脫了應得的懲罰。能躲在濫施的寬容背後，對於殺人和叛國是一樁很誘人的事情，因為它能立即轉變為一種決定，不僅消除了一切事實上的罪犯，而且也消除了

「根據種族出身」注定要犯某些罪的人。此類變化發生於法律與政治機器未脫離社會之時，以使社會標準能夠滲透進社會，變爲政治的和法律的準則。這種表面上將罪與惡等同起來的包容，假如允許它確立自己的法規，就必然會比無論多麼嚴厲的法律都更殘酷、更無人性，因爲法律尊重並承認人對自己的行爲所應負的獨立責任。

但是，正如普魯斯特所描述的，福伯格•聖-吉曼正處於這種發展過程的早期階段。它接受同性戀者，因爲它爲衆人以爲惡的事物所吸引。普魯斯特描寫到德・夏勒斯先生(Monsieur de Charlus)如何原先由於他的個人魅力和顯赫的家庭背景而被寬恕，因而「儘管他有惡」，後來仍然爬到社會頂峯。他不再需要過一種雙重生活，不必躲避那些面目可疑的熟人，反而有勇氣帶領他們到社交場合去。他過去避免的聊天話題——愛情，美人，嫉妒——是爲了避嫌，避免別人懷疑他不正常，但此刻卻受到熱烈歡迎，「本著經驗、奇趣、隱秘的名義，他誇張地細述他所發現的一切。」[65]

猶太人遇到的情況非常相似。特例的個人，即變成貴族的猶太人，在第二帝國的社會中不僅受到寬容，而且受到歡迎，然而此刻猶太人本身已越來越出名了。在這兩種情況下，社會都不會因偏見而再生歧視。他們並不懷疑同性戀「有罪」，或猶太人是「叛徒」；他們僅僅對罪與叛逆改變了態度。當然，新的眼界帶來的麻煩，並他們不再爲性倒錯感到可怕，而是不再爲犯罪感到可怕。他們絲毫不懷疑傳統的判斷。十九世紀最深藏的弊病，可怕的無聊和普遍的厭倦，像膿腫一樣噴發。社會稱之爲棄兒和賤民的人，無論他們過去如何，至少未傳染到厭鬱的心情(ennui)，而且(如果根據普魯斯特的判斷)他們是世紀末的社會裡僅有的仍能產生熱情的人。普魯斯特只須用「人類的愛情能力」爲線索，便引導我們穿過了由社會關係和野心構成的迷宮，在小說中呈現爲德•夏勒斯先生對莫萊(Morel)的倒錯情欲，猶太人斯旺(Swann)對他追求的愛人的忠誠被蹂躪，作者本人對艾伯蒂娜(Albertina)的瘋狂妒忌，而艾伯蒂娜在小說中是邪惡的化身。普魯

斯特清晰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局外人和新來者，即「淫奢之城」(Sodome et Ghomorre)的居民，不僅更富於人性，而且也更正常。

福伯格•聖-吉曼突然發現猶太人和性倒錯者的吸引人之處，暴民們則高喊「殺死猶太人」，兩者之間的區別是，那些沙龍尚未和罪有公開牽連。這意味著，一方面，他們還不想積極參與殺人，另一方面，仍然公開表示厭憎猶太人和害怕性倒錯。這反而導致一種很典型的曖昧情形，即新成員不能公開其身分，然而也不能掩蓋自己的觀點。這種情景引起了暴露與掩蓋、半公開與謊言歪曲、過分謙卑與過分驕橫之類的複雜遊戲，這一切都只起因於猶太人（或同性戀者）打開了非公開沙龍的大門，同時又使自己的地位極不安全。在這種曖昧的情形下，猶太人個人的猶太屬性即刻成了一種人身缺陷，一種神秘的個人特權，兩者都從「種族命運」(racial predestination)繼承而來。

普魯斯特用很長的篇幅描寫了社會如何常常監視著陌生者、怪異者、危險者，最後卻使高尙優雅同凶惡怪異混爲一談，並且隨時準備認可實在的或幻想的凶惡怪異事物，例如「本地演員演出」奇異陌生的「俄國或日本戲劇」；[66]性倒錯者「斑爛衣著、大腹便便、衣鈕緊扣的形象，使人聯想起一盒散發出怪異水果味的奇特可疑人物，一動品嘗念頭便會擾人心緒」；[66]「天才人物」可能造成「超自然的感覺」，周圍的社會「像圍著一張旋轉桌子，探詢永恆世界的秘密」。[66]在這種巫術的氣氛中，一個猶太男子或一個土耳其女人可能會「像通過某種手段而眞實地召喚來的人」一樣出現。[66]

很明顯，那些「特例的猶太人」不可能扮演這種奇異邪惡的角色，將近一百年來，他們作爲「外國暴發戶」被接納、被寬容，「誰也不指望因爲和他們的友誼而感到自豪。」[66]當然，那人不出名的小人物們適應性較強，在被同化的第一階段，他們旣不認同猶太社羣，又不是猶太社羣的代表，因爲認同著名的團體會嚴重地限制社會的想像和期望。那些像斯旺一類的人具有無法言述的社會嗅覺和一般的趣味，所以被接納；而受到更熱誠歡迎

的是那些像布洛赫一樣的人，屬於「不出名的家族，必須支承無數壓力，不僅是基督教的壓力，還有高於他自己的猶太人各個社會等級的壓力，其中每一層都以蔑視來壓垮下一個等級層次。」社會願意接受完全的外人，和它視爲眞正可惡的人，縮短幾代人往上爬的時間，使新來者必須「將自己從一個猶太家族提高到另一個猶太家族來打開自己的道路。」[71]在巴拿馬事件期間，這種情形發生在法國天眞的猶太人在一些德國猶太冒險家具創造性且肆無忌憚的行爲面前退縮之後，並非是偶然的；例外的個人無論有無貴族頭銜，都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急於尋找反猶主義和君主主義沙龍社會，藉以夢想往昔第二帝國的好時光，卻發現自己和那些一向被沙龍社會排斥在外的猶太人屬於同一個種類。如果猶太特質的特例性是社會接納猶太人的理由，那麼，社會寧可選擇那些明顯屬於「一支堅固的隊伍，內部完全一致，和那些觀望他們列隊走過的人完全不一樣」的人，那些人和他們的暴發戶兄弟們不一樣，尙未「達到相同的同化階段」。[72]

儘管本杰明・狄斯累利是由於特殊而被社會接納的猶太人之一，他那種世俗化的自我表現作爲「上帝特選民族中的特選者」，預示並勾勒出一種輪廓，猶太人的自我詮釋都照此進行。如果這種狂熱與粗魯本身不是奇怪地與社會對猶太人的期待相同的話，猶太人就永遠不可能扮演其模糊的角色。當然，他們並非有意識地採納狄斯累利的信念，或者有目的地編造世紀初他們的普魯士先輩膽怯而反常的自我解釋；他們大多欣喜地遺忘全部猶太歷史。但是，只要猶太人在曖昧的社會狀態與西歐、中歐國家的控制下接受教育、世俗化、同化，他們就失去了他們的種族淵源所意味著的、猶太著名人物們以特權和統治的形式感覺到的政治責任的尺度。猶太種族淵源失去了宗教和政治含義，都變成一種心理特質，被變成一種「猶太性格」，從此可以在善或惡的範疇內考量。假如說「猶太性格」不能扭轉爲一種有意思的惡(而不以偏見將它看成罪的)，那麼也可以說，只有那些認爲它是內在的善的猶太人才可能使它逆轉。

被同化的猶太人也被責罵爲疏離猶太教，同化引起的最終災難常被認爲是一種既可怕又無意義的受難，因爲它失去了舊日的殉難價值。這種論點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就原有的信仰方式和生活方式而言，「疏離」在東歐各國同樣明顯。但是出於另一種原因，一般認爲西歐猶太人被「非猶太化」了的想法是誤導的。普魯斯特在作品中描寫的情形同明顯過分地使人感興趣的猶太教正統說法相反，他指出，猶太人的出生事實從未像在同化了的猶太人中間一樣，在私人生活和日常存在中有那樣重大的作用。猶太改革家們將一種民族宗教改變爲一種宗教派別，並將宗教理解爲個人的事情；猶太革命家以世界公民自居，以使自己擺脫猶太民族；受過教育的猶太人，即「在街上是男人，在家裡是猶太人」，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成功地將民族特性轉變爲私人的事情。結果，他們的私人生活、他們的決定和感情，都變成了他們的「猶太特性」的中心。猶太出身越是失去它的宗教、民族和社會經濟的意義，猶太特性就越糾纏；猶太人糾纏於此，就像人糾纏於身體缺陷或優點一樣，沉溺於其中彷彿人沉溺於一種邪惡。

普魯斯特說的「內在氣質」(inner disposition)不是別的，正是這種個人的、私人的內心糾結，它在很大程度上由社會來證實，在這個社會裡，成功和失敗都取決於猶太出身這一事實。普魯斯特誤認它是「種族命運」，因爲他所見到的和描寫的僅僅是它的社會面向和個人的再思考。的確，從他作爲旁觀者的記錄來看，猶太集團的行爲顯示出與性倒錯者的行爲類型同樣的糾結。兩者都感覺到要麼是高超，要麼是卑劣，但在任何情況下都自豪其與眾不同；兩者都感到這種與眾不同是天生的事實；兩者都經常證明，並非他們所爲(what they did)，而是他們所是(what they were)才是正當的；還有，兩者都搖擺於或辯護態度或突然挑戰性地宣稱他們是菁英。他們的社會位置由本性而永久固定，兩者都不能從一個集團轉移到另一個集團。社會的其他成員也有歸屬之需要——「問題不像哈姆雷特那樣，是存在還是不存在，而是歸屬或不歸屬」[73]——但是程度不同。社會分化成

集團，不再讓外人（猶太人或性倒錯者）作爲個人進入小團體，但是由於他們受接納的具體情況，因此總像是體現了那種集團性質(clannishness)。

每一個社會都要求它的成員有一定數量的行動，有顯示和代表的能力，並且按照他們的實際面目行事。當社會分化成集團時，這些要求不再由個人提出，而是由集團的成員提出。因此，行爲不是由個人的能力控制，而由無聲的要求控制，恰如一名演員的表演必須配合其他一切角色。福伯格·聖-吉曼的沙龍就是一些集團的聚合，每一個集團都代表了一種極端的行爲類型。性倒錯者的作用是顯示他們的反常，猶太人的作用是代表邪惡巫術（「召魂術」），藝術家的作用是表現另一種形式的超自然和超人類的接觸，貴族的作用是顯示他們不像普通的（「資產階級的」）人們。正如普魯斯特觀察到的那樣，上述一些集團除了它們的集團性之外，「除了在總災難的日子大多數人圍觀犧牲者，就像猶太人圍觀德雷富斯一樣之外」，這些新來者都避免與他們的同類交往。這裡的原因在於，一切區別的標識只由集團的整體決定，所以猶太人或性倒錯者感到他們會失去在猶太人或性倒錯者的世界裡的明顯性格，在那種世界裡，作爲猶太人或表現同性戀是最自然不過、最平淡無奇，也是世界上最普通的事情。然而，同樣眞實的是，他們也需要對立的集團，讓他可以覺得與眾不同；羨慕貴族的非貴族需要形成集團，就像羨慕猶太人或性倒錯者的人也需要形成集團。

這些集團本身雖無一致性，而且其他集團的成員一旦不再聚集在它們周圍時，它們便會解體，它們的成員使用一種神秘的符號語言，似乎他們需要有某種奇怪的事物，以便用來互相識別。普魯斯特寫到了這種符號的重要性，尤其對於新來者更爲重要。但是，當性倒錯者這些符號語言大師，至少保有一種眞正的秘密時，猶太人使用這種語言只是爲了創造他們預定的神秘氣氛。他們的符號神秘而且奇特地意指某種世人共知的事物：某某親王家裡沙龍的角落坐著另一位猶太人，他不便公開地承認自己的身分，然而，要不是這種無意義的特性，他就永遠不可能爬到那個角落。

值得注意的是，十九世紀末新的混合社會像柏林的第一個猶太沙龍一樣，仍然以貴族爲中心。此刻的貴族社會一如以往，唯獨失去的是它對文化的熱心和對「人類的新人種」的好奇，但是它仍像過去一樣嘲諷資產階級社會。它對政治平等以及失去第三共和國建立時被肯定的政治地位和特權的回應是急於求得社會的劃分。在第二帝國期間短暫人爲的地位上升之後，法國貴族僅靠社會集團性來維持自身，並且不怎麼積極地爲兒子們保留在軍隊裡的較高地位。他們嘲笑攻擊中產階級標準的用心強過其政治野心，這無疑是一切個人和所有尙在屬於不被社會接受的階級的羣體想進入社會時的最強烈動機之一。曾使普魯士貴族在社會上接納演員和猶太人時的動機，同樣在最終導致法國的性倒錯者獲得社會光榮。另一方面，中產階級並未獲得社會自尊，儘管此時他們已在財富和力量兩方面崛起。民族國家內沒有政治階層，而平等權利的勝利造成「社會在外表上更民主的同時，內部的秘密階層化更加嚴重。」㉔既然階層原則(principle of hierarchy)也體現在福伯格•聖-吉曼的成員廣泛的社交圈子，那麼法國的每一個社團「或多或少地複製它的特點，或多或少地模仿福伯格•聖-吉曼的社團，它有時假裝很不屑……，無論其成員地位如何或持何種政治觀點。」貴族社會僅僅在外表上成爲過時的事物；實際上它用強加「時髦的社交生活秘訣和言語方式」來滲透整個社會（而且不僅僅在法國人中間）。㉕當普魯斯特感到需要爲此辯護，並重新考慮在貴族圈子內度過自己的一生時，他對社會所作的分析大致如此。

關於猶太人在這個世紀末的社會裡的角色，要點在於，正是德雷富斯事件的反猶主義才爲猶太人打開了通向社會的大門，而正是這一事件的結束，或者說是由於發現了德雷富斯無罪，才結束了他們的社會榮耀。㉖換言之，無論猶太人如何思考自身或思考德雷富斯事件，只有當社會認爲他們屬於一個叛徒種族時，他們才能扮演社會爲他們指定的角色。當這類叛徒最終被發現只不過是一場誣害的愚蠢的受害者，社會最後認定了猶太人

無罪時，整個社會對猶太人的興趣就像政治上的反猶主義一樣迅速地消失了。猶太人重新被看成普通凡人，落到毫無意義的地步，而假設中猶太人自身的罪惡只不過暫時地使他們出了一回風頭。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與奧地利猶太人在更加嚴酷的環境裡所享受的實質上是同一種社會榮耀。其假設的罪行在當時就是：他們在戰爭問題上有罪，是那種沒有哪一個人的哪一樁行爲必須爲之負責的罪，這件罪行不容置辯，以致暴民們仍然可以認爲猶太特性即罪孽，社會仍可繼續爲其猶太人感到歡欣鼓舞和興趣盎然，直到最後。如果說「代罪羔羊論」確有任何心理眞實性的話，那勢必是這個社會對待猶太人的態度之結果；因爲當反猶主義的立法逼迫社會驅逐猶太人時，那些「猶太迷」(philosemites)們感到似乎他們必須清洗自身隱秘的邪惡，洗去身上的污名，消除神秘的邪惡愛好。這種心理無疑很難解釋爲何「羨慕」猶太人的人最後變成殺害猶太人的凶手，儘管眞正的劊子手在所謂受過教育的階級中的人數比例令人吃驚，但是值得懷疑的是，他們在主宰「死亡工廠」的人中是否舉足輕重。但是這一點恰恰可以解釋那些社會階層令人無法置信的背叛行爲，他們曾經是猶太人最親密的朋友，猶太朋友們曾經最使他們感到高興和受到吸引。

對猶太人而言，將所謂猶太教的「罪」轉化爲所謂猶太人的「惡」，這種流行觀點實際上極其危險。猶太人可以脫離猶太教逃到改宗的路，但是身爲猶太人這一點是無法逃避的。再者，一樁罪行面臨的不過是懲罰，而一種惡只能面臨滅絕。在社會生活的範圍內，社會對於猶太出身和猶太人的角色所作的解釋直接關聯到反猶主義手段可能達到的徹底災難。納粹的反猶主義的根源便在這種社會條件和政治環境。雖然種族觀念具有其他一些更直接的政治目的和作用，但是它從最有害的方面應用於猶太問題時，其成功大多歸因於眞正地構成輿論贊同的社會現象和社會信念。

猶太人命中注定走向歷史事件的風暴中心，決定性的力量無疑地是政

治力量；但是社會對反猶主義的反應以及個人對猶太問題的心理反應，卻同時對猶太血統的每一個個人的殘暴與有組織、有計劃的侵害有關，在德雷富斯事件中的反猶主義早已顯示出這種特點。若認爲反猶主義的歷史本身只是一場純粹的政治運動，就無法理解這種由激情驅使的追殺「一般猶太人」，「無處不在而又無處可見的猶太人」。各種社會因素未被政治歷史或經濟歷史所解釋潛藏在事件的表面之下，歷史學家從未觀察到，只有詩人或小說家才以更深刻的激情力量將它們記錄下來（詩人和小說家是被社會驅逐到絕望的孤獨中的人），這些社會因素改變了政治上反猶主義可能會獨自採取的路線，這可能會導致反猶立法，甚至大規模驅逐，但不至於從總體上採取滅絕手段。

自從德雷富斯事件發生，以及它對法國猶太人權利的政治威脅產生了一種使猶太人享受歧義榮耀的社會情勢之後，歐洲反猶主義顯示出一種由各種難以相互融合的政治動機和社會因素組成的混合狀態。社會總是以明顯地偏向猶太人的態度首先對一場強大的反猶主義運動作出反應，因此德雷富斯的話在危險的時刻尤顯眞實：「此刻沒有別的種族問題……更能像猶太人問題一樣使歐洲興高采烈、興趣盎然、振奮人心和顯得高貴。」社會上的「猶太迷」們總是最後使政治反猶主義帶上神秘的瘋狂色彩，捨此反猶主義則不能變成組織羣眾的最佳口號。資本主義社會中一切無階級地位者(déclassé)到末了都隨時準備聯合起來建立自己的暴民組織；他們的宣傳及其吸引人之處在於：假定一個社會顯示出它願意將以惡的形式表現的罪結合進它的結構，此時就一定很容易用公開接納罪犯和公開犯罪的方式來澄淸自己。

註釋

❶在歐洲各國的單一種族居民之中，猶太人比其他羣體顯突，但是在美國，這種情形不會造成他們比其他羣體更受歧視的威脅。事實上直到現在，在美國的各種種族中間，就性質和歷史狀況而言，最不平等的不是猶太人，而是黑人，對黑人的社會和經濟歧視造成了美國的負擔。

但是，只要從這種純粹的社會歧視中產生一場政治運動，上述情形就會改觀。那麼，出於一種非常簡單的原因，即唯有猶太人在所有各民族羣體中間根據自身的歷史和宗教表達出一種人所共知的隔離原則，就完全有可能突然變成仇恨的主要目標。黑人和華人的情形就兩樣了，即使他們比猶太人更加有別於大多數人，但在政治上，他們也較少處於危險之中。

❷自由派新教神學家保勒斯在一本很有價值的論文《猶太民族起源、發展及轉變之後的隔離》(1831)中作了令人驚異地相像的分析。保勒斯受到當時猶太作家們的很多攻擊，他鼓吹在同化基礎上逐漸一個個地解放猶太人。

❸威廉·馮·洪堡德的「專家意見」(1809) 表達了這種態度：「國家不應只是教人尊重猶太人，而應放棄非人性的、歧視人的思維方式。……」見伊斯瑪爾·弗倫德(Ismar Freund)，《普魯士的解放猶太人》(*Die Emancipation der Juden in Preussen*) (柏林，1912)，第 2 卷，270 頁。

❹赫爾德，〈論猶太人的政治皈依〉(Über die politische Bekehrung der Juden)，見《百年紀念》(*Adrastea und das 18. Jahrhundert*) (1801-1803)。

❺赫爾德，《提升人性書簡》(*Briefe zur Beförderung der Humanität*) (1793—1797)，見《書信集》，40 頁。

❻費利克斯·普利巴奇，〈十七和十八世紀君主專制政體的猶太政策〉(1915)。

❼萊辛本人並無這種幻想。他給門德爾森的最後一封信最清楚地表達了他的希望：「走向一個既無基督徒又無猶太人的歐洲國家的最簡捷安全之路。」萊辛對猶太人的態度可見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萊辛傳》(*Die Lessing-legende*) (1906)。

❽見米哈波，《論門德爾森》(*Sur Moses Mendelssohn*)，倫敦，1788。

❽赫爾德，《論猶太人的政治皈依》。

❽歌德評伊薩卡・福肯森・伯爾(Isachar Falkensohn Behr)《一個波蘭猶太人的詩》(*Gedichte eines polnischen Juden*)(1772)的文章，載《法蘭克福學者通報》(*Frankfurter Gelehrte Anzeigen*)。

❽見施萊爾馬赫，《論政治宗教使命與猶太長老公開性》(*Briefe bei Gelegenheit der politisch theologischen Aufgabe und des Sendschreibens jüdischer Hausväter*)(1799)，見其作品集(1846)，第1部，第5卷，34頁。

❽但這不適用於莫西斯・門德爾森，他幾乎不知道赫爾德、歌德、施萊爾馬赫以及年輕一輩學者的思想。他以獨到的思想而受尊敬。他恪守自己的猶太宗教，這使他不可能完全脫離猶太民族，他的後繼者卻理所當然地這樣做了。他感到自己是「一個受壓迫民族的成員，必須懇求國家統治者的善心與保護。」(見他致拉伐特〔Lavater〕1770的信，載《著作總集》〔*Gesammelte Schriften*〕，第7卷，柏林，1930)。也就是說，他一向知道，他個人的特殊名聲伴隨著對他的民族的特殊蔑視。既然他與下一代猶太人不同，他不願蔑視他的民族，所以他並不認爲自己是一名特例的猶太人。

❽萊辛形容普魯士是「歐洲最具奴役性的國家」，門德爾森說這個國家有「有史以來統治人類的最明智的君主之一，使國家藝術與科學繁榮昌盛，造成普遍的思想自由，甚至仁慈地施予領土上最低層的居民。」假如明白「最明智的君主」使這位猶太哲學家很難獲准僑居柏林，當他的「金錢猶太人」享受一切特權時，卻並不允准他「受保護的猶太人」擁有正常地位，那麼門德爾森這種卑順的滿足就既令人感動、又令人奇怪了。他甚至也意識到，他作爲一切受過教育的德國人的朋友，假如他決定去萊比錫拜訪他的朋友拉伐特，他就會被徵收和一條牽到市場上去的牛一樣的稅，但是關於這種條件的改善，他並未從政治角度作過任何結論。(參見前引《致拉伐特信》，以及他所譯麥那賽・本・伊斯拉爾〔Menasseh Ben Israel〕著作的譯者前言，載《著作總集》，第3卷，萊比錫，1843-1845)。

❽見海因利希・西爾伯格萊特(Heinrich Silbergleit)《德意志帝國猶太居民人口

與職業情況》(*Die Bevölkerungs- und Berufsverhältnisse der Juden im Deutschen Reich*),第 1 卷,柏林,1930。

⑮格拉登納(C. W. F. Grattenauer)那本廣泛傳閱的小冊子《反對猶太人》(*Wider die Juden*)(1802)之前還有另一本寫於 1791 年的《論今日猶太人的生理與道德狀態》(*Über die physische und moralische Verfassung der heutigen Juden*),已經指出了柏林猶太人日益增長的影響,儘管在《全德國圖書年鑑》(*Allgemeine Deutsche Bibliothek*)1792 年第 112 卷有過介紹,但是後來幾乎無人讀它。

⑮克萊孟斯·布倫塔諾的《菲利斯丁史》(*Der Philister vor, in und nach der Geschichte*)是爲在所謂「基督教德國聚餐會」(Christlich-Deutsche Tischgesellschaft)上朗讀而寫的,這個著名俱樂部由作家和愛國者組成,1808 年爲反對拿破侖而創建。

⑮因此羅斯希爾德家族在 1820 年中止了對他們在法蘭克福的同胞社團的大筆捐款,以抵制改革者的影響力,改革者要求猶太兒童接受普遍教育。見伊薩克·馬庫斯·約斯特(Isaak Markus Jost),《以色列人的革新史》(*Neue Geschichte der Israeliten*)(1846),第 10 卷,102 頁。

⑮見前引書,第 9 卷,38 頁。宮廷猶太人以及追隨他們腳印的猶太銀行家們絕不想離開猶太社羣。在當局面前,他們充當猶太社團的代表和保護者;他們頻繁地獲准對社團擁有正式權力,實行遙控管制,致使猶太社團舊有的自治在它被民族國家取消之前,早就從內部被破壞和摧毀了。第一個在自己「國家」裡成爲宮廷金融猶太人的是一位布拉格猶太人,是十六世紀薩克森選帝候莫里斯(Maurice)的物資供應商。他要求全部猶太教士和社羣領袖須選自他的家族成員。(見邦迪—德沃斯基〔Bondy-Dworsky〕,《波希米亞、梅倫、施萊西安的猶太人史》〔*Geschichte der Juden in Boehmen, Maehren und Schlesien*〕,布拉格,1906,第 2 卷,727 頁。)以宮廷猶太人爲他們社羣的命令者的作法在十八世紀變得很普遍,引起十九世紀「猶太著名人物」統治。

⑮見約翰·雅考伯·舒特(Johoann Jacob Schudt),《奇特的猶太人》(*Jüdische*

Merkwürdigkeiten)，美茵河畔法蘭克福，1715-1717，第 4 卷，48 節。

⑳塞爾瑪·斯特恩(Selma Stern)，《蘇伊士猶太人》(*Jud Suess*)（柏林，1929），18 頁。

㉑舒特，前引書，第 1 卷，19 頁。

⑳克里斯蒂昂·弗里德里希·魯埃斯(Christian Friedrich Ruehs)將全體猶太人定義爲「商人階級」(caste of merchants)。見〈論猶太人的要求與德國公民權利〉（Über die Ansprüche der Juden an das deutsche Bürgerrecht），載於《近代歷史期刊》（*Zeitschrift für die Neueste Geschichte*），1815。

⑳有一個鮮爲人知的明顯事實，即同化過程往往導致改變信仰而不是不同宗教信仰通婚。很不幸，統計數字不是揭示而是掩蓋這一事實，因爲改宗者和非改宗者之間的一切聯姻都被認爲是通婚。但是我們明白，在德國有許多家庭，幾代人受洗禮，但仍然是純種的猶太人。事實證明，改宗的猶太人很少離開家族，至於離開猶太人的總體環境者就更少了。在任何方面，都證明猶太人的家庭比猶太人的宗教更是一種保守的力量。

⑳《巴黎書簡》，第 74 封信，1832 年 2 月。

⑳同上，第 72 封信。

⑳「具有意識的賤民」(conscious pariah)（伯納德·拉查爾〔Bernard Lazare〕語）是自身造成的唯一反叛的傳統，儘管屬於這一傳統的人幾乎不意識到它的存在。見本書作者的〈作爲賤民的猶太人：一種隱秘的傳統〉（The Jew as Pariah: A Hidden Tradition）（1944），載《猶太社會研究》，第 6 卷，第 2 號。

⑳不無諷刺意味的是，這個出色的說法可以用作西歐同化的格言，此話係一俄羅斯猶太人所創，最初以希伯萊文發表。語出裘達·萊伯·戈登(Judah Leib Gordon)1863 年的詩，"Hakitzah ami"，參見德伯瑙(S. M. Dubnow)，《俄國與波蘭猶太人歷史》（*History of the Jews in Russia and Poland*）（1918），第 2 卷，228 頁。

㉘這條說法是卡爾·克勞斯於 1912 年前後提出的。見《黑色魔法中世界的衰亡》

(*Untergang der Welt durch schwarze Magie*) (1925)。

㉙題目取自約翰・斯克雷頓(John Skleton)爵士於1867年對狄斯累利的一篇速寫文章，見莫尼潘尼(W. F. Monypenny)和伯克爾(G. E. Buckle)所著《比肯斯菲爾德伯爵本杰明・狄斯累利傳》(*The 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 Earle of Beaconsfield*)，紐約，1929，第2卷。

㉚莫里斯・拉查隆(Morris S. Lazaron)，《亞伯拉罕的種子》(*Seed of Abraham*)，紐約，1930，〈本杰明・狄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260頁。

㉙賀拉斯・塞繆爾(Horace B. Samuel)，〈狄斯累利的心理〉(The Psychology of Disraeli)，載於《現代性》(*Modernities*)，1914。

㉙弗勞德(J. A. Froude)在他的《比肯斯菲爾德勛爵傳》(*Lord Beaconsfield*)(1890)的結尾處寫道:「他從一開始起就設定的終生目標,使自己高出於一切同時代人，甚至顯示出一種野心，而最終贏得了這場他勇敢投下的賭注。」

㉙約翰・斯克爾頓爵士，前引書。

㉞見狄斯累利所著的小說《唐克雷德》(*Tancred*)(1847)。

㉙見約翰・斯克雷頓，前引書。

㉙狄斯累利自己說過:「我不是在自己的種族中長大的，我受的教育是對他們懷有極大的偏見。」關於他的家庭背景，可參見約瑟夫・卡羅(Joseph Caro)〈本杰明・狄斯累利、猶太人和猶太教〉(Benjamin Disraeli, Juden und Judentum)，載《猶太教歷史學月刊》(*Monatsschrift für Geschichte und 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1932，第76年度合刊。

㉙《喬治・班廷克勛爵政治傳記》(*Lord George Bentinck: A Political Biography*)(倫敦，1852)，496頁。

㉙同上，491頁。

㉙同上，497頁。

㊵莫尼潘尼與伯克爾，前引書，1507頁。

㊵賀拉斯・塞繆爾，前引書。

㉙莫尼潘尼和伯克爾，前引書，147頁。

[43]同上。

[44]羅伯特‧塞西爾的文章刊載托利黨(Tories)最權威的刊物《評論季刊》(*Quarterly Review*)。見莫尼潘尼和伯克爾，前引書，19-22 頁。

[45]這件事發生於 1874 年。據說卡萊爾稱狄斯累利是「一個該死的猶太人」，「有史以來最壞的人」。見前引卡羅著作。

[46]見薩利斯伯里(Salisbury)勛爵在《評論季刊》上的文章，1869 年。

[47]雷蒙(E. T. Raymond)，《外族愛國者狄斯累利》(*Disraeli, The Alien Patriot*)(倫敦，1925)，1 頁。

[48]見塞繆爾，前引書，狄斯累利的《唐克雷德》，喬治‧班廷克勛爵的著作。

[49]見他的小說《康寧斯比》(1844)。

[50]參見喬治‧班廷克的著作，以及《恩底米翁》(Endymion)(1881)和《康寧斯比》等小說。

[51]約翰‧斯克雷頓，前引書。

[52]賀拉斯‧塞繆爾，前引書。

[53]莫尼潘尼和伯克爾，前引書，882 頁。

[54]同前，73 頁，1863 年 7 月 21 日致威廉斯(Brydges Williams)夫人的信。

[55]見喬治‧班廷克勛爵，前引書，479 頁。

[56]見他的小說《洛賽爾》(*Lothair*)(1870)。

[57]喬治‧班廷克勛爵，前引書。

[58]莫尼潘尼與伯克爾，前引書，1470 頁。這部出色的傳記正確地評價了狄斯累利的勝利。在引用但尼遜(Tennyson)《紀念》(*In Memoriam*)第 64 詩章之後，作者評述道：「狄斯累利有一個方面的勝利比但尼遜詩行裡所說的更多、更吸引人；他不僅爬到政治梯階的最高層，『在王者耳旁私語』；他還征服了社會。他主宰著餐桌，主宰著倫敦貴族沙龍……而他在社會上的成功，無論哲學家們如何評定其內在價值，作爲一個受排斥的外人，當然不會比他取得政治上的成功更輕鬆，在他自己的評判中，或許在社會上的成功更顯得甜蜜」。(1506 頁)

[59]同上，第 1 卷，第 3 部。

[60]于凡・西蒙(Yves Simon),《法蘭西共和國的巨大危機》(*La Grande Grise de la Rēpublique Française*)(蒙特利爾, 1941), 20頁:「法國革命的精神在拿破侖戰敗後一百多年仍能存活。……它勝利過, 但在1918年10月11日之前默默無聞。法國革命的日期應該定在1789到1918年。」

[60]德國與奧地利猶太人的某些心理現象並不很明顯, 這也許部分地歸因於這兩個國家的猶太知識分子堅持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緣故。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十年(甚至在它的前十年)裡的猶太復國主義的力量來源並非是政治洞察力(並且也不產生政治信念), 而是它對心理反應和社會事實的批判分析。他的影響主要在其鼓勵力, 遠遠超出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小圈子。

[60]可比較列維那斯(E. Levinas),〈普魯斯特中的他者〉(L'Autre dans Proust)(1947)一文中就這一主題作的有趣評論, 刊於Deucalion第2期。

[60]范・普拉格(J. E. van Praag),〈馬塞爾・普魯斯特: 猶太教非猶太化的見證人〉(Marcel Proust: Tēmoin du Judaisme dējudaizē)刊於《日內瓦猶太人評論》(*Revue Juive de Genève*)(1937)。

講述猶太人問題的電影《交叉火力》(*Crossfire*)中有著奇怪的巧合(抑或不止是巧合?)。故事取材於理查德・布魯克斯(Richard Brook)的《磚石掩體》(*The Brick Foxhole*),《交叉火力》故事中那個被殺死的猶太人是一個同性戀者。

[64]以下尤請參見《平原城市》(*Cities of the Plain*), 第1部, 20-45頁。

[60]《平原城市》第2部, 第3章。

[60]同上。

[60]同上。

[60]同上。

[60]同上。

[60]《格蒙台之路》(*The Guermantes Way*), 第1部, 第1章。

[60]《在含苞的樹叢裡》(*Within a Budding Grove*), 第2部:〈地名: 地方〉(Placenames: The Place)。

(72)同上。

(72)《平原城市》，第 2 部，第 3 章。

(74)《格蒙台之路》，第 2 部，第 2 章。

(72)哈蒙·費爾南代(Ramon Fernandez)，〈馬塞爾·普魯斯特著作中的社會生活〉(La vie sociale dans l'œuvre de Marcel Proust)，載《普魯斯特筆記》(*Les Cahiers Marcel Proust*)，第 2 期，1927 年。

(76)「但正是從德雷富斯事件中產生反猶主義之時，以色列人也正浩大地滲入社會的活動。政治家們並未想錯：一旦有法律錯誤，就會給反猶主義予致命打擊。但是可以假定，社會的反猶活動至少可以從相反方面得到加強和深化。」見《揭穿可愛的騙局》(*The Sweet Cheat Gone*)，第 2 章。

第四章
德雷富斯事件

(一)案件事實

事情發生在法國，時間是 1894 年底。阿爾弗雷德・德雷富斯(Alfred Dreyfus)是法國軍隊總參謀部的一名猶太軍官，他被指控爲德國間諜。法庭一致判決將他終身流放魔鬼島。審判是秘密進行的。在據說大量的起訴檔案中，只出示了一件所謂的「清單」。其實這是一封信，說是德雷富斯的手跡，此信寫給德國大使館武官斯瓦茲柯本(Max von Schwartzkoppen) 1895 年 7 月，皮卡特(Georges Picquart)上校出任參謀總部情報局長。1896 年 5 月，他告訴總參謀長布瓦斯德弗雷(Charles le Mouton de Boisdeffre)說，他本人相信德雷富斯無罪，犯罪的是另一名軍官沃爾桑-埃斯特拉齊(Ferdinand Walsin-Esterhazy)少校。六個月後，皮卡特調任突尼斯的一個危險防地。與此同時，伯納德・拉查爾代表德雷富斯的兄弟們出版了關於這一事件的第一本小冊子《一個司法錯誤：德雷富斯事件眞相》(*Une Erreur judiciaire; la vérité sur l'affaire Dreyfus*)。1897 年 6 月，皮卡特將審判細節與德雷富斯無罪的眞情通知參議院副議長修雷爾-凱斯納(Auguste Scheurer-Kestner)。1897 年 11 月，克列孟梭開始爲重審此案而奮鬥。四個星期之後，左拉(Emile Zola)加入了爲德雷富斯辯護的一派。他的《我控訴》(*J'Accuse*)一文於 1898 年 1 月發表在克列孟梭掌握的報紙上。與此同時，皮卡特被捕。左拉以誹謗軍隊罪而遭審訊，並受到普通法庭和上訴法院的判決。1898 年 8 月，埃斯特拉齊由於侵吞錢財而很

不光彩地退役。他立即去告訴一名英國新聞記者說，那份「清單」的作者是他，而不是德雷富斯，那封信是他根據他的上司、前任反情報局局長桑代爾(Jean-Conrad Sandherr)上校的命令模仿德雷富斯的筆跡而寫的。幾天以後，同一機構中的另一名成員昂利(Joseph Henry)上校坦白說，德雷富斯秘密檔案裡的另外幾份文件也是僞造的，隨即他就自殺了。於是，上訴法院下令調查德雷富斯案件。

1899 年 6 月，上訴法院取消了 1894 年對德雷富斯的原判。8 月，在赫內(Rennes)重新開庭審理此案。判決改爲監禁十年，理由是「情況緩和了」。一個星期後，共和國總統宣布赦免德雷富斯。1900 年 4 月，世界博覽會在巴黎開幕。5 月，當博覽會成功在望時，下議院以壓倒多數投票反對進一步重審德雷富斯案件。同年 12 月，與事件相關的一切審判與訴訟資料檔案悉數銷毀。

1903 年，德雷富斯要求再次重審。直到 1906 年，克列孟梭當上總理之後，申訴才被受理。1906 年 7 月，上訴法院撤消了在赫內的判決，宣布對德雷富斯的一切指控無效。然而上訴法院無赦免的權力，它必須下令重審。在軍事法庭審理之前的重審完全有可能不顧對德雷富斯有利的大量證據而導致一次新的定罪。因此，根據法律，絕不可能宣判德雷富斯無罪，❶而此案未眞正解決。法國民眾從未承認對於被指控者的昭雪，原先被激起的情緒也未完全平息，直到 1908 年，即總統赦免令發布後九年、德雷富斯罪名洗清後二年，在克列孟梭的堅持之下，埃米爾・左拉的遺體遷葬至龐蒂昂(Pantheon)時，阿爾弗雷德・德雷富斯在街上受到公開襲擊。巴黎的一家法院爲襲擊他的人開脫，並且指出這件事起因於對爲德雷富斯昭雪的決定「持有異議」。

更奇怪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未能使人忘卻這一事件。1924 年，「法蘭西行動」(The Action Française)組織下令重新出版《德雷富斯事件摘要》(*Précis de L'Affaire Dreyfus*)，❷自此以後，它

就成了反德雷富斯派(Anti-Dreyfusads)的標準參考手冊。1931 年,在戲劇《德雷富斯事件》首次上演(此劇本作者是雷費希和威廉·赫索格〔Rehfisch and Wilhelm Herzog〕,筆名雷納·凱斯納〔René Kestner〕)時,仍然迷漫著九十年代的氣氛,大廳裡的爭吵,劇場正廳前座有人扔惡臭炸彈,「法蘭西行動」組織的突擊隊布滿四周,恐嚇演員、觀眾和旁觀者。拉伐爾(Pierre Laval)政府所做的一切也無非是三十年前法國政府所做的:它樂於承認無法保證哪一場演出不受騷擾,因此為反德雷富斯派取得新勝利提供了方便。戲被迫停演。當德雷富斯於 1935 年去世時,一般新聞界甚至不敢觸及這件事,❸只有左派報紙舊調重調闡說德雷富斯無罪,右翼報紙仍說他有罪。直至如今,德雷富斯事件在法國政治中仍是一塊試金石,儘管程度不如從前。在譴責貝當(Henri Philippe Pétain)時,著名的地方報紙《北方之聲》(*Voix du Nord*)(在里葉〔Lille〕出版)將貝當案件與德雷富斯案件相提並論,堅持認為「國家在德雷富斯案件發生之後一直處於分裂狀態」,因為法庭判絕不能解決政治衝突,不能「給法國所有的人帶來思想和心靈和平」。❹

德雷富斯事件在較大的政治範圍內屬於二十世紀,而德雷富斯案件,即對猶太人阿爾弗雷德·德雷富斯上尉的歷次審判,卻十分典型地屬於十九世紀,那時人們熱心遵循法律程序,因為每一案例都須經得起十九世紀最偉大的成就——法律的完整與不可分割性——的考驗。這一時代的特點是,司法錯誤會引起政治激動,無休無止的審判和重審,更不用說決鬥和互毆了。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信條仍然深深地扎根於文明世界的良知中,以致一次司法錯誤便會引起從莫斯科到紐約的公眾憤怒。除了在法國,誰也不會「現代」到將事情同政治問題聯繫起來。❺法國傷害了一個猶太軍官,能夠引起全世界一致的劇烈反應,而下一代人對德國屠殺猶太人的反應則差得多了。甚至連沙皇俄國都指責法國太野蠻,而在德國,皇帝的親近人士也公開表示憤慨,此情形只有三十年代的激進派報紙才可相媲美。❻

這個案件的當事人好像出自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的小說一樣：一方面，具有階級意識的將軍們拼命掩護自己集團中的成員，另一方面，他們的對手皮卡特以冷靜透徹的眼光和略帶譏諷的誠實態度來對抗他們。在他們之外，站著一羣無法描述其面貌的國會議員，每一個人都悚懼於鄰人可能知道他的內心；共和國總統這位巴黎妓院臭名昭著的保護人和專事視察的行政首腦，只爲了社交接觸才活著。還有德雷富斯本人，實際上是一名暴發戶，他不斷地向同僚吹噓家中有多少財富可供他在女人身上開銷；他的兄弟們爲了使他獲得釋放，起初傷感地表示願意付出全部家產，後來卻減少到十五萬法郎，他們一直拿不定主意，究竟是犧牲全部財產，還是只收買總參謀部；律師德曼吉(Edgar Démange)確實相信德雷富斯是無辜的，但是他的辯護詞只圍繞著有疑點的問題，唯恐自己受到攻擊，或傷及他的利益。最後還有那位冒險家埃斯特拉齊，他出身於古老的貴族家庭，完全厭倦於這個資產階級世界，想從英雄行爲或無賴行徑中尋求解脫。這位前駐外國軍團中的少尉在同僚中間以大膽和厚顏無恥而出名。他以充當向猶太軍官挑釁的決鬥者副手，和詐騙猶太人的錢財爲生。當然，爲了獲得猶太主教士的一封介紹信，他寧願替他效勞。即使在他最終垮台時，他仍然保持著巴爾扎克小說中描述的那種傳統。既不叛國，也不幻想有十萬名普魯士槍騎兵在鬧宴上喝醉酒後狂野地衝進巴黎，❼而是侵吞了一位親戚的一筆小小的現金，將自己送上毀滅之路。還有，我們亦不知如何評價左拉，他充滿道德熱忱，略帶空虛的哀憐，戲劇性的宣言，在他逃去倫敦的前夕，是他聽到德雷富斯的聲音在乞求他作出這種犧牲麼？❽

這一切都典型地屬於十九世紀，本身很難延續到兩次世界大戰。民眾對埃斯特拉齊懷有舊時代的熱情，就像他們仇恨左拉一樣，早已消失在汪洋大海，但是那種激烈地反對貴族和教士的情緒曾激發了饒勒斯(Jean Jaurès)的熱情，並保障了德雷富斯最後獲釋。正如卡古拉德事件(Cagoulard affair)顯示的那樣，總參謀部的軍官們在陰謀策劃一場政變

時，不再忌憚民眾的憤怒。法國自從教會與國家分離之後，雖然不再用宗教來思考問題，卻也失去了大部分反宗教情緒，正如天主教會也從自身失去了政治靈感一樣。貝當嘗試將法蘭西共和國改爲天主教國家，但是民眾極度冷漠，而下層教士們也敵視其宗教法西斯主義的傾向，因而使他的計劃受阻。

德雷富斯事件的政治意義之所以能延續，是因爲其中有兩種因素在二十世紀變得越來越重要。第一是對猶太人的仇恨；第二是對共和國本身、對議會、對國家機器的懷疑。公眾的大部分仍然會想到後一點，無論正確與否，都是受到了猶太人和銀行力量的影響。直到我們當今時代，「反德雷富斯派」這個詞仍可用作識別一切反共和主義、反民主、反猶主義的名稱。幾年前，它仍包含眾多意義，例如「法蘭西行動」組織的專制主義，道利奧特的國家布爾什維克主義，德亞特(Marcel Déat)的社會法西斯主義。但是，第三共和國的垮台不是因爲這些人數很少的法西斯主義團體的緣故。相反，雖然有些弔詭，但在第三共和國垮台時，反倒是這些法西斯主義團體影響甚微之時。使法國沒落的事實是它並沒有眞正的「德雷富斯派」，無人相信在共和國裡還能維護和實現民主、自由、平等和正義。❾最後，共和國像熟透的水果一樣落進了舊日反德雷富斯派集團❿（這個集團歷來構成共和國軍隊的核心）的口袋。此時法國很少有敵人，但也幾乎沒有朋友。貝當集團也不是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產物，這一點在它盲目堅持四十年前的舊政治方案上就可以淸楚地看到。

當德國精明地通過邊界線破壞了法國的整個經濟時，法國維希政府的領導人還在修補過去巴黑(Maurice　Barrès)主張的「自治省」(autonomous provinces)，弄得法國更加殘破不堪。他們比任何傀儡政府都更積極迅速地引進了反猶主義立法，並且一向吹噓無需從德國進口反猶主義，他們統治猶太人的法律要點與德意志帝國的法律不同。❿他們鼓動天主教教士反對猶太人，這只證明了教士們不僅失去了政治影響力，而且事實上也

不是反猶分子。相反，正是維希政府想再次拉進政權機構的這些主教們，對屠殺猶太人一事表示了最強烈的抗議。

不是德雷富斯案件及其審判，而是整個德雷富斯事件向二十世紀提供了一線光明。正如伯爾那諾於 1931 年所指出的⑫：「德雷富斯事件已經屬於那個悲劇時代，這個時代當然不會因上一次世界大戰而告結束。這個事件揭示了相同的非人性特點，在肆無忌憚的激情和仇恨的火焰折騰之中，留下了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冷漠心靈和鐵石心腸。」當然，這一事件的眞正後果並非是在法國才見到，然而，法國爲何在納粹入侵時如此輕易地成了犧牲品，其中的原因不難找到。希特勒的宣傳語言是法國人熟悉已久而且絕不會輕易忘記的。「法蘭西行動」組織的「凱撒主義」(Caesarism)⑬和巴黑與莫哈(Charles Maurras)的虛無民族主義(nihilistic nationalism)從未以它們的本來形式成功過，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都是負面的。它們缺乏社會遠見，也不會用大眾化的語言闡述他們在嘲弄理智時產生的那些精神上變幻不定的想像。

我們在此論述的主要是德雷富斯事件的政治面，而不是案件的法律面。其中明顯地勾勒的是一系列二十世紀的典型跡象。它們在本世界最初幾十年裡模糊難辨，最後大白於天下，顯現出它們屬於現代社會歷史的主流。經過三十年輕度的純粹社會形式的反猶主義種族歧視，很難還記得「猶太人該死」的呼聲在一個現代國家裡上上下下到處引起迴聲，而這個國家曾經一度將國內政策集中在反猶主義的問題上。三十年來，關於一個世界性密謀的舊傳說只不過是小報的花邊文章和廉價小說的題材，整個世界不會輕易想到不久以前有一個國家絞盡腦汁，試圖決定究竟由「秘密的羅馬」還是「秘密的猶太」來主宰世界政治，那時「錫安長老們的草案」還不爲世人所知。⑭

同樣地，在精神上自我仇恨的那種劇烈的虛無主義哲學，⑬在世界暫時和平時會黯然失色，它本身並無突出的罪行可合理化那種誇張了的殘暴

和狂妄。朱爾斯・蓋亨(Jules Guērins)還必須等將近四十年時間，建立類軍事的衝鋒隊的時機才成熟。十九世紀經濟的產物——失去社會地位的人必須在人數上大增，才能在政變之前成爲強有力的少數派，但這在法國始終只是一場奇特的陰謀，⑯只有在德國才會毫不費力地變成現實。納粹主義的序曲曾在整個歐洲的政治舞台上演奏過。所以德雷富斯案件遠遠不止是一樁希奇古怪的、處置不當的「罪行」，⑰或者一羣用假鬍子和墨鏡化裝起來的參謀部軍官在夜晚的巴黎街上愚蠢地製造僞證的事情。事件中的英雄不是德雷富斯，而是克列孟梭，事件並非從逮捕一名猶太參謀軍官才開始，它從巴拿馬醜聞時就已經開場了。

㈡第三共和與法國猶太人

德・勒賽帕斯(Ferdinand de Lesseps)曾建造了蘇伊士運河，他領導的巴拿馬公司在 1880 至 1888 年間卻進展甚慢。但是，法國國內在這段時間卻成功地得到了 1,335,538,454 法郎的私人貸款。⑰從法國中產階級在金融問題上的審慎態度來考慮，這一成功的意義更加重大。巴拿馬公司的成功奧秘在於，它的幾筆公共貸款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國會的支持。建造運河一般被認爲是公共的和國家的事務，而不是一樁私人事業。所以當公司破產時，眞正受打擊的是共和國的外交政策。直到幾年之後才又明白，更重要的是導致了五十萬中產階級法國人的破產。新聞界和國會調查委員會得出大致相同的結論：公司早已在幾年前破產。德・勒賽帕斯一直希望出現奇蹟，夢想新的基金會推動這一事業。爲了獲得對新貸款的批准，他賄賂了新聞界、半數的議員、以及政府的全部高級官員。但是，此舉必須雇用中間人，而中間人又要求過高的佣金。因此，這件事原先鼓舞了公眾對事業的信心，亦即，國會支持貸款，最後卻證實是一家不太可靠的私人企業從事一場大騙局。

受賄的國會議員或公司董事會成員中都沒有猶太人。但是，雅克·雷納克(Jacques Reinach)和考納利斯·赫茲(Cornélius Herz)爭搶向內閣成員發賞金的榮譽，前者在資產階級政黨中屬右翼，後者屬激進派（小資產階級的反宗教黨派）。[19]雷那克在八十年代是秘密的政府財政顧問，[19]因此處理財政部同巴拿馬公司的關係。而赫茲的作用是雙重的，一方面，他充任雷納克和國會內激進派之間的聯絡人，因爲雷納克本人同他們之間沒有溝通渠道；另一方面，這一職位使他能夠深刻觀察到腐敗現象，因此能經常勒索他的上司，並且越陷越深。[19]

這中間自然有許多猶太小商人替雷納克和赫茲兩人效勞。他們的名字當然已被人遺忘。公司的情況越不確定，佣金率自然就越高，直到最後，公司本身收到的錢就很少了。在公司垮台前夕，赫茲從一次國會內交易中就獲得不下六十萬法郎的預支。然而，過早支付這種預付款，使貸款難以進行，股東們口袋裡就損失了六十萬法郎。[19]這場醜惡騙局使雷納克走上絕路。不堪赫茲勒索之擾，他終於自殺了。[19]

但是，他在自殺前不久採取了一個步驟，其結果本來也同法國猶太人無甚關係。他向反猶主義日報《自由論壇》(*Libre Parole*)的埃多亞德·德魯芒(Edouard Drumont)遞交了一份受賄議員名單，即所謂「支款人」，唯一的附加條件是報紙在向外界披露時必須隱去他本人的名字。《自由論壇》一夜之間從一張政治上無足輕重的小報躍升爲國內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發行量達三十萬份。它小心謹慎而又手法巧妙地利用了雷納克奉贈的這次最佳良機。有罪之人的名單一小批一小批地分期刊登，致使幾百名政治家每天早晨如坐針氈。整個反猶主義新聞界和反猶主義運動就隨著德魯芒這張報紙的發跡而最終成爲一股危險的力量，出現在第三共和國。

用德魯芒的話來說，巴拿馬醜聞使隱藏的事物顯形了，它揭發了兩件事。第一，它揭發出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變成了商人。第二，它顯示出私人企業（此案中的公司）與國家機器之間的中間人幾乎全是猶太人。[19]最

令人驚奇的是，所有這些同國家機器有密切合作關係的猶太人全是新來者。直到第三共和國建立之時，國家金融管理一直由羅斯希爾德家族有效地控制著。他們的競爭對手貝萊爾兄弟(Péreires Brothers)建立了信貸流通公司，試圖奪走部分權力，最後達成了妥協。1882年，羅斯希爾德集團仍有足夠的力量迫使天主教聯合總會(Catholic Union Génerale)破產，後者的眞正目標是敗壞猶太銀行家們的事業。㉕ 1871年和平條約會議結束後，法國方面的財政後事由羅斯希爾德處理，德國方面由勃萊赫羅埃德處理，勃萊赫羅埃德原先是羅斯希爾德家族的代理人。羅斯希爾德家族採取了前所未有的政策：他們公開支持君主專制主義者，反對共和國。㉕嶄新之處並非它的君主專制主義傾向，而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由一個重要的猶太金融力量公開反對現任政府。在此之前，羅斯希爾德家族一直是去適應任何一種執政的政治系體。因此，共和政體看來對他們是一種無用的政府形式。

幾個世紀來，猶太人的政治影響和社會地位都歸因於一個事實，即他們是一個封閉的羣體，他們直接爲國家服務，並因特殊貢獻而直接受國家保護。他們同政府機構的直接密切關係，只有在國家依然和人民保持距離，而統治階級又對管理漠不關心時才有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從國家的觀點來看，正因爲猶太人實際上並不屬於社會，所以他們是社會上最可靠的因素。議會制度允許自由派資產階級取得對國家機器的控制權。但是猶太人從來就不屬於資產階級的這個派別，因此他們用一種懷疑的態度來看待它。既然國家政權現在有可能通過議會達到金融擴張，在程度上超過以往各個專制獨裁或立憲政府的最具野心的夢想，那麼它就不再像過去那樣需要猶太人了。於是一些主要的猶太家族在金融政治舞台上漸漸失勢，他們越來越多地投入反猶主義的貴族沙龍，他們夢想在那裡用金錢支持反動派別，以恢復舊日的好時光。㉕但是與此同時，其他猶太人的圈子，即新的猶太財閥，越來越多地參與第三共和的商業活動。羅斯希爾德家族幾乎忘記，一旦他們從對於一個政權的積極興趣上退卻，爲此他們付出喪失權力的代價，

不僅立即失去對內閣成員們的影響力，也失去對猶太人的影響力。猶太移民是首先看到機會的人。㉘他們很清楚地懂得，共和國不是一個民族聯合起義的邏輯結果。從對兩萬餘名巴黎公社社員的屠殺、在軍事失敗和經濟崩潰之後，實際上產生的政權的統治能力從一開始起就大有疑問。如此一來，三年之後這個瀕臨毀滅的社會就大聲疾呼要一個獨裁者。當它有了一個獨裁者——總統麥克馬洪(E. P. M. de MacMahon)將軍（他唯一的名聲是在色當戰役中戰敗)時，他個人立即變爲舊派議員，並於幾年後(1789年）被解職。但是社會中的各式人等，機會主義者、激進分子、聯盟主義者、極右分子，都已決定要他們的代理人執行何種政策、使用何種方法。正確的政策是保障既得利益，正確的方法是腐化。1881 年以後，用萊昂•塞(Lêon Say)的話來說，唯一規則是詐騙。

應該看到，法國的這段歷史時期裡，每一個政黨內都有猶太人，就像過去每一個王室都有它的宮廷猶太人一樣。㉚但是二者差異很大。猶太資本對國家的投資幫助了猶太人在歐洲經濟中發揮有益的作用。若無他們的幫助，十八世紀民族國家的發展及其獨立的文官制度就不可能存在。西方猶太人之獲得解放畢竟歸功於那批宮廷猶太人。雷納克和他的同伙們的幕後活動也並不能使他們長久富裕。㉘他們所做的一切就是使商業與政治之間的秘密醜聞掩藏得更深。這些腐敗體上的寄生蟲向一個徹底腐敗的社會提供了一種特別危險的不在場證明。既然他們是猶太人，那麼當公眾憤怒時，就可能使他們成爲代罪羔羊。在此之後，一切事情仍可繼續照舊。反猶分子們可以直接指責猶太人爲腐敗社會裡的寄生蟲，以「證明」猶太人無論在何處都是一羣白蟻，破壞健康的機體。國家政體的腐敗其實不用猶太人推波助瀾；在一個非猶太人所屬的資產階級社會，這個社會的商業政策，以及商人的自由競爭理想，導致政黨政治中國家的分裂；統治階級不再有保護自身利益的能力，更不用說國家的整體利益了。反猶主義者自稱愛國者，誘發了一種新的民族情緒，完全美化本民族人民，譴責其他一切

民族。

猶太人之能成爲隔離於社會之外的羣體，唯一條件是他們有一個大致同質的、穩定的國家機器可資利用，而且這個國家機器樂於保護他們。國家機器的衰敗引起長期以來依賴它的猶太人封閉階層結構的解體。最初的跡象出現在新歸化的法國猶太人主導的事務中，他們使當地出生的同胞失去了控制權，此情形就同德國在通貨膨脹時期所發生的一樣。新來者塡平了商業世界與國家之間的鴻溝。

另一種過程更具災難性，它與上一種情形同時發生，而且來自上面。國家解體爲多個部分，它在打破猶太人的封閉社會時，並未將他們逼進一種眞空，讓猶太人得以在國家和社會之外生長。如果那樣，猶太人就太富，而當金錢明顯地是獲得力量的必需條件之一時，他們就顯得太強有力了。他們根據自己的政治知識，或更經常地根據自己的各種社會聯繫，寧可傾向於被社會各「界」(social sets)吸收。但是這並不導致他們的消失。相反，他們同國家機器之間維持著某些關係，儘管在關鍵形式上不同，仍能繼續控制國家的商業。因此，雖然他們以反對第三共和而出名，但是仍然由羅斯希爾德家族承擔俄國貸款事務，而阿瑟・梅厄(Arthur Meyer)雖受洗禮，而且宣誓效忠專制君主政體，仍然成爲主管巴拿馬公司事務的人之一。這意味著法國猶太人中的新來者繼當地猶太人之後，構成了私人商業和政府機構之間的聯絡網。但是，如果說猶太人先前就組成了關係緊密的堅強團體，對國家明顯有用處的話，那麼此刻他們則是分裂爲一些集團，互相敵對，然而又都從屬於一個目的，幫助社會盤剝國家。

㈢軍隊與教士反對共和

從第二帝國時期留下來的軍隊，似乎同上述一切因素無關，也似乎同一切腐敗現象無關。共和政府從來不敢去控制它，即使在布朗熱危機

(Boulanger crisis)中它公開表現出對專制政治的同情和參與了陰謀。軍官階級一如既往地由舊貴族世家的後代組成，他們的祖先作爲移民在革命戰爭期間曾同他們的祖國作戰過。這些軍官受到教士的強烈影響，這些教士自從法國大革命以來，一直支持反動勢力，反對共和政府。或許教士對出身低微的軍官也有同樣強烈的影響，這些軍官希望得到教士的幫助以獲得提升，因爲教會一向是認爲才智同出身門第無關。

社會與議會的集團的變換和流動性很大，要進入這些集團不困難，所謂效忠對象變化無常，軍隊與此相反。軍隊具有嚴格的排外性，其特點是等級制度(caste system)。使軍官們集合在一起，組成反對共和、反對一切民主影響的原因，既不是軍旅生活涯的職業榮耀，也不是軍隊的集體精神，而是等級制度的紐帶。[32]軍隊拒絕國家對它的民主化要求，只服從它的內政權威，其結果十分明顯。這使軍隊成爲國家之外的一個整體，創造出一種軍事武裝力量，它的忠誠可以改變方向，誰也無法預料。這種受制於等級制度的力量倘若只是自己存在，既不擁護也不反對任何人，那只會出現在幾近滑稽的政變故事裡，自己並不願意加入。最後，即使其著稱的專制君主制，也只不過是一種藉口，作爲一個獨立的利益集團，隨時準備保護自己的特權，「而不顧甚至不惜反對共和體制。」[32]在德雷富斯事件期間的新聞記者和後來的歷史學家們百般努力想解釋軍事權力和內政權力之間的衝突，說是「商人與士兵」之間的對抗。[34]現在我們知道這種直接的反猶主義解釋是多麼錯誤。參謀總部的情報部門人員本身都很精通商業。難道不是他們公開地出賣僞造的檔案，將它們賣給外國的武官（像皮貨商人漫不經心地出賣皮張一樣），然後又變成出賣榮譽和名聲的共和國總統或者總統的女婿嗎？[32]事實上，德國大使館武官斯瓦茲柯本急於發現更多的法國軍事秘密，他的熱心反而造成了法國反間諜機構這些先生們的窘迫，畢竟他們能出賣的只有他們製造的情報。

天主教政治家在執行其歐洲政策時犯了大錯，想像他們可以利用法國

軍方，只因爲它反對共和政體。教會實際上爲此錯誤而付出了代價，失去了它對法國全部的政治影響力。㉝當情報部門最終變成一個普通騙子工廠（知道內情的埃斯特拉齊如此形容第二局〔Deuxième Bureau〕）時，㉞在法國（包括軍方）誰也不像教會那樣認眞地對此妥協。將臨十九世紀末時，天主教教士一直在尋求恢復它過去的政治力量，而在這一方面，出於各種不同的原因，其世俗權威在人民中間已經衰退。同樣的例子還有西班牙（腐朽的封建貴族造成了國家的經濟與文化衰亡）和奧匈帝國（民族衝突每日每時威脅著可能使國家分裂）。法國的情況也是如此，民族似乎在利益衝突的泥沼中迅速沉陷。㉟被第三共和棄置在政治眞空中的軍隊樂於接受天主教教士的引導，它至少爲軍隊提供了對平民的領導，捨此就使軍隊失去它的「存在理由，以保衛體現在平民社會中的原則」——這是克列孟梭的原話。

由於人們在共和與民主中目睹一切秩序、安全、政治意志的失落，因此使天主教教會廣泛獲得好感。很多人認爲宗教的等級制度是避免混亂的唯一途徑。這一點的確比任何宗教復興的主張更能使人尊重教士。㊱事實上，教會的堅定支持者們在那段時期倡導所謂的「理智的」天主教（"Cerebral" Catholicism），即「無信仰的天主教徒」（Catholic without faith），能控制整個君主專制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運動。這些「天主教徒」不相信自己的其他塵世基礎，疾呼要給予一切威權機構更多權力。這確實是首先由德魯芒確定、然後又由莫哈認可的一條路線。㊵

天主教的大多數教士深深地捲進了政治操作，遵循一條以調停爲原則的政策。在這一方面，正如由德雷富斯事件所清楚地揭示的，他們取得了顯著成功。因此，當維克多·巴希（Victor Basch）決定負責重審此案時，他在赫內的住所受到了衝擊，領頭者係三名教士，㊶一個有名的人物，多明我會神父昂利·迪東（Henri Didon）號召阿居愛爾學院（Collège D'Arcueil）的學生們「拔劍出鞘，，擺出威風，砍人首級，大開殺戒」。㊷同樣地，還有三百名小教士的見解，他們爲顯示自己的不朽，以「紀念昂利」（Henry

Memorial)爲名，捐款設立基金，接濟昂利夫人。（昂利上校之遺孀。昂利在獄中自殺。㊸）《自由論壇》報刊載了捐助人名單。當然，這件事是當時法蘭西民族上層階級驚人的腐敗所留下的永恆紀念碑。在德雷富斯危機期間，對天主教會的政治路線產生影響的，不是常規教士，不是普通宗教教團，當然也不是它的宗教精神。就歐洲而論，天主教會在法國、奧地利、西班牙的反動政策，以及它對維也納、巴黎、阿爾及爾的反猶傾向的支持，很可能是耶穌會影響的直接結果。在天主教教士中，反猶主義派的言論和著作一向最突出地表現在耶穌會成員身上。㊹這主要由他們的法規所致，根據法規，每一個新入會者必須證明上四代祖宗中沒有猶太血統。㊸自從十九世紀初以來，天主教會的國際政策方向就掌握在耶穌會手中。㊸

我們已經分析過國家機器的解體如何爲羅斯希爾德提供了進入反猶主義貴族社會的機會。福伯格·聖-吉曼時髦的社交圈不僅向幾個獲得貴族頭銜的猶太人敞開大門，而且受過洗禮的諂媚者——反猶主義的猶太人——以及徹底皈依基督教者也都隨波逐流地加入。㊸奇怪的是，阿爾薩斯的猶太人（像德雷富斯家族一樣，在阿爾薩斯被割讓之後遷往巴黎）在這種社會地位爬升中尤爲突出。他們以努力使自己脫離猶太移民環境的方式，誇張地表現出愛國主義。德雷富斯家族屬於法國猶太人，他們採用自己的反猶主義方式來謀求同化。㊸轉向法國貴族的立場不可避免地帶來一種後果：猶太人促使兒子們像他們新結交的朋友一樣去追逐同樣較高的軍人職業。正是在這一點上，引發了最初的磨擦。相對說來，猶太人進入高等社會還是比較太平的。上層階級雖然夢想恢復專制統治，在政治上無所作爲，也不想製造麻煩。但是，當猶太人開始在軍隊裡尋找平等機會時，就面對面地碰上了耶穌會士們的蓄意反對，他們不準備容忍那種不受特殊教規影響的軍官存在。㊸再者，猶太人反對根深蒂固的等級制度，而這種制度的精神早已由傳統與使命所強化，並且進一步由毫不妥協地敵視第三共和和市政制度的態度加強，但是沙龍裡的輕鬆氣氛使猶太人忘記了軍隊裡的現

實。

一位近代史專家形容猶太人同耶穌會教士的鬥爭是一場「旗鼓相當的戰鬥」，其中「高級耶穌會教士與猶太財閥在法國中部面對面虎視眈眈，像兩條無形的戰線。」[50]這種描述很眞實，因爲猶太人發現耶穌會教士是最頑固的敵人，而後者也迅即理解反猶主義可以是一種多麼強有力的武器。這是在泛歐洲範圍首次嘗試建立反猶主義的「主要政治概念」[50]，也是希特勒之前唯一的一次。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假設這只是一場勢均力敵的「對手」之間的鬥爭，那麼這種描述就明顯地不眞實。猶太人謀求的權力程度不會高於其他任何一個集團——共和國正是分裂爲這些集團——所追求的。當時他們所期待的一切，無非是以足夠的影響力來謀求社會利益和商業利益。他們並不渴望分享管理國家的政治權力。渴望政治權力的唯一有組織的羣體就是耶穌會。對德雷富斯的審判由一系列偶發事件開始，這些事件顯示了猶太人如何堅決地、精力充沛地嘗試在軍隊裡取得一個位置，也顯示即使在當時，對他們的敵視有多麼普遍。爲數甚少的猶太軍官常常屈服於粗魯的污辱，他們總是被迫決鬥，而異教的同伴們不願當他們的決鬥助手。在這種情況下，聲名狼藉的埃斯特拉齊可謂是第一個例外。[50]

逮捕和判決德雷富斯究竟只是一個司法錯誤，偶然發生，點燃起一場政治火災，還是參謀總部精心策劃僞造文件，以最後達到給一個猶太人定下叛國者罪名的目的，這一點始終不甚了了。有一點事實可以證明後一種假設，即德雷富斯是第一個在參謀總部謀到職位的猶太人，在當時情況下，這不僅引起反感，而且引起憤怒和驚愕。在任何情況，反猶的仇恨即使在陪審團答覆判決之前就會發洩出來。按照常規，一件間諜案在審判過程中時，一切情況都不准透露，但是這次卻相反，參謀總部的軍官們興高采烈地向《自由論壇》報提供案件細節和被告姓名。很顯然，他們唯恐猶太人對政府的影響力會導致政府對審案施加壓力，使整個事情陷入僵局。有一些花言巧語的表演反而證明了他們的這種恐懼；法國猶太人的某些圈子在

當時很認眞地關注著猶太軍官們的危險境況。

還必須記住，當時公眾對巴拿馬醜聞還記憶猶新，隨著羅斯希爾德向俄國貸款，對猶太人的不信任感正在與日俱增。[53] 國防部長梅爾西埃(Auguste Mercier)不僅在每當審判有了新的進展時大受資產階級報界的喝采，而且連饒勒斯的報紙——社會主義者的喉舌——也祝賀他「頂住了腐敗的政治家和金融界高層的強大壓力。」[54]最富有特點的贊美詞出自《自由論壇》的由衷評論：「饒勒斯，說得好！」兩年後，當伯納德・拉查爾發表了他的第一本論誤審的小冊子，饒勒斯的報紙小心翼翼地不去討論其內容，而是指責這位社會主義派的作者，說他欽佩羅斯希爾德，可能還接受他的津貼。[54]同樣地，直到 1897 年，爲爭取德雷富斯一案重審的鬥爭早已開始，饒勒斯眼裡卻只看到兩個資產階級集團的衝突，或者機會主義者與教士們的衝突。還有，甚至已到了赫內法庭重審之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威廉・李伯克內希特(Wilhelm Liebknecht)仍還認爲德雷富斯有罪，因爲他無法想像一個上層階級分子會成爲一場誤判的受害者。[53]

激進的社會主義派別的報紙所持的懷疑態度，雖然帶有強烈的反猶主義感情色彩，由於德雷富斯家族在試圖保證重新開庭一事上的古怪手段而加深。爲了營救一個無辜的人，却使用了通常爲營救一個有罪之人而採用的方法。他們對公開宣傳怕得要死，全然依靠走後門的操作。[53]他們一面亂花金錢，一面對待拉查爾——對他們最有價值的幫助者，此案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就好像他是他們雇請的代表似地。[53]克列孟梭、左拉、皮卡特、拉博里(Fernand Labori)——這些都是德雷富斯派的活躍人物——最後只有放棄努力而保住自己的良好名聲，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公開聲稱不再介入這一事件的具體方面。[53]

德雷富斯能夠或應該獲救的唯一基礎是：一個腐敗的國會的陰謀，一個不可救藥地傾圮的社會，教士們的權力欲，必須公正地同雅各賓派的嚴格觀念——民族以人權爲基礎——作比較。共和主義的共體生活觀點宣稱

(按照克列孟梭的說法)，你若侵犯了一個人的權利，便是侵犯了眾人的權利。依靠國會或依靠社會，會在戰鬥開始之前就失敗。因爲第一，猶太人的資源力量並不比富裕的天主教資產階級優越；第二，上層社會的一切階層，從福伯格•聖-吉曼一類的教士和貴族之家，到反教會的激進小資產階級，都只願意看到將猶太人正式清除出政治實體。他們以這種方式來考慮問題，也憑此來洗淸自己身上可能沾有的疑點。在他們看來，猶太人失去社會接觸和商業接觸，這是他們應該付出的代價。同樣地，正如饒勒斯的話所表明的，這一事件被國會看作是重整的黃金機會，或者是重新獲得永不腐敗的名譽。最後一點是至少在縱容「猶太人該死」或「法蘭西屬於法蘭西人」等口號時，發現一種幾乎像魔術般的公式，使羣眾同政府和社會的現狀達成和解。

(四)人民與暴民

如果說，信以爲宣傳可以達到一切目的，只要振振有辭或狡詐地說話，便可以同一個人談論任何事情，這是我們時代的一種普遍錯誤，那麼，在那段時間裡，社會上普遍地認爲「民眾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而領袖的任務，如克列孟梭嘲諷地說的那樣，則是機警地追隨那種聲音，這也必錯無疑。[60] 這兩種觀點的相同的根本錯誤是視暴民(mob)爲全體人民(people)。

暴民首先是這樣一種羣體，代表了各個階級的多餘人物。這一點容易使人錯將暴民看作民眾，而民眾也是包含了社會各個階層。在一切偉大的革命中，民眾爲尋找眞正的代表而戰鬥，暴民卻總是叫喊要尋找「強人」、「偉大領袖」。因爲暴民憎恨將他們排斥在外的社會，以及他們並未占領代表席位的國會。所以近代暴民領袖們利用公民投票(Plebiscite)來取得輝煌成果，公民投票是依靠暴民的政治家的舊觀念。反德雷富斯派中比較聰

明的領袖之一德洛萊德(Paul Dérouléde)叫囂要「通過公民投票建立共和國」。

上流社會和第三共和國的政治家們在一系列醜聞和大規模騙局中造就了法國暴民。此刻他們以父母對待子女的那種溫柔情感，對暴民懷著一種既喜愛又害怕的複雜感情。社會至少可以對它的孩子口頭上表示保護。當暴民們用行動搗毀猶太人的商店，在街上襲擊他們時，上流社會的語言使人聽起來似乎將一種實在的、充滿激情的暴力行爲說成兒童的無害遊戲。[61]在這一方面，當代文件中最重要的是〈紀念昂利〉，它提出了各種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方案：猶太人應該被撕成碎片，就像希臘神話中的瑪爾斯亞斯(Marsyas)一樣；雷納克應該被生烹；猶太人都應該被油炸，或用針慢慢刺死；他們應該被「割禮一直割到頭頸」。一羣軍官很不耐煩地說，要試製一種新槍，對付國內十萬名猶太人。爲此捐款的人中有一千多名軍官，其中包括四名現役將軍，還有國防部長梅爾西埃。令人吃驚的是名單上有爲數較多的知識分子[61]，甚至也有猶太人。上層階級深知，暴民是同他們互爲一體的。甚至還有一名猶太歷史學家，雖然他親眼所見使他預感到，一旦暴民們統治了街道，猶太人就不會安全，但他仍然在私下裡欽佩地稱贊說是「偉大的集體運動」。[61]這只能表明，大多數猶太人在社會中紮根有多深，而這個社會正要消滅他們。

在德雷富斯事件上，如果伯爾那諾將反猶主義描述爲一種主要的政治概念，那麼就暴民這一點而言，他無疑是正確的。這在先前的柏林和維也納已經試驗過了，艾爾沃特(Hermann Ahlwardt)和斯多克爾，肖納勒和路埃格爾，但是論功效，明顯地都比不上在法國。在暴民們眼睛裡，一切被他們嫌惡的事物中，無疑猶太人是可以教訓一下的目標。如果他們仇恨社會，他們可以針對社會容忍猶太人的方式；如果他們仇恨政府，他們可以針對保護猶太人的方式，或者故意視猶太人與政府爲合一的。雖說假設猶太人是暴民們唯一獵取的目標是錯誤的，但猶太人必然是首當其衝地成

爲受害者。

暴民們被排除在社會之外，政治上沒有自己的代表，就必然轉向議會外的行動。再者，他們總是傾向於在那些運動及其影響中尋找政治生活的眞正力量，它潛而不顯，隱藏在場面的背後。毋庸置疑，猶太人在十九世紀落入這個範疇，就像共濟會(Freemasonry)（尤其在拉丁國家）和耶穌會一樣。[64]當然，這些羣體中的任何一個都並不眞正構成一個秘密社會，用異常巨大的陰謀來控制世界。但在事實上，它們的影響力無論如何公開化，都未能納入正式的政治範圍，其運作方式只能是遊說、聚會，以及告白。自從法國革命以來，這三個羣體俱有可疑的名聲，在歐洲暴民眼中都是世界政治的軸心。在德雷富斯事件的危機期間，它們各自都能利用這一流行觀念，回斥其他兩方陰謀控制世界的指責。「秘密猶太」的說法無疑是某些耶穌會會士的發明，他們選定將第一屆猶太復國主義代表大會(Zionist Congress)（1897 召開）看作猶太人世界性陰謀的核心。[65]同樣地，「秘密羅馬國」是針對反基督教會的共濟會成員，或許也是對某些猶太人不加區別的誣蔑之辭。

暴民的反覆無常是天下聞名的，德雷富斯的反對者們終於悲哀地認識到這一點。到 1899 年時，風向變了，以克列孟梭爲首的一小羣眞正的共和主義者帶著複雜的感情突然明白，有一部分暴民是他們這一邊的盟友。[65]在某些人眼中，劇烈爭論的雙方現在好像「兩幫旗鼓相當的暴發戶競相爭取得到暴民的承認」，[65]而雅各賓派克列孟梭的聲音卻成功地使一部分法國人回到了他們最偉大的傳統道路。因此使大學者埃米爾・杜克勞(Emile Duclaux)可以這樣寫道：「在全體人民面前表演的這齣戲劇，又被報界煽動到熱點，使整個民族最後都加入了，我們從中看到，恍如古代悲劇中的歌隊和反歌隊在互相叫囂。全世界是一個劇場，而法國則是舞台中心。」

軍隊由耶穌會引導，並由暴民協助，進入了充滿勝利信心的階段。政界準備反擊，但是未能奏效。反猶主義的報紙公布巴拿馬醜聞中受賄官員

的名單，雷納克交出的那份名單使人們緘默了。㊳一切都使勝利顯得不費吹灰之力。第三共和國的整個社會與政治家們，各種醜聞和各種事件，製造出了一個新的階級，即「失去階級地位的新階級」；他們不可能同自己製造的這個階級作戰；相反，他們採用了暴民的語言和觀點。耶穌會通過軍隊，壓倒了腐敗的政界力量，於是鋪平了通向一場不流血政變的道路。

既然當時只有德雷富斯家族用古怪的方式試圖營救他們的親人出魔鬼島，既然當時只有猶太人關心他們在反猶的沙龍，以及更反猶的軍隊中的地位，那麼一切事情當然都對準了這個方向。猶太人顯然不會攻擊軍隊或社會。猶太人的唯一願望不就是想繼續被社會接受、卻在軍隊內遭到磨難嗎？在軍隊或平民的圈子裡，誰也不需要因此而有一個不眠之夜。㊳當秘密洩漏時，參謀總部情報部門裡坐著一名高級軍官，他儘管有著良好的天主教背景，在軍隊裡前途無量，對猶太人也有「適當」程度的嫌惡，但還未信奉「爲了成功可以不擇手段」的原則，所以就顯得不協調。這樣的一個人，完全脫離社會宗派，沒有職業野心，他就是皮卡特，他那種單純、平靜、政治上不謀私利的精神，不久就讓參謀總部受夠了。皮卡特不是英雄，當然也不是烈士。他只是普通類型的公民，對公共事務也只有一般興趣，他在危險時刻（雖然並沒早一點）挺身而出，就像執行他的公務一樣保衛他的國家。㊳但是，當拖延遲疑良久之後，克列孟梭最後認定德雷富斯無罪，相信共和國正於危險中時，這件事的目標就變得嚴肅了。鬥爭剛開始時，只有幾個著名作家和學者爲一個抽象目標而挺身，例如左拉、阿那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杜克勞、歷史學家加百列爾・莫諾德(Gabrie Monod)、師範學校圖書館長盧西安・赫爾(Lucien Herr)。這裡還須加上當時不出名的一羣青年知識分子，他們後來以《半月刊》(*Cahiers de la quinzaine*)而名載史冊。㊳不過克列孟梭的盟友也只有這些了。沒有一個政治團體、也沒有一名著名政治家準備與他並肩作戰。克列孟梭的道路之

偉大意義在於他的鬥爭不是針對一次具體的司法錯誤，而是基於正義、自由、人權道德等「抽象」觀念。總之，它的基礎是那些以往構成雅各賓派愛國主義的中心概念，那些曾被污髒不堪的事物所攻擊的概念。隨著時間消逝，面對威脅和失望，克列孟梭毫不動搖地繼續堅持眞理，並將眞理化爲各種具體要求，而更「具體的」民族主義者則衰退。像巴黑之類的追隨者曾經批評德雷富斯的支持者迷失在「一堆形而上概念」中，現在也開始明白，抽象的「老虎」比起那些劣等商人的有限智慧或宿命論知識分子的貧乏傳統，事實上更接近政治現實。❼關於講求實際的民族主義者的具體道路引向何方，有一個很有價值的故事對此作了描述：在法國戰敗之後，查理・莫哈在一次和一位女星占家坐飛機飛往南方途中，聽女星占家對他解說近期發生事件的政治含義，並勸他同納粹合作，他感到了一種墮落的「恐怖和愉快」。❼

在逮捕德雷富斯之後、克列孟梭發起運動之前的三年裡，反猶主義無疑取得了地盤，反猶主義報紙的發行量也能同幾家主要的報紙匹敵了，但是街頭仍然沉寂著。直到克列孟梭在《黎明報》(*L'Aurore*)上發表文章、左拉發表了《我控訴》、赫內上訴法庭開始了沉悶的繼續審訊和重審時，暴民們才喧鬧著加入了行動。德雷富斯派（他們是少數派）的每一次出擊之後，街上必有一次程度不同的騷動。❼暴民是由參謀總部組織起來的，這一點很明顯。審訊情形從軍方直通向《自由論壇》報，通過編輯們的文章或個人介入的形式直接地或間接地發動學生、君主專制主義者、冒險家、甚至歹徒，將他們推向街頭。只要左拉說一句話，馬上有石塊砸破他的窗戶。只要修雷爾-凱斯納給部長一寫信，他就會立即在街上遭人痛毆，而報紙上卻粗俗地攻擊他的私生活。所有人都認爲左拉如果遭到起訴，而又被宣判無罪，那麼他休想活著離開法庭。

「猶太人該死」的呼聲響徹全國。在里昂、赫內、南特(Nantes)、圖爾(Tours)、博爾多、克列蒙-費朗特(Clermont-Ferrant)、馬賽——事實

上到處如此——都爆發了反猶的騷亂，無一不是出於同樣的根源。在同一天、同一時間到處迸發羣眾的憤怒。[75]在蓋亨的領導下，暴民中間夾雜了軍人。反猶的突擊隊出現在街頭，使每一個同情德雷富斯的集會都毫無例外地以流血告終。而警察都公然與暴民同謀。[75]

反德雷富斯派中最現代的人物或許當推朱爾斯・蓋亨。他在經商破產後，以密探為職業開始了他的警察生涯，此人具有天生的紀律和組織才幹，這是地下社會不可缺少的標誌。由此他在後來得以轉入政治渠道，成為「反猶主義同盟」(Ligue Antisémite)的發起人和首腦。上流社會在他身上發現了第一位犯罪英雄。資產階級社會奉承蓋亨，清楚地表明了在道德和倫理準則方面，它背離了它自身關於善的標準。在這個「同盟」背後有兩名貴族——奧爾良公爵(Duke of Orléans)和莫雷侯爵(Marquis de Morès)。後者在美國喪失了財產，於是以組織巴黎的屠夫成立一個殺人大隊而出名。

這些現代運動傾向的活動中最顯突的一次是對所謂夏勃洛爾要塞(Fort Chabrol)滑稽式的包圍。正是在這裡，這第一座「褐色宮殿」裡，當警方最終決定逮捕反猶主義同盟的領袖時，同盟的菁英們在此聚會。房子的結構從建築角度來看是十全十美的。「窗戶都有鐵製護窗板保護。從地下室到頂樓天花板裝有一個電鈴系統。寬大的前門總是上鎖並拴緊，裡面距離五英尺左右有一個高大的鑄鐵格柵。大門和格柵之間，右邊是一扇小門，也是鐵板製的，門後的通道上布置著從屠夫中精選的衛兵，日夜把守。」[75]挑唆起阿爾及利亞計畫的麥克斯・雷吉斯(Max Régis)是名列現代史的另一個人物。正是這位年輕的雷吉斯曾經號召興高采烈的巴黎暴民「用猶太人的血澆灌自由之樹」。雷吉斯代表的那一部分運動期望用合法的議會手段來取得政權。根據這個計劃，他自己當選為阿爾及爾市長，並利用他的地位放縱屠殺，造成數名猶太人被殺，猶太婦女被強姦，猶太人的商店遭洗劫。也正是由於他的提攜，最著名的法國反猶分子、頗有文化修養的德魯

芒坐上了議會的交椅。

這一切情況中顯出新意的並非暴民的活動；因爲暴民的例子先前已多得不可勝數。在當時顯出新意並且令人驚奇的事情——儘管也是我們很熟悉的——是暴民的組織化，以及其領袖所享有的英雄崇拜。巴黑、莫哈、多代特(Léon Daudet)等人無疑共同構成一種青年知識分子菁英，暴民變成了他們所採納的「具體的」民族主義的直接代表。這些人藐視民眾，自己也只是最近才從沒落頹廢的唯美主義崇拜中脫離出來，他們從暴民身上看到一種剛強的原始「力量」的生動表現。他們用理論證明暴民就是民眾，將暴民的領袖說成是民族英雄。⑱正是他們的悲觀哲學以及他們對毀滅的欣喜，首先顯示了歐洲知識分子瀕臨崩潰的跡象。

連克列孟梭也未能擺脫將暴民等同於民眾的誘惑。特別容易使他產生錯誤的原因是工黨一貫對「抽象」正義(justice)問題的含糊態度。沒有任何政黨，包括社會主義者，會要將正義本身變成一個問題，「不管如何，支持正義是文明人之間唯一牢不可破的紐帶。」⑱社會主義者代表工人的利益，機會主義者代表自由資產階級，聯合主義者(coalitionist)代表天主教上層階級，激進派代表反教會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的一大優點是以一個內部統一團結之階級的名義發言。他們同資產階級政黨不一樣，他們所代表的不是一個內部分裂成無數集團和派系的社會。他們從本質上首先關心他們的階級利益。他們無須爲人類團結的更高責任煩惱，也不知道自治生活的眞正意義。他們的典型態度表現在朱爾斯・蓋斯德(Jules Guesde)——在法國社會主義黨派中與饒勒斯地位相等的人物——的話裡：「法律和榮譽只是空話。」

民族主義者的思想特徵是虛無主義，但是它並未主宰反德雷富斯分子的頭腦。相反，大部分社會主義者和許多支持德雷富斯的人——例如蓋斯德——說的卻是同樣語言。假如天主教刊物《十字架》(*La Croix*)評論說「德雷富斯無罪還是有罪已不再是個問題，問題只在於誰勝利了，是軍隊

的朋友還是軍隊的敵人,」那麼,德雷富斯派同樣也可以修改這句話來表達意見。⑳不僅暴民,而且連相當一部分法國民眾也都宣稱,他們根本不關心是否應該根據法律將某一羣人逐出全體居民的範圍。

一俟暴民開始了反對德雷富斯派的恐怖行動,他們發現面前打開了一條道路。正如克列孟梭所證實的,巴黎的工人們幾乎不關心整個事件,如果資產階級內部互相爭吵,他們認爲這也不會影響自己的利益。克列孟梭寫道:「他們根據民眾的公開要求,向全世界宣布『民主』的失敗。主權民族通過民眾顯示自身的正義是至高無上的。不可否認,惡與民眾共謀。……民眾不是上帝。任何人都能預見到這個新的神總有一天會垮台。一個集體暴君,遍布大地,它像帝王寶座上的一個單個的暴君一樣,令人不能接受。」⑳

克列孟梭最終使饒勒斯相信,侵犯一個人的權利也就是侵犯了所有人的權利。但是他在這方面成功,僅僅是因爲作惡者恰巧是自法國革命以來民眾的宿敵,即貴族階級和教士階級。這是在**反對**富人和教士,不是**爲了**共和國,不是**爲了**工人們最終帶上街頭的正義和自由。的確,饒勒斯的演講和克列孟梭的文章令人回憶起對於人權的舊日革命激情。的確,這種激情的強烈程度足以推動民眾投入鬥爭,但是他們首先應該相信,與鬥爭命運攸關的不僅是正義和共和國的榮譽,而且還有他們的階級「利益」。以前,法國社會主義者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都認爲捲入資產階級的內部爭吵或擔憂拯救共和國等等都是一種錯誤。

左拉,這位最熱愛民眾的人,最先使工人脫離這種冷漠心態。但是,在他那篇著名的控告共和國的文章裡,他也是最先背離了精確描述政治事實的原則,順從了暴民的激情,提出那個嚇唬人的「秘密羅馬國」的話題。這件事情克列孟梭是很勉強地提起的,而饒勒斯卻很熱心。左拉的眞正成績從他的小冊子裡很難看出,這就是他堅定無畏的勇氣,用一生和著作使民眾走向「接近偶像崇拜(idolatry)」的地步,他挺身而出,挑戰、戰鬥,最後征服羣眾,但他像克列孟梭一樣,一直很難把羣衆中的民眾和暴民區分

開來。「人生來就是要反抗最強大的君主，拒絕向他們低頭，但是很少有人生來爲了反抗多數人，在誤入歧途的羣眾面前挺身而出，赤手空拳面對瘋狂舉動，要他說『是』時他敢於說『不』。這個人就是左拉！」[82]

《我控訴》剛剛發表時，巴黎的社會主義者們正舉行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呼籲糾正德雷富斯案的判決。但是只過了五天，三十二名社會主義者政府官員出面聲明，「階級敵人」德雷富斯的命運同他們無關。這項聲明背後有巴黎社會主義組織的大批成員支持。儘管這支隊伍在整個案件過程中始終觀點分裂，但這個黨派仍有足夠的德雷富斯派成員，阻止了反猶主義聯盟控制街頭。有一次社會主義者的會議甚至稱反猶主義是「一種新形式的反動」。然而在幾個月後，當國會舉行選擇時，饒勒斯落選了，未幾，戰爭部長卡凡涅克(Jean-Baptiste Cavaignac)在內閣發表談話，攻擊德雷富斯，聲稱軍隊是不可缺少的力量，議員們投票表決將他的談話在巴黎公開張貼，只有兩票反對。同年十月，巴黎發生大罷工，德國駐法大使孟斯特(Münster)準確而自信地向柏林報告說，「至於廣大民眾，他們根本不是認爲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工人罷工只是爲了提高工資，只有這件事才能使他們鬥爭到底。至於德雷富斯案件，他們從未在腦子裡想過。」[82]

那麼，德雷富斯的支持者是誰？那熱心傾向左拉的《我控訴》、虔誠地跟從克列孟梭撰寫的社論的三十萬法國人是些什麼人？是誰最後成功地使法國的每一個階級、每一個家庭在德雷富斯事件上分裂成對立的兩派？答案是：他們既不是一個黨派，也不是一個同質團體。應該承認，他們吸收了社會的下層階級，而不是上層階級，他們之中比較多的是醫生，而不是律師和政府官員。但是，他們是各種不同的人的混合體，例如左拉和貝圭(Charles Péquy)，饒勒斯和皮卡特，這些人緊接著就會分道揚鑣。「他們來自毫無共同點的各個黨派和宗教團體，甚至還互相衝突。……這些人互不相識。他們爭鬥過，有時還會再爭鬥。可別誤以爲這些人都是法國民主的『菁英人物』。」[82]

假如克列孟梭當時有足夠的自信認爲只有追隨他的人才是眞正的法國民眾，那麼他後來的事業就不會落入宿命的驕傲。他在德雷富斯事件上的經歷使他對民眾產生了絕望，使他蔑視人類，最後他相信唯有他才能拯救共和國。他不能再屈尊向暴民的古怪行爲喝采。因此，一旦他將暴民等同於民眾，他確實使自己失去了立足之地，迫使自己走上那條使他後來更爲突顯的冷酷和超然的道路。

法國民眾的每一個家庭都明顯地發生了分歧。最典型的是表現在工黨的不同階層的政治態度中。其餘的黨派，以及國會中的不同集團，在重審案件風波之初就頑固地反對德雷富斯。但是這一切只意味著資產階級政黨不再代表選民的眞正觀點，社會主義者同樣也不統一，卻贏得了幾乎所有各部分的民眾。每一個地方都存在一個少數派，響應克列孟梭關於正義的呼籲，這些各不同質的少數派組成了德雷富斯的支持者。他們同軍隊及其支持與共謀的腐敗的共和國鬥爭，這是從 1897 年底到 1900 年世界博覽會開幕之間法國國內政策的支配因素。它也給國家的外交政策帶來了有利的影響。無論如何，這場鬥爭的最終結果至少是取得了部分勝利，這場鬥爭完全是在國會之外進行的。在那個所謂的代表大會裡，足足有六百名代表，都在不同形式上帶有勞工或資產階級色彩，在 1898 年時，竟然只有兩名議員支持德雷富斯，而其中之一的饒勒斯未能重新當選。

圍繞著德雷富斯事件引起的不安，不僅表現在暴民的行爲必定沿著國會外的路線，而且全體少數派成員爲議會制度、民主、共和國而戰鬥時，同樣不得不被限制在內閣之外從事戰鬥。兩者之間的唯一區別是，一個利用了街頭，一個利用了報紙和法庭。換言之，在德雷富斯危機期間，整個法國的政治生活脫離了國會。即使國會幾次投票支持軍隊、反對重審案件，也無法改變這個結論。值得記住的是，巴黎世界博覽會開幕後不久，當國會的觀點開始轉變時，國防部長格里菲(G. A. A. Galliffet)才能夠忠實地宣布這種現象根本不能代表整個國家的情緒。[85]另一方面，投票反對重審也

不能看作是認可耶穌會和某些激烈的反猶分子試圖在軍隊的協助下發起政變的政策。[86]而應該說，這歸因於對任何一種改變現狀企圖的抵制。事實上，內閣也同樣會以壓倒性的多數抵制軍方—教士專政。

那些國會議員懂得以政治爲職業生涯與利益所在，自然急於維持現狀，因爲現狀維繫著他們的「志業」與利益。再者，德雷富斯案件揭示出民眾同樣要求他們的代表照顧他們的特殊利益，而不是政治家的作用。在競選宣傳中，提及這個案件顯然是不明智的。如果僅僅是因爲反猶主義，那麼德雷富斯派當然就毫無指望了。從事實來看，在競選期間，他們早已從工人階級中獲得了相當多的支持。然而，連支持德雷富斯的人也不願將這個政治問題拖進競選活動。的確，饒勒斯正是堅持將它當作自己的競選綱領，所以失去了議員位子。

如果說，克列孟梭和德雷富斯派成功地爭取了各個階級中的大部分人一起要求重審案件，那麼天主教徒們的行爲則是一種阻力；天主教徒之間沒有意見分歧。耶穌會在操縱貴族階級和參謀總部時所做的事情，聖母會在中層階級和下層階級中也做了，它的輿論喉舌《十字架》在法國所有的天主教雜誌中發行量最大。[86]這兩個教派都圍繞猶太人問題鼓噪反對共和國。它們都表白自己是軍隊和國家的維護者，反對「國際猶太人」的陰謀。但是，更觸目的是，法國天主教徒們的態度事實上還遠遠不及全世界的天主教報紙，它們團結一致反對德雷富斯。「所有這些報紙都在上級的指揮下不斷地往前走。」[88]隨著案件的進展，可以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法國反對猶太人的活動遵循著一條國際路線。《天主教世界》(*Civiltà Cattolica*)宣稱，應該從法國、德國、奧地利、意大利等一切國家中驅逐猶太人。天主教政治家們最早明白，今後的權力政治必定以殖民主義野心的相互作用爲基礎。因此，他們最早將反猶主義同帝國主義聯繫起來，宣稱說猶太人都是英國特務，由此將對抗他們的作爲認作是和「恐英病」(Anglophobia)對抗。[89]在德雷富斯案件中，猶太人是中心人物，因此這爲他們提供了一個政治活

動機會。如果英國從法國手裡搶去埃及一事應該責怪猶太人的話，[90]那麼，英美聯盟運動當然起因於「羅斯希爾德帝國主義」。[90]天主教的政治活動並不限於在法國，一旦那樁特殊事件降下帷幕，這一點就完全清楚了。1899年底，德雷富斯已被赦免，法國公眾輿論也轉向了，因爲害怕這件事會造成對世界博覽會的聯合抵制，這時，要想阻止反猶主義在全世界的蔓延，只需同教皇利奧八世(Pope Leo XIII)會面一次就可以了。[90]即使在美國，非天主教徒中支持德雷富斯者都特別熱心，1897 年以後，在天主教報紙上也可以發覺反猶主義情緒明顯上升，然而在同利奧八世會面之後，這種情緒在一夜之間平息下來。[90]天主教利用反猶主義作爲工具的「偉大策略」流產了。

㈤猶太人與德雷富斯派

德雷富斯上尉不幸的案件向世界表明，在每一個猶太貴族和百萬富翁身上，仍然留有舊時代賤民的某種印記。他們沒有國家，人權對於他們並不存在，社會樂於將他們排除在它能給予的各種特權之外。但是，得到了解放的猶太人自己比別人更覺得難於把握住這一事實。伯納德・拉查爾寫道:「拒斥和那些生於外國的同胞團結一致，這對於他們猶嫌不夠；他們斥責其所有的惡行，那却是他們自己的怯懦造成的。他們不滿足於僅僅比當地法國人更富於侵略性；他們就像各地解放了的猶太人一樣，憑自己的意欲割斷了一切團結的紐帶。事實上甚至出現這樣的情形：在法國，有三十來個人準備保護一個受難的同胞，卻有上千人同這個國家裡最狂熱的愛國者一起監視著魔鬼島上的受難者。」[94]正因爲他們在居住的土地上發揮的政治作用太小，所以在十九世紀的進程中，他們才會盲目崇拜法律上的平等。毫無疑問，這是他們獲得永久安全的保證。當德雷富斯事件的發生警告他們，他們的安全受到威脅時，他們就更深入地走向同化，使猶太民族分化

解體，而就更加深政治智慧的貧匱。他們迅速地與社會同化，在這個社會裡，一切政治熱情都消融在沉重的社會勢利、大生意、以及未知的利潤機會之下。他們希望擺脫受人厭惡的局面，於是轉而形成一種反對自己同胞中的窮人和未同化移民的傾向。他們使用異教社會對付他們的手法，同樣痛苦地使自己脫離所謂的「東方猶太人」(Ostjuden)。政治上的反猶主義，一如表現在俄國和羅馬尼亞的猶太人計畫，猶太人解散而從中世紀逃生，但這並不是現代政治的眞實。他們不懂，德雷富斯事件中，不僅僅是社會地位的問題，因爲這一事件所帶來的遠遠超出社會反猶主義。

法國猶太人中爲何很少有人全心全意地支持德雷富斯，上面所說的就是原因。猶太人，包括這個被指控的人的家族，害怕引起一場政治戰。正是基於這些原因，左拉的顧問拉博里在赫內法庭重審之前被拒絕辯護資格，而德雷富斯的第二名律師德曼吉則不得不將其答辯建立在有疑點的爭端之上。大家期待在一大堆恭維話下抑制住來自軍隊或軍官們的可能攻擊。他們認爲，通向宣判無罪的最平坦道路是假裝整個事情弄到這種地步可能只是一個司法錯誤，受害者是猶太人這一點純屬偶然。結果在第二次審判中，德雷富斯拒絕面對眞實問題，在重審時只是請求寬厚處理，也就是服罪了。[95]猶太人未能看清，這裡牽涉到的問題是一場有組織地針對著他們的政治鬥爭。因此他們拒絕了那些準備在政治鬥爭基礎上同他們合作去迎接挑戰的人。在克列孟梭的事情上，可以看到他們的態度簡直是有眼無珠。克列孟梭爲國家基礎的正義而鬥爭，當然也支持猶太人的平等權利的回復。但是，在一個一方面是階級鬥爭、另一方面是瘋狂侵略的時代，如果不同時考慮到，這其實是被壓迫者必須同壓迫者作鬥爭，那麼，政治就變成抽象的了。克列孟梭是近代猶太人所知的爲數不多的眞正朋友之一，因爲他認識到、並向全世界宣布，猶太人是歐洲被壓迫民族之一。反猶主義者傾向於將猶太人看作暴發戶，或暴發的賤民；因此他會害怕每一個猶太小商販都會成爲一個羅斯希爾德，每一個猶太窮光蛋都會成爲暴發戶。但是克列孟梭從爲

正義而鬥爭的無限激情出發，仍然將羅斯希爾德家族看作被踐踏的民族的成員。他爲法國的民族災難感到痛苦，這使他的視野和心靈轉向對一切人的同情，甚至包括那些「作爲民族領袖，卻領導他們走向慘敗的不幸者」，那些怯懦畏縮的人(他們由於無知、虛弱、恐懼，十分迷戀和欽服強者，因此將自己排除在積極鬥爭的參加者隊伍之外)，還有那些只有當戰鬥勝利時才「飛跑著去支援勝利者」的人。[96]

㈥赦免及其意義

「德雷富斯」這齣戲劇直到它的最後一幕時才顯出是一場喜劇。唯有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出人意料地扭轉了局面，它使分裂的國家團結起來，使國會同意重審此案，最後使整個民族中不同的成員——從極右派到社會主義者——相互妥協。克列孟梭的每日評論、左拉的憐憫、民眾對教士和貴族的仇恨，都未能改變國會的感情向有利於德雷富斯的方面轉化，最後卻由於害怕各國抵制博覽會而告成功。同是這一個國會，一年前還在一致反對案件重審，此刻卻以三分之二贊成票通過了對反德雷富斯的政府的譴責。1899年7月，沃爾德克-羅梭(René Waldeck-Rousseau)內閣掌權，盧貝特(Loubet)總統赦免了德雷富斯，撤銷了整個案子。博覽會得以在最明亮的商業天空之下開幕，普遍友好的氣氛出現：甚至連社會主義者也可以得到政府職位；歐洲第一次有一位社會主義者當了部長，米勒宏(Alexandre Millerand)成了商業部長。

國會變成了德雷富斯的支持者！這就是結局。當然，對於克列孟梭來說，這是一場失敗。在苦澀地收場時，他譴責那種曖昧的赦免(pardon)，以及更曖昧的特赦。左拉寫道：「這一切，只不過是在一句充滿臭氣的赦免令中將高尙的人同惡棍捏成一團。一切東西都被扔進了一口大鍋。」[95]克列孟梭依然像在一開始那樣完全孤獨。社會主義者們，首先是饒勒斯，對赦免

和特赦表示歡迎。這不是保證他們在政府中取得了一席之地嗎？不是更廣泛地代表了他們的特殊利益嗎？幾個月後，在1900年5月，當世界博覽會的成功有了保證之後，最終露出了眞相。這一切妥協戰術是犧牲了德雷富斯派。關於進一步重審的提案被以四百二十五票對六十票否決了，甚至連克列孟梭自己當政的1906年政府也不能改變這一狀況；它不敢將重審託付給一個普通法庭。通過上訴法院而（不合法律手續的）宣判無罪，這是一種折衷之計。然而，克列孟梭的失敗也不意味著教會和軍隊的勝利。教會與國家分離以及禁止教區學校，結束了天主教在法國的政治影響。同樣，將情報部門劃歸國防部，亦即歸屬非軍方當局，這就剝奪了軍隊對內閣和議院的威懾性影響力，也剝奪了它出於自己的利益而行使警察權力的藉口。

1909年，德魯芒成爲法蘭西學院院士候選人。他的反猶主義立場曾經受到天主教會的贊揚，也受到民眾的肯定。但是，此時這位「自傅斯台爾(Fustel)以來最大的歷史學家」（拉美特利〔Jules Lemaître〕語）不得已而聽從馬塞爾・普烈佛斯特(Marcel Prévost)（色情小說《半處女》〔*Demi-Vierges*〕的作者），這位新的「不朽者」接受了耶穌會神父杜拉克(Du Lac)的祝賀。[98]甚至連耶穌會也停息了它同第三共和國的爭吵。德雷富斯案件的結束標誌著教會反猶主義的收場。第三共和國採取了折衷方法，不經過正常審理而使被告洗刷罪名，同時限制了天主教組織的活動。伯納德・拉查爾要求使雙方都得到平等權利，而國家允許猶太人享有各種例外權利，卻威脅著天主教良知的自由。[99]眞正處於衝突狀態的雙方都被推到了法律之外，結果使猶太人問題和政治上的天主教主張都因此在實際政治舞台上被排斥在外。

使十九世紀的各種潛在力量載入史冊的唯一事件就此結束了。唯一看得見的結果是它導致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產生——這是猶太人對反猶主義所能作出的唯一政治回答，猶太復國主義是他們認眞地從敵對角度採取的唯一的意識形態，這使他們處於各種世界性事件的中心。

註釋

❶關於這一事件的著件之中內容最全、最重要的一部是約瑟夫・雷納克(Joseph Reinach)的《德雷富斯事件》(*L'Affaire Dreyfus*)(巴黎, 1903-1911, 第7卷)。晚近最詳細的研究著作是威廉・赫索格(Wilhelm Herzog)按社會主義觀點來寫的《共和國的奮鬥》(*Der Kampf einer Rêpublique*)(蘇黎世, 1933)。其中不厭其煩地列出的大事年表非常有價值。對這一事件所作的最好的政治評價和歷史評價是勃勞根(D. W. Brogan)的《現代法國發展史》(*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France*)(1940, 第6卷和第7卷)。比較簡明可靠的則是夏倫索爾(G. Charensol)的《德雷富斯事件與第三共和》(*L'Affaire Dreyfus et la Troisième Rêpublique*)(1930)。

❷由兩位政府官員撰寫，筆名昂利・杜特萊-克勞松(Henri Dutrait-Crozon)。

❷《法蘭西行動報》(*Action Française*)1935年7月19日一方面贊揚法國新聞界的克制態度，一方面宣揚說「四十年前正義與眞理的著名鬥士們如今沒有信徒了。」

❹見1945年8月18日《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阿欽堡(G. H. Archambault)的文章。

❺唯一的例外是天教國家的多數報刊都憤怒地反對德雷富斯，下文將另行論述。美國的輿論則是除了抗議之外，還組織起來抵制計劃中的1900年巴黎國際博覽會。這一威脅行動的效果亦見下文。對此所作的全面研究可見於哥倫比亞大學碩士論文檔案中羅絲・哈爾普林(Rose A. Halperin)的〈美國人對德雷富斯案件的反應〉(The American Reaction to the Dreyfus Case)(1941)。

❷例如德國駐巴黎大使漢斯・馮・布洛(H. B. von Bülow)寫信給帝國首相霍亨羅赫-胥林斯富特(C. von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說，赫內法院的判決是「粗俗與怯懦的混合，無疑地顯示出野蠻」，而法國則「因此將自己關閉在文明民族大家庭的門外」，此信寫於1899年9月12日，引自赫索格，前引書。據馮・布洛看來，這一事件可作爲對德國自由主義的「試金石」；參見他的著作

《紀念》(*Denkwürdigkeiten*)（柏林，1930-1931，第1卷），428頁。

❼特奧鐸·雷納克(Théodore Reinach)，《德雷富斯事件紀略》(*Histoire sommaire de l'affaire Dreyfus*)（巴黎，1924），26頁。

❽根據約瑟夫·雷納克(Joseph Reinach)的報導，時間是1898年6月18日，引自赫索格，前引書。

❽即使是克列孟梭，到晚年也不相信這一點了，雷內·本杰明的《隱退中的克列孟梭》(*Clémenceau dans la retraite*)（巴黎，1930，249頁）中引用的話清楚地顯示了這一點：「希望？不可能！我已不再相信曾經喚我覺醒的事物，也就是民主，我還會繼續抱希望嗎?」

❽「法蘭西行動」組織的著名成員韋崗(Maxime Weygand)年輕時是反德雷富斯派分子。他是「紀念昂利」的捐助人之一，由「自由論壇」(Libre Parole)爲對不幸的昂利上校表示敬意而建，昂利上校因在總參謀部僞造文件一事而自殺。捐助人名單後來由克列孟梭系統的報紙《黎明報》編輯之一吉拉德在《昂利紀念碑》(*Le Monument Henry*)一文中披露(巴黎，1899)。1895年至1899巴黎軍事政府期間，貝當在總參謀部任職，此時只有反德雷富斯派分子才能忍受軍事政府統治。參見龔泰米納·德·拉多爾(Contamine de Latour)〈貝當元帥〉(Le Maréchal Pétain)一文（載《巴黎評論》〔*Revue de Paris*〕，第1卷，57-69頁）。勃勞根，前引書，382頁中肯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法國的五名元帥中，四人（福煦〔Ferdinand Foch〕、貝當、利奧代〔L. H. G. Lyautey〕、費約爾〔Marie-Emile Fayolle〕）是很壞的共和主義者，而第五位元帥約弗雷(J. J. C. Joffre)則以宗教知識淵博出名。

⓫關於貝當的反猶立法是受到帝國逼迫的神話幾乎騙過了所有的法國猶太人，其實它是法國自己的產物。可參見于凡·西蒙(Yves Simon)，《法蘭西共和國的巨大危機：1918—1938年法國政治生活觀察》(*La grande cris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observations sur la vie politique des français de 1918 à 1938*)，蒙特利爾，1941。

⓫伯爾那諾，《論對正統思想的巨大恐懼：德魯芒》(*La grande peur des bien-*

pensants: Edouard Drumont)（巴黎，1931），262頁。

⓭沃德瑪・居利安(Waldemar Gurian)《法蘭西帝國的全面民族主義：查理・莫哈與「法蘭西行動」組織》(*Der integrale Nationalismus in Frankreich: Charles Maurras und die Aktion Française*)（美因河畔法蘭克福，1931，92頁）對君主專制主義運動和其他反動傾向作了明顯區別。居利安在《法國天主教的政治理想與社會理想》(*Die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Ideen des französischen Katholizismus*)(1929）中也討論了德雷富斯案件。

⓭關於這一類神話，可參見達尼爾・哈勒維(Daniel Halévy)〈爲我們的歷史辯護〉(Apologie pour notre passé)，載《半月刊》(*Cahiers de la quinzaine*)第40卷，第10號，1910年。

⓭左拉1898年《寄往法國的信》(*Letter to France*)中明顯可以看到這種思想的現代表現:「我們從各方面都聽說關於自由的觀念已經破產。當德雷富斯那件事發生後，對自由的普遍仇恨找到了最佳機會。……你可見到修雷爾-凱斯納受到憤怒攻擊的唯一原因是他屬於相信自由並爲之奮鬥的那一代人？如今人們對這一類事物不屑一顧……他們會嘲笑說『老掉牙的古板偉大』。」見赫索格，前引書，標示時間爲1898年1月6日。

⓭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在《法蘭西帝國的社會危機》(Die soziale Krise in Frankreich)(1901）一文中清晰地分析了九十年代試圖發動政變的各種企圖滑稽的本質。

⓭昂利上校僞造檔案一事究竟係參謀總部首腦的命令，抑或是自己作主，這一點尙未明瞭。同樣地，試圖謀殺德雷富斯案在赫內法庭重審時被告辯護人拉博里(Fernand Labori)一事的內幕亦未曝光。參見左拉《書信集：給拉博里的信》(*Correspondance: lettres à Maître Labori*)（巴黎，1929），32頁。

⓭參見沃爾特・弗蘭克(Walter Frank)，《法國的民主與民族主義》(*Demokratie und Nationalismus in Frankreich*)（漢堡，1933），27頁。

⓭參見格奧爾格・蘇瓦雷(Georges Suarez)，《克列孟梭高傲的一生》(*La Vie orgueilleuse de Clémenceau*)（巴黎，1930），156頁。

⑳前部長羅維葉(Maurice Rouvier)在調查委員會面前的證詞即如此說。

㉑巴黑簡潔地說：「每當雷納克吞進一筆錢時，赫茲就知道該怎樣使他吐出來。」(引自伯爾那諾，前引書，271頁。)

㉒參見弗蘭克前引書中〈巴拿馬〉(Panama)一章；蘇瓦雷，前引書，155頁。

㉓雷納克與赫茲的爭吵使巴拿馬醜聞帶有一種在十九世紀罕見的黑幫氣息。雷納克在拒絕赫茲勒索時，竟買通一些前警探，以一萬法郎的賞金要他們取赫茲的人頭。參見蘇瓦雷，前引書，157頁。

㉔參見勒凡揚(Levaillant)，〈第三共和國反猶主義的產生〉(La Genèse de l'antisémitisme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刊於《猶太研究評論》，(*Revue des étude juives*)，第53卷(1907)，97頁。

㉕見伯納德·拉查爾，《反反猶主義：論戰史》(*Contre l'Antisémitisme: histoire d'une polémique*)，巴黎，1896。

㉖關於奧爾良運動中高級銀行的共謀事實，參見夏倫索爾，前引書。這個強力集團的代言人之一是阿瑟·梅厄(Arthur Meyer)，《高盧人》(Gaulois)的出版者。梅厄是受過洗禮的猶太人，他在反德雷富斯派中屬於最惡毒的一羣。見克列孟梭1899年在《論不公正》(*L'Inequité*)一書中的〈今日展望〉(Le spectacle du jour)；又見赫索格前引書中1898年6月11日霍亨羅赫的日記。

㉗關於目前對拿破侖主義(Bonapartism)的研究，參見弗蘭克，前引書，419頁，資料來源於德國外交部檔案館中未發表的文件。

㉘雅克·雷納克生於德國，在意大利獲得男爵勛位，後入籍法國。考納利斯·赫茲生於法國，父母都是巴伐利亞人，赫茲少年時移居美國，後加入美國籍，發財致富。詳見勃勞根，前引書，268頁。

當地猶太人從公共事務中消失的典型方式，見烈維-克萊米厄(Lévy-Crémieux)一例，當巴拿馬公司的事務開始惡化時，他的財政顧問一職便被雷納克取代。詳見勃勞根，前引書，第4卷，第2章。

㉙拉查佩葉(Georges Lachapelle)，《第三共和國的財政》(*Les Finances de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巴黎，1937)，54頁，詳細敍述了官僚機構如何控制

公共基金，以及預算委員會如何完全地被私人利益左右。

關於國會議員的經濟狀況，可參見伯爾那諾，前引書，192 頁：「他們大多數人像甘伯塔(Léon Gambetta)一樣，甚至沒有替換的內衣。」

㉚根據弗蘭克的說法，極右派的阿瑟·梅厄，布朗熱派(Boulangerism)的阿爾弗雷德·那格特(Alfred Naquet)，機會主義派的雷納克，激進派的考納利斯·赫茲等等都是例子。

㉛德魯芒指責這些新來者：「那批偉大的猶太人白手起家而得到一切……連上帝也不知道他們從哪兒來。他們生活在神秘中，也不知他們是如何死的。他們是跳出來的，連他們的死也只是一種消失匿形。」(《成功者的舞台》〔*Les Trêtaux du succès*〕，巴黎，1901，237 頁。)

㉛可參見一篇出色的匿名文章〈德雷富斯事件：法國觀點的研究〉(The Dreyfus Case: A Study of French Opinion)，載《當代評論》(*The Contemporary Review*)，第 74 卷，1898 年 10 月。

㉛盧森堡：「軍隊不願意採取行動的原因是它要顯示自己反對共和國的國內力量，但在效忠君主專制的同時也失去那種對抗的力量。」見前引書。

㉛德國猶太人馬克西米連·哈登(Maximilian Harden)在《論未來》(*Die Zukunft*)(1898)一書中以此爲標題論述了德雷富斯事件。反猶主義歷史學家沃爾特·弗蘭克在他論述德雷富斯的一章時也用了同樣的標題。伯爾那諾(前引著作，413 頁)按照同樣思路評論說：「無論正確還是錯誤，民主總是視軍隊爲最危險的對手。」

㉛巴拿馬醜聞從所謂「威爾森事件」(Wilson affair)開始。總統的女婿有公開出賣榮譽稱號和勛章的行爲。

㉛參見埃多亞德·勒加努埃(Edouard Lecanuet)神父所著《1894—1910 年分裂的先兆》(*Les Signes avant-coureurs de la séparation, 1894-1910*)，巴黎，1930。

㉛布魯諾·韋爾(Bruno Weil)，《德雷富斯事件》(*L'Affaire Dreyfus*)(巴黎，1930)，169 頁。

(38)參見克列孟梭前引著作中〈十字軍東征〉(La Croisade)一節:「西班牙在羅馬教會的軛下扭歪折騰。意大利似乎屈服了。唯剩在垂死掙扎的天主教奧地利,以及大革命的法國甚至連教皇手下的人也部署起來反對。」

(38)參見伯爾那諾,前引書,152 頁:「帝國衰落和失敗之後發生的那種反動運動的眞正受益者是教士階層,這一點不必再重複。由於他們,1873 年後的民族反應才帶有宗教復興性質。」

(40)參見伯爾那諾,前引書,127 頁,論德魯芒以及「理智的天主教」的起源。

(38)參見赫索格前引書,日期爲 1898 年 1 月 21 日。

(38)參見勒加努埃,前引書,182 頁。

(40)參見本章註(38)。

(44)耶穌會的刊物《天主教世界》(*Civiltã Cattolica*)在幾十年間最公開地表達反猶觀點,它是世界上最有影響的天主教雜誌。早在意大利走向法西斯主義之前很久,它已從事反猶宣傳,而且它的政策不受納粹反基督教態度的影響。見喬世華・斯泰爾(Joshua Starr)〈意大利的反猶分子〉(Italy's Antisemites),載《猶太社會研究》(1939)。

據考奇(L. Koch)說,「在一切教團中,耶穌會因其組織而最能抵禦任何猶太影響。」見《猶太辭典》(*Jesuiten-Lexikon*),〈猶太人〉(Juden)條,帕德鮑恩,1934。

(40)根據 1593 年宗教會議規定,原先基督徒中的猶太後裔一律不得加入耶穌會。1608 年修改的條文規定調查到第五代祖宗;1923 年又修改規定爲第四代。在個別情況中,這些要求可由教團首領宣布豁免。

(40)參見波伊默(H. Böhmer),《論耶穌會》(*Les Jésuites*),譯自德文,巴黎,1910,284 頁:「自 1820 年來,從無獨立的國家教會能拒絕耶穌會主宰的教皇命令。如今高級教士們在聖河面前紮營,教會變成如偉大的耶穌會異議論者貝拉明(Bellarmin)所說的那樣,始終要求君主專制,它的政策由耶穌會指導,並且用按鈴的方式來表決它如何發展。」

(40)參見克列孟梭前引書中〈今日展望〉一章:「羅斯希爾德是全體反猶主義貴族

的朋友……類似阿瑟・梅厄，此人比教皇還像教皇。」

㊽關於阿爾薩斯省的猶太人（即德雷富斯所屬），可參見安德烈・福柯（André Foucault），《德雷富斯事件的一個新的方面》（*Un nouvel de l'Affaire Dreyfus*）（1938），310頁：「巴黎的猶太資產階級認爲他們是僵化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t raideur）的化身……一種冷淡蔑視的態度，這是紳士階級對待同一宗教的暴發戶的態度。他們希望完全同化於高盧模式，與舊日望族和睦相處，取得國家最著名的職位；他們顯示出藐視猶太商人和新近歸化的加利西亞『波蘭佬』，使他們幾乎像是自己種族的叛徒。……1894年的德雷富斯？哎呀，他們都是反猶分子！」

㊽「根據民主的意志，一切法國人都應成爲戰士；根據天主教徒的意志，他們應該成爲指揮官。」《當代評論》，第74期，598頁。

㊽赫索格，前引書，35頁。

㊽參見伯爾那諾，前引書，151頁：「於是，反猶主義以奇特的誇張方法來顯示自己的眞面目：不光是一種古怪念頭，一種奇詭的想法，而是一種主要的政治概念。」

㊽參見雷納克，前引書，第5卷，53頁，引埃斯特拉齊1894年7月致埃德蒙・德・羅斯希爾德（Edmond de Rothschild）信：「當克萊米厄（Adolphe Crémieux）上尉找不到基督教軍官做他的決鬥助手時，我並未猶豫。」亦可參見赫索格前引書中1892年與1894年6月的日期標示，詳細列舉了這些決鬥，埃斯特拉齊做中間人時也都列名其上。最後一次是1896年9月，他收受了一萬法郎。這種錯誤的慷慨後來造成了糾紛。之後埃斯特拉齊在英國過安全舒適生活時終於披露這些事情，由此促成了重審此案，反猶主義的新聞界自然會提出，他的自我譴責是由於收到猶太人報酬之故。凡認爲德雷富斯有罪者，都一再以此作爲主要的辯論根據。

㊽赫索格，前引書，1892年的日期標示下詳細指出了羅斯希爾德家族如何開始適應共和國。奇怪的是教皇的聯合政策（代表了天主教會恢復和睦的嘗試）也從同一年開始。因此，羅斯希爾德路線很可能是受了教會的影響。至於向俄國貸

款五億法郎，孟斯特伯爵中肯地指出：「法國停止了思考。資本家無法談論他們的保障……這一點有利於貸款的成功。猶太大人物們相信，如果他們賺錢，他們最能幫助他們那些機遇不佳的兄弟們。這樣的結果是，儘管法國市場充斥著俄國證券，法國人仍然在用信譽極好的法郎換取信譽極壞的盧布。」參見赫索格，前引書。

㊸參見雷納克，前引書，第 1 卷，471 頁。

㊹參見赫索格，前引書，212 頁。

㊺參見麥克斯・科勒(Max J. Kohler)，〈關於德雷富斯案件的一些新發現〉(Some New Light on the Dreyfus Case)，載《猶太問題與相關主題書目研究》(*Studies in Jewish Bibliography and Related Subjects in Memory*)，紐約，1929。

㊻例如，德雷富斯家族當即拒絕了作家阿瑟・萊維(Arthur Lévy)和學者列維-布留爾(Lucien Lévy-Bruhl)的建議，即他們應該呼籲公共生活中一切重要人物出面抗議。相反，他們只通過一些個人渠道隨機地與政治家接觸。參見福柯，前引書，309 頁：「人們會感到奇怪，遠方的法國猶太人爲何不盡量公開表達他們的憤怒，而是熱衷於秘密文件。」

㊼參見赫索格，前引書，標題日期爲 1894 年和 1898 年 1 月；夏倫索爾，前引書，79 頁，夏勒・貝圭(Charles Péguy)〈伯納德・拉查爾肖像〉(Le Portrait de Bernard Lazare)，載《半月刊》，第 11 卷，第 2 期 (1910)。

㊽在德雷富斯家族匆忙從拉博里手中撤回訴訟事實摘要之後，儘管赫內法庭重審仍在進行，拉博里也就退出了，此舉引起了很大轟動。此事在弗蘭克前引書的第 432 頁起有冗長的敍述。拉博里自己的陳述雄辯地展示了他的高貴性格，刊載於《大雜誌》(*La Grande Revue*) (1900 年 2 月)。左拉在他的顧問和朋友的遭遇之後也立即斷絕了同德雷富斯家族的關係。至於皮卡特，《巴黎迴聲》(*Echo de Paris*) (1901 年 11 月 30 日) 報導說，自從赫內法庭重審之後，他便不同德雷富斯家族來往。整個法國，甚至整個世界，都比被告或他的家族更明白這場審判的眞實含義，克列孟梭面對這一事實，更傾向於認爲這一事件的幽

默性質；參見韋勒，前引書，307-308 頁。

60 參見克列孟梭 1898 年 2 月 2 日的文章，載前引書。關於試圖用反猶主義的口號贏得工人而徒勞，以及論及列昂・多代特(Léon Daudet)的各種企圖，可參見保皇派作家第米埃(Dimier)的著作《法蘭西行動組織的二十年》(*Vingt ans d'Action Française*)，巴黎，1926。

60 約瑟夫・雷納克對當時社會的各種描述在這一方面比較典型，見前引書，第 1 卷，233 頁，第 3 卷，141 頁：「社會的腳步落後於蓋亨。它的語言(很少能表達它的思想)會引起恐懼……」在這一方面特別有意思的是 1900 年 2 月號《大雜誌》上安德烈・歇伏利昂(André Chevrillon)的文章〈赫內的八天〉(Huit Jours à Rennes)，他首先敘述了這樣一件可以揭示實質的事情：「一位醫生對我的幾個朋友說起德雷富斯，正說到『我眞想拷打他。』有一位女士插嘴說：『我希望他無罪。那麼他就可以受更深的痛苦。』」

60 奇怪的是這中間居然有保爾・梵樂希(Paul Valéry)，他捐了三法郎「聊表意思」。

60 約瑟夫・雷納克，前引書，第 1 卷，233 頁。

64 研究歐洲的迷信問題，或許可能揭示出猶太人相當晚才成爲這種典型的十九世紀迷信的攻擊目標，在這之前有羅西克魯斯派(Rosicrucians)、聖殿派(Templars)、耶穌會、共濟會(Freemasons)等等。對十九世紀歷史的研究中在這些方面缺憾不少。

60 參見 1898 年 2 月 5 日《天主教世界》中，耶穌會會士皮埃爾・夏勒・盧凡(Pierre Charles Louvain)對「猶太長老們」的譴責。

60 馬丁・杜伽德(Martin du Gard)《讓・巴洛埃》，(*Jean Barois*)，272 頁起；達尼爾・哈勒維的文章，見《半月刊》第 11 卷，第 10 期，巴黎，1910。

60 參見格奧爾格・索黑爾(Georges Sorel)，《德雷富斯革命》(*La Revolution dreyfusienne*)(巴黎，1911)，70-71 頁。

60 從他們中間的優秀分子、參議院副議長修雷爾-凱斯納事件中，可以看到國會議員們的手被束縛得多麼緊。當《自由論壇》公布他的女婿與巴拿馬醜聞有牽

連的事實時，他也就轉向反對重審案件。參見赫索格前引書中 1897 年 11 月的內容。

(69) 參見勃勞根，前引書，第 7 卷第 1 章：「法國猶太人普遍希望事情平息下來，法國猶太富人尤其希望如此。」

(69) 皮卡特在公布了他發現的眞相之後立即被貶往在突尼斯的一個危險崗位。他因此下決心要將全部眞相公諸於眾，他將文件副本交托給他的律師。幾個月後，當人們發現他還活著，他收到了大批神秘的來信，或同他和解，或指責他與「叛國者」德雷富斯共謀。他被人當作一個威脅要去「告密」的歹徒。當這一切都宣告無效時，他被捕了，被逐出軍隊，剝奪勛章。對於所有這些，他都平靜沉著地忍受了。

(69) 這羣人以夏勒・貝圭爲首，成員有年輕的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蘇瓦雷、索黑爾、哈勒維、拉查爾。

(69) 參見巴黑，《民族主義的場景及教義》（*Scènes et doctrines du nationalisme*），巴黎，1899。

(69) 見于凡・西蒙，前引書，54-55 頁。

(74) 赫內大學的五名教授宣布支持重新開庭之後，教員辦公室立即被搗毀。左拉的第一篇文章發表之後，保皇主義的學生們在《費加羅報》（Figaro）社外示威，致使該報再也不敢發表同類文章。支持德雷富斯的《戰鬥》（*La Bataille*）的出版者在街頭遭毆打。最高上訴法院的法官們最終撤銷 1894 年原判時，據報紙一致報導，他們受到「非法襲擊」的威脅。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

(69) 1898 年 1 月 18 日，博爾多、馬賽、克列蒙-費朗特、南特、胡昂和里昂都發生了反猶示威。第二天，在胡昂、土魯斯、南特都發生了學生騷亂。

(69) 最殘暴的例子是赫內的警察總監。當兩千多名暴徒搗毀了維克多・巴希教授的住所後，這位警察總監居然對巴希教授說，由於他不再能保證巴希的安全，所以巴希應該遞交辭職書。

(69) 參見伯爾那諾，前引書，346 頁。

(78) 關於這些理論，尤見夏勒・莫哈，《以花爲記——政治生活回憶錄：德雷富斯

事件與法蘭西行動組織的基礎》(*Au Signe de Flore; souvenirs de la vie politique; l'Affaire Dreyfus et la fondation de l'Action Française*)，巴黎，1931；巴黑，前引書；列昂・多代特，《第三共和概況》(*Panorama de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巴黎，1936。

⑲參見克列孟梭〈在漂流中〉(A la dérive)一文，見前引書。

⑳正是這一點使德雷富斯派甚感幻滅，尤其是夏勒・貝圭周圍的一羣人。德雷富斯派和反德雷富斯派之間這種令人不安的相似性，構成了馬丁・杜伽德那本富有啓發意義的小說《讓・巴魯瓦》(1913) 的題材。

㉑見《反對正義》(*Contre la Justice*)(1900) 序言。

㉒見克列孟梭幾年後在參議院的演講；參見韋爾，前引書，111—113 頁。

㉓參見赫索格，前引書，標題日期是 1898 年 10 月 10 日。

㉔《當代評論》，第 76 期，608 頁。

㉕國防部長格里菲寫信給沃爾德克(René Waldeck-Rousseau)說：「我們不應忘記，法國民眾大多數是反猶主義者。所以，我們應選擇的立場是整個軍隊和大多數法國人的立場，更不用說政府官員和參議員們的立場了。」參見雅克・雷納克，前引書，579 頁。

㉖其中最出名的一次企圖是德洛萊德 1899 年 2 月在參加保爾・福荷(Paul Faure)總統葬禮時嘗試煽動羅格(Gaudérique Roget)將軍叛變。德國駐法大使館每隔幾個月就有一次這樣的報告。巴黑在前引著作第 4 頁上出色地總結了這方面的情況：「我們在赫內找到了戰場。我們所需的只是軍人，或者說得準確些，是幾個將軍，或更準確地說，**一個**將軍。」政變之所以沒發生，是因爲找不到這樣一個將軍。

㉗勃勞根甚至將整個教士階層的騷動歸咎於聖母會。

㉘《當代評論》，第 74 期，597 頁。

㉙「事件的最初刺激很可能來自倫敦，1896—1898 年剛果—尼羅河傳教團事件在倫敦引起某種程度的騷動，」莫哈在 1935 年 7 月 14 日《法蘭西行動報》上是這樣寫的。倫敦的天主教報紙爲耶穌會辯護，見《月報》(*The Month*)，第 18

卷（1899）。

⑩ 1898年2月5日《天主教世界》。

⑩參見具有具特別代表性的文章，喬治・麥克德莫特(George McDermot)神父的〈張伯倫先生的外交政策與德雷富斯案件〉(Mr. Chamberla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Dreyfus Case)，載美國《天主教世界》(*Catholic World*)月刊，第67期，1898年9月。

⑩參見埃多亞德・勒加努埃神父，前引書，188頁。

⑩參見羅絲・哈爾普林，前引書，59頁及77頁起。

⑭拉查爾，《約伯的肥料堆》(*Job's Dungheap*)（紐約，1948），97頁。

⑩參見拉博里，〈不道德的政治與政黨〉(Le mal politique et les partis)，載《大雜誌》(1901年10—12月)：「在赫內法庭，被告表示服罪，而辯護者請求重審，希望得到寬恕，從這一時刻起，德雷富斯案件作爲一個偉大的、普遍人權的議題就此結束了。」克列孟梭在他的〈今日展望〉一文中談到阿爾及爾的猶太人，「羅斯希爾德不會爲了他們而發出一點兒抗議之聲。」

⑩見克列孟梭的《論不公正》中〈今日展望〉、〈猶太人〉(Et les Juifs)、〈辛迪加的鬧劇〉(La Farce du syndicat)、〈猶太人，別洩氣！〉(Encore les juifs!)等文章。

⑩參見左拉1899年9月13日的信，載《通信集：致拉博里的信》。

⑩參見赫索格，前引書，97頁。

⑩夏勒・貝圭在〈我們的青年人〉(Notre Jeunesse)（《半月刊》，1910）一文中對拉查爾在德雷富斯事件中的地位作了很好的描述。貝圭認爲拉查爾是猶太人利益的眞正代表，他將拉查爾提出的要求歸納如下：「他是維護法律公正的鬥士。他維護德雷富斯案件中法律的公正，他在宗教組織中仍然維護公正的法律。這好像微不足道；這也可以走向極端。這一點又將他引向孤寂的死。」（引自拉查爾的《約伯的肥料堆》前言）拉查爾是最初的德雷富斯派中反對法律統治宗教集會的人之一。

第 二 部

帝國主義

如果可能，我眞想併吞所有的星球。

——塞西爾・羅德斯
(Cecil Rhodes)

第五章
資產階級的政治解放

從 1884 年至 1904 年這三十年劃分了十九世紀（以爭奪非洲和產生各種世界性運動爲終結）和二十世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作爲開端）。這是帝國主義的時期，歐洲呆滯平靜，亞洲和非洲的發展令人吃驚。❶這個時代的某些基本方面顯示出非常接近於二十世紀的極權主義現象，因此可以認爲這整個時期是即將來到的大災難的前奏階段。另一方面，它的平靜使它看來仍然是十九世紀的一個部分。我們很難避免用過於明智的眼光來看待這段很近的、然而又很遙遠的過去歷史，用這種眼光可以事先知道事情的結果，知道事情會導致延續不斷的西方歷史走向幾乎完全斷絕，一如我們兩千多年前就明瞭的。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自己懷有某種懷舊情緒，懷念一種可以稱爲「安全的黃金時代」的情景，在那種時代，即使是恐怖可怕的事情，也被對歷史的尊敬心情修飾和遏制了，因此總將它說成普遍的精神健全的時代。換言之，無論這段以往歷史離我們多近，我們總能恰當地意識到，對集中營和死亡工廠的體驗，其總體氣氛，就像對西方歷史上任何時期一樣，是很遠久了。

帝國主義時期歐洲內部的中心事件是資產階級的政治解放，它直到那時還是歐洲歷史上第一個並不渴望政治上統治而達到經濟上傑出成就的階級。資產階級在民族國家之內隨同它的發展而一起發展，根據定義，民族國家完全統治一個階級劃分的社會。即使當資產階級已使自身確立爲統治階級，它也將一切政治決策交給國家。只有當民族國家證明已不適應資本主義經濟進一步發展時，國家與社會之間的潛在對抗才公開變爲權力鬥爭。在帝國主義時期，國家與資產階級都不能贏得決定性的勝利。國家機制自

始至終抵制帝國主義的野蠻狂妄抱負，而資產階級則嘗試利用國家及其暴力工具來達到經濟目的，但往往不能完全成功。當德國資產階級將全部賭注押在希特勒運動上，渴望借用暴民的幫助來統治國家，這種情形才改變，但結果已經太晚了。資產階級成功地摧毀了民族國家，但是只贏得了犧牲代價極大的一場勝利；暴民們完全能夠憑自身從事政治活動，將資產階級連同一切其他階級和機構全都掃除。

(一)擴張與民族國家

塞西爾·羅德斯(Cecil Rhodes)說：「擴張就是一切，」但是陷入絕望，因爲每天夜裡他都看到頭頂「這些星星……這些廣袤的世界，我們無法達到。如果可能，我眞想吞併所有的星球。」❷他發現了新的帝國主義時代的運動規律(在不到二十年時間裡，英國殖民地增加了四百五十萬平方英里，殖民地人口增加了六千六百萬；法國獲得了三百五十萬平方英里，人口二千六百萬；德國贏得了一個新帝國，面積一百萬平方英里，人口一千三百萬；比利時國王獲得了九十萬平方英里，人口八百五十萬❷)；然而一瞬間的智慧，羅德斯同時認識到它的內在瘋狂本性，以及它同人類境況的矛盾。自然，深刻見解和悲哀心理都不會使他改變政策。他沒有善用智慧的瞬間，卻走得太遠，背離了一個雄心勃勃的商人的正常能力，明顯地傾向於狂妄。

德國進步黨領袖歐根·里希特(Eugen Richter)在差不多相同的歷史時刻說：「世界政治之於民族相當於狂妄之於個人。」❹但是，他在國會的時候反對俾斯麥關於支持私人公司以建立貿易和海岸基地的提案時，顯示出他對於一個民族的經濟需要的理解甚至不如俾斯麥。看來那些反對或忽視帝國主義的人——例如德國的歐根·里希特，英國的格萊斯東(William E. Gladstone)，法國的克列孟梭——脫離了現實，不瞭解貿易和經濟早已將每一個民族都捲入了世界政治。民族原則導致偏狹的無知，理智的戰鬥

全會失敗。

任何政治家，如果堅持反對帝國主義擴張的話，他得到的報償只會是迷惑和混亂。因此，俾斯麥在1871年拒絕法國以非洲殖民地交換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的建議。二十年後，他用烏干達(Uganda)、桑給巴爾(Zanzibar)和維都(Vdtu)向英國換來海利戈蘭(Heligoland)時，就如德國的帝國主義份子對他說的，兩個王國換來一只浴缸也還算公平。克列孟梭也是如此，他在八十年代拒絕法國的帝國主義政黨派遣一支遠征軍到埃及去同英國作戰，不料三十年後，爲了建立法英同盟，他將莫蘇爾油田交給英國。還有格萊斯東，在埃及的克洛默(Cromer)勛爵譴責他「不是一個大英帝國可以放心地將命運託付的人。」

這些政治家考慮問題首先想到的是既定的民族疆土，如果所涉及的超越了他們號稱的「海外探險」，他們就會懷疑這是帝國主義。他們不是根據深刻洞察，而是根據直覺知道，這種新的擴張運動中「愛國主義……在賺錢中表現」(休伯—施萊登〔Hübbe-Schleiden〕語)，而國旗是一種「商業資產」(羅德斯語)，民族國家的政體會毀於這種擴張運動。一些很好的理由卻使征服和帝國建設事業名聲掃地。事業的成功首先要依靠建立在法律基礎上的政府，例如羅馬共和國，所以征服之後，緊接著他們能用強制執行一種共同法律的方式，使四分五裂的民族統成一體。但是，民族國家的基礎是同一種族的民衆對政府的積極擁護(「日常的公民投票」❺)，如果缺乏這樣一種統一原則，那麼如果是征服，就會將被征服者同化，而不是讓他們統一；是強迫他們擁護，而不是使他們服從正義，這也就墮入暴政了。羅伯斯庇爾早就意識到這一點，他宣布說：「爲了自由，我們將取消殖民地作爲光榮的代價。」

帝國主義的中心政治觀念就是將擴張當作永久的最高政治目標。由於它所意指的既不是暫時掠奪，也不是較長時間的征服後的同化，所以它在政治思想和行動的漫長歷史上是一個全新的概念。這種令人驚奇的獨創性

——說它令人驚奇，是因爲在政治學中全新的概念很少見——的原因很簡單，它實際上根本不是政治概念，而是從商業考慮的範圍裡產生的，其中所說的擴張意味著工業生產和經濟業務的永久性拓展，這是十九世紀的特點。

在經濟領域，擴張是一個貼切的概念，因爲工業成長是一種運行中的現實。擴張意指增加被使用和消費的商品的實際生產。生產過程不受限制，正如人類的生產能力、創造能力、改造人類世界的能力不受限制一樣。當生產與經濟增長發展緩慢時，它們所受的限制主要不是經濟方面，而是政治方面，因爲生產所依靠的、享用產品的，乃是許多不同的人，他們組成了各種差異很大的政治實體。

資本主義的統治階級起而反對它的經濟擴張受到民族國家限制之時，帝國主義產生。資產階級出於經濟需要而轉向政治；因爲它如果不想放棄資本主義制度，要遵循其經濟不斷增長的內在規律，它就必須將這條規律強加給它的政府，宣布以擴張爲外交政策中最終的政治目標。

資產階級以「爲擴張而擴張」爲口號，嘗試並部分成功地說服其國家政府走上世界政治之路。他們提出的新政策一時似乎爲了找到民族國家天然條件的限制和平衡，根據的事實是有幾個國家已經同時開始競爭擴張了。帝國主義在開始階段時仍可被形容爲「幾個競爭的帝國」的鬥爭，不同於「古代和中世紀世界的帝國概念，那時的帝國是一國霸主(hegemony)下的幾國聯盟，包括……整個被承認的世界。」❻然而這類競爭只是過去時代的許多遺跡之一，是對當時仍然流行的民族原則的讓步，根據那種原則，人類是一個由競相爭取優越地位的各民族組成的大家庭，或者根據自由信念，在一個競爭者淘汰其他競爭者之前，競爭會自動設定其穩定化的先決限制。但是，這種愉快的平衡幾乎不可能成爲神秘的經濟規律的必然結果，反而嚴重地依賴於政治制度、甚至是警察制度來阻止競爭者運用武器。全副武裝的商業集團——「帝國」——之間的競爭結果，只能是一方勝利，其餘各

方死亡，這一點的原因很費解。換言之，政治原則不再是競爭，而是擴張，而控制和限制都迫切需要政治權力。

同經濟結構相比，政治結構不能無限擴張，因爲它的基礎不是無限的人類生產力。在一切政府形式和組織中，民族國家最不能適應無限增長，因爲民族國家建立在眞誠的共識，但它並不可能無限增長，而且只有在很少的情況下，才能很困難地獲得被征服民族的眞正擁護。沒有一個民族國家可以自認良心淸白地企圖去征服外國民族，因爲這種良是只產生於征服者民族的一種信念，認爲征服是將一種優等的法律強加給野蠻人。❼然而，這個民族相信它的法律來自一種獨特的民族素質，其他民族不具備這種素質，它的界域之外也不存在這種素質。

民族國家無論在何處以征服者姿態出現時，就會在被征服民族中喚起了民族意識與主權願望，由此擊敗一切眞正想建立帝國的企圖。所以，法國兼併阿爾及利亞，將它當作母國的一個省份，但是不能將自己的法律強加給阿拉伯人民。他們寧可繼續尊重回教法律，允許他們的阿拉伯公民具有「個人地位」，如此造出一個屬於法國疆域的荒謬組合，就像塞納省的行政區在法律上是法國的一部分，它的居民却不是法國公民。

早期的英國「帝國創建者們」信以爲征服可以成爲一種永恒的統治方法，却從來不能兼併相隔最近的鄰國愛爾蘭，將它併入在廣大地方建立起來的大英帝國或英聯邦；但是在二次大戰後，當愛爾蘭獲准成爲自治領，並作爲一個有充分資格的成員加入英聯邦時，英國的失敗即使不明顯，也是確實的。愛爾蘭這個最古老的「屬地」和最新的自治領，都於 1937 年單方面宣布不接受所謂自治領地位，並拒絕參戰而斬斷了與英國的一切關係。自從它「根本不能摧毀」愛爾蘭（契斯特頓語）時起，英國以永久征服來實施統治並沒能很好地喚起它自己的「蟄伏的帝國主義天才」，❽反倒喚起了愛爾蘭的民族抵抗精神。

英國的民族結構使它不可能迅速同化和兼併被征服的民族；英聯邦絕

不是一個「各民族的聯合體」(Commonwealth - of- Nations)，而是聯合王國的繼承體，**一個**國家分散在全世界。分散和殖民化不是擴張，而是移植政治結構，結果使新的聯邦體成員們繼續緊密地繫結於它們的共同母國，其可靠的理由是有共同的以往歷史與共同的法律。愛爾蘭的例子證明，聯合王國想建立一種帝國結構，使許多不同的民族在裡面心滿意足地生活在一起，這種想法是多麼不合時宜。❾事實證明不列顛民族不能適應羅馬式的帝國建設，只能追隨希臘式的殖民化模式。英國殖民者不是征服並將自己的法律強加給外國民族，而是將在全世界各地新贏得的土地穩定下來，使它們繼續成爲同一個不列顛民族的成員。❿英聯邦的結構方式是建立在一個國家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現實基礎上，它是否足以靈活地平衡民族在建立帝國時的內在困難，永久地承認非不列顛民族是充分發展的「被觀照的夥伴」，這還有待於觀察。印度目前的自治領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戰爭期間，印度民族主義者坦率地否認這種地位——常常被以爲是一種暫時的、過渡性的解決方案。⓫

民族的政體和作爲政治手段的征服之間的內在矛盾，自從拿破侖的美夢破滅之後就一直很明顯。正是出於這種經驗，而不是出於人道主義考慮，征服受到正式譴責，它在調解邊界衝突方面只起到很小的作用。拿破侖未能在法蘭西的旗幟下統一歐洲，這表明由一個民族實行征服，就會導致被征服的人民的民族意識完全覺醒，接著就會揭竿而起反抗征服，或者會導致暴政。而透過暴政或許可能成功地統治外族，因它不需要任何同意，但只有當它首先摧毀自身民族的國家機構後，才能繼續掌權。

法國同英國和歐洲的一切其他民族相比，實際上在近代企圖將國家和最高統治權力結合起來，建立古代羅馬式帝國。它至少獨自在嘗試將民族的政體發展成一種帝國主義的政治結構，相信「法蘭西民族在前進……去傳播法蘭西文明的優點」；它想將海外屬地兼併入民族實體，將被征服的各民族當作「既是……兄弟，也是……臣民——在法蘭西共同文明的博愛中

是兄弟，在他們是法蘭西之光的信徒和法國領導下的追隨者這一點上，他們是臣民。」[12]這一點部分地做到了：有色人種的代表在法國議會裡取得了席位，阿爾及利亞宣布它是法國的一部分。

這種雄才大略的結果是，爲了本民族利益起見，特別野蠻地剝削海外屬地。同一切理論相反，法蘭西帝國事實上是從民族防禦的角度來評價一切的，[12]將殖民地看作屬於軍人的土地，能夠產生一種「黑色力量」，保護法國居民，反對民族敵人。波安加雷(Raymond Poincaré)於 1923 年說的名言「法蘭西不是四千萬人的國家；她是一億人的國家」，直接指出發現一種「槍炮的經濟形式，用大規模生產的方式來製造」。[14]當克列孟梭在 1918 年的和平談判桌上堅持說，他只關心「如果將來德國進攻法國，那時應該有無限的權利徵召黑人軍隊，協助保衛法國在歐洲的本土。」[12]很不幸，我們現在知道，他並未能夠在德國入侵時拯救法國，雖然參謀總部執行了他的計劃，但是對前途未明的「法蘭西帝國」不啻是致命的一擊。[16]與這種盲目狂熱的民族主義相比，英國的帝國主義者在託管制度方面的妥協，使之表面上成爲各民族自決的衛士。這樣一來，他們就開始用「間接統治」的手段濫用託管制度，在事實上允許統治者在統治一個民族時「並不直接地、而是通過他們自己的部落首領或地方當局作爲中介，來實施統治。」[12]

英國人試圖採用讓被征服的各民族運用自己的統治工具——包括文化、宗教、法律——來管理殖民地，而自己高高在上，避免施展英國的法律和文化，這樣就可在建立帝國的嘗試中避免使本民族的內在傳統有中斷的危險。但這並不能阻止殖民人民發展民族意識，爭取主權和獨立——儘管它多少使這一過程遲緩。然而，這又極大地增強了一種新的帝國主義意識，一種根本的而不是暫時的人對人的優越感，「高等人」對「低等種類」的優越感。這反過來更激怒殖民人民爲自由而戰鬥，從而看不到英國的統治給他們帶來的毫無疑問的好處。「當地人」從那些高高在上的統治者——「儘管他們也眞誠地將當地人當作一個民族來尊重，而且在某些情況下

也熱愛他們，……幾乎熱愛到具體的一個人，但是並不相信他們究竟能否在不受監督的情況下自己實行統治。」⑱——「當地人」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他們永遠被排除和隔離在人類的其餘部分之外了。

帝國主義不是建立帝國，擴張也不是征服。英國征服者，舊日「在印度破壞法律的人」(伯克語)，與英國金錢輸出者或治理印度民族的行政者幾乎沒有共同之處。假如後二者從使用法令轉變爲制訂法律，他們就可能變成帝國建造者。然而問題在於英國對此不感興趣，很少願意支持這種人。帝國主義心態的商人之後，是政府官員們，他們想「讓非洲人自成非洲人」，而另外有很多人，他們尙未走出哈羅德・尼柯爾森(Harold Nicolson)曾經稱之爲「童年理想」階段，⑲却想幫助非洲人「成爲更好的非洲人」⑲——天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不會「將自己國家的統治制度和政治制度強制用於落後民族的政府，」⑲將英國王冠下遙遠的屬地繫結於英國民族。

眞正的帝國結構是母國的制度以各種方式整合成一個帝國，而帝國主義的特徵是國家制度同殖民行政分開，儘管它可以控制殖民地政府。制度分開的實際動機是傲慢與尊重的奇怪組合：在海外的統治者面對著「落後民族」或「低等種類」，新的傲慢與國內的舊派政治家的尊重態度相呼應，舊派政治家以爲任何民族都無權將它的法律強加給一個外國民族。根據事物的本性，傲慢轉變爲一種統治的工具，而尊重則完全是負面，並不產生一種新的方式以使各民族共同生活，却在一定範圍內用命令(decrees)來維持無情的帝國主義統治。畢竟不管怎麼說，非歐洲的各民族能夠從西方的統治中獲得好處，無論這些好處是什麼，我們都將它們歸結爲對國家體制、對政治家的有益限制。但是殖民機構從未停止過反對「無經驗的大多數人」(即國家)「以模仿的方式」試圖對「有經驗的少數人」(即帝國主義統治者)施加壓力，⑲即要求根據本國關於正義和自由的一般標準實行統治。

在民族國家裡產生了一種爲擴張而擴張的運動，而民族國家比其他任

何形式的政體都更受疆域的限制，征服他人的可能性也有限度，這是一個表面看來很荒誕的原因與結果分離的例子，它成了近代歷史的一大特點。近代歷史學術用語的混亂是這些因果分離的副產品。與古代帝國相比，將擴張混同於征服，忽略了聯邦與帝國之間的區別（前帝國主義歷史學中稱之爲拓墾地〔plantation〕與屬地〔possession〕、殖民地〔colony〕與附屬國〔dependency〕之間的區別，或在較晚一些時候所稱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區別㉓），換言之，忽略了輸出（英國）人和輸出（英國）金錢之間的差別；㉓歷史學家們試圖以上述這種種方式，消除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即近代歷史上如此衆多的重要事件都好像是在小題大做。

當代歷史學家們面對著一種景象：一些資本家向全世界作掠奪性的搜索，尋找新的投資機會，他們訴求於太富的人的利潤動機和太窮的人的賭搏本性，因此使歷史學家們用一種羅馬帝國和亞歷山大大帝式的舊日輝煌來遮掩帝國主義的面目，用這種輝煌來使以後發生的一切事件更能令人容忍。有一句不幸言中的著名說法，大英帝國是在心不在焉時造就的，這透露了因果之間的不相稱；殘酷的是，在我們的時代，需要用一場世界大戰來擺脫希特勒，令人感到羞耻，恰恰又因爲這是一齣笑劇。在德雷富斯事件期間，相似的情形早已出現過，當時一個民族中最優秀的一批人需要結束一場鬥爭，這場鬥爭以天方夜譚的陰謀開始，却以一場滑稽劇告終。

帝國主義唯一的一次輝煌是一個民族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裡的失敗。這場不太熱切的反抗是一場悲劇，其悲劇性質不在於許多國民代表竟可以被新帝國主義商人們收買；比腐敗更糟糕的是，不腐敗的人們竟會相信帝國主義是他們操作世界政治的唯一出路。既然海軍基地和取得原料這兩件事對於一切民族來說都是必要的，那麼他們也就相信，吞併和擴張將有效地拯救民族。他們是第一批人，不懂舊的貿易基礎和以貿易爲著眼點而建的海軍基地和新擴張政策之間的根本區別。他們相信塞西爾・羅德斯的話，要認醒一個事實，除非你同全世界貿易，否則就不能存活，」「你的

職業就是世界，你的生命就是世界，不是英國，」因此他們「必須面對這些問題，即全世界的擴張和維續。」㉕他們並非出於意願，有時甚至連自己也不知道，他們已經不僅變成了帝國主義政策的同謀，而且首當其衝地由於他們的「帝國主義」而受到譴責和揭露。克列孟梭就是一個例子，由於他過於焦慮法蘭西民族的前途，希冀殖民的人力可以保護法國公民，反對侵略者，竟使他自己轉變爲「帝國主義者」。

由議會和新聞自由所代表的民族良心，在歐洲一切擁有殖民地的國家——英國、法國、比利時、德國或荷蘭——發揮了作用，却被殖民地行政者所憎惡。在英國，爲了區分位於倫敦並由國會控制的帝國政府和殖民地統治者，就將這種影響稱作「帝國因素」(imperial factor)，於是使帝國主義還留有正義的殘餘和優點，而這又恰恰是它很想要淸除掉的。㉕「帝國因素」的政治概念表述爲英國人，「帝國國會」(Imperial Parliament)不僅保護殖民地當地人，而且代表他們。㉕這樣，英國人在建立帝國的方法上與法國的實驗很相像，儘管他們從不像法國人那樣事實上代表被征服的民族。但是他們明顯地希望整個民族作爲一個整體，能成爲被征服民族的託管人，實際上英國一貫在嘗試最好的方法，以避免最壞的結果。

「帝國因素」(其實應該叫做民族因素)的代表人物同殖民地政府官員們之間的衝突像一根線，貫穿於不列顚帝國主義的歷史。克洛默在他統治埃及期間，於1896年向薩利斯伯里勛爵「祈求」說「救我脫離英國行政區，」㉕此話說了又說，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這個國家及其代表的一切受到激進的帝國主義政黨公開譴責，言其造成失去印度的威脅。帝國主義者一向深深厭惡印度政府居然必須「在英國公衆輿論面前證明它的存在和政策是正當的」；這種控制現在已使帝國主義者不可能進行「行政屠殺」(administrative massacres)，這種措施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其他地方作爲綏靖的極端手段，㉚它的確可能阻止印度的獨立。

德國在非洲的國家代表和殖民官員之間也流行相同的敵對情緒。1897

年，卡爾·比德斯(Carl Peters)被調離德屬東南非洲的職位，並且被迫辭去政府機構的職務，原因是他殘暴地對待當地人。總督齊默勒(Zimmerer)也是同樣情形。1905年，部落酋長們第一次向德國國會發表了不同意見，結果，當殖民地行政官要他們下獄時，德國政府介入了此事。㉛

法國的殖民統治情況也一樣。巴黎政府任命的殖民地總督或者屈從於法國殖民者的強大壓力，例如在阿爾及利亞就是如此，或者乾脆拒絕在對待當地人的問題實行改革，據說這是由「(他們) 政府脆弱的民主原則」激發的結果。㉛帝國主義統治者在到處都感到對一個民族的控制是一種無法忍受的負擔，並且對統治者也是一種威脅。

帝國主義者們的感覺無疑是對的。比起那些一方面反對政府命令和獨斷的官僚統治，另一方面希望爲自己民族的更大榮譽而維持屬地的人來，他們更懂得如何在現代條件下對被征服的民族實行統治。帝國主義者們比民族主義者們更懂得，他們的國家政體不適於建立帝國。他們充分意識到，本民族向世界邁進並征服其他民族，這件事如果按它的內在規律發展的話，最終會喚起被征服者的民族識醒，造成征服者的失敗。因此，法國一向將民族激情與建立帝國結合起來，這種方式成功率比英國小得多。英國方式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以後顯示出公開的帝國主義性質，儘管它受到了保留其民主制度的母國的限制。

(二)權力與資產階級

帝國主義者們事實上想要的是，不需建立一種政體而能擴張政治權力。帝國主義的擴張以經濟危機作爲奇特的開始方式，資本主義過剩和「剩餘」資金（係過分儲存的結果）造成本國範圍內無法再找到有效投資場所。權力投資有史以來第一次不能爲金融投資鋪平道路，而是權力輸出卑順地跟在資本輸出的後面，因爲在遙遠國家的投資威脅著將社會的大部分階層轉

變爲賭徒，將整個資本主義經濟從生產制度轉變爲金融投機制度，用傭金利潤代替生產利潤。帝國主義時代之前的十年（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出現了先前無法比擬地增加的騙局、金融醜聞、股票市場的投機。

前帝國主義發展的先驅者是一部分猶太金融家，他們在資本主義制度之外掙得了財富，日益發展的民族國家需要他們來保證國際信貸。[33]隨著稅務制度的建立，保證了政府財政的穩定收入，這個羣體就不能不恐懼它遭到完全滅絕。幾個世紀來，他們靠傭金掙得財富，很自然地首先受到誘惑，轉移那些在國內市場上不再生利的資本。猶太國際金融家看來確實適合於這樣重大的國際商業操作。[34]再者，政府本身在某種形式上對於在遙遠國家投資者也是必需的保證，因而從一開始就寧可選擇著名的猶太金融家而不是生手來從事國際金融事業，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冒險家。

多餘財富在國民生產的狹小框架中必然被閑置，金融家們打開了資本輸出的渠道以後，很快地就可以明顯看到閑散股東們不想採取能使他們的利息巨倍增加的巨大冒險。而要從事這種冒險，賺傭金的金融家們即使得到國家的仁慈幫助，也沒有足夠的力量來保證成功：只有一個國家的物質力量才能做到這一點。

一旦確定資金輸出隨之而來是政府權力輸出，一般金融家——具體說來就是猶太金融家——的地位就相當微弱了，帝國主義商業活動和企業的領導權就慢慢地被當地的資產階級成員接管。這一方面比較有典型意義的例子是塞西爾·羅斯德在南非的生涯，他在當地完全是一個新來者，幾年之內，他就將那批最有實力的猶太金融家排擠掉了。在德國，勃萊赫羅埃德在1885年時還是創建一家公司「東非會社」(Ostafrikanische Gesellschaft)的合夥人，十四年後，當德國開始建造巴格達鐵路時，他與赫胥(Moritz Hirsch)爵士一起被正在形成中的帝國主義企業鉅子——西門子和德國銀行——取代。在某種程度上，政府不願意把眞正的權力拱手交給猶太人，猶太人不願意從事與政治活動有牽連的事業，這兩點十分符合，除

了猶太團體的巨大財富以外，在冒險投機和賺取傭金的最初階段結束之後，事實上也並未有更多的爭權奪利。

各國政府錯誤地看待商業轉化爲政治問題的發展傾向，以及將相對較小的羣體的經濟利益認作國家利益的傾向。但是，看來想要輸出權力的唯一選擇是有意犧牲很大一部分國民財富。只有通過國家暴力工具的擴張，向國外投資的運動才能理性化，而多餘資本引起的以一切儲備金作賭注，才能重新歸併入國民經濟體系。國家擴張權力，是因爲在兩種選擇——任何國家的經濟實體都無法承受的巨大經濟損失和任何民族都夢想靠自己的手段得到更大的收穫——中，它只能選擇後者。

權力輸出的第一個結果是國家的暴力工具——警察和軍隊並存於民族結構中的制度由這個政體控制——從這個政體中分離，並成爲未開化民族或弱國的國家代表。在這裡，在沒有工業、沒有政治組織的落後地區，暴力比在任何西方國家裡具有更大的活動餘地，所謂資本主義的法則事實上允許創造更多的現實。但是如果資金要經過長期的投資生產，那麼資產階級希望，像人會繁衍更多的人一樣，使金錢創造出更多金錢，這種空洞願望仍然只是一個醜陋的夢；不是錢能生錢，而是人造成了事物和生出了錢。新的快樂成就的秘密恰恰在於經濟規律不再阻礙有產階級的貪婪。錢最終能生錢，是因爲權力完全不顧一切經濟規律和道德法則而能獲得財富。只有當資本輸出成功地刺激了權力輸出時，它才能完成資本擁有者設計的目標。只有無限積聚的權力才能帶來無限的積聚的資本。

外國投資——一開始時作爲緊急措施的資本輸出——一旦受到權力輸出的保護，就變成了一切經濟制度的永久特徵。根據概念，擴張本身就是一種目的，不是暫時的手段，因此帝國主義的擴張概念出現在政治思想領域時，就明確地顯示出，民族國家最重要的永久性功能之一將是權力擴張。國家雇用的暴力行政者不久就在各民族中形成了一個新的階級，雖然他們的活動場所遠離母國，卻對國內的政體施加了一種重要影響。由於他們實

際上只不過是暴力作用者，他們就只能按照權力政治觀點來思考問題。作為一個階級，並由他們的日常經驗支撐著，他們首先會聲明，權力是每一種政治結構的本質。

這種帝國主義政治哲學的新特點，並非是它給予暴力以主導地位，亦非發現權力是基本的政治現實之一。在政治行動中，暴力一向是最後的手段，而權力一向是法令和統治的外在表現。但是兩者以前從無有意識的政體目標，或任何特定針策的最終目的。因為權力使自己能夠達到的也只是權力，而支配暴力是為了權力(而不是為了法律)，於是就轉變成一種毀滅性原則，不到無物可侵犯，它是不會停止的。

然而，一切隨之發生的權力政治的內在矛盾呈現出一種表面意義，如果在假定的永恆過程中來理解它，那麼它除了過程本身以外，不會有任何目標或目的。據此，檢驗其成就即成為毫無意義的事，而權力可以被認為是一切政治行動的永不休止、自我培植的動力，這就對應了那種傳奇般的「錢能生錢」的永無止境的積累。無限擴張的概念就能實現資本無限累積的願望，並能帶來權力毫無目的的累積，使新政體的建立——直到帝國主義時代還一直是征服的結果——變得毫無可能。事實上，它的邏輯結果是摧毀一切現存的社羣，包括被征服的民族，也包括自己國內的民族。因為一切新舊政治結構都產生了穩定性力量，阻礙經常性的變化和擴張，所以，當一切政體都被看作不斷成長的權力之一部分時，就成為暫時的障礙。

以往時代的帝國主義顯得比較溫和些，統治者的權力在長時間內不斷增長，他們甚至不打算吞併被征服的土地，而保留著依然落後的政治社羣，視之若往昔生活遺留的空曠廢墟，而繼承極權主義者却瓦解和摧毀了一切穩定的政治結構，包括他們自己的和其他民族的。純粹的暴力輸出使僕人變成主人，却不給他們以主人的特權：創造新生事物的可能。國內壟斷的集中和巨大的暴力積聚，使僕人成為積極的摧毀力量的代表，直到最後極權主義的擴張變成一個摧毀國家或一個民族的力量。

權力變成政治行動的本質和政治思想的中心，是因爲離開了它應該爲之服務的政治社羣。的確，這也是經濟因素引起的。但是結果造成權力成爲政治的唯一內容，擴張成爲唯一目的，這就很難得到普遍贊同；如果這種作法不是十分圓滿地符合在經濟上和社會上占統治地位階級的隱秘願望和秘密信念，那麼因而產生的民族政體的分解，遇到的反對力量也一定不會很小。資產階級長期被排斥在政府之外，一方面是由於民族國家的政體不需要它，另一方面，它自己也缺乏對公共事務的興趣，結果是帝國主義使他獲得了政治上的解放。

帝國主義應該被認爲是資產階級取得政治統治權的第一個階段，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衆所周知，有產階級總是不太願進入政府，只要財產權獲得保護，他們就對任何類型的國家都感到滿意。的確，國家對於他們來說，從來就只是一支有良好組織的警察力量。但是，這種假謙虛造成的奇怪後果是使整個資產階級遊離於政體之外；在他們成爲專制權力的主體或共和國的公民之前，他們實質上只是一些私人(private persons)。這種私人性質，以賺錢爲首要，創造出了一整套行爲類型，有一些諺語表達了這種行爲類型——「一事成功事事順利」、「強權即公理」、「權宜之計是上策」等等——這些諺語是一個競爭者社會之經驗的必然產物。

在帝國主義時代，商人變成了政治人，並被承認爲政治家；而政治家只有使用成功的商人的語言和「從全世界角度來思考」時，才會受到認眞注意；這時，私人的實踐和手段才逐漸轉變爲執行公共事務的規則和原則。關於這一重新評價的過程，有一個很有意義的事實開始發生於十九世紀末，至今仍然生效，即資產階級信念先應用於交事務，然後慢慢地擴展到國內政治。因此，這種國家很難意識到，在私人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不顧一切的做法，而公共社會一向必須針對此來保護自己及其公民個人，這正在上升爲公開認定的政治原則。

有意思的是，現代的權力信奉者與那位唯一的偉大思想家的哲學完全

相符，他嘗試將公眾利益從私人利益中分離出來，他從私人利益(private good)構思並勾勒出一個「共和國」(Commonwealth)，其基礎和最終目的是權力積聚。十七世紀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確是唯一這樣一位偉大的哲學家，資產階級可以準確無誤地、一致贊同地承認他，即使他的理論原理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未被資產階級承認。霍布斯的《巨獸》(*Leviathan*)㉟揭示了一種唯一的政治理論，根據這種政治理論，國家的基礎並非某種立憲法則——無論是神聖宗教法則、自然法則，或者社會契約法則——它們是根據公共事務來判定個人利益的正確或錯誤；國家的基礎是個人利益本身，因而「個人利益等於公共利益」。㉟

資產階級道德標準中幾乎沒有一條不被霍布斯那無與倫比的邏輯所預見到。他差不多完全地描述了一幅肖像，當然這不是一般「人」，而是資產階級的人；他作出的分析在三百年以來既未過時，也未被超過。「理性……不是別的，而是計算(reckoning)」；「自由的主體，自由意志……(這些都是)毫無意義的話；也就是荒唐話。」一種沒有理性、沒有追求眞理的能力、沒有自由意志——亦即沒有責任能力——的存在，人實質上只是社會的一種功能，因此對他的判斷也只根據他的「價格，或他值多少錢；亦即是說，他能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他的權力。」這種價格時常被社會一再評價，而「他人的評價」是依賴於供需法則。

根據霍布斯的看法，權力是一種積聚的控制力，能使個人確定價，調節供需關係，使之有利於他自己。個人會在完全隔絕的狀態中考慮他的利益，也就是所謂從一種絕對少數人的觀點出發；然後他會明白，只有藉助於某個大多數，他才能追求和得到他的利益。因此，如果人實際上只被他的個人利益驅使，那麼對權力的渴望就必然成了人的基本激情。它支配了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以及其他一切隨之而來的對財富、知識、榮譽的野心。

霍布斯指出，在權力鬥爭中，就像憑天生能力競爭一樣，人人平等；因

爲人的平等基於一個事實，即每一個人憑天性都有足夠的力量去殺死另一個人。力量薄弱的人可以用狡猾來補償。作爲潛在謀殺者的平等條件將所有的人都置於不安全的地位，從中產生了對國家的需要。國家存在的理由(raison d'étre of the state)是個人需要某種安全，他感覺受到了一切同類人的威嚇。

霍布斯對人的描述中關鍵的特徵完全不是現實主義的悲觀論，儘管這是近代人一再贊揚之處。因爲假如霍布斯對人的描述是眞實情況，他就根本不可能建立任何政體。霍布斯的確並未成功地——而且他甚至並不打算成功地——將人的這種存在明確地歸併入一種政治共同體(community)。霍布斯所說的人，在他的國家被打敗時，他無須忠誠於祖國；而假如他成了囚徒，他就無須對叛國行爲負責。凡是生活在共和國之外的人（例如奴隸），對他的同胞沒有進一步的責任，反而被允准可以儘量殺人；而相反，「爲了保護另一個人而反抗共同體的刀劍，無論其有罪無罪，誰也不會有自由，」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人與人之間既無同胞友情，亦無相互責任。使他們聚在一起的動機是共同的利益，它也許是「某種死罪，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可能爲之而死」；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有權「反抗共和國的刀劍」，以能「團結一致，共同反抗，相互保護。……因爲他們無非是在保衛自己的生命。」

因此，霍布斯認爲，任何形式的社羣的成員資格無非是一樁暫時的、有限的事務，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個人的孤立和私人性質(或結成團體時，他「不會快樂，相反，維持一個團體而沒有一種力量可以威鎮他們全體」，只有極大的悲哀)，或者在他同伴之間創造一種永恆的紐帶。看來霍布斯對人的描述似乎使他的目的——爲共和國提供基礎——歸於失敗，然而卻提出了一種連貫型式的態度，透過這種態度，每一種眞正的共同體都會輕易地被摧毀。因此，霍布斯所說的共和國本質上就有明確無疑的不穩定性，這一概念中還包含了它自身的解體——「每當在一場（國外或國內的）戰爭中

敵方最後勝利了……共和國就隨之解體，於是每一個人都可以任意保護自己」——不穩定性就益發明顯，正如霍布斯最注重而且反複強調的那樣，其目的是保障最大限度的安全和穩定。

如果認爲霍布斯對人的描述是嘗試從心理實在論或哲學眞理角度作出解釋，那麼對於他、對於他作爲一名哲學家的尊嚴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事實上，霍布斯對這兩者都不感興趣，而是全神貫注於政治結構本身，他根據集權政府的各種需要來描繪人的各種特徵。爲了論證和令人信服，他提出了他的政治大綱，從現實角度深入觀察人，認爲人只是「不斷渴求權力」；從這種洞察出發，他設計出最適合於這種渴望權力之動物的政體計劃。實際的過程——即他關於人的概念如何產生意義，並超越假定的人類弱點的明顯陳腐說法——卻恰恰相反。

這種新的政體是爲了新的資產階級社會的利益而構想，當它在十七世紀出現時，對人的這種描述只是對能適應它的一種新型人的粗略勾勒。共和國的基礎在於權力的委任，而不是權利的賦予。它取得對屠殺的壟斷權，反過來又提供了一種防止被殺的條件保證。法律提供安全，這是從國家的權力壟斷中直接產生的(並非人根據人類關於對錯標準而確立的)。由於這種法律直接源自絕對權力，因此生活在這種權力之下的個人就將它看作是代表了絕對的需要。至於國家的法律——由國家壟斷的社會力量積聚——它不存在對錯的問題，只有資產階級社會的絕對服從與盲目順從。

個人被剝奪了政治權力——公共生活和官方生活以必需性爲僞裝，向他們呈現——並從他的私人生活和個人命運中取得一種新的、更多的利益。個人被排除在參與行政和一切公民有關的公共事務之外，在社會中失去了他的正當地位和他與別人的天然聯繫。現在他只能根據和別人的私人生活作比較，判斷自己的私人生活，而他和別人在社會內部的關係則採取了競爭的形式。一旦國家以需要的名義處理公共事務，競爭者的社會和公共事業都會受機會擺佈。在一個由個人組成的社會裏，一切人都天生具有追逐

權力的同等能力，並由國家保護他們避免互相侵害，只有機會才能決定誰是贏家。[37]

根據資產階級的標準，那些完全不幸和不成功的人自動地退出了競爭，這就是社會生活。幸運即光榮，噩運即恥辱。個人將自己的政治權利授與國家，也將社會責任委於國家：他要求國家解除他關心窮人的負擔，正如他要求國家保護他不受罪犯傷害一樣。窮人與罪犯之間的界線消失了——兩者都被逐出社會。失敗者被剝奪了古代文明賦予他們的美德；不幸者再也不能籲求基督的仁慈。

霍布斯解放了那些被逐出社會的人——失敗者、不幸者、罪犯——如果國家不照顧他們，他們對社會和國家就不負一切責任。他們會放縱自己的權欲，別人告訴他們可以利用自己最起碼的殺人能力，於是就恢復了天然的平等，而社會掩蓋這種天然平等，只是出於權宜之計。被社會遺棄者組織成殺人集團，這是資產階級道德哲學的邏輯結果。霍布斯預見到這種情況，並將之合理化。

既然權力實質上只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那麼，一個唯以權力爲基礎的共同體在秩序平靜和穩定時就必然衰退；它的完全平安卻是建築在沙上的。只有獲得更多的權力，才能保持現狀；只有經常擴展它的權威，只有通過權力積聚的過程，才能維持穩定。霍布斯所說的共和國是一種動搖不定的結構，而且還必須總是向自身提供來自外界的新支柱；否則它就會在一夜之間跨台，跌入它所由來的那個毫無目的、毫無意義的個人利益至上的混亂局面。霍布斯形象地論述了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理論中所說權力累積的必要性，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永恒戰爭狀態」，各個國家維持着各自對峙的狀態，就像其各個人民在服從一個共和國的權威之前一樣。[37]這種永遠存在的交戰可能性保障了共和國的一種永久性前景，因爲它使國家有可能以犧牲其他國家的代價來增加自己的權力。

霍布斯對個人安全的訴求與他所說的共同體內在不穩定性之間，明顯

地存在着矛盾，但從表面價值來觀察便錯了。他在此處又一次試圖說服和籲求某種憑本能需要的安全，在《巨獸》一書的主題中，他顯示出自己清楚地懂得，只有採取一種形式——絕對服從那個「凌駕他們所有人」的權力，亦即懷着一種普遍蔓延、壓倒一切的恐懼，但這也不是一個尋求安全的人的那種基本情感——才能使安全得以存在。霍布斯的理論起點是對正在上升的資產階級新團體的政治需要所作的無與倫比的深刻觀察，他們相信財產積聚的無止境過程，而這種基本信念却正在消除個人的安全。當霍布斯對政體提出革命性的變革觀念時，他從社會行爲類型和經濟行爲類型中得出了必要的結論。他勾勒了那唯一能夠對應一個新階級的新需要及利益的新政體的框架。他的實際成績是描述了人如果想適應即將到來的資產階級社會，他應該變成什麼樣子，他應該如何行爲。

霍布斯堅持認爲，權力是一切人和神的事物的動力（甚至連上帝對人的統治也「並非出於『創造』了人，而是出於『不可抗拒的權力』」），他這個說法產生於一個理論上無可辯駁的假設：財產永無休止的積聚必然以權力永無休止的積聚爲基礎。和奠基於權力的共同體之內在不穩定性對應的哲學想像，是一種歷史的無止境過程的意象，爲了同不斷增長的權力相一致，這個歷史過程無情地抓住了個人、民族，乃至最後整個人類。資本無止境的累積過程需要「權力無邊」的政治結構，能用不斷增加權力來保護不斷增加的財富。這個新的社會階級得到了根本的活力，「他無法確信，如果不獲得更多，他是否還能保住權力，並像目前一樣生活得好，」此話的確相當眞實。這個結論的正確性不可能被改變，就算事實上，三百餘年從未有過一位君主會「將這個『思想的眞理』轉變爲『實踐的利用』」，而具有政治意識、經濟上十分成熟的資產階級也不會公開採納霍布斯的權力哲學。

這種出於保護無止境的資本累積而必需的無止境的權力累積過程，決定了十九世紀時期的「進步」(Progressive)意識形態，預示了帝國主義的

崛起。進步之不可阻擋，不是天眞地迷惑於財富的無限制增長，而是瞭解到權力積聚是所謂經濟規律穩定性的唯一保證。十八世紀關於進步的概念（例如大革命前的法國）意在將批評過去來當作掌握現在和控制未來的一種手段；進步終究導致人的解放。但是這種觀念與資產階級社會無止境的進步無關，資產階級社會的進步不僅不要人的解放和自主，而是隨時準備犧牲一切，每一個人服從於假想中的超人類的歷史規律。「我們所說的進步是（一種）風……不可抗拒地吹送（歷史的天使）向未來，當面前的廢墟堆積得高聳入雲，他就轉過身去。」㊴只有馬克思無階級社會的夢想才要去將人類從歷史的惡夢中喚醒（根據喬哀斯〔James Joyce〕的說法），只有在這種夢想中才出現十八世紀觀念的最後一絲踪跡，儘管它是烏托邦式的。

具有帝國主義頭腦的商人（爲滿天星辰所煩擾，因爲他不能去吞併它們）懂得，爲權力自身而組織的權力會產生出更多的權力來。當資本累積達到它的自然的、民族的極限時，資產者懂得，只有帶着「擴張就是一切」的觀念，只有伴隨着相應的權力積聚過程，才有可能將舊馬達重新起動。但與此同時，當永久運動的眞實原理似乎被發現時，進步意識的樂觀情緒就動搖了。並非有人開始懷疑過程本身的不可抗拒性，而是許多人開始明白使塞西爾・羅德斯害怕的是什麼：人類的處境和地球的限度是通向進步道路上的嚴重障礙，而進步是很難停止和穩定的，因此一旦它到達這些極限，就只能開始一連串毀滅性的災難。

在帝國主義時代，權力哲學變成了菁英們的哲學，他們很快發現並隨時準備承認，對權力的渴望只有通過毀滅才會被遏制。這就是他們的虛無主義的根本原因（世紀交替時期的法國和二十年代的德國表現得非常突出），它用以取代迷信進步的是同樣粗俗的迷信世界末日，並且以同樣的熱情鼓吹自動滅絕論，就像自動進步論的狂人們曾經鼓吹經濟規律的不可抗拒性一樣。它使偉大的「成功」崇拜者霍布斯的理論三百年來屹立不墜。這部分是由於法國革命（它的觀念是，人即立法者和公民〔citoyen〕）差不多

成功地阻止了資產階級充分發展它那關於「歷史是一個必然過程」的觀念。但是，部分也因爲「共和國」的革命性含義，它無畏地破壞西方傳統，霍布斯並未忘記指出這一點。

每一個人、每一種思想，如果不服務並認同一種機器的最終而唯一的目的，亦即產生權力和積聚權力，這是危險而愚蠢的。霍布斯判定，「古希臘和羅馬」的書都像基督教的說教一樣「充滿偏見」，「佈道……就像（它）在說一些舊日道德哲學家的書裏說的話」，或者像「人違反良心，就是一種罪惡」之類的教義，以及「法律是對正義和不義的規則」。霍布斯對整個西方政治思想傳統的深刻懷疑並不使我們感到驚奇，我們記得他不折不扣地要求爲暴政(tyranny)正名，儘管這在西方歷史上發生過多次，卻從未有過以哲學爲基礎的榮耀。他的「巨獸」實際上走向永恒的暴政統治，霍布斯驕傲地承認：「暴政的名字不折不扣地意味着主權的尊嚴……；我認爲，容忍暴政公然的仇恨，就是容忍對共和國的仇恨……」

既然霍布斯是一個哲學家，他早就可以從資產階級的興起中發現那個需要三百多年時間才發展得羽翼豐滿的新階級的一切反傳統性質。他的《巨獸》並非悠閑地沉思新的政治原則或者追尋舊時統治人類共同體的理性；嚴格地說來，這本書是「計算結果」(reckoning of the consequences)，計算社會上一個新階級興起之後，它的存在從根本上繫結於將財富當作動力，當作生產財富的新手段，所帶來的後果。所謂的資本累積，造成資產階級的產生，改變了財產和財富的概念：資產階級不再被看作是累積和獲得的結果，而是累積和獲得的開端；財富變成了一種想獲得更多財富的永無休止的過程。將資產者劃歸有產階級，這只在表面上是正確的。這個階級的人，相信生活是一種永遠變得更富有的過程，認爲金錢是一種神聖不可侵犯之物，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是一種純粹消費品。

然而，財產本身是應該被使用、被消費的，因此應該經常減少。最徹底的、唯一保險的擁有方式是毀滅，因爲只有我們毀滅的東西才安全地、永

遠地屬於我們。那些不消費、反而努力擴大擁有的有產者會繼續發現一種非常令人不便的侷限，一種不幸的事實，即人必定要死亡。死亡是「財產和獲得」永遠不可能成爲一條眞正的政治原理的實際原因。本質上以財產爲基礎的一種社會制度不可能走向別的目標，最後只能走向毀滅一切財產。個人的有限生命就像社會的基礎一樣，對財產是一種嚴重的挑戰，正如地球的侷限就像政體的建立一樣，對擴張是一種嚴重的挑戰。計劃使財富自動連續增長到超過一切人的需要和消費的可能性，以超越人類生命的侷限，個人財產於是變成了公共事務，從純粹私人生活範圍中脫離出去。私人利益本身的性質是暫時性，受到人的自然生活範圍的限制，現在卻能逃進公共事務的範圍，從中借得無限長的時間，這是繼續累積財產所需要的。這樣創造的一個社會似乎很像螞蟻和蜜蜂的社會，在那裏「公益(common good)同私益並無區別；憑天性爲私人謀利時，也對共同利益有利。」

但是，人既然不是螞蟻，也不是蜜蜂，那麼整個事情就成了一個幻象。公共生活戴上了私人利益總和的假面，好似這些私人利益通過單純相加就會創造出一種新的性質。一切所謂自由派的政治概念（即前帝國主義階段的一切資產階級政治概念）——例如從競爭活動的總體中神秘地產生秘密平衡所支配的「無限制競爭」；追求「開明的自利」是一種充分的政治美德；各種事件的純粹延續性中內在的「無限制進步」——都有這樣的共同點：他們將私人生活和個人行爲類型單純相加，將其總和看作歷史規律、經濟規律或政治規律。但是，當自由派的概念表達了資產階級對公共事務的本能懷疑和對公共事務內在的敵視時，這些概念僅僅是西方文化的舊標準和新階級對「財產即充滿活力的、自我運動的原理」的信念之間一種暫時的折衷。由於自動增長的財富實際上取代了政治行動，因此舊的標準就讓位了。

霍布斯是眞正的（儘管從來未被完全承認）資產階級哲學家，因爲他懂得，財富的獲得是一種永無終結的過程，它只能由奪取政權來保障，因爲累積過程遲早必定會強迫打開一切既定的領土邊界。他預見到，社會已

進入了永無終結的獲得財富之路,不得不設計一個充滿活力的政治組織,能夠適應於永無終止的權力增長。他甚至只通過想像力，就能勾勒出新型的人的主要心理軌跡，指出他們能適應那樣一種社會及其暴君式的政體。根據這種新的人類類型，他預見到對權力本身必然的崇拜，他們會在被稱爲嗜權動物時覺得受到恭維；但是社會實際上會逼迫他們交出一切天然力量、品德和手段，會將他們變成可憐猥瑣的小人物，甚至無權起來反抗暴政；他們不僅遠遠不能努力奪得政權，反而屈從於任何現行的政府；甚至當他們的最好的朋友在難以理解的「存在理由」的藉口下成了無辜的罪人時，他們也不敢激動。

共和國的基礎是其所有個體成員積聚及被壟斷的權力，它必然使每一個人都毫無權力，剝奪他的天然能力和人類能力。使他降格爲權力積聚機器中齒輪上的嵌齒,用關於這架機器的最終命運的崇高思想來自我安慰,而這架機器本身的構造方式使它能單憑自身內在法則就會吞噬整個地球。

從哲學的角度將人類平等解釋爲一種能夠殺人的「能力平等」，這種解釋至少指出了共和國的最終毀滅性目的。「在永久性戰爭的條件下，瀕臨戰爭，邊疆武裝起來，支起火炮對準他們周圍的鄰國，」在這種狀態下與其他一切民族共存，不會有別的行動法則，只有「最有利於（自身）利益」爲準則，並且會逐步地吞噬較弱的結構，直到最後的一場戰爭，「向每一個人提供的只有勝利，或者死亡」。

根據「勝利或死亡」，「巨獸」的確能夠跨過與其他民族共存的一切政治限制，可以將整個地球攬納在它的暴政之內。但是，當最後的戰爭來臨時，每一個人都置身其中，地球將不會有最終的和平：若無累積權力的機器，繼續擴張的目的就無法達到，在這架機器永無休止的過程中，它需要吞噬更多東西。假如最後勝利的共和國不能開始「併吞其他星球」，它就只能開始摧毀自身，爲的是開始更新永無休止的權力產生過程。

㈢暴民與資本的結合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隨着爭奪非洲拉開序幕，帝國主義登上了政治舞台，商人推波助瀾，掌權的各國政府強烈地反對它，受過教育的各個階級中很大一部份人却令人訝異地歡迎它。❹到末了，它似乎是上帝派來的，爲了醫治一切惡魔，是一帖解決一切衝突的萬靈藥。從某種意義上看，帝國主義的確並未使這些希望破滅。當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十分明顯地受到新的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威脅時，帝國主義爲之注入新生命。而在其他情況下，若無帝國主義之發展的介入，這些政治社會結構就不會有必要藉助兩次世界大戰使之消失了。

以事實爲證，帝國主義帶走了一切麻煩，並且產生了虛幻的安全感，這在戰前歐洲是十分普遍的，它騙過了所有的人，只有幾個最敏感的頭腦是例外。法國的貝圭和英國的契斯特頓直覺地明白，他們生活在一個充滿空洞藉口的世界，其中最大的藉口是它的穩定。直到一切都開始崩潰之前，事實上明顯過時的一些政治結構仍是穩定的，而其頑強的壽命似乎欺騙過曾經感受到脚下大地在顫抖的人。揭開謎底的是帝國主義。歐洲的國際禮節爲何允許這個惡魔在摧毀一切美好的和醜惡的事物之前到處蔓延，這個致命的問題的答案是：一切政府都清楚地知道，他們的國家正在秘密地解體，政體正從內部被摧毀，他們靠借來的時間在生存。

在誰也不知道的情況下，擴張起初顯示爲資本生產過剩提供一條補救的出路，即資本輸出。❹在以分配不公爲基礎的一種社會制度下，資本主義生產帶來大幅度增長的財富，已經導致了「儲金過多」(oversaving)——資本累積注定在現存的國民生產和消費能力之內成爲閒置財富。這筆錢事實上的確是多餘的，雖然是屬於一個正在成長的階級，但是他們都不需要它。帝國主義時代之前幾十年，❹跟着發生的危機和蕭條，使資本家

產生這樣的印象：他們整個生產的經濟體系取決於供需關係，而從現在起，這種供需關係來自「資本主義社會以外」。㊸只要資本主義不控制其所有階級體系和生產能力，這樣的供應和需求就只來自國內。當資本主義擴展到整個經濟結構，一切社會階層都納入了它的生產和消費軌道時，資本家們明顯地都必須決定，要麼看著整個制度崩潰，要麼去發現新的市場，亦即滲透進尚未走向資本主義的新國家，而能提供一種新的非資本主義式的供求關係。

引起帝國主義時代開始的一八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的蕭條景況，其決定性要點在於，蕭條迫使資產階級第一次懂得了，掠奪——幾個世紀以前造成了「資本的原始累積」(馬克思語)，並開始了一切進一步的累積——這種原罪行爲必須不斷重複，否則會使累積的動力突然停止。㊹面對這種危險，即生產的災難性崩潰不僅威脅到資產階級，也威脅到整個國家時，資本主義生產者們懂得，他們的生產體系的形式和法則「從一開始起就在算計着整個地球了」。㊸

對國內市場飽和、缺乏原材料、危機增長的第一個反應是輸出資本。剩餘財富的擁有者起先嘗試不擴張、不搞政治控制的對外投資，結果造成無與倫比的、膽大妄爲的騙局、金融醜聞、證券市場投機，自從對外投資比國內投資更蓬勃以來，一切都引人警覺。㊸過多儲金引起的大額資金爲小額資金——小規模生產的產物——鋪平了道路。國內企業爲了同對外投資的高額利潤保持同步，相應之下採用欺騙手法，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投資，這些人滿懷着奇跡般發財的希望，將他們的錢扔向窗外。法國的巴拿馬醜聞，德國和奧地利的「虛設公司騙局」，都可謂經典例子。巨額利潤的允諾結果是巨額地損失。小資本所有者迅速、大量地損失，使多餘資本的大戶們不久後發現金融戰場上孤零零地只剩下他們自己。他們未能將整個社會改變成一個賭徒社羣，他們就又成了多餘的人，被排除在正常的生產過程之外；而其他各個階級，在經過某種騷動不安之後，仍能平靜地回到這個

正常的生產過程之中，雖然或許變得貧苦一些。[47]

資金輸出和對外投資本身並非帝國主義，並不一定會導致擴張的政治手段。只要多餘資本的所有者滿足於投資「他們的大部分財產於外國」，即使這種傾向和「民族主義傳統衝突」，[47]也只是加強了他們和所寄生的那個國家之間的疏離關係。只有當他們要求政府保護他們的投資時（最初階段的騙局使他們看清了可以用政治來反對投機冒險），他們才重新進入這個國家的生活。然而，他們以這種訴求來遵從資產階級社會的既定傳統，總是認爲政治機構無一例外地是一種保護個人財產的工具。[47]唯獨一個新的有產階級的興起同工業革命碰巧同時發生了，才使資產階級成爲生產者和生產的推動者。現代社會實質上是生產者的社羣，只要它完成在這種社會中的基本功能，它的財富對國家整體就能起一種重要作用。多餘資本的擁有者是這一階級中第一羣想不完成某種眞正的社會功能——甚至是一個剝削別人的生產者的社會功能——而又獲得利潤的人，結果沒有一個警察能夠將他們從憤怒的民衆中解救出來。

於是，擴張不僅對多餘資本是一種逃避。更重要的是，它保護多餘資本的擁有者，防止繼續處於完全多餘和寄生的瘋狂前景。它使資產階級免於分配不公帶來的後果，在財富於國內範圍無法再作爲一種生產的因素，而同總體的社羣生產理想發生衝突時，賦予所有權概念一種新的生命。

比多餘財富更老的還有一種資本主義生產的副產品：伴隨着每一個時期的工業成長必然產生的每一次危機，地從生產社會中淸除出去的人。永遠閑置的人，就像剩餘財富的擁有者一樣，對於社會羣體來說是多餘的。他們事實上對社會構成威脅，這在整個十九世紀已爲社會所公認，這些人的外移，有助於在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美國的疆土上人口的增加。帝國主義時代的新事實是這兩種剩餘力量——多餘資本和剩餘人力——手挽手一起離開原先的國家。擴張的概念，輸出政府權力，吞併每一塊土地——國民們在其中或投入財富，或投入人力——越來越成爲減少財富和人口的唯

一選擇。帝國主義及其無限制擴張的觀念似乎為解決一種永久的邪惡而提供一種永久的補償。[50]

諷刺的是，第一個將多餘財富和多餘人力(superfluous men)聚集在一起的國家，本身也逐漸變成多餘的。自從十九世紀初以來，南非成了英國的屬地，因為它確保通向印度的海上通道。但是，蘇伊士運河的開通，以及隨後對埃及的征服，使好望角作為舊貿易站的重要性大大減弱。英國會盡一切可能，從非洲撤出，正如一切歐洲國家在印度的資產和商業利益消失之後所做的那樣。

南非出人意料地發展成「帝國主義的溫床」[50]，其中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甚至象徵意義的情況，在於當它對帝國不再有價值時，卻突然引人注目：在七十年代發現了鑽石田，在八十年代發現了大型金礦。不惜以一切代價獲得利潤的新欲望第一次結合了舊式的獵取財富方式。投機家、冒險家、大城市裏的賤民，都移民到黑色大陸，帶來了工業發達國家的資本。從此刻起，由惡魔般的資本累積產生的暴民，同累積的資本一起航海探險，結果別的都沒發現，只發現了投資的新機會。多餘財富擁有者是唯一能夠利用來自世界各地的多餘人的人。他們一起建立了第一個寄生蟲的天堂，他們的命脈是黃金。帝國主義，這個多餘資金和多餘人的產物，用生產最多餘的、最不眞實的商品——錢——來開始了它那令人驚愕的事業。

至今仍然令人疑惑的是，如果是替那些多餘的勢力——無論在什麼情況下，他們都早已外在於國家實體——提供了危險的解決方案，擴張這帖萬靈藥對於非帝國主義者來說，是否仍有如此誘惑力？議會中的各黨派在帝國主義的計劃中的共謀，已是記錄中的事實。英國工黨歷史在這一方面幾乎完整地證實了塞西爾•羅德斯早先的預言：「工人們發現，雖然美國人特別喜歡他們，而且剛剛建立兄弟般情誼，但是仍然拒絕他們的商品。工人們還發現俄國、法國、德國的當地人也是如此，於是工人們明白了，如果他們不小心，那麼世界貿易中就根本沒有他們的位置。所以工人們變成

了帝國主義者，然後自由黨(Liberal Party)也緊步後塵。」㊿在德國，自由黨(liberals)（而不是保守黨）是著名的海上政策的實際推動者，這一政策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起了很大作用。㊿社會主義政黨搖擺在積極支持帝國主義的海上政策（1906 年以後，它不斷投票贊同撥款建設德國海軍）和完全忽略一切外交政策問題之間，偶爾警告提防無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和可能用帝國主義餐桌上的殘羹冷飯來腐蝕工人階級，它並不能深刻地理解帝國主義計劃對它的政黨成員的巨大吸引力原因何在。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暴民與資本結合的新現象看來很不正常，明顯地同階級鬥爭學說相衝突，因此帝國主義企圖將人類分成主人種族(master races)和奴隸種族，高等人和低等人，有色人種和白人的眞正危險卻完全被忽略了——這一切都是試圖在暴民的基礎上將人統一起來。甚至連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打破了國際間的團結，也並未能擾動社會主義者的自滿和他們對無產階級本身的信念。當帝國主義者不再遵守帝國主義經濟規律，當這些規律在海外國家裏因「帝國因素」或「種族因素」而犧牲，當金融界高層只有少數年長的紳士仍相信不容剝奪的利潤權利時，社會主義者卻仍在研究帝國主義的經濟規律。

對帝國主義的普遍反對呈現出奇特的虛弱性質，自由派政治家的各種諾言相互矛盾並且一個個失信，常常推諉給機會主義或賄賂行爲，這些都另有深刻的原因。機會主義和賄賂都不能勸誘像格萊斯東那樣的人違背諾言，也就是，身爲自由黨的領袖，承諾一旦他做了首相之後，就從埃及撤軍。他的食言有另外的原因。這些人半有意識地、但又很難明說地與民衆共享一種信念，因爲國家本身深刻地分裂爲各個階級，近代政治生活中階級鬥爭是一種很普遍的特徵，民族的凝聚力因而面臨危險。擴張又一次顯現爲應急措施，它或許能爲整個民族提供一種共同利益，因此，主要由於這一原因，使帝國主義能變成「愛國主義之上的寄生體」。㊿

當然，這種希望仍然部分屬於舊時方法：用對外冒險來「醫治」各種

國內衝突。但是區別也很明顯。海外冒險從本質上來說侷限於時間和空間；它們也許暫時能成功地克服衝突，儘管作爲一種規律，衝突不僅很難克服，而且總是趨向越來越尖銳。從一開始起，帝國主義的擴張冒險看上去像一種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因爲人們相信擴張不會受限制。再者，帝國主義不是一種普通意義上的冒險，因爲它不依靠民族主義口號，而是依靠表面穩固的經濟利益基礎。在一個利益衝突的社會裏，共同利益與個人利益的總體被視爲一致，而擴張本身似乎成爲整個民族可能的共同利益。既然有產階級和統治階級使每一個人都相信，政體的可靠基礎是經濟利益和對所有制的熱情，當共同的經濟利益出現在地平線上，連非帝國主義的政治家們也很容易被說服。

這些就是民族主義爲何如此明顯地傾向於發展成帝國主義的原因，儘管這兩種主義之間仍存在着內在的矛盾。㊺那些於此不適應的國家越是贊成吞併外國民族(這同它們自己的政體結構都有矛盾)，就越是想去壓迫他們。從理論角度來說，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之間有一道鴻溝；在實踐上，它可以而且已經被狹隘民族主義和公開的種族主義溝通了。從一開始起，各國的帝國主義者宣傳並吹噓其「超越各家政黨」，是整個民族的唯一代言人。在很少或沒有海外屬地的中歐和東歐國家裏，情況尤其如此；暴民和資本的結合發生在國內，他們對國家機構和一切國內黨派非常不滿（而且還十分激烈地攻擊它們)。㊺

但是，帝國主義政治家們對國內問題漠然而不屑的態度到處都很明顯，尤其是在英國。當「櫻草會」(Primrose League)這一類「政黨之上的政黨」影響減弱時，帝國主義是使兩黨制降變爲議會「前排制」(the Front Bench system)的主要原因，它導致在國會內「減少對立力量」，增加了「內閣反對衆議院的力量。」㊺當然，這是超越黨派之爭和特殊利益的一種政策得到貫徹的，執行者宣稱是整個民族的代言人。這種說法恰恰吸引和欺騙了那些仍然保有政治理想主義觀點的人。要求團結一致的呼聲，很像戰鬥

號召，它們總是引導民衆走向戰爭；但是，在普遍的、永久的團結之工具中，誰也沒有覺察到普遍而永久的戰爭的萌芽。

公務員比任何別的羣體都更積極地從事民族主義式的帝國主義活動。民族國家創造了並依靠文官制度，作爲永久性的官員制度，而不受階級利益和政府變遷。他們的職業榮譽和自尊——在英國和德國尤甚——產生於他們是整個國家的公僕。他們是唯一一個根據直接利益來支持國家獨立於階級和派別之外的根本利益的羣體。民族國家的權威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其公務員的經濟獨立和政治上不偏不黨，這在我們的時代變得非常明顯：民族的衰落總是從其永久性統治機構的腐敗開始，一般人會認爲公務員的薪俸不是國家支付的，而是由有產階級支付。接近世紀末時，有產階級變得很強勢，以致國家雇員要繼續辯解說他是爲民族服務的，這幾乎是奇怪的說法了。社會分成各階級，這使他們處於社會實體之外，迫使他們組成自己的集團。在殖民機構中，他們遠離國家實體的崩解。當他們在遙遠的國家統治外國民族時，他們更能裝扮成民族的英雄公務員，「用他們的公務爲不列顛民族增光，」❺❽這比他們留在國內要光榮得多。殖民地不再僅僅是如詹姆斯・密爾(James Mill)所說的「擺脫了上層階級的、在國門之外的宏大體系」；它們要成爲不列顛民族主義的中流砥柱，他們在遙遠的國度，在對各個陌生民族的統治中發現爲英國的利益效忠的唯一方式。殖民官員實際上相信「每一個民族的奇特天才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殖民制度中那樣能夠顯示出來，這種制度就是對付臣屬種族的。」❺❽

事實上，英國、德國或法國的一個公民，只有遠離自己國家，才是不折不扣的英國人、德國人或法國人。他在自己的國家裏捲入經濟利益或社會忠誠太深，以致於他感到自己比較接近在外國的他那個階級，而不是本國的另一個階級的人。擴張給民族主義帶來了一種新的生命，所以被當作民族政治的一種工具而接受了。新的殖民社會和帝國主義團體組織的成員們感到「遠離了黨派的爭鬥」，他們越走得遠，就越相信，他們「只代表一

個民族目的。」[60]這顯示了帝國主義階段以前歐洲各民族的絕望狀態，它們的制度何其脆弱，面對着人類不斷增長的生產能力，它們的社會制度顯得多麼陳舊不堪。維持制度的手段也是絕望的，而最後的非常手段比惡魔更甚——它却是無濟於事的。

資本與暴民的結合可見諸於每一種周密的帝國主義政策產生之時。在某些國家，尤其在英國，太富的人和太窮的人之間的這種新聯盟一向只在海外屬地才有。所謂英國政策的虛僞性，是英國政治家們好意造成的結果，他們在殖民統治方法和正常的國內政策之間劃了一條明確的界線，因此相當成功地避免了帝國主義政策對自己國內恐怕會造成的惡果。在其他國家，尤其是在德國和奧地利，這種聯盟以「泛運動」(pan-movement)的形式影響了國內，法國也以程度稍輕些的所謂殖民政策造成了對國內的影響。這些「運動」的目標可以說是使整個民族（而不僅是它的「多餘」部分）帝國主義化，組織整個民族去掠奪外國領土，使異族永遠淪爲低等民族，以這樣的方式使國內和國外政策統一起來。

暴民從資本主義組織過程之中興起，十九世紀一切重要的歷史學家都早已注意到它小心翼翼而又急不可耐地成長。從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到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歷史家正是從這一思考中產生了歷史悲觀主義(historical pessimism)。但是，歷史學家們悲觀地對這一現象本身持有先入之見，他們未能抓住一點，即，不能將暴民同正在成長的工業工人階級混爲一談，當然更不能同民衆整體混爲一談，實際上它由各個階級被排斥的人組成。這種構成似乎使得暴民及其代表像是泯除了階級差異，站在劃分爲階級的民族之外的就是人民本身（納粹會稱之爲「民族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而不是人民的扭曲和醜化形式。歷史悲觀論者懂得這一新的社會階層實質上極不負責任，他們也準確地預見到暴民有可能將民主扭轉爲暴政，從暴民中會產生暴君，暴君須依靠暴民的

支持。他們未能懂得的是，暴民不僅是渣滓，也是資產階級社會直接產生的副產品，所以它同資產階級從來不會完全分離。出於這一原因，他們未能注意到，上流社會常常滋生出對底層社會的欽羨，這像一條線貫穿於整個十九世紀，它連續不斷地、一步一步地在所有道德問題上退卻，它越來越欣賞後輩們的無政府主義的玩世不恭態度。在世紀交替之際，德雷富斯事件顯示出法國的底層社會和上流社會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很難明確地將任何一個反德雷富斯派的「英雄」歸入底層社會或上流社會。

這種親緣感情，這種前輩與後代的結合，在巴爾扎克的小說中早已有過經典式描寫，先於一切實際的經濟學、政治學或社會學思考，使人回憶起三百年前霍布斯勾勒的新型西方人的基本心理特點。但是，事實上主要由於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產生之前的）經濟危機和蕭條期間已經獲得了深刻認識，見到上流社會終於承認它隨時準備接受道德標準方面的革命性變化——霍布斯的「現實主義」理論提議實行這種變化，如今又由暴民及其領袖來重新提出了。「原始資本的累積」的「原罪」將需要更多的罪行來保持制度運行，這種說法更能說服資產階級擺脫西方傳統的束縛，而非說服哲學家和底層社會。它最終引起德國資產階級扔掉虛偽的面具，公開表明它同暴民的關係，明確地號召它去爭奪財產利益。

有意思的是，這種情況竟會在德國發生。在英國和荷蘭，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相對比較平靜，幾個世紀以來，這兩個國家的資產階級享受着安全，免於恐懼。然而在法國，資產階級的興起被一場普遍的大革命打斷，革命的結果使資產階級享有最高地位。在德國，資產階級在十九世紀下半期以前尚未充分發展，它的興起，從一開始時就伴隨着革命的工人階級運動的成長，工人運動的傳統同資產階級的傳統一樣悠久。這樣，理所當然地使資產階級在自己國家裏感到不太安全，就更加會嘗試擺脫虛偽的沉重負擔。上流社會同暴民的密切關係，在法國曝光比在德國早，但最後在這兩個國家達到相等強烈的程度。但是法國由於其革命傳統，以及其較缺少工

業化，所以只產生了人數相對較小的一羣暴民，以致法國資產階級最後被迫越過邊界去尋找盟友，與希特勒德國結成同盟。

無論資產階級在歐洲各國的長期歷史演化的確切性質是什麼，只要資產階級洗盡了虛僞面目，對基督教傳統讓步，那麼，暴民的政治原則遇到帝國主義意識形態和極權主義運動時，就背叛了同資產階級社會政治態度之間的那種令人驚異的強有力的緊密關係。近來暴民的虛無主義態度在智識上吸引了資產階級，其原因是一種原則關係，遠非暴民的實際誕生所能涵括。

換言之，帝國主義之產生的特點是「原因和結果不一致」，這有其原因。過分累積造成了多餘財富，它需要暴民的幫助，來找到安全的、高利潤的投資途徑，這一機會使資產階級社會基本結構中一向存在的一種力量活動了起來，雖說它一直被高貴的傳統和備受幸運的虛僞性掩蓋着，拉·羅歇福考德(La Rochefoucauld)稱之爲「邪惡對美德的恭維」。同時，要想玩弄完全沒有原則的權力政治，只有等到大量民衆可以被利用，這些民衆沒有政治原則，而人數衆多，超過國家和社會能夠照料他們的程度。事實上，只有帝國主義政治家們才能利用這類暴民，只有種族理論才能煽動這種暴民，因此顯得只有帝國主義才能解決現代的各種嚴重的國內、社會和經濟問題。

霍布斯的哲學並不包含近代種族學說。近代各種種族理論不僅煽動了暴民，而且在它們的極權主義形式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各種組織形式，人類可以通過這些組織形式將無休無止的資本和權力累積過程推行下去，直至它的邏輯結果——自我毀滅。但是霍布斯至少爲政治思想提供了一切種族學說的先決條件，即，從原則上排除構成國際法中唯一規定性觀念的人性觀念。霍布斯假設，對外政治必然處於人類契約之外，從事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永恆戰爭，那是「自然狀態」的法則，因此他爲那些自然主義的意識形態定下了最有可能成立的理論基礎，認爲民族就是本質上互相區隔

的部落(tribe)，相互之間沒有任何關聯，不知人類團結爲何物，唯一的共同點是人與動物世界共有的那種自我保護的本能。如果關於全人類的觀念——其中最具決定性的象徵是各個人種的共同起源——不再有效，那麼，表面上最有道理的一種理論是棕色、黃色或黑色人種來自與白色人種不同的猿種，一切人種都注定要相互戰爭，直到他們都從地球表面消失爲止。

如果事實眞像霍布斯所說的，我們都被囚禁在權力積聚的無邊過程中，那麼暴民組織將不可避免地採取將民族轉化爲種族的形式，因爲在一個處於積聚過程中的社會裏，個人之間不會有統一的紐帶，他們正在從事權力積聚和擴張的過程中，失去了一切與人的自然聯繫。

種族主義的確會給西方世界帶來末日，因此也會給整個人類文明帶來毀滅。當俄國人變成了斯拉夫人，當法國人自認是「土著部隊」(force noire)指揮者，當英國人變成了「白人」，德國人在災難性的詛咒中變成了亞利安人，那麼這種轉變本身就意味着西方人的末日。因爲無論知識淵博的科學家們怎麼說，從政治角度來看，種族不是人類的開端，而是終結；不是各民族的起源，而是衰亡；不是人的自然誕生，而是他非自然的死亡。

註釋

❶霍布森，《帝國主義》(倫敦，1905，1938)，19 頁：「爲了敍述簡便起見，雖然將 1870 年看作有意識的帝國主義政策開端的標誌，但是很明顯，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帝國主義運動才獲得完整的動力……大約開始 1884 年。」

❷葛楚德·米林(S. Gertrude Millin)，《羅德斯傳》(*Rhodes*)(倫敦，1993)，138 頁。

❸這些數字來自卡爾頓·海耶斯(Corlton J. H. Hayes)，《唯物主義的一代》(*A Generation of Materialism*)(紐約，1941，237 頁)，時間是 1871 到 1900 年。亦見霍布森，前引書，19 頁：「在十五年內，大英帝國增加了大約三百七十五

萬平方英里；德國增加一百萬平方英里，人口一千四百萬；法國增加三百五十萬平方英里，人口三千七百萬。」

❹恩斯特·海斯(Ernst Hasse)，《德國的世界政治》(*Deutsche Weltpolitik*)，泛德聯盟宣傳小冊，第5號，1897，1頁。

❺歐內斯特·赫南(Ernest Renan)在其經典論文《什麼是民族?》(*Qu'est-ce qu'une nation?*)（巴黎，1882）中強調「眞正的贊同，共同生活的願望，意在保留世代相傳的統一傳統的價値」是使民衆一起組成一個民族的主要因素。摘譯自《克爾特文化中各民族詩歌研究論文集》(*The Poetry of the Celtic Races, and other Studies*)，倫敦，1896。

❻霍布森，前引書。

❼這種惡劣的心態產生於另一種信念——以爲一切政治組織的基礎是贊同(consent)。哈羅德·尼柯爾森(Harold Nicolson)，《寇曾：1919-1925年的最後階段》(*Curzon: The last Phase 1919-1925*)（波士頓—紐約，1934）中在論及英國在埃及的政策時出色地描述了這一點：「我們在埃及的正當地位不是基於可以辯護的征服權利，也不是基於武力，而是基於我們自己對贊同因素的信服。在1919年，這種因素並不以任何淸晰的形式存在。它富於戲劇性地受到1919年3月埃及暴動的挑戰。」

❺薩利斯伯里勛爵在擊敗格萊斯東的第一個「地方自治法案」時如此高興地說過這句話。在接下來的二十年保守黨——那是在帝國主義時代——執政(1885-1905)期間，英國與愛爾蘭的衝突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更加尖銳。亦見吉爾伯特·契斯特頓，《英國之罪》(*The Crimes of England*)(1915)，57頁。

❻在民族發展的最初階段，都鐸王朝爲何未能將愛爾蘭兼併入大不列顚，像法國成功地兼併布列塔尼、勃根第那樣，這始終是個謎。但這也許是因爲同樣的過程突然被克倫威爾政權打斷，它認爲愛爾蘭是一大塊戰利品，準備讓政府官員們去瓜分。無論如何，克倫威爾革命對於不列顚民族的構成是重要關鍵，一如法國革命之於法國。國協早就達到成熟階段，隨之發生的是失去同化和整合能力，這些能力只在國家的政體處於初級階段時才有。緊接著而來的是一個漫長

的悲哀故事,「高壓政治不是使民族平靜地活著,而是使民族平靜地死去。」(契斯特頓,前引書,60 頁)

關於愛爾蘭問題的歷史研究,包括最近的研究成果,可比較尼可拉斯‧曼舍夫(Nicholas Mansergh)公允而出色論文《不列顛與愛爾蘭》(*Britain and Ireland*)(朗門出版公司,不列顛國協研究系列,倫敦,1940)。

⑩弗勞德在帝國主義時代開始不久後說的話很有典型意義:「儘管英國人移民加拿大、南非、澳大利亞、新西蘭,但是並不喪失他的國籍,他仍然在英國土地上,就好比他在德風郡或約克郡一樣,只要大英帝國存在,他仍然是一個英國人;假如我們將浪費在巴拉克拉瓦的沼澤裡的錢拿出四分之一來,派送兩百萬英國人到那些殖民地,就能更加有助於增強國力,這比從事類似滑鐵盧的一切戰爭都有效。」引自羅伯特‧利文斯頓‧舒依勒(Robert Livingston Schuyler),《舊殖民制度的衰落》(*The Fall of the Old Colonial System*)(紐約,1945),280-281 頁。

⑪南非著名作家楊‧狹賽布姆(Jan Disselboom)非常直率地表達了國協各民族對此問題的態度:「大不列顛僅僅是一個相關成員……一切成員都出自同一個緊密相連的民族……帝國的那些尚未居住有眞正種族的部分絕不是相關成員。它們是占統治地位的成員的私人財產。……要麼是白人自治領,要麼是印度自治領,二者只居其一。」引自卡特希爾(A. Cathill),《失去的自治領》(*The Lost Dominion*)(1924)。

⑫歐內斯特‧巴克爾(Ernest Baker),《不列顛帝國的觀念和理想》(*Ideas and Ideals of the British Empire*)(劍橋,1941),4 頁。亦見《法蘭西殖民帝國》(*The French Colonial Empire*)(《情報部文件》〔*Information Department Papers*〕,第 25 號,皇家國際事務研究院出版,倫敦,1941),第 9 頁,對法蘭西帝國之基礎的出色導論。「目標是使殖民地民族同化到法蘭西民族,或者,如果在比較原始的羣體中做不到這一點,那麼就『聯合』他們,以便逐步使『本土法國』與『海外法國』之間的差異只成爲地理上的差異,而不是根本的差異。」

⑬加百利爾‧哈諾托(Gabriel Hanotaux),〈芒甘將軍〉(Le Général Mangin),

載《兩個世界》(*Revue des Deux Mondes*), 1925, 第27卷。

⓮克洛齊埃(W. P. Crozier), 〈法國與她的「黑色帝國」(France and her "Black Empire"), 載《新共和》(*New Republic*), 1924年1月23日。

⓯戴維・勞埃德・喬治(David Lloyd George), 《和平談判回憶錄》(*Memoir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紐黑文, 1939), 第1卷, 262頁。

⓯荷蘭是另一個爲本民族利益而企圖殘酷剝削海外屬地的國家。拿破侖戰敗後, 將殖民地還給已經相當貧困的母國。荷蘭東印度公司用強制開化的手段, 使當地人淪爲奴隸, 一切都是爲了在荷蘭的政府的利益。馬爾泰圖里(Multatuli)的《麥克斯•哈夫賴爾傳》(*Max Havelaar*)初版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 主要寫國內政府, 而不是海外的活動。參見德・凱特・安吉利諾(de Kat Angelino), 《殖民政策》(*Colonial Policy*), 第二卷:《荷蘭東印度公司》(*The Dutch East Indies*) (芝加哥, 1931), 45頁。

這種制度很快就被放棄了, 一時間, 荷蘭印度公司成了「一切殖民主義國家的欽羨對象」。(見前烏干達、北奈及利亞等地總督海斯克斯、貝爾(Hesketh Bell)爵士, 《遠東的外國殖民政府》〔*Foreign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Far Eust*〕, 1928, 第1部。)荷蘭的殖民方式與法國有許多相似之處: 給保留下來的當地人以歐洲人的地位, 引進歐洲教育制度, 以及其他逐漸同化的措施。荷蘭也招致同樣的結果: 引發殖民地強有力的民族獨立運動。

本書的研究過程中略去了荷蘭和比利時的帝國主義。前者是法國方式和英國方式的奇特又不斷變化的混合; 後者不是比利時民族、甚至也不是比利時資產階級的擴張, 而是比利時國王個人的擴張, 不受任何政府的阻撓, 也同任何其他機構沒有關係。荷蘭和比利時形式的帝國主義不是典型的。荷蘭在八十年代並未擴張, 只將它的舊屬地鞏固並使之現代化。另一方面, 比利時在剛果的凶殘暴行在研究一般殖民主義國家的海外屬地, 乃是一個極不公正的典型例子,。

⓯歐內斯特・巴克爾, 前引書, 69頁。

⓯塞爾文•詹姆斯(Selwyn James), 《剛果南部》(*South of the congo*) (紐約,

1943)，326 頁。

⓳關於這些童騃理想以及它們在不列顛帝國主義中的作用，可參見本書第 7 章。吉卜林的《主幹與夥伴》(*Stalky and Company*)中描述了這些理想是如何發展和培植的。

⓳歐內斯特・巴克爾，前引書，150 頁。

⓳克洛默勛爵〈臣屬種族的政府〉(The Government of Subject Races)，載《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1908 年 1 月號。

⓳同上。

⓳第一個用「帝國主義」這個術語來清楚地區分「帝國」(Empire)和「國協」(Commonwealth)的學者是霍布森。但是人們一向明白兩者的本質差別。例如在美國革命之後由所有的自由派英國政治家提出的「殖民自由」的原則，只有當殖民地「由英國人組成，或者……大不列顛各民族混合組成，以保證引進代議制政治」時，才被認爲是有效的。參見舒依勒，前引書，236 頁。

關於十九世紀的不列顛帝國，我們必須區分三種類型的海外屬地：租界、拓墾地、殖民地，例如澳大利亞和其他自治領；像印度一樣的貿易站和屬地；海軍基地和軍事基地，例如好望角(留作前者的安全保障)。在帝國主義時代，這三種屬地都經歷了政府更替和政治意義的變遷過程。

㉔歐內斯特・巴克爾，前引書。

⓳米林，前引書，175 頁。

㉖這一不當用詞，大約起源於英國在南非的統治歷史，當時的南非地方總督塞西爾•羅德斯和詹姆森(Leander Starr Jameson)將倫敦的「帝國政府」拖進了布爾戰爭，此舉違反帝國政府的本意。「事實上羅德斯，但毋寧說是詹姆森，是這一塊三倍大於英國的土地上的絕對統治者，對這塊地方的統治可以『不必等候最高長官的勉強同意或彬彬有禮的譴責』」，最高長官是只保留「名義上控制」的帝國政府的代表。(雷吉納爾・伊凡・洛凡爾〔Reginal Ivan Lovell〕，《1875-1899 年爭奪南非》〔*The Struggle for south Africa 1875-1899*〕，紐約，1934，194 頁。)英國政府將那裡的司法權交給當地歐洲人，却不受民族國家一切傳統

憲法的束縛，那裡發生的事情，從南非聯盟獨立（即「帝國政府」不再有權干涉）時起的悲慘故事中可以看到。

㉗在這一方面，1908 年 5 月下議院裡查爾斯，狄克爾（Charles Dilke）與殖民大臣的爭論顯得很有意思。狄克爾發出警告，反對皇家殖民地自治，因為這會造成白人農主對有色勞工的統治。殖民大臣對他說，當地人在英國下議院裡也有代表。參見佐普夫（G. Zoepfl），〈殖民與殖民政治〉（Kolonien und Kolonialpolitik），載《國家學說袖珍辭典》（*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㉘勞倫斯・齊特蘭（Lawrence J. Zetland），《克洛默勛爵傳》（*Lord Cromer*）（1923），324 頁。

㉙卡西爾，《失去的自治領》（1924），41-42 頁，93 頁。

㉚ T. E. 勞倫斯（T. E. Lawrence）的論文〈法國、英國與阿拉伯〉（France, Britain and the Arabs）（1920，載《觀察家》〔*The Observer*〕）用很長的篇幅論述了近東的「綏靖」：「英國派遣增援軍作為懲罰力量在阿拉伯取得了初步成功，他們一路作戰……以達到目標，同時動用火砲、飛機、炮艦。或許最後燒毀村莊，夷平整個地區。奇怪的是，我們在這些場合不使用毒氣。轟炸房屋是一種抓獲婦女和兒童的彆扭方式。……若用毒氣攻擊，可以將冒犯了我們的那個地區所有的人口乾淨地消滅；作為一種統治方式，目前的制度是最不道德的。」參見他的《書信集》，戴維・加內特（David Garnett）主編，紐約，1939，31 頁。

㉛另一方面，在 1910 年，殖民地部長登伯格（B. Dernburg）不得不辭職，因為他保護當地人，得罪了殖民地種植園主。參見瑪麗・湯森（Mary E. Townsend），《德意志殖民帝國的興亡》（*Rise and Fall of Germany's Colonial Empire*），紐約，1930，以及呂特溫（P. Leutwein）《在非洲的帝國》（*Kämpfe um Afrika*），盧倍克，1936。

㉜這是前馬德加斯加總督、貝當的朋友列昂・蓋拉（Léon Cayla）的原話。

㉝此處以及以下內容可同第 2 章相互參照。

❸有意思的是，帝國主義發展的早期觀察家們都十分強調這種猶太人因素，但是後晚近的文獻中就很少見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方面，霍布森所發展的理論顯示出十分可靠的觀察和十分忠實的分析。他就這個主題所發表的第一篇論文〈南非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Capitalism and Imperialism in South Africa)(載《當代評論》，1900)中說：「大多數(金融家)是猶太人，因爲猶太人是國際金融家中的佼佼者，儘管他們說英語，但是多數出生於歐洲大陸。……他們去那裡(德蘭士瓦〔Transvaal〕)是爲了賺錢，最先到達、賺錢最多的一批人普遍都功成身退，把他們的經濟毒牙留在犧牲品的屍體上。他們緊緊地抓住蘭德(Rand)……就像他們隨時準備抓住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一樣。……他們主要是金融投機家，不是眞正從工業成果中獲利，甚至也不從別人的企業中獲利，而是從建立公司、推動公司發展、在金融方面控制公司中獲利。但在霍布森後來的研究專著《帝國主義》中，根本不提猶太人；與此同時，他們的影響和作用是暫時的，並且多少是表面的。

關於猶太金融家在南非的作用，請參見第7章。

❹以下引文除特別註明外，皆出自《巨獸》一書。

❺這種說法符合極權主義的托辭，即所謂已消除了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矛盾，這一點很能說明問題(參見第12章)。但是，不應該忽略一個事實，即霍布斯最期望的是保護私利，如果沒理解錯的話，他的藉口是私人利益也是政體的利益，而極權主義的政權則相反，他們宣稱不存在隱私權。

❻機會上升到能夠決定整個人生的地步，這一現象在十九世紀發展到頂點。隨之而來的是長篇小說這種新的文學體裁的出現和戲劇的衰落。因爲在一個沒有戲劇情節的世界裏，戲劇變得毫無意義，而小說足以描寫人類的命運，他們或者是必然的犧牲品，或者是幸運的寵兒。巴爾扎克在這種新體裁中完整地顯示出，人類的激情甚至就是人的命運，既不包含善，也不包含惡，既不包含理性，也不包含自由意志。只有小說才以完全成熟的形式，對全部人類事物作了詮釋和再詮釋，才能鼓吹關於命運的新福音，這種對個人命運的沉迷在十九世紀知識分子中間，扮演多麼重大的角色。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用這種觀點，試圖在自

己和市儈們之間劃清一條界線，也試圖保護自己不受好運或惡運的非人性的影響，而且還發掘了現代感受能力的稟賦——對痛苦、對理解、對命定角色的扮演——這些都是保持人類尊嚴所迫切需要的，這要求人應該在別無選擇時至少做一個自願的犧牲者。

㊳目前流行的關於建立「世界政府」(World Government)的自由派觀念，就像在政治權力問題上的一切自由派觀念一樣，其基礎是一種相同的概念：個人服從於一個中央權威，它「凌駕所有的人」，除了在這裏是由國家來代替個人。「世界政府」要壓倒和消除正統的政治，亦即各個民族相互之間都以其全力合諧共處。

㊳沃爾特·班雅明，〈論歷史觀念〉(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社會研究學會，紐約，1942，油印本。——帝國主義者們自己充分意識到他們那種進步概念的意思。在印度的那位政府官員是一位非常有代表性的作者，他以卡特希爾爲筆名寫作。他說：「人們應該永遠對那些被進步的勝利之車碾得粉碎的人感到遺憾。」(見前引書，209 頁)

㊵「殖民機構向對外侵略政策提供了最淸楚、最自然的支持；帝國的擴張向貴族和各個職業階級有力地顯示出它能向他們的子孫提供各種新的、不斷發展的職位。」(霍布森「南非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見前引書)「……愛國的教授和共和黨員，無論何種政治傾向，也不考慮個人的經濟利益所在，」他們倡導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公開的帝國主義向外衝擊。」(海耶斯，前引書，220 頁)

㊵此處和下面論述可參見霍布森《帝國主義》，早在 1905 年，他就對經濟驅動力和動機及其某些政治意義作了高超的分析。1938 年，他發表了早先的研究，在未修改的著作引論中正確地指出，他的著作眞實地證明了「今日的……主要危險和動盪不安……早在上個世代中已經都潛伏着，並且明顯可辨了。」

㊵英國在六十年代、歐洲大陸在七十年代的嚴重經濟危機同帝國主義之間的明顯關聯，在海耶斯的著作第 219 頁的註釋和舒依勒前引書中都提到了。後者認爲「移居外國的興趣復甦，這在帝國主義運動的開始階段是一個重要因素」，引起這種興趣的原因是六十年代結束以前「英國商業和工業的蕭條」(280 頁)。舒

依勒還用較長篇幅描述了「維多利亞時代中期反帝國主義的傾向」之強烈狀況。很不幸，舒依勒未能區分國協與帝國本身之間的差異，儘管對前一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料研究本應該很容易提出這樣一種差異。

㊸羅莎·盧森堡，《論資本累積》(*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柏林，1923)，273 頁。

㊹魯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論金融資本》(*Das Finanzkapital*)，(維恩，1910，401 頁）提及——但未分析其意義——一個事實：帝國主義「突然又一次使用資本主義財富的原始累積方法」。

㊺根據羅莎·盧森堡對帝國主義政治結構的出色分析(前引書，273 及 361 頁)，「資本累積的歷史過程在其各方面都取決於非資產階級的階層之存在，」因此「帝國主義是在其爭奪非資本主義世界裏剩餘部分時的資本累積之政治表現。」資本主義從本質上依賴一個非資本主義化的世界，這一情況在帝國主義的其他一切基礎中都存在，由此可以解釋爲儲備過分和分配不公的結果（霍布森，前引書），可以解釋爲過度生產和需求新市場的結果(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Imper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Capitalism*〕，可以解釋爲原料供應不足的結果(海耶斯，前引書)，或可以解釋爲用資本輸出來均衡國內的利潤比率的結果。(希法亭，前引書)

㊻希法亭說，英國從 1865 年到 1898 年，從國外投資中增加了九倍的收入，而從國內的國民總收入僅增加兩倍，他假設德國和法國在國外的投資也有獲利增加的情形，儘管不如英國明顯。

㊼關於法國的情況，可參見拉夏白(George Lachapelle)，《第三共和國的財政》(*Les Finances de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巴黎，1937）和勃勞根《近代法國發展史》（*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France*）（紐約，1941)。關於德國的情況，可參見維爾思(Max Wirth)，《商業危機史》（*Geschichte der Handelskrisen*）(1873) 第 15 章，夏依弗爾(A. Schaeffle)〈1873 年的交易所風暴〉(Der “grosse Börsenkrach” des Jahres 1873)，載《總體國家學說研究期刊》(*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1874，第 30 卷。

這些著作都很有意思地作了同時代人的證言。

㊽霍布森，《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

㊾見希法亭，前引書，406 頁。「因此，所有對國外投資懷有興趣的資本家都大聲疾呼，要求有強大的國家力量。……當自己國家的權力已完全統治新的領土時，輸出的資本才最安全。……如有可能，它的利潤應該由國家來保證。所以，資本輸出贊成帝國主義政策。」423 頁：「毫無疑問，當國家政權變成了一種在世界市場上金融資本的競爭工具時，資產階級對國家的態度經歷了一種徹底的變化。資產階級曾經在其反對經濟重商主義和政治專制主義的戰鬥中敵視國家。……至少從理論上來說，經濟生活應該完全脫離國家干預；國家應該使自己限制在政治範圍，保衛人民安全，建立平等人權。」426 頁：「但是，擴張主義政策的欲望在資產階級的心理上引起了革命性的變化。它不再是和平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470 頁：「從社會角度來看，擴張是維持資本社會主義的重要條件；從經濟角度來看，它是保持和暫時增加利潤比率的條件。」

㊿這些動機在日耳曼帝國主義尤其明顯。成立於 1891 年的「泛德聯盟」的最初活動中，曾經努力阻止德國向外的移民改變國籍，威廉二世的第一次帝國主義演講是紀念帝國建立二十五周年，他的話包含着典型的帝國主義動機：「日耳曼帝國已成為世界帝國。我們有成千上萬名愛國志士居住在各處，在地球上遙遠的部分。……先生們，你們的神聖職責是幫助我，將這個更大的德意志帝國同我們本土國家聯合起來。」亦可參見本章註㊽。

(51)丹姆斯(E. H. Damce)，《維多利亞的幻覺》(*The Victorian Illusion*)(倫敦，1928)，164 頁：「非洲，這塊既不包括在撒克森人旅行路線中、又不包括在專業哲學家的帝國歷史中的土地，變成了不列顛帝國主義的溫床」。

(52)見米林，前引書。

(53)「自由黨（而不是議會中的右派）是海上政策的支持者。」(見艾爾弗雷德·馮·梯爾皮茲〔Alfred von Tirpitz〕，《回憶錄》〔*Erinnerungen*〕，1919）亦見丹尼爾·弗萊曼〔Daniel Frymann〕(海因里希·克拉斯〔Heinrich Class〕的筆名)，《如果我是皇帝：談政治的真理與必然性》(*Wenn ich der Kaiser wär: Poli-*

tische Wahrheiten und Notwendigkeiten)(1912):「眞正的帝國主義政黨是國家自由黨(National Liberal Party)。」弗萊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是德國著名的沙文主義者,他還說到保守黨:「保守黨對種族學說的漠然,也値得注意。」

❺❹霍布森,前引書,61 頁。

❺❺霍布森(前引書)最早認識到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根本對立,以及民族主義變爲帝國主義的傾向。他稱帝國主義是倒錯的民族主義,「各民族……將總體上富有刺激性的、各種民族類型的競爭轉變爲各帝國的競爭中你死我活的鬥爭。」(9 頁)

❺❻參見本書第 8 章。

❺❻霍布森,前引書,146 頁:「無疑地,內閣反對衆議院的力量穩步迅速的增長,看來還在繼續增強。」勃賴斯(James V. Bryce)在《歷史與法理學研究》(*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1901,第 1 卷,177 頁)提到這一點。關於「前排制」的活動情況,可參見希萊爾・貝洛克(Hilaire Belloc)和塞西爾・契斯特頓(Cecil Chesterton),《政黨制度》(*The Party System*),倫敦,1911。

❺❻寇曾勛爵在克洛默勛爵紀念碑揭幕儀式上的演講。見勞倫斯・澤特蘭,《克洛默勛爵傳》(1932),362 頁。

❺❻海斯克斯・貝爾,前引書,第 1 部分,300 頁。

在荷蘭殖民地機構中也流行着同樣的情緒。「最高的任務,史無前例的任務,等待着由東印度公司的公務官員們去完成……應該認爲,在這支隊伍裏服務,是一種最高榮譽……,這個團體是精心挑選來完成荷蘭的海外使命的。」見德・凱特・安吉利諾,《殖民政策》(*Colonial Policy*)(芝加哥,1931),第 2 卷,129 頁。

❺❻德國「殖民地協會」(Kolonialverein)主席霍亨羅赫-蘭根伯格(Hermann Hohenlohe-Langenburg)於 1884 年所言。見瑪麗・湯森,《近代德國殖民主義的起源:1871-1885》(*Origin of Modern German Colonialism: 1871-1885*)(1921)。

第六章
種族主義之前的種族思想

如果像以往有時斷言的那樣，種族思想(race-thinking)是德國人發明的，那麼「德國思想」(German thinking)（無論那是什麼）在精神世界的許多部分裡都取得了勝利，遠在納粹開始他們征服世界的企圖之前。在三十年代，希特勒主義(Hitlerism)使用了它在國際上和歐洲各國之間的強大魅力，因爲種族主義(racism)儘管只有在德國才成爲國家理論，但是已經到處成爲一股強大的輿論潮流。當德國坦克在1939年開始它們毀滅世界的進軍時，納粹的政治戰爭機器早已開動。在政治戰中，種族主義被視爲比任何收買的特務或第五縱隊的秘密組織等同盟者都更有力。幾乎二十年裡在各大城市裡的經歷增強了納粹的信心，認爲他們最好的「宣傳」(propaganda)是他們的種族政策本身，儘管在種族主義政策上，他們有過許多妥協，失落過許多希望，但是他們從未因權宜之計而偏離方向。❶種族主義既非新武器，亦非秘密武器，儘管以前從來未曾如此貫徹地使用過。

歷史的事實是，種族思想根源溯至十八世紀，在十九世紀同時出現在西方所有的國家。自從世紀交替以來，種族主義一直是帝國主義政策中一種強有力的意識形態。它當然吸收了各種舊的種族觀點，並且使它們復興，但是，舊的種族觀點單憑自身是難以創造或衍生成種族主義，成爲一種世界觀(weltanschauung)或意識形態。在十九世紀中期，種族觀點仍需由政治理由的尺度來評判；托克維爾就高比諾(Joseph Arthur de Gobineau)的理論而寫信給他說「它們或許是錯誤的，而且當然是有害的。❷直到十九世紀末，才顯出種族思想的威嚴和重要性來，它似成了西方世界的主要思想貢獻之一。❷

在「爭奪非洲」的致命日子之前，種族思想還一直是許多種自由思想之一，歸納在自由主義的總體範圍之內，互相爭辯和論爭，想贏得大眾輿論的支持。❹其中只有少數發展成完整的意識形態——以一個觀點爲基礎的思想體系，其力量足以吸引和說服大多數人，其範圍能引導他們的各種經驗和現代日常生活的情景。因爲一種意識形態不同於一種單一的觀點，它或者宣稱擁有解說歷史的鑰匙，或者擁有關於一切「宇宙之謎」的答案，或者擁有對隱秘的宇宙規律的新知，假定這些規律在統治自然和人。在人類信念的艱難競爭中，很少有幾種意識形態能夠贏得足夠的名聲，而且只有兩種能達到頂峰，擊敗其他各種。其一是將歷史解釋爲階級之間的經濟鬥爭，其二是將歷史解釋爲各個種族的自然混戰。兩者都強烈地吸引了廣大羣眾，能夠取得國家的支持，成爲官方的國家學說。輿論採納這兩種思想竟也到了如此程度，超越種族思想和階級思想發展成強制型思想的範圍：不光是知識分子，就連廣大羣眾也從此根據這兩種觀點來接受對過去或現在的事實的論述。

我們時代的主要意識形態中內在的信念的巨大力量不是偶然的。信念若不訴諸經驗或願望，或謂之直接的政治需要，就難以成立。這些事物的可信度既非來自科學事實（例如各種的達爾文主義者要我們相信的那樣），亦非來自歷史規律（例如歷史學家在努力發現文明盛衰規律時假設的那樣）。每一種完備的意識形態創造出來，繼續發展，不斷改進，成爲一種政治武器，而不是一種理論教條。的確在有時——種族主義的情況即如此——某種意識形態改變了它原先的政治含義，但若不直接同政治生活接觸，那是難以想像的。它們的科學方面內涵只在其次，主要在於提供無懈可擊的論點的欲望，說它是「其次」，因爲它們的說服力也抓住了科學家，他們不再對自己的研究結果感興趣，而是離開了實驗室，匆忙地向各種各樣的人鼓吹他們對生命和世界的新詮釋。❺我們認爲，如今任何一門科學都深刻地受到種族思想的滲透，不再是單純屬於其學科分類系統，這與其歸咎

於科學發現，不如說應該歸咎於這批「科學的」鼓吹者。這就反過來歷史學家們——其中有些人認爲種族思想應該歸咎於科學——錯以爲某些語文學或生物學研究成果是種族思想得以產生的原因，而不是種族思想導致的結果。❻ 相反的判斷倒是更接近眞理。毫無疑問，「強權即公理」(Might is Right)的信條需要花幾個世紀的時間（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才征服自然科學，產生「適者生存」的「法則」。另舉一列，如果說，德•梅斯特(Comte J. M. de Maistre)和謝林(Friedrich W. J. Schelling)關於「蠻族部落是先民衰亡後的遺民」的理論適應了十九世紀政治手段和進步論的需要，那麼我們很可能從來沒聽說過關於「原始人」的事，科學家們都不會浪費時間去尋找猿與人之間的「失去的聯繫」。這不能責怪這些學科，而應該責怪某些科學家，他們與同時代的別人一樣受到了意識形態的迷惑。

種族主義是帝國主義政治的主要意識形態武器，這一事實很明顯，似乎讓許多研究者寧可避開其貌似眞理的舊途。相反，過去將種族主義概念錯誤地理解爲一種誇大了的民族主義，這種錯誤仍在盛行。有價値的研究著作，尤其是在法國，都證明了種族主義不僅是一種十分不同的現象，而且傾向於摧毀國家政體，這些著作一般都被忽略了。有些人目睹種族思想和階級思想之間爲爭得對現代人頭腦的統治權而激烈競爭，認爲前者是國家傾向的表現，另一則是國際傾向的表現；倘若相信前一種，即是爲民族戰爭作精神準備，相信後一種，即是爲內戰製造意識準備。這些都是可能的，因爲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奇怪地混合著舊的民族主義和新的帝國主義的衝突，其中舊的民族主義口號仍然超過了帝國主義目標的吸引力，對捲入大戰的各國民眾有著十分強大的魅力。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到處都是賣國賊和勾結通敵者，這可以證明，種族主義可以煽動起每一個國家的內戰，而且也是有史以來所發明的製造內戰的最巧妙手段之一。

事實上，當歐洲各民族在準備建立（並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新的政體時，種族思想就進入了積極活動的政治舞台。從一開始起，種族主義就

蓄意衝破了一切國界——無論從地域上、語言上、傳統上、或任何別的標示——並且否認國家—政治的存在。伴隨著歐洲國際禮節的陰影不是階級思想，而是種族思想，直到它最終生長成強大的武器，足以摧毀那些國家。從歷史的角度來說，種族主義在愛國主義方面的惡劣記錄，比其他一切代表性的國際意識形態加在一起還多，而且唯有種族主義才一貫否定人民的國家組織賴以建立的偉大原則，即由全人類的觀念所保障的各民族平等和團結的原則。

㈠貴族的「種族」對抗平民的「國家」

十八世紀法國的特點是對於最不同、最陌生、甚至最野蠻的民族的興趣逐步上升。這是欽羨和模作中國畫的時代，這是一個《波斯人信札》(*Letters Persanes*)成爲最著名的著作之一的時代，這是整個社會都喜歡閱讀遊記的時代。野蠻和未開化民族的誠實和單純同世故老練和淺薄輕浮的文化形成對照。早在十九世紀之前很久，法國社會大大增加的旅遊機會將歐洲以外的世界帶回給國內每一個普通市民，十八世紀的法國社會曾努力把握歐洲邊界之外遙遠地方各種文化和各個國家的精神實質。追尋「人類新人種」(赫爾德語)的極大熱忱充溢著法國大革命英雄們的心靈，他們同法蘭西民族一起，在法蘭西的旗幟下解放了每一種膚色的每一個民族。這種對陌生異域的熱忱在博愛的啓示下昇華，因爲它激奮地想從每一個新的、令人驚異的「人類新人種」中證明拉•布呂埃爾(La Bruyère)的老話：「眞理是世界性的。」

然而，也正是要在這個創造民族的世紀裏和熱愛人類的國家，去追蹤後來變成摧毀民族、滅絕人類的種族主義力量的萌芽。❼有一個著名的事實是第一位假設不同起源的不同民族在法國可以共存的法國作家，同時也是第一個明確界定階級思想的人。波蘭維葉(Boulainvilliers)伯爵在十八

世紀初期從事寫作，他的著作在去世後發表。他將法國歷史解釋成兩個不同民族的歷史，其一起源於日耳曼族，它征服了舊居民「高盧人」(Gaules)，將它的法律強加給他們，奪取了他們的土地，定居下來成爲統治階級，這個「貴族階級」(peerage)最高權利的依據是「征服的權利」，以及「永遠有必要服從最強者」。❽波蘭維葉主要想尋找證據，反對正在上升的政治力量「第三階級」(Tier Etat)及其代言人，即由「作家和律師」組成的「新團體」，同時他也必須和專制君主作戰，因爲法國國王再也不想作爲「身居首位之人」來代表貴族階級，而是想代表整個民族；在一段時間裡，新興的階級在他身上找到了最強有力的保護人。爲了重新獲得貴族階級的無可挑戰的首要地位，波蘭維葉向同儕貴族們提議，否定法國人有共同起源，打破民族的同一性，宣布有一種原初的、因而也是永久的區分。❽波蘭維葉比後來的大多數貴族階級辯護士都大膽，他否定有有任何命定先決的聯繫；他承認「高盧人」在法蘭西居住間時更長，而「法蘭克人」(Francs)則是外來人和蠻族。他的唯一理論基礎是永恆的征服權，並且很容易地斷言「弗里斯蘭(Friesland)……是法蘭西民族的眞正搖籃。」早在帝國主義的種族主義實際發展之前兩百年，他只從概念的內在邏輯出發，便以現代意義來思考法國當地居民的最初起源，或者根據（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臣民」(subject)來思考——不是國王的臣民，而是征服者民族中的既得利益者的臣民，那些既得利益者僅憑出身就有權被稱作「法國人」了。

波蘭維葉深受十七世紀的強權公理說的影響，他無疑是同時代人中最堅定的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信徒之一。他翻譯過斯賓諾沙的《倫理學》(*Ethics*)，評析過《神學政治論》(*Traité théologico-politique*)。在他所接受的斯賓諾莎政治觀念中，強權轉譯爲征服，而征服則成了對人、對民族的自然特質和人類特權的唯一評判標準。我們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強權公理說在後來經歷自然主義式(naturalistic)之轉化的最初跡象。波蘭維葉是他那個時代傑出的自由思想家之一，他對基督教的攻訐也不只是出於

反教會的動機，這事實確實強化了上述觀點。

但是，波蘭維葉的理論仍然是關於民族的，而不是關於種族的；他認爲優等民族的權利基礎是歷史行爲和征服，而不是有形事實——儘管這種歷史行爲早已對被征服民族的自然特質產生了某些影響。它在理論上將法國人分爲兩種不同的人，目的是爲了對抗新的民族觀念，這種新的觀念表現在專制君主和第三階級的結合。當時法國的民族觀念被看作是新的革命性觀念，但是尚未像在法國大革命中那樣顯示它同民主政府形式的關聯有多密切，波蘭維葉就已經是一個反民族者了。波蘭維葉在不知內戰意味著什麼的情況下替他的國家準備了內戰。他是許多貴族的代表，而他們認爲自己不是民族的代表，而是和民族分開的一個統治者階級，比起其民族同胞來，它與一個外國民族中「相同社會條件」的階級有更多的共同之處。的確，正是這些反民族的思潮在移民的環境中產生了影響，最後被十九世紀晚期新的、公開的種族理論吸收了。

直到法國革命眞正爆發，迫使大批法國貴族逃亡德國和英國避難，波蘭維葉的思想才顯示出是一種有用的政治武器。同時，他在法國貴族中仍然有影響，例如可以見諸於杜波埃-南賽(Dubuat-Nansay)伯爵⑩的著作，杜波埃-南賽想使法國貴族同它在歐洲大陸諸國的兄弟聯繫得更密切。在法國革命前夕，這位法國封建主義的代言人感到不安全，因而期待「創造一個蠻族起源的貴族國際聯盟」，⑩但他最終唯一能指望的只有德國貴族的幫助，在此，法國貴族的眞正起源假定與德國貴族一致，而法國的低層階級雖說不再是奴隸，其自由卻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靠貴族——與身俱來的自由人——給予其公民權。幾年以後，法國流亡貴族眞的試圖建立一個貴族國際聯盟，以避免外國被奴役的人民起而抗爭。雖然其中比較實際的措施在伐爾米(Valmy)轟動一時後垮台了，但是流亡貴族們不承認失敗，例如查理・弗朗索瓦・多米尼克・德・維里埃(Charles François Dominique de Villiers)（此人於1800年左右反對將「高盧的羅馬人」(Gallo-

Romains)歸於日耳曼人種）和威廉・阿爾特(William Alter)（此人十年後又夢想建立所有日耳曼民族的聯盟)。⑫也許他們從未想到過，他們實際上都是叛國者，他們頑固地相信「法國革命是一場外國民族之間的戰爭」——很久以後，法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還這麼說。

當波蘭維葉在一個不太騷亂的時代以冷靜的公正態度說話，以征服權爲貴族權利之唯一基礎，不直接貶低其他被征服民族的本質時，蒙特羅西爾(Montlosier)伯爵——法國流亡貴族中個性最曖昧的人物之一——卻公開說他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從奴隸崛起……（混合）一切時代一切種族的……新民族。」⑫時代明顯地變了，不再屬於一個未被征服的種族的貴族也同樣必須改變。他們放棄了波蘭維葉、甚至孟德斯鳩十分珍視的舊觀念，即認爲只有征服——用武力獲得財富——決定人的命運。流亡的貴族意識形態產生之時，正值阿貝・西葉(Abbé Siéyès)在他那本著名的小冊子中告訴第三階級：「凡是那些堅持荒唐的虛矯，說自己是征服者種族的後裔、具有勝利者之權利的家族，統統應該將它們送回弗朗科(Franconia)尼亞森林。」⑭

很奇怪，從這些較早的時代起，法國貴族在同資產階級鬥爭時發現，他們屬於另一個民族，具有另一種系譜淵源，和一個國際階級的紐帶遠比和法蘭西土地緊密，法國的一切種族理論都支持日耳曼主義(Germanism)，或者至少是北歐民族優越論(勝過本國民族)。如果說，法國大革命的參加者認爲自己的精神歸屬是羅馬，這並非因爲他們將第三階級的「拉丁主義」(Latinism)來對立於貴族的「日耳曼主義」(Germanism)，而是因爲他們感到自己是羅馬共和國的精神繼承人。這種歷史認歸與貴族的部落性認同不同，原因之一也許是防止「拉丁民族主義」自己以一種種族理論的面目出現。雖然有點弔詭，但實際上是法國人早於德國人或英國人堅持這種關於日耳曼優越性的固定觀念。⑫ 1806 年普魯士戰敗後德國意志種族意識的產生是針對法國的，但也改變不了法國種族意識形態的路線。在十九世紀

四十年代，奧克斯丁•梯埃里(Augustin Thierry)仍然將階級與種族等同，而將「日耳曼貴族」與「克爾特(celtic)資產階級」區別開來，⓰另一個貴族雷繆薩(Rémusat)伯爵宣稱自己是德裔的歐洲貴族。還有，高比諾伯爵將法國貴族中間早已被普遍接受的一種觀點發展成完備的歷史學理，宣稱發現了文明衰落的秘密規律，並將歷史學提高到具有自然科學的地位。此時，種族思想完成了第一階段，進入第二階段，其影響將在我們這個二十世紀中才被人感受到。

(二)種族統一作爲民族解放的替代

德國的種族思想在舊式普魯士軍隊被拿破崙打敗之前並未獲得發展。它的興起歸功於普魯士的愛國者和政治浪漫主義(political romanticism)，而不是貴族及其代言人。法國式的種族思想是一種內戰和使民族分裂的武器；德國種族思想的產生是爲了團結全民族，反對外族統治，它的創始人們不到邊境之外去尋找同盟者，而是想在全民族中喚起一種同根意識。這實際上不包括貴族及其著名的大同主義式連結(cosmopolitan relations)，它不是普魯士容克貴族的特點，而是歐洲其餘國家貴族的特點；總而言之，它不可能將種族思想的基礎放在這個最排外的階級身上。

由於日耳曼種族思想伴隨著長期以來無法統一無數日耳曼小國的挫折，所以在早期階段，種族思想仍然緊密地聯繫著一般的民族感情，以致很難區別純粹的民族主義和明確的種族主義。無害的民族感情以我們今天所知的種族主義語言來表達，所以即便歷史學家們將二十世紀德國種族主義認作德意志民族主義的奇特表現，卻也很奇怪地混淆納粹主義和德意志民族主義，因此低估了希特勒的宣傳的巨大國際吸引力。德意志民族主義的這些特殊條件，只有在 1870 年後民族統一實際上發生以後，德國種族主義與德國帝國主義一起獲得充分發展時，才產生變化。但是，德國特殊的

種族思想從早期起，就有許多特點留存了下來，並繼續具有意義。

普魯士貴族們與法國貴族不同，他們感覺到自己的利益同絕對君主專制的地位緊密相連，至少從腓特烈二世時代起，他們就希望被承認爲整個民族的合法代表。除了普魯士改革(1808－1812)那幾年以外，普魯士貴族並未被資產階級的興起以及它可能要接管政府所嚇倒，他們也並不害怕中產階級與統治者家族之間的聯合。儘管改革派們百般努力，普魯士國王直到 1809 年時仍是國內首屈一指的最大地主。因此，在貴族階層之外發展起來的種族思想乃是某些民族主義者的武器，他們要使所有的德語民族達到統一，於是就堅持「共同起源」論。他們反對普魯士容克貴族的排外統治，因此可以說是自由派，只要是以共同語言來界定這一共同起源，就很難說是種族思想了。⓱

値得注意的是，直到 1814 年以後，這一共同起源才頻繁地以「血緣關係」、家族紐帶、部族統一性、非混合起源等等術語形式出現在描述中。這些定義幾乎同時出現在天主教作家的瑟夫·戈雷斯(Josef Goerres)、民族主義自由派作家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或加恩(F. L. Jahn)等人的著作中，從中亦可見到那種想在德意志民族中喚起眞正的民族感情的希望已歸落空。由於未能將民族上升到國家地位，由於缺乏共同的歷史記憶和對未來共同命運的普遍冷漠，就產生了一種自然主義式的訴求，指出部族本能可能作爲一種代替物，來取代整個世界眼裡所見的那種法蘭西民族性的輝煌力量。需要以民族統一性的意識形態定義來取代政治上的民族性的人發明了一種有機歷史理論:「每一個種族都是一個各自完整的整體。」⓱正是由於民族主義受挫，才使阿恩特宣稱，德國人明顯地是最後一個發展成有機統一體的，所以幸運地成爲純粹的、非混合的一族，一個「眞正的民族」。⓱

德意志意識形態和德意志歷史主義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以有機自然主義(organic nationalistic)定義各民族。但是這些尙非眞正的種族主義，因

爲同樣說著這些「種族主義」語言的人仍然堅持眞正民族性的中心支柱——一切民族之平等。故在同一文章中，加恩將各民族的法則同動物生活的法則作比較，他堅持主張眞正平等的各民族多元共存，人類只有在這種完全的多元性中才能實現自身。⑳阿恩特後來想對波蘭人和義大利人的民族解放運動表示強烈的同情，他宣稱說：「誰想征服和統治外國民族，誰就該受詛咒。」⑳由於德意志民族的感情不是眞正的民族發展的果實，而是對外來占領的反應，⑳造成了民族理論的奇特的消極特徵，命中注定要在該民族四周築起一道高牆，非地理和歷史所能界定的邊界。

如果說在法蘭西貴族的早先形式中，種族思想是作爲內部分野的工具而發明，結果轉變爲一種內戰武器的話，那麼德意志種族理論的早期形式是民族內部統一的武器，並且轉化爲民族戰爭的武器。就像法蘭西民族中的一個重要階級——法國貴族——的衰落，如果第三共和的敵人未能使種族思想復興，那麼這個武器就失去了效用，當德國完成了民族統一時，倘若現代帝國主義的策畫者不想使它復興，這種有機歷史性的理論就會失去意義——而復興種族思想是爲了吸引民衆，並將其醜惡嘴臉掩蓋在令人肅然起敬的民族主義外表下。德國另一種種族主義的來源與此不同，它儘管表面上離政治舞台十分遙遠，卻對後來的政治思想眞正地具有更強烈的影響。

政治的浪漫主義曾被指責爲發明了種族思想，也發明了另一種可能不負責任的觀點。亞當・繆勒(Adam Müller)與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在最大程度上表徵出現代思想的一般遊戲性質，在現代思想的範疇內，幾乎任何觀點都可以從中暫時找到一席之地。從浪漫主義包容一切而又毀滅一切的狂熱嗜好中，沒有一種眞實的事物、沒有一個歷史事件、沒有一種政治思想是安穩可靠的，但是文人學士們卻總是可以發現新的創造性機會來發明新鮮的、令人感興趣的觀點。正如諾瓦利斯(Friedrich von Hardenberg Novalis)所說，「世界必須浪漫化」，應該「使普通事物具有高度意義，使

一般事物具有神秘的外表，使無名之輩在著名人物面前也有尊嚴。」㉓這種浪漫化的對象之一就是人民，這個對象在瞬間的關注之下可以變成一個國家、一個家庭、一個貴族階級，或者其他身份，可能——如同早期——碰巧閃過一位知識份子的腦中，或者——後來當這些知識分子明白了現實生涯的艱難——應其贊助人的要求而做。㉔因此，假如不涉及德國形式的浪漫主義，就幾乎不可能研究十九世紀裡豐富而迷人的任何一種自由競爭的觀點的發展。

第一批現代知識分子所做的並不完全是發明一種單一的觀點，而是為現代德國學者的一般精神狀態作準備；這些學者們不止一次地證明了，即便是一位浪漫主義者也很難忽略，唯有現實是利害攸關的，亦即地位的現實，否則就很難發現他們所不願意遵從的那種意識形態。浪漫主義為這種奇特的行為提供了最出色的藉口，絕對地偶像化個人的「人格」(personality)，而個人的任意性便是天才的證明。所謂個人創造，亦即他的「觀念」(idea)之整體任意遊戲，無論它是什麼，都可以成為整個生命觀和世界觀的中心。

浪漫主義的人格崇拜中這種內在的犬儒主義(inherent cynicism)在知識分子中使某些現代態度得以確立。墨索里尼比較充分地代表了這些態度，他是浪漫主義運動的最後繼承者，他形容自己同時是「貴族派和民主派，革命者和反革命者，無產階級衛士和反無產階級鬥士，和平主義者和好戰分子」。浪漫主義中凜然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從不意味著別的，而只意味著「每一個人都可以自由地為自己創造一種意識形態」。墨索里尼的實驗中新成分無非是「用一切可能的力量來使之完成」。㉕

由於這種內在的「相對主義」(relativism)，使浪漫主義對種族思想發展之直接貢獻幾乎被人忽略。在無政府主義的遊戲中，它的規則允許每一個人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時間裡創造至少一種個人的任意觀點，這幾乎是無可懷疑的事實，每一種可理解的觀點應該系統地表達並出版。比這種混亂

狀態更有特色的是，相信人格就是最終目標。在德國，貴族與上升的中產階級之間的衝突從來不在政治舞台上表演，個性崇拜發展成爲獲得某種社會解放的唯一手段。國家的統治階級坦率地表明它蔑視商業的傳統態度，不喜歡同商人合作，也不屑於商人日益增長的財富和重要性，致使它很難找到贏得某種自尊的手段。德國經典「成長小說」作品《威廉・麥斯特》(*Wilhelm Meister*)明確地描述了這種毫無希望的情形，作品中的中產階級主人翁由貴族和演員教育成長，因爲資產階級社會階層還沒有「人格」。

德國知識分子儘管很難爲他們所屬的中產階級而推動一場政治鬥爭，卻爲爭取社會地位而艱難地從事了一場痛苦的但又不幸高度成功的戰鬥。甚至那些寫文章爲貴族辯護的人也仍然感到，他們的社會等級問題是一個利益攸關的問題。爲了在權利和出生性質上競爭，他們創造了「內在人格」(innate personality)的新概念，這在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獲得了普遍的贊同。就像一個舊家族的世襲稱號一樣，「內在人格」是生而有之，不是靠功績來取得的。正如民族的構成缺乏共同歷史這一點表面上被自然主義的有機發展概念所克服，在社會層面，當自然本身被政治現實否定時，也會提出另一種稱號。自由派的作家們不久就鼓吹「眞正的高貴」(true nobility)，來反對那些諸如男爵之類可以授與亦可以撤銷的破舊稱號，並且暗示性地斷言，他們的自然特權，就像「力量或天才」，從人類的任何行爲中都無法追蹤到。[26]

這種新的社會概念的區別性質立即被證實了。在長時間純粹的社會反猶時期內，引發了將仇視猶太人當作一種政治武器的新發現，正是缺乏「內在人格」，缺乏內在的方法，缺乏內在的生產力，缺乏內在的商業素質，等等，才使它的猶太同行的行爲同一般商人的行爲區別開來。資產階級在狂熱地嘗試抖擻起它自身的自豪感來反抗容克貴族等級制的傲慢，但又不敢爭奪政治領導權時，從一開始起就不想鄙視自己民族中的那些低層階級，而是鄙視其他民族。這些嘗試中最有意義的是克萊孟斯・布倫塔諾的一部不

重要的文學作品，㉗它爲一個仇視拿破侖的超民族主義俱樂部而創作，並在那裡朗讀，這個俱樂部成立於 1808 年，名爲「基督教德國聚餐會」(Die Christlich-Deutsche Tischgesellschaft)。布倫塔諾以他那高度強辭奪理和巧智的風格，指出個人天才的「內在人格」和他直接等同於法國人和猶太人的「市儈」(philistine)之間的對比。據此，德國資產階級至少會用貴族所蔑視的資產階級的一切典型特徵來形容其他民族——先是法國人，後來是英國人，而猶太人則一向如此。至於與生俱來的「內在人格」的各種神秘特質，恰恰與眞正的容克貴族自稱的那些特質相同。

雖然貴族的標準以這種方式影響種族思想的興起，但是容克貴族們本身對這種精神狀態的形成並未起多大作用。在這一時期，只有一名容克貴族發展了自己的政治理論，他就是路德維希・馮・德・馬爾威茲，但是他從不使用種族詞語。他認爲，民族是按照語言來區分的，這是一種精神差異，而不是物質差異。雖然他劇烈地反對法國革命，但是當一個民族有可能侵略另一個民族的時候，他像羅伯斯庇爾一樣說：「誰若以擴張疆土爲目的，誰就是整個歐洲各國共和中的叛徒。」㉗亞當・繆勒堅持以血統純淨爲對貴族的檢驗標準，而哈勒(Ludwig von Haller)卻脫離了明顯的事實，即強權者統治那些被剝奪了權力的人，指出弱者應該由強者來統治，這是一條自然法則。當然，當貴族們知道他們篡奪的權力不僅是合法的，而且還符合自然法則，他們一定會報之以熱烈的掌聲，而資產階級定義的結果是，在十九世紀的進程中，他們比以前更小心地避免「門不當戶不對的聯姻」(mesalliance)。㉗

這種堅持認爲共同的部族起源是民族性的本質的觀點，是由德國民族主義者們在 1814 年戰爭期間和以後提出的。浪漫主義者強調天性和自然貴族，這從智識上爲德國種族思想的發展鋪平了道路。從前者中產生了關於自然法則的歷史有機理論；而在世紀末，從後者產生了奇特的超人式侏儒，他的自然命運是統治世界。只要民族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潮流同時發生，它

們就只不過是逃避政治現實的臨時手段。一旦二者結合，就爲種族主義作爲一種充分發展的意識形態奠定基礎。但是，這並不首先發生在德國，而是在法國，不是由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來完成，而是由一位天賦極高但又落魄的貴族完成的，他的名字叫高比諾。

(三)開啓歷史的新論

1853 年，阿瑟·德·高比諾伯爵發表了《論人類種族的不平等》(*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五十年後，在世紀轉折時，此文成爲歷史上種族理論的某一種標準著作。這部四卷本著作的第一句話——「文明的衰落是一切歷史現象中最觸目驚心、同時也是最曖昧難明的現象」㉚——清楚地指出了作者的全新的現代興趣，他的著作中瀰漫著一股新的悲觀主義情調，這種意識形態的力量可以囊括一切先前的因素和衝突的觀點。的確，從上古時代起，人類就想盡可能多地了解過去的各種文化，覆滅的各個帝國，消失的各個民族；但是在高比諾之前，誰也沒想到去找出一條單一的原因，一種單一的力量，以解釋古往今來文明在各處的興衰。衰落論似乎與種族思想有某種密切的關係。當然，它與早先的另一種「種族信念」完全不一樣，本杰明・狄斯累利同樣對一些文化的衰落感興趣，另一方面，黑格爾的哲學大部分與歷史發展的辯證規律有關，但是他對各種文化的興衰從來不感興趣，也無意去發現一些民族死亡的規律；而高比諾恰恰指出了這條規律。他未受達爾文或其他進化論的影響，誇言已將歷史學變成自然科學家庭中的一員，探索一切事件進程的自然規律，將一切精神表現或文化現象降變爲某些「我們的眼睛能看見、耳朵能聽到、手能觸摸到的確切的科學之品質」。

這種在樂觀主義盛行的十九世紀中葉提出的理論，其最令人驚奇的方面是，事實上作者感興趣的是文明的衰落，而對文明的興起幾乎毫無興趣。

在寫作《論人類種族的不平等》時，高比諾很少思考是否有可能利用歷史學作爲實際政治中的一種武器，因此敢於得出關於衰亡規律內在的邪惡後果。斯賓塞只預言了西方文化的衰落，而高比諾以「科學的」精確性來預見「人」——或者根據他的說法是「人類」——的必然從地球表面消失。在這四卷重寫人類歷史的著作中，他得出結論說：「人們也許可以假設人類對大地的統治能延續一萬二千年到一萬四千年，這一統治時代分成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過去了，它擁有青春……第二個時代開始了，它將會看到衰亡進程，直至腐朽。」

從這裡可以明確看到，高比諾比尼采早三十年關注「衰落」(décadence)問題。㉛但是兩者之間有一個區別，尼采對歐洲的衰落有基本體驗，在頹廢派運動的頂峰期，其著作與法國的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英國的斯文朋(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德國的華格納同期，而高比諾卻很少能意識到近現代「厭世觀」(taedium vitae)的變化，所以他應當被看作波蘭維葉和法國流放貴族的最後一名繼承者，他並無複雜的心理問題，僅僅（正確地）對貴族作爲特殊階級之命運感到恐懼。他天眞地幾乎逐字逐句地接受了十八世紀關於法蘭西民族起源的理論：資產階級是高盧—羅馬奴隸的後裔，貴族是德意志人的後裔。㉛同樣地，他也堅持貴族的國際性質。他的理論的現代面向展現了一個事實，即他可能是一個騙子（他的法國貴族頭銜很可疑），過分地吹噓舊理論，而變成奇談怪論——他宣稱自己的族系是在斯堪地納維亞海盜之前上溯到北歐神話中司掌智慧、藝術、戰爭的奧丁神(Odin)：「我也是神的族裔。」㉛但是他的眞正重要性在於，他在進步論的普遍意識形態中間預言毀滅，預言人類在一個緩慢走向自然毀滅的人類末日。當高比諾開始寫作時，正値資產階級擁戴的國王路易・菲利浦執政時期，貴族的命運看來已定。貴族階級不必恐懼第三階級的勝利了，因爲這事早已發生，他們只能抱怨而已。高比諾表達了他們的沮喪心情，這與幾十年後出現的頹廢派詩人的巨大絕望感非常相近，這

些詩人詠唱人類一切事物的脆弱性，詠唱去年的白雪。就高比諾自己而言，他與頹廢派詩人的相似性是十分偶然的；但是有一點值得注意：一旦這種相似性建立起來，那麼在世紀轉折時期，一些聲望卓著的知識分子，例如法國的羅伯特・德雷富斯(Robert Dreyfus)或者德國的托馬斯・曼(Thomas Mann)，都必然以認眞的態度來看待這批奧丁神的後裔。我們這個世紀的特徵是人類現象令人難以理解的混合，而在「恐怖」與「荒謬」融入這種混合之前很久，「荒謬」早已喪失了它的作用能力。

高比諾遲來的名聲同時也歸因於社會上奇特的悲觀主義情緒，歸因於十九世紀最後幾十年裡活躍的絕望感覺。但是，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他本人是「死神與貿易的歡樂共舞」(康拉德〔Joseph Conrad〕語）那一代人的先驅者。他不是一個相信商業的政治家，也不是一個贊頌死神的詩人。他是一個失敗的貴族和一個幾乎在偶然情況下發明了種族主義理論的浪漫派知識分子的混合。當他發現，他不能簡單地接受關於法蘭西民族中有兩個民族的舊理論，根據情況變化，他必須修正舊的思路（即最優秀的人必然處於社會的頂層)，這時他就處於上述狀態。同他的老師們相比，他還必須解釋爲何最優秀的人——貴族——甚至無法期望恢復他們先前的地位。他一步一步地指認他那個等級的沒落和法國的衰落、西方文明的衰落及整個人類的衰落之間的一致性。因此他發現文明的衰落起因於人種退化，而人種的衰退起因於血統混雜，這個觀點受到後來的作家和他的傳記作家們推崇。這裡的意思是，在每一次混合中，低等種族總是占主導地位。這種論調在二十世紀初普遍流行，但是並不符合高比諾同時代理論家們的進步論觀點，他們不久就獲得了另一種固定觀念——「適者生存」。勝利的資產階級的自由樂觀主義需要一種新的「強權—公理」理論，而不是歷史的答案或衰亡必然論的證明。高比諾徒勞地想用美國奴隸制問題、用輕而易舉地將他的整個理論體系建立在白人與黑人的衝突上的方法，來爭取更多的讀者。他不得不等候將近五十年時間，才在菁英份子中間取得成功，並且直到第一

次世界大戰，隨著死亡哲學的浪潮，他的著作才獲得廣泛名聲。㉞

高比諾實際上在政治中尋找「菁英」的定義以及他們的產生，以取代貴族。他提出的不是君主，而是一種「君主種族」(race of princes)，即亞利安人，據他說，他們處於危險之中，低層的非亞利安階級會通過民主而溶入。種族概念使德國浪漫主義有可能組織起「內在人格」，確定他們是天然貴族的成員，命定要統治其他一切種族。假如種族與種族混合對於個人是全部決定因素——而且高比諾並不假設存在「純粹」血統——那麼就有可能藉口說每一個個人都可以演化至肉體上高人一等，無論他目前的社會地位如何，每一個傑出的人都屬於「眞正的生存者」，屬於「國王之子」。由於種族關係，只要宣稱自己出身於古老的封建特權家庭，就可以編造出「菁英」的世系來，只須聲稱他們覺得自己是貴族；接受種族思想，就勢必最後證明某人是「血統良好」，他的血管裡流著高貴的血，高等的出身意味著高等的權利。因此，高比諾從一個政治事件——貴族的沒落——得出兩種相互矛盾的結論：這是人種的沒落；這是新的自然貴族的形成。但是他未能活著見到，他的教義的實際應用消解了其內在矛盾——新的貴族種族實際上在一種要摧毀它的最大努力下開始造成人類「必然的」衰落。

高比諾同他的先驅者——流放的法國貴族——一樣，他在他所說的「種族菁英」(race-elite)中看到的，不僅是一道反民主的屏障，而且也是反對愛國主義的「迦南怪物」(Canaan monstrosity)的防線。㉟而法國既然恰好是優秀的「部分」(patrie)，它的政府——無論是王國、帝國或共和國——都還以人的平等爲基礎，既然最糟糕的是在他那個時代，法國是黑皮膚民族可以享受民權的唯一國家，那麼很自然地高比諾會蔑視法蘭西民族，而效忠於英國的民族，在法國 1871 年戰敗後更轉向日耳曼民族。㉟這種不顧尊嚴的態度不能說是偶然的，這種機會主義的態度也不是不幸的巧合。俗語說，成功即一切，這正是那些習慣於各種任意觀點之人的寫照。那些假裝擁有解開現實問題之答案的意識形態專家們被迫根據新近發生的事件來

改變和扭曲自己對個案的觀點，他們絕不可能承受自己同變化無常的現實之間的衝突。人們根據自己的信念來合理化既定的情勢，要求他們成爲可靠之人，那顯然是荒謬的。

必須承認,直到納粹自稱種族菁英之前,公開蔑視其他一切民族——甚至蔑視日耳曼民族中的其他人——以法國的種族主義最一貫，因爲它從不陷入愛國主義的弱點。(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種態度也未見改變；的確，「亞利安素質」(essence aryenne)不再爲日耳曼人所獨有，而是屬於盎格魯—撒克遜人、瑞典人、諾曼人，而民族、愛國主義、法律等等仍然被看作「偏見、虛妄和空洞的價值」。)㊲甚至連坦恩(Hippolyte Taine)也對「日耳曼民族」的優越天賦堅信不疑，㊲歐內斯特•赫南也許是將「閃族人」與「亞利安人」對立起來的第一位學者，他的關鍵理論是「人種分野」，儘管他也認爲文明是一種更強大的力量，能夠摧毀地方人種淵源和原始種族的差異。㊴ 1870 年以後，法國學者多有關於種族問題的泛談，㊴即使嚴格說來他們並非種族主義者，但也遵循著反民族、主張日耳曼優越論的路線。

如果說，高比諾一貫的反民族傾向爲法國民主的敵人、後來又爲第三共和的敵人提供了思想武器，使法國境外的眞實的或虛構的同盟者們有了理論，那麼也可以說，關於種族的具體混合和「菁英」概念使國際知識分子在歷史的巨大遊戲場上獲得了新的、令人興奮的心理玩具。高比諾所說的「國王之子」是十九世紀晚期的浪漫主義英雄、聖人、天才和超人，他們都無法掩蓋自己的日耳曼浪漫主義淵源。浪漫主義觀點內在的不負責任性質受到了高比諾關於種族混合理論的新刺激，因爲這種血緣混合顯示了過去的歷史事件，可以在人自我的深邃處追尋。這意味著內在經驗可以被賦予歷史意義，人的自我變成了歷史的戰場。「自從我讀了《論人類種族的不平等》，每當某種衝突激起了我的存在之中的各種潛在力量，我就感到靈魂經受著一場無休止的戰鬥，一場黑種人、黃種人、閃族人、亞利安人之

間的戰鬥。」❹這一類自白的意義又也許在於揭示了現代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無論他們持何種觀點，他們都是浪漫主義的眞正繼承人，他們的思想顯示了可能被迫納入各種意識形態的人的無害本質和政治上的幼稚。

(四)「英國人的權利」與人權

在拿破崙戰爭期間，德國種族思想的種子已經撒下，而在法國革命期間，英國已經顯現了後來發展的端倪，這也許可以追溯到那個強烈譴責法國革命是「迄今爲止世界上最令人驚愕的危機」的人——埃德蒙·伯克。❹他的著作不僅對英國思想界，而且對德國思想界也產生了巨大影響，這已爲人所共知。但是，必須強調一個事實，即與法國的種族思想相比，德國與英國的種族思想十分相像。這一類似現象源出於這兩個國家都擊敗了法國，因此就顯示出一種傾向，認爲「自由—平等—博愛」爲外國的發明。英國社會的基礎是社會的不平等，英國的保守黨人並未因遇到「人權」問題而感到絲毫的不舒服。根據十九世紀托利黨人的普遍觀點，不平等是英國的民族性格。狄斯累利發現「在英國人的權利之中有某種比人權更好的東西」，而詹姆斯·斯蒂文(James Stephen)爵士認爲「法國人對於這種事物竟會如此興奮，這樣可憐的事情看來也是歷史上少有的。」❹爲何直到十九世紀末他們能沿著民族的思想路線來發展種族思想，這也就是原因之一，而法國的種族思想從一開始起就顯示出反民族的面目。

伯克的主要論點是反對法國革命的「抽象原則」，具體表述如下：「我們憲法中的統一政策是宣稱並斷言我們有自由，這種自由是從先輩那裡繼承而來的，而且要遺留給後人；它是一種財產，具體地屬於這個王國裡的人民，並不指涉任何普遍和先驗的權利。」繼承(inheritance)的概念，套用於自由的本質時，一直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基礎，自從法國革命以後，英國的民族主義從中接觸到一種奇怪的種族感情。根據一位中產階級作家的說

法，意指直接接受封建的概念，自由是繼承自封號和土地的特權總合。伯克並未侵犯英國特權階級的權利，他只是將這些原則擴大涵蓋整個英國人民，將他們確定為各民族中間的一種貴族。所以他嘲笑那些將特許當作人權的人，認為他所見到的權利只能說是「英國人的權利」。

在英國，民族主義在發展過程中並不認眞地攻擊舊的封建階級。這是很可能的，因為英國紳士階級從十七世紀以來人數漸增，同化了上層資產階級，所以有時甚至普通人也能爬上貴族地位。在這個過程中，普通等級的人們大多淡薄了貴族之高傲的觀念，創造了一種民族責任感的強烈意識；但是同樣地，封建觀念與心理比在別的地方更能影響低層階級的政治思想。於是，關於繼承的概念幾乎原封不動地被接受，並且應用於整個不列顛「種族」。這種根據貴族標準的同化結果，是英國的種族思想幾乎糾纏於繼承論，以及現代版的繼承論——優生學。

自從歐洲各民族在實踐中嘗試以人類概念涵括世界上一切民族，他們就為自身與在其他大陸上的各民族之間外表上的巨大差異感到激怒。[44]十八世紀追求多樣性的熱情、使表面一致的人性和理性能得到多樣表現——在一個關鍵問題上却提供了一種相當薄弱的表面論點；這個問題是，基督教關於一切人和睦與平等的教義——因為他們共同來源於最初的一對父母——當我們面對部族問題時，心中是否要想到這一點，就我們所知，這些部族在文化活動和普遍風俗中從未充分表達過人類理性和人類激情，只在很低的層次上建立了人類制度。這個新問題在歐美歷史舞台上出現，隨著對非洲部族的直接知識，歐洲——尤其在美國和英國的某些殖民地中——又回到古老的社會組織形式，一般認為它曾為基督教明確地消滅過。但是在十九世紀以前，即使是事實上嚴格地建立在種族基礎上的奴隸制，也並不使擁有奴隸的各民族產生種族意識。在整個十八世紀，美國的奴隸主們自己也認為奴隸制是暫時的，想逐漸地廢除它。他們大多數人也許會像傑斐遜一樣想：「每當我想起上帝是公正的，我就會發抖。」

法國在黑人部族問題上想實施同化和教育的方法，傑出的科學家萊克勒克·德·布封(Leclerc de Buffon)首次對種族作了分類，他以歐洲各民族的分類方式對其他一切民族作出區分，按照嚴格並列的方法教導人們各民族的平等。㊺用托克維爾的精確論述來說，十八世紀「相信種族多樣化，但是信奉各人種之間的一致」。㊺德國的赫爾德拒絕用種族這「可恥的語言」來描述人類，甚至第一個利用不同人種分類的人類文化歷史學家古斯塔夫·克倫姆(Gustav Klemm)也十分尊重人類的概念，而將之看作其研究的總體架構。㊺

但是在美國和英國，人們必須解決在廢除奴隸制以後共同生活的問題，事情就相當不容易了。除了在南非問題上以外——這個國家只是在一八八十年代「爭奪非洲」之後才影響西方的種族主義——英國和美國是最早在實際政治中處理種族問題的兩個民族。廢除奴隸制使內在衝突尖銳化，而不是找到了解決現存嚴重困境的方法。這在英國尤其如此，「英國人的權利」並未被一種可以宣示人權的新政治傾向所取代。1834 年在英國屬地廢除奴隸制，以及討論這一問題時，美國內戰爆發，於是在英國公眾輿論中引起了高度混亂，輿論成了一片沃土，使各種自然主義理論在那幾十年裡紛紛出籠。

最早一種自然主義理論是多元創世論(polygenism)，他們否認人類「各種族」之間有任何聯系，向聖經這本虔誠的謊言書挑戰；他們的主要成就是摧毀了自然法則作爲一切人和一切民族的統一聯繫的觀念。多元創世論儘管並不堅持宿命的種族優越性一說，但獨斷地將一切民族互相孤立，爲人類實際上不可能相互理解和溝通的深淵所隔離。多元創世論解釋爲何「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兩者絕不相同」，而且有助於防止殖民地的異族通婚，推動了對混血兒的歧視。根據多元創世論，這些人不是眞正的人類；他們不屬於任何一個單一人種，而是一種魔鬼，他們的「每一個細胞都是一個內戰舞台」。㊺

在英國的種族思想中，多元創世論的持續時間很長，到了十九世紀，它在公眾輿論中很快地敗於另一種理論，這種理論也起源於繼承原則，但又加進了十九世紀的「進步」論政治原理，它得出相反的、但又非常有說服力的結論，認爲人不僅同人的生命有關，而且也同動物的生命有聯繫，低等人種的存在清楚地顯示了人與動物之間緩慢變化的差異，強有力的生存鬥爭主宰了一切有生命的動物。達爾文主義由於遵循了舊日的「強權—公理」說，因此尤其得到強化。但是這種理論由貴族應用時，說出的是傲慢的征服者的語言，現在它轉化爲民眾相當痛苦的語言，他們已知道要爲每日的麵包而掙扎，千方百計地要奮鬥到相對比較安穩的暴發戶地位。

達爾文主義獲得了壓倒一切的成功，因爲它在繼承論的基礎上提供了種族與階級統治的思想武器，可以用於或反對種族歧視。從政治角度來看，達爾文主義是中性的，實際上它也導向了各種和平主義、世界主義、以及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最明顯形式。㊾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達爾文主義幾乎全部被掌握在英國功利主義的反殖民主義政黨手中。第一位進化論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將社會學視爲生物學的一部分，相信自然選擇有利於人類進化，可以帶來永久和平。在政治研究方面，達爾文主義提供了兩種重要的概念：樂觀地斷言必然的和自動的「適者生存」的生存競爭，在脫離了動物生活後的人類進化以及開始了新的優生「科學」中，似乎存在的無限可能性。

適者必然生存的理論，其中意指著社會的最高階層是最終的「適者」，當英國或英國殖民地的自治領不再絕對地安全，當那些今天的「適者」明天是否仍然是適者已大可懷疑時，隨著征服者理論的消亡，「適者生存」論也就消亡了。達爾文主義的另一部分內容，即人從動物衍生而來的理論，卻不幸地生存了下來。優生學的前景似乎能克服生存理論中麻煩的不確定性，根據生存理論，既不可能預言誰將變成適者，也不可能爲各民族提供永久生存的方法。二十年代在德國強調的應用優生學的這種可能結果是對史賓

格勒《西方的衰落》(*Decline of the West*)的反應。[50]選擇的過程只須從自然的必然性(natural necessity)變化而來，自然的必然性在人的背後活動，成為一種「不自然的」、有意識地應用的有形工具。在優生學中，獸性向來被認為是內在的，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aeckel)早先說過，「憐憫的死亡」將是拯救手段，「除非為家庭和國家付出代價」，這種說法是很典型的。[51]德國的最後一批達爾文主義信徒最終決定完全放棄科學研究領域，忘掉對人與猿之間失落的關聯之追尋，而代之以實際的努力，將人改變成達爾文主義者所認為的猿的模樣。

但是在納粹主義根據它的極權主義政策嘗試將人變成野獸之前，曾經有過無數的努力要在嚴格的遺傳基礎上使人變成神。[52]不僅是赫伯特·斯賓塞，還有早期所有的進化論者和達爾文主義者「對人類具有天使般未來的強烈信念如同相信人起源於猿一樣。」[53]他們相信天擇的繼承會導致「遺傳天才」，[54]而貴族階級又被認為是純粹血統自然選擇的結果，不是政治的結果。為了將整個民族轉變成自然貴族(natural aristocracy)，從中精選的典範將會發展成天才和超人，這是受挫折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在他們夢想通過非政治的手段以一種新的「菁英」來取代舊的統治階級時產生的許多「思想」之一。在十九世紀末，作家們理所當然地以生物學和動物學的術語來論述政治話題，而動物學家們卻撰寫「從生物學觀點看我們的外交政策」，似乎他們偵察到了指導政治家們立於不敗之地的途徑。[55]他們都提出了新的方式，根據英國人民的民族利益來控制和調節「適者生存」。[56]

這些進化論理論最危險的方面是結合了遺傳概念和堅持個人成就與個人性格，這對於十九世紀中產階級的自尊向來是很重要的。中產階級需要科學家，因為科學家可以證明只有偉大人物，而不是貴族，才是民族的真正代表，在他們身上體現了「種族的天才」。當這些科學家「證明」了狄斯累利早先的說法，偉大人物是「種族的體現，精選的典範」時，他們提供的是一種逃避政治責任的理想。另一位進化論的信徒乾脆聲明：「英國人是

超人，英格蘭歷史就是他的進化史。」這是所謂「天才」發展的邏輯結果。[57]

英國和德國的種族思想都是從中產階級作家中間產生的，而非來自貴族，它的願望是將貴族標準的利益擴展至一切階級，它由眞正的民族感情孕育發展。在這一方面，卡萊爾關於天才和英雄的觀念實際上應該說是「社會改革家」的武器，他不是「不列顚帝國主義之父」，這種說法確實是不公正的指責。[57]他的「英雄崇拜」理論在英國和德國獲得廣泛贊同，與德國浪漫主義的「人格」崇拜同源。兩者對獨立於社會環境之外的個人內在偉大性格都作了肯定，並加以美化。在十九世紀中期到世紀末帝國主義的實際產生之間，在對殖民主義運動產生影響的人中間，誰也逃不過卡萊爾的影響，但是誰也不能被指責爲公開鼓吹種族主義。卡萊爾本人在一篇論「黑人問題」的文章中講到如何幫助西印度羣島上的土著產生他們自己的「英雄」的方法。査爾斯・迪爾克(Charles Dilke)的《更偉大的不列顚》(*Greater Britain*)(1869)有時被看作帝國主義理論的開端，[57]他偏激地美化英國殖民者，認爲他們是不列顚民族的一部分，他們可以防止別人蔑視他們，將他們的土地看作單純的殖民地。約翰・羅伯特・西萊(J. R. Seeley)的《英國的擴張》(*Expansion of England*)(1883)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銷售八萬冊，書中對印度人仍尊爲一個外族，將他們同「野蠻人」明顯地區別開來。甚至連弗勞德對布爾人(Boer)——皈依種族主義部族理論的第一個民族——的欽佩也顯得大有疑問，因爲他反對給南非以太多的權利，因爲「南非的自治意味著由歐洲殖民者對土著的統治，這不是眞正的自治。」[57]

英國的民族主義同德國非常相像，它由中產階級刺激產生，中產階級從未完全使自己從貴族階級治下解放出來，因此萌生了最初的種族思想。德國缺乏統一，因此需要建造一堵意識形態的高牆，作爲歷史事實或地理事實的替代，英國則不同，英倫諸島完全由於自然疆界而同周圍的世界隔絕，作爲一個民族，英國必須發明一種理論，來統一遠在海外殖民地、同母國相隔千萬哩的英國殖民者。他們之間的唯一聯繫是共同的種族譜系，共同

的淵源和共同的語言。美國之脫離英國，顯示了這些聯繫本身並不保證統治權；不僅在美洲，其他殖民地雖然並不使用暴力，也都顯示出採取與母國不同的立憲路線而發展的強烈傾向。迪爾克在卡萊爾的影響下，爲了拯救這些前不列顛民族成員，提出了「撒克遜國」(Saxondom)的說法，他的著作用三分之一的篇幅論述這一內容，以爲能贏回美國人。作爲一名激進分子，迪爾克似乎不將獨立戰爭當成兩個民族之間的戰爭，而是看作英國式的十八世紀內戰，他則是站在共和主義者一邊。原因之一是令人吃驚的事實：社會改革家和激進派是英國民族主義的推進者，他們想保持殖民地，不僅因爲殖民地是低層階級必要的出路，而且他們想保持這些英國激進分子的後代對母國的影響。弗勞德就有這種強烈的動機，他希望「保持殖民地，因爲他認爲在殖民地中有可能再造一個比較簡單的社會國家，一種比較高貴的生活方式，這種可能性比在工業化的英國更大，」[61]而且它對西萊的《英國的擴張》無疑造成了衝擊：「當我們自己已習慣於將整個帝國看成一個整體，我們稱之爲『全』英國時，我們將會看到，還存在著一個美國。」不管後來的政治學著作家們可能用「撒克遜國」來指什麼，在迪爾克的著作中，它的眞正政治意義不再由一個有限的國家來保持完整的一個民族。「一直伴隨著我，並且指導著我的思路的是這樣一種思想——解開陌生的新土地上隱秘事物之謎的答案——是這樣一種概念……我們的種族光輝早已照耀著大地，也許它必定如此，最終將照亮全世界。」(〈序言〉)迪爾克認爲，共同起源、繼承、「種族光輝」，都既非有形事實，亦非歷史的關鍵，它們只是當今世界迫切需要的指導，是無限空間裡的一種可靠聯結。

由於英國殖民者遍佈全世界，遂使最危險的民族主義概念，即「民族使命」的觀念，在英國特別強烈。儘管民族使命的發展由來已久，在人民渴望民族地位的所有國家裡都不受種族影響左右，它最終必將和種族思想有特殊連繫。從後來的經驗來看，上文引述的幾位英國民族主義者的話可以看作是比較邊緣的例子。其言論並不比例如法國的奧古斯特・孔德

(Auguste Comte)更有害，孔德表達過一種願望，要全世界在法國的領導下統一和組織起來，重新創造和諧。[62]他們並不放棄關於人類的觀念，但是他們認爲英國就是全人類的最高保護者。他們不能不強調這種民族主義的概念，因爲使命觀念中所暗示的土地和人民之間紐帶內在的溶合，這種溶合對於英國政治來說不是一種用於宣傳的意識形態，而是每一個政治家不得不考慮的既定事實。他們同後來的種族主義者之間的區別在於，他們之中誰也不會認眞地歧視其他民族爲低等種族，除非是因爲他們在談論的國家——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幾乎是空曠的土地，並無嚴重的人口問題。

所以，英國第一個反覆強調他的種族信念以及種族優越性作爲歷史與政治的決定因素的政治家是這樣一個人，他對殖民地和英國殖民者並無特殊興趣——「我們管不了殖民的重擔」——他想使英帝國的權力擴展到亞洲，並且確實在唯一的一塊有嚴重人口與文化問題的殖民地上有力地強化了大不列顚的地位，這並非偶然。正是本杰明・狄斯累利使英國女王成了印度女皇；他是英國政治家中第一個視印度爲帝國基石的人，他要割斷英國民族同大陸各民族之間的聯繫。[62]由此，他爲不列顚在印度的統治實行根本轉變而奠定了基石之一。這塊殖民地曾經由征服者實施了無情的統治，伯克曾經稱他們爲「在印度破壞法律者」。此刻它要接受一種仔細籌劃的統治，其目的在於用行政措施建立永久統治。這一實驗使英國瀕臨伯克曾經警告過的危險，「在印度破壞法律者」可能變成「替英國制訂法律者」。[62]所有那些認爲「英國歷史上，沒有比建立印度帝國更值得驕傲」的人，將自由和平等看成是「小題大做」。[62]

狄斯累利引進的政策將有利於在一個外國建立一個統一的階層，它的唯一功能是統治，而不是殖民化。爲了實現這個狄斯累利在有生之年未能見到它實現的概念，種族主義將在事實上成爲一種必不可少的工具。它預示著將人民由民族變爲「有第一流組織的純淨種族」這種恐怖的轉變，自認爲是「天生貴族」——這是狄斯累利的原話。[62]

我們至此一直論述的是關於一種觀點的發展情況，在經歷了我們時代的一切恐怖之後，可以從這一觀點中發現種族主義的最初情形。但是，雖說種族主義在每一個國家裡復活了種族思想的因素，我們關心的仍然不是由某種「內在邏輯」賦與的一種觀念的歷史。對於各種政治衝突，種族思想是一種便利的論點來源，但是它絕不可能具有任何一種對各民族政治生活的控制權；它使現存的各種利益衝突和政治問題尖銳化，但是它絕不可能製造新的衝突或產生政治思想的新種類。種族主義產生自經驗和迄今未知的政治類型，而且即使對於高比諾或狄斯累利這一類「種族」辯護士來說也是完全陌生的。在具有出色的、機敏的思想的人和行爲粗魯、獸心活躍的人之間有一道鴻溝，任何理性的解釋都無法使兩者溝通。如果「爭奪非洲」和帝國主義新時代不能向西方人揭示震撼人心的新經驗，那麼訴諸種族的思考就很有可能在一定的時間裡隨著十九世紀其他各種不負責任的觀點一起消失。帝國主義必然會造成種族主義思想的發明，作爲對它的行爲的唯一可行的「解釋」和藉口，即便文明世界裡從未存在過任何一種種族思想。

然而，既然種族思想確實存在過，它證明了是種族主義的有力幫手。一種號稱有其傳統的觀點的存在，就可以用來掩蓋新理論的摧毀性力量，如果這種新學說不能顯示民族的尊嚴或傳統的表面約束，就完全不能同西方過去的一切政治標準和道德標準相容，哪怕是在它摧毀歐洲各民族的國際禮節之前。

註釋

❶在德蘇和約期間，納粹的宣傳停止了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一切攻擊，但在種族問題上從未妥協過。

❷〈托克維爾與高比諾通信集〉(Letters de Alexis de Tocqueville et de Arthur de Gobineau), 載於《兩個世界》, 1853 年 11 月 17 日信。

❸以「理念史」的型式對種族思想作出論述的著作中, 最出色的是埃利希·伏格林(Erich Vögelin)《種族與國家》(*Rasse und Staat*), 圖賓根, 1933。

❹關於十九世紀各種觀點的衝突, 可參見海耶斯,《唯物主義的一代》, 111－122 頁。

❺「赫胥黎(T. H. Huxley)自從七十年代以後就忽視了自己的科學研究, 他忙於充當『達爾文的惡犬』, 吠咬神學家們。」(海耶斯, 前引書, 126 頁) 恩斯特·海克爾(Ernst Heckel)熱忱普及科學成果, 其熱情至少不亞於他對科學本身的熱心, 後來受到納粹作家布魯切爾(H. Bruecher)的大肆讚揚:「恩斯特·海克爾, 我國思想界生物學開路先鋒。」見《國家社會主義月刊》, 1935 年, 69 期。

有兩個相當極端的例子可以引用來指出科學家們能做到何等地步。這兩位學者的地位和著作都很不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德國藝術史家約瑟夫·斯特齊戈斯基(Josef Strzygowski)在《阿爾泰、伊朗與人種變化》(*Altai, Iran und Völkerwanderung*)(萊比錫, 1917) 中說, 他發現亞利安人種由日耳曼、烏克蘭、亞美尼亞、波斯、匈牙利、保加利亞、土耳其民族組成(306－307 頁)。巴黎醫學會發表的一篇報告不僅宣稱發現了日耳曼種族的「特別純種」和「特殊身體氣味」, 而且還提出了對日耳曼人種的尿液分析報告, 說是從日耳曼人的尿液中「發現」含百分之二十的無尿氮, 而其他人種的尿液中含百分之十五。見雅克·巴曾(Jacques Barzun),《論種族》(*Race*)(紐約, 1937) 239 頁。

❻這種倒置關係部分起因於研究者的熱心, 他們想記錄下每一個涉及種族的單例。他們誤解許多作家, 這些作家認爲用種族來解釋問題, 是可能的而且有趣, 他們相對說來並無惡意, 但是却被認爲是種族主義者。這些觀點本身是無害的, 早期人類學家還以此作爲推動學科研究的起點。十九世紀中期法國著名人類學家保爾·勃羅卡(Paul Broca)的天眞的假設又是一例, 他假設說:「大腦與種族有關, 頭骨形狀測量是探知大腦內容的最好方法」(引自雅克·巴曾, 前

引書，162 頁)。很明顯，若無人類本質的概念支撐，此類斷言只是謬論。

至於十九世紀初期的語文學家，其關於「亞利安主義」(Aryanism)的概念吸引了幾乎每一個種族主義研究者，因此將他們歸為種族思想的宣傳者，甚至尊他們為創始人。其實他們是最無辜不過的。他們跨過了純粹研究的界線，這是因為他們想在結論中盡可能將文化同宗的民族納為同一個國家。用恩斯特·賽利葉(Ernest Seilliere)在《帝國主義哲學》(*La Philosophie de L'Imperialisme*)(四卷本，1903－1906)中的話來說：「有一種陶醉：近代文明認為它恢復了淵源……產生了一種有機性質，它用同一種親緣關係囊括一切在語言方面顯示出與梵語密切近似的所有的民族。」(〈序言〉，第1卷，35頁)換言之，這些人仍然沿循十八世紀的人文主義傳統，對於陌生民族和外族文化懷有同樣的熱心。

❼十六世紀法國的《法國高盧》(*Franco-Gallia*)一書的作者弗朗索瓦·奧特曼(François Hotman)有時被認為是十八世紀種族理論的先驅者，參見恩斯特·塞利葉，前引書。特奧非爾·西瑪爾(Thêophile Simar)反對這種誤解概念，他正確地指出：「奧特曼並非以條頓民族的辯護士身份，而是以受專制君主壓迫的人民的衛士身份出現。」(《十八至十九世紀種族理論基礎批判研究》〔*Etude Critique sur la Formation de la doctrine des Races au 18e et son expansion au 19e siecle*〕，布魯塞爾，1922，20頁)

❽《古代法蘭西政制史》(*Histoire de l'Ancien Gouvernement de la France*)，1727，第1卷，33頁。

❽波蘭維葉的歷史著作是反對第三階級的政治武器，此話出自孟德斯鳩(Montesquieu)，《法意》(*Esprit des Lois*)，1748，第30卷，第10章。

❽《古代法國、德國、義大利政府起源》(*Les Origines de l'Ancien Gouvernement de la France, de l'Allemagne et de l'Italie*)(1789)。

❽塞利葉，前引書，序言32頁。

❽雷內·穆尼埃(René Maunier)，《殖民地社會學》(*Sociologie Coloniale*)(巴黎，1932)，第2卷，115頁。

⑬蒙特羅西爾即使在流亡中，也和法國警察總長福歇(Joseph Fouché)保持密切聯繫，後者幫他改善了逃亡者的悲慘經濟狀況。後來他替拿破崙充當在法國本土社會中的秘密代表。參見約瑟夫•布魯格萊特(Joseph Brugerette)，《蒙特羅西爾伯爵傳》(Le Comte de Montlosier)(1931)，以及西瑪爾，前引書，71頁。

⑭《什麼是第三階級?》(*Questce-que le Tiers Etat?*)(1789)發表於法國革命爆發後不久。譯文引自古萊帕海姆(J. H. Clapham)，《阿貝・西葉傳》(*The Abbê* Sieyes)(倫敦，1912)，62頁。

⑮「歷史上的亞利安主義起源於十八世紀封建主義，並得到十九世紀日耳曼主義的支持。」賽利葉，前引書，序言第2頁。

⑯《關於法國歷史的通信集》(*Lettre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1840)。

⑰此情況可見諸於弗里德里希・施萊格爾的《1804－1806年哲學演講集》(*Philosophische Vorlesungen aus den Jahren* 1804－1806)，第2卷，357頁。阿恩特的同樣情況可見於龐特(Alfred P. Pundt)的《阿恩特與德意志民族覺醒》(*Arndt and the National Awakening in Germany*)(紐約，1935)，116頁。甚至連費希特(Johann G. Fichte)這位近代德國種族思想的主要代罪羔羊也幾乎從未越過民族主義的界限。

⑱戈雷斯(Joseph Goerres)，《萊茵水星》(*Reinischer Merkur*)，1814年，第25期。

⑲《修正德國未來狀況之判斷的玄想》(*Phantasien zur Berichtigung der Urteile über Kunftige deutsche Verfassungen*)(1815)。

⑳「混種的動物沒有眞正的生殖能力；同樣地，雜種民族不會有自己的種族繁衍。……人類的祖先死了，種族起源消失了。這就是每一個民族的消亡成爲人類之不幸的原因。……人類的高貴族不能只體現在一個民族身上。」(《德意志種族》〔*Deutsches Volkstum*〕，1810)。

戈雷斯也同樣地放棄了他的自然主義式的民族定義(「一切成員都由一種共同的血緣紐帶繫結著」)，而追隨一種眞正的民族原理，他說：「任何一分支

都無權統治另一個。」

㉑《從這個時代的眼光看這個時代》(*Blick aus der Zeit auf die Zeit*) (1814)。英譯引自阿爾弗雷德・龐特譯本。

㉒「直到奧地利和普魯士在一場徒勞的鬥爭中失敗之後，我才眞正開始喜歡德意志了……當德意志在征服者面前屈服時，它在我眼中是一個不可分解的整體。」此係阿恩特，《瑞典回憶錄》(*Erinnerungen aus Schweden*) (1818) 中所說。引自龐特譯本，151 頁。

㉓《諾瓦利斯著作集》(萊比錫，1929)，第 2 卷，335 頁，〈新片斷集〉(Neue Fragmentensammlung)。

㉔關於德國的浪漫主義態度，可參見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政治浪漫主義》(*Politische Romantik*)，慕尼黑，1925。

㉕墨索里尼〈相對主義與法西斯主義〉(Relativismo e Fascismo)，米蘭，1924，引自紐曼(F. Neumann)譯本，《政治巨獸》(*Behemoth*) (1942)，462－463 頁。

㉖參見自由派作家布克霍爾茲(Buchholz)那本反對貴族的饒有趣味的小冊子《世襲貴族問題研究》(*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Geburtsadel*) (柏林，1807)，68 頁：「眞正的貴族是無法授與和撤銷的；因爲它就像權力和天才一樣，自我成立，並且自我存在。」

㉗克萊孟斯・布倫塔諾，《菲利斯丁史》。

㉘〈和平條約提綱〉(Entwurf eines Friedenspaktes)，見葛哈德・蘭姆洛(Gerhard Ramlow)，《路德維希・馮・德・馬爾威茲與普魯士前期保守主義政治和國家觀》(*Ludwig von der Marwitz und die Anfänge Konservativer Politik und Staatsauffassung in Preußen*)，歷史研究叢書，第 185 冊，92 頁。

㉙見西格蒙・紐曼(Sigmund Neumann)，《普魯士保守主義的各個階段》(*Die Stufen des preußischen Konservatismus*)，歷史研究叢書，第 190 冊，柏林，1930，尤見 48、51、64 及 82 頁。關於繆勒，可參見《治國基礎》(*Elemente der Staatskunst*) (1809)。

㉚引自阿德利安・科林斯(Adrien Collins)譯本《論人類種族的不平等》(*The Inequality of Human Races*)(1915)。

㉛見羅伯特・德雷富斯(Robert Dreyfus)〈高比諾伯爵的生活與預言〉(La vie et les prophéties du Comte de Gobineau),巴黎,1905,載《半月刊》第6卷,第16期,56頁。

㉛《論人類種族的不平等》,第2卷,第4部分,445頁,及文章〈1870年誰到了巴黎〉(Ce qui est arrivé à la France en 1870)(1939),載於《歐洲》(*Europe*)。

㉛杜斯伯格(J. Düsberg),〈高比諾伯爵傳〉(*Le Comte de Gobinean*)(1939)。

㉞參見法國雜誌《歐洲》的紀念高比諾專號(1923)。尤見克萊芒・塞爾貝葉・德・高比諾(Clément Serpeille de Gobineau)的〈高比諾主義與現代思想〉(Le Gobinisme et la pensée moderne)。「然而直到……戰爭中期,我才想到《論種族》(*Essai sur les Races*)是受到了一種豐富的前提的啓發,唯此才能解釋在我們眼前發生的許多事件。……我很奇怪地注意到,這種觀點幾乎是所有的人一致接受的。戰後,我注意到,在整個年輕一代中,高比諾的著作幾乎成了一種啓示錄。」

㉛《論人類種族的不平等》,第2卷,第4部分,440頁和445頁:「『部分』這個詞只有在高盧—羅馬階層興起並有政治作用時才重新獲得意義。隨著他們的勝利,愛國主義重新變爲一種美德。」

㉛見塞利葉,前引書,第一卷《高比諾伯爵與亞利安歷史主義》,32頁:「他說德國很難算作日耳曼族,而大不列顛的日耳曼化程度更高。……當然,高比諾後來改變了想法,但是在德國人成功之影響下。」有意思的是,塞利葉在他自己的研究過程中竟也變成了高比諾主義的忠實信徒——「也許二十世紀的知識分子要調整自身來適應環境變化」——在他看來,成敗便足以使高比諾突然修正觀點。

㉛此類例子很多。此處語出卡米葉・斯比斯(Camille Spiess),《法國的帝國主義和高比諾主義》(*Impérialismes Gobinisme en France*),巴黎,1917。

㊳關於坦恩的立場，可參見約翰・懷特(John S. White)〈坦恩論種族與天才〉(Taine on race and Genius)，載《社會研究》(*Social Research*)，1943年2月號。

㊳根據高比諾的觀點，閃族人是混合了黑人血統的雜種白人。關於赫南的觀點，可參見《一般語言史及其系統比較》(*Histoire Générale et Système comparé des Langues*)(1863)第1部分，4頁及503頁等等；另見他的《論閃族語言》(*Langues Sémitiques*)，1及15頁。

㊳關於這一點，雅克・巴曾有充分表述，見前引書。

㊶這位令人驚奇的先生就是著名作家與歷史學家埃利・福勒(Elie Faure)，見〈高比諾與種族問題〉(Gobineau et le Probleme des Races)，載《歐洲》雜誌，1925。

㊷見《法國大革命反思錄》(*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紐約「大眾叢書」版，1970，8頁。

㊷《論自由、平等、博愛》(*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1873)，254頁。另見狄斯累利《喬治・本廷克勛爵傳》(1853)，184頁。

㊶十八世紀的許多遊記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這種內心迷惑。伏爾泰(F. M. Arouet de Voltaire)認為這一問題非常重要，他在《哲學辭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中特別指出：「而且我們看到，居住在這個地球上的人種之間差異甚大，第一個黑人與第一個白人相遇時，他們會互相驚異到何種地步。」(見〈人類〉(Homme)條目)

㊷《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1769－1789)。

㊳見前引書，1852年5月15日信。

㊷《人類文化通史》(*Allgemeine Kultur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1843－1852)。

㊷卡特希爾，《失去的自治領》(1924)，158頁。

㊷見弗里德里希・勃利(Friedrich Brie)，《英國文學中的帝國主義思潮》(*Imperialistische Strömungen in der englischen Literatur*)，哈勒，1928。

[50]例如奧托·班格特(Otto Bangert)的《黃金或鮮血》(*Gold oder Blut*)(1927)，17 頁：「因此一種文明可以是永恆的。」

[51]見《生命之奇跡》(*Lebenswunder*)(1904)，128 頁。

[52]幾乎在進化論披上科學外衣之前一個世紀，有一些告誡的聲音預言了當時還只在純粹想像階級的一種瘋狂行爲。伏爾泰不止一次地嘲弄進化論觀點。(見〈哲學總論：形而上學、道德、神學〉〔Philosophie Générale: Métaphysique, Morale et Théologie〕，載《全集》，1785，第 40 卷，16 頁)他在《哲學辭典》的〈大生存鏈〉(Chaîne des Etres Crées)條目中寫道：「首先，我們的想像樂於微妙地將天然物變成有機物，從植物變成植物形動物，再從這些植物形動物變成動物，從動物變成人，從人變成精神，再將這些精神套上小小的無形外衣，變成非物質的存在；再……變成上帝本人。……但是由「至高無上的存在」創造最完美的精神，他能變成上帝嗎？在上帝和他之間不是有一種無限嗎？猴子與人之間不是明顯地有一段空間嗎?」

[53]海耶斯，前引書，11 頁。海耶斯正確地強調所有這些早先的唯物主義者的強烈的道德實踐。他將「這種奇怪的道德和信念的分離」解釋爲「後來的社會學家們形容爲一種『時差』的東西。」(130 頁)但是，這種解釋顯得相當無力，如果人們回憶起其他唯物主義者(例如德國的海克爾或法國的瓦切爾·德·拉波熱〔Vacher de Lapouge〕)使冷靜的研究變成了宣傳活動，他們並不因這樣一種時差而極爲受挫；另一方面，他們的同時代人並不沾染他們的唯物主義教條，例如巴黑和法國公司，他們是德雷富斯事件期間橫掃法國的野蠻倒錯行徑的實際服膺者。西方世界道德的突然淪衰看來並不是由某些「思想」的自動發展引起的，而是由人類迷惘困惑地面對的一系列新的政治事件和新的政治與社會問題引起的。

[54]此係當時廣泛傳閱的加爾頓(Francis Galton)的著作的書名，發表於 1869 年，在以後幾十年裡，引起同樣的話題大肆泛濫。

[55]〈從生物學的觀點看我們的外交政策〉(A Biological View of Our Foreign Policy)由查爾斯·米切爾(P. Charles Michel)發表於《星期六評論》(*Satur-*

day Review)，倫敦，1896年2月。這一類著作中最重要的有赫胥黎的《人類社會的生存競爭》(*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Human Society*)(1888)。他的主要論點是：只有當出生率得不到控制時，文明的衰落才是必然的。還有本傑明·基德(Benjamin Kidd)的《社會進化》(*Social Evolution*)(1894)，約翰·克羅齊爾(John B. Crozier)《遵循近代進化軌跡的知識發展史》(*History of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n the Lines of Modern Evolution*)(1897－1901)，倫敦大學優生學教授卡爾·皮爾森(Karl Pearson)的《民族生活》(*National Life*)(1901)較早地提出，進步是一種非人化的魔鬼，它吞噬所遇到的一切。查爾斯·哈維(Charles H. Harvey)的《不列顛政治生物學》(*The Biology of British Politics*)(1904)提出，一個民族可以用嚴格控制內部「生存競爭」的方法變得無比強盛，以便同其他民族作不可避免的生存鬥爭。

(56)尤見卡爾·皮爾森，前引書。但是加爾頓早已說過：「我想強調一個事實：人類未來幾代自然天賦的改進大多控制在我們手中。」(見前引書，1892年版，序言，26頁)

(56)《約翰·戴維森的證言》(*Tastament of John Davidson*)(1908)。

(56)波德爾森(C. A. Bodelsen)，《維多利亞中期帝國主義研究》(*Studies in Mid-Victorian Imperialism*)(1924)，22頁。

(56)丹姆斯《維多利亞時代的前景》(1928)。「帝國主義起始於一本書……迪爾克的《大不列顛》。」

(56)〈關於南非的兩次演講〉(Two Lectures on South Africa)，載《一些重要主題的簡要研究》(*Short Studies on Great Subjects*)(1867－1882)。

(56)波德爾森，前引書，199頁。

(56)《實證主義總論》(*Discours sur L'Ensemble du Positivisme*)(1848)，384頁。

(56)「我們應該在亞洲行使的權力和影響；其後再行施於西歐。」(莫尼潘尼與伯克爾《比肯斯菲爾德伯爵本杰明·狄斯累利傳》，紐約，1929，第2卷，210頁。)但是「如果歐洲目光短淺地陷入可怕的精疲力盡狀態，那麼英國將仍然有可觀的前途。」因為「英國不再是一個純粹的歐洲強國……它是一個歐洲強國，實際上

更是一個亞洲強國。」(同上書，第 1 卷和第 2 卷)

64 伯克，前引書，42－43 頁：「下議院的權力，……的確很大；願它永遠保持這樣的權力……只要它能使在印度的法律破壞者不要成爲替英國制訂法律者就行了。」

65 詹姆斯·斯蒂文，前引書；以及他的〈印度政府的基礎〉(Foundation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1883)，載《十九世紀》(*The Nineteenth Century*)，第 80 卷。

66 關於狄斯累利的種族主義思想，可參見第 3 章。

第七章
種族與官僚政治

在帝國主義的最初幾十年裡，發現了兩種實施政治組織和統治外國民族的新手段。其一是以種族爲政體的原則，其二是以官僚政治爲海外統治的原則。倘若不以種族代替民族，爭奪非洲和投資狂熱很可能停留在毫無目的的淘金熱中「死神與貿易共舞」的狀態（康拉德語）。若不以官僚政治代替政府，不列顛的印度屬地很可能落入「在印度的法律破壞者」（伯克語）手中，造成無法無天狀態，而不會改變整個時代的政治氣候。

這兩種發現，實際上都在非洲。種族是對一部分人類的應急解釋，歐洲人或文明人都無法理解那一部分人，他們的人性使移民們驚恐和羞辱，致使移民們不再將他們視爲同一人類。布爾人對非洲——遍地布滿野蠻人的大陸——怪異駭人狀態的回答就是「種族」一詞，以此解釋他們領會和頓悟的瘋狂念頭，這種念頭彷彿「一道閃電掠過明朗的天空：『消滅一切野人』。」❶這種回答造成了近代歷史上最可怕的屠殺，布爾人滅絕霍登托特(Hottentot)部落，卡爾・比德斯在德國的東南非洲殖民地隨心所欲地屠殺，大批殺害和平的剛果人，使剛果人口從二千萬到四千萬銳減到八百萬人；或許最惡劣的是造成了使這種勝利者的平定手段成爲普通的、令人尊敬的外交政策。當 1900 年德國遠征軍鎮壓中國的義和團起義時，從未有過哪一個文明國家的元首像威廉二世那樣告誡說：「正如一千年前的匈奴人一樣，在阿提拉率領之下，獲得至今仍留青史的名聲，所以德國的名字也要用這種方式留在中國，叫中國人再也不敢斜視一個德國人。」❷

無論種族論是歐洲內部生長的一種意識形態，還是一種用於粉碎經驗的應急解釋，它總是吸引著西方文明中最壞的成員，而官僚政治是由最優

秀的成員發現，並爲之吸引，有時甚至吸引了歐洲知識分子中目光最敏銳的階層。根據下級報告來實行統治的行政主管❸，以比東方暴君更懷敵意地秘密發布命令，這些暴君都出自冷酷無情和無視法律者的軍事原則的傳統；長久以來，這種人靠現代騎士童年的忠誠、認眞的理想而生活，用光明的愛去保護孤苦無援的原始民族。只要他進入了一個由舊日的「三位一體——戰爭、貿易、海盜行徑」（歌德語）主宰的世界，無論是好是壞，便能完成任務，而且不是以一種複雜的遊戲，要求主宰一個民族的遠地投資政策，不像過去那樣只是爲了自己發財，而是爲了另一個國家的富裕。官僚政治是擴張遊戲的巨大組織，每一個地區都是進一步捲入遊戲的階石，將每一個民族都看成實行進一步征服的工具。

雖然種族主義和官僚政治說到底在許多方面是互相關聯的，但是它們分別地被發現和發展。任何一個牽連在種族主義和官僚政治發展成熟過程中的人，誰也不能完全理解這種結合所提供的權力積聚和毀滅的潛力。克洛默勛爵在埃及從一名普通的代辦變成一名帝國主義官僚，他不會夢想將行政手段與屠殺結合起來（如卡特希爾在四十年後直截了當地所說的「行政屠殺」），而只會在南非的種族狂熱中夢想組織屠殺，以達到建立自成體系的理性政治社羣的目的（如同納粹在種族滅絕集中營裡所做的那樣）。

㈠黑色大陸的幻影世界

到十九世紀末時，歐洲一些航海民族的殖民事業取得了兩種形式的傑出成就：在新近發現的人口稀少的土地上建立新據點，採用母國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在一些著名的異域國家裡，在外國民族中間建立航海和貿易站，它的唯一功能是促進（從來不是和平的）世界珍寶交易。殖民代發生在美洲和澳洲，這兩個大陸沒有自己的文化和歷史，落到了歐洲人的手裡。在亞洲，典型方式是貿易站，幾個世紀以來，歐洲人尚未顯示出要在那裡實

行永久統治的野心、征服、減少當地人口或永久居住的意圖。❹這兩種海外事業的形式經歷了長期穩定發展，時間將近四百年。在這期間，殖民地漸漸地取得獨立，貿易站的擁有權因歐洲各國力量相對微弱或強大而幾經易手。

歐洲在其殖民歷史中唯一未曾觸及的是黑色的非洲大陸。它的北岸由阿拉伯各民族和部落居住，當時已很著名，並從古代起就以透過不同方式進入歐洲影響的範圍。這些地區人口分布較密，無法吸引移民，而且太貧瘠，不適宜開發，它們遭受各種各樣的外來統治，或處於無政府狀態，然而奇怪的是，在埃及帝國衰亡和迦太基遭毀之後，它們從未眞正地獨立或建立可靠的政治組織。事實上，歐洲各國一次又一次地越過地中海，試圖強行統治阿拉伯土地，將基督教強加給回教民族，但是它們從不試圖像對待海外屬地一樣對待北非領地。相反，它們常常渴望使這些北非民族加入各自的母國。這種由來已久的傳統，雖然近來仍被意大利和法國採用，但在八十年代當英國進入埃及去保護蘇伊士運河而無意將其征服或吞併時，就已被打破了。問題不在於埃及受欺凌——英國（它不是地中海沿岸國家）不可能對埃及本身感興趣——而在於因爲印度的財寶而需要埃及的運河。

帝國主義將埃及從一個偶爾爲自身利益而有所貪求的國家改變成一個通向印度的軍事基地和進一步擴張的階石，而南非的情形恰恰相反。自從十七世紀以來，好望角的意義取決於印度這個殖民財富的中心；在那裡建立貿易站的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在好望角有一個航海站，當印度的貿易消失後，好望角也被遺棄了。十八世紀末，英國東印度公司擊敗了葡萄牙、荷蘭、法國，贏得了在印度的貿易壟斷權；接著就理所當然地占領了南非。假如帝國主義只是簡單地繼續殖民貿易的舊方法（這一點常被誤解爲帝國主義），那麼英國在1869年蘇伊士運河開通之後就會放棄它在南非的地位。❺儘管南非現在屬於大英國協，但它一向與其他自治領不同；移民居住地的主要先決條件——土地肥沃與人口稀少——南非並不具備，所以十九世紀

初英國的一次行動——五千名英國失業者移居南非——失敗了。在整 個十九世紀，不僅英倫諸島的移民熱潮一直避開南非，而近來的英國移民返回英國之潮也唯獨在南非這塊自治領上發生。❻南非變成了「帝國主義的溫床」(丹姆斯〔E. H. Damce〕語)，但是它從未被英國最激進的「撒克遜國」的辯護者承認過，在英國最浪漫主義的夢想家關於亞細亞帝國的幻景中也沒有它。這本身顯示出，前帝國主義的殖民事業和海外殖民地對於帝國主義發展的眞正影響很小。假如好望角殖民地仍然留在前帝國主義政策架構內，那麼在它事實上變得非常重要的那一刻，它就會被拋棄。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發現的金礦和鑽石，如果不是偶然地充當了帝國主義各種力量的觸媒，本身是不會有什麼意義的，但是有一點很明顯，帝國主義者宣稱發現了一種永久性的解決多餘(superfluity)問題的方法，它的最初動機是爭搶地球上最多餘的原料。黃金在人類生產中很難占有一席之地，同鐵、煤、石油、橡膠等原料相比，黃金並無重要性；相反，它只是一種最古老的純粹財富象徵。黃金在工業生產中的無用，使它諷刺性地類似多餘資金——用以提供挖掘金礦所需的資金——以及支付挖掘金礦的多餘勞力。帝國主義者們藉口發現了一種拯救頹廢的社會和陳舊的政治組織的永久性方法，黃金則爲自己找到了一種明顯地構成永久性穩定和獨立於一切功能性決定因素的方法。有意思的是，一個社會將要脫離一切傳統的絕對價值，卻開始在經濟世界中尋找一種絕對價值，在經濟世界中，這類絕對價值確實不會存在，也不能存在，因爲一切事物在定義上都是功能性的。自從古代以來，這種關於絕對價值的迷妄使黃金生產成了冒險家、賭徒、罪犯、以及正常和健康社會之外一切人的事業。南非淘金熱潮的新轉折點是，此地尋找運氣的人並非處於文明社會之外，而是相反，是這個社會的副產品，是資本主義制度不可避免的殘餘，甚至是一種不停地產生多餘人力和多餘資本的經濟的代表。

多餘的人，即「四個大陸上的波希米亞人」，❼蜂湧來到好望角，他們

同舊時的冒險家仍有許多共同之處。他們也感到「運送我到蘇伊士以東，那裡最好的就像最壞的，那裡不會有十誡，人可以膨漲起渴望。」區別不在於他們是道德或不道德，而在於是否加入這一羣「各民族和各膚色」的人❽不再由他們決定；不是他們走出社會，而是社會將他們唾棄；他們不是雄心勃勃地跨出文明許可的界限，而是無用的、失去功能的犧牲品。他們的唯一選擇是否定的選擇，是反對工人運動的決定，其中多餘的人中的最優秀分子或受到過剩事物威脅的人中間的最優秀分子建立了一種對抗社會(countersociety)，人們通過這種社會能夠找到一條回到一個有友情、有目的的人類社會去的道路。他們對於自己的同類是微不足道的，對於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他們就像活著的象徵，是人類荒誕制度的抽象表現和見證人。他們不是像舊時冒險家的個人，他們是各種事件的影子，而他們對這些事件卻無能爲力。

他們就像康拉德的小說《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中的克茲先生(Mr. Kurtz)一樣，「空虛到內心」，「魯莽而不堅強、貪婪而不大膽、殘忍而無勇氣」。他們什麼也不相信，但又「可以（使自己）相信一切——一切都信。」他們被從一個具有共同社會價值的世界中驅逐出來，被扔回自身，再也不會落到更差的處境，除非他們的才智隨時隨地使他們變得像克茲先生一樣危險，如果他們再度獲准返鄉的話。因爲在他們空虛的靈魂裡唯一能迸發的才智是一種吸引人的天才，能夠造就「一個極端政黨的一名出色領袖」。像德國的卡爾‧比德斯（可能就是克茲先生的原型）就是不滿情緒的具體化身中比較有天才的一位，他公開承認自己「在賤民中長大，想成爲主人種族中的一員。」❽但是無論他們是否天才，「從擲錢遊戲到蓄意謀殺，他們都會賭一賭」，在他們看來，他們的同類「只不過是蒼蠅而已。」因此他們具備了（或者說很快學會了）一種行爲法則，十分適合於成爲即將到來的謀殺者類型，對於他們來說，唯一不可原諒的罪惡是發脾氣。

當然，他們之中也有正派君子，像康拉德的小說《勝利》(*Victory*)中

的瓊斯先生(Mr. Jones)一樣，他厭倦無聊，願以任何代價去居住在一個「機遇和冒險的世界」，或者像海斯特先生(Mr. Heyst)一樣，酒醉後嘲笑人類一切事物，直到自己飄流得「像一片落葉……抓不住任何東西。」他們無法抵禦一個一切都是玩笑的世界的吸引，這個世界教他們「一個大玩笑」，即「控制絕望」。在「無法無天的巨大的野森林」裡，完美的紳士與完全的醜聞相洽甚歡，他們發覺自己「在巨大的差異下彼此相同，在不同的外表下靈魂一致」。我們在德雷富斯事件中看到過上流社會的表現，並且注意到狄斯累利發現了惡與罪之間的社會聯繫；我們從中也同樣從本質上發現上流社會和它的黑社會戀愛，犯罪因其文明冷漠的手法而自覺不凡，規避「不必要的介入」和創造邪惡的優雅風度時，使他們可以在自己的罪孽周圍創造出一種高尚氣氛。這種優雅高尚，這種罪的殘忍與犯罪的方式之間的對比，成爲自己與完美的紳士之間深刻理解的橋樑。但是，畢竟在歐洲達到這個目的需要幾十年時間，由於社會倫理價值觀的延遲效果，所以直到幻影般的殖民冒險世界的短暫循環周期中才突然爆發。

在社會的限制和虛僞之外，爲了不墮落到當地生活中，紳士和罪犯不僅感到人的相近性，他們有共同的膚色，而且受到一個可以本著遊戲精神犯罪的無限可能的世界之衝擊，在這種可能性之下，恐怖與歡笑相連，完全能實現他們自己幻影般的存在。當地生活使這種魔鬼般的事件似乎對一切結果都有保障，因爲無論如何，它在這些人眼中都好像是一種「純粹的影子遊戲。占統治地位的種族在追求自己令人不可思議的目標和需要時，可以不受影響、不被注意地走過。」

土著野蠻人的世界對於那些逃避文明現實的人是一種完美的環境。在無情的陽光下，被充滿敵意的自然包圍著，他們面對的人類既無未來的目標，也無以往的成就，像瘋人院裡的瘋子一樣令人難以理解。「這種史前人咒罵我們，吞食我們，歡迎我們——誰說得清他們會對我們怎麼樣？我們被阻斷了對周圍環境的理解；我們如鬼魅般遊走而過，在一座瘋人院的突

發激情之前，我們這些正常人只會驚愕，被悄悄地嚇癱。我們不能理解，因為我們已經記不清遙遠歷史，因為我們走進了人類初始階段的黑夜，那些逝去的史前時期在我們心中未留一絲痕跡，也未留下任何記憶。地球好像不是地球，……而這些人呢……不，他們並非動物。人總是慢慢地變化的。他們吼叫，跳躍，旋轉，扮出各種可怕的臉相；不過一想起他們也是人類，便會使你感到興奮，你會想起你同這些粗野而充滿激情的咆哮有著遙遠的血緣關係。」（《黑暗的心》）

奇怪的是，從歷史角度來看，在爭奪非洲之前，「史前人」的存在對西方人幾乎沒有任何影響。但是，根據歷史記載，當人數遠遠超過歐洲移民的野蠻部落被消滅時，當一船船黑人被當作奴隸販運到歐洲人主宰的美國大陸時，甚至當人們孤身漂流到這個黑暗大陸內地，那裡的野蠻人數量之多足以構成他們自己的世界，一個愚人的世界，而歐洲冒險家們又以追逐象牙而使他們更愚蠢時，實際上並未發生多大的事情。許多冒險家在一個人口過多的大陸上沉寂的曠野裡發瘋了，人類在那裡的出現只加深徹底的孤獨，一種未經改造的、絕對充滿敵意的自然環境，誰都不願意花力氣將它改造成人類的風景地，似乎在一種崇高的耐心中，等待人類「異想天開式的入侵能結束」。但是他們的瘋狂依然只是一種個人體驗，而且毫無結果。

在爭奪非洲期間到達那裡的人使這一切都改變了。這些人不再是孤獨的個人；「整個歐洲都致力於獲得成功。」他們集中在非洲大陸南部，在那裡同布爾人相遇，這些南非的荷蘭人後裔幾乎已被歐洲遺忘了，但是此刻他們卻成為面對新環境挑戰時的天然引路人。這些歐洲大陸的多餘的人對新環境的反應，大多取決於這個儘管處於完全孤獨狀態，卻一向生活在黑色野蠻部落的世界之中的唯一的歐洲羣體對這個環境的反應。

十七世紀中葉，荷蘭移民駐紮在好望角，向航行去印度的船供應新鮮蔬菜和肉類，布爾人就是他們的後代。到了十八世紀，一小羣法國胡格諾

教徒(Huguenot)追隨他們的腳印來到這裡，因此只有借助較高的出生率，才使這個少數荷蘭人分支發展成一個小規模民族。他們完全同歐洲歷史潮流隔絕，走出了一條路，「在他們之前，鮮有其他民族這樣做過，而且絕少成功。」⑩

布爾民族的發展中有兩個主要的物質因素：土地特別貧瘠，只能用於大量養牛；黑人人口眾多，組成部落，以游牧狩獵爲生。⑩貧瘠的土地使人不可能相鄰而居，因此荷蘭農業移民無法像在故國那樣組成村落。一些較大的家族，相互之間遠隔著荒漠，被迫形成血緣組織，只有時時存在的共同敵人——人數壓倒白人移民的黑人部落——的威脅，才防止這些家族之間發生相互戰爭。土地貧瘠與土著眾多這兩個問題的解決方案便是實行奴隸制。⑩

但是，對於事實上發生的一切情形，用奴隸制這個詞來描述是遠遠不夠的。首先，奴隸制雖然蓄養了相當一部分蠻族人口，但絕不可能蓄養全部，因此布爾人很難忘記他們第一次看到的可怕情景：那個人種的人出於人的驕傲和人的自尊感，無法容忍自己成爲別人的奴隸。這種恐懼——自己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變成那樣——這就是奴隸制的基礎，同時也成了種族社會的基礎。

人類記得各民族的歷史，但是對於史前部落卻只有傳說中的知識。「種族」這個詞的確切含義，只有當人們面對這樣一些未經歷史記載、不知他們自己的任何歷史的部落時，才得以成立。我們不知道他們究竟是代表了「史前人」——地球上人類生命的最初形式的人種，偶然生存下來的標本——還是我們所不知的一種文明因遭遇我們同樣不知的一場大災難而倖存下來的「史後人」。他們當然很像一場巨大災變的倖存者，這場災變之後又有一系列小災難，直至最後，災難單調得好像是人類生活的一種自然條件一樣。在任何情況下，這種意義的種族只有在那些自然條件特別險惡的地區才存在。造成他們與其他人種之間區別的不是他們的膚色，而是他們的

行爲舉止像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們對待自然像是對待無可爭議的主人，他們並未創造一個人類世界、一種人類現實，因此自然界就以主宰的身份始終是唯一的、無比強大的現實，相比之下，他們看上去就像是幻影，像鬼一樣地不眞實。他們本身就是「自然的」人類，他們缺少具體的人類特點，即具體的人類現實，因此當歐洲人屠殺他們的時候，並未意識到自己在犯謀殺罪。

再者，在非洲大陸對土著部落的毫無意義的屠殺，與他們的部落之間相互殺戮的傳統是一致的。在非洲土著的一切戰爭中，滅絕敵方部落一向是一條規律，即使當一名黑人領袖偶然在他的麾下統一了幾個部落，仍然不會廢止這條規律。十九世紀初，恰卡國王(King Tchaka)統一了祖魯(Zulu)人各部落，建立了具有特殊紀律的類似戰爭時期的組織，但也並沒有建立起一個祖魯民族或民族國家。他只是成功地滅絕了共有一百多萬人口的一些弱小部落。⓭由於紀律和軍事組織本身不能建立起一個政體，因此毀滅也只是一種非現實的、無法理解的過程中一種未經記錄的事件，人無法接受這種過程，所以人類歷史也就將它遺忘了。

布爾人的奴隸制是一個歐洲民族適應一個黑人種族的一種形式，⓮只有在表面上類似一般歷史狀況，亦即奴隸只是征服或奴隸貿易的結果。並無一個政治實體、一種社團組織，將布爾人繫結在一起，也無明確劃定的殖民領土，黑奴也並不爲任何白人文明服務。布爾人既失去了農民和土地的關係，也失去了與人類伙伴們的文明感情。「每一個人都逃避他的鄰居煙囪的暴政」⓯便是這個國度裡的規則，每一個布爾人家庭都在完全的孤獨中重覆著在黑人野蠻人的經歷，在絕對沒有法律統治的地方生活，不會「在醜聞、絞刑架和瘋人院的神聖恐怖中，和善的鄰居們準備朝你歡呼，或者在劊子手和警察之間腳步歡快地向你撲來。」（康拉德語）他們統治各個部落，寄生在勞動之上，據有與土著部落首領非常相像的地位，而這些部落首領們的統治權是被他們滅除的。總而言之，土著人承認他們是更高形式

的部落領袖，是必須服從的一種自然的神；因此布爾人扮演神的角色，是他們自己隨意假設的，也是黑人奴隸們尊加給他們的。當然，對於黑人奴隸們的這批白人神來說，每一條法律都是剝奪自由，每一種統治只是對人類野性放任的限制。⑯布爾人在土著人身上發現了非洲能大量提供的唯一「原料」，他們不是利用土著人來生產財富，而只是利用了土著人作爲人類存在的本質。

南非的黑奴很快變成了唯一實際勞動的人口。他們的勞苦帶有奴隸勞動的一切已知缺點，例如缺乏主動性，懶惰，不愛惜工具，以及普遍的低效。因此他們的勞動僅夠維持主人的生活，從不達到足以推動文明發展的相對豐裕水平。正是這種絕對依靠他人的勞動，完全蔑視任何形式的勞動和生產力，使荷蘭人變成了布爾人，使他的種族觀念明顯地帶上了經濟含義。⑯

西方人以生活在自己創造和構築的世界中而感到自豪，布爾人是第一個完全擺脫這種自豪的歐洲羣體。⑯他們把土著人當作原料，依靠他們生活就像依靠水果和野生樹木一樣。他們懶散而生產力低下，願意像幾千年來的黑人部落一樣，過一種單調呆板的生活。當歐洲人第一次面對土著人的生活，接觸到人類生活中的非人性的一面，發現這是土著人野獸般的天性中的一部分，便激起了巨大的恐懼。布爾人依靠奴隸生活，恰如土著人依賴未經改造和變化的自然而生活。當布爾人在戰戰兢兢的苦難生活中決定將野蠻人當作另一種動物來使用時，他們開始了一種過程，最終將使自己蛻化成一個脫離其淵源的白人種族，與黑人種族共同生活，但是膚色又完全兩樣。

南非的貧窮白人在 1923 年時占白人總數的十分之一，⑯他們的生活水準同班圖部落的生活水準也無甚差別，而如今也有這種可能，這是值得注意的。貧困的原因，完全是輕視勞動，以及與黑人部落生活同化的結果。他們像黑人一樣，如果最原始的墾殖方式不能再生產最必需的食物，或者他

們將這個地區的野生動物捕獲光了，他們就會放棄這塊土地。⑳當黑人離開了農田時，他們也放棄了農莊，和自己以前的奴隸一起奔向金礦和鑽石礦。所不同的是，土著人立即受雇為廉價的非技術工人，而白人則以白種人皮膚的權利而要求並獲准受到照顧，根本未意識到，正常而言，人並不靠膚色來謀生。⑳如今他們的種族意識十分強烈，因為他們除了其白人社團成員的資格以外，不會再失去什麼，也因為種族概念更足以界定他們的處境，而非界定他們先前的奴隸地位，後者也漸漸成為工人，成為人類文明中的一個正常部分。

種族主義在被帝國主義當作一種主要的政治思想之前，就已在白人和黑人的社會裡被用作統治工具了。它的基礎與藉口使它本身產生了一種令人難以想像和理解的異化的可怖經驗；它實際上想宣布黑人不屬於人類。但是，既然黑人不顧任何意識形態的解釋，頑固地堅持保留他們的人類特徵，那麼「白人」不得不考慮他們的人類地位，而認定他們自己高於人類，是由上帝選擇來做黑人的諸神的。假如誰激烈地否認自己和野蠻人的一切共同聯繫，那就不可避免地得出這種邏輯結論；在實踐中，它意味著基督教第一次不能作為關鍵的限制力量，無法約束人類自我意識的危險扭曲，預示著在其他近代種族社會裡實質上也處於無能狀態。⑳布爾人乾脆否認關於人類共同起源的基督教教義，將《舊約》中的那些段落都改變了，但是《舊約》並未超越舊以色列民族宗教的界限而變成（甚至稱不上是異教的）迷信。⑳他們像猶太人一樣堅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㉔而根本區別在於他們並非被選取來完成拯救人類的天職，而是為了輕鬆地統治另一個命定以同樣懶惰的方式做苦工的人種。⑳這就是荷蘭改革教派(Dutch Reformed Church)宣布的上帝的意志，而且是直到如今仍以同其餘一切基督教名下的宣教團尖銳對立，而且以充滿敵意的方式宣布的上帝意志。⑳

布爾人的種族主義同其他類型的種族主義不一樣，有點眞實性，以及天眞無知的色彩。他們沒有文學，也沒有別的學術成果，這就是最好的證

據。㉗只要它仍然還是那種狀況，就只能像過去一樣，絕望地回應著令人絕望的生存條件，無法言喻也毫無結果。只有當英國人到達之後，事情發生了，他們對這個最新的殖民地不甚感興趣，直到 1849 年還只稱它是一個軍事站(和殖民地或拓墾地相對而言)。但僅憑他們的出現——他們對土著人的態度不同，並不認爲土著是另一個動物種類，他們後來嘗試 (1834 年以後) 廢除奴隸制，特別是確定土地財產的固定邊界——在停滯的布爾人社會中引起了劇烈的反應。布爾人的這些反應在整個十九世紀以同樣的方式重覆出現：布爾人農夫逃避英國法律，集體遷移到內地荒涼的遠鄉，毫不後悔地拋棄他們的家園和農莊。他們寧可將擁有的財產全部放棄，也不接受對地產的限制。㉗ 這並不意味著布爾人不以他們曾住的地方爲家園；他們至今仍比後來的移民更感到非洲是自己的家，不過這是指非洲，而不是圈定的具體領地。他們那種異想天開的集體遷移使英國殖民管理局大爲驚愕，這清楚地顯示出他們已將自己看成部落，失去了歐洲人那種對領土的感情，沒有那種自己國土的概念。他們的行爲正像在黑色大陸上漂流了許多個世紀的黑人部落一樣——無論在哪裡臨時落腳都感到自在，每當要他們明確定居時，便像躲避死神一樣逃走。

一切種族組織的特點就是無根(rootlessness)。歐洲人「運動」(movement)的有意識目的是將人們轉化爲定居部落，這在布爾人早先悲慘的嘗試中已經可以觀察到。無根作爲一種有意識目的，可以追溯到最早時對一個「多餘」的人毫無立足之地的世界的仇恨，因此它的毀滅變成了一種最高的政治目的，布爾人的無根是早先從勞動和不存在人類建造之世界的狀況下解放出來的自然結果。同樣深刻的類似性可見諸於各種「運動」和布爾人對「特選」(chosenness)的解釋之間。但是，當「泛日耳曼」、「泛斯拉夫」或「波蘭救世主義」(Polish Messianic movement)等等運動中的特選概念多少是一種有意識的統治工具時，布爾人濫用基督教信仰的根源卻是一種可怕的現實——悲慘的「白人」被同樣不幸的「黑人」當作神來崇

拜。他們沒有力量將現有生活環境，轉化爲一個文明的世界，他們就只能在自身中發現最高價值。但是，無論種族主義是災難的自然結果，還是造成災難的有意識工具，它總是緊密聯繫到輕視勞動、仇視領土界限、普遍的無根心態，以及積極地相信自己是神特選的。

早年英國籍傳教士、士兵、冒險家統治南非，並不明白布爾人的態度具有某種現實基礎。他們不懂得歐洲人的絕對優越地位——他們對此畢竟像布爾人一樣有興趣——若不通過種族主義是很難維持的，因爲歐洲人的永久移民區畢竟在數量上太少；㉙「假如居住在非洲的歐洲人像野蠻人一樣行事的話，那是因爲當地的習俗如此，」㉚而且在他們簡單的功利主義頭腦中，倘若爲了一個白人神明統治黑人幽靈的幻想而貢獻生產力和利潤，那將是愚蠢的。隨著黃金熱潮中英國和歐洲其他各國人來殖民，他們才逐漸調整爲穩定的居民，此時歐洲文明哪怕是用利益動機也無法再誘使他們回去了，當他們拋棄了較高的動機時，也失去了和歐洲人較低誘因的接觸，因爲在一個誰也不想獲得任何東西、任何人都變成了一個神的社會裡，兩者都已失去了意義和魅力。

㈡黃金與種族

金伯利(Kimberley)鑽石礦和維特沃特斯蘭德(Witwatersrand)金礦正巧就在這塊種族的魅幻世界中，「曾看到過滿滿一船一船移民的紐西蘭和澳大利亞，現在又看到人們跌跌撞撞走到碼頭，急急忙忙奔向金礦。他們大多數是英國人，但是其中也有不少人來自里加和基輔，漢堡和法蘭克福，鹿特丹和舊金山。」㉛他們都屬於「同一個階級的人，寧願選擇冒險和投機，不選擇固定的事業，他們做不好普通生活中帶束縛性的工作。……（他們是）美洲和澳洲來的礦工、德國投機家、商人、小店主、職業賭徒、律師……，前陸軍和海軍軍官、富裕人家的幼子……一羣奇妙的雜色人等聚合，

他們使金錢像流水一樣從迷人豐饒的礦床中流出。」成千上萬名土著也加入這支隊伍，起初來「偷鑽石，或者從槍枝彈藥中掙得一份收入，」㉜但是很快就開始爲工資而勞動，當「最沉悶的殖民地區突然爆發出活力時，」他們似乎變成了取之不盡的廉價勞動力源泉。㉜

土著人數眾多，勞動廉價，這或許可謂是這裡的淘金熱潮與其他地方的同類熱潮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事情不久就變得很明顯，從世界各個角落來的烏合之眾自己甚至不必從事採掘；無論如何，南非的永恆吸引力——即引誘冒險家來永久定居的那種永恆資源——不是黃金，而是人類原料，它可以使人永遠地從勞動中解放出來。㉞歐洲人只做監工，他們甚至也不出技術工人和工程師，因爲這兩者都可以從歐洲進口。

對於最終結果，其次重要的是，淘金熱潮並非單純淘金，它的資金和組織都與普通的歐洲經濟相關，通過累積多餘財富，並在猶太金融家的幫助下進行。從一開始起，「一百多名猶太商人像兀鷹一樣撲向獵物，」㉜他們是實際上的中間人，歐洲資本透過他們投入金礦和鑽石工業。

在南非突然爆發的這股熱潮中，它的居民中唯有一部分人並未加入，而且也不想介入。這就是布爾人。他們仇恨所有這些「外國人」(uitlanders)，這些人不在乎公民身份，但是需要獲得英國的保護，所以增強了英國政府在好望角的影響。布爾人的反應一如往常，他們在金伯利賣掉了帶有鑽石礦的領地，在約翰尼斯堡附近賣掉了帶有金礦的農場，又一次向內地荒漠集體遷移。他們不懂得這次新的洪流與英國傳教士、政府官員和普通移民不同，但當他們明白過來時，已經太晚了，在淘金浪潮中他們早已失去了自己的財富；他們後來才瞭解到，新的黃金偶像和他們的血緣崇拜並非不能妥協，新的暴民自行其是，如同他們一樣，不願意勞動，不適合於建立一種文明，因此對於他們，英國官員不會一再堅持法律，或堅持基督教傳教士們令人生厭的人類平等觀念。

布爾人害怕和逃避的事情實際上並沒有發生，即這個國家的工業化。就

正常的生產和文明會自動毀滅一個種族社會的生活方式而言，他們是對的。一個正常的勞動力市場和商品市場會清除種族的各種特權。但是黃金和鑽石不久就養活了南非的一半人口，它們不是在同樣的意義上交易的，不是以生產澳大利亞羊毛、紐西蘭肉類、加拿大小麥的同樣方式進行生產。黃金在經濟中的非理性、非功能性地位使它獨立於理性的生產方式，後者當然不會容忍黑人與白人之間工資的巨大差異。黃金用於投機，它的價值實質上取決於政治因素，它變成了南非的「生命線」[36]，但是它不可能，也不會變成一種新經濟秩序的基礎。

布爾人也害怕「外國人」的存在，因爲他們把這些人誤當成英國移民了。但是，「外國人」來此地僅僅是爲了迅速致富，只有那些留下來的人才是不成功者，或者是無國可回的猶太人。這兩個羣體非常關心建立一個社羣，想以歐洲各國爲楷模，像英國移民在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紐西蘭所做的一樣。巴爾那托(Barney Barnato)愉快地發現「德蘭士瓦省政府與世界上別的政府不一樣。它實際上根本不是政府，而是一個有兩千多名股東的無限公司。」[37]同樣地，正是一系列或多或少的誤解，最終導致了英國對布爾人的戰爭，布爾人錯誤地認爲，這場戰爭是「英國政府長期以來要求建立統一的南非國家的極點」，而事實上這場戰爭主要是由投資利益問題挑起的。[38]當布爾人戰敗後，他們失去的只不過是他們早已刻意放棄的東西，即他們的一份財富；但是他們肯定贏得了歐洲其他國家的同情，包括英國政府，都贊同他們保持一個沒有法律的種族社會。[39]如今，各個部分的居民，英國人或南非生長的白人，組織起來的工人或資本家，在種族問題上都意見一致，[40]而當納粹德國興起，有意識地試圖將德國人民轉化爲一個種族，這種作法大大地增強了布爾人的政治地位，德國的戰敗也並未使它削弱。

布爾人憎恨和害怕金融家遠甚於其他外國人。他們多少懂得，在多餘財富和多餘人力的結合中，金融家是關鍵人物，正由於他的作用，才使淘金熱潮從根本上轉變成一種無限廣闊的永久性商業。[41]再者，對英國的戰

爭不久就顯出另一個更具決定性作用的方面；很明顯，戰爭是由外國投資者推動的，他們理所當然地要求政府保護他們遠在外國的巨大利潤——似乎捲入一場反對外國人的戰爭的軍隊，只不過像捲入一場和當地犯罪分子作戰的當地警察力量一樣。在布爾人看來，將這種暴力引進黃金與鑽石生產的陰暗事情的人不再是金融家，而是從暴民中發展出來的人，他們像塞西爾・羅德斯，與其說信奉利潤，不如說信奉爲擴張而擴張，但這兩者沒有多大巨別。㊷金融家大多數是猶太人，但是只有多餘資本的代理人而不是擁有者，才是既沒有必然的政治影響力、又沒有足夠的經濟力量，無力在投機和賭博中引進政治目的和使用暴力的人。

金融家儘管不是帝國主義的最終決定因素，但無疑是帝國主義最初階段的顯著代表。㊷他們利用資本過度生產和伴隨著發生的經濟價值觀和道德價值觀的徹底逆轉，不是從事簡單的商品貿易和生產中獲取利潤，而是以空前的規模從事貿易本身的貿易。僅憑這一點，就能使他們有顯赫的地位；再者，在外國投資的利潤不久就以比貿易利潤更快的速度增加，所以貿易商原本來的領先地位就讓給了金融家。㊹金融家的主要經濟特點是他的利潤並非從生產中取得，亦非從貿易或正常的銀行業務中剝削或交易來取得，而是僅僅通過佣金來獲得。在整個脈絡裏，這一點很重要，因爲它能指出金融家那種即使在正常的經濟活動中也屬於非實在的、幻影般的、而實際上無益的存在，在南非的許多事件中，這是很典型的。當然，金融家並不是剝削任何一個人，他們對自己的商業冒險最少控制，無論這些冒險最後變成普通的騙局，還是穩固可靠的企業。

值得注意的另一點是，恰恰是猶太人中的暴民分子變成了金融家。南非發現金礦之時，正值俄國發生現代社會中第一次對猶太人的屠殺，因此有一小部分猶太移民陸續到達南非。但是，倘若不是幾個猶太金融家先期到達那裡，新來者對他們直接有益——因爲先來者可以代表他們——那麼，後來者在國際流氓和追逐財富者中間就很難立足了。

猶太金融家實際上來自歐洲大陸各國，就階級而言，他們像來南非的其他移民一樣是多餘的人。他們和幾個已經擁有著名地位的猶太家族十分不同，這些家族自 1820 年以來影響力已經逐步減弱，而猶太金融家們加入這些家族的行列也不會被同化。他們屬於新的猶太金融家階層，從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起，他們來到各國首都，而且大多離開了原先居住的國家，目的是在國際證券市場的賭博中一試運氣。他們在到處都這樣，使得舊猶太家族都萬分沮喪，因爲舊家族都太虛弱，無法阻止新一代肆無忌憚的行徑，所以如果後者決定將活動轉移到海外去時，舊家族的人眞是太高興了。換言之，猶太銀行家們在合法的猶太銀行業中變成了多餘者，他們所代表的財富在合法的工業活動中變成了多餘的，而在合法的勞動世界中也成爲追逐財富者。在南非本地，商人在國內經濟中的地位正在讓給新來的金融家，巴爾那托、貝特(Beits)及薛米・馬克斯(Sammy Marks)等家族，比在歐洲更輕而易舉地將原先的猶太移民們從第一等的位置上擠走。[45] 在南非——儘管在別處不大可能如此——他們是資本與暴民最初結合的第三個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們推動了這一結合，操縱著資本匯集和向金礦與鑽石礦投資，不久就變得比任何人更引人注目。

他們的猶太種族淵源給他們的金融家角色塗上了一種不甚明確的、具有象徵性的色彩——一種實質上無家、無根的色彩——一種神祕的成份，同時也使整個情況象徵化了。這裡還須補充的是，猶太人實際上的國際聯繫很自然地挑起一些普遍的妄想，認爲猶太人對全世界的政治有影響力。一切關於猶太人的國際秘密力量的說法——這些說法緣起於猶太銀行資本和國家事務的密切關係——在這裡變得比在歐洲更加刻毒，這是很可以理解的。在這裡，猶太人第一次被驅趕到一個種族社會裡，並且幾乎自動地被布爾人出於仇恨將他們從別的「白」人中間剔除出來，他們不光是被當作整個事業的代表人物，而且被當作一個不同的「種族」，當作進入正常的「黑人」和「白人」世界的魔鬼原則的化身。這種仇恨越來越嚴重，部分原因

是懷疑猶太人古有的正統主張，使他們會比別人更難於相信布爾人關於自己是上帝特選民的主張。基督教單純地否定這條原則，而猶太教似乎是一種直接的挑戰和競爭。遠在納粹有意識地在南非發動反猶主義運動之前，種族議題就以反猶主義的形式進入了「外國人」和布爾人之間的衝突，㊻而自從二十世紀之初開始，猶太人在南非的黃金和鑽石經濟中失去重要性之後，這個問題就更值得注意了。

一旦黃金和鑽石工業進入帝國主義發展階段，在外的股東們向他們的政府請求政治保護，結果變成猶太人無法保住他們重要的經濟地位。他們沒有自己的母國政府，在南非社會的地位很不保險，使他們除了影響力日趨衰弱之外，還有更多的方面處於危險之中。只有當猶太人取得了某種社會地位——在這裡所說的情況是，進入不公開的各個英國俱樂部，他們才能保住其在南非比任何「外國人」團體更需要的經濟安全和永久移民權。他們被迫以降低影響力來換取紳士的地位，塞西爾·羅德斯如此直率地說過，因爲他當時將他的比爾斯公司(De Beers Company)和阿爾弗雷德·貝特(Alfred Beit)的公司合併，買下了「巴爾那托鑽石信託公司」。㊻但是這些猶太人能提供的東西不止於經濟力量；正是由於他們，羅德斯這位同他們一樣的冒險家和新來者最終才被英格蘭令人尊敬的銀行業接納，而英國銀行業畢竟是猶太金融家可以建立比和別人關係更良好的機構。㊻「沒有一家英國銀行會借一個先令來保障黃金股票。正是金伯利的這些弄鑽石的人的無限信心，才像磁鐵一樣吸引了家鄉具有同樣信念的人們。」㊻

直到塞西爾·羅德斯霸占了猶太人的財富，將英國的投資政策控制在自己手裡，成了好望角的中心人物之後，淘金熱潮才變爲完整的帝國主義事業，付給股東的股息百分之七十五流到國外，其中大部分流到英國。羅德斯成功地使英國政府對他的商業事務發生興趣，並且說服他們相信，爲了保護投資，有必要擴張和輸出暴力工具，這種政策是每一個民族政府的神聖職責。另一方面，他在好望角引進了典型的帝國主義經濟政策，忽視

非海外股東擁有的工礦企業，因此到末了，不僅是黃金開採公司，而且連政府本身也灰心於開發豐富的基本金屬儲礦和消費品生產。㊿隨著這項政策開始實行，羅德斯終於在安撫布爾人方面啓動了最有力的因素；忽視一切眞正的工業企業對避免正常的資本主義發展最有力的保證，因而阻礙了種族社會的正常目標。

布爾人在幾十年之後才懂得不用害怕帝國主義，因爲它既不會使這個國家像澳大利亞和加拿大一樣發展，也不會從這個國家榨取利潤，它只是滿足於在某一方面的投資得到高額回報。因此，如果具體投資的利潤有保障，帝國主義願意放棄所謂的資本主義生產規律及其平均主義傾向。這最終導致廢除純粹利潤法則，暴民與資本結合中，當暴民變成主導因素時會產生何種現象，南非成了第一個例子。

在某一個方面，最重要的是布爾人仍然是這個國家的主人而無可爭議：每當合理的勞工與生產政策和種族原因發生衝突時，總是後者勝。利潤動機一次又一次地屈從於一個種族社會的要求，並且常常付出可怕的代價。當政府解雇一萬七千名班圖族雇員，並爲白人增加了兩倍工資時，鐵路租借權便在一夜之間被摧毀了；㊿當土著的市政府雇員位置被白人取代時，市政府的開支便斷了來源；「有色人種法案」(Color Bar Bill)最終將黑人工人排除出機械技術工作，迫使工礦企業大幅度增加生產成本。布爾人的種族世界不必再害怕任何人了，更不害怕白人勞工，其工會痛苦地抱怨說，「有色人種法案」走得還不夠遠。㊿

初看起來很奇怪，猶太金融家消失了，種族主義成功地灌輸給對歐洲各國民眾，而暴力的反猶主義卻生存了下來。猶太人當然逃不過這條規律；他們和每一個人一樣地去適應種族主義，他們對黑人的行爲則無可非議。㊿但是在不知不覺中、在特殊環境的壓力下，他們和這個國家的一條最強有力的傳統絕裂。

猶太金融家在黃金和鑽石工業中失去地位之後，立即出現了「不正常」行爲的第一個跡象。他們並未離開這個國家，而是永久地居住下來，[54]處於白人團體中的一種獨特地位：他們既不屬於非洲的「生命血液」(life-blood)，也不屬於「窮白人廢物」。相反，由於他們同金礦沒有聯繫，所以他們幾乎立即開始從事那些根據南非人的看法是「二等的」工業和職業。[55]猶太人變成了家具和服裝製造商、店主、職業人士——醫生、律師和新聞從業人員。換言之，無論他們如何想到自己是怎樣適應了這個國家的暴民環境和種族觀點，猶太人以在南非經濟中引進了正常的生產而打破了它的最重要格局，結果，當梅倫(Daniel François Malan)先生在議會提案，將所有猶太人逐出南非聯邦時，得到了全體貧窮白人和黑人的熱情支持。[56]

這種經濟功能的改變，即南非珠寶業從陰影般的黃金和種族世界的最模糊性質的代表轉變爲全人口中唯一有生產力的部份，好似證實了布爾人最初時的恐懼。他們憎恨猶太人，主要倒不是因爲猶太人是剩餘財富的中間商或黃金世界的代表；他們害怕和蔑視猶太人，是因爲後者的「外國人」形象，認爲猶太人會設法將這個國家改變成西方文明中的一個正常生產的部分，至少他們的利潤動機會致命地危害種族的幻影世界。而當猶太人最終被趕出「外國人」的黃金生命線，無法像其他外國人在同樣情況下一樣離開這個國家，而是開拓了「第二等」工業，布爾人眞是猜對了。猶太人完全依靠自己，不模仿任何事物和任何別人，於是變成了對種族世界的一個眞正威脅。正如現在的事實所表明的，猶太人讓那些相信種族或黃金的人一致敵視他們——實際上這些人就是在南非的全體歐洲人。然而他們不能、也不會同另外一個唯一的團體合作，那個團體慢慢地脫離了種族社會：在正規的勞動和城市生活的推動下，黑人工人們越來越意識到他們的人類地位。雖然和「白人」相比，他們有自己的種族淵源，但沒有種族迷信，廢除種族社會只意味著他們有希望得到解放。

相比之下，對於納粹來說，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是用以摧毀文明的主

要政治武器，而且藉以建立一種新的政體；但是在南非，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是一種毋庸置疑的事實和現狀的自然結果。它們無須借納粹來誕生，但是却對納粹主義產生間接的影響。

然而，南非種族社會中歐洲各民族人的行爲自食其果地導致了直接的眞正後果：自從南非在勞動力內部暫時供應不足時，發瘋般地運來大量廉價的印度和中國勞工，[57]而在亞洲馬上感受得到對有色人種的態度變化，第一次，歐洲人對待亞洲人的態度就像對待那使他們魂飛魄散的非洲野蠻人。唯一的區別是，沒有任何藉口或者可以理解的理由，可以將印度人和中國人不當人看待。從某種意義上說，眞正的罪行是從這裡開始的，因爲在這裡每一個人都應該已知道他在做什麼。的確，種族觀念在亞洲多少比較輕一些；當「白人」開始擔負起他的重任時，他會說「血統高貴和低賤」，這仍然表明緩慢發展的規模和可能性，這種觀點多少避免了關於兩種完全不同的動物生命種類的概念。另一方面，旣然種族原則取代了亞洲舊有的外國人概念，它就成爲比在非洲更有意識地應用的統治和剝削工具。

南非種族社會的另一種經驗不具有直接意義，但對於極權主義政府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即利潤動機不是神聖的，可能被壓倒；社會可以不根據經濟原則，而根據其他原則來運行；這種情況可能有利於那些在合理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下屬於被剝奪權利的人。南非的種族社會一向有著混亂的預兆，這極大地教育了暴民，一個被剝奪權利的羣體可以通過暴力來造出一個比它更低賤的階級，爲了達到這個目的，甚至不需要一場革命，而是與統治階級的各個羣體結夥，而外國民族和落後民族則提供了實施這種策略的最佳機會。

非洲經驗的全面衝擊最先在暴民的領袖身上看出——例如卡爾・比德斯——他認定他們也應該是一個主人種族，非洲殖民屬地變成沃土，培植了後來的納粹中心分子。他們在此親眼看到可以怎樣將民族轉變爲種族，只要這個過程一起頭，就可以把自己的民族推主人種族的地位。在這裡他們

治癒了原先關於歷史過程必然是「進步的」幻覺，因爲舊殖民化的過程假如是爲某個目標而集體遷移，「荷蘭人遷移離開一切」，[58]假如「經濟史曾經教導說，人類是從狩獵生活到畜牧生活、最終定居從事農耕生活的漸進步伐發展而來的，」那麼布爾人的故事則清楚地顯示了，人也可以「來自一塊率先繁榮和精耕細作的土地……而漸漸地變成牧人和獵人。」[59]這些領袖非常懂得，正因爲布爾人沉淪回到蠻族部落的水平，才使他們繼續做個無可爭議的主人。他們很願意付出這種代價，退回到一種種族組織的水平，只要這樣做能使他們成爲其他「種族」的主人。而且他們根據自己的經驗也知道，隨著人們從地球的四面八方匯集到南非來，西方文明世界的全體暴民都會與他們同在。[60]

㈢帝國主義的特性

在帝國主義的兩種最主要的政治統治手段中，種族手段發現於南非，官僚政治手段發現於阿爾及利亞、埃及和印度；前者原先只是歐洲人對各部落的人性狀態感到恥辱和害怕的有意識反應，而後者是歐洲人試圖統治外族的施政結果，他們認爲這些外族對自己的可怕境遇感到絕望，同時需要他們的特殊保護。換言之，種族手段即逃避責任，使其中不再存在人性事物，而官僚政治是一種責任的結果，任何人對他的同伴、任何民族對其他民族都難膺此重任。

在印度的英國行政當局的責任感是誇張了的，他們繼承了伯克的「破壞法律者」的思想，其物質基礎是英帝國事實上是在「心不在焉」的情形下獲得印度的。因此，凡是面對已完成的事實以及需要通過偶發事件來保住已獲得的利益，都須找到一種解釋，可以將偶然變爲一種有意志的行動。這種歷史事實的變化從古代以來一直通過傳奇來完成，而英國知識階層夢想的傳說在組建官僚政治和英國間諜機構的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創造歷史時，傳奇一向起著有力的作用。人未曾獲得「不為」的天賦，他總是未被詢問就必須接受別人的行動，總是承擔著責任，而責任似乎是一連串永無止境的事件而不是有意識行動的結果，要求解釋過去，彷彿裡邊掩藏著解開未來命運之謎的神秘鑰匙。傳奇是每一座古老的城市、每一個古老的帝國、每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的精神基礎，擔保著安全地引導通過未來的無限空間。傳奇從不可靠地聯繫事實，但總是表現眞正的意義，提供一種超越現實的眞理，一種超越回憶的記憶。

傳奇對歷史的解釋總是對事實和眞實事件遲來的糾正，這是很必要的，因爲歷史本身恰恰會要求人對他未曾做過的事情和未能預見的結果負責。古代傳奇中的眞理——在它們描述的城市、帝國、民族被碾成塵土之後許多個世紀，仍賦與它以引人入勝的現實性——只是一種形式，過去的事件在其中符合普遍的人類狀況和具體的政治靈感。只有在坦率地編織有關事件的故事中，人才肯假定他對它們的責任，將過去的事件當作**他的**過去來考慮。傳奇使他成了他未做過的事情的主人，有能力應付他不能不做的事情。在這個意義上，傳奇不僅存在於人類的最初記憶中間，而且事實上也是人類歷史的眞正開端。

基督教的誕生，使繁榮興旺的歷史傳奇和政治傳奇突然中止。基督教對歷史的解釋，從亞當時代到末日審判，規定了唯一的一條獲得拯救之路，爲人類的命運提供了一種最有力的和無所不包的傳奇式解釋。只有到了基督教各民族的精神統一讓位於各民族的多元化之後，當拯救之路不是一種應用於一切發生的事情的普遍理論，而變成個人信仰中一個不確定的因素時，才出現對歷史的各種各樣新解釋。十九世紀爲我們提供了一幅奇觀，各種最不相同的、互相矛盾的意識形態幾乎同時產生，每一種意識形態都宣稱自己知道別人不理解的各類事實中隱藏的眞理。但是，傳奇不是意識形態；它們的目標不是作出普遍解釋，而一向只關心具體的事實。有意思的

是，民族實體的發展不會伴隨著一種奠基式的傳奇，近代第一種獨特的嘗試恰恰是在民族實體的衰落變得十分明顯時開始的，帝國主義似乎取代了舊式的民族主義。

吉卜林是一位帝國主義傳奇的作者，傳奇的中心是不列顛帝國，它的結果是帝國主義特性（帝國主義是近代政治中唯一一種具有特性的派別）。關於不列顛帝國的傳奇幾乎同不列顛帝國主義毫不相干，後者強迫和哄騙英國最優秀的子弟爲它服務。傳奇吸引了我們時代最優秀的人，一如意識形態會吸引普通人，而竊竊私語地流傳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秘密黑幕權力故事則吸引了最惡劣的人。毫無疑問，沒有哪一種政治結構比不列顛帝國更能喚起傳奇故事和辯護的說法，不列顛人民從有意識地建立殖民地發展到了統治和主宰全世界的外國人民。

吉卜林敍述的那種基本傳奇產生於不列顛諸島人的現實基礎。[61]他們被大海環圍著，通過船的發明，需要求助於水、風、太陽這三大要素。船與這些危險的可能因素配合，使英國人成了世界的主人。吉卜林說：「無需任何人**關心**你怎樣行事，你可以贏得這個世界：你能擁有這個世界，無需任何人**知道**你如何擁有了它：你能背負起這個世界，無需任何人**看到**你是如何做的。但是無論是你，還是你的子孫，從那種無足輕重的工作中得不到什麼，只得到四種禮物——海、風、太陽、還有你乘坐的船。……因爲贏得世界、擁有世界、背負起整個世界——在地上，在海上，在空中——你的子孫永遠得到這四種禮物。他們會變得有遠見，言語謹愼，背負沉重；對每一個敵人總有那麼一點占上風——他們可能會保護一切在合法的場合航海的人。」

使〈第一個水手〉(First Sailor)這個小故事接近古代基本傳奇的原因是，它提出唯有英國人才是政治上成熟的人，關心法律和全世界的福利，優於那些既不關心又不懂得是什麼結合整個世界的蠻族部落。不幸的是，這種表述缺乏古代傳奇中的那種內在眞理：這個世界關心、懂得並且看到他

們如何成功，沒有一個故事能使世界相信他們「從那種無足輕重的工作中得不到什麼」。但是在英國本身有一種現實印證了吉卜林的傳奇故事，並使它完全變得可能，那就是豪俠、高貴、勇敢等等美德的存在，即便在塞西爾・羅德斯或寇曾勛爵統治下的政治現實中，它們完全被排除。

「白種人的負擔」既非虛僞，亦非種族主義，這一事實並未阻止一些優秀的英國人認眞地擔負起重任，使自己成爲悲劇式的、吉訶德式的帝國主義傻瓜。英國除了虛僞的傳統，還有一個較不明顯的傳統，可以稱作是「屠龍者」(dragon-slayer)的傳統，他們充滿激情地跑到遙遠奇異的地方，遇到陌生而天眞無知的人們，殺死了無數條千百年來危害那些人的毒龍。吉卜林的另一個故事〈祖先的墳墓〉(The Tomb of His Ancestor)[62]中還有許多眞理，故事裡的秦恩家族(the Chinn family)「世世代代在印度服務，就像排隊穿越大海的海豚一樣」。他們射殺偷食窮人莊稼的鹿，教他農耕方法的秘訣，幫他擺脫有害的迷信，殺死大批獅子和虎。他們的唯一報酬的確是一種「祖先的墳墓」和留下一部家族的傳奇，整個印度部落據此都相信「令人尊敬的祖先……自己有一頭虎——他騎著這頭虎周遊全國，覺得哪裡需要他，就去那裡。」不幸的是，這種騎虎周遊全國是「一種戰爭或禍害或其他什麼的明確象徵」，而在這種具體情況下則是一種預兆。因此秦恩家族最年輕的人雖說在家族歷史上軍階最低，是最不重要的一位後代，但是對於印度部落來說卻是最重要的人，他不得不射殺他祖先的寵獸，以使人們免於恐懼「戰爭或禍害或其他什麼」。

隨著近代生活的變遷，秦恩家族的確「比大多數人幸運」。他們的運氣在於生來就被溫和而自然地引導著去實現青年人最好的夢。當其他少年們不得不忘記「貴族夢」時，他們恰恰已成年，可以將夢想化爲行動。當他們服務了三十年之後退休了，他們的船將越過「遠征軍艦，送他的兒子到東方去履行家族職責」，因此秦恩老先生的存在，作爲政府指定的、軍隊供職的屠龍手，可以將職位傳給下一代。毫無疑問，是英國政府支付他們薪

水，但是有一點很不清楚，他們到底是在爲誰服務。很可能他們實際上爲某一個印度部落服務，一代接著一代，聊可慰藉的是至少這個部落的人認爲如此。事實上，上級官員幾乎不知道小秦恩少尉的奇怪職責和歷險到底爲了什麼，也幾乎沒意識到他是他祖父成功化身的再現，這卻爲他那夢幻般的雙重存在提供了一種現實生活中不受干擾的基礎。他在兩個世界中——用防水的和防流言蜚語的牆隔開的世界——輕鬆自如。生於「灌木叢生的猛虎般國家的心臟地帶」，在和平的、和諧的、閉塞的英國，在自己人中間受教育，他完全可以和兩個民族永遠在一起生活，扎根在那裡，十分熟悉兩者的傳統、語言、迷信和偏見。只消一紙通知，他就可以從國王陛下的士兵、隨時聽從命令的後代，搖身變爲土著世界中令人興奮的高貴人物、弱者敬愛的保護人、古老傳說中的屠龍手。

問題在於這些奇怪的、吉訶德式的弱者保護人在英國官方統治的背後發揮作用，他們是原始民族天眞想像的產物，而不是包含了歐洲和基督教最優秀傳統之夢想的產物，即便在他們早已回到少年時代理想之中時也是如此。能使土著人懂得西方世界之偉大的，旣不是陛下的士兵，也不是不列顚高級官員。只有那些永遠走不出童年理想，因此獻身於殖民地服務的人才能適合這一任務。對於他們來說，帝國主義只不過是一次逃避一個社會的偶然機會，在那個社會裡人若想成長就必須忘記童年。英國社會很樂意見到他們離開，到遙遠的國度去，那種環境允許人保留甚至發展在公立學校制度中培養的少年理想；殖民地服務使他們遠離英國，防止他們將童年的理想轉入成年人的成熟思想。陌生奇特的土地自從十九世紀末以來一直吸引著英國最優秀的青年，奪走了英國社會最誠實也是最危險的成員，除了這點祝福之外，還保障了某種少年時代可貴品質的存續，或者固定化，使西方的道德標準得以維持，**而且**變得幼稚。

克洛默勛爵是印度的帝國主義政府之前的總督秘書和財政部長，他仍

然屬於英國的「屠龍者」那一類人物。僅僅出於對落後民族的「犧牲精神」和對大不列顛王國的「責任感」㊸——即「產生一個官員階級，他們既有統治的願望又有統治的能力」，㊹他在1894年辭卻了總督職務，十年之後又拒絕了外交國務卿(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ttairs)的職位。他不要這些能使次一等的人心滿意足的榮耀，而在1883至1907年當了屬不大出名但極有權力的埃及的英國執政官(British Consul General in Egypt)。他在那裡是第一個帝國主義行政官員，無疑「在那些以自己的服務爲不列顛種族增光的人中間首屈一指者」；㊺或許他還是最後一個帶著不受指責的驕傲去世的人物:「讓這一切證明不列顛的獎賞不虛——／誰也不曾獲得過更高貴的驕傲，／賜福一個被解放的民族／意識的職責已經完成。」㊺

克洛默去埃及，因爲他懂得「極力想控制他所愛的印度的英國人（必須）將一隻脚牢牢地插在尼羅河岸。」㊺埃及對於他只是達到目標的手段，是爲了保證在印度的安全而必要的擴張。幾乎與此同時，另一個英國人揷足非洲大陸，儘管目的和原因都不同：塞西爾·羅德斯去了南非，在英國人有了「可愛的印度」之後，好望角殖民地失去了一切重要性，但是羅德斯挽救了它。羅德斯的擴張觀念比他那位在北方更令人尊敬的同僚激烈得多；他認爲，擴張不需要用例如保持某人早已獲得的東西這類合情合理的動機來證明是正當的。「擴張就是一切」，而印度，南非，埃及這些地方，無論重要還是不重要，都同樣是擴張的階石，而擴張以全球爲止境。在卑瑣的自大狂和獻身於責任的有教養的人之間當然有一道鴻溝；然而他們達到大致相同的結果，同樣地對秘密的「偉大遊戲」(Great Game)負責，這種「偉大遊戲」，無論對於政治還是對於種族的幻影世界，都一樣不健康而且有害。

羅德斯統治南非和克洛默主宰埃及有一種突出的相似性，兩者都不將治轄的國家本身當作理想的目標，而只是爲更高目標服務的手段。他們是

相同的，所以他們的一致性和超然態度、對自己的臣民缺少眞正的興趣，都完全一樣，這種態度有別於亞洲當地統治者的殘酷和獨斷，有別於征服者那種毫無憐惜的剝削，也有別於通過一個種族對另一個種族實行卑劣無度的壓迫。一旦克洛默爲了印度而開始統治埃及，他就失去了「落後民族」保護者的作用，也無法再眞誠地相信「臣屬種族的自我利益是整個帝國網絡的主要基礎」。[68]

超然態度成爲不列顚殖民機構一切成員的新態度；它的統治形式比暴君專制和獨裁統治更危險，因爲它甚至不能容忍獨裁者和他的臣民之間由賄賂和禮物構成的最後一種聯繫。英國殖民行政當局的正直使當地獨裁統治更無人道，更脫離它的臣民，遠比亞洲的統治者和無法無天的征服者更甚。[69]正直和超然對於利益的絕對分化，從不允許利益互相衝突這一點而言，只是兩種象徵。相比之下，剝削、壓迫、腐敗看來好像是人類尊嚴的衛士，因爲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壓迫者與被壓迫者，腐蝕者與腐敗者仍然生活在同一個世界上，仍然有著共同的目標，相互爭奪同樣的東西；而超然態度摧毀的正是上述第三對關係。最糟糕的是，超然的行政長官很難意識到他創造了一種新的統治形式，他實際上相信，他的態度受到「被迫與生活在下層的人接觸」的制約。他不相信自己個人帶有某種程度無害的虛榮之優越地位，他覺得自己屬於「一個達到相對較高程度文明的民族」，[70]因此認爲他的地位是與生俱來的，和個人的成就無關。

克洛默勛爵的事業很有意思，因爲它體現了從舊殖民地機構到帝國主義機構的轉折點。他對自己在埃及的職責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明顯地感到不自在，他關心的事態不是「吞併」，而是一種「混雜的統治形式，說不出名稱，也沒有先例」。[71]服務了兩年之後，在 1885 年，他仍然認眞地懷疑這樣一種制度，他在其中是名義上的英國執政官和事實上的埃及統治者，他在信中寫過，「一種高度靈敏的機制的有效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幾個個人的判斷和能力……要證明這一點，我們必須能夠保持撤退的可能性。

……如果那種可能性很小，無法作實際考慮……那麼我們最好是……與其他列強一起作安排，我們應該接管這個國家，擔保它的債務，等等。」❼克洛默無疑是正確的，或者占領，或者撤離，兩者都能使事情正常化。但是那「混雜的統治形式」(hybrid form of government)沒有先例，會變成具有一切帝國主義事業的特點，結果幾十年後，每一個人都忘記了克洛默勛爵早先關於可能的與不可能的統治形式的有力判斷，正如忘記了塞爾伯恩勛爵早先關於「種族社會是一種史無前例的生活方式」的深刻見解一樣。帝國主義最初階段的最大特點是對非洲情況的這兩種判斷的綜合所顯示的：南部的一種史無前例的生活方式，北部的一種史無前例的統治形式。

在緊接著的幾年中，克洛默順從了「混雜的統治形式」；在他的信中，他開始論證這種無名稱、無先例的政府，並且解釋這種需要。在他晚年時，終於寫下了（論文〈臣屬種族的政府〉〔The Government of Subject Races〕）主要內容，它完全可以被稱作是「一種官僚的哲學」。

克洛默開始認識到，「個人影響」即使沒有法律上或成文的政治條約，也足以在外國「完全有效地監督公共事務」。❼這種非正式的影響有益於一種定義明確的政策，因為它可以在任何情況下立即改變，在發生困難時不必將母國政府牽連進來。它需要一批受過高度訓練的、高度可靠的人員，他們的忠誠和愛國精神與個人野心或虛榮無關，他們甚至被要求放棄將他們的名字同他們的成就聯在一起的那種人類抱負。他們最偉大的激情是要從事秘密工作（「越是少談起英國官員越好」），❼扮演幕後角色；他們最蔑視的是公開露面，以及樂於此道的人。

克洛默本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這一切品質；只有當他「被從躲避之處抬出來時」，當「先前只有幕後少數幾個人知道的事情弄得全世界都知道」時，他才勃然大怒。❼的確，他感到自豪的是「多少保持隱秘地在幕後牽線。」❼倒過來，為了使他的工作有可能成功，官僚必須感到不受一切公共機構（不管是國會、「英國各政治部門」、還是新聞界）的控制，亦即來自

他們的讚揚，或者譴責。民主制的每一步成長，或者即使是現有的民主制機構的簡單功能，都可能只是一種危險，因爲它不可能「用一個民族去統治另一個民族——用英國人民去統治印度人民。」[77]官僚政治永遠是一種專家政治，一種「有經驗的少數人」的統治，它必須抵制、而且也瞭解，來自「沒有經驗的大多數人」的經常性壓力是怎樣一回事。每一個人從根本上來說都屬於沒有經驗的大多數人，因此不能託付以政治和公共事務這樣高度專門化的事情。再者，官僚政治家們對於政治事務可能根本沒有總體觀念；他們的愛國熱情不應該將他們引導到歧途，只相信自己國家政治原則的內在優點；那將只會造成他們廉價地「模仿」，將自己國家的政治原則應用於「落後民眾的政府」，根據克洛默的看法，這是法國體制的主要缺陷。[77]

誰也不會認爲塞西爾・羅德斯因爲缺少榮譽而痛苦。根據詹姆森的說法，他希望被人紀念至少四千年。然而，儘管他渴求自我的榮譽，他也同過分謙虛的克洛默勛爵一樣主張不事張揚的統治。羅德斯特別喜歡寫遺囑（在二十餘年公共生活的過程中），他堅持在所有的遺囑中寫上他的錢應該用於建立「一個秘密會社……以便執行他的計劃」，它應該「由希望做一番事業的人聚財支持而組織起來」，以便最終會有「兩千至三千名精力旺盛的人，分布在全世界，每一個人應該在他一生中最易受影響的時期，把這個組織締造者的夢想牢牢地印在腦子裡，還有，每一個人都須按照締造者的目標經過特殊嚴格的挑選。」[77]羅德斯比克洛默更有遠見，他立即著手組織其成員全是「北歐人種」的會社，[80]以使其目標不完全是大不列顛的發展和榮耀——而是囊括「整個非洲大陸，巴勒斯坦聖地，幼發拉底河谷，塞浦路斯羣島和克里特島，整個南美洲；太平洋羣島，……整個馬來亞羣島，中國和日本，最後還有美國」[80]——而是爲了「北歐人種」的擴張，以秘密會社的組織形式，建立一個統治全世界各民族的官僚政府。

使羅德斯克服畸形的內心虛榮並使他發覺秘密事物魅力的原因，同樣使克洛默克服了內心的責任感：發現有一種擴張並非由渴望獲得某一個國

家的願望爲動力，而是相信擴張是一個過程，一個國家是一塊階石，用於進一步擴張。從這種概念來看，對榮譽的渴望不會再滿足於爲了自己的民族利益而光榮地征服另一個民族，責任感也不會通過有意識地從事具體的工作和完成具體的任務而得到滿足。一個人不管有什麼優點和缺點，一旦他進入了擴張的無休止過程的漩渦，他就會忘記了自身，只聽從這個過程的規律，將自身認同於一些無名的力量，爲之服務，目的是維持這整個運動過程；他會想到自己只是一種功能，最後會認爲這種功能性，這種動力傾向的化身是他能取得的最高成就。正如羅德斯十分愚蠢地說過，他的確「不會做錯事，他所做的都是正確的。他的責任是做他想做的事。他覺得自己是一個神——一個不折不扣的神。」[82]但是克洛默勛爵清醒地指出了同樣的現象：人自願地使自己降格爲純粹工具或純粹功能。他將官僚政治家們稱作「執行帝國主義政策中無價的工具。」[82]

很明顯，擴張力量的秘密的和匿名的代表並不理會人制定的法律。他們遵從的唯一「法律」是擴張的「法律」，而唯一證明他們「守法」的依據是他們的成功。一旦證明是失敗了，如果任何一種原因證明他們不再是「無價的工具」，他們就必須自願消失在完全湮沒無聞之中。只要他們獲得成功，那麼一種體現出比自身更偉大的力量的感覺就使他們能相對輕鬆地退隱，甚至可以不顧別人的喝采和頌揚。他們都是怪物，成功時自負，失敗時謙虛。

在官僚政治作爲統治形式，其法律替換爲臨時變化的法令這種內在性質的基礎上，產生了一種迷信，認爲人與歷史的各種動力之間可能有一種奇妙的一致性。關於這種政體的理想，總是置放在那些躲在幕後牽動歷史的神經的人身上。克洛默在他和埃及的關係中——即使只是宣布埃及同英國合併——爲了避免只遵從擴張的法則，避免受人爲條約的約束，他最終避開了每一種「書面文件，或者任何一種實際上有形的文件之類」。[82]如此，官僚政治家迴避每一種普遍法律，用法令來分別處理每一種具體情況，因

爲法律的內在穩定性要求建立永久的社羣，在那裡面誰也不可能成爲一個神，一切都要服從法律，這對官僚政治是一種威脅。

這一制度的本質是毫無目的的過程，其中的兩個關鍵角色一是官僚人員，一是特務。只要他們還只爲英國帝國主義服務，這兩種人就不會否認他們是屠龍手和弱者保護人的後裔，所以也絕不會將官僚政體驅使到它們的內在極端。差不多在克洛默去世二十年後，一位英國的官僚懂得了「行政屠殺」可以使印度留在不列顛帝國之內，但是他也知道，要想使令人痛恨的「英國各政治部門」支持另一項十分現實的計劃，那將是空想。[85]印度的總督寇曾勛爵身上顯示不出克洛默的那種高貴氣派，他身上很典型地體現了這樣一種社會——如果暴民們得到了一種以流行的勢利態度爲形式的種族標準，這個社會就會越來越傾向接受暴民們的種族標準。[85]但是勢利不同於狂暴，所以從來未眞正奏效。

英國情報機構(British Secret Service)的成員們的情形也與此相同。他們也有輝煌的前身——屠龍手成爲官僚政治家，冒險家變爲特務——他們也可以宣稱有一種基本的傳奇故事，即吉卜林在《基姆》（*Kim*）中講述的「偉大遊戲」的傳奇。

每一個冒險家當然都知道吉卜林的意思，他稱讚基姆，因爲「他熱愛的遊戲是爲了自己」。每一個仍然能驚詫於「這個偉大而奇妙的世界」的人都知道，當「傳教士和慈善機構的代表看不到這個世界的美」時，要反對這種遊戲是很難的。至於那些認爲「吻一個白種姑娘的嘴是一種罪，而吻一個黑人的鞋是一種美德」的人，就更沒有權利說話了。[85]既然生命本身最終必須出於自身目的去經歷、去愛，那麼遊戲出於本身目的也必須去冒險、去喜愛，這很容易顯示出是一種最強烈的人類生命象徵。正是這種人性激情的底蘊使《基姆》成爲帝國主義時代的唯一一部小說，書中一種眞正的兄弟情誼繫結著「高貴的和低賤的血統」，其中的基姆是「一個紳士

(Sihib)，一個紳士的兒子」，當他談論起「鎖鏈上的人」、「鐵絲上捆綁著的所有人」時，很正確地說「我們」。這個「我們」——從一個帝國主義信仰者口中說出來是很奇怪的——的意義超過那些爲「無名字，只有一個數字和一個字母」而自豪並守口如瓶的人，超過那些以「頭顱值錢」而自豪的人。使他們成爲同志的因素是作爲人的共同經驗——經受危險、恐懼、驚奇、沒有固定習慣、常常準備改變自己的身份——是生命本身的象徵，例如象徵在印度各地發生的事情，都直接地共享生命，就像是「它在整個印度來回穿梭」，因此「不再一個人在整個生命中獨處」，它本身囿於一個人自己的個性和民族性。一個人從事偉大的遊戲，他會感到好像只有他的生命才有價值，因爲他已被剝奪了一切仍可能被認爲是附屬品的東西。當人斬斷了他同普通社會的一切聯繫，家庭、正常職業、明確的目標、雄心壯志，以及生來即受所屬社羣保護的地位，生命本身就好像處於一種奇異而強烈的純粹之中。「當每一個人都死去時，偉大的遊戲才結束。不是在它之前。」當一個人死了，生命結束了，不是結束在死之前，不是結束在人偶然取得他想要得到的成就。遊戲沒有最終目的，這使它危險地類似於生命本身。

基姆的存在，其魅力正是毫無目的性(purposelessness)。他接受奇怪的任務，不是爲了英國，也不是爲了印度，也不是爲了其他有價值或無價值的原因。爲擴張而擴張、爲權力而權力之類的帝國主義觀念也許於他很合適，但是他並不給予特別的注意，當然也不會去構想這一類的任何計劃。他踏上了一條奇特的道路，「不要去追究爲什麼，只要去做，然後死去」，閉口不問任何問題。他只受到根本無止境的遊戲及其本身的秘密性質的誘惑。這裡的秘密性質看來又像生命的根本神秘性的一種象徵。

無論如何，對於天生的冒險家來說，對於那些憑本性生活於社會和一切政治團體之外的人來說，他們在帝國主義之中發現了一種無休無止的政治遊戲，這不是他們的過錯；他們也許不知道，政治中無止境的遊戲只有

到大災難時才會結束，政治的秘密性質很少終結於任何高貴的事物，只會終結於間諜的卑鄙欺騙。對這些偉大遊戲的參與者有一則笑話說，他們的雇主知道他們想得到什麼，利用他們熱衷於隱匿名姓，而讓他們做普通的間諜工作。但是這種追逐利潤的投資者的勝利是暫時的，而且幾十年之後，他們遇上了極權主義遊戲者——這種遊戲沒有類似利潤這樣的外在動機，而有謀殺式的效率，甚至吞噬了它的資助者——這時他們才知道受了欺騙。

但是在這一切發生之前，帝國主義者們毀滅了像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這樣從冒險家（在很大程度上混合了屠龍者性質）轉變爲特務。後來再未有過這樣一個體面的人如此純粹地從事過秘密政治活動。勞倫斯無畏地以自身做實驗，然後歸來時卻相信自己屬於「失落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他認爲這是因爲「老人東山再起，攫取了我們的勝利」，目的是爲了「根據他們熟悉的先前世界的樣子再造世界」。[88]實際上老人們在這一方面收效甚差，於是將這勝利連同他們的權力，都移交給了同屬「失落的一代」中的其他人，這些人旣不老，也同勞倫斯不一樣。勞倫斯與他們的區別，唯在於他仍然堅持一種早已失去一切客觀基礎，一種只包含私人的、必定是吉訶德式騎士態度的道德觀。

勞倫斯受誘惑去當在阿拉伯的特務，因爲他有強烈的願望要離開一個充斥愚妄尊榮的世界，它的單調沉悶簡直毫無意義，因爲他厭惡這個世界，也厭惡自己。阿拉伯文明中最吸引他的一點是它的「質樸的教理……也明顯包含了一種質樸的道德觀，」它「無需家庭守護神就能使自己變高尚。」[89]在他回到英國文明的環境之後，他最想避開的是過自己的生活，所以他最後令人不可理解地居然報名在英國軍隊員當一名士兵，軍隊明顯地是一個以捨去他的個性以換得人的榮譽的唯一機構。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勞倫斯(T. E. Lawrence)被派去阿拉伯和近東，去喚起人們反抗土耳其人的壓迫，站在英國一邊作戰，這時他眞正投入了這場偉大遊戲。只有當在阿拉伯各部落中間發動起一場民族運動，一

場最終服務於不列顚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他才能達到目的。勞倫斯不得不表現出他的最大興趣是在阿拉伯民族運動，他幹得出色是因爲他自己相信這個運動。但是他後來又不屬於他們，他根本不能夠「想他們所想」和「裝扮他們的性格」。[90]他假裝自己是一個阿拉伯人，這只會失去他的「英國人的自我」(English self)，[90]並且醉心於用完全秘密狀態來達到自我忘卻，而不是用克洛默勛爵可能使用的對落後民族的仁慈統治的明顯正當理由來欺騙自己。他比克洛默年長而且不幸，所以他最大的愉快是扮演一種角色，需要調整他的整個人格，直到他適應偉大遊戲，直到他變成阿拉伯民族運動力量的化身，直到他在和必然大於他自身的各種力量的神秘連結中失去一切天然的虛榮，直到他自發地，而不是連結各種歷史力量，達到一種極度的「輕蔑，不是對別人，而是對他們所做的一切。」

戰爭結束時，當勞倫斯不得不放棄做特務的各種藉口，恢復了他的「英國人的自我」，[90]他「用新的眼光打量著西方，以及它的一切習俗：對我而言，他們毀滅了一切。」[90]沒有哪一種宣傳力量能夠讚美或限制偉大遊戲，這個遊戲提昇了他，使他在二十多歲時就超越國王們和宰相們，因爲他「造就了他們，或者說玩弄了他們」，[94]他帶著一種隱名埋姓的心理糾結回到故鄉，深信他這一生中不可能再做令他滿意的事情了。他從自己的準確知識中得出結論，不是他自己了不起，而是他扮演的角色了不起；是遊戲的結果了不起，而不是他做的事了不起。現在他「不想再做了不起的人了」，他決心「不再做受人尊敬的人」，因此他就「平息了……想爲自己做任何事情的願望。」[90]他曾經是一種力量的幻影，當那種力量、那種功能被拿走時，他變成衆生之中的幻影。他瘋狂地尋找的是想扮演另一種角色，而這正巧是「遊戲」，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和善而又不理解地向他詢問的正是這場遊戲，他的詢問似乎是在另一個世紀說話，不明白一個有如此巨大成就的人爲何不能擁有這些成就。[90]只有另一種角色、另一種作用才足以防止他自己或這個世界將他的事跡同阿拉伯等同起來，用一種新的個

性取代他舊的自我。他不想成爲「阿拉伯的勞倫斯」，因爲從根本上說，他不想在失去舊的自我以後再去重新獲得一個新的自我。他的偉大在於他有熱情去拒絕廉價的妥協，輕而易舉地進入受人尊重的現實，他從來不會不意識到，他一向只是一種功能，只扮演了一個角色，所以「不應該以任何形式從他在阿拉伯所做的一切中受惠。他拒絕了自己掙得的榮譽。他必須放棄根據他的名聲而爲他提供的工作，他也不允許自己利用成功而以勞倫斯的名字替報紙寫文章獲得報酬。」[97]

勞倫斯令人感動的苦難和偉大的全部故事，不是領取薪水的官員和受雇佣的間諜的簡單故事，而是一個眞正的特務或眞正的官員的故事，他眞誠地相信自己進入了——或者說被驅動著進入——歷史必然性的潮流，變成了統治世界的秘密力量的一名官員或特務。「我將我的手推車推進了永恆的潮流，所以它比橫渡或上溯的速度更快。最後我並不是相信阿拉伯的運動：而是認爲它在當時當地是必然的。」[97] 正如克洛默爲了印度而統治埃及，羅德斯爲了進一步擴張而統治南非，勞倫斯的行動是出於某種將來的、不可預測的目的。他從中唯一能感到滿意的來自於一種作用感，或者受某種大運動的歡迎或驅動，但欠缺對某種有限的成就的冷靜良知。他回到倫敦後，處於絕望之中，想找到一種事情來取代這類「自我滿足」，「而只要從摩托車的狂飆中獲得。」[97]勞倫斯雖然並未被一種狂熱運動的意識形態控制，或許因爲他受過良好的教育，不會受制於同時代的迷信，但他早就體驗過那種魅力了，那些迷信是永恆的運動之潮流，而他已經對人類一切可能的責任感到絕望。他投身於其中，除了某種朦朧的莊重和以「正確行事」爲自豪，之外一無所獲。「我至今仍感到迷惑，個人的價值有多大？我猜想是很大的，只要他行事正確。」[97]那麼，這就是西方人眞正的驕傲，他不以自身爲終點，就不再給世界規定法律而做「一件自己的事，或明顯地屬於他自己的事」，[97]而是「只要他正確行事」，他就有機會同「歷史」和「必然」的各種秘密力量結盟——而他自己在其中只不過是一種功能。

當歐洲的暴民發現白色皮膚在非洲可以是一種「可愛的美德」，[112]當英國在印度的征服者變成了統治者，他不再相信法律的普遍有效性，而是相信他的天生的統治和主宰能力。當屠龍手轉變成「高貴血統」的「白人」，或者官僚政治家和間諜，在一種永無止境的運動中玩弄帶著永無止境的未來動機的偉大遊戲；當英國情報局(British Intelligence Services)(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開始吸引英國的最優秀子弟，他們選擇服務於秘密力量，在全世界爲他們祖國的共同利益效勞，就無異於搭起了一座可能發生一切恐怖事件的舞台。許多這樣的人聚在一起，就可能在種族主義基礎上創造一個極權主義政府。在印度的官僚提出了「行政屠殺」，而在南非的官員們則宣布，在白人統治的道路上「不允許有例如人權這類倫理道德上的考慮成爲障礙」。[113]

令人愉快的事實是，儘管不列顛帝國主義的統治墮落到某種卑鄙的程度，在兩次大戰之間，殘酷的程度減輕了，最小限度的人權總是受到了保護。正是這種在普遍的不健康傾向中的小小的改進，爲邱吉爾所說的「清除陛下的帝國」鋪下坦途，最終的結果可能意味著將英國國家改變成一個由英語民族組成的國協。

註釋

❶約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是一篇最能說明在非洲的實際種族經驗的著作。

❷引自卡爾頓・海耶斯，《唯物主義的一代》，338 頁。更壞的例子當屬比利時的利奧波德二世，他應對非洲歷史最黑暗的幾頁負責。「剛果的當地人口從 1890 年的二千萬到四千萬下降到 1911 年的八百五十萬，只有一個人要爲這種暴行受指責——利奧波德二世。」見塞爾溫・詹姆斯(Selwyn James)，《剛果南部》

(*South of the Congo*)(紐約，1943)，305 頁。

❸見卡特希爾,《失去的自治領》, 70 頁, 描述了「由報告所統治的印度政府制度」。

❹重要的是記住，美洲和澳洲的殖民化過程中，曾經殘酷地消滅土著，因爲土著有無數弱點，而「在理解近代南非社會的產生時，有一點很重要，即瞭解到好望角疆界以外的土地，在澳洲人到來之前，早已有居民，居住著眾多的班圖族人。」參見德・基維特(C. W. de Kiewiet),《南非社會與經濟史》(*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Social and Economic*)(牛津，1941)，59 頁。

❺「直到 1884 年，英國政府仍然願意縮小它在南非的統治權力和影響。」德•基維特，前引書，113 頁。

❻下表系 1924 年至 1928 年英國向南非移民和南非向英國移民人數統計，顯示英國人的強烈傾向，離開南非的移民比其他國家的移民更多，除了一年是例外，其餘每年中，英國人離開南非比進入南非的人數多。

年份	英國向南非移民	南非入境移民總數	南非向英國移民	南非出境移民總數
1924	3,724	5,265	5,275	5,857
1925	2,400	5,426	4,019	4,483
1926	4,094	6,575	3,512	3,799
1927	3,681	6,595	3,717	3,988
1928	3,285	7,050	3,409	4,127
總數	17,184	30,911	19,932	22,254

這些數字引自列奧納德・巴恩斯(Leonard Barnes),《非洲的卡利班：對有色人種瘋狂之印象》(*Caliban in Africa: An Impression of Colour Madness*)(費城，1931)，59 頁註。

❼弗勞德，〈南非報刊摘要〉(Leaves from a South African Journal) (1874)，載《一些主要主題的簡要研究》(1867-1882)，第4卷。

❽同上。

❽保羅・里特(Paul Ritter)，《德國殖民地文獻集》(*Kolonien im deutschen Schrifttum*) (1936) 的序言。

❽塞爾伯恩(Selbourne)勛爵在1907年說過:「南非的白人走了一條道路，就像他們之前少數一些民族做過的，但絕少有成功的。」參見基維特，《南非社會與經濟史》，第6章。

❽見基維特，前引書，第3章。

❽「奴隸與霍登托特人一起引起了殖民主義者們的思想與習慣的顯著變化，因為布爾人種族明顯特徵的形成並非只限於氣候和地理。奴隸與乾旱，霍登托特人與孤立，廉價勞動力與土地，共同創造了南非社會的制度與習俗。頑強的荷蘭人和胡格諾教徒的子女們學會了將田裡的勞動者和全部艱難的苦力看作是一個奴隸人種的功能。」(基維特，前引書，21頁。)。

❽見詹姆斯，前引書，28頁。

❽「南非殖民化的眞實歷史描述的不是歐洲人的成長，而是膚色、文化和種族都不同的一個全新的獨特社會，其特點是種族傳統的衝突和不平等的各社會團體的對立。」(基維特，前引書，19頁)

❽基維特，前引書，19頁。

❽「(布爾人的) 社會是反叛的，但不是革命的。」(同上，58頁)

❽「他們很少致力於提高生活水準或使奴隸與僕役階級有更多的機會。因此殖民地的有限財富變成了白人的特權。……南非很早就懂得了，在一個貧困荒涼地區，一個有自我意識的團體通過將種族與膚色的區分轉變為社會歧視與經濟歧視的手段，便可避免生活的最壞結果。」(同上，22頁)

❽問題在於例如「在西印度羣島，像好望角所擁有的這樣大量奴隸就會變成一種財富的標誌和繁榮的源泉」；而「在好望角，奴隸制是不發達經濟的標誌……勞動力的使用既浪費又無效。」(同上) 主要由於這一原因，使巴恩斯 (前引書，

107 頁)與其他許多分析者得出如下結論:「南非因此是一個外國,不僅是指它的立場明確地是非不列顛的,同時也在許多更嚴重的方面,它的存在理由作爲一個有意組織的社會,與基督教國家的立國原則相悖。」

⑲據基維特估計是十六萬人,而詹姆斯估計貧窮白人在 1943 年是五十萬人,約占白人總數的百分之二十。

⑲「貧苦的非洲白人與班圖族一樣生活,主要原因是布爾人的無能,或者頑固地拒絕學習農業科學。布爾人像班圖人一樣,從一個地方遊蕩到另一個地方,耗盡農作土地、獵盡野生動物。」(同上)

⑲「他們的種族是他們優於土著的封號,而從事體力勞動則又同他們的種族賦予的尊嚴相悖。……這樣一種嫌惡在那些最傷風敗俗的人中間卻墮落了,宣稱一種權利。」(基維特,前引書,216 頁)

⑲荷蘭改革教派在布爾人反對基督教好望角宣教團的鬥爭中曾經站在前線。但是在 1944 年,他們進了一步,採用「不准有一個異教聲音」的口號,發起運動,反對布爾人和說英語的人通婚。(1944 年 7 月 18 日《好望角時報》〔*Cape Times*〕社論)

⑲基維特(前引書,181 頁)提及「種族優越論來自《聖經》,而且由於十九世紀強加在達爾文理論之上的流行解釋而強化。」

㉔「舊約中的上帝對於他們,幾乎就像對於猶太人一樣,是他們的一個民族人物。……我還記得在開普敦俱樂部裡的一個場面,一個大膽的英國佬碰巧與三、四個荷蘭人同桌用餐,他冒失地評論說基督不是歐洲人,以法律上說,在南非聯邦他是非法移民者。荷蘭人一聽此話都像觸了電般地幾乎從椅子上跌下來。」(巴恩斯,前引書,33 頁。)

⑲「布爾人農民認爲隔離和貶低土著人是上帝的命令,若以相反意見爭辯,便是犯罪和褻瀆上帝。」(諾曼·班特維奇〔Norman Bentwich〕,〈南非:自領的種族問題〉〔South Africa: Dominion of Racial Problems〕,見《政治季刊》,1939,第 10 卷,第 3 期)

⑲「直到現在,布爾人還認爲宣教團是徹底的叛徒,是支持黑人反對白人的那種

白人。」（葛楚德·米林〔S. Gertrude Millin〕，《羅德斯傳》(*Rhodes*)，倫敦，1933，38 頁。）

㉗「因爲他們幾乎沒有藝術，很少有建築學，根本沒有文學，所以只依靠農莊、《聖經》和鮮血來同土著人和外來人對立。」（基維特，前引書，121 頁）

㉘「眞正的旅居者(Vertrekker)仇恨邊界。當英國殖民政府堅持要在殖民地內的農莊劃定固定邊界時，就好比是從他身上取走了什麼東西。……最好是自己越過邊地，到有水、有自由土地而無英國政府的地方去，那裡不會有法律，白人也不會被拖到法庭上去回答他們的奴僕的抱怨。」（同上，54-55 頁）「大遷移這個殖民歷史上獨特的運動」(58 頁)「是集中居住地政策的失敗。這個地區要求完整的加拿大移民鄉鎮應由十個家庭構成的實踐做法推廣到全南非。這使白人與黑人分地區居住而實行種族隔離變得不可能。……布爾人集體大遷移遠離英國法律可及的範圍，得以同土著居民建立『恰當』的關係。」(56 頁)「後來，集體大遷移的意義不止是抗議；它變成了對英國殖民當局的反叛，成爲二十世紀盎格魯—布爾人種族主義(Anglo-Boer racialism)的基石。」（詹姆斯，前引書，28 頁。）

㉙ 1939 年，南非聯邦的總人口達到九百五十萬，其中七百萬是土著，二百五十萬是歐洲移民。在歐洲移民中間，一百二十五萬是布爾人，英國人占三分之一，還有十萬猶太人。參見諾曼·班特維奇，前引書。

㉚參見弗勞德，前引書，375 頁。

㉛基維特，前引書，119 頁。

㉜弗勞德，前引書，400 頁。

㉝基維特，前引書，119 頁。

㉞「豐富的雨量和青草有利於新西蘭的羊肉，大量廉價的草場有利於澳大利亞的羊毛，肥沃的原野有利於加拿大的小麥，廉價的土著勞動力有利於南非的開礦和工業。」（基維特，前引書，96 頁。）

㉟弗格德，前引書。

㊱「金礦是南非聯邦的生命線……一半人口直接地或間接地靠金礦工業謀生，而

且……政府的一半財政直接或間接地從採金而來。」(基維特，前引書，155 頁)

㊲參見保羅•埃姆登(Paul H. Emden)《英國猶太人傳記系列》(*Jews of Britain, A Series of Biographies*)(倫敦，1944)，〈從開羅到好望角〉(From Cairo to the Cape)一章。

㊲基維特(前引書，138-139 頁)也提到另外「一種情況」：「英國政府任何一次試圖保障租界或改革德蘭士瓦省政府的行動都必定代表了礦業大資本家的利益……無論唐寧街是否明白，英國政府總是支持資本家和金礦投資的利益。」

㊲「布爾戰爭之前的一代英國政治家的遲疑不決和推諉行為，大多出於英國政府在它對土著的責任和對白人社羣的責任之間搖擺不定……但現在布爾戰爭推動了一項對土著人的決策。英國政府爲了和平，許諾在批准幾個前共和國(ex-Repulics)自治之前，不會改變土著人的政治地位。在那個劃時代的決議中，英國政府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作了讓步，在和平談判中讓布爾人領袖取得象徵性的勝利，以掩蓋他們軍事上的失敗。大不列顛放棄對白人與黑人之間的關係實施控制的努力。唐寧街對它的前線邊界讓步了。(基維特，前引書，143-144 頁)

㊵「有一種……完全錯誤的概念，認爲南非生長的白人和說英語的人對於如何對待土著人仍持不同意見。情況正相反，他們意見一致的事情不多，而這件事卻是其中之一。(詹姆斯，前引書，47 頁)

㊵這大多歸因於阿爾弗雷德•貝特(Alfred Beit)的方法，他於 1875 年到南非，替漢堡的一家公司採買鑽石。「直到那時，只有投機家們才是合資開礦的股東。……貝特的方法也吸引了眞正的投資者。」(埃姆登，前引書)

㊵在這一方面，巴爾那托的態度非常典型，當時他的商業與羅德斯財團合併。「巴爾那托認爲這次合併只不過是他想賺錢的一次金融交易。……因此他希望公司應該與政治無所關涉。但是羅德斯不是一個單純的商人。……」這一點說明，當巴爾那托說「如果我受過像塞西爾•羅德斯受過的那種教育，就不會有塞西爾•羅德斯了」，他其實大錯特錯。(同上)

㊸比較第 5 章註㊲。

㊹帝國主義經濟的特點是增加對外投資的利潤，相對地減少對外貿易的利潤。據

估計，英國 1819 年對外貿易和殖民地貿易的總收入只有一千八百萬英鎊，同年的對外投資利潤達九千萬至一億鎊之間。參見霍布森《帝國主義》，53 頁及其後。很明顯，同貿易相比，投資更需要一種有意識的長期開發政策。

45 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上半期，南非的早期猶太移民都是冒險家；商人們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接踵而至，他們之中最有名的人轉向了工業，例如漁業（德帕斯兄弟）和駝鳥養殖業（莫森泰爾〔Mosenthal〕家族）。隨後，他們幾乎被迫進入金伯利鑽石工業，但是他們在這一行中從未達到過像巴爾那托和貝特那樣的名聲。

46 恩斯特・舒爾茲(Ernst Schultz)，〈南非的猶太人問題〉(Die Judenfrage in Süd-Afrika)，載《世界鬥爭》(*Der Weltkampf*)，1938 年 10 月，第 15 卷，178 頁。

47 巴爾那托將他的股份賣給羅德斯，以此進入金伯利俱樂部。「這不是單純的金錢交易」，據說羅德斯是這樣對巴爾那托說的：「我提議將你變爲一位紳士。」巴爾那托享受了八年當紳士的樂趣，隨後自殺了。見米林，前引書，14 頁。

48 「從一名猶太人〔此處指從漢堡來的阿爾弗雷德・貝特〕到另一名猶太人的道路十分容易。羅德斯到英格蘭去見羅斯希爾德，羅斯希爾德認可了他。」（同上）

49 埃默登，前引書。

50 「南非幾乎將它在和平時期的工業能力全集中在黃金生產上。一般投資者將資金投於採金，因爲它回報最快、最大。但是南非也蘊藏豐富的鐵、銅、石棉、錳、錫、鉛、鉑、鉻、雲母、石墨。這些開礦業同煤礦和爲數很少的消費品工廠都被稱爲『次等』工業。投資者對它們興趣有限。金礦公司以及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輕視這些工業的發展。」（詹姆斯，前引書，333 頁。）

51 詹姆斯，前引書，111－112 頁。「政府認識到這是私人雇主可以遵循的一個很好例子……輿論不久就迫使許多雇主改變了雇佣政策。」

52 詹姆斯，前引書，108 頁。

53 在這裡，早先的移居者和金融家之間的明顯區別直到十九世紀末還一直很明顯。例如，索爾・薩羅蒙(Saul Salomon)這位好望角議會的親黑人派出生於

一個十九世紀初移居南非的家族。見埃默登，前引書。

[54]從 1924 年到 1930 年期間，一萬二千三百一十九名猶太人移居南非，而離開這個國家的只有四百六十一人。如果扣除同一時期離開的人數，移民總數僅達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一人的話，這些數字就很有意思了。（參見舒爾茲，前引書）如果將這些數字同註❻的移民一覽表作比較，就會看到，二十年代移民去南非的總人數中，猶太人占了約三分之一，他們同其他「外國人」形成鮮明對比，永久居留在南非了；每年離開南非的人只占出境移民總數不到百分之二。

[55]「狂怒的南非白人民族主義領袖們痛惜一個事實：在南非聯邦內有十萬二千名猶太人；大多數是白領工人、工廠主、店主，或職業人士。猶太人爲建立南非的『次等』工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尤其是在服裝和家具製造業。」（詹姆斯，前引書，46 頁。）

[55]同上，67－68 頁。

[55]在十九世紀，十萬多名印度苦力被運送進那塔爾(Natal)甘蔗種植園。接著到了 1907 年，從事開礦的中國勞工人數達五萬五千名。1910 年，英國政府下令遣返全部中國礦工，1913 年，它禁止從印度和亞洲其他國家的移民入境。1931 年，在南非聯邦仍有十四萬二千名亞洲人，他們的待遇像非洲土著人一樣。（亦見舒爾茲，前引書）

[55]巴恩斯，前引書，13 頁。

[55]基維特，前引書，13 頁。

[55]「當經濟學家們宣布說，高工資是一種賞金，而受保護的勞動是非經濟性質的，那麼對此的答覆就是，如果白人中的不幸者最終在現代生活中發現了一個可靠的立足點，這犧牲就值得。」「但是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保守派經濟學家的聲音就不受人注意了，這不僅僅發生在南非。……一代人看到英國放棄了自由貿易，美國放棄了金本位，第三帝國信奉專制，……南非堅持認爲它的經濟生活應該有組織，以保障白種人的統治地位，這並非嚴重失當。」（基維特，前引書，224 和 225 頁。）

[55]拉德亞•吉卜林，〈第一個水手〉，載《幽默故事集》(*Humorous Tales*)(1891)。

[62]載《白日工作》(*The Day's Work*)(1898)。

[63]勞倫斯·齊特蘭,《克洛默勛爵傳》(1932),16 頁。

[64]克洛默勛爵〈臣屬種族的政府〉,載《愛丁堡評論》,1908 年 1 月。

[65]寇曾勛爵在克洛默紀念碑揭幕儀式上的演講。見齊特蘭,前引書,362 頁。

[66]引自克洛默的長詩。見齊特蘭,前引書,17－18 頁。

[67]引自克洛默勛爵 1882 年的一封信,同上,87 頁。

[68]克洛默勛爵,前引書。

[69]賄賂「在俄國秩序的刺鐵絲網中或許是一種最有人性的慣例了。」見莫賽葉·奧爾金(Moissaye J. Olgin),《俄國革命之靈魂》(*The Soul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紐約,1917。

[70]齊特蘭,前引書,89 頁。

[71]引自克洛默勛爵 1884 年的信,前引書,117 頁。

[72]給格蘭維葉勛爵(Lord Granville)(自由黨成員)的信(1885),同上,219 頁。

[73]引自致羅斯貝雷勛爵(Lord Rosebery)的信(1886)。同上,134 頁。

[74]同上,352 頁。

[75]引自 1893 年致羅斯貝雷勛爵的信。同上,204-205 頁。

[76]同上,192 頁。

[77]引自克洛默 1904 年後在國會的演講。同上,311 頁。

[78]在談判和考慮吞併蘇丹需使用何種行政格局時,克洛默堅持認爲整個事情都應該不受法國的影響;他這樣做並非因爲想確保英國在非洲的壟斷,而是因爲他「極度需要有信心運用宗主國民族行之有效的行政制度」。(引自 1899 年致薩利斯伯里的信。同上,284 頁。)

[79]羅德斯寫了六份遺囑(第一份早在 1877 年即寫成),全都提到「秘密會社」。詳細引文可參見巴西爾·威廉斯(Basil Williams)的《塞西爾·羅德斯傳》(*Cecil Rhodes*),倫敦,1921;以及米林,前引書,128 頁和 331 頁。

[80]眾所周知,羅德斯的「秘密會社」最終改爲非常令人尊敬的「羅德斯學術協會」(Rhodes Scholarship Association),直至今日,不僅英國人,而且所有的「北

歐人」，例如德國人、斯堪的納維亞人、美國人都可以參加。

(81)巴西爾・威廉斯，前引書，51 頁。

(81)米林，前引書，51 頁。

(81)克洛默，前引書。

(81)引自克洛默勛爵 1886 年致羅斯貝雷勛爵的信。見齊特蘭，前引書，134 頁。

(81)「據報告，印度的政治制度……（在英國）很令人懷疑。在印度，審判沒有陪審團，法官是國王付給薪水的奴僕，許多法官被隨意撤換。……有些從事過法律工作的人感到在印度很難成功。他們說：『如果專制暴君和官僚政治家在印度百事順利，那麼將來會不會有人以此來爭辯將類似的制度引進到英國?』」無論如何，印度政府「清楚地知道，它必須在英國的輿論面前爲自己的存在和政策找到理由，它也知道，輿論絕對不會容忍壓迫。」（卡特希爾，前引書，70 頁及 41－42 頁）

(81)哈羅德・尼柯爾森在《寇曾：最後階段 1919－1925》中講了一個故事：「在佛蘭德斯防線後面有一家很大的啤酒廠，有許多大桶，士兵們從戰壕回來，就在裡邊洗澡。有人領寇曾去看這種但丁式的表演。他饒有興趣地觀看那上百位裸體從蒸汽中出來。『我的天!』他說，『我竟一點也不知道原來下層階級的人會有這等白的皮膚。』寇曾自己否認這個故事的眞實性，但還是很喜歡聽。」（47－48 頁）

(81)卡特希爾，前引書，88 頁。

(81)勞倫斯《智慧的七大柱石》（*Seven Pillars of Wisdom*）引論（第 1 版，1926），後來再版時根據蕭伯納的勸告而略去。可參見勞倫斯《書信集》，戴維・伽奈特（David Garnett）主編（紐約，1939），262 頁。

(81)引自 1918 年的一封信。《書信集》，244 頁。

(81)勞倫斯，《智慧的七大柱石》，1938 年版，第 1 章。

(81)同上。

(81)這一過程如何令人懷疑，如何困難，由下面一則軼事作了描述：「勞倫斯受邀請出席克拉里奇（Claridge）家的晚宴以及晚宴後在哈利・林賽夫人（Mrs.

Harry Lindsay)家的晚會。他躲過了晚宴，但是穿著阿拉伯人的服裝去赴晚會。」這事發生在 1919 年，見《書信集》，371 頁。

93勞倫斯，前引書，第 1 章。

94勞倫斯在 1929 年寫道：「任何一個像我那樣快速上升……並且在世界的上層看到這麼多內幕的人，都可能失去抱負，厭倦於普通的行動。我不是國王或者宰相，但是我造就了他們，或者說玩弄了他們，自那以後，在這一方面我就沒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了。」(《書信集》，616 頁)

93同上。244、447 及 450 頁。尤可參照 1918 年的信(244 頁)以及 1923 年(447 頁)和 1928 年(616 頁)兩封致蕭伯納的信。

93蕭伯納在 1928 年問勞倫斯「你的遊戲究竟是什麼?」並且勸告說，他在軍隊裡的角色或者他在尋找的一份守夜人工作(他認爲可以「有許多良好的關係」)不太正經。

93伽奈特，前引書，264 頁。

93《書信集》，1930 年的信，693 頁。

93同上。1924 年的信，456 頁。

93同上。693 頁。

93勞倫斯，前引書，第 1 章。

93米林，前引書，15 頁。

93此話是一個南非公民、英國人的後裔托瑪斯·瓦特(Sir Thomas Watt)說的。見巴恩斯，前引書，230 頁。



第八章
大陸帝國主義：各種「泛一」運動

納粹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大多（分別地）成因於泛日耳曼主義和泛斯拉夫主義，其他意識形態和政治運動倒在其次。這在外交政策領域最爲明顯，納粹德國和蘇維埃俄國的策略緊緊追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和期間各種泛一運動勾勒的各種著名的征服計劃，極權主義的各種目標常常錯誤地導致追求一些永久的德國利益或俄國利益。而希特勒與斯大林都不承認他們在發展自己的統治方法時受惠於帝國主義，都不敢承認他們受惠於各種泛一運動的意識形態，或者是模仿了它們的口號。❶

各種泛一運動的誕生並不與帝國主義的誕生同時；在 1870 年前後，泛斯拉夫主義早已從模糊混亂的斯拉夫文化優越論(Slavophiles)中產生，❷而泛日耳曼情緒早在十九世紀中期已在奧地利流行。但是它們集中成爲運動，抓住了廣大民眾階層的想像力，那只是在八十年代西方各國帝國主義擴張成功時候的事了。中歐與東歐諸國沒有殖民地，也很少有向海外擴張的希望，於是就認定它們「像其他偉大的民族一樣，有同樣的擴張權利，假如(它們)不被承認這種海外擴張的可能，(它們就會)被迫在歐洲這樣做。」❷泛日耳曼主義者和泛斯拉夫主義者一致同意，生在「大陸國家」，身爲「大陸民族」，它們必須在大陸尋找殖民地，❹從權力中心開始，在地緣上連續擴張，❺反對「英國的觀念……表達出來是：我要統治海洋。而俄國的觀念是：我要統治陸地，」❺最終「陸地比海洋優越……陸權意義勝過海權……，」就變得很明顯了。❷

不同於海外帝國主義，大陸帝國主義的重要性，主要在於它那一體擴張的概念不允許殖民地和宗主國的方法和制度有地理的距離，因此它不求

那種自食其果的模式，而使自己與一切結果都留在歐洲。事實上，大陸帝國主義又是從本土開始的。❽即使它同海外帝國主義一樣蔑視民族國家的狹隘性，它反對的並不是經濟方式，經濟畢竟頻繁地表達出民族的正式需要，作爲一種「擴大的部族意識」(enlarged tribal consciousness)❽，它假定應該聯合同一民俗起源的民族，無須多慮它們的歷史和偶然定居的地方。❽因此，大陸帝國主義從一開始起就十分接近民族觀念，熱情地吸收種族思想的傳統，❽而極少依賴具體經驗。它的種族概念基礎完全是意識形態化的，而且比一向以正規經驗爲基礎的海外帝國主義論者所表達的相同理論發展得更快，成爲一種便利的政治武器。

在關於帝國主義的討論中，各種泛一運動一般都很引人注目。它們的大陸帝國夢想在更能獲得實際結果的海外擴張面前黯然失色，它們對經濟缺乏興趣，⓬這和先前的帝國主義的巨額利潤又形成了奇怪的對比。再者，在這樣一個幾乎每一個人都相信政治與經濟多多少少是同一回事的時代，很容易忽略兩種帝國主義之間的相同性與實質性的區別。各種泛一運動的主要人物與西方帝國主義者都同樣有對外交政策問題的意識，而那是已經被舊的民族國家的統治集團所忘卻的。❽他們對知識分子的影響甚至更長久——俄國知識分子(除了極少數人是例外)都是泛斯拉夫主義傾向的，而泛日耳曼主義在奧地利幾乎是以學生運動開始的。❽它們和西方各國更受人尊重的帝國主義之間的主要區別是，缺少資本主義的支持；它們的擴張企圖不曾、也不可能以輸出多餘資本和多餘人力來開始，因爲歐洲並不提供這兩方面殖民機會。所以在它們的領袖中間，沒有商人，也很少有冒險家，只有自由職業者、教師和政府官員。❽

海外帝國主義儘管有反民族傾向，但是也成功地使民族國家的古老機制注入了新的生命，而大陸帝國主義卻依然曖昧地敵視一切既存的政體。所以，它的一般情緒具有更多的反叛性質，它的領袖們更喜愛使用變革性的語言。海外帝國主義爲一切階級的殘餘分子提供了充足的萬應靈藥，而大

陸帝國主義除了一種意識形態和一場運動以外，提供不出什麼東西。然而，當人在羣體瓦解、社會分崩離析之時願以任何代價尋找歸屬，在這樣的時代，對於爲政治行動尋找解開歷史之謎的關鍵來說，大陸帝國主義所提供的東西已經十分足夠了。同樣地，在黑皮膚和褐色皮膚的環境中間，白皮膚的明顯區別是一種優勢，這是很容易理解的，與此相仿的情形還有東方人和西方人之間在想像中的區別，亞利安人與非亞利安人的區別亦是如此。關鍵在於一種相當複雜的意識形態與一種不推動直接利益的組織，比可見的利益和普通的信念更能夠吸引人。

各種泛一運動儘管沒有成功，但是和海外帝國主義相比，它對暴民的語言煽動性魅力從一開始起就產生了更大的吸引力。這種普遍魅力經受過明顯的失敗，計劃經常變更，後來又在目標同樣模糊、屈從日復一日變化的政治路線的極權主義團體面前黯然失色。使各種泛一運動成員凝聚在一起的大多是一種普遍情緒，而不是一種淸晰界定的目標。的確，海外帝國主義也將擴張置於任何征服計劃之上，所以不放過可以輕而易舉地擁有每一塊土地的機會。但是，無論輸出剩餘資金怎樣反覆無常，它能用於界定隨後發生的擴張；而各種泛一運動的目標中甚至缺少人類計劃和地域限制中相當無政府主義式的成分。然而，儘管它們沒有征服世界的具體計劃，它們仍然能夠產生包容一切的全面控制，觸及和囊括一切人類問題，如同陀斯妥也夫斯基曾經說過的「泛人道主義」(pan-humanism)的情緒。⑮

暴民與資本之間的帝國主義聯盟的發軔大多出於商界代表——只有南非的情況例外，那裡很早就出現了明確的暴民政策。另一方面，在各種泛一運動中，發軔之初總是排斥暴民，當時（以及現在）都是由某種類型的知識分子領導的。他們仍然缺乏統治全世界的野心，他們甚至也不夢想絕對主宰世界的可能性。但是他們懂得如何組織暴民，而且他們意識到可以摻進種族觀念的組織手段，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手段和宣傳手段。它們的意義只顯現在外交政策——日耳曼化的中歐或俄羅斯化的東歐與南歐

——比較溫和之理論的表面，用於作爲納粹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征服世界計劃的起點。⑰德意志帝國疆土以外的「日耳曼各民族」和神聖俄羅斯以外的「我們的斯拉夫小兄弟」造成一股民族自決權的舒適煙幕，也產生了輕而易舉地進一步擴張的基石。但是，更重要的事實是，極權主義政府繼承了一種神聖性的氣氛：它們只消喚起往昔的「神聖俄羅斯」或「神聖羅馬帝國」記憶，就能在斯拉夫或日耳曼知識分子中間喚醒各種各樣迷信。⑰僞神秘的妄言加上無數隨心所欲的歷史記憶，提供了一種情感上的魅力，似乎在深度和廣度上超越了民族主義的侷限性。從中生長出一種新的民族主義感情，它的暴力是一種出色的動力，發動暴民羣眾，足以取代舊的民族愛國主義，成爲一種情感中心。

這種新型的部族民族主義(tribal nationalism)或多或少帶有中歐和東歐各國和各民族的特點，同西方的民族主義過分行爲在內容和意義兩方面十分不同——儘管不是在暴力方面。沙文主義——現在一般認爲它同世紀轉折時期莫哈與巴黑的「完整的民族主義」(nationalisme intégral)有關，它浪漫式地美化過去，病態地崇拜死亡——即使以最狂熱的形式表現，也不會認爲，法國血統的人如果生於另一個國家，在那裡長大，毫無法國語言和文化知識，僅僅由於某些肉體和靈魂的神秘特性，就會是「天生的法國人」。只有根據「擴大的部族意識」，才使那種奇特的民族認同伴隨著某人的靈魂一起出現，那種轉向內心的自豪不再只同公共事務有關，而是占據了私人生活的每一個方面，直到「每一個眞正的波蘭人的私人生活……就是波蘭的公共生活。」⑰

用心理學的術語來說，即使暴力傾向最嚴重的沙文主義與這種部族民族主義之間的主要區別是，一種是外向型的，關心民族可見的精神和物質成就，而另一種即使以最溫和的形式（例如德國青年運動）也是內向型的，集中於個人自我的靈魂，將它看作一般民族特性的體現。沙文主義神話仍然指向過去眞正存在過的某種事物（例如「完整的民族主義」），並且試圖

將它提高到超越人類控制的範圍；部族主義卻從不存在的假神秘因素出發，建議在將來充分地理解它。要認出它來很容易，只要看它那無比狂傲、天生的自我中心，敢於用高昇的內在特性碼尺去衡量一個民族的過去與現在，並且不可避免地否定其可見的存在、傳統、制度與文化。

從政治角度來說，部族民族主義總是堅持認爲它自己的民族被「全世界的敵人」包圍著，「獨自對付一切」，根本的差別存在於這個民族與其他一切民族之間。它宣稱自己的民族是獨特的、具有個性的，其他民族無法與之較量，並且在它用人類同源的可能性來摧毀人性之前很久，就已經從理論上否定了這個可能性。

(一)部族的民族主義

正如大陸帝國主義是從那些野心受挫、卻又在八十年代的突然擴張中未曾得到自己一份的國家中產生的一樣，部族主義作爲一種民族主義，看來是從那些並未參加民族解放運動、並未獲得一個民族國家尊嚴的民族中產生的。當兩種失敗結合，就像在多民族的奧匈帝國和俄國，各種泛一運動自然地找到了最肥沃的土壤。再者，因爲雙重君主國的奧匈帝國對斯拉夫和日耳曼的民族統一主義深懷惡意，所以泛斯拉夫主義和泛日耳曼主義從一開始起就想集中摧毀它，於是奧匈帝國變成了各種泛一運動的眞正中心。俄國泛斯拉夫主義分子們早在 1870 年就宣稱，建立泛斯拉夫帝國的最好起點是瓦解奧地利，⑳而奧地利的泛日耳曼主義者十分暴烈地反對自己的政府，連德國的泛德聯盟也常常抱怨奧地利兄弟運動(Austrian brother movement)「太誇張了」。⑳日耳曼設想的中歐經濟統一藍圖是：在德國領導下，與德國泛日耳曼主義者的大陸帝國計劃同行，當奧地利的泛日耳曼主義者一掌權，立即改變成一種結構，成爲「全世界日耳曼人的生活中心，同其他一切日耳曼國家聯盟。」⑳

不言自喻，泛斯拉夫主義的擴張主義傾向使沙皇感到難堪，正如奧地利的泛日耳曼主義者們自發地忠於德意志帝國、不忠於奧地利使俾斯麥難堪一樣。㉓因爲無論民族情緒偶爾多麼高漲，無論民族主義主張在危急時候變得如何奇特，只要它們囿於一塊定界的國土，受一個有限的民族國家的自豪感控制，就只能繼續留在界限內，而這種界限立即被各種泛一運動的部族主義一步跨過。

從各種泛一運動的全新的反猶主義觀點中可以充分看出它們的現代性。受壓迫的少數民族（例如奧地利的斯拉夫人，沙皇俄國的波蘭人）由於和政府的衝突，更容易發現猶太社羣同歐洲各個民族國家之間的隱秘關係，而這一發現又容易導致更加根深蒂固的敵視。只要和國家的對抗並不等同於缺乏愛國熱情，例如在波蘭，波蘭人的忠誠並非忠誠於沙皇，或者在奧地利，日耳曼人視俾斯麥爲他們本民族的偉大人物，那麼在這些地方，反猶主義很可能採取更多暴力的形式，因爲猶太人在當時不僅顯現爲一種國家的壓迫機器的代表，而且也是外來的壓迫者。而其少數民族地位，使反猶主義在各種泛一運動中的根本作用，被奧地利泛日耳曼主義的主要代表肖納勒解釋爲微不足道，當他早年仍還是自由黨成員時，就意識到哈布斯堡寡頭統治與羅斯希爾德家族統治奧地利鐵路系統之間的關聯。㉓僅此事本身還不足以使他宣布，「我們泛日耳曼主義者認爲反猶主義是我們民族意識形態的主幹，」㉓而其他任何類似情形也不足以引起泛斯拉主義作家羅札諾夫(Vassiliff Rozanov)妄稱「在俄國生活中沒有一個問題不會和『如何對付猶太人』這樣的問題相隨，一如『逗號』和句子的相伴。」㉓

反猶主義作爲整體生活觀和世界觀的中心而突然出現的線索——與在法國德雷富斯事件中的純粹政治作用，或德國斯多克爾運動(Stoecker movement)中作爲宣傳工具明顯地不同——不在於政治事實和政治環境，而在於部族主義的性質。各種泛一運動的反猶主義的眞正意義在於對猶太人的仇恨第一次脫離一切同猶太人有關的實際經驗——政治的、社會的、或

經濟的——而只遵循一種意識形態的特殊邏輯。

部族民族主義是大陸帝國主義背後的驅動力，與充分發展的西方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毫無共同之處。從法國革命到十九世紀中發展起來的民族國家，要求有廣泛代表性和民族尊嚴，這是兩種因素結合的結果，這兩種因素在十八世紀仍是分離的，並且後來在俄國和奧匈帝國繼續分離著：這就是民族性(nationality)和國家。民族進入歷史舞台，並且獲得解放，這是在各民族獲得了關於自身是文化和歷史的整體性的意識之時，意識到它們的領土是一塊永久的家園，而歷史在此留下了明顯蹤跡，它的文明開化是祖先共同勞動的產物，它的未來將取決於一種共同的文明進程。凡是產生民族國家的地方，對外移民就停止了，而另一方面，在東歐和南歐地區，民族國家卻建立不起來，因爲它們不可能求助於根深蒂固的農民階級。㉗從社會學角度分析，民族國家是歐洲解放了的農民階級的政體，這就是直到上世紀末以前這些國家的軍隊仍然保有地位的原因，也就是說，只要它們是眞正代表農村階級的。馬克思曾經指出過：「軍隊是小園地農民『攸關榮譽』的事：正是他們自己變成了主義，在國外保衛他們新得到的財產。……軍裝是他們的國服，戰爭是他們的詩；土地份額是他們的祖國，而愛國主義變成了財產的理想形式。」㉗西方民族主義在普遍徵兵中達到頂點，這是札根於土地**但又**獲得解放的農民階級的產物。

對民族屬性的意識是一種比較晚近的發展，而國家結構卻產生於幾個世紀來的君主專制和受啓蒙的專制政治。無論是以新的共和制度形式，還是立憲君主制度形式，國家稟承的最高職能是保護它的領土上的一切居民，無論他們屬於哪一個民族，並且必須要起至高無上的法律機構的作用。民族國家的悲劇在於民眾的日益高漲的民族意識干擾了這些功能。國家在人民意志(the will of the people)的名義下被迫承認，只有「民族的成員」才能成爲公民，完全的民權與政治權利只給予那些憑種族淵源和出生事實

而屬於本民族羣體的人。這意味著國家從法律的執行者轉變成了民族的工具。

民族征服了國家，㉙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君主專制的垮台與各個階級的新發展提供的條件。君主專制應爲了作爲一個整體的民族利益服務，是這樣一種共同利益存在的明顯代表和證明。開明的專制政治基礎是羅昂(Henri Rohan)所說的「國王指揮民眾，利益指揮國王」；㉚隨著國王被廢黜和民眾獲得主權，這種共同利益常常處於被取代的危險，即階級利益的長期衝突、爭奪對國家機器的控制權，亦即長期內戰。一個民族國家在沒有一位君主來象徵他們的根本一致性時，公民之間唯一剩下的聯繫看來只有民族關係了，亦即共同的種族起源。因此在這樣一個時代，每一個階級和居民中的每一個部分都受到階級利益或羣體利益的統制，民族的整體利益假定是由一種共同的種族淵源來保證的，它以民族主義來充滿感情地表現自己。

國家與民族之間的秘密衝突在近代民族國家誕生之時暴露出來，這就是法國革命將人權宣言與民族主權的要求結合在一起時的情況。同樣重要的兩種權利被同時宣布爲天經地義——一切人的生來不可分割的權利**和**特定民族與生俱來的特定權利，同一個民族同時被宣布爲服從法律，而法律是來自於人權**與**主權，亦即不受普遍法則的束縛，不承認有比它本身更高的事物。㉛這一矛盾的實際結果是，從那時起，人權只有作爲民族權利時才受到保護和強化，國家作爲一種機構，它的最高任務是保護和保障人作爲人的權利、作爲公民的權利，以及作爲民族成員的權利，而國家則失去了它的合法的、理性的外表，可以被浪漫主義者們解釋爲一個「民族靈魂」的模糊代表，假設它通過自己的存在這一事實而超越或高於法律。於是，民族主權失去了它原先民族自由的內涵，而被一種無法無天而獨斷的僞神秘氣氛包圍著。

民族主義實質上是國家轉化爲民族的工具、公民與民族成員同一化的

表現。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取決於階級鬥爭的事實，它代替了以往的封建秩序。社會上盛行自由派的個人主義(liberal individualism)，錯誤地相信國家只統治個人，而事實上國家統治的是各個階級；自由個人主義眼中的國家是一種最高的個人，餘下的個人必須在它面前俯首。看來是民族的意志使國家保護自己不發生社會分化，同時保證自己有可能在分化狀態下仍是一個國家。與此相同的任務是，國家必須強化先前的一切集中化傾向；只有一種強有力的集中統治來壟斷一切暴力工具和可能的權力工具，才能平衡在一個受階級支配的社會裡時常產生的各種離心力量。然後，民族主義變成了寶貴的水泥，將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和一個分化的社會凝結在一起，事實證明它是民族國家裡的個人之間唯一有效的聯結手段。

民族主義一向保持著這種對政府的最密切的忠誠，從不完全失去它的功能，一方面在民族和國家之間保持一種不穩定的平衡，另一方面在分子化的社會中保持民族成員之間的平衡。民族國家的原公民經常蔑視歸化的公民，後者不是根據出生、而是根據法律，不是從民族、而是從國家得到他們的權利；但是他們從不過分地提出泛日耳曼主義式的「外國人(Staatsfremde)」和「外族人」(Volksfremde)的區別，後者後來被吸收進納粹的立法。就國家而言，即使遭到扭曲，仍然是合法的機構；民族主義受到某種法律的控制，它產生自民族成員對他們的領土的認同，就這一點而言，它受制於有限的疆界。

有些民族對民族問題的反應與此大不相同，對於它們來說，民族性尚未發展到能夠清楚地表達種族意識；它們的語言尚未發展到越過方言階段——一切歐洲語言在變得適合於文化目的之前，都經歷過這個階段；它們的農民階級都還未在國內深深札根，還未達到獲得解放的邊緣；結果對它們來說，民族特質似乎更像一種小小的私人事情，內在於其人格，而不是公眾關注的事情，不是文明。㉜如果它們想要達到西方各民族的那種民族自豪，但是它們沒有國土，沒有國家，無法顯示歷史成就，只能指向自身，

說得好一點是它們有語言——似乎語言本身早已是一種成就，說得差一點，是指它們的斯拉夫的、日耳曼的、或者上帝才知道是哪一種靈魂。然而在一個天眞地假設人民(peoples)實際上就是民族(nations)的時代，幾乎沒有別的東西留給奧匈帝國、沙皇俄國、或巴爾幹半島國家裡受壓迫的民眾，在這些國家裡，不存在實現西方民族那種「人民—領土—國家」三位一體的條件，千百年來，它們的邊界經常變動，居民在不斷地遷移。羣眾並無絲毫愛國心理，也無起碼的對一個共同的、有限的社羣的責任觀念。這就是從波羅的海到亞得里亞海的「混合居民地帶」(belt of mixed populations)（馬卡特尼〔Macartney〕語）的麻煩之處，而在奧匈帝國的雙重君主制裡表現得最明顯。

部族民族主義產生於這種無根的氛圍。它廣泛散布在奧匈帝國各民族，以及儘管在一個較高層次上、但處於同樣氛圍中的沙皇俄國的那些痛苦的知識分子中間。無根是「擴大的部族意識」的眞正來源，實際上意味著這些民族的成員沒有特定的家園，而只有將他們「部族」的其他成員偶然居住的地方感覺爲家園。肖納勒說：「憑我們的直覺……我們的向心力不是朝著維也納，而是朝著日耳曼人可以居住的任何地方。」㉝各種泛—運動的標誌是它們甚至從不嘗試取得民族解放，而是在其擴張夢想中同時超越民族社羣的狹隘邊界，並且宣布作爲政治因素的種族社羣，哪怕它的成員們分散在全世界。不像一向以探索自己民族歷史作爲開端的弱小民族的眞正的民族解放運動，它們並不停下來思考歷史，而是將它們的社羣基礎投射在一種運動假設要邁向的未來。

分布在東歐和南歐一切受壓迫民族中的部族民族主義發展成了一種新的組織形式，即各種泛—運動，將民族母國（德國和俄國）同侵占地區分散居住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視同一體。㉞海外帝國主義滿足於相對的權威、一種民族使命、或一種白種人的負擔，相比之下，各種泛—運動從一開始就宣布自己是特選民族、民族主義常常被形容爲宗教的一種情感代用

品，但是，只有各種泛一運動的部族主義才提供了一種新的宗教理論和新的神聖概念。並非沙皇在希臘正教中的作用和地位使俄國的泛斯拉夫主義分子肯定俄羅斯民族的基督教性質，肯定他們的存在，像陀斯妥也夫斯基所說的，「各民族中的聖克里斯多夫」將上帝直接地帶進這個世界的事務。[35]正是由於宣稱自己是「現代的眞正神聖民族」，[35]才使泛斯拉夫主義者們放棄了他們早年的自由傾向，儘管遇到政府的反對，有時甚至是迫害，他們仍然變成了神聖俄羅斯的堅強衛士。

奧地利泛日耳曼主義者同樣宣稱自己是上帝特選的，雖然他們過去也是自由派，但是他們仍然反宗教，並且變成了反基督教主義者。當自稱是肖納勒信徒的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說:「全能的上帝造就了我們民族。我們保衛民族的生存，就是保衛上帝的成就，」來自另一邊的一位泛斯拉夫主義的追隨者卻同樣眞誠地說過:「德國魔鬼不僅是我們的敵人，也是上帝的敵人。」[35]這兩種新近的公式不是出於當時的需要，而且這類瘋狂信念也並不是簡單地濫用宗教語言；它背後是一種確確實實的神學，使早期各種泛一運動有了銳氣，也對現代極權主義運動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各種泛一運動鼓吹它們自己民族的神聖起源，以反對猶太—基督教(Jewish-Christian)對人的神聖起源的信念。根據他們的說法，人必定屬於某個民族，只有通過作爲一個民族的成員，才能間接地獲得他的神聖起源。因此，個人只有當他屬於一個挑選出來作爲有神聖起源的民族時，才具有他的神聖價值。而當他決定改變其民族認同時，他就放棄了神聖的價值，他在哪一種情況下切斷了一切聯繫，他就在哪一種情況下放棄了神聖的種族淵源，墜入形而上概念的無家可歸(metaphysical homelessness)境地。這一觀念有政治上的雙重有利之處。它使民族性具有永恆性質，不再會被歷史改變，無論什麼情況發生於某個民族——向外移民、征服、散居各地。但是，更加直接的衝擊是在自己那個民族的神聖起源同其他一切非神聖民族之間的絕對對比之中，民族成員個人之間的一切差別都消失了，無論是社

會差別、經濟差別、還是心理差別。神聖種族起源將一個民族改變成了同一的「上帝特選」的羣衆，一羣傲慢的機器人。[39]

這種理論的荒謬同它在政治上的無用一樣明顯。上帝既沒有創造人——人明顯地起源於生殖，也沒有創造各個民族——民族的誕生是人類組織起來的結果。人因他們的天生淵源、不同的組織、歷史的命運而不平等。他們的平等只是一種權利的平等，亦即人類目的之平等；而在人類目的平等的背後，根據猶太—基督教的傳統，存在著另一種平等，表現爲超越人類歷史、人性和人類目標的一種共同淵源觀念——這種共同淵源來自於神秘的、無可界說的「人」，只有他是上帝創造的。這種神聖起源是形而上的觀念，政治平等的目的——在地球上建立人類的目的——以這種觀念爲基礎。十九世紀的實證論和進步論歪曲了這種人類平等的目的，著手顯示無法顯示的東西，即人天生平等，差異只在歷史和環境，因此他們不是靠權利，而是靠環境和教育來實現平等。民族主義及其「民族使命」的觀念將人類是各民族的大家庭這樣一種民族觀念歪曲爲一種層級結構，其中歷史差異和組織差異被錯誤地解釋成出於自然起源中的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種族主義否定人類共同起源，否認建立人性的共同目的，提倡一個民族相對於其他各民族的神聖起源觀念，因此用神聖的永恆性和終極性（finality）的僞神秘烏雲掩蓋了人類的努力所取得的暫時的、變化不定的結果。

這種終極性就是各種泛—運動的哲學和種族觀念之間的共同特性，用神學的術語解釋了它們內在的密切關係。從政治角度來看，認爲一個民族的起源究竟是上帝還是自然，這並不重要；在這兩種情況下，無論怎樣抬高自己的民族，各民族都轉化爲動物種類，所以一個俄羅斯人不同於一個日耳曼人，就像狼不同於狐狸一樣。在一個「神聖民族」（divine people）居住的世界裡，它天生是其他一切弱小族類的統治者，或天生是其他一切更強大的族類的犧牲品。只有動物王國的法則才可能適用於它的政治命運。

各種泛—運動的以一個民族爲「神聖起源」的部族主義觀念，它的訴

求很大部分在於它對自由派的個人主義、㊵人類的理想和人的尊嚴感的蔑視。如果個人將他的價值只歸因於偶然生而爲日耳曼人或俄羅斯人這樣一個事實，那麼就毫無人類尊嚴可言；相反，有一種新的凝聚性，即民族一切成員之間的相互依賴感，的確很能夠緩和現代人正確感受到的恐懼，尤其是在一個分子化的社會中，孤立的個人們無法受到純粹人數眾多和強加的一致凝聚性的保護之時。同樣地，「混合居民地帶」比歐洲其他地區更易暴露在歷史風暴面前，在西方傳統中札根較淺，比歐洲其他各民族更早地在關於人的共同起源的人類理想和猶太—基督教信念面前感到恐懼。他們並不懷藏「高尚的野蠻人」的幻覺，因爲他們無須研究食人者的習俗就知道潛藏著的惡。各民族之間越是相互了解，就越是不想承認其他民族與它們同等，就越是不追求人性的理想。

部族孤立的訴求和做支配種族的野心，部分地起因於一種直覺，無論出於宗教理想還是人文主義的理想，總感覺到人類必須共擔責任。㊶地理距離的縮短使這一點成爲首要的政治現實。㊷它也使理想化地談論人類和人的尊嚴成了過去的事情，僅僅是因爲所有這些美好的、夢幻般的概念帶著時代賦與榮耀的傳統突然背負了一種可怕的無時間性。即使堅持認爲一切人都有罪——當然也會出現在倡言「人類」(mankind)的自由派領導者的詞彙之中——也根本無能力理解一項這個民族非常懂得的事實，即關於人性的觀念清除了一切多愁善感，得到了一種嚴重的後果，人必須以某種形式爲人所犯下的一切罪行承擔責任，每一個民族最終都會被迫回應其他一切民族所作的惡。

部族主義和種族主義都是逃避這種預定的共同責任時非常現實的（也是非常有破壞性的）道路。它們形而上的無根性很符合最早發現的一些民族失去領土的實情，同樣十分適應現代城市中不斷變動的羣眾的需要，也因此立即被極權主義抓在手中；在蘇維埃俄國，由於這些理論本身具有巨大的單獨價值(isolating value)，所以即使是布爾什維克黨人採用的最偉

大的反民族理論——馬克思主義——來抵制它們，而只是重新宣傳泛斯拉夫主義。㊸

的確，奧匈帝國和沙皇俄國的統治制度是部族民族主義的一種眞實教育，它的基本立場就是壓迫各民族。在俄國，這種壓迫就是同樣也壓迫俄羅斯人民的官僚政治壟斷，結果只有俄國知識分子變成泛斯拉夫主義者。相反，雙重君主的奧匈帝國統治它那些經常製造麻煩的民族的手段是給它們以足夠的自由去壓迫其他民族，結果使它們變成各種泛—運動意識形態的眞正的羣眾基礎。哈布斯堡家族在十九世紀得以繼續生存的秘密在於謹愼地平衡和支持超民族的機器，造成相互對立，讓日耳曼人剝削捷克人，匈牙利人剝削斯洛伐克人，波蘭人剝削魯西民安人，等等。這樣便理所當然地使一個民族以犧牲其他民族的利益來取得自己的民族地位，而如果壓迫來自自己的國家政府，則十分樂於被剝奪自由。

這兩種泛—運動的發展並未得到俄國或德國政府的支持。但這並不能阻止奧地利泛—運動信徒投入對奧地利政府的反叛。正是這種根據高度反叛的精神來教育羣眾的可能性，爲奧地利各種泛—運動提供了他們在德國和俄國本土一向缺乏的可資利用的廣泛支持。引誘德國工人攻擊德國資產階級，比引誘他們攻擊政府要容易得多，同樣地，在俄國「喚起農民反對紳士階級要比喚起他們反對沙皇要容易得多」。㊸德國工人與俄國農民之間的差異無疑是巨大的；前者視一位不太可愛的君主爲民族統一的象徵，後者卻認爲他們的政府首腦是上帝在大地上的眞正代表。但是，俄國和德國的政府都不像奧地利政府那樣軟弱，所以上述差異同這一事實相比就無足輕重了，亦即奧地利政府的權威不彰，使各種泛—運動在革命動盪之中能奉其爲政治首都。唯有在奧地利，各種革命的動力才能在各種泛—運動中找到天然的發洩口。分而治之(divide et impera)的手段並不能很成功地消除民族情感的分裂傾向，但它十分成功地引起了優越心理和普遍的反叛

情緒。

一切泛—運動的理論都從頭到尾貫穿著對國家機構的敵視態度。斯拉夫文化優越論者反對國家，被正確地描述爲「完全不同於從官方的民族主義體系中可以找到的任何事物」；㊺國家的性質被看作是和人民分離的。斯拉夫優越論可見於俄羅斯民族對國家的漠不關心，也在於俄羅斯人使自己和政府分離。這就是斯拉夫文化優越論者稱俄羅斯人是一個「沒有國家的民族」(stateless people)時的意義所指，這就使這些「自由派人士」有可能使自己和專制君主和解；這和專制君主要求人民不「干涉國家權力」是一致的，也就是同那種權力的絕對性一致。㊺泛日耳曼主義者們在政治方面比較明確地堅持民族利益高於國家利益，㊺通常提出「世界政治超越國家架構」，歷史過程中唯一的永恆因素是民族，而不是國家；因此，民族的需要雖因環境而變化，但是在任何時候都應該決定國家的行動。㊺但是在德國和俄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爲止，只聽到唱高調，而在奧地利卻有實際成果，奧匈帝國的衰亡導致一種對政府的長久嘲弄態度。

假如說，泛—運動的領導者都是反動者或「反革命者」，那將是一種嚴重錯誤。雖然他們通常對社會問題不太感興趣，但是他們決不會錯誤地贊同資本主義剝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屬於——其中有不少人後來一直屬於——自由派的進步黨派。從某種意義上說，泛德聯盟「體現了羣眾控制外交事務的一種眞正嘗試。它堅定地相信一種帶有強烈民族思想的輿論的效率……並且通過普遍需求的力量來倡始國家政策。」㊺在泛—運動中組織起來、受到種族意識煽動的是暴民，而人民以革命行動產生憲法政府，他們的眞正代表當時只能在工人之中找到，暴民與民眾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其「擴大的部族意識」，以及它缺乏愛國熱情的顯著特點，都使它看上去很像一個「種族」。

同泛日耳曼主義相比，泛斯拉夫主義由全體俄羅斯知識分子組成並傳布開來。在政治計劃方面，它很少連貫性，在組織形式方面，它也沒有明

確的跡象，在相當長時間裡，它始終在一個很高的層次上停留在文學的成熟和哲學沉思上。當羅札諾夫沉思猶太教和基督教在性能力方面的神秘差別，得出令人奇怪的結論，說猶太人「同這種能力結合，基督徒們同這種能力分離」，[50]奧地利泛日耳曼主義的領袖興高采烈地發現了一些手段，可以用「宣傳歌曲、明信片、印有肖納勒頭像的啤酒杯、手杖和火柴盒來吸引小人物們的興趣。」[50]而泛斯拉夫主義者們也最終「拋棄了謝林和黑格爾，用自然科學來充實理論的彈藥庫」。[50]

泛日耳曼主義是蓋奧爾格·馮·肖納勒一個人發起的，主要獲得了德國和奧地利學生們的支持。它從一開始起就使用引人注目的平民語言，必定要吸引更廣大的各個社會階層。結果使肖納勒又成爲「第一個看到有可能使用反猶主義作爲工具，對外交政策的方向施加壓力，並且瓦解……國家的內部結構。」[50]猶太人適用於這個目的某些原因是很明顯的：他們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突出地位，以及他們在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裡很容易被認作是一個隔離的民族，不像在民族國家的公民，他們至少從理論上說來是同質的。但是，即使當它明確解釋了奧地利反猶主義的暴力，顯示出當政治家肖納勒闡述這個問題時是多麼精明，也無助於我們理解反猶主義作爲一種意識形態在這兩種泛—運動中的中心作用。

「擴大的部族意識」作爲各種泛—運動的情感動力，在反猶主義作爲其中心問題之前就已發展完備。泛斯拉夫主義在哲學思考方面的歷史更長，更令人尊敬，它的政治有效性更明顯，直到十九世紀的最後年代才轉向反猶主義；泛日耳曼主義者肖納勒早就公開宣布他對國家機構的敵視，當時許多猶太人仍然還是他那個政黨的成員。[54]在德國，斯多克爾運動顯示出反猶主義作爲一種政治宣傳武器是無用的，泛德聯盟開始時有一種反猶主義傾向，但是在 1918 年前，它從不過分地排除猶太人的成員資格。[50]斯拉夫文化優越論者對猶太人偶爾的反感，在全體俄羅斯知識分子中間轉化爲

反猶主義，在1818年沙皇被刺事件之後，政府策動了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使猶太人問題成了公眾注意的焦點。

與此同時，肖納勒發現了反猶主義，或許他只是偶然地意識到它的可能性：既然他首先要摧毀哈布斯堡帝國，就不難計算出建立在多種民族基礎上的國家結構裡排斥一個民族的後果。如果使一切民族都享有一定的平等的輕微壓迫被民眾運動破壞了，那麼這種奇特的結構組織、它的官僚體制不穩定的平衡就會被粉碎。然而，這種目的也同樣可以很好地被泛日耳曼主義者用來仇恨斯拉夫各民族，早在運動轉向反猶主義以前，就已經有了這種仇恨，並且得到了它的猶太成員們的贊同。

各種泛一運動中的反猶主義又和東歐的部族民族主義結合，變得更有效，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假相和平時期中，反猶主義宣傳衰微的情況下，還得以存在。因爲當時在泛一運動的民族理論和猶太民族無根的存在之間有一種內在聯結。猶太人似乎是一個部族意義之民族的最好例子，他們的組織結構正是各種泛運動極力要仿效的一種典範，他們的生存和他們的力量正是對種族理論的正確性性的最好證明。

假如奧匈帝國的其他各民族只是虛弱地札根在這塊土地上，很少意識到共同領土的意義，那麼猶太人就是一個民族的例子，他們根本沒有故土，卻能在幾個世紀裡一直保持其身份認同(identity)，因此也可以用來證明，想要構成一種民族性，不一定需要有領土。[55]如果各種泛一運動堅持認爲國家是次等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民族，那麼，在各國都有組織、不一定由明確的機構來代表的猶太人，就是一個沒有國家、沒有明確的機構的民族的完美典範。[56]如果各種部族民族都以自身爲民族驕傲的中心，而無視歷史的成就和他們在記錄下來的事件中的參與，如果他們相信，某種神秘的內在心理或生理特性使他們成爲日耳曼主義而不單純是日耳曼的化身，成爲俄羅斯的靈魂而不單純是俄羅斯的化身，那麼即使他們不懂得如何表達，也多少會知道，同化了的猶太人的猶太特性恰恰與猶太教的個人體現是一

樣的，世俗化了的猶太人還未放棄關於上帝特選的主張，他們的奇特的自豪感實際上意味著他們相信自己與眾不同，比別的民族優秀，因爲他們生來是猶太人，這與猶太人的成就和傳統無關。

這種猶太人態度，這種猶太式的部族民族主義，是近代國家中猶太人不正常地位導致的結果，因爲他們被排斥在社會和民族之外。但是，變動中的一些種族羣體只能參照其他西方民族的民族地位來意識到自己的民族地位，而後來種族主義有效動員的大城市無根的羣衆，也是以類似的方式意識到自己的地位。他們也處於社會的範圍之外，處於民族國家的政體之外，這種政體似乎是各民族唯一滿意的政治組織。他們從同時也發現猶太人是更愉快、更幸運的競爭者，因爲猶太人找到了一種構成自己人的社會的方式，恰恰是因爲它沒有明顯可鑒的表現形式，沒有正常的政治出路，這種社會方式可以變成民族的替代形式。

但是，驅使猶太人進入這些種族意識形態中心的主要是一個更明顯的事實，各種泛一運動宣稱自己民族屬上帝特選，這只會和猶太人的自我宣稱起嚴重衝突。猶太人的觀念同各種主張自己民族的神聖起源的部族理論毫無共同之處，但是這一點無足輕重。暴民不會太關心這種歷史的準確性，也不太意識到猶太人在歷史上要完成建立人類的使命與它自己想要統治地球上一切民族的「使命」之間的區別。但是，各種泛一運動的領導人們都淸楚地知道，猶太人事實上的確將世界分成兩半——他們自己與其他一切人。[58]在這樣種二分法中，猶太人又一次表現爲比較幸運的競爭者，他們繼承了某種東西，被承認有某種東西，而這些東西是異教徒們必須從頭做起的。[58]

無需反覆強調，反猶主義是一種嫉妒的形式。但是聯繫到猶太人的上帝特選觀念，這種說法就更眞實了。每當各民族同它們的行動和成就分離，每當它們與共同世界的天然聯繫被切斷，或者出於某種原因而不再存在，他們就會以原始天然的條件轉向自身，宣布自身的神聖性和拯救整個世界的

使命。當這種事情在西方文明中發生時，這些民族就會毫無例外地以它們自己的方式找到猶太人那種古老的宣言。這就是各種泛—運動的代言人所感受到的，這就是他們爲何仍然不會受困於那個現實問題——就數量和力量而言，猶太人問題是否已重要到了應該以仇視猶太人作爲他們的意識形態的支柱。一如他們自己的民族自豪感獨立於他們的一切成就之外，他們對猶太人的仇恨也就脫離猶太人的一切具體的正確與錯誤的行爲。各種泛—運動也完全同意這一點，儘管它們不懂如何利用這種意識形態的支柱來達到政治組織的目的。

各種泛—運動意識形態的構成與它在政治上認眞應用的可能性之間的時間間隔，由一個事實來顯示，即所謂「錫安長老們的草案」——1900 年前後俄國派駐巴黎的秘密警察根據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的政治顧問波別耶多諾茨也夫(C. Pobyedonostzev)的建議而僞造的，此人是泛斯拉夫主義者中唯一有影響力的人——在 1919 年之前以小冊子形式出現，但已半被人遺忘，此時卻開始在歐洲各國以不同語言成功地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傳播；[60]三十年之後，它的發行量僅次於希特勒的《我的奮鬥》。僞造者和使用者都不知道將會出現這樣一個時代：警察會成爲一個社會的中心機構，一個國家的全部權力會根據傳說中的猶太長老們制訂的原則而組織起來。或許是斯大林首先發現了警察擁有的統治潛力；但是希特勒無疑比他精神上的父親肖納勒更精明，他懂得如何使用種族主義的層級原則，發明出一種反猶主義的斷言，說存在著一個「最壞」民族，由此正可以組織一個「最好」民族，以及兩者之間一切被征服、被壓迫的民族，如何使泛—運動的優越心理普及開來，以使每一個民族——猶太人必然排除在外——都可以蔑視另一個比它更壞的民族。

很明顯，在大多數階層的人愉快地承認他們將要取得據信只有猶太人才能獲得的魔鬼天性之前，必然還會有幾十年隱藏的混亂和公開的絕望。無論如何，泛—運動的領導人儘管早已隱隱地意識到這個社會問題，卻非常

片面地堅持自己的外交政策。所以他們無法看到反猶主義能夠構成內政與外交方法之間的必要聯繫；他們還不知道如何建立他們的「人民社羣」(folk community)，即一種完全被逐出家園的、被灌輸了種族思想的人羣。

泛一運動的狂熱加快地使猶太人成了意識形態的中心，這是歐洲猶太人末日的開端，構成了歷史採取的最符合邏輯的、最厲害的報復之一。從伏爾泰到赫南再到坦納，他們的「啓蒙」主張中當然有某種眞理，認爲猶太人的上帝特選觀念，其宗教與民族性一致，並自稱在歷史上有一種絕對地位，與上帝有特殊關係，這一方面給西方文明帶來了一種別人不知道的狂熱因素(承繼自基督教自稱的擁有全部眞理)，另一方面又帶來了自傲的成份，很危險地接近了扭曲的種族觀點。[61]從政治方面來看，即使猶太教與一種長久的猶太人虔誠態度，總是超脫、甚至敵視神性內蘊的異端觀點，但這也無所助益。

部族民族主義恰恰是對宗教的扭曲，它讓上帝選一個民族而且選的正是它自己那個民族；僅僅由於這個古老的神話，以及從古代生存下來的唯一民族，深深地札根在西方文明中，才使現代暴民的領袖能言善辨地、厚顏無恥地將上帝拉進各民族之間小小的衝突中，要上帝作出這位領袖早已愉快地控制了的選擇。[62]種族主義者對猶太人的仇恨產生於一種迷信的理解，認爲實際上很可能是猶太人，而不是他們自己，才是上帝的選民，猶太人的成功是神助天佑。有一種虛弱的精神因素在厭惡一個民族，害怕這個民族會得到一種理性無法理解的保障，使它最終崛起，成爲世界歷史中最後的勝利者。

在暴民的心態中，猶太人關於建立一個上帝王國的神聖使命，似乎只能以成功和失敗這種粗糙的詞彙來顯示。基督教這一起源於猶太人的宗教早已征服了西方世界的人們，這一事實孕育了恐懼和仇恨，並使它們有點理性化了。泛一運動的領導人由自己荒謬的迷信所引導，發現了隱藏在猶

太人的虔誠機制中的小齒輪，這就留下了倒置和曲解的可能性，因此，「上帝特選」就不再是一個迷思，可以達成共同人性理想的最終實現，反而是對這種理想的最後摧毀。

(二)無法律性的繼承

大陸帝國主義比海外帝國主義更具特點之處是，公開輕視法律和法律機構，在意識形態上將無法律性(lawlessness)合理化。其中一部分原因出於一個事實，即大陸帝國主義無地理距離來隔開它們本國機構的合法性和對外國統治上的無法律性。同樣重要的還有一個事實，即泛一運動都源出於從來不知憲法政府爲何物的國家，因此它們的領導人都很自然地認爲政府和權力都是自上而下任意決定的產物。

一切運動的特點都是蔑視法律。它反映了俄國和奧匈帝國的實際條件，儘管在泛斯拉夫主義中比在泛日耳曼主義中更清晰。用「多民族國家」(multinational state)這樣的術語來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歐洲僅存的這兩個專制政治國家，只能說明一部分問題。就它們對多民族國家領土的統治而言，它們同其他政府的區別在於由一種官僚制度來直接地統治各民族，而不僅僅是剝削它們；政黨難起有意義的作用，國會沒有立法功能；國家通過發布命令來實施統治。議會對奧匈帝國來說只是一個草率含糊的辯論協會。在俄國和戰前的奧地利，很難找到嚴肅的反對黨，只有議會之外的團體才發揮反對派作用，它們知道，一旦進入了議會體系，只會失去羣眾對它們的廣泛注意和支持。

從法律角度來看，官僚政制的政府靠命令來統治，這意味著權力變成了一切立法的直接來源，而在憲法政府中它只能加強法律。還有，命令發布是匿名的(而依據法律，總可以追溯到具體的人或會議)，因此，總好像出自某種統治一切的權力而無須論證其合法性。波別耶多諾茨也夫嘲笑法

律是「圈套」，這是對執政者的永久性嘲笑，假設立法者缺乏自由，受囿於原則，司法者的遲鈍，受到解釋法律的限制。官僚僅僅管轄一些命令，幻想經常性的行動，感到自己絕對優越於那些「不求實際」的民眾，認爲他們永遠只糾纏於「法律細節」，所以總站在權力的範圍之外，成爲他獲得一切的來源。

統治者認爲法律是無力的(powerless)，因爲根據定義，法律與其實際應用是分離的。另一方面，命令只有在應用時才存在；除了可應用性之外，它無須證明其正當性。的確，一切政府在緊急狀態下都使用命令，但是那時的緊急狀態本身就是一種明顯的合理性證明和自動的限制。在官僚制政府中，命令以它們赤裸裸的純粹形式出現，似乎它們不再由權勢人物發布，而是權力的化身，統治者則不過是偶然的代表。在命令的背後，沒有哪一條一般原則是簡單的原因可以理解的，專家所詳細了解的也只有不斷變化的環境。命令統治下的民眾從來不知是什麼在統治他們，因爲命令本身也是不可理解的，一切統治者保持主體地位的方法是精心封鎖具體情況及其實意義。殖民帝國主義也靠命令來統治，有時甚至稱之爲「法令的政府」(régime des décrets)，㊸這是很危險的；然而統治當地人民的人都是外來的，感覺像是篡位者，因此在被統治民族中的影響也減輕了。只有像在俄國和奧地利這樣的地方，才認可當地統治者和當地官僚政制爲合法政府，可以用命令的統治來創造獨斷和神秘的氣氛，作爲它的唯一有效手段。

命令統治(Rule by decree)明顯地有利於對遙遠領土上異質異源人民的控制，有利於一種壓迫政策。它的高度有效性僅僅因爲它無視發布與執行命令之間的一切中間階段(intermediary stayes)，因爲它防止了人民通過掌握信息而提出爭議。它可以輕易地壓制當地各種習俗，無須依靠一般法律發展中必然產生的緩慢過程。它最有助於建立一種集中化的統治(rale of cleverness)，因爲它自動地蹂躪當地經濟中的一切事物。如果良好法律的統治有時可被稱作明智的統治(rule of wisdom)的話，那麼恰當

命令的統治可以被正確地稱爲聰明的統治。因爲考慮隱而不明的動機和目的的做法是聰明的，而從一般可接受的原則中推演而達到理解和創造的做法則是明智的。

官僚政制的政府必須有別於公職行政機構的成長與變形，後者常常伴隨著民族國家的衰落——法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自從大革命以來，法國政府經歷了一切政權的更迭，像寄生物一樣固附在政體上，發展了它自己的階級利益，變成了一個無用的機體，它的目的看來只是玩弄手法，阻止經濟和政治的正常發展。在兩種類型的官僚政制之間當然也有許多表面相似之處，尤其當人們過於注意低級文官心理特點的相似性時，會令人很感興趣。但是，假如法國民眾犯了嚴重錯誤，將行政統治當作一種必要的惡接受下來，那麼他們就永遠不會犯致命的錯誤，不會容忍它統治國家——哪怕結果是國家無人統治。法國政府變得效率很差，氣氛僵化；但是它並沒有創造出一種僞神秘氛圍。

當官僚政制變成政府的一種形式時，這種僞神秘就是官僚政制的印記。由於它統治的民眾從來不會眞正知道某件事情如何發生，對法律也沒有合理的解釋，那麼剩下的只有一種事物，即粗暴的、赤裸裸的事件本身。然後人遇到的事情就有無限解釋的可能性，有無限的理由，不受知識的妨礙。這種無底的詮釋思考在俄國革命前的全部文學作品中很典型，它們假設生命和世界的整個結構是一種神秘的深度。由於這種氛圍表面看來無比豐富，所以具有一種危險的魅力；對苦難的詮釋比對行動的詮釋有更大的範圍可循，因爲前者進入靈魂的內向思考，釋放出一切可能的人類想像，而後者常常受到檢驗，根據外在的結果和可控制的經驗而可能被判爲荒謬。

舊式的官僚統治和最新的極權主義之間最顯眼的區別之一，是俄國和奧地利戰前的統治者們滿足於一種權力虛耗的光芒，滿足於對外在命運的控制，尙使靈魂的內在生命保持完整。極權主義的官僚政制對絕對權力的含義有更完整的理解，用同樣的粗暴態度踐踏私人生活和他的內心生命。這

種極端有效的統治，造成它統治下的人的內在天性隨同他的社會政治活動一起被扼殺，以致舊官僚政制的單純政治衰竭變成了極權主義統治下的整體的衰竭。

然而各種泛一運動興趣的時代依舊很愉快地不知有全面衰竭之事。相反，有一位天眞的觀察者（像大多數西方人一樣）認爲，所謂東方的靈魂顯得無比的豐富，它的心理更加深刻，它的文學比「淺陋的」西方民主主學含義更豐富。這種向苦難的「深度」作心理學和文學的探險並未出現在奧匈帝國，因爲它的文學主要是德語文學，畢竟還是總體德語文學的一部分。奧地利官僚政制並未激發起深刻的謊話，而是造就了它的一位最偉大的現代作家，使他成爲針對全部現實的幽默作家和批評家。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很懂得那種對命運的迷信，它主宰了生活在偶然事件之永恆規則下的人，一種必然傾向是將具體的超人類含義讀解爲偶發事件，其理性意義是無法了解和理解的。他淸楚地意識到這類民族的巨大吸引力，他們的哀婉而優美的悲慘民間故事大大高於幸運民族的輕鬆而歡快的文學作品。他揭示了必然性——甚至是惡的必然性——的傲慢，也揭示了令人作嘔的比喻，將惡與不幸解釋成命運。他的作品所創造的奇跡，僅僅是因爲他能夠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創作，生活氛圍的主要因素還沒有完全顯現；他相信自己想像力的巨大力量，能得出一切必要的結論，而且本身能完成現實生活未曾集中關注的問題。[64]

當時只有俄羅斯帝國提出了一幅官僚政制統治的完整畫面。國家的混亂狀態——幅員遼闊難以統治，居住在那裡的史前民族沒有任何一種政治組織的經驗，他們單調地生活在俄國官僚政制無法理喩的暴政之下——組成一種無序和危險的氛圍，其中小官吏們衝突的想法和日常無能爲力的、相互無關的事件激起了一種哲學，視偶然爲眞正的上帝，神意的幽靈。[65]泛斯拉夫主義者一向堅持認爲，同文明國家的淺薄單調相比，俄羅斯的情況更「有意思」，看來似乎神在俄羅斯民族痛苦的靈魂中找到了一種內在的親

和性，世界上其他地方都無相仿情形。在無止盡的文學洪流中，泛斯拉夫主義者們以俄羅斯的深厚暴烈來對抗西方表面化的陳腐平庸，西方不知痛苦和犧牲的含義，在它的嚴格的文明化表面之下，隱藏著輕浮和陳舊的本質。㊅極權主義運動的大部分魅力來自於這種模糊、苦難的反西方情緒，尤其流行於希特勒掌權前的德國和奧地利，在二十年代也吸引了一般的歐洲知識分子。直到實際奪取權力之時，他們一直能利用這種深刻而又豐富的「非理性」激情，在關鍵的年代裡，流放的俄國知識分子對完全動盪不安的歐洲的精神情緒產生了不可忽略的影響，這種純粹文學的態度是一種強烈的情感因素，爲極權主義鋪路。㊅

與政黨相比，各種運動並不簡單地墮落爲官僚機器，㊅但是在官僚政府中可以見到它的組織結構模式。激起泛斯拉夫主義者鮑戈庭(Pogodin)描繪沙皇俄國官僚政治機器的那種欽羡之心是他們共有的:「一架巨大的機器，根據最簡單的原理製造，由**一人**之手引導……一個簡單動作就能使它隨時運轉，無論選擇何種方向和速度。這不光是一種機械運動，機器完全由傳統繼承的情感推動，它屬於沙皇，無條件信任沙皇，忠誠於沙皇，沙皇是他們在地上的上帝。有誰膽敢向我們進攻，誰能讓我們不迫使他服從?」㊅

泛斯拉夫主義者不像泛日耳曼主義者那樣攻擊國家。他們有時甚至試圖說服沙皇充當泛斯拉夫運動的首領。這種傾向的原因當然是沙皇的地位與歐洲任何一位君主（不排除奧匈帝國皇帝）的地位都大不相同，俄羅斯的專制統治從來未發展到西方意義上的理性狀態，而是保持著變動的、無序的、非組織化的狀態。所以，沙皇至上(Czarism)有時在泛斯拉夫主義者們看來是一種巨大的行動力量的象徵，環繞著一圈獨特的神聖光環。㊅同泛日耳曼主義相比，泛斯拉夫主義又並不發明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來適應斯拉夫靈魂及其運動的需要，但是又能夠解釋——並且使之成爲神話——沙皇是泛斯拉夫運動本身反西方、反憲法、反國家的表現。這種將無政府主義權力神秘化的傾向，激勵泛斯拉夫主義創造了最有害的理論，即它具有

的超驗特性和繼承了一切權力的優點。權力被認作是神擴散於自然活動和人類活動中無所不在的一種力量。它不再是一種獲得東西的手段：它只是存在著，人要獻身於它，是爲了熱愛上帝，而任何一種規範或約束其「無限性和可怕力量」的法律都是明顯的褻瀆行爲。權力本身的完全任意性是神聖的，無論是沙皇的權力還是性愛的權力。法律不僅不能同它相比，而且是有罪的，是人爲的「圈套」，阻礙著「神性」的充分發展。[71]政府無論做什麼，仍然是「行動中的最高權力」，[72]而泛斯拉夫主義運動只須堅持這種權力，策動民眾對它的廣泛支持，使它最終能夠庇護整個民族——一個龐大的牧羣，服從一個人的獨斷意志，不受法律和利益的統制，他們聚集在一起，僅僅是出於人數龐大造成的內聚力和相信自身的神聖性質。

從一開始起，泛—運動就缺乏「承傳而來之情緒的力量」(strength of inherited emotions)，所以在兩個方面必須與早已存在的俄國專制制度不同。他們必須作宣傳，那是已經建立的官僚政制幾乎不需要的，而且在宣傳中還要增加暴力成分；[72] 他們在大陸的各政黨早已發展的意識形態中，找到了「承傳而來之感情」的代用品。他們對意識形態的利用，其差別在於他們不僅在表達利益時加進了意識形態的論證，而且將各種意識形態當作組織原則來使用。如果說在過去，政黨是組織階級利益的團體，那麼此刻的各種泛—運動則變成了意識形態的體現。換言之，運動「用哲學來武裝」，宣稱它們發動了「在一個集體之中普遍道德的個人化」。[71]

關於觀念的具體化，先見諸於黑格爾的國家與歷史學說，然後在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是人類歷史主角的理論中得到進一步發展。俄國泛斯拉夫主義受到黑格爾的很大影響，布爾什維克主義受到馬克思的影響，這當然都不是偶然的。然而馬克思和黑格爾都未假設實際的人類和政黨或國家是觀念的具體化；他們都相信歷史過程，觀念在其中只有通過複雜的辯證運動才能具體化。它需要暴民領袖的粗俗來達到具體地組織羣眾的巨大可能性。這些人開始對暴民們說，每一個成員只要加入這個運動，就都能變成

崇高的、重要的人物，體現某種理想的事物。然後他不再有必要忠誠、慷慨、勇敢，就能自動地成爲忠誠、慷慨、勇敢的化身。泛日耳曼主義在組織理論方面顯示出一些優越性，它精明地剝奪德國人的個人的這些優秀品質，假如他們不加入這個運動的話。(這預示著後來的納粹主義對德國人民中的非納粹黨員抱著蔑視的態度。)而泛斯拉夫主義在它關於斯拉夫之魂的無邊無際的玄想中，認定每一個斯拉夫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都具有這樣一種靈魂，無論他參加或不參加特定的組織。它需要斯大林的冷酷無情來使布爾什維克主義同樣地嘲笑俄羅斯人民,就像納粹分子對待德國人民一樣。

正是運動的這種絕對性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使他們遠離黨派結構和派性，才能用來證明它們扼殺一切帶著個人良知的反對意見是正當的。個人的特殊現實在一種總體的和普遍的欺騙性現實中顯現出來，數量上却退縮到無足輕重的地步，或者沉沒在普遍地富有活力的運動的潮流之中。在這股潮流中，目的和手段的區別隨同人格一起消失，結果出現了惡魔般不朽的意識形態政治。一切重要的事物都體現爲運動本身的運作；每一種觀念、每一種價值都消失到迷信的僞科學內在性當中。

㈢黨派與運動

大陸帝國主義和海外帝國主義之間關鍵性的重大區別在於它們最初的成功與失敗都恰恰相反。大陸帝國主義即使在它剛開始的時候，也成功地組織起黨派體系之外廣大階層的民眾，實現了帝國主義對民族國家的敵視，但總是不能取得擴張的實際成果，而海外帝國主義在它瘋狂而成功地迅速吞併越來越多的遠方領土時，卻在試圖改變母國的政治結構方面從未十分成功。民族國家制度的破壞是海外帝國主義自身造成的，最終由那些產生於自己國家之外的運動來達到完成。當各種運動開始成功地和民族國家的政黨制度競爭時，它們也只能夠破壞那些多黨制國家，但是單靠帝國主義

*傳統並不具有羣眾魅力，大不列顚這個歷史悠久的兩黨制國家並沒有在它*的政黨制度之外產生帶有法西斯主義傾向或共產主義傾向的運動。

一切帝國主義團體中都有帶同樣特點的口號「超越黨派」、呼籲「一切政黨的人們」合作，並且吹噓它們將會「遠離黨派鬥爭，只代表民族的目標」，⑮這是它們毫無例外地關心外交政策的自然結果，在外交政策方面，它們假設在任何一個事件中，民族只作爲一個整體來行動，而獨立於階級和政黨之外。⑮再者，既然在大陸制度中，這種民族作爲整體的表現是對國家的「壟斷」(monoploy of the state)，⑮那麼它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帝國主義者們置國家利益高於一切，或者說，民族的整體利益在他們中間找到了盼望已久的廣泛支持。然而，儘管有這一類關於眞正的廣泛性的宣言，「政黨之上的政黨」仍然只是知識分子以及生活富裕的人們的小團體，他們像泛德聯盟一樣，只有在民族危急的時刻才能產生更大的魅力。⑮

因此，各種泛—運動的最大發明不是它們也宣稱超越政黨體系，而是它們自稱「運動」，(這種名稱表明它們對一切政黨都抱著深深的懷疑態度，在世紀轉折時期，歐洲早已蔓延各種政黨，)並且最終起到關鍵作用，例如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每一個新的團體都認爲，不是『政黨』，而是『運動』，才能更加合法化，更加吸引羣眾。」⑮

事實上，歐洲政黨體系的解體的起因不是泛—運動，而是一極權主義運動。但是，各種泛—運動在小型的、相對無害的帝國主義團體和極權主義運動之間找到自己的位置，實際上成了極權主義的前驅，因爲它們早已拋棄了一切帝國主義聯盟中的那種顯眼的勢利態度——無論是在英國對財富或出身的勢利，或是德國對受過教育與否的勢利——所以能利用那種對應該要代表人民的體制的普遍仇視。⑮因此，當納粹戰敗、歐洲越來越害怕布爾什維克主義時，泛—運動的魅力不減，這也就不足爲怪了。從現在的情況來看，歐洲國家中唯有英國不藐視議會、不仇恨政黨制度。⑮

面對英倫三島政治體制的穩定，同時大陸的一切民族國家卻在衰落，人

們難免得出結論，即盎格魯—撒克遜與大陸在政黨制度方面的差異必定是一個重要因素。戰爭結束後英國極度貧困，法國未被摧毀，兩國之間的純粹物質差異並不大；戰前歐洲造成革命最大的因素——失業——在英國比在許多大陸國家裡更嚴重；戰爭一結束，工黨政府取消了在印度的帝國主義統治，致力於重建英國的外交政策，遵循一條非帝國主義的路線，這對於英國的政治穩定不啻是一場巨大的震盪。社會結構方面的差別相對於英國的力量來說也並非關係重大；社會主義的政府極大地改變了社會制度的經濟基礎，而在政治體制上並無任何重大改變。

英國的兩黨制和大陸的多黨制之間的表面差異背後，存在著一種關於政黨在政體內作用的根本差異，它對於政黨對權力的態度和公民在國家中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在兩黨制中，一黨總是代表政府，事實上統治著國家，因此，執政黨暫時地與國家合一。國家是國家統一的永恆保證，只表現爲國王的永久在位（外交部副大臣的職位的永久性則只是爲了外交事務的延續性）。❽由於計劃與組織的兩黨是輪流執政的，❽所以政府一切部門的計劃與組織也跟隨輪流執政制度。由於每一黨執政時間有限，反對黨也參與控制，它的效用也因爲它是明日的統治者而得到加強。事實上，保證整體的完整性、反對一黨獨裁的作用，是反對黨的制衡，而不是因爲國王的象徵地位。這種制度的明顯優點是，政府與國家之間沒有根本區別；權力與國家掌握在組織政黨的公民手中；政黨代表今日與明日的權力與國家；因此，權力與國家似乎超越人類範圍，是獨立於公民的意志與行動之外的形而上的實體，也不會使人對之過於崇拜。

大陸政黨制度假設每一黨都有意識地界定自身爲整體中的一個部分，反過來又由超越各政黨的國家來代表它。❽因此，一黨統治只能意味著一個部分對其餘各部分的專制控制。由政黨領袖之間的聯盟來組成的政府永遠只能是政黨政府，明顯不同於超越它們之上的國家。這種制度的微小缺點之一是，內閣成員們不能由競選來選出，因爲黨派代表太多，大臣們必

定根據政黨聯盟而選出來；[85]另一方面，英國的制度允許從一黨的大批成員中選出最優秀的人才。但是，一個重要的事實是，多黨制從不允許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個黨員負起全面責任，結果自然使由政黨聯盟組成的政府從不感到負有全面的責任。即使發生了不可能發生的情況，一黨以絕對多數主宰了議會，結果造成一黨統治，結局只能是要麼獨裁統治(dictatorship)，因為制度並未準備接受這種政府，要麼仍然是眞正的民主領導制，卻於心不安，習慣於認為自己只代表整體中的一個部分，自然害怕使用它的權力。這就會造成雖有好心卻一事無成的局面，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德國和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在短期內崛起為絕對多數黨，卻放棄與其地位俱來的權力。[85]

自從出現政黨制度後，政黨理所當然地同特殊的經濟等等方面的利益一致，[85]而大陸的一切政黨（不僅僅是工黨）只要能確信政黨之上的國家或多或少根據所有的人的利益來行使權力，就會很坦率地承認這一點。相反，英國的政黨出於為「民族利益」服務而在某種「特殊原則」基礎上建立，[85]本身就是國家的實際狀況和未來狀態；右翼和左翼政黨都代表著特殊的利益，並且受到政府的必要監督。由於在兩黨制中，一個政黨如果不能贏得足夠的力量來取得權力，它就不能生存，因此無須在理論上作論證，沒有發展出意識形態；而大陸政黨為之鬥爭的狂熱，並非產生於利益衝突，而是產生於對立的意識形態，這在英國完全不存在。[85]

大陸政黨原則上同政府和權力分離，它們的麻煩並不完全在於它們陷於狹隘的特殊利益，而是為這些利益感到羞恥，所以要為自己辯護，使每一個政黨都會宣稱它的特殊利益同人類的總體利益是一致的。保守黨不滿足於維護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是需要一種哲學，宣稱上帝造人是為了使人滿頭流汗地耕作土地。中產階級政黨提出進步論的意識形態，勞工黨宣布無產階級是人類的領袖，道理也是一樣的。這種崇高的哲學和講究實際利益的奇怪結合只有乍看之下才顯得矛盾。既然這些政黨並不組織他們的

黨員（或教育他們的領導者）以處理公共事務爲目的，而是只代表他們作爲個人的個人利益，那麼，它們就必須迎合一切私人的精神需要和物質需要。換言之，英國政黨和大陸政黨的主要區別是，前者是需要以「共同行動」(act in concert)來對付一切事情的一個公民政治組織，[90]而後者是一羣私人的組織，他們要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公共事務的干涉。

大陸國家的哲學與它們的政黨制度是一致的，只有當人們不是政黨成員時，才被承認是公民，亦即在他們個人同國家的非組織化關係中，或在緊急狀態下表現愛國主義熱情的才是公民(citoyen)。[90]這種不幸的結果，一方面是由於法國革命中的公民在十九世紀轉化爲資產階級(bourgeois)，另一方面是由於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對立。德國人認爲愛國主義是對官方當局的忘我(self-oblivion)服從，而法國人認爲愛國主義是熱情地忠實於一種「永恆的法國」的幻象。兩者的愛國主義都意味著，爲了政府與民族利益而放棄個人的黨派與政黨利益。問題在於，在一種根據個人利益來創建政黨的制度中，這種民族化的變形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羣眾的益處只能依靠來自上面的力量，而在下者慷慨的自我犧牲只能通過喚起民族主義激情來取得。英國的情形則相反，個人利益與民族利益之間的對立在政治中從未有過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大陸的政黨制度愈是迎合階級利益，民族就愈是迫切需要民族主義；英國的反對黨同執政黨一起公開表達對民族利益的支持，所以不像大陸國家那樣迫切需要民族主義。

如果就各種運動興起的先決條件來思考大陸的多黨制與英國的兩黨制之間的區別，那麼表面上看來，在那些「國家高於政黨」的國家裡，很容易產生一黨專制奪取國家機器，因此，與那些公民「一致」行動（即，通過黨派組織）的國家相比，高於公民之上就可以合法地獲得權力，感到自己無論今天還是明天都是國家的主人。更可能的是，只要公民越遠離權力來源，各種運動中的權力神秘化就越容易達到——在官僚政制的國家裡很容易達到，那裡的權力完全超越了被統治者的理解能力，而不像以憲法治

國的地方，法律高於權力，權力只是強化法律的手段；而有些國家裡，國家權力是政黨無法取得的，所以即使公民理解這一切，但也超過其實際經驗和行動，也就容易產生權力繼承神秘化的傾向了。

羣眾與政府異化，這是他們最終厭惡與仇恨議會的開端，這在法國(與其他西歐國家）和德國（與中歐國家）之間是有差別的。德國的國家定義是超越政黨的，通常當黨政領袖擔任部長職務時，就使他們的政黨忠誠地服從政府，並且負有官方的責任。在擔任公職時，每一個人都有義務不忠於自己的黨派。㊈法國則由政黨聯合執政，自從建立第三共和，內閣創下了荒唐的紀錄之後，就不可能有眞正的政府了。它的弱點同德國的弱點正相反；它並不將政黨制度重新組織成一個能夠實行統治的實體，因此取消了超越政黨和議會的國家。政府必然奇怪地變成議會與輿論變化無常態度的反映。相反，德國的制度使議會成爲表達各種衝突的利益和觀點多少有些用處的戰場，這些利益與觀點的主要作用是影響政府，但是它們在管理國家事務中的實際必要性猶待爭議。法國的政黨使政府窒息；德國的國家閹割了政黨。

從十九世紀末起，憲政議會與政黨的聲望日益下降；人民大多認爲它們像代價昂貴而又不必要的機構。僅此原因，使每一個團體只須在議會之外活動、宣布自己超越政黨與階級利益，就足以有極大的機會獲得廣泛名聲。這類團體似乎更有能力、更眞誠、更關心公眾事務。但是，這些還都只是外表，因爲每一個「政黨之上的政黨」的眞正目的是促進一種特殊的利益，使它最終吞噬其他一切利益，並且使一個特殊的羣體成爲國家機器的主人。這就是意大利在墨索里尼法西斯主義之下最終發生的情況，意大利在 1938 年之前還不是極權主義，只不過是一種從多黨制民主制中發展起來的普通民族主義獨裁。在以往的事實中，多數人的統治與獨裁統治之間確實有某種聯繫，但是這種聯繫同極權主義毫無關係。很明顯，在幾十年的低效率與混亂的多黨統治之後，一黨以有利條件奪得國家政權，可以成

爲一種巨大的解脫，因爲它至少確保某種一致性、長期性，較少矛盾，儘管只是在一個有限的時期內。

納粹攫取政權的事實，通常被說成一黨專政(one-party dictatorship)，但是這顯示出政治思想仍然植根於舊的固有模式，人們對即將發生的情況仍然毫無準備。法西斯主義政黨專政唯一典型的現代含義是，這個政黨堅持說它是一場運動；這其實與運動無關係，僅僅借用了「運動」的標簽，目的是吸引羣眾，而當它一旦攫取了國家機器，並不從根本上改變國家的權力結構，只滿足於在政府的一切位置上填滿自己的黨員，那麼一切都昭然若揭了。正是通過使政黨和國家合一——這是納粹和布爾什維克一向小心翼翼地迴避的——政黨才不再是一場「運動」，並且同基本穩定的國家結構結合。

即使極權主義運動和它們的前驅——各種「泛—運動」——並非「政黨之上的政黨」，非打算攫取國家機器，而是旨在摧毀國家機器的運動，納粹黨人發現可以很方便地利用它，假裝忠實地追隨意大利式的法西斯主義。於是他們獲得了上層階級與商界菁英的支持，這些人錯以爲納粹黨人就是自己過去頻頻地想組織的舊式羣體，只不過是作了一點小小的改變，用一個政黨來征服國家機器。[93]幫助希特勒上台執政的商界人士天眞地相信，他們只支持了一名獨裁者，一個同他們一樣的人，很自然地會根據他們自己階級的利益去統治國家，而不利於其他階級。

帝國主義者培植的「政黨之上的政黨」從來不懂得如何從羣眾對政黨制度的普遍仇恨中贏得益處；德國戰前帝國主義的失敗，除了它夢想過在歐洲大陸上的擴張和激烈地反對民族國家的民主機構之外，是因爲從未達到過一場運動的規模。高傲地放棄階級利益，放棄一個國家的政黨制度的基礎，這當然還是不夠的，因爲這使它們減少連那些普通政黨也還仍然享有的號召力。除了民族主義的高調之外，它們所明顯缺乏的是一種眞正的民族主義的（或其他的）意識形態。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德國的泛日耳

曼主義者，尤其是魯登道夫(Ludendorff)夫婦，認識到了這種錯誤，嘗試建立一種意識形態，但是，儘管他們作出明顯努力，向羣眾灌輸一種最具迷信色彩的信念，他們仍然失敗了，因爲他們太固執於一種過時的非極權主義國家崇拜，不理解羣眾對所謂「超國家的力量」(superstate powers)——即耶穌會、猶太人、共濟會成員(Freemason)——的狂熱興趣其實並不產生於民族崇拜和國家崇拜，而相反是產生於嫉妒及渴求「超國家的力量」，並且希望也變成一種這樣的力量。[94]

在一切外表上顯示出迷戀和崇拜國家的那些歐洲的拉丁國家，例如意大利，還有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當時尚未形成這種崇拜，反對「超國家」力量的民族主義口號還只是一種對民族的認眞關心，這些國家由於教會力量太強，阻礙民族的充分發展。由於民族因爲過程中的正統成分，也由於教會聰明地承認法西斯主義在原則上既不反基督教，也不是極權主義的，只不過是使政教分離，而這在其他國家早已有之，致使法西斯民族主義起初的反宗教色彩迅速淡化，而變成一種妥協(例如在意大利)，或者變成積極合作（例如在西班牙和葡萄牙)。

墨索里尼對「統合國家」(corporate state)觀念的解釋是爲了克服階級鬥爭社會裡顯而易見的民族危機，建立一種完整團結的社會新組織，[95]解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對抗狀態，使民族國家賴以存在的社會和國家團結一致。[95]法西斯主義運動是「政黨之上的政黨」，它宣稱代表民族整體的利益，攫取了國家機器，將自身等同於最高的民族權威，企圖將整個民族當作「國家的一部分」。但是，它並不認爲自己「高於國家」，它的領袖們也並不相信自己「高於民族」。[95]至於法西斯主義者，隨著他們奪取政權，他們的運動也就結束了，至少在國內政策上是如此；這場運動此刻只能在外交政策事務中運作，即表現爲帝國主義擴張和典型的帝國主義冒險。即使在奪取政權之前，納粹分子也明確地避開這種法西斯主義形式的獨裁——其中「運動」只是幫助政黨走向掌權——並且有意識地利用政黨來「促進運動」，運

動與政黨不一樣，它不能有任何「明確的、幾乎是確定性的目標。」[98]

法西斯主義運動與極權主義運動之間的差別在它們對軍隊（最典型的國家機構）的態度上表現得最充分。納粹與布爾什維克使軍隊服從政治委員或極權式的菁英結構的領導，因此摧毀了軍隊的精神，相比之下，法西斯主義者們可以利用軍隊這種民族主義工具，他們認同軍隊就像認同國家一樣。他們需要一個法西斯主義的國家，一支法西斯主義的軍隊，但它們仍還是一支軍隊和一個國家。只有在納粹德國和蘇聯，軍隊和國家才變成運動的附庸。法西斯主義獨裁者——但這既不是指希特勒，也不是指斯大林——從古典政治理論的意義上來說是唯一眞正的篡位者，他的一黨統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唯一一種仍然與多黨制有密切聯繫的統治。他執行帝國主義傾向的各種聯盟、社羣、「政黨之上的政黨」的目標，因此，意大利法西斯主義是在現有國家範圍內組織的現代羣眾運動的唯一例子，它只受到極端民族主義的激勵，將民眾轉變成只有當民族國家在危急時代和「神聖同盟」(union sacrée)時期才動員得起來的「公民」和「愛國者」。[99]

凡是運動，都仇視政府，但是在戰前德國相對穩定的局勢下，未聞泛日耳曼主義者有此傾向。運動起源於奧匈帝國，對政府的仇視在那裡是受壓迫民族愛國主義的表現，政黨——社會民主黨（它是基督教社會黨之外唯一眞誠地忠於奧地利的政黨）是個例外——是以民族而不是階級爲根據組成的。這很可能是由於經濟利益和民族利益在奧地利幾乎是一致的緣故，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大多取決於民族歸屬；因此，在民族國家裡曾是一種統一力量的民族主義，在奧匈帝國就立即變成了一種內部分裂的原因，結果造成政黨結構同民族國家的政黨結構相比的關鍵差異。在多民族的奧匈帝國，使政黨成員保持團結的因素不是一種特殊利益，像在其他大陸國家的政黨體系中那樣，而是像英國那樣的一種有組織的行動的原則，但是主要還是那種屬於同一民族的感情。嚴格說來，在奧地利政黨中，這應該說是、也曾經是一種很大的弱點，因爲沒有一種特定的目標或計劃能夠減弱

部族歸屬的感情。各種泛—運動卻從這種缺點中獲得了一種優點，其途徑是將政黨轉化爲運動，發現一種組織形式，它同其他一切形式都不一樣，從來不需要一種目標或計劃，可以隨時改變政策，而又不傷害它的成員。納粹主義驕傲地宣稱它雖有一個計劃但並不需要它，早在這之前很久，泛日耳曼主義就發現，比起制定大綱和建立講壇來，大規模地鼓動一種普遍情緒更加重要。因爲在一場運動中，唯一重要的事情恰恰是它必須使自己保持經常的運動。[100]因此，納粹常常提起魏瑪共和國的十四年是「制度時代」(Systemzeit)，意即這個時代枯燥而缺少動力，並不「運動」(move)，而緊接著就是他們的「運動的時代」(era of the movement)了。

即便是一黨專政，他們仍然認爲國家應該根據不斷變化的需要而不斷地發展運動。在帝國主義的「超越政黨的羣體」——德國本土的「泛德聯盟」——和奧地利的泛日耳曼主義運動之間已不再有本質的區別，只有它們對國家的態度才顯示出本質區別來：[100]當「政黨之上的政黨」只想奪取國家機器時，眞正的運動卻旨在摧毀國家機器；前者認爲國家機器一旦落到一黨的成員手中時（例如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國家仍然是最高權威，而後者則認爲運動獨立於國家權威之外，並且高於國家權威。

各種泛—運動對政黨制度的敵視取得了實際意義，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政黨制度不再是一種有效的手段，歐洲社會的階級制度在越來越壯大的羣眾（由各種事件造成地位喪失的羣眾）的重壓下被打破。然後走到前台來的不再僅僅是泛—運動，而是它們的後繼者，極權主義，它在幾年之內決定了其他一切政黨的政治，使它們或者反法西斯，或者反布爾什維克，或者兼而有之。[100]根據這種似乎從外部施加的負面手法，舊的政黨清楚地顯示出，他們也不再能代表具體階級的利益，而是變成了現狀的純粹維護者。德國與奧地利的泛日耳曼主義者很快同納粹主義結盟，而泛斯拉夫主義者最終發現列寧的俄國革命之消除，足以使他們有可能全心全意地支持斯大

林，但是這個過程要慢得多，也複雜得多。登上權力高峰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納粹主義已非純粹的部族民族主義所能涵蓋，這對於那些事實上仍然相信其原則而不將之當作一種純粹宣傳的人來說，沒有多大用處；這既不是泛日耳曼主義者的錯誤，也不是泛斯拉夫主義者的錯誤，因而很難阻止他們的熱情。

大陸政黨制度隨著民族國家聲望下降而衰落。民族同質性由於移民而受嚴重干擾，法國這個「優秀民族」多年來完全依靠外國勞工；嚴格的移民政策不能滿足新的需要，儘管還是十足的「民族性的」政策，但已很明顯看出，民族國家不再能面對當時的主要政治問題。[103]更嚴重的是，1919年的和平條約徒勞無益地想將民族國家組織形式引進東歐和南歐，而那裡的本國人民常常只占相對的多數，「少數民族」合起來總數反而比本國人口多。這種新的情況本身足以嚴重地破壞政黨制度的階級基礎；此時各處的政黨都按照民族路線而組織，而奧匈帝國的消亡也有助於在更小的規模上開始相同的實驗。[104]在其餘國家，如果民族國家及其政黨的階級基礎並未受移民和異質性人口的影響，通貨膨漲和失業同樣引起了崩潰；很明顯，國家的階級制度愈嚴格，它的人民愈有階級意識，這種崩潰也就愈具有戲劇性、愈危險。

這就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情形，每一種運動都比任何政黨有更大的機會，因爲運動攻擊國家機構，並不訴求於階級。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總是吹噓它們的仇恨不是針對一個個階級，而是階級制度本身，它們譴責說階級制度是馬克思主義的發明。更有意義的是共產主義者們雖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也不得不放棄他們的嚴格的階級外表，1935年以後，藉口擴大他們的羣眾基礎，在各地都組織了「統一陣線」(Popular Fronts)，開始訴諸發展於各階級層次之外的羣眾，羣眾直到那時一直是法西斯主義運動的天然犧牲品。舊政黨都不打算接受這些羣眾，也不曾正確地估量他們的人數所顯示的越來越增大的重要性，以及他們的領袖所具有

的越來越大的影響力。舊政黨這一個判斷上的錯誤可由一個事實來解釋：它們在議會中的安全地位和在國家機構中的太平位置，使它們只感到應該靠近權力來源，而不是靠向羣眾；它們認爲國家將永遠是一切暴力工具的無可爭議的主人，軍隊和民族國家的最高機構在處理一切國內危機時仍會是決定性因素。因此它們對議會中不經過官方幫助而冒出來的無數組織並不在意。在議會和階級之外的運動的壓力下，政黨制度愈虛弱，各政黨先前同國家的敵對就愈迅速地消失。政黨在「國家高於政黨」的幻覺下運作，錯將這種和諧誤解爲力量的源泉，是和某種更高階層事物的奇妙聯繫。但是在革命運動的壓力下，國家像政黨制度一樣受到威脅，它再也不能保持崇高地位和在國內的內部爭鬥中必要的特殊地位。軍隊早已不再是一種反對革命動亂的可靠堡壘，並非因爲它同情革命，而是因爲它失去了地位。法國這個優秀民族在現代歷史中有兩次證明軍隊根本不情願幫助當權者鞏固地位，或者沒有能力靠自己奪取政權：1850 年，它允許「十二月十日協會」(Society of December 10)的暴民們推動拿破侖三世執政；[105] 在十九世紀末的德雷富斯事件中，本來軍方是可以輕易建立軍人專政的。軍隊的中立，願意侍奉每一個主人，最終使國家的地位處於「有組織的政黨利益之間的仲介。它不再是社會各階級**之上**，而是**之間**。」[106]換言之，國家和各政黨聯合維護現狀，但是不懂這種聯盟和別的事物一樣，實際上會改變現狀。

歐洲政黨制度的垮台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發生於希特勒上台之時。人們現在常常會忘記，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歐洲大多數國家都採取了某種形式的獨裁，拋棄了政黨制度，在大多數國家裡，這種革命性的變化導致不發生革命起義便能影響政府的統治方式。革命的行動往往不是實際上的權力鬥爭，而是心懷不滿的、暴力傾向的羣眾戲劇性地表達他們的願望。畢竟說來，如果有幾千名非武裝民眾向羅馬進軍，接管了意大利政府，或在波蘭，1934 年有一個所謂「無黨派團體」(partyless bloc)帶著一項支持半法西斯主義政府的計劃，會同沒落貴族、窮苦農民、工人、商人、天主教

徒、正統猶太教徒，合法地贏得了議會中的三分之二席位，這兩者之間其實並無多大區別。[107]

希特勒上台，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在發展，在法國一夜之間迅速取消了其他政黨原先的相互關係，改變了久享聲譽的政黨路線。法國右派直到此時仍是一個反對德國、贊同戰爭的黨，在1933年以後變成了和平主義的先鋒，力主與德國取得諒解。左派政黨以同樣的速度，不惜任何代價，放棄和平主義，堅定地反對德國，不久便被指控爲戰爭販子黨，指控它的那些黨派，僅在幾年前還在譴責和平主義是對民族的背叛。[107]希特勒上台後的幾年，法國政黨制度的完整性遭受到了更大的災難。在慕尼黑危機期間，從左派到右派都發生內部分裂，焦點是同一個政治問題：誰贊同、誰反對向德國開戰。[107]每一個政黨都分裂成一個主和派和一個主戰派；在主要政治問題的決策上沒有一個政黨能保持團結統一，沒有一個政黨面對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不分裂成反法西斯派和納粹的追隨者。希特勒可以從所有的政黨中自由地挑選並扶持傀儡政府，這是戰前情勢造成的結果，不是納粹的一種特別精明的操作。在歐洲，沒有一個政黨未產生與納粹合作的人。

與舊政黨的解體相反，到處都可見到法西斯主義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團結統一——前者在德國和意大利之外忠實地鼓吹和平，不惜犧牲海外領地，後者長期鼓吹戰爭，不惜以民族的毀滅爲代價。但是，關鍵並不在於各地的極右派拋棄傳統的民族主義，贊同希特勒治理歐洲，極左派忘記了它傳統的和平主義，贊同舊民族主義口號，而是這兩種運動可以依靠其成員和領導者的忠誠，不會因政策突然轉向而受干擾。這一點在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一事上暴露出來，當時納粹不得不放棄他們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主要口號，而共產主義者不得不轉向和平主義，他們一向譴責這是小資產階級主張。這種突然轉向絲毫不曾損傷他們。人們仍可清楚地記得，在此之後不到兩年，納粹德國進攻蘇聯，共產主義者在第二次轉向之後依

然很強大，儘管事實上這兩種政治路線使平民百姓們都捲入了嚴重而危險的政治活動，要求眞正的犧牲和經常性的行動。

外表上不同、但實際上更爲猛烈的是希特勒掌權之前德國政黨制度的垮台。在 1932 年的最後一次總統選舉中，這件事就公開發生了，當時一切政黨都採用了全新的、形式複雜的大規模宣傳。

推舉候選人這件事本身就相當奇怪。兩種運動都理所當然地置身局外，並且站在各自的對立面上反對議會制度，都提出了自己的候選人（納粹黨提名希特勒，共產主義者提名台爾曼〔Ernst Thälmann〕），令人十分驚奇的是，其他黨派都會突然同意一名候選人。這名候選人正是年老的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他獲得了無比的聲望，眾人自從麥克馬洪時代以來，靜待一個戰敗的將軍返鄉，這卻不只是一個笑話；這顯示出舊政黨多麼想和舊時代的國家認同，一個在政黨之上的國家，它的最有效象徵曾是國家的軍隊，換言之，他們實際上早已拋棄了政黨制度。面對著兩種運動，政黨之間的差別確實已變得毫無意義；它們的存在都已成了問題，因此它們經常聯合起來，希望維持現狀，保證它們的生存。興登堡成了民族國家和政黨制度的象徵，而希特勒和台爾曼卻互相競爭，要做人民眞正的代表。

競選宣傳口號很有意思。這些口號都不宣傳候選人自身的優點；興登堡派的宣傳口號是「投台爾曼一票等於投希特勒一票」，這句話警告工人們不要浪費選票，去投給一個肯定會落選的人(指台爾曼)，而讓希特勒占了便宜。社會民主黨人就這樣同興登堡妥協了，而他根本不是他們提名的人。右翼政黨玩弄同樣的把戲，強調「投希特勒一票就是投台爾曼一票」。這兩句口號都十分明顯地含指納粹和共產主義是一回事，目的在於使一切忠誠的黨員（無論左派還是右派）相信，若要維持現狀，就需要興堡登。

興堡登的宣傳，是呼籲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現狀——在 1932 年，這意味著德國民眾幾乎有一半人失業；與此相反，兩種運動的候選人都不得不站

在那些主張不惜一切代價改變現狀的人一邊（哪怕這種代價是摧毀一切合法的機構），這些人就是人數越來越多的幾百萬失業者和他們的家庭。於是，納粹毫不示弱地提出「投台爾曼一票就是投興堡登一票」的口號，共產主義者也毫不猶豫地回敬「投希特勒一票就是投興堡登一票」，雙方都用現狀的可怕來威脅投票者，這同他們的對手用革命的鬼影來威脅自己的成員的手法如出一轍。

三個候選人的支持者們所用的手法完全一致，也心照不宣地明白，選舉成敗就看心懷恐懼的投票者了——他們是害怕共產主義，害怕納粹，或者害怕現狀。在這種普遍的恐懼中，一切階級分野在政治舞台上都消失了：維護現狀的政黨同盟模糊了各自政黨中維持的舊階級結構，兩種運動中的普通成員也是成分複雜，就像失業現象一樣動盪起伏。[110]在國家制度的架構內，議會左派加盟議會中的右派，而兩種運動就忙於共同組織 1932 年 11 月柏林街頭著名的運輸工人大罷工。

在思考大陸政黨制度異常迅速地衰落問題時，應該記住整個機制的壽命很短。在十九世紀以前它還不存在，在歐洲大多數國家裡，政黨的形成發生於 1848 年之後，因此它作爲一種無法動搖的體制在國家政治中只延續了不到四十年。在十九世紀的最二十年，法國以及奧匈帝國內一切有意義的政治發展，都早已在議會各政黨之外及對立面上發生了，而各地較小的帝國主義性質的「政黨之上的政黨」也在向這種體制挑戰，目的在於爭取人民支持一種侵略性的、擴張主義的外交政策。

當帝國主義聯盟將自身置於各政黨之上，將自己等同於民族國家時，各種泛—運動卻攻擊這些政黨是一種包含了民族國家的總體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們不是「在政黨之上」，而是「在國家之上」，以便直接與民眾認同。極權主義運動最終也會走向拋棄民眾，它們緊緊追隨泛—運動的腳步，民眾只被它們利用來達到宣傳的目的。「極權主義國家」（totalitarian

state)只在外表上是一個國家，這個運動不再眞正地將自身認同於民眾的需要。這個運動現在高於國家和人民，爲了其意識形態，它會隨時犧牲國家和人民：「這個運動……既是國家也是民眾，而目前的國家……目前的德國民族，倘若沒有這個運動，就都不可置信。」⑪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大陸竭力復興政黨制度，結果很慘。納粹主義失敗之後還有不斷爲之招魂的運動，布爾什維克主義明顯地威脅著民族獨立，這無疑都證明了政黨制度不可避免地淪衰了。一切努力恢復現狀的結果只是恢復了一種政治情勢，在其中唯有毀滅一切的各種運動才是能恰當地產生作用的「政黨」。在最困難的條件下，儘管政黨的路線經常變化，各種運動仍占據權威性的領導地位。爲了正確估計歐洲民族國家的生存機會，最明智的辦法是不要過分注意民族主義的口號——各種運動只是偶爾用這種口號來掩蓋眞正意圖的——而是應該想到，現在每一個人都知道它們是國際組織的地區分支；民眾不應爲一些事情而騷動不安，例如它們的政策明顯地服務於另一個（甚至是敵對的）強權的外交政策利益；而譴責領導人是第五縱隊、叛國者等等，也不會引起這些人的注意。和各種舊政黨相比，各種運動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如今是唯一的「政黨」，對於其追隨者來說，它們仍然充滿著生命力和意義。

註釋

⑪希特勒在《我的奮鬥》(*Mein Kampf*)(紐約版，1939)中寫道：在維也納，「我奠定了總體的世界觀和一種具體的政治思想方法，後來我只是在細節上添加，但是從未在以後拋棄過它。」(129頁)——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回到了泛斯拉夫主義口號。1945年在索菲亞舉行的泛斯拉夫大會是由勝利了的俄國人召集的，大會通過了一項決定，宣布它「宣稱俄語作爲全體斯拉夫國家的一般交往語言和官方語言，這不僅是國際政治的需要，也是一種道德上的需要。」

（見《建設》〔*Aufbau*〕雜誌，紐約，1945年4月6日）在此之前不久，保加利亞電台廣播了一篇文章，神聖保加利亞宗教會議的教皇代理人梅特羅波利坦·斯特凡〔Metropolitan Stefan〕號召俄國人民「記住他們的救世使命」，並且預言「斯拉夫民族統一」即將到來。（見《政治》〔*Politics*〕雜誌，1945年1月）

❷關於斯拉夫文化優越論的討論，參見亞歷山大·柯依雷（Alexandre Koyré），《十九世紀初俄國哲學與民族問題》（*La Philosophie et le problème national en Russie début du 19e siecle*）（列寧格列弗朗西斯學院目錄，第10卷，巴黎，1929）

❷恩斯特·海斯（Ernst Hasse），《德國政治》（*Deutsclce Politik*）第4冊，《德意志民族之未來》（*Die Zukunft des deutschen Volkstums*）（1907），132頁。

❹同上，第3冊，《德國的政治邊界》（*Deutsche Grenzpolitik*），167－168頁。這種地緣政治理論在泛德聯盟成員中很流行。他們總是將德國同俄國作地緣政治之需要的比較。奧地利泛日耳曼主義者的特點卻是從來不作這種平行比較。

❺斯拉夫文化優越論的作家達尼羅斯基（N. Y. Danilewski）的《俄國與歐洲》（*Russia and Europe*）（1871）成爲泛斯拉夫主義的標準著作，他贊揚俄國人的「政治能力」，因爲他們的「千年大國仍在生長，它的力量不像歐洲強權那樣以殖民方式擴張，而總是圍繞著它的核心莫斯科。」見史塔埃林（K. Staelin），《俄國史》（*Geschichte Russlands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1923-1939，五卷本）第4卷，1頁及274頁。

❻引自波蘭政論家斯洛沃基（J. Slowacki）在四十年代的著作，見洛斯基（N. O. Lossky），《波蘭救世主義歷史三章》（*Three Chapters from the History of Polish Messianism*）（布拉格，1936），第2卷，9頁。

泛斯拉夫主義是各種泛—主義中的第一種（見霍埃茨〔Hoetzsch〕《俄國》〔*Russland*〕，柏林，1913，439頁），差不多在泛日耳曼主義開始「以大陸思考」之前四十年就發表了這些政治理論。英國海上霸權和大陸霸權之間的對比十分顯著，其意義要過很久才能看到。

❷里斯曼-格羅恩（Reismann-Grone），《海外政治還是大陸政治?》（*Uebersee-*

politik oder Festlandspolitik)(1905)，泛德聯盟宣傳小冊，第 27 期，17 頁。

❽泛德聯盟的恩斯特・海斯提議像海外帝國主義對待非歐洲大陸的土著一樣對待某些民族(波蘭、捷克、猶太、意大利，等等)。見《德國政治》第 1 冊，《作為民族國家的德意志帝國》(*Das Deutsche Reich als National Staat*)(1905)，62 頁。這是 1886 年成立的泛德聯盟與成立於 1863 年的「商業地理協會」(Centralverein für Handelsgeographie)之類較早的殖民主義社羣之間的主要區別。關於泛德聯盟的可靠記載，可參見米爾德雷・威泰海默(Mildred S. Wertheimer)，《1890-1914 年的泛德聯盟》(*The Pan-German League, 1890-1914*)(1924)。

❾埃米爾・德克特(Emil Deckert)，《泛拉丁主義、泛斯拉夫主義、泛條頓主義及其在國際政治形勢中的意義》(*Panlatinismus, Panslavismus und Panteutonismus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ie politische Weltlage*)(美茵河畔法蘭克福，1914)，4 頁。

❿泛日耳曼主義者們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就談論「外國人」(Staatsfremde)(居住在另一個主權國家的德裔)和「外族人」(Volksfremde)(居住在德國的外裔)之間的區別。參見丹尼爾・弗萊曼，《如果我是皇帝：談政治的眞理與必然性》(1912)。

當奧地利併入第三帝國時，希特勒對奧地利德國人的演講是典型的泛日耳曼主義口號。「無論我們生在何處」，他對他們說，我們都是「日耳曼人的後代」。見貝恩斯(N. H. Baynes)主編《希特勒演講集》(*Hitler's Speeches*)(1942)，第 2 卷，1408 頁。

⓫馬薩利克(Th. G. Masaryk)，《俄國歷史哲學與宗教哲學》(*Zur russischen Geschichts und Religionsphilosophie*)(1913)描述了自達尼羅斯基以來的斯拉夫文化優越論者的「動物學民族主義」(zoological nationalism)。泛德聯盟的正規歷史學家奧托・邦哈德(Otto Bonhard)指出了它的意識形態同高比諾和豪斯頓・斯圖亞德・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的種族主義有密切聯繫。見《泛德聯盟史》(*Geschichte des alldeutschen Verbandes*)

(1920)，95 頁。

⑫弗里德里希·諾曼(Friedrich Naumann)是例外，他的《中部歐洲》(*Central Europe*)(倫敦，1916)提出用一個統一的「經濟民族」代替中歐的許多民族，由德國來領導。儘管他的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很暢銷，但是只影響了奧地利社會民主黨；見卡爾·倫納(Karl Renner)，《奧地利改革：政治計劃論文》(*Österreichs Erneuerung: Politisch-programmatische Aufsätze*)(維也納，1916)，37 頁。

⑫「至少在戰前，一些較大的政黨在外交事務上的利益完全被國內問題掩蓋了。泛德聯盟的態度不同，而這無疑是一種宣傳主張。」(馬丁·溫克〔Martin Wenck〕，《泛德聯盟的策略》〔*Alldeutsche Taktik*〕，1917)

⑫見保羅·莫利希(Paul Molisch)，《奧地利的德意志民族運動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nationalen Bewegung in Österreich*)(耶拿，1926)，90 頁：事實上「學生團體並不只是反映一般政治總體情況；相反，泛日耳曼主義的強烈觀點大部分產生於學生團體，從那裡找到通向一般政治的道路。」

⑫關於泛德聯盟成員的社會結構、它的地區官員和執行官員的情況，可參見威泰海默，前引書。亦見羅塔爾·維納(Lothar Werner)，《泛德聯盟，1890－1918》(*Des alleleutsche Verband, 1890-1918*)(柏林，1935)，歷史研究叢書，第 278 冊，以及高特弗利德·尼波爾德(Gottfried Nippold)，《德意志沙文主義》(*Der deutsche Chauvinismus*)(1913)，179 頁。

⑫引自漢斯·科恩(Hans Kohn)，〈永恆的使命〉(The Permanent Mission)，載《政治評論》(*The Review of Politics*)，1948 年 7 月。

⑫見達尼羅斯基，前引書；未來的俄羅斯帝國將包括所有的巴爾幹地區國家——土耳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的加利西亞(Galicia)伊士特里亞(Istria)半島及崔伊斯特(Trieste)港等等。

⑫斯拉夫文化優越論者阿克薩科夫(K. S. Aksakow)在十九世紀中葉採用了正式名稱「神聖俄羅斯」(Holy Russia)，後來又改爲泛斯拉夫。泛日耳曼主義的模糊意義，表達最典型者是莫勒·范登布魯克(Moeller van den Bruck)，

他在《德意志第三帝國》(*Germany's Third Empire*)(紐約,1934)中宣稱說:「只有一個帝國,就像只有一種宗教一樣。其他宣布這個稱號的可能是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團體,或者一個部分。只存在『這個帝國』。」(263 頁)

⑲喬治·克萊瑙(George Cleinow),《未來的波蘭》(*Die Zukunft Polens*)(萊比錫,1914),第 12 卷,93 頁。

⑲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1853-1856),俄羅斯民間文學作家、語文學家米哈伊爾·帕戈庭(Michael Pagodin)寫信給沙皇,稱斯拉夫各民族是俄羅斯的唯一可靠而且有力的同盟者(見史塔埃林,前引書,35 頁);此後不久,尼古拉依·莫拉維也夫-阿穆爾斯基(Nikolai Muravyev-Amursky)這位「大俄羅斯帝國創建者之一」希望「斯拉夫各民族從奧地利和土耳其手中解放出來」(漢斯·科恩,前引書);早在 1870 年就出現過一本軍方的宣傳冊,要求「摧毀奧地利,作爲建立泛斯拉夫聯邦的必要條件」。(史塔埃林,前引書,282 頁)

⑲見奧托·邦哈德,前引書,58 頁,亦見雨果·格雷爾(Hugo Grell),《泛德聯盟的歷史、奮鬥目標和成就》(*Der alldeutsche Verband, seine Geschichte, seine Bestrebungen, seine Erfolge*)(1898),泛德聯盟宣傳小冊,第 8 號。

⑲根據奧地利 1913 年泛日耳曼計劃,引自愛多亞德·皮切爾(Eduard Pichl),《蓋奧爾格·肖納勒傳》(*Georg Schönerer*)(1938),六卷本,第 4 卷,375 頁。

⑲當崇拜俾斯麥的肖納勒在 1876 年聲稱「奧地利應該停止作爲強權國家」(皮切爾,前引書)時,俾斯麥對他的奧地利崇拜者說,「一個強大的奧地利對德國來說具有重大的必要性。」(參見紐謝弗〔F. A. Neuschäfer〕,《論肖納勒》(*Georg Ritter von Schönerer*),漢堡,1935。)俄國沙皇對泛斯拉夫主義的態度要曖昧得多,因爲泛斯拉夫主義的國家概念中含包了人民對君主專制政府強力的支持。然而即使在這種誘惑的情況下,沙皇仍然拒絕支持斯拉夫文化優越論者的擴張主義要求。(史塔埃林,前引書,30 頁。)

⑳參見本書第 2 章。

⑲皮切爾,前引書,第 1 卷,326 頁,譯引自奧斯卡·卡巴赫(Oscar Karbach)

的出色論文〈現代政治反猶主義的創始人：肖納勒〉(The Founder of Modern Political Antisemitism: Georg von Schönerer)，載《猶太社會研究》，第6卷，第1號，1945年1月。

㉖瓦西里耶夫·羅札諾夫，《落葉》(*Fallen Leaves*)(1929)，163－164頁。

㉗見馬卡特內(C. A. Macartney)，《民族國家與民族少數》(*National States and National Minorities*)(倫敦，1934)，432頁。

㉘卡爾·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㉙見德洛斯(J. T. Delos)，《論民族》(*La Nation*)(蒙特利爾，1944)。

㉚見羅昂(Duc de Rohan)，《君主利益與基督教國家》(*De l'Intérêt des Princes et Etats de la Chrétienté*)(1638)，題獻給黎希留大主教(Cardinal Richelieu)。

㉛對主權原則作出最具啓發意義的解釋的著作仍推讓·布丹(Jean Bodin)，《共和國六論》(*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1576)。對布丹的理論作最佳述評的是喬治·薩賓(George H. Sabine)，《政治理論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1937)。

㉜在這個問題上，奧地利的卡爾·雷納(Karl Renner)和奧托·鮑厄(Otto Bauer)的社會主義觀點很有趣，他們將民族性同它的領土基礎完全分離，使它成爲一種個人地位；這當然對應於一種情勢，種族羣體分散在帝國各地，而不失去它們的任何一種民族特點。參見鮑厄，《民族性問題與奧地利社會民主》(*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Österreichische Sozialdemokratie*)(維也納，1907)中論及(相對於領土的)原則，332及353頁。「個人原理不是想將民族組成領土上的實體，而是純粹的個人聯盟。」

㉝皮切爾，前引書，第1卷，152頁。

㉞若無這些條件，任何一種泛一運動都不可能充分發展。泛一拉丁主義是一種誤稱，只是幾個拉丁民族的幾次流產的嘗試，想組成某種聯盟，對抗德國的威脅，甚至連波蘭的彌賽亞主義也向來只要求收回早先曾控制過的領土。亦見德克

特前引書，他於 1914 年指出：「泛拉丁主義越來越衰落，而國家意識越來越強烈，比在歐洲其他地方更具潛力。」（7 頁）

[35]尼古拉・伯德耶也夫(Nicolas Berdyaev)，《俄國共產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 of Russian Communism*)(1937)，102 頁。阿克薩科夫在 1855 年稱俄羅斯民族爲「地球上唯一的基督教民族」。(參見漢斯・愛倫伯格〔Hans Ehrenberg〕和巴勃諾夫〔N. V. Bubnoff〕，《東方的基督教》〔*Östliches Christentum*〕，第 1 卷，92 頁）詩人梯烏切夫(F. I. Tyuchev)同時斷言：「俄羅斯民族屬於基督教，不僅是通過它的正統信念，而且通過某種更直接的因素。它的道德天性的基礎就是斷絕俗念和獻身。」(引自漢斯・科恩，前引書。)

[36]根據恰達耶夫(P. Y. Chaadayev)的說法。他的《1829－1831 年哲學通信》(*Philosophical Letters 1829-1831*)第一次嘗試系統地以俄羅斯民族爲中心來看待世界歷史。(見愛倫伯格，前引書，第 1 卷，5 頁。)

[37] 1945 年 1 月 30 日的演說。見載於《紐約時報》，1945 年 1 月 31 日。

[38]坦波夫(Tambov)主教呂克(Luke)的話，引自《莫斯科主教雜誌》(*The Journal of Moscow Patriarchate*)，第 2 期，1944。

[39]這一點早已由俄國耶穌會會士伊凡・加加林(Ivan S. Gagarin)親王認識到，他在小冊子《俄羅斯是否屬於天主教?》(*La Russie sera-t-elle catholique?*)(1856)中攻訐斯拉夫文化優越論者，因爲「他們希望建立最完整的宗教、政治和民族的一致性。他們在外交政策方面希望合併一切東正教民族，以及無論何種宗教信仰的一切斯拉夫人，併入一個斯拉夫東正教大帝國。」(引自漢斯・科恩，前引書)

[40]「人們將認識到，人在這個世界上別無命運，只是致力於摧毀他的個性，代之以一種社會性的、非個人的存在。」(恰達耶夫，前引書。引自愛倫伯格，前引書，60 頁)

[41]弗萊曼(前引書，186 頁)的話很典型：「我們知道自己民族的優點和缺點——我們不懂人類，也不關心或熱心於人類問題。它從何處開始，到何處結束，難道因爲它屬於人類，我們就假裝關心……? 頹廢的或半獸類的俄羅斯村社農民、

東非的黑人、德屬西南非洲的混血種、或者加利西亞和羅馬尼亞那些令人無法容忍的猶太人，難道都是人類成員？……值得相信的是日耳曼各民族的團結——誰在這個範圍之外，就對我們無足輕重。」

㊷弗里德里希·諾曼在《論中歐》(*Central Eurape*)中論述過關於地理距離縮短的問題：「應該只有『一個羊羣和一個牧人』的日子畢竟還很遙遠，但是無數大大小小的牧人在歐洲牧場上無拘無束地驅趕自己的羊羣的日子畢竟也過去了。大工業和超民族組織的精神掌握了政治。如塞西爾·羅德斯所說，人們「以大陸」來思考問題(think…"in Continent")。」以上這些話在當時被無數文章引用過。

㊸蘇聯遺傳學的新理論十分有趣。繼承已有的特點，明顯地意指生活在不利條件下的羣眾會傳遞更貧困的遺傳天性，反之亦然。「總之，我們應該有天生的支配種族及臣屬種族。」參見穆勒(H. S. Muller)，〈蘇聯的主人種族理論〉(The Soviet Master Race Theory)，載《新領導者》(*New Leader*)，1949年7月30日。

㊹費多托夫的(G. Fedotov)的〈俄羅斯與自由〉(Russia and Freedom)(載《政治評論》，第8卷，第1期，1946年1月)是一篇眞正的歷史學名著；它概括了俄羅斯的全部歷史。

㊺伯德耶也夫，前引書，29頁。

㊻阿克薩科夫，引自愛倫伯格，前引書，97頁。

㊼例如，肖納勒抱怨奧地利「憲法黨」仍將民族利益從屬於國家利益。(皮切爾，前引書，第1卷，151頁)亦見格拉夫·雷凡特勞(Graf E. Reventlow)，《德國猶太人的鬥爭與失敗》(*Judas Kampf und Niederlage in Deutschland*)(1937)，39頁。雷凡特勞認爲國家社會主義是實現了泛日耳曼主義，因爲它拒絕將只是民眾生活的功能之一的國家「偶像化」。

㊽恩斯特·海斯，《德國的世界政治》(1897)，泛德聯盟宣傳小册，第5號；《德國政治》第1册：《作爲民族國家的德意志帝國》(1905)，50頁。

㊾威泰海默，前引書，209頁。

㊿羅札諾夫，前引書，56－57頁。

㊿奧斯卡・卡爾巴赫，前引書。

㊿路易斯・萊文(Louis Levine)，《泛斯拉夫主義與歐洲政治》(*Pan-Slavism and European Politics*)(1914)描述了從舊式斯拉夫文化優越論的一代到新的泛斯拉夫運動的演變。

㊿奧斯卡・卡爾巴赫，前引書。

(54)「林茲綱領」(Linz Program)當時還是奧地利泛日耳曼主義的綱領，原先文中並無猶太人問題這一段；1882年的綱領起草委員會中甚至還有三名猶太人。1885年加進了猶太人問題的一段文字。(見奧斯卡・卡爾巴赫前引書)

㊿奧托・邦哈德，前引書，45頁。

㊿非反猶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奧托・鮑厄即如是說，見前引書，373頁。

㊿斯坦伯格(A. S. Steinberg)的論文〈論猶太歷史學家世界觀的先決條件〉(Die weltanschaulichen Voraussetzungen der jüdische Geschichtsschreibung)(載《杜勃諾夫紀念文集》〔*Dubnov Festschrift*〕，1930)闡明了猶太人的自我解釋：「如果一個人……相信猶太歷史中表現的生命觀……那麼國家問題就失去了它的重要性，至於如何回答問題，那是無關緊要的。」

㊿這兩種觀念的近似可以見之於下列巧合，而且還有更多的例子可證明：斯坦伯格（見前引書）說猶太人是：他們的歷史發生於一切通常的歷史法則之外；恰達耶夫把俄國人稱作是一個例外的民族。伯德耶也夫也直率地說過：「俄羅斯救世說與猶太救世說是一樣的。」

㊿參見反猶分子雷凡特勞的前引書，亦見擁護猶太人的俄國哲學家弗拉季米爾・索洛維約夫(Vladimir Solovyov)所著《猶太教與基督教問題》(*Judaism and the Christian Question*)(1886)：在俄羅斯與波蘭這兩個宗教民族之間插進了第三個宗教民族，即猶太人。(見愛倫伯格，前引書，314頁)

㊿約翰・寇提斯(John S. Curtiss)，《錫安的草案》(*The Protocols of Zion*)，紐約，1942。

㊿見伯德耶也夫，前引書，5頁：「莫斯科公國的宗教與民族共同成長，正如在古

代希伯來民族的意識中一樣。猶太教有一種救世意識(Messianic consciousness)，俄羅斯的正教同樣也有這樣一種救世意識。

(62) 整個事情的瘋狂性質可由一個奇妙的例子來解釋。列昂·勃洛埃(Léon Bloy)——幸虧他不是法國民族主義者——說：「法蘭西是最早的這樣一個民族，其他民族任憑是誰，只要獲准去吃她的狗的食物，就會感到榮耀。如果法蘭西幸福了，世界上其餘民族即使爲了她的幸福而受奴役、遭毀滅，也會感到滿意。而如果法蘭西遭難，那麼上帝本人也受難了……可怕的上帝。這是絕對必然的命運的秘密。」(轉引自納多內〔R. Nadolny〕，《日耳曼主義還是斯拉夫主義?》〔*Germanisierung oder Slavisierung?*〕，1928)。

(63) 見拉歇爾(M. Larcher)，《論阿爾及利亞立法的基礎》(*Traité Elémentaire de Législation Algérienne*)(1903)，第2卷，150－152頁：「法國所有的殖民地政府都是命令政府。」

(64) 尤見《城堡》(*The Castle*)(1930)中意義深遠的巴那貝斯的故事，讀起來像對俄羅斯文學中可怕情形的滑稽模仿。這個家族生活在詛咒之下，被當作痲瘋病人那樣對待，一直到他們自己察覺，而這也只是因爲他們的美貌女兒之一有一次敢於拒絕一位重要官吏的非禮。村民們事無巨細皆受官僚控制，奴隸們受到握有絕對權力的官吏們奇怪念頭的支配，他們長久以來就明白，生活的好壞對他們來說只是「命運」，是他們無力改變的。小說揭露的不是無辜地送一封淫猥的信的K，而是腐敗的收信人。村民們所說的「命運」就是這個意思。據K看來，「這不公平，太可惡，但是(他是)村裡唯一有那種觀點的人。」

(65) 將偶然奉爲神聖，這當然是用來使每一個並非自己命運的主人的人合理化。斯坦伯格說：「偶然性是構成猶太歷史的決定因素。而偶然性……用宗教的語言來說就是神意。」(見前引書，34頁)

(66) 一位俄國作家曾說過泛斯拉夫主義「產生了一種對西方的深刻仇恨，病態地推崇俄羅斯的一切。泛斯拉夫主義者到處發現自己的思想敵人，迫害每一個不同意他們觀點的人……」(維克多·貝拉德〔Victor Bérard〕，《俄羅斯帝國與沙皇統治》〔*L'Empire russe et le tsarisme*〕，1905)。亦見巴伯諾夫(N. V. Bubnoff)，《俄

羅斯文化與歷史的現代思考》(*Kultur und Geschichte im russischen Denken der Gegenwart*)(1927),「東歐研究」叢書(Osteuropa: Quellen und Studien),第2冊,第5章。

㉗愛倫伯格強調說:基雷耶夫斯基(Kirejewski)、喬姆雅可夫(Homjakow)、列昂節夫(Leontjew)的想法「在俄國革命後可能會消失。但是他們的觀點現在在歐洲到處流行,如今仍活躍在索非亞、君士坦丁堡、柏林、巴黎、倫敦。俄羅斯人,尤其是這幾位作家的信徒們,……出版書籍,編輯刊物,發行全歐洲;通過這些出版物,他們的精神之父們的思想得到傳播。俄羅斯精神變成了歐洲精神。」(見前引書,334頁)

㉘關於政黨機器的官僚化,羅伯特·米切爾斯(Robert Michels)的《政黨:對現代民主中寡頭政治傾向的社會學研究》(*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1911年德文版,1949年英文版)仍可視爲一本標準著作。

㉘史塔埃林,〈泛斯拉夫主義的產生〉(Die Entstehung des Panslawismus)(載《日耳曼—斯拉夫》〔*Germano-Slavica*〕,1936年,第4卷)。

㉙卡特可夫(M. N. Katkov):「一切力量來自上帝;但是,俄國沙皇具有特殊意義,與世界上其餘統治者不同。……他是東方帝國的凱撒的繼承者,……基督信仰教義奠基人的繼承者。……這裡存在著俄羅斯同世界上其他一切國家之間的神秘的深刻區別。」(引自沙羅·巴隆〔Salo W. Baron〕,《現代民族主義與宗教》〔*Modern Nationalism and Religion*〕,1947。)

㉚波別耶多諾茨也夫在《一個俄羅斯政治家的思考》(*Reflections of a Russian Stateman*)(倫敦,1898)中說:「權力不僅爲自身而存在,而且也爲了熱愛上帝。這是人的一種奉獻。因此權力是一種無限的、可怕的力量,它本身也是一種無限的、可怕的負擔。」(254頁)「法律變成了不僅是對民眾的圈套,也是對統治者的圈套,如果執法者在每一步上都發現法律本身的束縛,那麼一切統治者都會疑惑地感到自己因法律而變虛弱,並且會因害怕負責任而徹底失去信心。」(88頁)

⑫卡特可夫認爲「俄國政府含義完全不同於其他國家對政府這個詞的理解。在俄國，政府的概念取其最高的含義是指執政的最高權力。」（奧爾金〔Moissaye J. Olgin〕，《俄國革命的靈魂》〔*The Soul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紐約，1917）比較理性的說法是「以征服而建立、受到階級衝突和種族衝突威脅的國家需要法律的保障；俄國的階級和諧和種族友誼使法律成爲多餘。」（漢斯·科恩，前引書。）

儘管權力偶像化在泛日耳曼主義運動中不起多大作用，但也總有一種反對法律的傾向，例如弗萊曼早在1912年就建議實行「保護性監管」(protective custody; Sicherheitshaft)，亦即無須法律理由便可實施逮捕，後來納粹就用這種藉口建立集中營。（參見前引書）

⑫當然，在德雷富斯事件期間的法國暴民組織與俄國「黑色百人團」(Black Hundreds)之類迫害猶太人的組織之間有明顯的相似之處，黑色百人團中「舊俄羅斯最野蠻和最無文化的渣滓同大多數正統主教團人士關係密切」。（費多陶，前引書）或者「俄羅斯人同盟」中的秘密「戰鬥隊」，其人員招募自下層警官，政府付給薪水，由知識分子領導。（參見切利柯佛〔E. Cherikover〕，〈八十年初俄國迫害猶太人的新資料〉〔New Materials on the Programs in Russi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ies〕，載《歷史文獻》〔*Historische Schriften*〕第2卷，第463期；蓋爾伯〔N. M. Gelber〕，〈奧地利外交通訊中的八十年代初期俄國對猶太人的迫害〉〔The Russian Progroms in the Early Eighties in the Light of the Austrian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同上。）

⑭戴洛斯，前引書。

⑫ 1844年，德國殖民主義協會主席如是說。（參見瑪麗·湯森德，《近代德國殖民主義的起源》，紐約，1921）泛德聯盟一向堅持自稱「超越黨派；這過去是、現在也是本同盟的一個重大條件」。（奧托·邦哈德，前引書）第一個眞正宣布自己不只是一個政黨的是德國的民族自由黨(National-Liberal Party)，所謂的「帝國黨」(imperial party)，其領導人是恩斯特·貝塞爾曼(Ernst Bessermann)。（見奧爾金，前引書，57頁）

在俄國，泛斯拉夫主義者只須假裝全力支持政府，以避免同一切政黨競爭；其理由是政府係「行動中的最高權力……不能被理解爲同政黨有關。」波別耶多諾茨也夫在新聞界的親密合作者卡特可夫亦持相同觀點。(見奧爾金，前引書，57 頁)

⑯這明顯地仍然是早先一些「政黨之外」羣體的目的，直到 1918 年之前，泛德聯盟仍在其中。「我們站在一切有組織的政黨的立場之外，走純粹的民族道路。我們並不問：你是保守黨嗎？你是自由黨嗎？……日耳曼民族是一個會集點，一切政黨都可以據此創造共同的事業。」(萊爾〔Lehr〕，《泛德聯盟的目標與目的》〔*Zweck und Ziel des allcleutschen Verbandes*〕，宣傳小冊，第 14 號，譯文引自威泰海默，前引書，110 頁)

⑰卡爾·施密特(Karl Schmitt)，《國家、運動、民眾》(*Staat, Bewegung, Volk*)(1934) 提及「在十七與十八世紀，國家獲得了對政治的壟斷」。

⑯威泰海默十分正確地描述了這種情形，她說：「要說戰前泛德聯盟與帝國政府之間就有重大關係，這是十分荒謬的。」(前引書) 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的政策受到泛日耳曼運動的極大影響，因爲高級軍官團都變成了泛日耳曼主義者，這也是事實。(見漢斯·德爾布呂克〔Hans Delbrück〕，《魯登道夫的自畫像》〔*Ludendorffs Selbstportrait*〕，柏林，1922；〈泛德主義者〉〔Die Alldeutschen〕，載《普魯士年鑒》〔*Preussische Jahrbücher*〕，第 154 卷，1913 年 12 月。

⑯西格蒙·紐曼，《德國政黨》(*Die deutschen Partein*) (1932)，99 頁。

⑰莫勒·范登布魯克《第三帝國》(*Das dritte Reich*) (1923) 描述了此種情形：「當世界大戰以失敗告終，我們在每一個地方遇到的德國人都說他們不屬於任何政黨，他們談論『擺脫政黨』，試圖找到一種『超越政黨』的觀點。對議會則完全缺乏尊重，所以在任何時候都對國內發生的眞實事情一無所知，這種情形在民眾中間很普遍。」

⑯英國對議會的「前排制」不滿，這與反議會的情緒無關，而只表明英國反對某些阻礙議會發揮適當功能的事物。

⑯英國的政黨制度是最古老的一種，「只有當王權不再統攬國家事務時，它才成

形……」這是指 1688 年。「國王的歷史作用是代表國家統一，反對黨派紛爭。」（見拉德林〔W. A. Rudlin〕主編，《社會科學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中〈政黨〉〔political parties〕條目下，「英國」的部分。）

❽喬治·庫克（George W. Cooke），《政黨史》（*The History of Party*）（倫敦，1936）中論述「政黨」的早期歷史，他在序言裡界定政黨爲一種制度，「兩個政治家階級……輪流統治一個強大的帝國。」

❽對大陸政黨制度本質作出最佳論述的是瑞士法學家約翰·卡斯帕爾·勃倫切利（Johann Caspar Bluntschli）的《政黨的特徵與精神》（*Charakter und Geist der politichen Parteien*）（1869）。他指出：「當然，政黨只是一個更大的整體中的一部分，絕不是這個整體本身。它絕對不能將自己認作整體，認作人民或國家；因此一個政黨可以同其他政黨作鬥爭，但是絕不可以無視它們的存在，通常也不能摧毀它們。沒有一個政黨能只憑自身而生存。」德國的黑格爾派哲學家卡爾·羅森克蘭茲（Karl Rosenkranz）也表述過相同觀點，他的論述政黨問題的專著《論政黨的概念》（*Über den Begriff der politischen Partei*）（1843）出版於德國有政黨之前：「政黨就是有意識的派別。」

❽海因伯格（John Gilbert Heinberg），《歐洲主要政府比較研究》（*Comparative Major European Governments*）（紐約，1937）說：「英國的一個政黨通常在下議院占多數席位，黨的領袖都是內閣成員。在法國卻沒有一個政黨實際上占據過眾議院（Camber of Deputies）的多數席位，結果，部長會議由許多政黨團體的領袖組成。」（158 頁）

❽見彼得·羅登（Peter R. Rohden）主編，《民主與政黨》（*Demokratie und Partei*）（維也納，1932）的引言：「德國各政黨的明顯特點是……議會中的一切羣體都不想代表普遍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這就是十一月革命將它們推上權力地位時各政黨感到窘迫的原因。每一個政黨的構成都使它只能發表相對的聲明，即它總是認爲其他政黨的存在代表了其他政黨的利益，因此自然地限制了它自己的雄心壯志。」（13－14 頁）

❽大陸政黨制度較晚出現。只有法國早在大革命時期就有了政黨，這是個例外。

1848 年以前，歐洲其他國家還不懂政黨的表現形式。政黨通過議會中的派別而形成。在瑞典，1889 年成立的社會民主黨是第一個有完整綱領的政黨。（參見路德維希·伯格斯特拉塞〔Ludwig Bergsträsser〕，《政黨史》〔*Geschichte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1921）一切政黨都坦然地以保護利益爲基礎；例如德國保守黨於 1848 年建立，它產生於「保護大土地財產所有者的聯盟」。但是，利益並不一定是經濟上的。荷蘭的政黨的基點是「兩個極大地控制了荷蘭政治的問題——擴大參政權和減少私人（主要是宗教派別的）教育」。

⑱埃德蒙·伯克關於政黨的定義：「政黨是一羣人聯合起來根據他們一致認同的某種特殊原則，通過共同努力來推進民族利益。（《論政黨》〔*Upon Party*〕，第二版，倫敦，1850）

⑱阿瑟·霍爾柯姆（Arthur N. Holcombe）正確地強調，在雙重政黨制度中，兩黨的原則「趨向一致。如果它們的本質不一樣，那麼，服從勝利者對於被征服者來說是將是不可容忍的。」（見《社會科學百科全書》）

⑱伯克在前引書中說：「他們相信，如果不共同行動，誰也不會取得成效；如果行動沒有信心，就不可能有共同行動；如果不根據共同觀點、共同感情、共同利益而團結在一起，就不會在行動中抱有信心。」

⑱在中歐，公民（Citizen; Staatsbürger）的概念是同黨派成員對立的，參見勃倫切利前引書：「政黨不是國家機構，……不是國家機構的成員，而是自由的社會組合，它們構成取決於變動的成員，他們根據特定的信念聯合起來採取共同的政治行動。」國家與政黨利益之間的區別一再得到強調：「政黨絕不可將自己凌駕於國家之上，絕對不可以將政黨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9－10 頁）

相反，伯克反對說政黨利益和作爲政黨成員使人變成壞公民。「共和國由家庭組成，自由的共和國同時也是由政黨組成；我們也可以證明，我們的自然本質和血緣關係使人不可避免地成爲公民，我們同政黨的關係會削弱我們同國家的關係。」（前引書）約翰·羅素（John Russell）勛爵《論政黨》（*On Party*）（1850）甚至斷言政黨的主要效果是「它使政治家鬼影般的觀點有了一個實體，使政治家具有穩定而長久的原則。」

(92)與這種態度比較，英國的拉姆賽·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卻無法在以後洗清他「背叛」工黨的污名。在德國，行政機構的根本精神要求公務員「超然於政黨之外」。舊普魯士的行政機構持這種宗旨，但是納粹針對這一點而主張政黨至上的地位，因爲他們想要獨裁。戈培爾很明確地提出：「每一個擔任國家職務的黨員首先必須是一個國家社會主義者……並且與政黨的統治緊密地合作。」(引自戈特弗利德·尼斯〔Gottfried Nesse〕，《政黨與國家》〔*Partei und Staat*〕，1939，28 頁)

(93)例如殖民協會、商業地理中央學會、海軍協會(Flottenverein)、或者甚至是泛德聯盟，它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與大商業沒有任何聯繫。(參見威泰海默，前引書，73 頁。) 資產階級的「政黨之上的政黨」的典型例子當屬「民族自由黨」(Nationalliberalen)。(參見註(74))

(94)魯登道夫，《世界大戰期間的超國家力量》(*Die überstaatlichen Mächte im letzen Jahre des Weltkrieges*) (萊比錫，1927)。

(95)統合國家的主要目標是「糾正和消除十九世界工業革命引起的狀況，它使工業中的資本與勞動分離，一方面產生了資本主義的雇主階級，另一方面產生了龐大的工業無產階級。這兩個階級的並存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立利益的衝突。」(《法西斯主義時代》〔*The Fascist Era*〕，法西斯主義工業家聯盟出版，羅馬，1979，第 3 章)

(96)「如果國家眞正代表民族，那麼組成民族的人民應該是國家的一部分。

「如何保證這一點？

「法西斯主義的答案就是根據民眾的不同活動將他們組織成各個團體，團體通過它們的領袖……像金字塔一樣逐級上升，最底層是羣眾，塔尖上是國家。

「沒有一個團體可以游離於國家之外、反對國家，它們都在國家之內，國家是民族本身的表現。」(同上)

(97)關於極權主義國家內政黨與國家的關係，尤其是意大利法西斯主義政黨和國家的合作，可參見弗朗茨·紐曼，《政治巨獸》(1942)，第 1 章。

(98)參見〈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黨組織服務守則〉(Dienstvorschrift für die Par-

teiorganisation der NSDAP)(1932)對政黨與運動關係的有趣描述，以及維爾納・貝斯特(Werner Best)在《德國警察》(*Die deutsche Polizei*)(1941)一書中的相同說法：「政黨的任務是……保持運動的團結，向運動提供援助和指導。」(107 頁)

(99)墨索里尼在 1933 年 11 月 14 日的演說中，用一切民族國家在戰時都會採用的論調為他的一黨統治辯護：「政治原則將會存在……共同命運的繫結將會使每一個人放棄對立的利益而團結起來，」因此只需要一個政黨。(貝尼托・墨索里尼，《關於統合國家的四次演講》〔*Four Speeches on the Corporate State*〕，羅馬，1935。)

(99)伯德耶也夫記錄的一則軼事很值得注意：「一個蘇聯的年輕人到了法國……他被問及對法國的印象。他回答說：『這個國家沒有自由。』……這個年輕人如此解釋他對自由的看法：……所謂（法國的）自由就是一切都不變；每一天都同以前的日子一樣；……因此這位來自蘇聯的年輕人在法國感到厭倦。」(前引書，182－183 頁)

(99)敵視奧地利國家的態度有時也發生在德國的泛日耳曼主義者身上，尤其是范登布魯克等外鄉德國人(Auslandsdeutsche)。

(99)希特勒正確地形容過這種情形，他在 1932 年大選時說：「在德國，反對國家社會主義的只是消極的多數。」(引自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領袖》〔*Der Führer*〕，1944，564 頁。)

(99)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法國人口中至少有百分之十是未歸化的外國人。北部採礦業的勞工主要是波蘭人和比利時人，南部農業勞工主要是西班牙人和意大利。(參見卡爾-桑德斯〔Carr-Saunders〕，《世界人口》〔*World Population*〕，牛津，1936，145－148 頁。)

(104)「自從 1918 年以後，沒有一個相繼的國家產生過一個可以容納多種族、多宗教、多階級、多地區的政黨。唯一例外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參見《社會科學百科全書》)

(105)卡爾・馬克思，前引書。

(105)卡爾・施密特，前引書，31 頁。

⑩瓦克拉夫・費亞拉(Vaclav Fiala)〈波蘭的政黨〉(Les Partis politiques polonais)，載《斯拉夫世界》(*Monde Slave*)，1935 年 2 月。

⑩參見查爾斯・米考德(Charles A. Micaud)《法國右派與納粹德國：1933－1939》(*The French Right and Nazi Germany: 1933-1939*) (1943) 中的詳細分析。

⑩最著名的例子是 1958 年法國社會主義黨的分裂，當時布呂姆(Léon Blum)派仍是少數派，在塞納省黨代表大會上反對德業特的慕尼黑團體(pro-Munich group)。

⑩從世紀初到 1933 年，德國社會主義黨派經歷了一種典型的變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其成員中只有百分之十不屬於工人階級，而它獲得的選票百分之二十五來自中產階級。但是到了 1930 年，其成員中工人只占百分之六十，而它獲得的選票至少有百分之四十來自中產階級。(參見西格蒙・紐曼，前引書，28 頁)

⑩施密特，前引書。

第九章
民族國家的衰落與人權的終結

即使到現在,我們也還是幾乎不可能描述1914年8月4日在歐洲究竟發生了什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和之後的日子的分隔，不像一個舊時期的結束和一個新時期的開始，而是像一場爆炸之前的日子和爆炸之後的日子。然而這種說法也像其他一切說法一樣不甚精確,因爲一場大災難之後,悲哀總是無法平息的。第一次爆炸似乎啓動了連鎖反應，我們從此以後便被圈住，誰也無法停止它。第一次世界大戰炸毁了國際禮節，使它壞得無法修補，以往任何一場戰爭都沒發生過這樣的事情。通貨膨漲摧毁了整個小有產者階級，使它毫無恢復或更新的希望，這也是以往任何一次金融危機都未如此厲害地造成的結果。失業人數之多令人不可思議，也不再侷限於工人階級，整個國家都遭此厄運。二十年艱難的和平中發生並蔓延的內戰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血腥、更殘酷；接著是羣體移民，他們不像先前宗教戰爭中的前人那麼愉快，而是到處不受歡迎，到處不能同化。他們一旦離開故鄉，便無家可歸，一旦離開自己的國家，便成了無祖國之人；他們一旦被剝奪了人權,就毫無權利,成了大地上的浮渣。凡是所做的一切,無論多麼愚蠢，無論有多少人事先就知道它的後果，結果也不得不做，後果無法預防。每一個事件最終都會有一個最後判斷，這個最後判斷既不是上帝作的，也不是魔鬼作的，而似乎是某種無法挽救的愚蠢命運的表現。

在極權主義有意識地攻擊、並且部分地摧毁歐洲文明的結構之前,1914年戰爭的爆發及其造成世界不穩定的嚴重後果足以粉碎歐洲政治制度的表面,暴露出它的內藏架構。越來越多的羣體由於這種明顯的暴露而受難,他們所處的世界的規則對他們突然失去作用了。正是周圍世界的表面穩定曾

使每一個團體被逼著走出了它們的受保護地帶，在其他方面顯得健康而正常的規則似乎是一種不幸的例外，卻也都同樣充滿了犬儒的受害者，以及遭受明顯不公正和反常命運的旁觀者。兩者都錯將這種犬儒當成世界運行方式中日益增長的智慧，而實際上他們卻更困惑，因此使他們變得比以前更愚蠢。戰前的世界上當然不乏仇恨，這種仇恨現在開始在到處在公共事務中起著中心作用，以致在二十年代平靜假像的政治舞台上，好像是斯特林堡戲劇中家庭爭吵的那種可憐而又古怪的氣氛。也許沒有其他任何一種描述能比這種對每一個人和每一種事物的模糊而又普遍瀰漫的仇恨更顯示政治生活普遍解體的情形，沒有了熱情關注的焦點，誰也不能對國家事務負責——無論是政府、資產階級，還是一種外在的力量。結果目標轉向一切方向，偶然地、盲目地行動，無法假設太陽底下任何一件事情能有一種健康的、一致的氛圍。

這種支離破碎(disintegration)的氛圍儘管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是整個歐洲的典型現象，但是在失敗的國家裡比在勝利的國家裡更明顯，而在奧匈帝國和沙俄帝國消失後新建立的國家裡充分展露。「混合居民地帶」裡未獲解放的各民族之間最後殘存的團結，隨著中央集權專制官僚政制的消失，也無影無蹤了，這種官僚政制也同樣致力於將散布的仇恨集中起來，使各種衝突的民族主張互相轉移。現在每一個人都在反對另一個人，而大多數人都在反對他最近的鄰居——斯洛伐克人反對捷克人，克羅埃西亞人反對塞爾維亞人，烏克蘭人反對波蘭人。這並非各民族之間和各國人民之間（或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衝突的結果；斯洛伐克人不僅經常破壞布拉格的民主捷克政府，而且同時也屠殺自己土地上的匈牙利少數民族，一方面對這個國家的人民懷著同樣的敵視，另一方面他們自己也互相敵視，波蘭少數民族之間也存在著這種情況。

乍看之下，舊歐洲這塊是非之地上的這些麻煩好像是小小的民族爭端，對歐洲的政治命運不會產生任何後果。然而在這些地區，在戰前歐洲兩個

多民族國家俄羅斯和奧匈帝國消失以後，又出現了兩個受害的羣體，它們的苦難與兩次大戰之間同時代其他羣體的苦難不同；它們的情況比破產的中產階級、失業者、小土地出租者、養老金領取者等等被剝奪了社會地位、工作機會、財產擁有權的人更糟：他們失去了被認爲和被界定爲不可分離的權利，即人權(the Right of Man)。無國籍者(stateless)和少數民族——一個很好的稱語是「表兄弟」(cousins-germane)❶——沒有政府來代表和保護他們，因此被迫生活在關於〈少數民族條約〉(Minority Treaties)的例外法律統治下，所有的政府（除捷克斯洛伐克以外）都在抗議聲下簽署了這種條約，或者生活在絕對沒有法律(absolute lawlessness)的條件下。

隨著東歐與南歐少數民族的出現，隨著無國籍人民被驅逐到中歐和西歐，戰後歐洲出現了一種完全新的分解因素。非民族化(denationalization)變成了極權主義政治的一種有力武器，而歐洲民族國家憲法無力保障那些失去國家保證其權利的人的人權，使那些嗜殺成性的政府甚至有可能將它們的價值標準強加在反對者頭上。凡是迫害者挑選出來作爲人類渣滓的人——猶太人、托洛茨基分子，等等——事實上到處被當作人類渣滓；凡是迫害者稱之爲不受歡迎的人，在歐洲到處不受歡迎。納粹黨衞軍的官方報紙《黑色軍團》(*Schwarze Korps*)在 1938 年就公開聲明，假如全世界還不相信猶太人是人類渣滓，那麼不久就會看到他們變成人類渣滓，變成沒有身份的乞丐、沒有國籍、沒有錢、沒有過境的護照。❷的確，這種事實勝於戈培爾(Joset Goebbels)的宣傳語言，不僅因爲將猶太人定爲人類渣滓，而且它使一個不斷增加的無辜民族落入不可思議的窘境，而以此證明極權主義運動憤世嫉俗的主張，認爲根本不存在所謂不可分離的人權，更斷定民主只是偏見、虛僞，以及面對一個新的世界的殘酷統治而表現出來的懦弱。「人權」對於一切與之有關的人——受害者，迫害者，旁觀者——來說，變成了毫無希望的理想主義和愚庸之弱者僞善的例證。

(一)「少數民族的國家」與無國籍的人民

現代的權力狀況使民族主權除了在大國中才有之外，其餘的都成爲一種嘲諷。帝國主義的興起以及各種泛—運動，從外部破壞了歐洲民族國家制度的穩定。但是，這些因素沒有一個是直接從民族國家本身的傳統和機構中產生的。它們的內部瓦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才開始發生，〈和平條約〉(Peace Treaties)創造了少數民族，而不斷擴大的難民運動是革命的後果。

〈和平條約〉的不足之處常常可以從事實中看出，和平締造者那一代人都只有戰前時代的經驗，因此他們從來不十分明白他們必須以和平來結束的這場戰爭的整體衝擊力。最好的證明是他們試圖通過建立民族國家和制訂少數民族條約來規定東歐和南歐的民族問題。如果這種擴展政府形式的智慧，即使在已有舊的民族傳統但不會處理新的世界政治的國家裡，也變得大有疑問，那麼在一個缺乏民族國家的興起條件的時代再這樣做，就更加可疑了：人口同種，故土同根。但是假設民族國家可以用〈和平條約〉的方法來建立，那就簡直荒謬可笑了。的確，「只要看一看歐洲的人口分布地圖，就足以發現民族國家的原則不適於東歐。」❸條約在一個國家裡歸併許多民族，將其中幾個民族定爲「有國籍民族」(state people)，將統治權委託給它們，又悄悄地假定其它民族(例如捷克斯洛伐克中的斯洛伐克人，或南斯拉夫的克羅埃西亞人和斯洛凡尼亞人)作爲政府中的平等合作者(事實上他們當然不是)，❹並且同樣任意地從剩下的民族中製造出第三個民族團體，稱作「少數民族」，因此使新的國家增加了許多負擔，麻煩地監管對居民中一部分人生效的具體規定。❺結果對於國家不予承認的那些民族來說，無論他們作爲官方認定的少數民族，或者僅僅作爲民族，他們都認爲這個條約是一種獨斷的遊戲，給某些民族以統治權，而對另外一些民族施

以奴役。另一方面，新創建的國家被許諾享有同西方各國地位平等的民族主權，它們將〈少數民族條約〉看作公開的違背諾言和歧視，因爲只有新的國家才需要它，連戰敗的德國也不包括在內。

奧匈帝國解體、波蘭和巴爾幹半島國家從沙皇暴政下的解放，造成複雜的權力眞空，並非誘惑政治家們從事這種災難性實踐的唯一因素。更有力的因素是，一億多歐洲人從未達到民族自由的階段，也未取得過殖民地人民早已渴望的、而他們決不向殖民地人民讓步的民族自決權，這一點已無法再含糊搪塞。的確，西歐與中歐無產階級這個受盡歷史磨難的被壓迫團體的解放，對於整個歐洲社會制度來說是一場生死鬥爭，他們的角色在東歐由「沒有歷史的民族」(peoples without a history)❻來扮演。東歐民族解放運動的革命性質同西歐的工人運動十分相似；兩者都代表了歐洲人中的「無歷史」的階層，都極力在公共事務中想得到承認和參與。由於目標是維持現狀，給予歐洲各民族自決權與主權看來的確不可避免；否則它們就會被無情地打入殖民地民族的地位（這是各種泛—運動一向提出的），歐洲事務中就會引進殖民地方式。❼

當然，歐洲的問題在於現狀無法得到維持，明顯地只有在歐洲獨裁政治的最後殘餘垮台之後，才採用了先前從未使用過的統治方式，以符合至少百分之二十五的歐洲人的需要。但是，這種惡疾並未隨著一系列國家的建立而治癒，因爲大約一億人口中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被正式認爲是例外，他們必須由特殊的少數民族條約來保護。再者，這個數字根本不反映總體情況，它只能指出自治的民族與那些太小、太分散而不能達到完整的民族性的民族之間的區別。〈少數民族條約〉涉及的只是一部分民族，它們的條件是每一個民族必須至少在兩個國家裡都有相當多的人數，條約中忽略了其餘沒有自己的政府的那些民族，因此在某些相關國家裡，不能成其爲民族的人數竟達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❽這種情形中最壞的因素，這些民族理所當然地不會效忠強加給他們的政府，以便讓政府盡可能有效地壓

迫他們，但這還不是這種情況中最壞的因素；而是不成其爲民族的人們都相信，眞正的自由、眞正的解放、眞正的普遍主權只有通過全民族的解放才能達到，而沒有自己政府的民族就是被剝奪了人權。根據這種信念，（這種信念的基礎是法國革命將人權宣言中加進了民族主權的內容），它們得到了〈少數民族條約〉的支持，這個條約並不將保護不同民族的職責交付給各國政府，而是責成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保護那些由於領土居住問題而造成沒有自己國籍的民族。

其實少數民族不會信任國際聯盟，就算他們也不信任有國籍的民族。國際聯盟畢竟由各民族的政治家組成，他們同情各國新政府的困境，這些政府遭到居民中百分之二十五至五十的人的阻撓及反對。於是，〈少數民族條約〉的締造者不久就被迫更嚴格地解釋他們的眞實意圖，並且指明少數民族對這些新國家的義務；❾如此一來，條約就被看作只是一種毫無痛苦的人道的同化方法，一種必然激怒少數民族的詮釋。❿但是，在主權民族國家制度中沒法期望別的東西；如果〈少數民族條約〉的意圖超過對一種混亂情勢的臨時補救，那麼它們對民族主權的隱含限制將會影響老的歐洲霸權的民族主權。一些大國的代表很淸楚地知道，民族國家裡的少數民族早晚會被同化或淸除。它們究竟出於人道的考慮，保護小民族不受傷害，還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反對相關國家同大多數有少數民族的國家之間的雙邊協議，這些都無關緊要（畢竟，日耳曼人在各國都是官方承認在人數和經濟地位方面最強的少數民族）；它們既不願意、也無能力推翻民族國家生存的法則。❿

無論是國際聯盟，還是〈少數民族條約〉，都不能防止新建立的國家強制同化它們的少數民族。阻止同化的最強有力的因素是所謂有國籍民族在人數上和文化上的弱點。波蘭的俄羅斯或猶太少數民族認爲波蘭文化比他們自己的文化差，也並不將波蘭人在波蘭總人口中占約百分之六十這一事實特別當作一回事。

怨怒的民族完全無視國際聯盟，它們不久就決定自己來掌管事務。它們通過少數民族代表大會聯合起來，這在不止一個方面顯得很引人注目。少數民族代表大會同國際聯盟的條約基本精神針鋒相對，正式自稱「歐洲國家民族團體組織代表大會」(Congress of Organized National Groups in European States)，在和平談判期間爲了避免不祥的「民族的」(national)字眼，花費很大努力，在此却付之東流。⑫這就產生了重要的結果，不光是「少數民族」，而是所有的「民族」都會加入，而「有少數民族的國家」大量增加，在相關國家內，各少數民族聯合的人數會大大超過有國籍的民族。但是在另一方面，「民族團體代表大會」對於國際聯盟的條約是個沉重打擊。東歐民族問題中最難令人理解的方面之一（比涉及的土地小而人數多的民族，或「混合居民地帶」⑫更難以理解）是各民族都散居於各地區，如果它們將民族利益置於它們各自的政府的利益之上，就會使這些國家的安全明顯地面臨威脅。⑭國際聯盟的條約嘗試不考慮少數民族在各地區之間互相混居的特點，以和每一個國家個別簽訂條約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一如在各國邊境之外並無猶太或日耳曼少數民族。「民族團體代表大會」不僅避開了國際聯盟的領土原則；它很自然地由兩個在所有相關國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控制著，因此它們所占據的位置是，只是它們願意，就可以在東歐和南歐到處顯示出它們的份量。這兩個團體就是日耳曼人和猶太人。羅馬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日耳曼少數民族當然會同波蘭和匈牙利的日耳曼少數民族一樣投票，誰也不會指望波蘭猶太人會贊同羅馬尼亞政府的種族歧視行爲。換言之，這個代表大會成員的眞正基礎不是少數民族的共同利益，而是各自的民族利益，⑫只有猶太人同日耳曼人之間的和睦關係（魏瑪共和國成功地扮演了少數民族特殊保護者的角色）才能使代表大會團結起來。因此在 1933 年，當猶太代表團要求抗議第三帝國虐待猶太人時，（嚴格說來，他們無權提出這個要求，因爲德國的猶太人不是少數民族，）而日耳曼人宣布他們站在德國一邊，得到大多數代表支持，（因

爲在一切相關國家裡，反猶主義運動已經成熟，）於是在猶太代表團永遠退出之後，這個代表大會就變得毫無意義了。

〈少數民族條約〉的眞正意義又不在於它的實際應用，而是在於它受到國際性團體的保證。少數民族早已存在，⑮但是作爲一種永久的制度，承認幾百萬人生活在正常的法律保護之外，需要有一個外在的團體來專門保護他們的基本權利，並且假定這種狀況不是暫時的，爲了建立一種持久的協議，就需要這個條約——這種規模是歐洲歷史上少有的。〈少數民族條約〉用通俗明白的語言說出直到那時還只是隱含在民族國家的有效制度中的情形，也就是只有國人(nationals)可以是公民，只有同一種族淵源的人才能受到法律機構的充分保護，其他民族的人需要某種例外的法律，直到（或至少）他們完全被同化，脫離原先的種族。沒有少數民族問題困擾的國家的政治家們對國際聯盟條約的解釋說得更清楚：他們理所當然地認爲一個國家的法律不能對堅持另一個民族身份的人負責。⑯於是他們承認——而且很快就有機會從無國籍人民的產生中很實際地證明這一點——國家已經完成了從法律的工具到民族的工具的轉化；民族戰勝了國家，民族利益早在希特勒宣稱「正義就是對德國人民有好處」之前，就已經高於法律。在這裡，暴民的語言是輿論中毫不虛僞、毫不節制的語言。

這種發展狀況的危險性無疑從一開始起就內存於民族國家的結構。但是，只要民族國家的建立是和憲法政府的建立一致進行，它們總是針對獨斷的行政和獨裁專制，代表了法律統治，並以法律的統治爲基礎。因此，當民族與國家之間、民族利益與法律機構之間搖搖欲墜的平衡打破之後，這種政府形式和民族組織形式的解體以可怕的速度發生了。奇怪的是，它的解體恰恰開始於全歐洲承認民族自決權、它的根本信念——民族意志高於一切法律的和「抽象的」制度——被普遍接受之時。

關於〈少數民族條約〉可以爲之辯護——或只是藉口——一些老的民族享受的憲法或暗或明地（例如法國）建立在人權基礎上，即使它們的疆

域內有其他少數民族，也不需要另外的法律，只有在新建立的國家裡，才有必要暫時執行人權作爲一種妥協和例外條款。⓲無國籍民族的到來則徹底打破了這種幻覺。

少數民族只是半無國籍；從法律上說，他們屬於某個政體，儘管他們需要特殊條約形式的額外保護和保障；某些次要的權利，例如說自已的語言，留在自己的文化和社會環境，都處於危險之中，由一個外在的政體若有若無地保護著；但是其他基本權利，例如居住權和工作權，卻從未觸及。〈少數民族條約〉大綱起草者並未預見到整批整批人遷移的可能性，或者由於那些人在地球上不屬於任何一個他們可以有權居住的國家，無處可將他們「遞解出境」(undeportable)而產生的問題。少數民族仍可被看作是一個例外現象，特屬於某種作偏離常軌的領域。這種論點很有誘惑性，因爲它不去觸動制度本身；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依然存在（二次大戰的和平締造者們認爲少數民族條約行不通），開始盡可能地「遣返」(repatriate)各民族，竭力避免爭奪「混合居民地帶」。⓲這種精心思慮的大規模「遣返」不是從〈少數民族條約〉而來的災難性經驗的直接後果；而是希望這一步驟能夠最後解決一個問題，即無國籍人民的問題，在前幾十年中無國籍人的比例越來越大，國際上承認和接受的解決問題程序並不存在。

無國籍(statelessness)現象事實上越來越嚴重，其結果的影響越來越大，這是當代歷史上最新出現的大規模現象，當代政治中最成問題的羣體——無國籍人民——組成了一種人數越來越多的新民族。⓲他們的存在很難歸咎於哪一種單一因素，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無國籍者中的不同羣體，就會想到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每一次政治事件都不可避免地爲生活在法律庇護之外的人增加了一個新的種類，而無論原有的組合如何發生變化，沒有哪個羣體種類會重新正常化。⓲

從他們中間，我們仍可發現最老的無國籍者(Heimatlosen)，即奧匈帝國解體、波羅的海沿海國家建立，以及 1919 年和平條約所產生的一個團體。

他們的種族淵源有時無法確定，尤其是當戰爭結束時他們正巧居住在自己出生的城市，㉒有時他們的出生地改變了領土歸屬，而且在戰後的領土爭端動盪中多次易手，使居民的國籍每年改變一次（例如在維爾那〔Vilna〕，一位法國官員曾稱它是「遣返回國者之城」〔la capitale des apatrides〕）；人們很難想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那些選擇無國籍難民身份的人是爲了留在原地，避免被遞解到一個「祖國」(homeland)去，因爲他們在那裡是外國人（例如在法國和德國的許多波蘭猶太人和羅馬尼亞猶太人，得到了各自國家持反猶主義立場的領事們憐憫的幫助，而留在原地）。

當「遣返回國者」和戰後被革命逼迫離開祖國、立即被祖國剝奪國籍的難民一起處於同樣的法律地位時，得到了相應的關注，卻覺得自己一文不值，明顯地只是一個沒有正當法律地位的人。按照時間順序，屬這個羣體的有幾百萬俄國人，幾十萬亞美尼亞人，幾千匈牙利人，幾十萬德國人，五十多萬西班牙人——這裡列舉的只是一些主要種類。從今天來看，這些國家政府的行爲只是內戰的自然結果；但在當時，大規模地取消國籍還是前所未有的事物。它們認定國家結構理應如此，即使還不完全是極權主義，也至少不容忍反對派，寧可失去公民，也不容納持不同觀點的人。再者，這種現象也揭示了整個歷史上民族主權背後隱藏的眞相，相鄰的主權國家之間不僅在戰爭的特殊情況下，而且在和平時期也會產生殊死的衝突。現在看來很清楚，只有當歐洲的國際禮節繼續存在，才可能有完整的國家主權；正是這種非組織化的團結一致的精神，才防止任何政府充分行使它的主權力量。從理論上說，在國際法的範圍內，絕對的主權一向只有在涉及「移民、歸化、國籍、驅逐出境」等事務時才顯示出來；㉒但是，問題在於對共同利益的實際考慮和默認限制了國家主權，直到極權主義政權興起爲止。人們很容易用有關的政府利用主權中剝奪國籍的權利之程度來衡量極權主義的程度。（於是在發現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很不情願用這種方式來對待它的難民時，就很有意思。）㉒但是應該記住，與此同時，大陸上幾乎沒有一個

國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不制訂新的法律，即使它不廣泛利用這種權力，也總是聲明有權在適當的時機擺脫它的大批居民。㉕

善意的理想主義者們頑固地堅持認爲人權「不可分離」(inalienable)(這唯有最繁榮和文明國家的公民才能享受)，他們的努力與自身無權的情況之間的矛盾是當代政治弔詭中最辛辣的諷刺。他們的情況不斷惡化，直到難民收容營——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例外做法，而不是對無國籍者的管治——變成安置「難民」(displaced persons)永久居住處問題的日常解決辦法。

甚至連用於無國籍者的術語也被接受了。「無國籍」這個術語至少承認了一個事實，即這些人失去了他們政府的保護，要求國際協議來保障他們的合法地位。戰後使用的術語「難民」是戰時創造的，明確的目的是一勞永逸地消除無國籍現象，不承認它的存在。不承認無國籍現象總是意味著遣返，即解送原出生國家，而這些國家或者拒絕承認將被遣返者是公民，或者相反，急於要他們回去接受懲罰。由於非極權主義國家除了戰爭的氣候引起它們的惡意之外，一般總避免大規模遣返，無國籍人的總數——戰爭結束後十二年——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政客們用無視其存在來解決無國籍的問題，這可以從缺少任何可靠統計數字中進一步得到揭示。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知道：如果「已承認」的無國籍者有一百萬人，那麼就有一千多萬人是所謂「事實上的」無國籍("de facto" stateless)者；而相對地無關緊要的「法律上」無國籍("de jure" stateless)的問題偶爾在國際會議上提出，而問題的核心卻與難民問題一樣，無人提出。更糟糕的是，潛在的無國籍者的人數還在繼續增加。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只有極權主義或半極權主義的獨裁者訴諸取消歸化的武器，對付以出生地來取得公民資格的人；現在我們要討論的要點是，即使是自由民主國家（例如美國）也在認眞考慮剝奪雖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但卻是共產黨的人的公民資格。這些措施的有害方面在於他們是在全然無所知的情況下被考慮的。然而，只要回憶

起納粹的特殊關心方面，他們堅持說所有非德國國籍的猶太人「應該在被遞解出境之前，或者至少在當日被剝奪公民資格，㉕目的是實現眞正的無國籍含義。(對於德國猶太人來說，這種命令是不必要的，因爲第三帝國有一條法律：猶太人只要離開國境——當然包括押送去波蘭集中營——就自動失去他們的公民資格。)

幾十萬名無國籍者的到來，造成的結果是對民族國家的第一次大破壞，政治避難權——在國際關係中唯一可視作人權象徵的權利——被廢止了。它的漫長而神聖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政治生活正規化之初。它從古代起就保護著難民和避難地，不致於因人無法控制的情況而使他們被迫變成亡命者。中世紀唯一一條留至現代的原則是「誰在此地，此地屬誰」，因爲在其他一切情況下，現代國家傾向於保護它在境外的公民，並通過互惠條約的手段來確保他們遵從所在國家的法律。但是，在一個以民族國家爲組織形式的世界裡，避難權雖然繼續起作用，在個別情況下甚至在兩次大戰後仍存在，但是，人們總覺得它不合時宜，和國家的國際權利衝突。因此，它不可能在成文法、憲法或國際協議中找到，而國際聯盟的協定條款中對之隻字不提。㉖在這一方面，它與人權命運相同，人權從未成爲法律，只作爲一種呼籲而多少像影子般地存在著，在個別的、例外的情況下，正常的法律機構無力應付時，它才出現。㉖

歐洲世界從難民的到來中遭受到第二次強大的衝擊，明白了不可能擺脫他們，或者將他們轉爲庇護國的國民。㉖從一開始起的共識就是只有兩種方式能解決問題：或遣返、或歸化。㉚當俄國和亞美尼亞的第一次難民浪潮證明這兩種方式都不會有實際結果，庇護國簡單地拒絕承認一切後來者是無國籍的，由此使難民的情況更加難以忍受。㉖從有關政府的角度來看，它們不斷提醒國際聯盟，它的「難民工作必須以最快的速度結束」，這也是可以理解的；㉖他們有許多理由害怕從舊的「國家—人民—領土」三位一體中冒出來的人（這三位一體仍是構成歐洲的國家組織和政治文明的

基礎）只會形成一個不斷發展的運動的開端，只是一座水位不斷上升的水庫的第一個滲水口。很明顯，甚至連 1938 年的埃維安會議（Evian Conference）也承認，一切德國和奧地利猶太人都是潛在的無國籍者；有少數民族的國家會受到德國榜樣的鼓勵，試圖用同樣的方法擺脫它們的某些少數民族，這也是很自然的。㉝在少數民族中，猶太人和亞美尼亞人冒著最大的危險，而且不久就顯示出最高的無國籍者的比例；它們也證明了〈少數民族條約〉不一定是提供保護的，相反也能用於作爲一種工具，將某些羣體挑選出來供最終驅逐。

這些新的危險產生於歐洲舊日多事之地，同樣使人害怕的是全歐洲各民族在「意識形態」鬥爭中一種完全新的行爲。不僅是人們被驅逐出國，剝奪公民資格，而且各國都有越來越多的人（包括西方民主國家）自願到外國去加入內戰（直到那時，這還只是一小部分理想主義者和冒險家做過的事情），即使這意味著使他們脫離民族社羣。這是西班牙內戰的教訓，也是各國政府十分害怕國際縱隊的原因之一。假如這意味著人們不再緊緊地依附於其國籍上，隨時準備最後同化於另一個民族環境，事情可能並不是很糟糕。但是情況根本不是這樣。無國籍者顯示出令人驚奇的頑強，要保留他們原先的國籍；從各種意義上來看，難民們代表了孤立的外國少數民族，常常不關心歸化問題，而且從不團結一致維護其共同利益，像其他少數民族短時期做過的那樣。㉞國際縱隊裡分別組織成民族營，其中德國人感到自己在同希特勒作戰，意大利人感到自己在同墨索里尼作戰，正如幾年以後在抵抗運動中，西班牙難民在幫助法國人反對維希政府時，感到自己是在同佛朗哥作戰。在這個過程中，歐洲各國政府十分害怕的是，新的無國籍者不可能再被說成是身份或國籍未定（de nationalité indéterminée）。即使他們已經放棄公民資格，不再同原國家保持任何聯繫或持忠誠態度，並不將他們的民族屬性等同於一個看得見的、完全受承認的政府，他們還是強烈地依附於他們的民族。從民族中分裂出來的團體和少數民族在他們的

居住地沒有根基，同國家之間沒有忠誠和關係，曾經只有在東歐才具有這種特點。現在以難民和無國籍者的方式滲透到了西歐老的民族國家。

自從開始試驗遣返和歸化這兩種公認的補救措施以後，眞正的麻煩就開始了。由於沒有一個國家可供遣返這些人，所以遣返措施很自然地就失敗了。它們的失敗不是因爲考慮這些無國籍的人（當蘇聯宣布承認它的前公民時，民主國家卻必須保護他們不被遣返到他們不想去的地方）；也不是接納難民的國家出於人道主義的感情；而是因爲原先的國家不接受無國籍者，其他國家也都不同意接受他們。無國籍者無處可遣返，應該會阻止政府驅逐他們，但是由於無國籍者是「一個反常者，一般法律架構內沒有他的適當地位」㉟——這從定義上來說就是一個被剝奪法律保護的人——他完全受警察擺布，警察並不擔憂做出一些非法行爲來減輕這個國家由於不受歡迎的人而加重的負擔。㉟換言之，國家堅持有驅逐的主權，被迫將無國籍的非法本質轉化爲被承認的非法行爲。㊲它偷偷將被驅逐的無國籍者驅向鄰國，引起鄰國也仿而效之。解決遣返問題的理想方案，即偷送難民回到他原先的國家，只有少數明顯成功的例子，部分原因是非極權主義國家的警察仍然受到一些基本的道德約束，另一部分原因是無國籍者可能再度被從他的母國和其他國家偷送回來，還因爲這種事情只有在相鄰國家之間發生。結果這種偷送遣返成了邊界上警察之間小小的戰爭，它有損於國際關係，無國籍者在一個國家警察的幫助下，「非法地」進入另一國家的領土，結果使無國籍者越來越多地被判入獄。

國際會議嘗試替無國籍者確立某種法律身份，但是全都失敗了，因爲沒有哪一種協議可以取代領土，在現存法律的範圍內，一個僑民就是被遞解出境，進入另一領土。一切關於難民問題的討論都圍繞著一個問題：如何才能將難民再次遞解出境？第二次世界大戰和難民營並不一定表明對失去祖國的實際取代只有收容所。的確，早在三十年代，這是全世界向無國籍者提供的唯一「國家」（country）。㉟

另一方面，歸化也由事實證明是失敗的。在面對無國籍者時，歐洲各國的歸化制度各不相同，而出於同樣原因，避難權被擱置一邊，從本質上說，歸化屬於民族國家的一種附帶立法，只承認「國民」，即生於這塊領土上、生來便是公民的人。在例外情況下需要歸化，它適用於在各種情況下被驅趕到國外土地上的個人。當出現大批人申請歸化的情形時，整個過程就被打破了：[39]即使從純粹的行政管理角度來看，歐洲沒有一個政府能應付這個難題。各國不是採取至少使一小部分人歸化的辦法，而是掩蓋先前的歸化，其部分因爲驚慌，部分則因爲大批新來者實際上改變了處理同一種族淵源的歸化公民不穩定的地位。[40]取消歸化或者制訂明顯地鋪平了大規模阻止歸化之路的法律，[40]使難民對自己可能適應新的正常生活的微弱信心被打得粉碎；如果說，過去曾經將同化到一個新的國家看成是卑劣或叛國，那些現在看來只是可笑的事。歸化的公民和無國籍的居民之間的差異還不足解釋爲什麼要加以區別，前者常常被剝奪重要的民權，並且隨時受威脅可能落到後者的命運。歸化者大多同化到普通外僑的身份，由於歸化者早已失去他們先前的公民資格，所以這些措施就只威脅到另一羣爲數甚多的無國籍者了。

儘管歐洲各國政府意識到這種無國籍狀態對於既定的法律和政府制度有危險，儘管它們竭力阻止這股浪潮，但是它們一籌莫展，這幾乎令人感到悲哀。一旦有一批無國籍者被接納到一個各方面都很正常的國家，無國籍現象就會像傳染病一樣蔓延。不光是歸化公民有倒退到無國籍身份的危險，而且所有的外國人的生活條件也明顯地惡化。在三十年代，越來越難區分清楚無國籍難民和正常居住的外僑。一旦政府試圖利用它的權力，在一個外僑不願意的情況下要遣返他，他就會想盡辦法變成無國籍的難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敵對國僑民早已發現無國籍狀態的便利。但是，當時這一點還只是個人狡黠地找到了一個法律上的漏洞，如今卻變成了羣眾的直覺反應。法國是歐洲最大的接受移民的地區，[40]由於它在需要時召喚

外國工人進來調整混亂的勞動力市場，而在失業和危機的時代又將他們遞解出境，這就讓外僑知道無國籍狀態的好處，這一點他們是不會忘記的。1935 年，拉伐爾政府大規模遣返外國僑民，只有無國籍者倖免，在此之後，所謂「經濟移民」(economic immigrants)和原先的其他羣體——巴爾幹人、意大利人、波蘭人、西班牙人——混在難民潮中，成爲一個再也無法解開的死結。

同胞與外國人之間久已有之的必然區分，以及在國籍和驅逐問題上的國家主權，無國籍狀態對這兩點帶來更糟糕的情形：當越來越多的居民不得不生活在法律管轄之外，不受任何法律保護時，國家的法律制度結構就遭到了破壞。無國籍者既無居住權又無就業權，當然就常常逾越法律規定。他也可能從不犯罪而被判入獄。更有甚者，文明國家裡恪守的價值觀念等級體系在他身上會完全顛倒。既然他是個違反常規者，一般法律於他無效，那麼最好是將他變成一個受法律約束的反常者，成爲一個罪犯。

要想認定某人是否被迫置於法律的保護之外，最好的標準是問一問他在犯罪時會不會受到優待。如果一樁小小的偷竊案會改進他的法律地位(至少暫時地)，那麼可以認定他一向被剝奪了人權。因爲此刻一樁犯罪行爲變成了重新獲得某種人類平等的最好機會，即使它被承認是正常情況之外的特例。一個重要的事實：這種例外是由法律提供的。即使是一個無國籍者罪犯，他所受的對待不會比另一名罪犯更差，也就是說，將他同其他每一個人一樣對待。他只有作爲一個犯法者，才能得到法律的保護，適用各種法律規定。只要對他的審判和判決繼續生效，他就能躲過警察不受法律干涉的恣意虐待。同樣一個人，昨天他還因爲他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而下監入獄，沒有任何一種人權，而且生活在隨時可能被遞解出境的威脅之下，或者因爲他試圖就業以謀生存而未經判決就遭驅逐、未經審訊而遭拘押，但是會因爲偷了一點東西而變成具有完全資格的公民。即使他分文不名，現在他也能有一位律師，可對律師抱怨獄警如何如何，而且律師會很尊重地

聽他說話。他不再是大地上的流浪漢，而是一位重要的公民，律師會很詳細地向他介紹同他有關的法律條文。他變成了一個受尊重的人。[43]

從不被承認的反常地位上升到被承認的例外地位還有一條路，但是不太可靠，而且更困難，那就是成爲天才。法律只知道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區別，即正常的非犯罪者和反常的犯罪者，而一個遵守法律的社會只承認一種決定性的個人主義形式——天才。歐洲資產階級社會要天才留在人類法則之外，成爲一種魔鬼，他的主要社會功能是製造興奮，即使他實際上犯法也沒關係。再者，失去公民資格不僅剝奪了人被保護的權利，而且也失去了明確的、正式承認的身份，他們永遠熱衷於努力從剝奪他們國籍的國家取得出生證明，這一事實就是一種非常確切的象徵；當他們出名了，從龐大的無名之輩當中被救出來，他們的難題之一就獲得解決。只有名聲才能回答各個階層的難民關於「這裡誰也不知道我是誰」的不斷抱怨；著名的難民機遇改觀，正如一條有名字的狗的生存機會多於一條普通的迷路的狗。[44]

民族國家無能力向那些失去國家政府保護的人提供一條法律，遂將全部事情移交給警察。西歐的警察第一次得到了自由行動權來直接統治民眾；在公共生活的一個方面，它不再是執行和強化法律的工具，而是變成了獨立於政府及其各部的統治權威。[45]警察的力量和它脫離政府與法律，隨難民潮的人數而呈正比例發展。總人口中無國籍者和潛在的無國籍者越多——在戰前的法國達到總人口的百分之十——逐漸轉變爲警察國家的危險就越大。

毋庸贅言，凡在警察上升至國家權力頂峰的國家，極權主義政府就尤其願意通過對廣大的民眾羣體的控制來鞏固這種力量，無論怎樣侵犯個人的權利，總是認爲自己不受法律管束。在納粹德國，紐倫堡法律規定了帝國公民(Reich citizens)(正式公民)和國民(nationals)(沒有政治權利的二等公民)的區別，鋪平了繼續發展的道路，最終使一切「外國血統」(alien

blood)的國民可能憑官方命令就會喪失其國籍；只有戰爭爆發才阻止了相應的立法，而這項立法早已具體準備妥當。[46]另一方面，非極權主義國家裡無國籍者羣體的增加導致由警察策動的無法律形式，實際上造成自由世界同極權主義國家的立法之間的協調。在一切國家裡，最終是集中營向同一種羣體提供地方，即使對待關押在內的人的方式相當不同，但是極權主義政府主張完全由它來選擇關押哪幾個羣體，這就使集中營更有特徵：假如納粹將一個人關進集中營，而他成功地逃走，譬如說逃到荷蘭，荷蘭也會將他關進難民營。所以早在戰爭爆發之前很久，一些西方國家的警察藉口「國家安全」，自發地和蓋世太保和格別烏(GPU)建立密切關係，因此也可以說，警察另有一種獨立的外交關係。這種警察指導的外交政策，其功能獨立於官方政府外交政策；蓋世太保與法國警察的關係在列昂・布魯姆的統一陣線政府時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熱絡，這個政府的堅定政策卻是反德的。和政府相反，各種警察組織從不爲對任何極權主義政權的「偏見」所累；他們歡迎來自格別烏特務的情報和告發，同樣歡迎法西斯和蓋世太保特務的情報。他們懂得一切極權主義政權中警察機器的突出作用，知道它社會地位很高，具有政治重要性，所以他們從來不忌憚對之表示同情。納粹最後在它占領的國家裡都遇到了警方的小小抵抗，很失面子，但是它也在地方警察的幫助下組織恐怖行動，這些至少歸因於，多年來警方在不受節制地任意支配無國籍者和難民中獲得的強有力地位。

•

在「有少數民族的國家」(nation of minorities)和無國籍人民的形成這兩方面的歷史上，猶太人發揮了有意義的作用。他們在所謂的少數民族運動中領頭，是因爲他們極需要保護(只有亞美尼亞人的需要與他們相似)，以及他們有出色的國際關係網絡，但是首要原因是他們在任何一個國家裡都是少數，所以可被看作「眞正的少數民族」(minorité par excellence)，也就是說，它是唯一的只有靠國際保證的保護才能維護利益的少數民族。[47]

猶太民族的特殊需要可能是最好的理由，可用來否定〈少數民族條約〉是新國家強制同化外族的傾向和出於己利之計而不能得到民族自決權的民族之間的一種妥協。

相同的情況使猶太人在討論難民和無國籍問題時有突出的地位。〈和平條約〉中創造的「無國籍者」(Heimatlose; apatrides)最初大多用於猶太人，他們來自繼來的國家，不能夠或不願意在原住國的新少數民族保護法之下安身。直到德國迫使德國猶太人向外移民和失去國籍時，他們才構成無國籍者中人數相當多的一部分。但是在隨後幾年裡，隨著希特勒成功地迫害猶太人，所有的國家都開始考慮驅逐少數民族，而且很自然地首先向「眞正的少數民族」開刀，它是唯一的一個除了少數民族制度之外別無保護的民族，而這個制度現在也已成了笑柄。

無國籍主要是猶太人問題，㊽這個觀念只是各國政府的藉口，它們試圖用視而不見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政治家們誰也沒有意識到，希特勒對猶太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先將德國猶太人貶低成爲德國社會中一個不受承認的少數民族，然後將他們當作無國籍者驅逐出境，最後再將他們從世界各地運回來，送進死亡集中營，這無疑十分有力地向全世界顯示如何眞正地「清除」關於少數民族和無國籍的一切問題。戰後，被認爲是無法解決的猶太人問題結果解決了——其方法是先殖民後征服一塊土地——但是這既未解決少數民族問題，亦未解決無國籍問題。相反，就像本質上屬於我們這個世紀的一切問題一樣，猶太人問題的解決反而產生出一個新種類的難民，即阿拉伯人，因此使無國籍、無權利者人數另增了七十萬至八十萬人。而在巴勒斯坦這塊最小領土上發生的幾十萬人的問題，在印度重覆出現時卻牽涉到規模更大的幾百萬人。自從 1919 年和 1920 年的和平條約簽訂以來，難民和無國籍者像詛咒一樣附著在按照民族國家的形象創建起來的地球上一切新建國家身上。

對於這些新國家，這種詛咒帶著致死的病菌。因爲一旦法律面前平等

的原則被打破，民族國家就不能存在。若無這種法律平等(legal equality)(它原先法定要取代封建社會的舊法律和舊秩序)，民族就瓦解爲一羣特權過多和毫無權利的個人組成的無政府羣眾。並非對眾人皆平等的法律轉變爲權利和特權，這與民族國家的本質是矛盾的。越是清楚地證明它們沒有能力將無國籍者當作合法的人，越是靠警察力量擴大恣意統治的範圍，國家就越難抵抗一種誘惑——剝奪一切公民的合法地位，用無所不能的警察來統治他們。

(二)人權的窘困

十八世紀末的〈人權宣言〉是一個歷史轉折點。它的意義在於，從此以後，法律的來源不是上帝的命令，也不是歷史的習俗，而是人。人權宣言無視歷史賜予某些社會階層或某些民族的特權，顯示了人從一切監護下的解放，宣布了他的時代的到來。

在此之外，宣言的起草者們並未完全意識到另一層含義。宣布人權，同時也意味著新時代裡有一種迫切需要的保護，因爲個人在這個時代裡，不再能安全保有生出時即有的財產，作爲基督徒而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也不再得到肯定。換言之，在新的世俗化和解放了的社會裡，人不再確信這些社會權利和人權，而直到此時，這些權利還在政治秩序之外，不是由政府和憲法來保障，而是由社會的、精神的、宗教的力量來保障。因此在整個十九世紀，一致的意見是，每當個人針對國家的新統治權和社會的新專橫而需要保護時，就必須提出人權。

既然宣稱人權是「不可分離的」，不會化約到或推衍自其他權利或法律，那麼人權的確立就不能訴諸權威。人是自己之本，也是他們的最終目的之本。另外，沒有哪一種具體的法律能必然保護他們，因爲一切法律都取決於他們。就法律而言，人是其唯一的主人，正如就政府而言人民被宣布爲

是它唯一的主人一樣。人民的主權（有別於君主的統治權）並非上帝恩惠所賜，而是以人的名義宣布的，所以很自然，人「不可分離」的權利能夠得到保障，並且變成人民自治主權中不可分離的部分。

換言之，人幾乎不作為一種完全解放的、完全孤立的存在而出現，不依托某種更大的全面秩序而在自身得到尊嚴，他很可能再度消失在人羣中。從一開始起，在宣稱不可分離的人權中就包含了一種弔詭，即它重視一種好像根本不存在的「抽象」的人，事實上，即使連野蠻人也生活在某一種社會秩序裡。如果說一個部落或一個「落後的」社羣並不享有人權，那是因為它作為一個整體，明顯地還未達到文明階段，未達到人民主權和民族主權的階段，反而受外國或當地專制統治者壓迫。因此，全部人權問題迅速地同民族解放問題糾纏混合在一起；只有自己的民族主權的解放才能使人權得到保障。由於人類自從法國革命以來一直相信世界各國是一個家庭的幻象，漸漸地，人的形象應該是民眾，而不是個人，成為自明之理。

人權在歐洲民族國家體系中同各民族的權利一致的意義，只有在越來越多的民族突然出現時才顯現，它們的基本權利在歐洲不像在非洲的心臟地區那樣受到民族國家普通功能的維護。畢竟人權是因為假設為獨立於一切政府之外，而被定義為「不可分離的」；但是結果在人在缺乏自己的政府而不得不回到最基本的權利時，沒有一種權威能保護它，沒有一種機構願意保障它。或者說，例如對於少數民族，當一個國際團體僭稱自己具有統治權威時，即使在它的措施得到充分實現之前，它的失敗就已經很顯然了；不僅是各國政府或多或少地公開反對這種對其主權的侵犯，而且有關的各民族本身也並不認可一種外來的保障，懷疑一切不是明確地支持其「民族的」（相對於它們的語言、宗教和種族）權利的事物，像德國人或匈牙利人那樣，或者選擇轉向保護他們的「民族」母國，或者像猶太人那樣，選擇某種領土內的團結。[49]

無國籍者像少數民族一樣，相信失去民族權利等於失去人權，前者必

定導致後者。他們越是被排斥在任何形式的權利之外，就越想尋求重新歸併入本民族社羣。俄國難民只是帶頭堅持自己的民族性，竭力反對將他們歸入其他無國籍者行列。從他們開始，不止一個難民團體發展出一種強烈、甚至劇烈程度的羣體意識，要求擁有像只有波蘭人、猶太人、日耳曼人才有的那些權利。

更糟糕的是，爲保護人權而建立的一切團體、爲達成一項新的人權法案而作出的一切努力嘗試，都被一些邊際人物嗤之以鼻——一些沒有政治經驗的國際法學家，或者是由理想主義情感支配的博愛主義者。他們構成的團體，他們發表的宣言，其形式和語言酷似那些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的組織和宣言。沒有一個政治家、沒有一個重要人物會有可能認眞對待它們；歐洲的自由派和激進派政黨也都認爲沒必要在自己的綱領中新增人權宣言。不管在二次大戰戰前或戰後，受害者被各種事件驅趕進一座鐵絲網圍起來的迷宮，當他們以多種方式嘗試尋找一條走出這座迷宮的道路時，却從不提及這些基本權利，那些基本人權十分明顯地是對他們的否定。相反，對於那些嘗試在任何一種基本的或一般的意義上推動人權的邊緣團體，受害者表現出來的是對權力的鄙視和漠不關心。

在越來越多的人被迫生活於一切可觸及的法律範圍之外的情況下，所有那些想用宣布一種不幸的人權法案來對待這種不幸情況的人都失敗了，這當然不是他們居心不良。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莊嚴地宣布「人權」是文明社會的新基礎，這是先前從來沒有過的一個實際政治問題。在十九世紀，這些權利只是以一種相當表面化的形式被提出來，用以在國家權力日益增強時保護個人，在工業革命引起新的社會不安時當作緩衝。因此，人權的含義獲得了一種新的解釋：它們變成了無權利者的保護人的標準口號，一種附加的法律，一種對於無權利者來說別無選擇必須依賴的例外權利。

人權的概念在十九世紀政治思想中爲何被當作「養子」(stepchild)，二十世紀的自由派和激進派政黨，即使在急需加強人權時，爲何不將人權寫

進其綱領，原因很明顯：公民權(civil rights)——在不同國家裡，公民權並不一樣——應以可觸及的法律形式體現並詳細說明「人權」，而人權本身應該獨立於公民和國籍之外。一切人都是某種政治社會的公民；如果他們國家的法律不能符合人權的要求，那麼就應該改寫法律，其途徑是透過民主國家的立法或在專制國家採取革命行動。

人權假定是不可分離的，但是每當人們不再是任何主權國家的公民時，就無法實行人權——即使是在那些以人權爲憲法基礎的國家裡。這一事實本身就夠煩擾了，人們還須看到近來許多制訂新的人權法案的嘗試所帶來的混亂，這顯示出似乎無人能夠明確地界定這些一般人權（它同公民權不同）究竟是什麼。儘管每一個人好像都一致認爲，這些人的處境恰恰是喪失人權，但是誰也不知道他們失去的人權是哪些權利。

喪失人權者失去的第一種權利是家園，這意味著失去他們出生的和爲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確立一個獨特地方的整個社會環境。這在歷史上已有先例；歷史上的個人和整個民族羣體由於政治和經濟原因而被迫遷移，這好像是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歷史上沒有先例的倒不是失去家園，而是不可能找到一個新的家園。突然地，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是移民可以不受最嚴格的限制而去的，沒有一個可使他們同化的國家，沒有一塊領土可供他們建立自己的新社羣。另外，這幾乎也同任何人口過剩的物質問題無關；這不是一個空間問題，而是政治組織問題。誰也沒有意識到，人類在如此長久的時間裡總以家庭或民族的形象出現，現在竟變成，誰若被拋出一個結構組織緊密的社羣，就會發現自己同時完全被拋出了民族大家庭。[50]

喪失人權者失去的第二種權利是政府的保護，這並非單純地指失去他們的在自己國家裡的合法身份，而是失去在所有的國家裡的合法身份。互惠的條約和國際協議在地球上織了一張網，使每一個國家的每一個公民不管走到哪裡，都可以帶有合法身份（因此紐倫堡法律就規定，納粹政權下的德國公民不可以與國外異族通婚）。然而，不再受它約束的人卻發現自己

完全失去了合法性（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無國籍者不可避免地處於比敵對的外國人更差的地位，敵方僑民還可以根據國際協議間接地受到他們政府的保護）。

失去政府保護這件事同失去家園一樣，都是前所未有的。文明國家向那些出於政治原因而遭他們政府驅逐的人提供避難權，這種做法雖然從未正式寫進任何一部憲法，但是在整個十九世紀、甚至在二十世紀都十分有作用。但是，這種針對例外情況的非正式作法，在處理人數甚巨的各種新的被迫害者時，麻煩就出現了。再者，其中大多數人很難有資格獲得避難權，避難權隱含預設的政治和宗教信仰方面，那在這些難民的國家裡並不違法。新難民被驅逐不是因爲他們的行爲和思想，而是由於他們那些不可改變的方面——生在一個錯誤的種族，一種錯誤的階級，或被一個錯誤的政府選中（例如西班牙共和軍）。[51]

失去人權者的人數越多，注意力就越被吸引到被迫害者的身份問題，而不去注意迫害者的政府的行爲。而第一個引人注目的事實是，這些人雖然以某種政治藉口而遭迫害，但是不再像歷史上遭迫害的人那樣，成爲迫害者的恥辱的象徵；他們不被認爲、也很難說他們是積極的敵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幾千名蘇聯公民離開蘇聯，在民主國家獲得避難權，卻比二十年代屬於被虐待階級的幾百萬難民更能損害蘇聯的名譽），他們只是人，他們的無辜——尤其對於迫害他們的政府而言——是他們最大的不幸。無罪——完全沒有責任——就是他們無權狀態的標記，正如它是他們失去政治地位的標記一樣。

因此，只有在外表上，實行人權的需要觸及了眞正政治難民的命運。政治難民在人數上必然很少，他們在許多國家裡仍然能享受避難權，這種權利以一種非正式的方式成爲對國家法律的眞正替代。

關於無國籍者從犯一樁罪中獲得法律上的受惠，我們經驗中令人驚奇的方面之一就是看到一種事實，即剝奪一個完全無辜的人的法律權利比剝

奪一個犯有罪行的人的法律權利要容易得多。阿那托•法朗士的名言說:「如果我被指控偷盜了巴黎聖母院的鐘樓，我就只能逃亡出國。」這句話指出了可怕的現實。法官們習慣於根據懲罰的概念來思考法律——懲罰的確總是剝奪了我們的某些權利——而也許會發現自己比不懂法律的人更難以承認，剝奪合法性（即**一切**權利）不再同具體罪行有聯繫。

這種情形說明了人權概念的許多內在的混亂。無論它們曾經有過怎樣的定義(根據美國的定義是：生命、自由、追求幸福；根據法國的定義是：在法律面前平等、自由、財產保護、國家主權)，無論人們怎樣嘗試改進含混的定義（例如「追求幸福」）或者較早的定義（例如「絕對的財產權」)，那些被驅逐出二十世紀法律保護之外的人，其狀況顯示出這些公民權利的喪失並不引起絕對無權利的後果。戰爭中的士兵被剝奪了他的生命權利，罪犯被剝奪了自己權利，一切公民都在非常事件時期被剝奪了追求幸福的權利，但是在上述這些情況下，誰也不會宣稱發生了喪失人權的情況。但是，即使在基本無權利的情況下，他們也被許諾有這些權利（儘管幾乎享受不到)。

無權利帶來的災難，並非被剝奪生命、自由、追求幸福、或者在法律面前平等、言論自由——這些都是設想來解決社羣**內部**問題的公式——而是不再屬於任何一個社羣。他們的困境並非在法律面前不平等，而是對他們不存在任何法律；不是他們受壓迫，而是甚至沒有人想壓迫他們。只有在一個相當長時期的最後階段，他們的生存權才受到威脅；只有當他們仍然完全屬於「多餘者」，誰也不「承認」他們，他們的生命才處於危險之中。連納粹開始對猶太人實施種族滅絕政策時，首先也是剝奪他們的一切合法身份(二等公民身份)，將他們驅趕到指定居住區，關進集中營，切斷他們與生活世界的聯繫；在納粹啓用毒氣室之前，曾經仔細地作過試驗，並且滿意地發現沒有一個國家會承認這些受害者。問題的關鍵在於，完全無權利的狀態在生存權受到挑戰之前就已產生了。

同樣的情況發生在關於自由權利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諷刺意味。自由權利有時被看作是人權的本質。毫無疑問，處於法律保護之外的人比受法律保護的在押罪犯有更多的行動自由，他們在民主國家的收容所裡比在任何一般的專制政治下（更無需說是在一個極權主義國家裡）享有更多的言論自由。52但是，人身安全——由某些國家機構或私人福利機構保障——和言論自由都絲毫也不能改變他們根本沒有任何權利的狀態。他們的生命延續只是出於別人的仁慈，而不是由於權利，因爲沒有一條既存的法律能迫使國家供養他們；如果說他們有行動自由，也並不是自由居住權，這是連在押的罪犯也能享受到的權利；而他們的言論自由是傻瓜的自由，因爲他們的想法起不了任何作用。

這些都是關鍵性的要點。根本剝奪人權，首先表現在人被剝奪了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一個能使言論產生意義、行動產生效果的位置。比自由與正義遠更重要的人權是公民權，當人出生時，他屬於一個社羣，而當這種與生俱來的權利失去了，也無法再選擇，或者當他被置於另一種情景，除非他犯罪，否則別人就不會根據他做了什麼或不做什麼來對待他，這時的人權就岌岌可危了。正是這種極端情形才是人被剝奪了人權。他們被剝奪的不光是自由權利，而且還有行動權利；不光是他們願意怎樣思想的權利，而且還有言論的權利。某些情況下的特權，大多數情況下的不公正，是禍是福，都只能根據偶然情況來衡量，而與他們現在、過去和將來做什麼無關。

我們開始注意到還存在一種權利，即獲得各種權利的權利（意味著在一個生活架構中，對人的判斷是根據他的行動和言論）和從屬於某種有組織的社羣的權利，這是因爲我們看到了千百萬人由於新的世界政治形勢而失去了並且無法重新獲得這些權利。麻煩的問題還在於這種災難並非產生於野蠻、落後、或者暴政，而是相反，它無可挽救，因爲地球上不再有任何「未經文明化」的地點，因爲無論我們是否喜歡，我們實際上已經開始

在「同一個世界」上生活。失去家園和政治身份，只有在一個完全有組織的人類社會裡，才等同於被逐出人類整體。

在此之前，我們今天所說的「人權」會被認爲是人類境況的一種總體特點，不會被暴君奪走。失去人權，相應地失去言論權利（自從亞里士多德以來，人被定義爲一種控制言語和思想的存在），也失去一切人類關係（同樣自從亞里士多德以來，人被認爲是一種「政治動物」，根據定義，生活在一個團體內），換言之，亦即失去了人類生命的一些最本質的特點。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奴隸的悲慘處境，亞里士多德因此也並未將來他們歸入人類。奴隸制對人權的根本侵犯不在於它奪走了自由（這在其他許多情況下也會發生），而在於它將一種人排除在外，甚至使他們不可能爲自由而戰鬥——這種戰鬥在暴政之下、甚至在現代恐怖的絕望條件下也還是可能的（但不是在任何一種集中營的生活條件下）。奴隸制的違反人性的罪行，並不是從一個民族打敗和奴役它的敵人開始的（當然這是一種極壞的情形），而是開始於奴隸制成爲一種制度，使一些人「生來」自由，另一些人「生來」是奴隸，它忘記了正是人剝奪了人的自由，將懲罰罪行的職責歸於自然。然而根據晚近的一些事件，可說甚至連奴隸們也仍然屬於某種人類社羣；他們的勞動被需要、被使用、被剝削，這使他們被保留在人類範圍之內。做一名奴隸，畢竟有一種明顯的特點，在社會中占有一個地方——不止是抽象意義上單純的人。那麼，降臨在越來越多的人頭上的災難就不是失去具體的權利，而是失去願意和能夠保護其任何一種權利的社羣。由此造成的結果是人可以在不失去他作爲人的基本特性、不失去他的人類尊嚴的情況下失去所謂的「人權」。只有失去了一個國家，才使他被逐出人類。

這種喪失的權利，在人權範疇內從未被提及，也無法用十八世紀的範疇來表述，因爲這些範疇都假設權利是從人的「天性」（“nature” of man）中直接產生的——而這種天性是根據自然法則看到的，還是根據上帝的形象創造的，它究竟同「自然的」權利有關，還是同神的指令有關，其實相

對地看來並無區別。決定性的因素是他們擁有的這些權利和人的尊嚴應該是有效的、眞實的，哪怕地球上只剩下了一個人；這些權利和尊嚴獨立於人類的大多數，即使一個人被逐出人類社羣，它們仍然應該是有效的。

當人權被首次提出時，被看作和歷史無關，也和歷史所造的社會階層無關。這種新的獨立事物構成了新發現的人類尊嚴。從一開始起，這種新的尊嚴就帶有相當曖昧的性質。歷史權利(historical rights)被自然權利取代，「天性」(nature)取代了歷史，而且其中還暗含了一層意思：自然比歷史更接近人的本質。〈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和〈人權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的語言——「不可分離的」、「天賦的」、「自明的眞理」——意味著相信一種人類「天性」，它所從屬的發展規律同人的發展規律一樣，從中產生權利和法則。也許我們今天更有資格明確地判斷這種人類「天性」有多少含意；在任何事物中都顯示出，三千多年來一直反覆下定義的這個「天性」的潛在含義是西方哲學和宗教既未認清又不懷疑的。但是，使我們產生疑問的不僅是人類天性本身。自從人學會控制自然，在某種程度上使用人造的工具來摧毀地球上一切有機生命的做法變得可以理解、又在技術上可能時開始，人就同自然異化了。自從對自然過程有了一種更深刻的知識，便對究竟是否存在自然法則產生了嚴重的懷疑，自然本身呈現出一種有害的方面。既然宇宙明顯地無範疇之別，那麼人又如何從中推論出法則與權利?

十八世紀的人從歷史之下解放出來，二十世紀的人從自然之下解放出來。歷史和自然同樣地與我們異化，也就是說，人的本質不再被理解爲這兩種範疇。另一方面，人類在十八世紀——用康德的話來說——無非是一種規定性的理念(regulative idea)，如今變成了無法迴避的事實。這種新的情況使其中的「人性」(humanity)實際上具備了先前歸結於自然或歷史的功能，意味著在這種情勢下，應該由人類自身來保障獲得各種權利的權利，或者說是每一個個人從屬於人類的權利。這一點是否可能，卻完全沒

有把握。因爲和帶著最良好的意願想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出發，嘗試獲得各種國際組織宣布新的人權的願望相反，應該明白的是，這種想法超越了目前的國際法範圍(即目前仍在運作的主權國家之間的相互協議和條約)；而超越各國之上的運作範圍暫時還不存在。再者，這種兩難狀況也根本不會由於建立一個「世界政府」(world government)而消除。這樣一種世界政府的確也在可能範圍之內，但是人們會懷疑，在實際情形中，事情可能和各種理想主義傾向的組織所鼓吹的設想完全兩樣。違反人權的各種罪行成了極權主義政府的專利，但也一向可以用各種口實來辯解，例如權利等同於對整體而不是對部分有利或有用，等等。(希特勒的座右銘，「對日耳曼民族有利就是對的」，只不過是一種法律概念的庸俗形式，這種庸俗形式到處可見，而在實踐中，只要在憲法中仍然有效的舊傳統起著阻礙作用，它就依然無效。）法律概念上將什麼是正確的(what is good)認定爲對什麼是有利的(what is good for)——有利於個人、有利於家庭、有利於民眾，或有利於大多數人——在宗教或自然法則的超驗尺度失去權威性之後，這種等同變成勢所必然。如果應用「有利於」的單位大到像人類本身一樣，那麼這種預言就絲毫也不解決問題。因爲有一種完全可以置信的情景——即使在實際政治領域也是可能的——即在一個美好的日子裡，組織結構和機制都高度完善的人類，將非常民主地——亦即根據大多數人的決定——得出結論，爲了人類的整體利益，最好是清除掉其中的某些部分。但是在這裡，根據事實上存在的問題，我們面對著政治學中最古老的難題之一，在基督教神學將一切政治學和哲學問題都統歸在它的框架之中時，這個問題一直未被觸及，但是在很久以前，柏拉圖就說過：「一切事物的衡量尺度應該是神，而不是人。」

以上的事實和思考所提供的似乎諷刺性地、令人痛苦地、直到如今還在支持埃德蒙・伯克反對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的一些著名論點。這些

論點支撑著他的結論，即人權是「抽象」的，比較聰明的做法是依靠一種對權利「限定的繼承」(entailed inheritance)，像生命一樣轉交給子孫；他還宣稱，人的權利不應該是不可分離的人權，而應該具體地說到例如「一個英國人的權利」。㊾根據伯克的觀點，我們所享有的權利產生於「國家內部」，所以法律的依據不必是自然法則、神的旨意、任何關於人類的概念，例如羅伯斯庇爾所說的「人類」、「世俗的尊嚴」等等。㊿

伯克概念實用主義的公正性似乎無疑地以我們多方面的經驗爲依據。不光是民族權利的喪失在一切情況下引起人權的喪失；人權的恢復（例如最近以色列國的例子證明）到目前爲止也只是通過恢復或者建立民族權利才能達到。以假設人類本身的存在爲基礎的人權概念崩解之時，正值那些虔誠地相信此概念的人首次面對另一種人——那些人確實失去了一切其他特性和具體關係，只除了他們還是人。這個世界在抽象的赤裸裸的人類身上發現沒有一點事情可謂神聖。從客觀政治環境來看，很難說人權所依據的人的概念——他是根據上帝的樣子創造的(美國人的說法)，或者他是人類的代表，或者他自身包含了自然法則的神聖旨意(法國人的說法)——能夠有助於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案。

死亡集中營的倖存者們，集中營和難民營裡的被羈押的人們，甚至相對地比較幸運的無國籍者，無須讀過伯克的理論，也能看到正是人的抽象的、赤裸裸的存在才是他們的最大危險。他們因此被看作野蠻人，害怕他們可能會被當作野獸而遭厄運，所以他們堅持自己的國籍（他們以前的公民資格的最後一種象徵），將它當作僅存的和人類之間能被承認的紐帶。他們不信任自然權利，只相信民族權利，這恰恰產生於他們的理解：自然權利甚至也可以賦與野蠻人。伯克早就怕自然的「不可分離的」權利只會確立「赤裸的野蠻人的權利」，㊿因此會將文明國家貶低到蠻族的地位。因爲只有野蠻人才不會懼怕墮入他們那種人類起源的最低事實，而人們緊緊抓住他們的國籍，當他們失去了這樣的國籍曾經給予他們的權利和保護時，他

們愈是瀕危掙扎。似乎只有他們以往的歷史和「限定的繼承」，才能證實他們仍然屬於文明世界。

假如一個人失去了他的政治地位，根據天賦的和不可分離的人權的含意，他應該不折不扣地回到一般權利宣言所提供的情形。但是實際情況卻相反。如果一個人只是一個人，似乎他失去的是其他人據以將他當同類看待的身份。這就是爲何很難毀滅一個罪犯的法律身份（即一個人自己承擔行爲責任，結果決定了他的命運），這比毀滅一個無法獲准擔負普遍人類責任的人之法律身份要難得多。

因此，如果我們只看那些被迫離開一切政治社羣的人的普遍人類狀況，伯克的論點就會有另外一層意義。姑且不言他們受到何種對待，也不論自由或壓迫、正義或非正義，他們失去的是整個世界，是人類生存的一切方面，即我們共同的勞動和人類創造的結果。倘若說，蠻族部落的悲劇是他們棲居於自己無力控制的、一成不變的自然環境，而它的豐饒尚可維持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生死不留絲毫痕跡，於共同的世界毫無貢獻，那麼，失去權利的人也確實被扔回到奇特的自然狀態。當然，他們不是野蠻人；他們中的一些人實實在在地屬於他們各自國家裡最有教養的階層；然而，在一個幾乎已消除了蠻族狀態的世界裡，他們卻顯示了可能從文明倒退的最初跡象。

一種文明越是高度發展，它所創造的世界就越有成就，人在人類技術成果中越感到自在——他們就越厭惡他們未造出的一切，即一切純粹地、神秘地加在他們頭上的事物。人失去了他在社羣中的地位，他在那個時代鬥爭中的政治地位，以及使他的行動和他的一部分命運所構成一個連貫整體的合法身份，剩下的只是通常只有在私人生活中才明瞭的特徵，而在公共生活的一切方面必然只保留一種失去資格的純粹存在(mere existence)。這種純粹存在只包括我們出生時神秘地帶來的一切，包括身體形狀和頭腦的天分，只足以用來對付無法預見的機會中的友誼和同情，或者巨大得無

法估量的愛情恩惠，正如奧古斯丁所說「我要你如此」，而無須用任何特殊的理由來作至高無上的證實。

從古希臘時代起，我們就知道，高度發展的政治生活培養了一種對這類私人生活範圍的根深蒂固的懷疑，深深地厭惡一個令人覺得煩擾不安的奇跡，即我們每一個人都被造成現在的這個樣子——單個的、獨特的、無法改變的。這種純粹的生成、歸附到文明社會裡的私人生活之全部範圍，是對公共生活的永恆威脅，因爲公共生活一貫以平等的法律爲基礎，而私人生活所根據的規則是普遍的區別和差異。平等，與單純的存在中所包含的一切形成對比，不是施捨給我們的，而是由正義原則引導下造成的人類組織結果。我們不是生而平等的；我們依靠自己決心保障相互之間的平等權利，作爲羣體的成員而獲得平等。

我們的政治生活建立在一種假設上：我們可以通過組織來產生平等，因爲人與同他平等的人在一起，才可以在一個共同的世界裡行動，改造和建設這個世界。純粹既定(mere givenness)的黑暗背景，由我們不可更改的獨特天性組成的背景，作爲一種異質物突破而進入政治場景，它以非常明顯的差異提醒我們關於人類活動的侷限性——這與人類平等的侷限性是一致的。高度發展的政治社羣(例如古代的城邦國家和近代的民族國家)爲何常常堅持種族的內部一致性，原因在於它們希望盡可能消除那些天然的、一向呈現的區別和差異，這些區別和差異本身會引起盲目的仇恨、虐待和歧視，因爲它們過分清晰地指出了人不能夠任意活動和改造的範圍，亦即人類手段的侷限性。「異質」(alien)是事實差異本身的可怕象徵，是個體性本身的可怕象徵，並且指明了那些範圍，人在其中無法改變、無法行動，因此他在其中有一種明顯的毀滅性傾向。假如在白人的羣體中有一個黑人，別人只當他是一個黑人，而沒有其他身分，那麼他在失去平等權利的同時，也失去了人類特有的行動自由；他的所作所爲只被解釋爲某種「黑人」特性的「必然」結果；他變成了某種動物種類的標本，這種動物種類就叫做人。

那些失去了一切明顯的政治特性，只變成了單純而不再具有其他性質的人，身上所發生的情況也大致相仿。所以毫不奇怪，凡是公共生活及其平等原則完全取得勝利的地方，凡是一種文明成功地消除了差異的黑暗背景或使之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地方，最終結果是完全失去活力和受到懲罰，因爲忘記了人只是世界的主人，而不是它的締造者。

被迫生活於共同世界之外的人的存在，產生巨大危險，他們在文明當中被扔回到自然天性和純粹差異當中。他們缺乏從某個社羣內的公民中產生的極大差異的平等化，但是，既然他們不再被允許參與人類創製，他們就開始像動物屬於某一具體動物種類一樣從屬於人類。人權之喪失的弔詭是，這種喪失和另一種事例同時發生：當一個人變成了一般意義上的人——沒有職業、沒有公民資格、沒有言論、沒有用以具體地驗明自身的行動——**並且**在總體上與眾不同，完全只代表他自己絕對的、獨特的個體，被剝奪了在一個共同世界裡的表現以及對這個共同世界產生作用的行動，這個個體就失去了全部意義。

在如此的「人的存在」中，危險性是雙重的：第一種比較明顯，這一類人的人數越來越多，威脅著我們的政治生活、我們的人類創製和作爲我們共同協調努力結果的這個世界。這種威脅的方式很像自然界的猛獸曾經威脅人造的城市和鄉村一樣，或許還更可怕一些。對任何一種文明的致命危險不再會來自外部。自然被控制了，野蠻人不再能威脅要毀滅他們無法理解的東西，例如幾百年前蒙古人威脅歐洲一樣。甚至連極權主義政府的出現，也只是我們的文明內部產生的現象，而不是從外部產生的。危險的是，一個全世界性的、普遍相互關聯的文明可能逼迫千百萬人進入野蠻狀態（儘管只在表相上），而從它自身中間產生出野蠻人。[55]

註釋

❶根據勞福德·柴爾茲(S. Lawford Childs),《戰爭並非不可避免》(*War is not Inevitabble*)中的說法是「難民——國際組織中的一個永久性問題」。(載《和平問題》〔*Problems of Peace*〕,第13卷,倫敦,1938)

❷納粹分子早先對德國猶太人的迫害應該說是一種嘗試,企圖在「那些友好地對待猶太人的民眾中,尤其在所有的西方民主人士中」散布反猶情緒,而不是想努力擺脫猶太人。1938年11月屠殺後不久,德國外交部在給所有的駐外機構發出的一份通報中聲稱:「僅此十萬猶太移民的運動也早就足以使許多國家意識到猶太民族的危險性。……德國非常有興趣繼續遣散猶太民族……猶太人流向世界各地,引起各地居民的反對,由此構成對德國的猶太人政策的最佳宣傳。猶太移民越窮,就越成爲接納他們的國家的負擔,因此越能引起這些國家的強烈反應。」(參見美國政府1964年出版的《納粹陰謀與侵略》,第6卷,87頁。)

❷庫爾特·特拉帕爾斯(Kurt Tramples),〈民族聯盟與民族獨立〉(Völkerbund und Völkerfreiheit),載《南德月刊》,第26期,1929年7月。

❶斯洛伐克人反對在布拉格的「捷克」政府的鬥爭,結束於希特勒支持下的斯洛伐克獨立之時;1921年的南斯拉夫憲法在議會以壓倒所有的克羅埃西亞和斯洛凡尼亞議員的票數而通過。關於兩次大戰期間南斯拉夫的歷史,可參見《帝國主義時代》(*Propyläen Weltgeschichte. Das Zeitalter des Imperialismus*)(1933),第10卷,471頁。

❺墨索里尼在慕尼黑危機之後說得很對:「假如捷克斯洛伐克發現自己今天處於一種『微妙的情勢』,這是因爲它不僅是捷克斯洛伐克,而是捷克—日耳曼—波蘭—馬札爾—露西亞—羅馬—斯洛伐克。……」(引自休伯特·利帕卡〔Hubert Ripka〕,《慕尼黑事件前後》〔*Munich: Before and After*〕,倫敦,1939,117頁。)

❻這個術語由奧托·鮑厄首創。見《民族問題與東歐社會民主制》(*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österreiche Sozialdemokratie*)(維也納,1907)。在民族意識的構成中,歷史意識起了很大作用。民族從封建統治和國際貴族政治下獲得解放,也伴隨著文學從「國際」知識界語言(先是拉丁文,後是法文)

下解放，民族語言從人民的方言中成長。看來凡是語言適合文學的民族都已明確無疑地達到了民族成熟的階段。因此，東歐各民族的解放運動開始於一種語文的復興（其結果有時很奇怪，有時很富於成果），它在政治方面的作用是證明了：擁有自己的文學和歷史的民族有權獲得國家主權。

❼當然，這種選擇不是一向很清楚的。至今仍無人有興趣探討剝削殖民地與剝削少數民族的相同性質。只有雅考伯·羅賓森(Jacob Robinson)說過：「一種奇特的經濟保護主義出現了，它不是針對其他國家，而是針對某些人民羣體。令人驚奇的是，某種剝削殖民地的方式在中歐也能見到。」（見〈國民平等權利與經濟平等權利〉〔Staatsburgerliche und wirtschaftliche Gleichberechtigung〕，載《南德月刊》，第 26 期，1929 年 7 月。）

❽據估計，1914 年前約有一億人未能實現民族願望。（見查爾斯·金斯萊·韋伯斯特〔Charles Kingsley Webster〕，〈少數民族史〉〔Minorities: History〕，1929 年版《大英百科全書》）少數民族人口據估計在二千五百萬至三千萬。（阿茲卡雷特〔P. de Azcarate〕，〈少數民族：國際聯盟〉〔Minorities: League of Nations〕，同上）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眞實情形更糟。捷克有國籍人民人數七百二十萬，占總人口百分之五十左右，南斯拉夫五百萬塞爾維亞人只占總人口百分之四十二。（參見溫克爾〔W. Winkler〕，《歐洲民族統計手冊》〔*Statistisches Handbuch der europäischen*〕，維也納，1931；奧托·榮格哈恩〔Otto Junghann〕的《歐洲的少數民族》〔*National Minorities in Europe*〕(1932)。特拉帕爾斯提供的數字略有不同，見前引書。）

❾阿茲卡雷特說：「〈少數民族條約〉並不包含關於少數民族對他們所在國家的『義務』的條款。國際聯盟第三屆普通大會卻於 1922 年採納了關於『少數民族的義務』。」（參見前引書）

❿在這一方面，法國和英國政府最爲坦率。布賴恩德(Aristide Briand)說：「我們的目標並不是使少數民族消失，而是建立一種同化過程。」英國代表奧斯登·張伯倫(Austen Chamberlain)甚至宣稱「〈少數民族條約〉的目標是成爲使少數民族逐步準備融入他們所屬的國家社羣的保護措施和公平措施。」（參卡尼

〔C. A. Macartney〕,《民族國家與民族少數》〔*National States and National Minorities*〕, 倫敦, 1934, 276及277頁)

⓫某些捷克政治家(民族運動中最突出的自由派和民主派領導人)曾經夢想過使捷克斯洛伐克成爲像瑞士一樣的共和國。但是, 甚至連貝內斯(Eduard Beneš)也從未認眞嘗試對令其煩惱的民族問題提出這樣一個解決方案, 原因是瑞士模式不可模仿, 它只是幸運的例外, 能建立另一種統治方式。新建立的國家並不認爲放棄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是一種安全措施, 因此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創造出那些小型的自治行政體, 以及瑞士聯邦制度賴以爲基礎的、權力範圍很廣的「州」(canton)。

⓬曾經熱心鼓吹允許「少數民族的種族、宗教、語言權利」的威爾遜(Woodrow Wilson)明顯地「害怕『民族權利』會是有害的, 少數民族羣體會因此成爲一個獨立的聯合體, 由此導致『妒忌和攻擊』。」(奧斯卡·雅諾夫斯基〔Oscar J. Janowsky〕,《猶太人與少數民族權利》〔*The Jews and Minority Rights*〕, 紐約, 1933, 51頁)麥卡尼描述過這種情況, 以及「外交事務聯合委員會的謹愼工作」中努力迴避「民族的」這個詞。(參見前引書, 4頁)

⓬麥卡尼在前引書中使用的詞。

⓫「和平解決的結果是, 混合居民地帶的每一個國家現在都認爲自己是一個民族國家。但是事實正相反。這些國家沒有一個是單一民族的, 正如從另一方面來看, 沒有一個民族是其所有成員只居住在一個國家裡。」(麥卡尼, 前引書, 210頁)

⓬ 1933年, 代表大會主席公開強調:「有一件事很明確: 我們在此代表大會上相聚, 並不純粹作爲抽象的少數民族的成員; 我們每一個人從肉體到精神都屬於一個具體的民族, 他自己的民族, 並與之同呼吸共命運。因此, 我可以說, 我們每一個人站在這裡, 作爲血統完全的日耳曼人或猶太人, 匈牙利人或烏克蘭人。」見《歐洲國家民族團體組織代表大會文獻集》(*Sitzungsbericht des Kongresses der organisierten nationalen Gruppen in den Staaten Europas*)(1933), 8頁。

⑯最初的少數民族產生於新教徒的良心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原則戰勝教區原則之時。1815 年維也納會議早已採取步驟，保證俄國、普魯士、奧地利三國居民中波蘭人的某些權利，權利當然不僅僅指「宗教的」；但是，後來的一切條約——1830 年簽訂的保障希臘獨立條約，1856 年的保障摩爾達維亞(Moldavia)和瓦拉西亞(Wallachia)獨立條約，1878 年關於羅馬尼亞問題的柏林會議條約——說的是「宗教的」，不是「民族的」少數，它給予的是「民權」(civil rights)，而不是「政治權利」。

⑯國際聯盟理事會的巴西代表德・梅洛・佛朗哥(De Mello Franco)將此問題說得很透徹：「我看很明顯，構想這種保護制度的人並不夢想在某些國家裡製造一個居民羣體，而他們認為自己對於國家的總體組織機構來說永遠是外國人。」(馬卡尼，前引書，277 頁)

⑯「對少數民族實施保護的體制，是對於從民族角度來看領土安置不完善的一種彌補。」(約瑟夫・羅瑟克〔Joseph Roucek〕，《政治學中的少數民族原則問題》〔*The Minority Principle as a Problem of Political Science*〕，布拉格，1928，29 頁) 麻煩的是，確定領土時的不完善不僅是少數民族居住區的緣故，也是建立繼來的國家本身固有的問題，因為在這個地區，每一塊領土都可以由幾個民族宣稱其擁有權。

⑯從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埃多亞德・貝內斯的話中可以發現這種思想變化的象徵性證據，捷克斯洛伐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體面地服從〈少數民族條約〉義務的唯一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不久，貝內斯開始支持人口遷移原則，最後導致驅逐日耳曼少數民族，造成增加了另一種「難民」(Displaced Persons)。關於貝內斯的立場，可參見奧斯卡・雅諾夫斯基(Oscar I. Janowsky)，《民族屬性與民族少數》(*Nationalities and National Minorities*)(紐約，1945)，156 頁。

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無國籍變成了最著名的問題。戰前某些國家(美國就很明顯)對此有一些規定，根據這種規定，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實行歸化，即被歸化者同他原先所屬的國家不再保持眞正的依附關係。非歸化者則無國籍。戰

爭期間，歐洲一些主要國家發現有必要修改它們的民族法，以獲得取消歸化的權力。」（約翰·霍普·辛普森〔John Hope Simpson〕，《難民問題》〔*The Refugee Problem*〕，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院，1939，231 頁）通過撤銷歸化而產生的無國籍者階級規模很小；但是他們輕易地開創了一個先例，致使兩次大戰之間的歸化公民依例成爲居民中第一個無國籍者的部分。大規模地撤銷歸化（例如納粹德國於 1933 年對已歸化的猶太血統德國人所做的那樣）通常引起出生類型相同的公民失去國籍，而制訂法律則能透過簡單的法令來取消歸化，就像三十年代的比利時等西方國家所做的那樣，通常引起實際上大規模地開除國籍；典型的例子是希臘政府對待亞美尼亞難民：在四萬五千名亞美尼亞難民中，1923 年至 1928 年有一千人已歸化。1928 年後，取消了一條關於二十二歲以下的難民全部可以歸化的法律，在 1936 年，政府撤銷了所有關於歸化的規定。（辛普森，前引書，41 頁）

㉑蘇維埃政府失去一百五十萬俄羅斯人之後二十五年，據估計至少有三十五萬至四十五萬人仍無國籍——如果考慮到自從首批逃亡之後已經過了整整一代人，那麼這個比例是相當大的，相當一部分人出走海外，另有很大一部分人通過婚姻在不同國家取得了公民資格。（辛普森，前引書，559 頁；尤金·庫利歇〔Eugene M. Kulischer〕，《歐洲的人口轉移》〔*The Displacement of Population in Europe*〕，蒙特利爾，1943；威尼弗雷德·哈德賽爾〔Winifred N. Hadsel〕，〈歐洲難民能否找到新的家園?〉〔Can Europe's Refugees Find New Homes?〕，載《外交政策報告》〔*Foreign Policy Reports*〕，1943 年 8 月，第 10 卷，第 10 號。）

的確，美國將無國籍移民置於同其他外國人完全平等的地位，其可能性只是因爲這個移民的優秀國家一向認爲新來者是它的未來公民，無論他們原先效忠哪個民族。

㉒《美國之友服務公告》（*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Bulletin*）（1943 年 3 月）發表過一篇由一位在西班牙做實地調查者寫的長篇報告，他面對的問題是「一個生於德國柏林的人，卻是波蘭血統，父母親都是波蘭人，所以他是無國籍者，但是他自稱烏克蘭人，俄國政府也因他是被遣送回國並在紅軍中服役而稱他

爲烏克蘭人。」

㉓勞倫斯・普勒斯(Lawrence Preuss),〈出於政治動機的剝奪國籍〉(La Dénationalisation imposée pour des motifs politiques),載《法國國際人權評論》(*Revue Internationale Française du Droit des Gens*),1937年,第4卷,第1、2及5號。

㉔意大利1926年反對「濫用向外移民」的立法,似乎預示了後來取消反法西斯主義難民的歸化措施;但是,在1929年廢止了取消國籍政策,主張在國外建立法西斯主義組織。在法國的意大利人聯盟四萬名成員中,至少有一萬人是正式的反法西斯主義難民,但是其中只有三千人無護照。(參見辛普森,前引書,122頁)

㉕第一個此類法律是法國1915年戰時措施,只和原爲敵國血統而歸化但仍保留原先國籍的公民有關;葡萄牙更進一步,其1916年法令宣布,凡是生父爲德國人者都自動除籍。比利時於1922年頒布法律,凡在戰爭期間從事反國家活動的人都被除籍,1934年又以新的法令再次重申這一點,它用當時典型的含糊語言風格提及「作爲比利時公民而嚴重失職」的人。意大利自從1926年後,凡是「不配做意大利公民」或者危害公共秩序的人都可能被除籍。埃及和土耳其分別於1926年和1928年頒布法律,根據它們的法律,凡是對社會秩序有威脅的人都將被除籍。法國威脅它的新公民,誰犯有違背法國利益的行爲,誰就失去歸化資格(1927年)。奧地利於1933年宣布,奧地利公民在國外從事或參與敵視奧地利的活動,就將被開除國籍。德國於1933年緊隨俄國自1921年以來頒布的各項法令,宣稱一切「居住國外」的人可以被任意剝奪德國國籍。

㉖引自衝鋒隊首領達納克(Dannecker)1943年3月10日的命令,指的是「1942年從法國押解五千名猶太人出境」。此文件是紐倫堡文件RF 1216號。對比利時猶太人的同樣處理,可見之於華格納(L. R. Wagner)1943年4月3日的有關備忘錄,紐倫堡文件NG 4180號。

㉗勞福德・柴爾茲(前引書)研究過,國際聯盟協議中「沒有政治難民的條文,沒有對放逐者的撫慰」。聯合國最近嘗試至少爲一小羣無國籍者——所謂「法律

上無國籍者」——爭取改善法律地位，這只不過是一種姿態；至少需要二十國代表同意，但又明確肯定參加這類會議不負任何道義責任。即使在這些情況下，會議能否召集仍大有疑問。（參見紐約《時代周刊》，1954 年 10 月 17 日新聞專欄）

㉘避難權的衛士只有幾個組織，其專門目的是保護人權。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國倡導的「人權聯盟」(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在歐洲各民主國家都設分部，它們的行動表現出對此問題仍然僅僅停留在救助因政治信念和活動而遭迫害的個人。這在幾百萬俄國難民的事例中早已證明毫無意義，而對猶太人和亞美尼亞人而言更顯得荒謬。人權聯盟在思想上和組織上都還不足以處理新問題。由於它不想面對新形勢，因此就難以產生作用，還不如許多慈善機構做得更好，這些機構是難民們在同胞的幫助下自己建立的。當人權變成一個特別無效的慈善機構的目標時，人權概念的信譽自然有所下跌。

㉙法律界作出各種努力，想透過指出無國籍者和難民的區別來簡化問題——例如主張「一個無國籍者的地位特徵是他沒有國籍的事實，而難民的地位特徵取決於他失去了外交保護」（辛普森，前引書，232 頁）——但「從實際來看，一切難民都無國籍」使這一努力失敗。（同上，4 頁）

㉚這種普遍願望最具諷刺意義的表述見於尤達爾・傑明斯(Yewdall Jermings)在《不列顛國際法年鑑》(*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39) 中〈難民問題的若干國際面向〉(Some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the Refugee Question)一文：「當然，難民地位不是一個永久性問題，他的目的是盡快使自己擺脫那種地位，或者遣返，或者在庇護國歸化」。

㉛只有俄國的無國籍貴族和同化為俄國身份的亞美尼亞人，才在各方面被正式認可為「無國籍」，置於國際聯盟的南森總部保護之下，並頒發給旅行證件。

㉜柴爾茲，前引書。這種拼命想迅速結束的原因是，各國政府害怕任何微小的舉動都「可能鼓勵各國擺脫它們不想要的人，他們中許多人會移居國外，而本來，即使在更嚴重的情況下，他們也仍然會留在自己國內」。（露易絲・霍爾本〔Louise W. Holborn〕，〈1920－1938 年政治難民的法律身份〉〔The Legal Status of Political

Refugees. 1920-38〕, 載《美國國際法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38)。

亦可參見喬治・莫柯(Georges Mauco) (《精神》〔Esprit〕, 第7卷, 第82號, 1939年7月, 590頁):「將德國難民與南森總部關注的其他難民置於同等地位, 自然是最簡單、最好的解決德國難民本身問題的辦法。但是, 各國政府不想將早已許諾的特權延伸到一個新種類的難民身上, 再說他們的人數呈威脅性地無限增長的趨勢。」

㉝在1938年, 德國和奧地利的六十萬猶太人可能喪失國籍, 還必須加上羅馬尼亞猶太人(羅馬尼亞聯邦少數民族事務委員會主席德拉戈米爾〔Dragomir〕剛剛宣布過即將修改羅馬尼亞所有的猶太人的公民資格)和波蘭猶太人(波蘭外交部長貝克〔Beck〕正式宣布波蘭的一百萬猶太人的人數太多了)。(見辛普森, 前引書, 235頁)

㉞很難認定首先出現的是什麼, 是民族國家不願使難民歸化(實際上歸化越來越嚴格, 而隨著難民的到來, 取消歸化卻越來越普遍), 還是難民不願接受另一種公民身份。在波蘭這樣的有少數民族的國家裡, 難民們(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有一種明確傾向, 不管是否要求取得波蘭公民身份, 都同化於少數民族。(辛普森, 前引書, 764頁)

俄國難民的行爲很有特點。南森(Nansen)護照描述其持有者是「俄國血統人」(personne d'origine russe), 因爲「誰也不敢對俄國移民說他沒有國籍或國籍可疑。」(見馬克・維什涅克〔Marc Vichniac〕, 〈無國籍者的國際身份〉(Le Statut International des Apatrides), 載《國際法學術文集》〔*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第33卷, 1933年) 嘗試向一切無國籍者提供統一身份證的做法受到南森護照持有者的劇烈抵制, 他們宣稱自己的護照是「對他們特殊身份的合法承認」。(見傑明斯, 前引書)戰爭爆發前, 甚至連德國難民也完全不願意與其他無國籍者爲伍, 而寧可選擇保留國籍尾巴的「來自德國的難民」(refugié provenant d'Allemagne)的身份說法。

比起歐洲各國對同化難民一事之難度的抱怨, 比較令人信服的是來自海

外的聲明:「在歐洲移民的各個部分中，最難同化的是南歐、東歐和中歐人。」（參見〈加拿大與和平演變原則〉〔Canada and the Doctrine of Peaceful Changes〕，安格斯〔H. F. Angus〕主編《人口統計問題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和平演變》〔*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 Demographic Questions: Peaceful Changes*〕，1937，75-76頁）

㉟傑明斯，前引書。

㉟荷蘭官方於1938年5月7日散發的文件中認爲每一個難民都是「不受歡迎的僑民」，將難民定義爲「在環境壓力下離開自己國家的僑民」。（參見〈移民：革命性問題〉〔L'Emigration, Problême Révolutionnaire〕，載《精神》，第7卷，第82號，1939年7月，602頁。）

㉟勞倫斯·普勒斯形容非法情形蔓延如下：「政府剝奪國籍的最初非法行動……使驅逐國處於觸犯國際法的地位，因爲它的當局侵犯了無國籍者被驅趕去的那個國家的法律。後者卻無法擺脫無國籍者，除非侵犯第三國的法律……無國籍者發覺自己只有如下選擇：或者侵犯他居住的那個國家的法律，或者侵犯他被驅趕去的那個國家的法律。」（見前引書）

約翰·費歇爾·威廉斯（Sir John Fischer Williams）（〈剝奪國籍〉〔Denationalisation〕，載《不列顛國際法年鑑》，第7卷，1927年）從這種情況中得出結論，認爲剝奪國籍是違背國際法的；但是在1930年海牙的國際人權法典編纂會議上，只有芬蘭政府堅持認爲「剝奪國籍……絕不構成懲罰……也不應該以宣布取消國籍來擺脫一個不受歡迎的人。」

㉟柴爾茲得出悲哀的結論：「在接受難民問題上的眞正困難是，如果他表現很壞，就已經無法擺脫他了。」之後，建議成立「轉運站」，難民即使在國外也可被送回這裡，換言之，它可以出於遞解目的取代一個祖國。

㉟近東地區兩個大規模歸化的例子明顯地是例外：一是希臘的土耳其難民，希臘政府於1922年將他們全部歸化入本國，因爲他們實際上是遣返的一個希臘少數民族，而不是外國公民；另一是從土耳其、敘利亞、黎巴嫩等國逃往亞美尼亞的難民，僅在幾年前，近東這些國家還共享公民資格。

㊵在一個難民浪潮中，難民發現了早已在移民國家定居的本民族人——例如法國的亞美尼亞人和意大利人，各國的猶太人——於是對於在此定居時間較長的人，其同化就出現了倒退現象。因爲只有訴求於與新來者同一民族的人，才能得到他們的幫助和團結。這一點與大批湧入難民的國家有著直接的利害關係，但是這些國家不能夠或者不願意給予直接幫助或工作權利。在這些情況下，證明舊團體的民族感情是「成功地安置難民的主要因素之一，」（辛普森，前引書，45－46頁）但是訴求這類民族良心和團結精神的方式，使接受難民的國家自然地增加了未同化的外國人的人數。例如，一萬名意大利難民足以無限期地延遲法國對將近一百萬意大利移民的同化。

㊵法國以及後來的西方各國政府在三十年代對歸化的公民訂出了越來越多的限制措施：他們在歸化之後的十年中不能從事某些職業，他們沒有政治上的權利，等等。

㊵辛普森，前引書，289頁。

㊵在實際情況中，對他的量刑比起一紙驅逐令或撤消工作許可證或將他送進難民營來，是微不足道的。美國西海岸的一個美籍日本人被關進監獄，當時軍方命令不強迫拘留所裡的一切美籍日本人以太低的價格清理出賣他的財產；他可以留在原地，配給他一名律師照看他的利益；如果他幸運地得到一個長期判決，他就可以合理平安地返回原先的商業和職業，哪怕他的職業是偷竊。他被判入獄，保障了他的憲法權利，一旦他的公民資格受到懷疑，也不會有別的事情來麻煩他，例如懷疑他的忠誠或對他起訴。

㊵同樣的道理，一個菁英人才在極權主義的集中營工作，那裡的「貴族」由大多數罪犯和極少數「天才」——也就是演藝者和藝術家——組成，這種情況顯示了這些羣體的社會地位之間的密切關係。

㊵例如在法國，根據記錄事實，從警方發出的驅逐令比起「只」從內政部發布的命令要嚴重得多，內政部長只能在偶爾情況下撤銷警方驅逐令，而警方要撤銷內政部的成命，只須一次賄賂便足夠了。根據憲法規定，警察隸屬於內政部管轄之下。

㊻ 1938 年 2 月，帝國與普魯士內政部提出「取得與失去德國國籍的法律草案」，比紐倫堡立法嚴格。它提出一切「猶太人、混血猶太人、其他外國血統」的兒童「即使父親擁有憑出生取得的德國國籍」，也都不能獲得德國國籍。這些措施不再只是和反猶立法有關，這明顯地從 1939 年 7 月 19 日的司法部長講話中可以看出。他提議「如有可能，法律條文中應避免使用猶太人和混血猶太人的概念，代之以『外國血統者』或『非日耳曼人』，或者『非日耳曼血統』。」在謀劃這一特別的擴展無國籍人口的過程中，納粹德國有一種很有趣的特徵，在有關棄兒（明顯地被看作無國籍者）的問題上，要等到「可以作出對他們的種族特徵的調查之後」。在這裡，每一個人生來根據他的國籍具有不可分離之權利的原則被精心顛倒了：每一個人都生而無權利、無國籍，除非能提出證明。

上述情況的原始文件見存於紐約意地緒學術研究所(Yiddish Scientific Institute)的檔案館。

㊻關於猶太人在〈少數民族條約〉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可參見麥卡尼，前引書，4、213、281 等頁；大衛•埃爾德斯坦(David Erdstein)，《歐洲少數民族的法律地位》(*Le Statut juridique des Minorités en Europe*)，巴黎，1932，11 頁及其後；雅諾夫斯基，前引書。

㊻這不僅是納粹德國的概念，儘管只有一個納粹作家敢於如此說：「是的，即使沒有猶太人問題了，難民問題還會繼續存在；但是，既然猶太人構成了高比例的難民人數，就使難民問題簡單得多了。」（卡伯曼〔Kabermann〕，〈國際難民問題〉〔Das internationale Flüchtlingsproblem〕，載《政治雜誌》，第 29 卷，第 3 號，1939 年）

㊻這種全然信任民族權利的不幸例子有：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意大利的蒂羅爾人中日耳曼少數民族的將近百分之七十五的人離開家園，重新定居德國；斯洛凡尼亞一個日耳曼人居住的島（自從十四世紀起他們就定居在那裡）在戰爭結束後立即自願遣返；意大利難民營中的猶太人一致拒絕意大利政府對他們提供的集體歸化許可。面對兩次大戰之間歐洲各民族的經驗，如果將這種舉動解釋爲狂熱的民族感情，那就錯了；如果這些人的基本權利不是由一個他

們的出生國的政府來保護，他們就會疑慮。（庫利歇，前引書）

[50]對新移民開放重新歸併的極少機會也大多根據他們的民族：例如西班牙移民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墨西哥歡迎。在二十年代，美國採用配額制度，根據這個制度，在這個國家早已有代表性的每一個民族，都有權接受一批原先屬於同一國家的人，數目比照其民族之人在美國總人口中的比例。

[50]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政府向那些受到「德法停戰協議」中引渡條款威脅的德國難民提供庇護，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從驅逐國政府的角度來說，要說它無罪，那是很危險的。當然，條件是申請者要能夠證明他做過反對納粹政府的事情。能夠達到這一條件的德國難民比例很小，而奇怪的是這些難民並不是處於最危險地位的人。

[50]即使在極權主義恐怖的條件下，集中營有時是某些殘餘的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仍然存在的唯一地方。關於布辛瓦德(Buchenwald)集中營的討論自由，參見達維德·羅賽特(David Rousset)，《我們死亡的日子》(*Les Jours de Notre Mort*)（巴黎，1947）；安東・西利加(Anton Ciliga)的《俄羅斯之謎》（*The Russian Enigma*）（倫敦，1940）在談到言論自由時，敘述了蘇聯的某些監禁地是「自由的小島」，有「心智自由」。（400頁）

[50]埃德蒙·伯克，《法國大革命反思錄》（1790），佩尼(E. J. Payne)主編的「大眾叢書」之一。

[54]羅伯斯庇爾，《演講集》（1927）中1793年4月24日的演講。

[50]伯克，前引書，佩尼所寫的引言。

[50]現代社會的這種將人逐出人類之外的情形，比起古代和中世紀的放逐習俗來，後果要嚴重得多。放逐（當然是「史前法律能造成的最可怕命運」）將犯法之人的生命置於他所遇到的任何人的處置之下，隨著有效法律執行制度的建立，放逐的做法最終被國家之間的引渡條約所取代。這是警察力量的最初替代事物，用於逼迫罪犯屈服。

中世紀初期似乎已清醒地意識到「公民死亡」(civil death)中牽涉到的危

險性。羅馬帝國晚期的革出教門(excommunication)意味著宗教的死亡(ecclesiastical death)，但是失去教籍的人在其他方面仍享自由。革出教門和放逐後來只在邁羅凡吉(Merovingian)時代才有，而且「放逐一般只限於暫時撤銷或中斷權利，可以恢復」。(參見《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中〈剝奪公民權〉〔Outlawry〕和〈革除教籍〉〔Excommunication〕條目。亦見《施威澤辭典》〔*Schweizwer Lexikon*〕中〈放逐〉〔Friedlosigkeit〕條目。)

第 三 部

極權主義

正常的人並不知道，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

——戴維・羅賽特
(David Rousset)

第十章
無階級社會

㈠羣衆

一般的極權主義運動特別是其領導者的名譽方面，其特點是令人吃驚地迅速被遺忘，令人吃驚地輕易被取代，這種特點是任何事物都無法和它相比的。斯大林多年來苦心經營，通過艱難的宗派鬥爭和無邊的特權所完成的一切，至少借用了前任的名義——即以列寧的接班人的身分使自己合法化——斯大林的後繼者則嘗試不借用他們的前任的特許名義，儘管斯大林花了三十年時間才控制了列寧時尚未出現的宣傳機器，來使自己的名字不朽。希特勒的情形也相仿，他在自己的一生中發揮了他的魅力，據說誰都會受到他的影響，❶但是在他戰敗並死去之後，如今已被人徹底遺忘，他很難再繼續發揮作用，即使在戰後德國的新法西斯主義和新納粹主義團體中。這種短命現象無疑和羣眾出名的反覆無常和以他們爲基礎的名聲必定不長久有關；或許還可以追溯到極權主義運動的那種永恆運動狂，它們只要保持運動，並且使周圍的一切也跟著運動，就可以繼續掌權。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這種短命現象對於已故的領袖們來說，只要他們曾成功地使自己的國民從具體方面沾染了極權主義毒素，那就是使他們可以得意的獎勵了；如果說有一種極權主義的個性或性格，那麼，這種異常的可更改性和缺乏延續性可謂它的突出的個性性格。所以，如果假設羣眾的朝三暮四和過於健忘，意味著他們的極權主義心理妄想已被治癒，那將大錯特錯，這種心理妄想時常表現爲希特勒崇拜或斯大林崇拜；事實上，這種心理妄

想是難以醫治的。

還有一種更嚴重的錯誤是，由於看到這種短命現象，而忘記了只要極權主義政權還在掌權，只要極權主義領袖們還活著，這種政權就會一直「指揮一切，並且得到羣眾支持」。❷根據服從大多數人意志的定則，希特勒崛起掌權是合法的，❷但是他或斯大林假如對羣眾沒有信心，就不能維持對大多數民眾的領導權，克服許多內外危機，安然度過黨內無休無止地發生的無數次內部鬥爭的危險。如果羣眾不支持斯大林和希特勒，那麼莫斯科大審判或者清除羅姆派(Röhm faction)的事都不可能發生。流行的觀點認爲希特勒只是德國工業家的代表，斯大林只是通過一種險惡的陰謀才在列寧去世後的鬥爭中獲勝，其實許多事實都可以駁斥這兩種傳奇故事，最重要的事實是領袖們的那種無可爭議的廣泛名聲。❹他們的名聲也不能歸結於嫻熟的謊言宣傳手法對無知和愚蠢的勝利。因爲極權主義運動在執政之前和執政期間的宣傳一貫坦率而且善於撒謊，未來的極權主義統治者通常以吹噓他們以往的罪行和小心地勾勒他們未來的犯罪計劃，來開始自己的事業。納粹分子們「相信在我們這個時代作惡有一種病態的誘人力量」，❺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內外都明確地說，他們並不承認一般的道德標準，這已成爲是共產主義宣傳之本，經驗一再證明，惡行的宣傳價值以及普遍對道德標準的藐視，與政治中最強有力的心理因素，即私利，無關。

惡與罪在暴民心理中的吸引力早已有之。暴民一向會歡迎「暴力行爲，而且會讚美說：這也許不光彩，但是很聰明。」❻極權主義之成功中令人不安的因素必定是它的信奉者眞正的無私(selflessness)：可以理解，一名納粹分子或者布爾什維克分子不會因爲對不屬於運動的民眾或者敵視運動的民眾犯了罪而動搖他的信念；然而令人驚異的事實是，如果他遭到厄運，甚至自己變成迫害的犧牲品，被整肅出黨，被送進苦役營或集中營，極權主義的魔鬼開始吞噬它自己的孩子，他也不會動搖。相反，文明世界都驚奇地發現，只要他在極權主義運動中的成員地位尚未被觸動，他甚至會自願

幫助迫害他自己，判處自己死刑。❼如果認爲這種愚蠢的信念，不顧一切實際經驗，取消一切直接的自我利益，是一種狂熱的理想主義的簡單表現，那就太天眞了。無論是傻瓜的理想主義還是英雄的理想主義，總是產生於某種個人的決定和信念，並且受到經驗和理論的支配。❽極權主義運動的狂熱同一切形式的理想主義相反，它在危險時將其狂熱的信徒棄之不顧，將他們那種有可能挽救運動本身於頹敗的殘存信念無情抹煞，到這時，這種狂熱就冰消瓦解了。❽但是在運動的組織結構內，只要它還未分化，那麼經驗或爭論都還不能動搖那批狂熱的成員；和運動完全認同及完全的服從似乎摧毀了他們的經驗能力，哪怕是折磨和對死的恐懼。

極權主義運動將目標定在組織羣衆，並且獲得了成功——這個羣衆並不是像大陸民族國家的舊的利益黨派一樣的階級；不是對管理公共事務有觀點、有興趣的公民，像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政黨一樣。當其他一切政黨都只依靠一部分力量時，極權主義運動是依靠純粹多數的力量，其程度使人口較少的國家即使在其他有形勢下也不可能建立極權主義政權。❽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一種反民主的、專制主義的半極權主義和極權主義運動橫掃歐洲；法西斯主義運動從意大利蔓延到整個中歐和東歐（只有捷克斯洛伐克的捷克部分是顯著的例外）；然而，即使是墨索里尼（他十分喜歡「極權主義國家」這個說法），也並未嘗試建立一個完全的極權主義政權，❽他自己只滿足於個人專政和一黨統治。戰前的羅馬尼亞、波蘭、波羅的海諸國、匈牙利、葡萄牙和佛朗哥的西班牙產生了同樣的非極權主義的專政。納粹分子向來直覺地感到這種區別，所以常常嘲笑地評論他們的法西斯主義同盟者的缺點，而他們對俄國布爾什維克政權（以及對德國共產黨）的由衷佩服也是有限的，也可以與他們對東歐各種族的蔑視相比。❽希特勒「無與倫比地尊重」的唯一一個人就是「天才斯大林」，❽而關於斯大林和俄國政府，我們沒有（也許永遠不會有）像我們從德國得到的那樣豐富的文件

資料，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從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知道了，斯大林只相信一個人，那就是希特勒。⑭

問題在於，在所有這些東歐小國中，極權主義運動帶來了非極權主義的專政，所以極權主義的野心目標似乎太大，儘管極權主義運動在奪得政權之前有效地組織了羣眾，但在絕對攫取了國家之後，又迫使羣眾中的極權主義潛在統治者納入更加熟悉的階級專政或政黨專政。事實眞相是這些國家簡直不能控制足夠的人力資源來實行極權統治，也不能控制內在的人口巨大流失。⑮暴君們對於征服人口更多的領土不抱多大希望，他們在這些小國家裡被迫作某種舊式的緩和，以免失去他們要統治的民眾。這也就是納粹直到發動戰爭、擴張到整個歐洲前夕，在貫徹及無情的手段方面還落後於它的俄國對手之原因；即使是德國民眾，其人數也不足以供使這種最新形式的政府得到充分發展。只有當德國贏得戰爭，它才知道什麼是充分發展的極權主義統治，但是它將會帶來的犧牲，不僅是對於「劣等種族」，而且對於德國人自己來說，也都可以從希特勒計劃的後遺症中發現和加以評斷。⑯在任何事件中，只有在戰時，在征服了東歐之後，獲得了大量的民眾，才有可能建立種族滅絕集中營，德國才能建立眞正的極權主義統治。（相反，在傳統的東方專制的土地上，在印度和中國，極權主義統治卻有極好的機會，那裡幾乎有永不枯竭的材料可以餵養極權統治的那架不斷積聚權力、不斷毀滅人的機器，更有甚者，那裡的人典型地感覺到人口太多——這在歐洲還是一種新現象，過去一百五十年間大規模失業和人口劇增現象並存——幾百年來普遍地蔑視人類生命價值。）政府恐懼普遍的反叛時，並不必然採用溫和的或不屠殺人的手段；他們自己國家裡的人口減少是一種更嚴重的威脅。只有在大量羣眾是多餘的或可以用不引起災難性後果的方法來減少的地方，極權統治（totalitarian rule）（與極權主義運動不同）才完全有可能。

在那些羣眾爲了某些原因渴望政治組織的地方，極權主義運動就有可能產生。羣眾並非由於一種共同利益的意識才聚合，他們缺乏一種具體的、明確表現的和有限的實際目標的階級組合。羣眾這個術語只用於人民，或者由於人數過眾，或者由於漠不關心，或者兩者兼具時，而不能整合進任何以共同利益爲基礎的組織、政黨、市政府、職業組織、工會。他們潛在地生存於每一個國家，由大量中立的、政治上無動於衷的、從不參加政黨、幾乎不參加民意測驗的大多數人構成。

1930 年後，德國的納粹運動和歐洲的共產主義運動興起，它們從羣眾中招募成員，這些民眾明顯地是冷漠的，其他一切政黨都認爲他們太麻木不仁、太愚頑，因而不值得注意，所以放棄了他們。⓱結果是他們的成員中大多數是從未在政治舞台上出現過的人。這就使政治宣傳得以引進全新的方法，而毫不關心政治對手的論點；這些運動不僅使自己處於政黨制度之外來反對它，而且建立了一種從未達到過、從未被政黨制度「寵壞」過的成員資格制度。所以它們不需要駁斥對立的觀點，一貫選擇以死亡爲結局而非以說服爲結局的方法，它呼喚出來是的恐怖，而不是信念。它們違背各種產生於深刻的自然、社會或心理的根源，超出了個人的控制範圍，因此也超出了理性力量的範圍。如果它們眞誠地與其他政黨競爭，這就會是一種缺點；但如果它們確定了和那些有理由同樣地敵視一切政黨的人打交道，這就不是一種缺點了。

極權主義運動在羣眾中的成功，意味著對一般民主統治的國家，尤其是歐洲民族國家和政黨制度，兩種幻想的終結。第一種是大多人積極參與政府，每一個個人都同情自己的或別人的政黨。事實上相反，運動顯示出政治上中立和無動於衷的羣眾很容易成爲一個民主統治國家裡的多數，因此民主可以根據少數人積極地承認的規劃來發揮功能。被極權主義運動炸得粉碎的第二種民主幻想是，這些對政治漠不關心的羣眾無關緊要，他們是眞正中立的，無非是構成了國家政治生活中沒有意見的背景。別的公共

輿論喉舌向來都不能顯示的東西，即民主政府有賴於人民的默認和無動於衷的容忍，就像依賴國家中清晰表達意見的機構和組織一樣，現在卻由極權主義運動來使之顯現。所以，當極權主義運動用它們對代議制政府的蔑視來侵犯議會時，它們顯得有些矛盾：事實上，它們成功地使一般民眾相信，議會中的多數是虛假的，並不必然符合國家的現實，由此破壞了政府的自尊和信心——它本來也只相信大多數人的統治，而不相信憲法。

經常有人指出，極權主義運動利用並且濫用民主自由，以便廢止它們。這不僅僅是領袖們的邪惡聰明和羣眾的天眞愚蠢。民主自由也許是以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爲基礎；然而它們只有在公民們屬於羣體、由羣體來代表，或者構成一個社會政治層級時，才獲得它們的意義和功能。歐洲民族國家裡唯一的社會政治階層化是階級制度，它的崩潰當然是「晚近德國歷史中最富於戲劇性的事件之一」，⑬有利於納粹主義的興起，就像俄國巨大的農業人口（這種「缺乏政治教育的巨大而鬆弛的體制，幾乎無法達到能夠採取高貴行動的思想」⑱）中社會階層的消失，有利於布爾什維克推翻克倫茨基(Alexander Kerensky)的民主政府。希特勒以前德國的條件在西方世界的發展中明顯地可以顯出其危險性，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幾乎在所有的歐洲國家內一再重複地發生階級制度崩潰的情況，而俄國的情況又清楚地指出了亞洲可能發生不可避免的革命變化的趨向。實際上，極權主義運動採取納粹主義方式還是布爾什維克主義方式，以種族還是以階級的名義組織羣眾，假裝遵從生命與自然的法則還是遵從辯證法與經濟學的法則，其實並無多大區別。

對公共事務無動於衷，對政治問題漠不關心，對於極權主義運動的興起並不構成充分的原因。資產階級貪得無厭的競爭社會對公共生活產生的冷漠甚至敵視，不是（甚至首先不是）僅僅在社會層面上（被剝奪、被排斥於積極參與統治國家之外），而首先是在它自己的階級內。當資產階級滿足於成爲社會的主要階級，而沒想到取得政治統治時，它樂於將政權留給

貴族階級，接著進入了帝國主義時代，在長期虛假的謙遜之後，資產階級越來越仇視現存的國家機構，開始問鼎政治權力，組織執政力量。早先的冷淡和後來要求得到國家外交事務的壟斷專制權力，根源都在其生活方式和生命哲學，一貫地堅持完全集中於個人在無情競爭中的成敗，以致一個公民的職責和責任只能看作是有限的時間和精力無謂的浪費。一個「強者」總是在專政中自己承擔麻煩的責任，以能從事公共事務，資產階級的這些態度對那些專政形式非常有用；這些態度積極干預極權主義運動，而極權運動不能夠容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就像無法容忍其他各種個人主義一樣。在資產階級占主導地位的社會裡，無論那些無動於衷的人如何不願意承認公民的責任，他們總還是保持自己的個性完整，倘若失去個性，就很難期望在生活的競爭鬥爭中生存。

十九世紀暴民組織和二十世紀羣眾運動之間關鍵的差異是很難觀察到的，因爲現代極權主義領袖們並非從早先的暴民領袖那裡繼承心理和精神狀態，儘管暴民領袖同資產階級領袖在道德標準和政治手腕方面非常相像。然而，就個人主義作爲資產階級和暴民的生活態度的特徵而言，極權主義運動倒是可以準確地宣稱它們是最早的反資產階級的黨派；它們在十九世紀的先驅，例如幫助路易·拿破侖上台執政的「12 月 10 日社」，德雷富斯事件期間的屠殺集團，俄國屠殺猶太人時的「黑色百人團」，或者是各種泛一運動，都還不曾將其成員逼到完全失去個人要求和野心，或者使他們明白，一個組織可以成功地永遠消滅個人的身分，而且不是只在集體的英勇行動片刻。

資產階級占主導地位的階級社會和崩潰後出現的羣眾之間的關係，不同於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生產的副產品暴民之間的關係。羣眾與暴民只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兩者都站在一切社會分枝和正常的政治代表性之外。暴民繼承了——儘管以一種扭曲的形式——占主導地位的階級的標準和態度，而羣眾則只反映、並且多少有些歪曲一切階級對公共事務的標準和態

度。人在羣眾中的標準不僅僅是取決於、而且首先不是取決於他曾經從屬過的具體階級，而是取決於普遍的影響和社會上一切階級心照不宣和不言而喻地共有的信念。

一個階級中的成員資格雖然比較鬆散，不像封建社會裡的等級和財產不可更改地取決於社會出身，但是一般也由出生而定，只有非凡的天才或命運才能改變。社會地位對個人參與政治產生決定性作用，除非在民族危難時，個人只是作爲一個「**民族成員**」而行動，無論他屬於哪一個階級或哪一個政黨，否則他絕不直接面對公共事務，或者認爲對公共事務的實施負有直接責任。一個階級在社羣中的重要作用上升，總是伴隨著將它的某一部分成員教育和訓練成以政治爲職業，在政府中服務或在議會中作爲階級代表而獲得報酬(或者，如果他們有經濟能力，就不取報酬)。大多數人在一切政黨和其他政治組織之外，對任何人來說都不重要，對這個階級和對那個階級也沒什麼兩樣。換言之，階級成員資格及其有限的羣體義務和對政府的傳統態度，阻礙了公民意識的成長，使公民不會感到對政府的統治負有個人責任。只有當階級制度崩潰，使民眾繫結於政體的可見和不可見的關係也隨之而去時，民族國家居民非政治的特點才會暴露。

階級制度的崩潰意味著政黨制度的自動崩潰，這主要是因爲這些政黨作爲利益政黨不再能代表階級的利益。它們的延續對於各階級先前的成員具有某些重要意義，這些階級成員違背意願地希望恢復他們舊日的階級地位，他們聚集在一起，並非因爲他們還會有共同利益，而是因爲他們期待恢復舊日的利益。結果使政黨在宣傳方面越來越帶有心理學和意識形態傾向，在政治方法上越來越帶有辯解的和懷舊的傾向。更有甚者，這些政黨在不知不覺中失去了中立的支持者，這些人對政治從來不感興趣，因爲他們認爲現存的政黨沒有一個關心他們的利益。所以，大陸政黨制度崩潰的最初跡象不是老黨員們的退出，而是從年輕一代中招募新黨員未能成功，而且失去了未經組織的羣眾的默認讚許和支持，他們突然表現冷淡，並且一

有機會就到處發表他們新的強烈反對觀點。

階級保護牆的倒坍將一切政黨背後遲鈍的大多數人轉變爲一種無組織、無結構、由憤怒的個人組成的羣眾，他們之間只有一點共同之處，即朦朧地理解到政黨成員們的希望落空了，結果將最受人尊敬的、最鮮明地具有代表性的社羣成員看作蠢人，將現有的一切力量看作是邪惡的，與以往一樣愚頑和具有欺騙性。對於這種新的可怕的消極團結的產生，失業工人痛恨現存的以社會民主黨爲形式的力量、以中央集權的或右翼黨派爲形式的被剝奪財產的小所有者、以傳統的極右派爲形式的前中層和上層階級的成員，其實也沒有重要結果。這批普遍不滿和絕望的羣眾人數在德國和奧地利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迅速增加，通貨膨脹和失業使軍事失敗的分崩瓦解局面雪上加霜，促使了這種情勢的發展；他們在相關的國家裡在人數上占據很大比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法國和意大利則支持了極端傾向的運動。

在階級社會崩潰的氣氛下，歐洲的羣眾心理有了發展。單一而又抽象地一致的命運降臨到一大批個人的身上，這一事實並未阻止他們根據個人的失敗來評判自己，或者根據具體的非正義來評判世界。但是，以自我爲中心的痛苦雖然在個人的孤獨狀態中一再重複，而除了消滅個人差異之外，它並非一種共同紐帶，因爲它的基礎並非共同的經濟、社會、政治利益。所以，自我中心(self-centeredness)與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的本能中的關鍵弱點一起發生。無私的意義倘是不計較個人自我，感覺到可以作出犧牲，那麼現在它不再是個人理想主義的表現，而是一種羣眾現象。古老的格言說，窮人和被壓迫者只有鎖鏈可以失去，這句話卻不再適用於羣眾，因爲當他們對自己的福利失去興趣時，他們失去的比苦難的鎖鏈更多：使人類生命煩惱怨苦的一切的憂慮與關心的根源都不見了。同他們的非物質性相比，一個基督教僧侶外表卻像一個沉緬於塵世事務的人。希姆萊清

楚地知道被他組織起來的那些人的精神狀況，他描繪的不光是衝鋒隊員，還包括從中招募衝鋒隊員的整個階層的人，他說他們對「每天發生的問題」不感興趣，而只感興趣於「幾十年和幾百年來重要的意識形態問題，所以人……知道他所效力的是一項二千年中才有一次的偉大任務。」⑳人數規模巨*大的個人混合起來，產生了一種心理，像四十年前的塞西爾•羅德斯一樣，*從各大陸的範圍來思考，根據幾個世紀的歷史來感受。

從十九世紀初開始，歐洲一些著名的學者和政治家們都預言過羣眾的興起和羣眾時代的來臨。關於羣眾行爲和羣眾心理的全部研究文獻，都顯示和傳播了人們從古代以來就很熟悉的關於民主與專政、暴民統治與暴君統治之間密切關係的睿見。他們爲蠱惑、欺騙、迷信和粗野的出現，準備了西方受過教育者的政治意識和超意識。但是，當所有這一切預言在某種意義上實現時，就這種意料不到和無法預言的現象（例如徹底喪失自我利益）而言，預言就失去了大部分意義，⑳面對死亡或其他個人災難時顯出玩世不恭或因厭倦而冷漠，激情傾向於最抽象概念（例如對生命的引導），普遍地嘲弄甚至最明顯的常識規律。

同預言相反，羣眾並不產生於日益平等的條件、一般教育的普及，以及不可避免地降低標準和普遍滿足。美國歷來是條件平等之地，實行普遍教育（儘管有缺點），或許它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疏於了解現代羣眾心理學。事情不久就變得很明顯，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對羣眾運動尤感興趣，一般說來，有高度差異的個人主義和世故態度並不妨礙（有時反而鼓勵）將自我拋擲在羣眾之中（Self-abandonment into the mass），投入羣眾運動。個人主義化和文明化並不妨礙羣眾態度的構成，由於這個明顯的事實如此出人意料之外，常受責備的卻是現代知識分子的病態和虛無主義，一種假定的典型知識分子的自我仇恨，以及精神的「敵視生命」和與生命力相對抗。但是，備受污蔑的知識分子只不過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他們是一種更普遍現象淸晰的代言人。社會分化和極端個人主義化開創了羣眾運動，比

它們造就社會性的非個人主義化的傳統式政黨成員要早得多，也容易得多，它們吸引了完全未經組織的、典型的「不參加者」，那些人本來出於個人原因，總是拒絕承認社會聯繫或者社會責任。

事實上，羣眾產生於高度分化的社會內，其競爭性結構和附帶的個人的孤獨，唯有通過在一個階級內的成員資格才會稍緩。羣眾中的人的主要特點不是野蠻和落後，而是孤獨和缺少正常的社會聯繫。羣眾產生於民族國家受階級所累的社會，它的裂痕曾由民族主義情緒彌補過，所以很自然，羣眾第一次在無助的新經驗下，傾向於一種特別暴烈的民族主義，羣眾的領袖們違背自己的本能和目的，純粹為煽動人心而順應於這種民族主義。㉒

就羣眾而言，部族民族主義和反叛的虛無主義都既非其特徵，又不適合於它的意識形態，但符合暴民的特點和意識形態。但是我們當代最有天才的羣眾領袖卻仍然產生於暴民，而不是羣眾。㉒在這方面，希特勒的傳記讀起來就像教科書，而斯大林也來自布爾什維克黨的密謀組織，具體地由流放者和革命者組成。希特勒早年的政黨成員幾乎全是不適應環境的人、失敗者、冒險家，確實代表了「武裝的波西米亞人」(armed bohēmians)㉒，他們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相反面，而德國的資產階級為了達到它自己的目的，本應成功地利用他們。實際上，資產階級受了納粹的騙，一如帝國衛隊的羅姆—施萊徹派(Röhm-Schleicher faction)認為希特勒或衝鋒隊(SA)只不過是他們用來作為囮鴿，用於軍事宣傳和社會訓練的代表人物而已，幫助他們建立軍事獨裁。㉒兩者都根據自己的想法，根據暴民的政治哲學，㉒忽略羣眾對新的暴民領袖的獨立的、自發的支持，以及暴民領袖創造新的組織形式的眞正天才。暴民作為羣眾的領袖，不再代表資產階級或任何人，除了代表羣眾之外。

極權主義運動較少地依靠無結構的羣眾社會，較多地依靠分子化的(atomized)、個人化(individualized)的羣眾的具體條件，這可充分地見諸於對納粹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比較，這兩種主義在非常不同的情況下

開始產生於各自的國家。斯大林爲了將列寧的革命專政改變成完全的極權主義統治，率先創造了那種虛假的分子化社會，這在德國歷史條件下也早已爲納粹作了準備。

俄國十月革命輕而易舉地獲勝，令人驚訝。這個國家的中央集權專制官僚政府統治著一羣無結構的羣眾，鄉村封建秩序的殘餘和新生而又虛弱的城市資產階級都還沒有組織起來。當列寧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能如此容易地奪取政權、又如此困難地保持這個政權，這時他意識到俄國工人階級的弱點，也意識到有利於突變的總體社會狀況是混亂的。列寧缺乏羣眾領袖的各種本能，他不是一個預言家，他樂於公開承認和分析自己的錯誤，這就違背了一個甚至是最普通的煽動家的規則，但是他立即把握住社會的、民族的、職業方面，或許會引進某種結構的差異，而且他似乎也相信，拯救革命的希望存在於這些階層分化之中。他使農村羣眾無政府主義式地剝奪地主財產的行爲合法化，由此第一次（或許也是最後一次）在俄國解放了自法國革命以來一直最堅定地支持西方民族國家的農民階級。他嘗試用鼓勵獨立工會的方法來增強工人階級的立場。他容忍了內戰結束後從國民經濟計劃中悄悄產生的新的中產階級。他倡導用組織(有時是製造)盡可能多的少數民族的方法，進一步區分特徵，提高民族意識，認識到即使在蘇聯的最原始的部落中也存在著歷史和文化的差別。似乎很清楚，在這些純粹實踐性的政治問題上，列寧遵循的是他的政治家的偉大本能，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信念；無論如何，他的政策證明了一點：他害怕的是缺乏社會結構和其他結構，而不是新解放的各民族可能產生離心傾向，甚至也不是新建立的中層和農民階級中間產生出新的資產階級。當內戰爆發時，列寧無疑遭受了一場最大的失敗，他原先打算集中在蘇維埃各國的最高權力，卻落到了黨內官僚手中；但是，這種在革命過程中本身悲劇的發展不一定會走向極權主義。在一個國家早已形成的社會結構層中，一黨專政只是增加了一個階級，即官僚階級，根據社會主義的革命批評家的說法，這個階

級「將國家當作私有財產來占有」(馬克思語)。㉗在列寧去世時，這條道路仍然敞開著。工人、農民、中產階級組成的結構並不一定會導致階級鬥爭，而階級鬥爭則曾經是歐洲資本主義的特徵。農業仍然可以在集體、合作或私有基礎上發展，國民經濟仍然可以自由地遵循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或自由企業形式。各種形式的選擇都不會自動地摧毀國家的新結構。

當斯大林著手替國家準備極權主義政府時，上述這一切新階級和民族都是他的障礙。爲了製造一個分子化的和無結構的羣眾，他首先清除蘇維埃權力的殘餘分子(他們是國家機構的主要代表)，因爲他們仍然在產生某些作用，仍在阻礙政黨階層制度(party hierarchy)的絕對統治。所以他首先引入布爾什維克細胞——中央委員會的高級官員皆由其中產生，以此來破壞全國蘇維埃。㉗到了 1930 年，先前的公共機構的最後遺跡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堅實的中央集權政黨官僚機構，它的俄羅斯化傾向同沙皇政權沒有多大差別，唯一的區別是這個新的官僚制不再懼怕識字的人。

布爾什維克政府接著開始消滅階級，出於意識形態和宣傳的原因，首先著手清除有產者階級、城市中產階級、農村中的農民。由於人數和財產集合的力量，使農民直到那時一直是蘇聯潛在的最強有力的階級；結果對他們的清除比對其他階級更徹底、更殘酷，其執行手段是製造災荒和驅逐出境，藉口沒收富農財產和實現集體化。清除中產階級和農民階級在三十年代初完成；凡是未死於好幾百萬人之中，或未成爲被押解的幾百萬苦役犯的人，都懂得了「誰是這裡的主人」，明白了他們和家屬的生命並非取決於同國公民，而是完全取決於政府的興致，他們孤獨地面對政府，得不到來自他們從屬的那個團體的任何幫助。集體化(collectivization)產生了一個新的農民階級，它有共同的利益。這個階級的形成是由於它的人數和在國家經濟中的關鍵地位，這也表現出一種通向極權主義統治的潛在危險。從統計數字和文件資料中很難準確地確定它的產生時間。但是，如果知道如何閱讀極權主義的「資料來源」，就可以知道這一時刻是斯大林去世前兩年

到來的，當時他提議解散集體農莊，將它們轉變成更大的單位。他未能在活著的時候執行這個計劃；這一次，犧牲將會更大，總體經濟的混亂結果造成的災難將會大於第一次清除農民階級，但是，也並沒有理由懷疑他可能取得成功；任何一個階級，只要它的成員被殺害的數字足夠到一定程度，它就可以被消滅。

下一個要清除的階級是工人羣體。作爲一個階級，他們比農民更虛弱，作出的反抗更少，因爲他們在革命期間自發地剝奪工廠主的所有權，同農民剝奪地主的所有權不一樣，立即引起了政府的注意，政府藉口國家在任何情況下都屬於無產階級，將工廠沒收，作爲國家財產。三十年代初採用的斯達漢諾夫制度(Stakhanov system)打破了工人中間的一切團結和階級意識，首先是凶猛的競爭，其次是一個斯達漢諾夫式的新貴階級暫時團結，他們同普通工人之間的社會差異比起工人同管理階層之間的差異來得尖銳得多。這一過程完成於 1938 年，當時建立了考勤卡制度，使全俄國的工人階級正式地轉變成一支巨大的強迫勞動大軍。

在這些措施中，最主要的是清除那個幫助執行先前的清除措施的官僚階級。從 1936 年到 1938 年，斯大林花了兩年時間擺脫了蘇聯社會的整個管理階層和軍事貴族；幾乎所有的政府機構、工廠、經濟和文化團體、政黨、軍事當局都落入了新人手中，「將近半數的黨員和非黨的管理人員被消滅，」黨員之中有百分之五十，「至少八百多萬人」被清除。㉙接著又建立了內部護照制度，從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去必須登記和獲得批准，最終摧毀了作爲一個階級的黨內官僚。至於它的法律地位，官僚同政黨官員一樣，現在與工人等級相同；而且它現在也變成了俄國各種各樣的強迫勞動力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在蘇聯社會中作爲一個特權階級的地位已成爲過去。由於這場大整肅以清除最高警察官員而告終——起初是他們組織了這場大整肅——甚至連執行恐怖行動的格別烏官員們也無法再自欺地認爲他們作爲一個團體可以代表什麼事物，更無須說是權力了。

人類生命的這些大規模犧牲，其實動機都不是出於舊意義上的「存在的理由」。被清除的社會階層沒有一個會敵視體制，或者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敵視它。積極組織起來的反對派在 1930 年就停止了，當時斯大林在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上講話，宣布黨內極右派和極左派皆爲非法，這些虛弱的反對派幾乎不能將現存的任何一個階級當作自己的基礎。㉚獨裁恐怖(dictatorial terror)——它和極權主義恐怖不同，只威脅正式的反對者，而不威脅沒有政治觀點的無害的公民——十分凶惡地窒息一切公開的或秘密的政治生活，即使在列寧去世之前亦是如此。外國的干涉可能會和國內一部分心懷不滿的力量串連，但是到了 1930 年，蘇聯政府得到大多數國家承認，並且和許多國家簽訂了貿易以及其他國際協議，就不存在外國干涉的危險了。(就人民本身而言，斯大林政府難以消除可能的危險：如果希特勒是一個普通的征服者，而不是一個競爭的極權主義統治者，他就可能有一個特殊的機會來贏得他的事業，至少贏得烏克蘭人民。)

假如消滅階級一事毫無政治意義，那麼它對於蘇維埃的敵人而言卻造成了災難。1933 年假飢荒的後果在全國持續多年；1935 年提倡斯達漢諾夫運動，它任意提高個人生產指標，完全無視工業生產中協同工作的必要性，結果使年輕的工業陷入「混亂失衡」。㉛清除官僚階層，即工廠管理者和工程師階級，最終導致剝奪了新的俄國技術知識分子曾經得到的一點點的技術經驗和知識。

自從古代以來，專制及暴君政制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是臣民之間的條件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然而這種平等化還不足以構成極權主義統治，因爲它或多或少地使臣民之間非政治的共體關係（例如家庭紐帶、共同的文化興趣）保持原封不動。假如極權主義嚴肅地對待自己的主張，它就必須「一勞永逸地結束棋戲的中立」的態度，亦即結束任何活動的自主存在。喜歡「爲下棋而下棋」者被清除他們的人比擬爲「爲藝術而藝術」者，㉛他們在羣眾社會裡還不是羣眾社會中絕對分子化的成分(atomized ele-

ments)，而羣眾社會的異質的一致性(heterogeneous uniformity)是極權主義的首要條件之一。從極權主義統治者的觀點來看，一個專心於爲下棋而下棋的社會和一個專心於農事的農民階級比起來，只有程度不同，而較不危險而已。希姆萊(Heisrich Himmler)十分喜歡將黨衛軍成員描述成新型的人，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爲事情本身而去做一件事」。㉝

由於熟練地運用反覆整肅的手段，蘇聯社會的羣眾終於分化了，整肅運動不可避免地開始事實上的團體整肅。爲了摧毀一切社會的和家庭的紐帶，整肅運動在方式上，威脅被告與整肅一切和他有普通關係的人——從一般熟人到最親密的朋友和親戚——將遭受同樣命運。這種簡單直率的「株連罪」(guilt by association)手法造成的結果，使一個人一旦受指控，他先前的朋友們便會立即轉變爲他的最凶惡敵人；爲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他們自願告密，爭先恐後地用莫須有的罪證來指控和譴責他；這明顯地是他們證明，自己忠實可靠的唯一辦法。他們還會倒過來試圖證明自己同被指控者相識或結交，只是爲了掩護對他的監視，並且揭露他是一個破壞者、一個托洛茨基分子、一個外國間諜，或者一個法西斯分子。成績是「由你揭發的親密朋友的人數來衡量的」，㉞很明顯，最基本的謹慎態度是要儘量避開一切親密往來——不是爲了防止秘密的思想被發覺，而是在考慮到未來可能發生的麻煩時——杜絕所有的人可能不僅出於一種批判別人的普通廉價興趣，而且也出於一種不可抗拒的需要；他們給別人帶來毀滅，只因爲他們自己的生命也處於危險之中。說到底，通過將這種手段發展到光怪陸離的極致，布爾什維克統治者成功地製造了一個分子化的和個人化的社會，我們從未見過這樣的社會，光憑事件或災難還很難造成這樣的社會。

極權主義運動是分子化、孤立的個人的羣眾組織。同其他一切政黨和運動相比，極權主義運動最顯著的外部特徵是個體成員必須完全地、無限制地、無條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誠。極權主義運動的領袖們甚至在攫取政

權之前就已提出了這樣的要求。通常的做法是在實際掌權之後才開始從總體上組織國家，接著宣布他們的意識形態，聲稱他們的組織必將包容整個人類。但是，凡在極權統治並非由極權主義運動開始的地方（俄國是這種例子，和納粹德國完全相反），運動必須在事後組織，它的生長條件是虛構創造的，其目的是盡可能製造完全的忠誠——這是極權統治的心理基礎。這類忠誠只能產生自完全孤立的人，他們沒有其他的社會聯繫，例如家庭、朋友、同志，或者只是熟人。忠誠使他們感覺到，只有當他屬於一個運動，他在政黨中是一個成員，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個位置。

忠實(fidelity)包含著具體內容，它可能很自然地會改變人的思想，因此只有消除具體內容，才可能達到完全忠誠。極權主義運動以各自的方式盡了最大的努力，來擺脫帶有具體內容的、繼承自先前非極權主義發展階段的政黨綱領。無論他們的話多麼激進，每一種特定的政治目標都不能簡單地斷言或描述統治世界的主張，每一種針對比「幾個世紀來重要的意識形態問題」更具體的問題的政治計劃，都是對極權主義的阻礙。希特勒從一個典型的民族主義小政黨中漸漸地建立納粹運動，他在納粹組織中的最大成績是使運動卸下了先前的政黨綱領的負擔，他不是改變它或者正式取消它，而是簡單地拒絕談論或討論其要點，那些較爲溫和的內容和表達方式很快就過時了。[35]斯大林在這一方面的任務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樣，顯得更加可怕；布爾什維克黨的社會主義綱領是一樁非常麻煩的負擔，[35]遠遠超過了一個業餘經濟學家和瘋人政治家的二十五點計劃。[35]但是斯大林在廢除了俄國黨內派別之後，通過共產黨的經常曲折的路線，通過經常性地重新解釋和應用馬克思主義，取消它的全部理論內容（因爲它不再可能預言未來的路線和行動），最終達到了同樣的結果。事實上，最合適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教條並非對政治行爲的引導——相反，假如一個人每天早晨重複斯大林昨天晚上的話，他才是遵循了黨的路線——結果自然統一了思想，集中地服從，不會由於試圖理解人在做什麼而分裂，正如希姆萊爲

黨衛軍擬定的口號:「我的忠誠是我的光榮」(My honor is my loyalty)。㊳

缺乏黨綱或無視黨綱本身不一定是極權主義的標誌。前者認爲黨綱和論壇是無用的紙上空談和窘迫的諾言，同一場運動的風格和動力絲毫不一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行動哲學就是如此，他只相信通過歷史契機本身的靈感。㊴對權力的純粹渴望，並且嘲笑「滔滔不絕地談論」他們將怎樣處理，這是一切暴民領袖的特點，但是還不夠極權主義的標準。法西斯主義的眞正目標只是奪取權力，確立法西斯主義「菁英」爲統治國家的無可競爭的統治者。極權主義絕不滿足於用外部手段來統治，即通過國家和一種暴力機器；由於它那奇特的意識形態和它在這種高壓政策中被賦予的角色，極權主義發現了一種從內部控制人和威嚇人的方法。在此意義上，它消除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距離，達到一種新的狀態，其中我們所知的權力和權力意志根本不產生作用，或者至多只有次等作用。極權主義領袖實質上不折不扣地體現受他領導的羣眾的功能；他不是一個渴望權力的個人，對他的臣民不施加暴政和獨斷意志。他只是一個執行者，隨時可以被取代，他依靠的正是他所體現的羣眾「意志」，羣眾也依靠他。若沒有他，他們就缺少外在的代表，始終是烏合之眾；若無羣眾，領袖就成爲無足輕重之人。希特勒充分意識到這種相互依賴性，他曾經在對衝鋒隊的一次演講中說:「你們之所以是你們，是因爲我；我之所以是我，只是因爲你們。」㊵我們總是過於低估這些說法，或者誤解其含義，認爲此處所說的行動(acting)之定義只是下達或執行命令，正如西方歷史的政治傳統中經常發生的那樣。㊵然而這種觀點一向假定，領導者思考並產生意志，然後將他的思想和意志強加給被剝奪思想和意志的羣體——無論是採用說服、權威、或暴力的手段。但是，希特勒認爲甚至連「思想……也只依靠發出或執行命令才存在，」㊳因此即使是從理論上，他也一方面消除了思想和行動的差別，另一方面消除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差別。

國家社會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都未宣稱過要建立一種新式政府，或

者斷言它的目標是奪取政權和控制國家機器。其統治思想是任何國家、任何純粹的暴力機器都未達到過的一種東西，是一種持久不息的運動：在生活的每一個領域裡都永久地統治每一個個人。[43]通過暴力手段奪取政權，這本身絕不是一種目的，而是通向目的的一種手段，而在任何一個國家裡奪取政權也只是一種可行的過渡階段，絕不是運動之目的。運動的實際目標是盡可能多地組織民眾進入它的架構，推動和保持他們處於運動狀態；則能夠構成運動目的的政治目標根本不存在。

(二)暴民與菁英的暫時結合

比極權主義運動的成員們的無條件忠誠和對極權主義政府的廣泛支持更能擾亂心靈寧靜的，是這些運動在社會上不僅對暴民、而且對菁英產生無可置疑的吸引力。若忽略這一點，未免顯得輕率，因爲藝術家的異想天開或學者的天眞，以及一些著名人物，都會成爲極權主義的同情者、同路人和註冊黨員中可依靠的人。

對於理解極權主義運動（儘管不是極權主義政府）來說，菁英們所受到的吸引力和他們與暴民的明顯關聯一樣，都是重要的線索。它指出了極權主義崛起時的具體氛圍和一般氣候。必須記住，極權主義運動的領導人和同情者比他們所組織的羣眾都年長，因此根據日程而言，羣眾不必在一個衰落的階級社會（羣眾正是這個社會裡最顯著的產物）中間，孤立無援地等待他們的領袖出現。在階級敗落之前自願離開社會的人又同暴民一起出現了，暴民是資產階級統治的早期副產品，他們隨時歡迎那些人。目前的極權主義統治者和極權主義運動的領袖們的特點中仍然帶有暴民的痕跡，他們的心理和政治哲學是人們相當熟悉的；至於正式的羣眾代表一旦接管之後會發生些什麼，我們還不得而知，儘管大可以猜測，他將像希姆萊那樣小心謹愼和說話精確，而不像希特勒那樣歇斯底里發狂，更像莫洛

托夫(V. Molotov)那樣頑固遲鈍，而不像斯大林那樣敏感、善於報復和殘忍。

在這一方面，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情形同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並無實質區別；正如在二十年代，建立法西斯主義、布爾什維主義、納粹主義意識形態和領導運動的是所謂戰場上的一代，他們在戰前長大，依然明顯地記得戰前的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極權主義的一般政治和理智氣圍也取決於一代人，他們也親身感知先前的時代和生活。這在法國尤其如此，階級制度的崩潰發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而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極權主義運動的領袖們就像帝國主義時代的暴民和冒險家一樣，與知識界的同情者一樣，即使在歐洲各國社會的階級和民族制度崩潰以前，也早已置身於這個制度之外。

當虛僞自尊的自命不凡讓位於無政府主義式的絕望時，這種制度的崩潰彷彿爲菁英和暴民都提供了第一次巨大的機會。新的羣眾領袖身上再現了早先暴民領袖的各種特徵，這一點很明顯：職業和社會生活中的失敗，私人生活的反常和災難。事實上，在轉向政治生涯之前，他們的生活是失敗的，舊政黨比較令人尊敬的領袖們無意地造成了他們的失敗，這是他們在羣眾中產生魅力的最有力因素。他們的個人經歷似乎體現了當時羣眾的命運，他們爲了運動可以犧牲一切，他們保證爲那些受災難打擊的人獻身，他們的決心不會動搖，不會受誘惑回到安全的正常生活，他們對聲望尊嚴的蔑視是出於眞心，而不只是出於達到野心的動機。

另一方面，戰後的菁英們只不過稍微比上一代人年輕些，上一代人被帝國主義利用和濫用，目的是爲了除受人尊敬以外還要追求光榮的事業，所以去做賭徒、做間諜、做冒險家、做穿戴閃亮盔甲的騎士和屠龍手。他們同「阿拉伯的勞倫斯」一樣，渴望「丟棄自我」(losing their selves)，極度厭惡一切既存的標準，厭惡一切權力。倘若他們仍然記得「安全的黃金時代」，那麼也會記得他們是多麼恨它，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們的

熱情是多麼眞誠。當 1914 年戰爭席捲歐洲時，感謝上帝的不光是希特勒，也不光是失敗者。㊹他們甚至不用責備自己曾受誘於沙文主義宣傳，或者對純粹自衛性質的戰爭作解釋。菁英們興高采烈地走向戰爭，期望他們所知道的一切，包括整個文化和生命特質，都能隨著「鋼鐵風暴」(Storms of Steel)發展（恩斯特・榮格〔Ernst Junger〕語）。用托馬斯・曼精心斟酌的話來說，戰爭是「懲戒物」，是「淨化劑」；「戰爭本身比勝利更能給詩人靈感。」或者用當時一名學生的話來說，「關鍵一向在於隨時作出犧牲，而不是作出犧牲要爭取的目標。」或者用一位年輕工人的話來說，「一個人多活幾年少活幾年都無關緊要。一個人在一生中總想顯示某種東西。」㊺很久以前，知識界一位同情納粹主義的人宣布說，「當我聽到文化這個詞時，我就會拔出手槍，」詩人們宣稱他們厭惡「垃圾文化」，並且用詩句來號召「你們野蠻人、塞西亞人、黑人、印度人，將它踩在腳下吧。」㊻

簡而言之，這種對戰前時代劇烈不滿的虛無主義式爆發以及後來嘗試使之恢復（從尼采和索黑爾到巴烈圖〔Vilfredo Pareto〕，從韓波〔Arthur Rimbaud〕和 T.E.勞倫斯到榮格、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和馬侯〔André Malraux〕，從巴枯寧〔Michael Bakunin〕和納恰耶夫〔Sergi Nechayev〕到亞歷山大・勃洛克〔Alexander Blok〕）其實忽略了，在一個彌漫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觀念和道德標準的社會裡，厭惡是多麼正當的。然而同樣地，「前線世代」(front generation)同他們選擇的精神之父們形成明顯對比，完全沉湎於一種願望，想看到這整個虛假的安全、虛假的文化、虛假的生活的世界徹底傾圮。這種願望如此強烈，它的影響力和說明度大大超過了先前在「價值轉變」(transformation of values)時期的一切嘗試，例如尼采的努力，索黑爾著作中指出的重新組織政治生活，巴枯寧關於復興人類眞實性的主張，韓波在純淨的奇異探險中表現的熱愛生命。在毀滅中沒有緩和、混亂和傾圮，這本身就帶有最高價值之尊嚴。㊼

這些感覺的眞實性可見諸於事實，這一代人中很少有人由戰爭之恐怖

的實際經歷醫治他們對戰爭的狂熱。戰壕裡的倖存者並未變成和平主義者。他們得到的經驗卻是認爲，這一切可能會毫不含糊地將他們同可恨的體面環境分隔開來。他們糾纏於四年戰壕生活的記憶，似乎他們爲確立一種新的菁英而構成了一種客觀標準。他們不會受誘惑去使這種過去生活理想化；相反，戰爭崇拜者最早承認，機器時代的戰爭不可能養育騎士氣概、勇敢、榮譽感、男子氣等等美德，㊽它強加給人的只是赤裸裸毀滅的經歷，以及在屠殺的巨輪之下只能成爲微不足道的小東西的卑屈感覺。

這一代人記得戰爭是階級崩潰和淪爲羣眾的偉大前奏曲。戰爭以它那經常性的任意屠殺而成爲死亡的象徵，成爲「偉大的平等使者」㊾，因此也是一種新世界秩序之父。追求平等和正義的激情，渴望超越狹隘而無意義的階級界限，丟棄愚蠢的特權和偏見，這些似乎都在戰爭中找到了一條出路，可以擺脫那種憐憫被壓迫者和無繼承權者的舊式恩賜態度。在日益悲苦和個人孤立無助的時代，似乎很難在憐憫發展成一種吞噬一切的激情時抵制它，也不用抱怨它無休無止地用一種比悲苦本身更明確無疑的態度來戕殺人的尊嚴。

在希特勒的早年生涯中，當時歐洲恢復現狀對暴民的野心仍是最嚴重的威脅，㊿他幾乎完全訴諸前線世代的這些情感。羣眾在此顯示的奇特無私，似乎只是一個數字，只作爲一個小齒輪，在每日的改變中默默無聞，簡言之，消滅虛假的具體的身分認同，執行在社會中的預定功能。戰爭被體驗爲「最有力的羣眾行動」，它消除個人之間的差異，因此，即使受難（按傳統的說法，受難標誌著個人承受獨特的、難以改變的命運）現在也被解釋爲「歷史進步的一種工具」。㊿民族差異也不會阻止戰後菁英們一心一意地希望投入的羣眾。第一次世界大戰多少有點弔詭地幾乎在歐洲消除了眞正的民族感情，在兩次大戰之間，歐洲屬於戰壕裡的那一代人——無論他們是哪一邊的——而不屬於一個德國人或一個法國人。㊿納粹宣傳的基礎就是這種模糊的同志情誼，這種「命運共同體」(community of fate)，於

是在歐洲各國的各種退伍軍人組織中大得人心，這也證明了即使在所謂的右派隊伍中，民族主義口號也顯得毫無意義，右派利用這些口號只是爲了替自己的暴力行爲辯護，而不是爲了口號中那些具體的民族內容。

在戰後歐洲知識界的一般氣氛中，沒有一種因素是新的。巴枯寧早就承認：「我不想成爲**我**，我想成爲**我們**。」㊽納恰耶夫鼓吹「倒楣者」的福音，說他們「沒有個人興趣，沒有事情糾葛，沒有情感，沒有歸屬，沒有財產，甚至沒有自己的名字」。㊾前線世代的反人道主義、反自由主義、反個人主義、反文化主義的本能，他們對暴力、權力、殘酷出色而又充滿機智的讚美，是由帝國主義菁英們拙劣而又傲慢地作出「科學」論證而開始的，他們認爲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鬥爭就是宇宙規律，擴張在其成爲政治手段之前就是一種心理需要，而人必須根據這種宇宙規律來行事。㊾前線世代的著作中特出的地方是他們的文學標準很高，並且帶有深刻的激情。戰後的作家們不再需要遺傳學的科學說明，他們很少引用高比諾或豪斯頓・斯圖亞特・張伯倫的著作集，因爲它們早已成爲市儈庸人家居的文化裝飾。他們不讀達爾文的著作，而是讀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的書。㊿如果說他們還相信宇宙規律的話，他們自然也並不特別關注要同它們一致。他們認爲，暴力、權力、殘酷都是人的最高能力，人在宇宙中無疑失去了地位，而又過分自傲地渴望有一種權力理論，借以將他們安全地帶回到世界，與之重新整合。他們滿足於盲目地參與體面的社會裡禁止的任何事物，而無視其理論或內容，他們推崇殘酷爲主要美德，因爲它同社會上虛僞的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對抗。

假如我們將這一代人同十九世紀的意識型態思想家相比，他們在理論上似乎有時會有許多共同之處，他們的主要區別是這一代人更實在、更富於激情。他們更深地受到苦難的觸動，更關心使人困惑的事物，比一切帶著良善和兄弟情誼的信徒更受到虛僞的嚴重傷害。而且他們無法再逃避到異域，也無力在陌生而興奮的人羣中再充當屠龍手。他們無法逃避由有教

養的談吐構成的虛假文化掩飾下日常生活中的悲哀、卑微、失敗和厭惡；神話般的風俗也不可能使他們免於對上述現象的綜合所產生的厭惡心情。

無法逃避到廣闊的世界，感覺到一次又一次地跌入社會的陷阱——這與構成帝國主義性格的條件十分不同——這些都使舊日對匿名的愛好轉變爲經常不斷的緊張和對暴力的渴望。由於在角色和性格方面不可能有劇烈的變化，例如與阿拉伯民族運動認同，或者與印度農村風俗認同，於是自願沉湎於超人類的毀滅力量，似乎可以擺脫那種自動地進入預定社會功能的命運，擺脫徹底平庸的狀態，同時有助於摧毀那種毀滅性力量本身。這些人受到極權主義運動宣佈的行動主義(activism)的吸引，同時又受到它們那種奇怪的表面矛盾——既堅持純粹行動的首要性、又堅持純粹必要的那種壓倒一切的力量——的吸引。這種感情混合，恰恰符合「前線世代」的戰爭經驗，符合在絕對命定的範圍內經常性活動的經驗。

再者，行動主義似乎對那個困擾人的舊問題作出了新的答案，「我是誰?」在危機時代，這個問題總是一再被提出。假如社會堅持說，「你就是你顯示的那個樣子，」戰後的行動主義就會回答：「你就是你的行爲的結果」——例如，第一次坐飛機飛越大西洋的人（正如布萊希特《林德堡的空中旅行》〔*Der Flug der Lindberghs*〕中描寫的）——這種回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再重複，但說法略有改變，沙特(Jean-Paul Sartre)說：「你就是你的生活。」（見《密室》〔*Huis Clos*〕）這些回答的恰當與否，不在於尋找自我時重下定義的有效性，而在於最終逃避它在社會認同，逃避社會所強加的可互換的角色和作用方面的有用性。關鍵在於要做出別人都想不到和未決定做的英雄業績或邪惡行徑。

極權主義運動公開宣稱的行動主義，它們在一切政治活動形式中選擇恐怖主義，這一點吸引了知識界菁英和暴民，正因爲這種恐怖主義(terrorism)與早先的革命團體的做法完全不同。它不再是一種精心考慮的政策，它認爲恐怖行動是消滅某些傑出人士的唯一手段，他們由於自己的政策或

觀點而成爲壓迫的象徵。恐怖主義的吸引人之處在於它變成了一種哲學，表達失落、厭惡、盲目仇恨，這是一種政治的表現，用炸彈來表現自我，興奮地看著公眾以行動來響應，絕對願意付出生命的代價，以成功地迫使正常的社會階層承認一個人的存在。這種精神和這種手法，就是戈培爾在納粹德國最終戰敗之前很久就明顯興奮地宣布過的，假如戰敗，也懂得如何關上門，幾百年不會被遺忘。

正是在這一點上，可以找到一條有效的標準，來辨別極權主義運動之前氛圍中的菁英與暴民。暴民所需要的也就是戈培爾很精確地說過的，走向歷史，哪怕付出的代價是毀滅。戈培爾真誠地相信，「一個當代人在今天能夠體驗的最大快樂」是成爲一個天才，或者爲天才服務，[57]這是暴民的典型思想，但不是羣眾或知識界同情者的思想。後者恰恰相反地認真地主張隱姓埋名，否認天才的存在；二十年代的全部藝術理論都拼命地想證明，優秀的作品是藝術手法、技巧、邏輯的產物，使物質的潛力得以實現。[57]「名譽的光芒四射力量」（斯蒂方·茨威格語）和晚期資產階級社會熱誠接受的天才崇拜只使暴民受到誘惑，而不能誘惑菁英。二十世紀的暴民忠實地追隨先前暴發戶的形式，他們發現了一種事實：資產階級社會寧可敞開大門，歡迎有趣的「異常現象」、天才、同性戀者、猶太人，而不願恪守簡單的道德。菁英們嘲笑天才，渴望匿名，仍然證明了一種精神，從羣眾或暴民的立場出發都不能理解這種精神，按照羅伯斯庇爾的說法，這種精神努力證明人是輝煌的，而偉大人物則是微不足道的。

儘管菁英和暴民之間有區別，但是無疑地，每當底層社會使體面社會因恐懼而接受其平等地位時，菁英會因之感到高興。菁英成員們根本不反對以文明的毀滅爲代價，滿懷興趣地看到那些過去被不公正地排除在社會之外的人擠進了這個社會。他們對於歷史編纂中大量作僞並不特別憤怒，反正一切極權主義政府都有份，並且也清楚地宣布自己參與了極權主義宣傳。他們相信，傳統的編史都有作僞現象，因爲其中排斥了人類對被剝奪權利

者和受壓迫者的記憶。被時代否定的人通常都被歷史遺忘，創傷加侮辱使一切敏感的良心感到不安，因爲「最後一個將會變成第一個」的信念早已消失了。過去和現在的一切非正義都令人無法容忍，關於正義的天平最終能擺正的希望也不復存在。馬克思想根據階級鬥爭來重寫世界歷史，這一嘗試甚至吸引了不相信他的論點正確性的人，因爲他的最初意圖是找到一種方法，使那些被官方歷史書排除在外的人爲後世所記得。

菁英和暴民之間的暫時聯盟大多依靠這種眞正的愉悅，前者看著後者摧毀體面的社會。與德國鋼鐵巨子們被迫同希特勒這位房屋油漆工和只有自己承認的無固定職業者交易，並且接納他進入社交界時，這個目的就達到了，這只有依靠在知識界生活的一切領域由極權主義運動粗暴而卑劣地作僞，它們糾集歐洲歷史上一切地下的、卑賤的成分，使之進入歷史畫面。從這一觀點來看，倒不如看到布爾什維克黨和納粹主義開始行動，清除它們自己在學術界和其他官方領域早已獲得承認的意識形態根源。激起歷史學家們重寫歷史的原因，不是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而是三百個家族的陰謀；不是高比諾和張伯倫的長篇科學論證，而是「錫安長老們的草案」；不是天主教會的淸晰影響和拉丁國家反教會派所產生的作用，而是關於耶穌會和共濟會的秘密文獻。最富於變化的歷史學理論結構的目標一向是，揭露出官方歷史是一場巨大的玩笑，而一些受到秘密影響的領域中的明顯的、可追溯的、眾所周知的歷史，實在只不過是一些外表，用來愚弄人。

知識界菁英憎惡官方歷史，相信歷史一向被僞造，成爲騙子的遊戲場所，還要加上反道德訴求，以防止巨大的謊言和巨大的作僞最終被確定爲無疑的事實，防止人們任意改寫他們自己的以往歷史，應該分淸眞史和僞史的區別，防止作僞成爲一種狡黠的力量、一種壓力和無限重複。產生魅力的不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的說謊技巧，而是一種事實，即他們能夠將羣眾組織成一個集體單位，大力支持他們那些謊言。當極權主義運動的整體發展現實支持他們，假裝從他們身上取得關於行動的必然靈感時，從學術觀

點簡單的歷史僞造似乎受到了歷史的認可。

極權主義運動對菁英產生了吸引力，只要他們還未取得權力，這種吸引力就會持續下去，此種吸引力令人捉摸不透，因爲極權主義明顯庸俗、隨心所欲及積極的教條，對於外人和旁觀者來說，比流行於前極權主義氣氛的一般情緒更明顯。這些理論根據普遍接受的知識、文化、道德標準而不斷變更，以致人們會認爲，只有知識分子的一種內在的基本性格缺點，即「知識分子的叛逆」(la trahison des clercs)（班達〔J.Benda〕語)，或者精神上墮落的自我仇恨，可以歸結於菁英接受了暴民的「思想」。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代言人們在痛苦的失望中、在對時代的一般經驗的陌生感中，通常忽視的是一種氛圍，其中一切傳統的價值與定則都化爲烏有（十九世紀以後，各種意識形態互相排斥，耗盡了它們的巨大魅力)，從某種意義上說，使它更容易接受明顯荒誕的定則，而不易接受變成虔誠的陳詞濫調所表達的舊日眞理，這恰恰是因爲無法期待任何人認眞地對待荒誕現象。粗俗而玩世不恭地拋棄體面的標準和已被接受的理論、坦率地承認最壞的標準，以及無視一切的態度，都很容易被誤認爲勇氣或是新的生活方式。在日益流行的暴民態度和信念中——這些實際上是資產階級淸除了虛僞之後的態度和信念——那些按傳統方式仇恨資產階級、自願離開體面社會的人，看到的只是缺少虛僞和體面，而不是內容本身。[59]

自從資產階級自稱是西方傳統的衛士，公開列舉一切美德來混淆全部道德問題——那些美德是他們在私人生活和商業生活中都沒有的，事實上也嘲笑它們——以來，似乎承認殘酷、拋棄人類價值和普遍貶低道德便是一種革命，因爲它至少摧毀了現存社會賴以存在的雙重性。在虛僞的雙重道德標準中採取極端態度，由於每一個人都明顯地輕率粗魯而又假裝文雅，因此就公開戴上一副殘酷的面具，在一個平庸而虛飾的社會中展現邪惡，這種翻轉價值的作法是多麼大的誘惑！二十年代知識界菁英很少了解暴民與資產階級早先的關聯，確信可以充分玩弄過去使資產階級驚愕的遊戲，只

要用諷刺誇張地描繪自己的行爲來震驚社會就可以了。

那時，誰也無法預見到，這種諷刺的眞正受害者是菁英，而不是資產階級。前衛者並不知道，他們一頭撞向的並不是牆，而是敞開的門，一致的成功反而違背他們成爲革命之少數派的主張，會證明他們表達的是一種新的羣眾精神，或者時代精神。在這一方面特別有意義的是布萊希特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的德國寫《三辨士歌劇》(*Dreigroschenoper*)時的情形。這齣戲劇將強盜描寫成體面的商人，將體面的商人描寫成強盜。當觀眾中的體面商人想到這是一種深刻觀察世界的方式，當暴民將它當作對強盜的一種藝術上認可來歡迎時，戲中的諷刺意義就失去了。戲中的主題歌曲〈先吃，再講道德〉(Erst Kommt das Fressen, dann Kommt die Moral)受到每一個觀眾發瘋似地鼓掌歡迎，儘管出於不同的原因。暴民鼓掌是因爲他們從字面上理解這句話；資產階級鼓掌是因爲它長期以來被自己的虛僞欺騙，漸漸地厭倦了那種緊張，而被這句話裡表現的深刻智慧觸動；菁英鼓掌是因爲揭去虛僞的面紗是一種最高的奇妙趣事。作品的效果正巧與布萊希特尋求的效果相反。資產階級不再爲此感到吃驚；它歡迎此劇揭示它的隱秘哲學，宣揚這種哲學，證明了它一向正確，以致布萊希特「革命」的唯一政治結果是，鼓勵每一個人拋棄不舒服的虛僞面罩，公開接受暴民的標準。

過了十年左右，法國的塞利納(Céline)的《大屠殺，小伎倆》得到了一種相同曖昧的反應，他在書中提出殺死所有的猶太人。安德烈·紀德在《法國新評論》(*Nouvelle Revue Français*)中公開興奮地表態，當然不是因爲他想殺死猶太人，而是因爲他欣賞直率地承認這種欲望的表達，對於塞利納的直言不諱和到處圍繞著猶太人問題的虛僞謙和之間的矛盾感到有趣。菁英中間對揭露虛僞的那種無法抵抗的欲望可以由事實來衡量，甚至連希特勒動手屠殺猶太人的事實情況也不會破壞這種興致，在塞利納寫那本書時，希特勒早已大規模地動手了。然而同仇恨猶太人相比，更爲相關的反

應是厭惡自由派的好猶表現(philosemitism)。相同的思路可用於解釋一個顯著的事實：希特勒和斯大林廣泛發表對藝術的看法，並且迫害現代藝術家，這些都不能摧毀極權主義運動對前衛藝術家的吸引力；這表明菁英們缺乏現實感，再加上反常的無私，兩者都很接近虛構的世界，在羣眾中間不求自我利益。他們的問題以一種基本一致的方式表現得很相同，並且預示了羣眾的問題和心理，這對於極權主義運動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機會，也可以說明知識界菁英與暴民之間為何能有暫時的結合。

與暴民的不虛偽和羣眾的不自私對菁英的吸引力密切相關的，還有一點，極權主義運動偽稱泯除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分離的現象，恢復人的神秘而非理性完整性，這同樣地產生了不可抗拒的魅力。自從巴爾扎克揭露了法國社會名流的私人生活，自從易卜生(Henrik Ibsen)將「社會中堅」戲劇化而征服了歐洲大陸戲劇界，雙重道德這一問題成了悲劇、喜劇、小說的主題之一。資產階級實行的雙重道德變成了那種「嚴肅精神」的顯著標誌，其實它總是浮誇而不眞實。私人生活和公共（社會的）生活之間的分野，與個人範圍和公共範圍之間的正當區分無關，但它卻是十九世紀資產階級和公民之間鬥爭的心理反映，是用私人利益的尺度來判斷和利用一切公共機構的人，和關心公共事物有責任心的公民之間的鬥爭，在心理上的反映。在這一方面，根據自由派的政治哲學，個人利益的總和就能產生公共利益的奇蹟，這種政治哲學似乎只是魯莽行為的理性化，據此，個人利益受到抑制，而無視其中是否有共同利益。

大陸政黨的階級精神一向承認自己代表某些利益，他們的自我概念產生的「機會主義」(opportunism)只是總體中的一部分，而極權主義運動與此相反，聲稱其「優越性」，因為帶有一種世界觀，可以將人作為一種整體來掌握。[60] 運動的暴民領袖們在這種總體性(totality)的宣稱中又一次形成，並且只是翻轉了資產階級的政治哲學。資產階級衝出了社會壓力，並且常常經受政治機構的經濟訛詐，總是相信公開的權力機構受到它們自己

秘密的非公共利益和影響的左右。在這一意義上，資產階級的政治哲學一向是「極權主義的」：它一向假設政治、經濟和社會的一致性，政治機構在其中就只是私人利益的表面建制。資產階級的雙重標準，它對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區分，是對民族國家的讓步，因爲民族國家總是不遺餘力地試圖使這兩種範圍分開。

對菁英產生魅力的就是這種激進態度。馬克思滿懷希望地預言，國家將會消亡，出現的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不會是激進的，也不會是基督教先知預言過的。伯德耶也夫指出：「俄國革命者們……一向是極權主義者。」如果他的話是正確的，那麼蘇俄對納粹和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同路人的吸引力幾乎同樣地產生於一個事實：在俄國，「革命是一種宗教、一種哲學，而不僅僅是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種衝突。」[61]事實上，階級轉化爲羣眾，以及政治機構的名聲和權威性的垮台，給西歐國家帶來了一些條件，這些條件同俄國的普遍情況很相似，因此，它們的革命者們也開始採取典型的俄國革命式的狂暴態度，他們不希望改變社會和政治條件，而是希望摧毀一切迄今存在的信條、價值觀念、制度，這就不是偶然的了。暴民只是利用這種新的心態，造成了革命者與罪犯的短暫結合，這在沙皇俄國的許多革命組織中出現過，但是在歐洲舞台上卻明顯地看不到。

暴民與菁英之間令人不安的結合，他們的思想奇特地吻合，這起源於一個事實：這兩個階層是民族國家的結構和階級社會的架構內首先要清除的。他們很容易地互相發現了對方，哪怕只是暫時的，因爲他們都感到自己代表了時代的命運，他們身後有無數羣眾追隨，遲早，歐洲各民族中的大多數人會站到他們一邊——根據他們的想法——隨時發動其革命。

結果它們都錯了。暴民，這個資產階級的底層社會，希望孤立無援的羣眾會幫助他們掌權，當他們提出自己的私人利益時也會支持他們，他們就能輕而易舉地取代資產階級舊的社會階層，注入更加富有雄心的底層社

會精神。但是，掌權的極權主義很快就懂得，雄心壯志不限於人民中的暴民階層，在任何情況下，這種自發動力都只會是對絕對統治的一種威脅。另一方面，毫無顧忌的作風也不只限於暴民，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在短時間裡學會。對於無情的統治和滅絕的機器而言，步調一致的「菲利斯丁」(philistines)羣眾提供了更好的材料，能供使它犯下比所謂職業罪犯更大的罪行，只要這些罪行組織得好，披上日常工作的外衣。

因此，那些爲數不多的針對納粹對猶太人和東歐各民族的大規模暴行的抗議，不是由軍人、也不是由與各國受人尊敬的「菲利斯丁」步調一致的羣眾提出，而偏偏是由暴民的典型代表希特勒的早年同伙提出，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62]當然也不會是希姆萊這位自 1936 年以後德國最有權勢的人，那批「武裝的波希米亞人」(海登語)之一，他的特徵卻很不幸地同知識界菁英很相像。希姆萊本人「比較正常」，也就是說，不像納粹運動最早的領導人，而像一名「菲利斯」。[62]他不是戈培爾那樣放蕩不羈，不像性罪犯斯特萊徹(Julius Streicher)，不像騙子羅森伯格，不像瘋子希特勒，不像冒險家戈林(Hermann Göring)。希姆萊有將羣眾組織到絕對控制的高度才能，認爲大多數人不是放蕩不羈者、瘋子、冒險家、性罪犯、騙子，也不是社會上的失敗者，而首先是安份守己工作的人、顧及家庭的良民。

「菲利斯丁」退回到私人生活，頭腦簡單地致力於家庭和職業，這是資產階級私人利益至上信念早已退化的最後產物。「菲利斯丁」是資產階級在自己的階級中孤立的產物，是資產階級本身敗落後產生的分化了的個人。希姆萊爲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犯罪而組織的羣眾，帶有「菲利斯丁」的特徵，而不是暴民的特徵，他們是資產階級，在自己的世界傾圮之中只擔憂個人安全，只要有一點兒挑釁，就會犧牲一切——信念、榮譽感、尊嚴。對於那些只考慮維護自己私人生活的人來說，最容易摧毀的莫過於他們的隱私和私人道德觀。在經過幾年掌權和系統地協調之後，納粹可以正確地宣布：「在德國，只有睡著的人仍然是一個有隱私的個人。」[62]

另一方面，公正地說來，菁英中的一些人時常使自己受極權主義運動誘惑，有時由於他們的知識能力而被指責爲極權主義的鼓吹者，應該指出，二十世紀這批絕望的人無論做什麼還是不做什麼，都不會影響極權主義，儘管他們在早期產生過一些作用，成功地迫使外界認眞地接受他們的理論。凡是在極權主義運動取得政權的地方，早在政權開始它們的最大犯罪之前，就已經拋棄了這一整羣同情者。智識的、精神的、藝術的創造力，對於極權主義來說，就像暴民的歹徒自發力一樣危險。兩者都比純粹的政治反對派更危險。新的羣眾領袖一貫會清除每一種更高形式的知識分子活動，遠遠超過了他們對自己無法理解的一切事物的天然厭惡。絕對的統治並不容許任何一個生活領域中的自由創造力，不容許任何一種無法完全預見的活動。執政的極權主義無一例外地排斥一切第一流的天才，無論他們是否同情極權主義，使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騙子和傻瓜，因爲他們缺少智慧和創造力，這正是他們的忠誠的最好保障。[65]

註釋

[1] 希特勒對他的聽眾施加的「魔咒」多次奏效（參見《希特勒的餐桌談話》〔*Hitlers Tischgespräche*〕，波恩，1951；美國版：紐約，1953），這種魅力（fascination）——「希特勒從一種迷人的舉止放射出奇特的磁力」——事實上基於「這個人對自己的瘋狂信念」（見葛哈德·里特爾〔Gerhard Ritter〕的導言，14 頁），基於他對太陽底下一切事物所作的各種僞權威性的判斷，同時也基於一個事實：他的觀點——無論說到吸煙的有害結果，還是說到拿破侖的政策——總是切合一種無所不包的意識形態。

魅力是一種社會現象，而希特勒對環境所施加的影響必須根據他保持的一支特殊隊伍來理解。社會總是傾向於接受一個現成的人，接受他僞裝的樣子，因此僞裝成天才的瘋子總有機會受到信任。現代社會的特點是缺乏冷靜的

判斷，這種傾向越來越強烈，所以一個人只要堅持自己的觀點，又以一種毫不動搖的調子來宣傳他的信念，就不會輕易失去聲譽，無論他出過多少明顯的錯誤。希特勒從親身經驗中懂得現代社會裡觀點的混亂，他發現各種觀點之間無可救藥地難以擺平，「關於一切事物都是夢囈……的信念」(281 頁)可以有效地避免，方法是只要堅持許多流行觀點中的**一種**，「不屈不撓地堅持」。這樣一種瘋狂舉動中令人毛骨悚然的任意性對社會卻有極大的魅力，因爲對於一個社會的漫長凝聚過程來說，它可以避免社會經常產生的觀點混亂，但是，這種魅力的「天賦」(gift)只同社會有關；它在希特勒的「餐桌談話」中很突出，因爲希特勒在其中玩弄社交遊戲，他不是對自己那類人說話，而是對帝國衛隊(Wehrmacht)的將軍們說話，這些人多少都是屬於「社會」的。但若以爲希特勒成功的基礎是他的「魅力」，那就大錯特錯了，如果他光有魅力，就永遠超不出沙龍裡那些著名人物的角色範圍。

❷參見海耶斯在〈西方文明歷史中極權主義的創新〉(The Novelty of Totalitarianism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中富於啓發性的論述。(載《極權主義國家研究論文集》〔*Symposium on the Totalitarian State*〕，1939，美國哲學學會會刊，第 132 卷，費城，1940 年出刊)

❷這的確是「歷史上第一次在奪取政權時運用現存的法律正式條文進行的大革命」。(漢斯・弗蘭克〔Han Frank〕，《法律與行政》〔*Recht und Verwaltung*〕，1939，8 頁)

❹寫得最好的一本希特勒評傳是艾倫・布勞克(Alan Bullock)的《希特勒：暴政的研究》(*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倫敦，1952)。在英語傳統的政治傳記中，過分注重使用一切已有的資料，全面而詳盡地描述時代的政治背景。這一類出版物中，康拉德・海登的幾本——尤其是《希特勒之執政》(*Der Führer: Hitler's Rise to Power*)(波士頓，1944)——細節太多，儘管它們在一般地解釋事件時也很重要。關於斯大林的生平，鮑里斯・蘇伐萊恩的《斯大林：布爾什維克主義批判研究》(*Stalin: A Critical Survey of Bolshevism*)(紐約，1939)至今仍是範本。艾薩克・多伊切的《斯大林政治傳記》(*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紐約, 倫敦, 1949)在文件資料豐富和對布爾什維克黨內部鬥爭的深刻分析方面的確顯示了重要性；它的缺點是將斯大林比擬爲克倫威爾、拿破侖及羅伯斯庇爾。

❺弗朗茲・波克諾(Franz Borkenau),《極權主義敵人》(*The Totalitarian Enemy*)(倫敦, 1940), 231頁。

❻引自德文版《錫安長老們的草案》(1924), 29頁。

❼這無疑是俄國式極權主義的特例。有意思的是, 在蘇聯起初審判外國工程師時, 同情共產主義的人都已被利用來作爲自我指責的根據:「當局始終堅持要我承認做過破壞活動, 但我並沒做過。我拒絕了。他們對我說:『如果你擁護蘇維埃政府, 正如你說過的那樣, 那麼用你的行動來證明吧; 政府需要你坦白。』」(安東・西利加,《俄國之謎》, 倫敦, 1940, 153頁。)托洛茨基從理論上爲這種行爲作了論證:「我們只有和黨在一起, 在黨的支持下才能變得正確, 因爲歷史並未提供其他通向正確的方法。英國人有句話說,『我的國家, 無論是對是錯』。我們可以用許多更好的歷史事實證明, 無論黨在某些個別的具體問題上是對還是錯, 它是我的黨。」(蘇伐萊恩, 前引書, 361頁)還有, 紅軍軍官中的非極權主義分子都必定秘密遭到審判。

❺納粹作家安德里亞斯・普芬寧(Andreas Pfenning)明確地否定關於衝鋒隊(SA)爲「理想」而戰鬥或被一種「理想主義的經驗」支配的說法。他說他們的「基本經驗在鬥爭過程中形成。」(〈社羣與國家學說〉〔Gemeinschaf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載《總體國家學說研究期刊》〔*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第96期)翻譯引自恩斯特・弗蘭克(Ernst Fraenkel),《雙重國家》(*The Dual State*)(紐約, 倫敦, 1941), 192頁。從黨衛隊主要的思想灌輸中心散發的大量小冊子中可以看到,「理想主義」一詞被謹慎地避免了。黨衛軍成員們並不要求理想主義, 而是要求「在一切意識形態問題上保持邏輯上的完全一致, 無情地追求政治鬥爭。」(維納・貝斯特,《德國警察》, 1941, 99頁)

❻在這一方面, 戰後德國提供了許多很有啓發性的例子。令人驚愕的是美國黑人軍隊一點也不受到敵視, 儘管納粹實行過大規模灌輸種族思想。但是同樣令人

吃驚的是，「在德國抵抗盟軍的最後日子裡，黨衛軍並沒有戰鬥到『最後一個人』，」而這種特殊的納粹戰鬥單位「在開始幾年中作出重大犧牲以後，損失比國防軍更慘重，但是在最後幾個星期中表現得像任何一個從民眾中徵兵的戰鬥單位一樣，對毫無希望的情勢認命了。」（卡爾·帕特爾〔Karl O. Paetel〕，〈黨衛軍〉（Die SS），載《當代史季刊》〔*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hichte*〕，1954 年 1 月號）

⑩莫斯科控制下的東歐各國政府其實是共產國際的代理人；它們不是本地極權主義發展的產物，而是莫斯科指揮下傳播的極權主義運動。唯一的例外是南斯拉夫的狄托，也許他同莫斯科的決裂是因爲認識到俄國倡導的極權主義方式會使他付出代價，損失很大一部分南斯拉夫人口。

⑩法西斯主義專政之非極權主義性質的證明是，政治犯人數少得令人驚奇，判刑也相對比較輕。在法西斯主義特別活躍的 1926 年至 1932 年，對政治犯特別審判的結果是：死刑七人，十年以上刑期者二百五十七人，刑期十年以下者一千三百六十人，被放逐者更多一些；逮捕了一萬二千多人，但判決無罪，這在納粹或布爾什維克的恐怖情形下是難以想像的。（參見科恩—布拉姆斯坦特〔E. Kohn-Bramstedt〕，《專政與政治警察：用恐懼實施控制的技巧》〔*Dictatorship and Political Police: The Technique of Control by Fear*〕，倫敦，1945，51 頁）

⑩納粹政治理論家們一向強調指出，「墨索里尼的『種族國家』和希特勒的『意識形態國家』（ideological state; Weltanschauungsstaat）不可同日而語」。（戈特弗利德·尼斯〔Gottfried Neesse〕，〈一黨制的憲法規定組織形式〉〔Die verfassungsrechtliche Gestaltung der Ein-Partei〕，載《總體國家學說研究期刊》，1938，第 98 號）

戈培爾在論及法西斯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之間的區別時說：「(法西斯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根本不同。國家社會主義是深刻的根，而法西斯主義只是一種表面事物。（路易斯·洛奇納〔Louis Lochner〕主編《1942—1943 年戈培爾日記》〔*The Goebbels Diaries 1942－1943*〕，紐約，1948，71 頁）(意大利的領袖)不是一名像斯大林那樣的革命者。只是爲了他自己的意大利民族，因此他缺乏世

界範圍的革命者和起義者應具備的全面優點。」（同上，468 頁）

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於 1943 年在軍官大會上演講時也表達了與此相同的觀點：「法西斯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是根本不同的兩回事，……作爲精神上的、意識形態的運動，這兩者是絕對無法相比的。」（見科恩-布拉姆斯坦特，前引書，附錄一）

希特勒早在二十年代初就認爲納粹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之間的密切關係：「在我們的運動中，兩個極端會合在一起：左派的共產主義者和右派的軍官與學生。這兩者向來是最活躍的成員。……共產主義者是社會主義的理想主義者。」（見海登，前引書，147 頁）衝鋒隊首領羅姆(Ernst Röhm)在二十年代末的著作中只重複了一種流行的觀點：「我們與共產主義者之間有許多事情發生，但是我們尊重他們信念眞誠，他們願意爲自己的事業獻身，這使我們同他們聯合。」（恩斯特·羅姆，《一個反叛者的故事》〔*Die Geschichte eines Hochverräters*〕，1933，273 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隨時都承認俄國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像他們的伙伴。希特勒於 1943 年在一次德法兩國領導人會議上說：「首先的事實是，在這場戰爭中，資產階級國家與革命者的國家對峙。我們輕而易舉地擊敗資產階級國家，因爲它們的教養與態度對我們而言完全是地獄。一些帶有某種意識形態的國家醉心於建立資產階級政治制度。……（在東方）我們遇到了一個對手，它也提倡一種意識形態，哪怕是錯誤的一種。……」（《戈培爾日記》，355 頁）這種估計基於意識形態而不是軍事。戈特弗利德·尼斯的《政黨與國家》(*Partei und Staat*)(1936)論述了運動的奪權鬥爭：「我們的統一陣線將**體系**從日耳曼民族人民黨（極右派）擴展到社會民主黨。共產黨是**體系**外的敵人。因此在 1933 年最初幾個月，**體系**的滅亡已見端倪，但是我們仍然必須同共產黨作一次決戰。」（16 頁）

⑬《希特勒的餐桌談話》，113 頁。書中有很多例子可以證明，與戰後的許多傳說相反，希特勒從來不想保衛「西方」，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但總是隨時準備與「紅色分子」一起摧毀西方，即使在對蘇俄作戰時亦是如此。（尤見 95、108、

113、158 及 385 頁)

⑭我們現在知道，斯大林反覆得到警告，希特勒進攻蘇聯迫在眉睫。甚至當駐柏林的蘇聯武官通知他納粹進攻的日期，斯大林仍不相信希特勒會撕毀條約。(見赫魯曉夫〈關於斯大林的報告〉〔Speech on Stalin〕，文本由美國國務院公布，刊載紐約《時代周刊》，1956 年 6 月 5 日)

⑮蘇伐萊恩(前引書，669 頁)的描述很能說明這種情況:「根據克利維茨基(Walter Krivitsky)從格別烏獲得的可靠情報資料，『1937 年統計的居民人數是一億七千一百萬，結果只發現一億四千五百萬；因此，蘇聯有將近三千萬人失蹤。』」應當記住，這一情況發生在三十年代初消滅富農時失去大約八百萬人生命之後。(見美國政府《共產主義行動》〔*Communism in Action*〕一文，華盛頓，1946，140 頁)

⑯根據原始資料，這些計劃中的大部分可見諸於列昂·波利雅可夫(Léon Poliakov)的《仇恨的豐收》(*Bréviaire de la Haine*)(1951)(美國版標題爲 *Harvest of Hate*, 1954)，第八章。但是它們只提到滅絕各個非日耳曼民族，首先是斯拉夫血統的民族。納粹的毀滅機器就算在德國人面前也不會停止運作，這在希特勒親筆起草的帝國健康法案中非常明顯。希特勒在這項法案中提議將凡有心臟病或肺病患者的家庭同居民中的其他家庭「隔離」開來，他的計劃中下一步無疑是從肉體上消滅。預期中戰後勝利的德國的這樣一些有意思的項目可見諸於海斯—拿騷(Hesse-Nassau)地區領導人中傳閱的一封發自希特勒總部的信，談及應該執行的「勝利結束戰爭之前和之後的一些措施」。(參見《納粹陰謀與侵略》文件集，華盛頓，1946，第 7 卷，175 頁)同一文件中還有關於「全面疏離的立法」的執行計劃，動用警察「制度的權威」(institutional authority)——將受到任何指控的無辜者押運到集中營——使之合法化和擴大化。(參見黨衛軍領導人保羅·維納〔Paul Werner〕，《德意志青年的權利》〔Deutsches Jugendrecht〕，第 4 卷，1944)。

與這種「消極人口政策」相關的還有布爾什維克黨內大整肅，其目的也是決定性的滅絕，重要的是記住「在這個選擇過程中，絕不會有一次停止」。(希

姆萊〈防禦階段〉〔Die Schutzstaffel〕，載《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基礎、結構與經濟制度》〔*Grundlagen, Aufbau und Wirtschaftsordnung des national Sozialistischen Staates*〕，第76期）「領袖的奮鬥和他的政黨至今仍是一種尚未達到目標的選擇。……這種選擇和這種奮鬥在1933年1月30日公開實現了。……領袖和他的老近衛兵們知道，眞正的奮鬥還剛剛開始。」（羅伯特·萊依〔Robert Ley〕，《奧登斯堡之路》〔Der Weg zur Ordensburg〕，德意志工作戰線出版社，內部發行。）

⓱波克諾準確地描述了這種情況：「共產主義者們試圖在工人階級羣眾中間造成影響，但是很少成功；因此，假如說他們有羣眾基礎的話，也離無產階級越來越遠。」（〈論新共產國際〉〔Die neue Komintern〕，載《月刊》，柏林，1949年，第4期）

⓱威廉·埃伯斯坦（William Ebenstein），《納粹國家》（*The Nazi State*）（紐約，1943），147頁。

⓱高爾基（Maxim Gorky）語。（參見蘇伐萊恩，前引書，290頁）

⓴海因里希·希姆萊的演講〈黨衛軍與警察的組織與職責〉（Organization and Obligation of the SS and the Police）發表於《1937年1月15－23日德國國防軍民族政治教程》（*National-politischer Lehrgang der Wehrmacht vom* 15-23. *Januar*, 1937），第15至23卷，1937年1月。譯文引自《納粹陰謀與侵略》，第4卷，616頁。

⓱居斯塔夫·勒本（Gustave Lebon），《羣眾心理》（*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1895）論及羣眾的那種奇特的自私性格。見第2章第5節。

⓴納粹黨創始人們在希特勒執政之前，有時稱之爲「左派政黨」。1932年議會選舉之後發生的一件事很有意思：「格雷戈爾·斯特拉塞（Gregor Strasser）痛苦地向領袖指出，在大選前，帝國的國家社會黨人可以同中間派一起構成多數派；現在已無這種可能性，兩派在議會裡少於半數。……希特勒回答說，但是我們和共產黨人在一起仍然構成多數派，誰也無法反對我們而能統治。」（海登，前引書，94及495頁）

㉓可比較海耶斯前引書，他並不區別暴民與羣眾，他認爲極權主義獨裁者「來自

羣眾，而不是來自階級。」

㉔這是海登的中心觀點，他對納粹運動的分析至今仍顯得很出色。「從僵死階級的沒落中誕生了新的知識分子階級，而站在前列的是最無情的人，他們最不怕失去什麼，所以他們最堅強：武裝的流浪漢們視戰爭如家，視內戰爲家鄉。」（前引書，100 頁）

㉕帝國衛隊將軍施萊徹(Kurt von Schleicher)和 SA（衝鋒隊）首領羅姆之間的陰謀中包括一項計劃，將一切準軍事組織全部劃歸國防軍軍事當局管轄，這樣就使德國軍隊一下子增加了幾百萬人數。當然，這會不可避免地導致軍事獨裁。1934 年 6 月，希特勒整肅了羅姆和施萊徹。事情一開始就完全清楚，希特勒利用羅姆同帝國衛隊的關係來欺騙德國軍方，掩蓋他的眞正意圖。1932 年 4 月羅姆在希特勒的一次訴訟中證實 SA 的軍事地位完全受到帝國衛隊的默契同情。（關於羅姆—施萊徹計劃的文件證明，可見《納粹的陰謀》，第 5 卷，456 頁，海登，前引書，450 頁）羅姆自豪地敍述過他同施萊徹的會談，根據他的說法，會談開始於 1931 年。施萊徹答應在緊急情況下將 SA 置於帝國衛隊軍官指揮之下。（見《羅姆回憶錄》〔*Pie Memoiren des Stabschefs Röhm*〕，薩伯呂肯，1934，170 頁）SA 的軍事性質在羅姆的組織下和希特勒的經常指揮下，繼續決定著它的活動，即使在羅姆派被清除之後。和黨衛軍不同，SA 成員總是認爲自己是「德國軍事意志的代表」，第三帝國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由「兩大支柱支持的軍事團體：政黨和武裝部隊」。（見《衝鋒隊手冊》〔*Handbuch der SA*〕，柏林，1939；維克特·盧澤〔Victor Lutze〕的〈衝鋒隊〉〔Die Sturmabteilungen〕，載《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基礎、結構和經濟制度》）

㉖這類文獻中尤以羅姆的自傳爲眞正的經典。

㉗眾所周知，反斯大林的幾個分裂集團對蘇聯情勢的發展的批評基於馬克思的這一思想，但是實際上從未奏效。對蘇聯官僚階層的反覆「整肅」，等於是將官僚當作一個階級來清除，是將官僚階級看成蘇聯的統治階級。拉科夫斯基(Christian Rakovsky)於 1930 年在流放西伯利亞時寫道：「在我們眼前已經形成並且繼續在形成一個龐大的獨裁者階級，它內部有各種部分，而且通過精

心收編和直接或間接提名增加了人數。……使這個新生階級團結起來的因素是一種同樣屬於新生的形式，即私有財產，說得明確些，就是國家權力。」（引自蘇伐萊恩，前引著作，564 頁）對於斯大林時代之前的時代發展，這一分析的確十分精確。關於政黨和蘇維埃之間關係的發展狀況，這一點十月革命的進程具有關鍵性的重要意義，（可參見多伊切，《武裝的先知：1879 至 1921 年的托洛茨基》〔*The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1954）。

㉘在 1927 年，百分之九十的村蘇維埃代表和百分之七十五的村蘇維埃主席不是黨員；縣級執行委員會中百分之五十是黨員，百分之五十非黨員，而在中央委員會裡，百分之七十五的代表是黨員。（參見莫里斯·多勃〔Maurice Dobb〕在《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中〈布爾什維克主義〉〔Bolshevism〕條目。）

蘇維埃中的黨員如何用「根據他們接到的黨內終身官員的指示來一致投票」的方法從內部摧毀蘇維埃制度，具體情形可參見羅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歷史》（*A History of Bolshevism*），倫敦，1934，第 6 章。

㉙這些數字引自維克多·克拉夫欽柯（Victor Kravchenko）的《我選擇自由：一個蘇聯官員的個人生活和政治生活》（*I Chose Freedom: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Life of a Soviet Official*）（紐約，1946，278 及 303 頁）。這一資料來源當然很值得懷疑。但是由於蘇聯的情況，我們除了可疑的資料之外別無選擇——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完全依靠新聞故事、報導和各種評論——我們所能做的只能是利用到手的任何資料，只要它們至少似乎有高度的可能性。有些歷史學家似乎認為可以完全利用俄國政府提供的一切資料，這樣更可靠。其實不然，官方資料只不過是一種宣傳材料。

㉚斯大林在第十六次黨代會上譴責這些派別是「反映」了黨中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反對。（見《列寧主義》〔*Leninism*〕，1933，第 2 卷，第 3 章）針對這種攻擊，反對派奇怪地不作防衛，因為他們（尤其是托洛茨基）也「一向焦慮地發現集團鬥爭背後的階級鬥爭」。（蘇伐萊恩，前引書，440 頁）。

㉛克拉夫欽科，前引書，187 頁。

㉜蘇伐萊恩，前引書，575頁。

㉜希姆萊親自爲黨衛軍擬定的口號以這句話開始：「沒有一項任務是爲了它自身而存在的。」（參見京特·達爾昆〔Gunter d'Alquen〕〈論黨衛軍〉，載《高等院校政治學全集》〔*Schriften der Hochschule für Politik*〕，1939）黨衛軍散發供內部閱讀的小冊子一再強調「絕對有必要理解，一切以自身爲目的的事物都是無用的。」（見「只供警察內部使用」的《帝國領導者黨衛軍與德國警察首腦》〔*Der Reichsführer SS und Chef der deutschen Polizei*〕，無出版日期。）㉞實踐本身就是豐富的文件資料。克利維茨基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Stalin's Secret Service*）（紐約，1939）裡將此事追蹤到斯大林。

㉜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說，與其容許討論綱領，不如採用舊綱領。不久後他公開宣稱：「一旦我們接管政府，綱領會自然產生。……首要的事情應該是掀起一個宣傳浪潮。這是一種政治行動，與屆時的其他各種問題無關。」（海登，前引書，203頁。）

㉜蘇伐萊恩錯誤地提出，列寧早已否定了政黨綱領的作用：「除了列寧所想的以外，布爾什維克黨的理論明顯地根本不存在；每一個布爾什維克都在他這一派的『路線』上徬徨……因爲這些人的聚合不是憑思想，而是憑性情、憑列寧的權勢。」（前引書，85頁）

㉜戈特弗利德·費德爾(Gottfried Feder)的「納粹黨綱領」著名的二十五點計劃在關於運動的文獻中比在運動本身中作用更大。

㉜希姆萊親自擬定的口號之動力是很難用言語來表述的。德國諺語中有類似說法：「忠誠是我的光榮」(Meine Ehre heiβt Treue)意指一種絕對的獻身和服從，它超過了純粹原則和個人忠誠的含義。《納粹的陰謀》是德文文獻資料和納粹文獻的翻譯，是不可或缺的資料來源，但是不幸地，不夠平衡，說黨衛軍的口號是：「我的榮譽意味著忠實。(My honor signifies faithfulnese)」（第5卷，346頁）

㉞墨索里尼或許是第一個有意識地拒絕正式綱領的政黨領導人，他用鼓舞人心的領導和行動來取代它。這種行動背後的觀念是現實契機本身即靈感的主要

因素，黨綱只會阻撓它。意大利法西斯主義表現爲異教徒的「實際主義」(actualism)，而不是索黑所說的「神話」(myth)。亦可參照《社會科學百科全書》中的〈法西斯主義〉(Fascism)條目。當運動已存在兩年，並且大多體現了民族主義哲學時，它的黨綱於 1921 年才系統地形成文字。

㊵恩斯特·貝耶(Ernst Bayer)，《衝鋒隊》(*Die SA*)(柏林，1938)。譯文引自《納粹的陰謀》，第 4 卷，783 頁。

㊶在柏拉圖的《政治家》(*Statesman*)中，首次將行動(acting)解釋爲下令開始一種行動和執行這種命令(archein 與 pratlein)。

㊷《希特勒的餐桌談話》，198 頁。

㊸《我的奮鬥》，第 1 卷，第 11 章。亦見迪特·施瓦茲(Dieter Schwarz)，《評國家社會主義的世界觀》(*Angriffe auf die national sozialistische Weltanschauung*)(1936)，作者對明顯的批評作了回答，認爲國家社會主義者在崛起掌權後繼續談論「一種鬥爭」:「國家社會主義作爲一種意識形態(世界觀)，絕不會放棄鬥爭，直至……德國每一個個人的生活方式由其基本價値確定，並且每天獲得新的價値。」

㊹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描述了他在當時的反應。

㊺參見漢娜·哈夫克斯伯林克(Hanna Hafkesbrink)所編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內部編年史〉收於《鮮爲人知的德國》(*Unknown Germany*)(紐黑文，1948，43、45 及 81 頁)。這本原始資料集反映歷史氛圍，其巨大價値使對法國、英國、意大利類似的研究的缺乏更突顯。

㊻同上，20-21 頁。

㊼這一點起始於一種完全背離正常生活的感覺。例如，魯道夫·班丁(Rudolf Binding)寫道:「我們越來越被當作死者和外人——因爲一切已發生的事情的偉大意義將我們疏離了——我們不在被拋棄而又有可能回歸的人之列。」(同上，160 頁)希姆敍述過他最終如何決定改組黨衛軍的「選擇形式」，從中仍然可見到對戰場上的一代菁英的主張的奇怪回憶:「……最嚴酷的選擇過程是由戰爭這場生死鬥爭引起的。在這一過程中，成就顯示了血的價値。……但是，

戰爭是一種特殊環境，必須找到一種方式，以便在和平時代作出選擇。」（見前引書）

[48]見恩斯特・榮格的《鋼鐵風暴》（*The Storm of Steel*），倫敦，1929。

[49]哈夫克斯伯林克，前引書，156 頁。

[50]海登在前引著作中指出，希特勒在運動初期一直不斷地受到災難打擊，他害怕德國有可能恢復原樣。「他有好幾次（在魯爾暴動〔Ruhrputsch〕期間）以不同的說法向衝鋒隊宣布，德國正在走向失敗。『我們的任務是保證運動的勝利』。」（167 頁）——在當時，勝利取決於在瓦解魯爾中的戰鬥。

[51]哈夫克斯伯林克，前引書，156—157 頁。

[52]魯道夫・班丁說過，這種感情在戰時就已很普遍：「（這場戰爭）不能同一場戰役相比。在戰爭中，一名領袖的意志和另一名領袖的意志衝突。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雙方都躺在地上，只有戰爭在發揮它的意志。」（《鮮爲人知的德國》，67 頁）

[53]巴枯寧 1870 年 2 月 7 日的信。見麥克斯・諾瑪德（Max Nomad），《革命使徒》（*Apostles of Revolution*）（波士頓，1939），180 頁。

[54]〈革命問答〉（Catechism of the Revolution），此文是巴枯寧或他的追隨者納恰耶夫所著。關於作者與全文翻譯者是誰，這一問題可參閱諾瑪德，前引書，227 頁。在任何情況下，「革命者對其他人的態度中完全無視正派和公平的簡單原則的制度……在俄國革命的歷史上都衰落了。」（同上，224 頁）

[55]傑出的帝國主義政治理論家恩斯特・賽利葉（Ernest Seillière）著有《神秘性與統治術：帝國主義批評論文集》（*Mysticisme et Domination: Essais de Critique Impérialiste*）（1913）。亦見卡吉爾・斯帕利茨瑪（Cargill Sprietsma）《我們帝國主義者：評恩斯特・賽利葉的帝國主義理論》（*We Imperialists: Notes on Ernest Seillière's Philosophy of Imperialism*），紐約，1913；莫諾德（G. Monod）在 1912 年 1 月號《歷史評論》（*La Revue Historique*）上的文章；以及路易斯・埃斯特弗（Louis Estève）的《一個新的帝國主義心理學：論賽利葉》（*Une nouvelle Psychologie de l'Impérialisme: Ernest Seillière*）。

⑯自從 1930 年以後，薩德侯爵在法國成了最受喜愛的前衛文學家之一。讓・保蘭(John Paulhan)在薩德的《貞潔的厄運》(*Les Infortunes de la Verta*)新版（巴黎，1946）前言中說：「當我看到眾多作家如今有意識地想否定技巧和文學手段，以強調不可表達性……，急於替聲名狼藉的事物尋找崇高性質，替破壞性質尋找偉大意義……，我自問……如果現代文學在那些顯得最有活力的部分——或者說最積極的部分——中還未完全轉向過去，是否恰恰由薩德決定了這一點。」亦見格奧爾格・巴達葉(Georges Bataille)，〈薩德的秘密〉(Le Secret de Sade)，載《批評》(*La Critique*)，第 3 卷，第 15—16 期和第 17 期，1947 年。

⑯戈培爾，前引書，139 頁。

⑯在這一方面，包豪斯派(Bauhaus)的藝術理論尤爲典型。亦見布萊希特論戲劇的著作，收於其《全集》，倫敦，1938。

⑯羅姆的話不僅代表了菁英的感受，而且也代表了幾乎整個年輕一代的感受：「虛僞和勢利(Pharisaism)統治了一切。它們是今日社會最顯著的特點。……所謂的社會道德最具有謊言性質。」這些青年「在資產階級雙重道德的市儈世界裡找不到自己的路，再也無法辨認眞理與謬誤。」(《一個反叛者的故事》，267 及 269 頁）這些圈子裡的同性戀至少部分地表達了他們對社會的抗議。

⑯在納粹運動的形成過程中，希特勒本人就多次強調過世界觀的作用。值得指出的是，他在《我的奮鬥》中，假裝理解一個政黨必然要以一種世界觀爲基礎，而且是透過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優越性來建立。參見第 2 卷，第 1 章，〈世界觀與政黨〉(Weltanschauung and Party)。

⑯伯德耶也夫，《俄國共產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 of Russian Communism*)(1937)，124—125 頁。

⑯例如，明斯克的總司令、納粹黨的最早黨員之一威廉・庫貝(Welhelm Kube)就很奇怪地介入了這件事，他於 1941 年，即大規模屠殺開始時，就寫信給他的領袖說：「我當然毫不手軟，願意配合解決猶太人問題，但是在我們自己的文化中長大的人畢竟不同於當地的那羣畜牲。我們是否要派立陶宛人和拉脫

維亞人去屠殺他們? 立陶宛人和列特人與當地居民不同。但是我不能這樣做。我請求你給我明確的指示，讓我以最人道的方式來管這件事，這也是爲了帝國和我們黨的榮譽。」此信發表於麥克斯•威恩賴希(Max Weinreich)的《希特勒的教授們》(*Hitler's Professors*)(紐約, 1946, 153－154 頁)。庫貝的干涉很快就被駁回了，但是帝國駐丹麥全權大使、著名的納粹黨員貝斯特幾乎相同的嘗試——拯救丹麥猶太人生命——卻比較成功。(參見《納粹的陰謀》, 第 5 卷, 2 頁)

同樣地，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鼓吹斯拉夫民族劣等論，很明顯，他不明白他的理論有朝一日會導致消滅斯拉夫民族。他被指派統治烏克蘭，寫了大膽的報告，在先前嘗試直接干預希特勒本人計劃之後，於 1942 年秋天如實描述了烏克蘭的情況。(同上, 第 3 卷, 第 4 卷)

當然也有一些與上不同的情況。馮•喬提茲(von Choltitz)將軍曾使巴黎免遭毀滅，但是他仍然「害怕由於未執行他的命令而被解除指揮權」，即使他知道「戰爭失敗已經好幾年了」。倘若不是一位持舊日立場的納粹黨人、駐巴黎大使奧托•阿貝茲(Otto Abetz)的有力支持，他可能不會有勇氣抵制「將巴黎變爲一片廢墟」的命令。在巴黎審判阿貝茲期間，喬提茲的證詞說，當時他的態度很猶豫。(參見紐約《時代週刊》, 1949 年 7 月 21 日)

㊸英國人斯蒂文•羅伯茨(Stephen H. Roberts)在《希特勒建立的大廈》(*The House that Hitler Built*)(倫敦, 1939)中描述希姆萊是「一個優雅有禮之人，對生活中簡單事物仍有興趣。他沒有那種納粹分子自扮神明的樣子。……這位德國的警察獨裁者與他的身分不甚相符，我相信在德國遇見的人中間，誰也比不上他正常。」這一點使人回憶起斯大林母親的話，根據布爾什維克的宣傳，他母親說他是「一個好兒子，我希望每一個人都像他。」(蘇伐萊恩, 前引書, 656 頁。)

㊹此言係羅伯特•萊依所說。

㊺在這一方面，布爾什維克的政策令人驚異地始終一致，這是人所共知的，無庸贅言。最著名的例子是畢卡索，即使他加入了共產黨，俄國還是不喜歡他。1936

年，安德烈·紀德在見到布爾什維克的實踐之後突然改變態度（《蘇聯遊記》〔*Retour de l'USSR*〕），這無疑使斯大林相信，從事藝術創作的人即使是同路人，也是無用的。納粹的政策唯有一點與布爾什維克的措施不同，它並不殺死自己的第一流天才。

値得仔細研究的是那批人數相對較少的德國學者的生涯，他們不僅是合作者和志願服務者，而是篤信的納粹分子。（威恩賴希的前引著作是僅有的研究專著，但是有錯誤，因爲他並未區別信仰納粹的教授和只爲政府服務的教授，忽略了有關學者的早年事業，因此不分青紅皀白，將具有偉大成就的著名人物一律歸入騙子一類。）最有趣的例子是法官卡爾·施密特，他關於民主的終結和法治政府的獨創性理論仍然很令讀者佩服；在三十年代中期，他被解職，由納粹自己的政治學家和法學家，例如漢斯·弗蘭克（後來成爲波蘭統治者）、戈特弗利德·尼斯、雷恩哈德·霍恩(Reinhard Hoehn)等人取而代之。最後一個倒楣的是沃爾特·弗蘭克，他曾是公認的反猶主義者，在納粹上台之前是其黨員，在 1933 年，他成爲新成立的「新德意志帝國歷史研究院」(Reichsinstitut für Geschicht des Neuen Deutschlands)院長，以猶太人問題研究著稱，主編過九卷本《猶太問題研究》(*Forschungen zur Judenfrage*)(1937－1944)。在四十年代初，他的地位和影響被迫讓給了臭名昭著的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此人的《二十世紀神話》(*Der Mytho des 20. Jahrhunderts*)毫無「學術」靈感。弗蘭克失寵的原因只是他並非騙子。

以這種熱情來「擁抱」國家社會主義的菁英和暴民都不懂，「人們不能偶然地歡迎這種『秩序』。在自願服務之上，是一種堅定的必然選擇，既不低估形勢，也不優柔寡斷。」（《黨衛軍之路》，4 頁）換言之，納粹在選擇誰能屬於他們時，傾向於根據各人自己的決定，而不是看「偶然的」觀點。布爾什維克在挑選秘密警察時，情形亦是如此。貝克(F. Beck)和戈丁(W. Godin)在《俄國大整肅與逼供》(*Russian Purge and the Extraction of Confession*)（1951，160 頁）中報導說，國家保衛局成員只從黨員中挑選，而志願從事這一「職業」的人根本沒有機會。

第十一章
極權主義運動

(一)極權主義的宣傳

只有暴民和菁英才會被極權主義本身的銳氣所吸引；而只有用宣傳才能贏得羣眾。在立憲政府和自由言論的條件下，爲奪取政權而奮鬥的極權主義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使用暴力，並與其他政黨共同獲得必要的堅定支持者，巧言取悅公眾。公眾在此時此刻尚未與其他一切資訊來源隔絕。

在極權主義國家裡，宣傳(propaganda)和恐怖相輔相成，這一點早已爲人們的所識出，而且經常被如此認定。❶然而這只是部分事實。凡在極權主義擁有絕對控制權的地方，它就用灌輸(indoctrination)來代替宣傳，使用暴力與其說是恐嚇民眾(只有在初期階段，當政治反對派仍然存在時，才這樣做)，不如說是爲了經常實現其意識形態教條和謊言。在相反的事實面前，極權主義不會滿足於宣稱不存在失業現象；它會廢除失業者的福利，作爲它的一部分宣傳。❷同樣重要的是，拒絕承認失業——儘管是以一種相當出人意料的方式——實現了古老的社會原則：不勞動者不得食。或者另舉一例，當斯大林決定重寫俄國革命歷史時，他的新版本的宣傳中包含了將舊版本的書、文件連同作者和讀者一起加以毀滅：1938 年出版的新版官方共產黨歷史是一個信號，意味著那場屠殺蘇聯整整一代知識分子的超級大整肅結束了。同樣地，納粹在東方占領區起初主要利用反猶主義宣傳來贏得對居民的牢固控制。他們不需要也不使用恐怖來支持這種宣傳。當他們清除波蘭的大部分知識分子時，並非因爲知識分子們的反對，而是因

爲根據他們的理論，波蘭沒有知識分子，而當他們計劃綁架藍眼睛金頭髮的兒童時，意圖並非在於恐嚇居民，而是要拯救「日耳曼血統」。❸

由於極權主義運動存在於一個本身是非極權主義的世界中，它們被迫使用那種普遍認爲是宣傳的手段。但是這種宣傳總是訴求於「外部範圍」——無論是國內居民中的非極權主義階層，還是國外的非極權主義外國。極權主義宣傳訴求的這個外部範圍可能變化很大；即使在奪取政權以後，極權主義宣傳可能會針對自己國家裡的幾部分人，因爲在經過足夠的灌輸之後，他們仍未採取協調一致的態度。在這一方面，希特勒在戰時對他的將軍們的演講是典型的宣傳，其特點主要是撒彌天大謊，這位領袖借此來娛樂他的客人，以圖博取人心。❹外部範圍也可以指一些運動的同情者，他們還未準備接受運動的眞正目的；最後，甚至納粹黨員也常常被領袖手下的內部圈子(inner circle)或菁英集團成員看作屬於這類外部範圍，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也需要接受宣傳，因爲他們還不能可靠地接受控制。爲了不致於低估謊言宣傳的重要性，人們應該記得更多的例子，看到希特勒在界定運動的眞正目的時，他是完全眞誠的，直率而不含糊，然而公眾還未準備好接受這種貫徹的說法，所以未被承認。❺但是從根本上來說，極權主義統治之努力限制其宣傳手法，僅僅在於它的外交政策方面，或者它的國外各分部，目的是向他們提供合適的材料。每當國內的極權主義思想灌輸與在國外的宣傳路線相衝突時（戰時在俄國發生過此類情形，這不是在斯大林結束他與希特勒聯盟之時，而發生在對希特勒作戰使之站到民主陣營一方時），在國內就將宣傳解釋爲一種「暫時的策略手段」。❻只要有可能，對於被吸納到運動內的人的意識形態理論（他們已不再需要宣傳）與對外部世界的眞正宣傳之間的區別，在運動取得權力之前就已存在。宣傳與灌輸之間的關係通常一方面取決於運動的規模，另一方面取決於外部壓力。運動規模越小，就越有能量擴展純粹的宣傳；外部世界對極權主義政權的壓力越大——即使在鐵幕後面，也不能完全忽視這種壓力——極權主義獨裁

者就越會積極地從事宣傳。根本的要點是，宣傳的必需性總是由外部世界控制著，而運動本身實際上並不宣傳，而是灌輸。相反，灌輸不可避免地與恐怖相伴，增強了運動的力量或極權主義政府的孤立，以及不受外部干涉的安全感。

宣傳確實是「心理戰」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恐怖更甚。甚至當極權主義政府達到了它的心理目的以後，還會繼續利用恐怖手段：它眞正恐佈在於它統治一羣完全沉默的居民。凡在恐怖統治達到完美的地方，例如在集中營裡，宣傳就完全消失了；甚至在納粹德國，宣傳也被明白禁止。❼換言之，宣傳也許是極權主義一種最重要的對付非極權主義世界的工具；相反，恐怖是它的統治形式的本質。它的存在很少依靠心理因素或其他主觀因素，就像法律在一個立憲國家內的存在不依靠違法者的人數一樣。

恐怖作爲宣傳的對應，在納粹主義中比在共產主義中作用更大。納粹並不打擊著名人物，像它早先在德國掀起犯罪浪潮時那樣（殺害拉德諾和厄茲伯格〔Matthias Erzberger〕）；相反，他們殺害社會主義的小活動家們，或反對黨中有影響力的成員，試圖向民眾證明只有參加那些組織的人才有危險。這種大規模的恐怖還在相對較小範圍內進行時，並逐漸擴大著範圍，因爲警察和法庭都不會認眞地對攻擊所謂右翼的政治犯法者執法。一個納粹宣傳家所說的「權力宣傳」(power propagenda)❽是很值得研究的：它至少淸楚地向民眾表明，納粹的權力比當局更大，參加納粹組織比做一個忠誠的共和主義者更安全。納粹在製造政治罪行時具體地利用了這一點，極大地強化了上述印象。他們對此總是供認不諱，從來不爲「下級的過分行爲」而道歉——只有納粹的同情者們才作這類道歉——並且使民眾印象深刻，看到他們與其他政黨的「高談闊論者」大不相同。

這種恐怖和歹徒的普通犯罪(gangsterism)之間的相似性已很明顯，無需指出。這並不是指納粹主義就是歹徒幫派，像人們有時作出的結論那樣，而只意味著納粹儘管不承認，它實際上學了美國的黑社會組織，而其

宣傳卻承認是學了美國的商業宣傳。

但是，極權主義宣傳比直接威脅更具體，針對個人的犯罪行爲就是利用間接的、掩蓋之下的、險惡的暗示來針對一切不願跟從他們教導的人們，在此之後，大規模屠殺滲透到一切「有罪」和「無罪」之人。共產主義宣傳威脅民眾，說他們會被歷史拋棄，落後於時代就會陷入絕望，只能虛度生命；而納粹主義威脅說，民眾的生活會違背自然和生命的永恆規律，他們的血液會無可挽回地、神秘地敗壞。極權主義宣傳非常強調其論點的「科學」性質，這一點常被人用來比較某些在羣眾面前作自我表演的廣告技巧。而事實上，每一份報紙的廣告欄都誇示這種「科學性」(scientificality)，製造商用事實和數字來證明，一個「研究」機構出馬相助，例如論證他的肥皂是「世界上最好的肥皂」。❾同樣地，宣傳者充滿想像的誇張中有某種暴力成分，例如小姐們如果不用這種牌子的肥皂，就會一輩子長粉刺，找不到丈夫，這種說法的背後是壟斷欲望的胡思亂想，夢想有朝一日，這位「唯一預防粉刺的肥皂」製造商會有力量剝奪所有不用這種肥皂的小姐們獲得丈夫的權利。商業廣告宣傳和極權主義宣傳這兩者都明顯地只是一種權力追求。一旦極權主義運動掌握了權力，這種科學證明的糾結就停止了。納粹甚至拋棄了那些願意爲他們服務的學者，布爾什維克利用他們的科學家的名聲來達到非科學的目的，強迫他們做騙子。

但是，經常被高估的羣眾廣告和羣眾宣傳之間的相似性，僅止於此。商人通常並不裝扮成先知，他們往往不會表明自己的預言是正確的。極權主義的科學性的特點是幾乎完全強調，科學的預言與老式的追溯歷史完全不同。社會主義的和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起源所顯示的，無非就是它們的代言人假說他們發現了隱藏的力量，可以在命運鏈上給他們帶來好運。當然，羣眾極被吸引，是因爲「絕對系統(absolutist system)陳述一切歷史事件是依靠與命運鏈相連的第一因，這個絕對系統本身在人類歷史上就是壓迫人的。」(托克維爾語) 但是毫無疑問，納粹領袖實際上並不只是利用宣傳，

他們也相信這樣的理論:「事實上,我們越是認識和觀察自然和生活的規律,……我們就越是服從萬能之神的意志。我們越是深刻認識到萬能之神的意志,我們越是能獲得更大的成功。」⑩很明顯,無需改動多少字,就能表達斯大林用兩句話所說的信條:「我們越是精確地認識和觀察歷史與階級鬥爭的規律,就越會遵從辯證唯物主義。我們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越深刻,就越能取得偉大的成功。」無論如何,就斯大林關於「正確領導」的概念而言,沒有比這更好的解釋了。⑩

極權主義宣傳將意識形態的科學性及其用預言形式發表聲明的技巧提高到有效方法與荒謬內容的高度,因爲從煽動技巧的角度來說,幾乎沒有更好的方法可以避免爭論,只能從控制目前情形出發來發表論點,說只有未來才能顯示它的優點。但是,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並未發明這種程序,也並非這種程序的唯一使用者。現代政治普遍地在羣眾宣傳中運用科學性,這被解釋爲是一般跡象,這種對科學的熱中是西方世界自從數學和物理學在十六世紀興起以來的特點;因此極權主義在「科學變成偶像,可以巫術般地醫治惡的存在,改變人性」⑩的過程中似乎是最後一個階段了。羣眾的興起和利用科學性之間實際上很早就有聯繫。羣眾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受到一些人的歡迎,他們曾希望出現「歷史發展的自然規律」,它能消除個人行動與行爲的無法預示性。⑩昂方丹(B. P. Enfantin)常被援引作爲例子,他早就能「看到一種時代即將到來,『使羣眾感動的藝術』即將完美地發展,使畫家、音樂家和詩人能夠擁有一種力量,取悅和感動羣眾,其自信程度不亞於數學家解決一個幾何難題,或化學家解釋任何一種物質。」其結論是:現代宣傳就在此時此刻產生。⑬

然而,無論實證主義、實用主義(pragmatism)和行爲主義(behaviorism)有何種缺點,無論它們對十九世紀常識的形成產生多大影響,極權主義宣傳和科學性所訴求的羣眾的特點完全不是「功利主義存在部分的有害生長」。⑩我們從孔德的學說中知道,實證主義相信,未來最終可以科學地

被預測，利益評價是決定歷史的主要力量，並且假設可以發現權力的客觀規律。羅昂的政治學理論說，「國王指揮民眾，利益指揮國王」，客觀利益是「唯一不會失效」的規律，「正確理解利益，能使政府生存，錯誤理解利益，會使政府死亡」，這些都是現代功利主義、實證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的傳統核心，但是，這些理論都不會假設有可能「改變人性」，如極權主義試圖做的那樣。相反，它們都或明顯、或含蓄地假設，人性總是不變的，歷史就是變動的客觀環境以及人類對它們作出反應的故事，正確地理解歷史，就能導致改變環境，但不能導致改變人類反應。政治學中的「科學主義」(scientism)仍然假設人類福利是它的目標，這種觀念是在極權主義裏完全沒有。⑯

正因爲認可了功利主義的核心思想，極權主義政府的反功利主義行爲、完全無視羣眾的利益這一點，就成了一種震盪。這在當代政治中引進了一種前所未聞的和不可預測性的因素。然而，極權主義宣傳——儘管其形式上經常變換重點——指出了，即使在極權主義奪得權力之前，羣眾所關注的早已超越純粹利益。因此同盟國都懷疑，希特勒在戰爭開始時下令屠殺精神病人，其實是想擺脫不必要的食物供應之負擔，這是毫無道理的。⑰希特勒不是因爲戰爭而被迫拋棄道德上的考慮，而是將戰爭的大規模屠殺看作是一次無與倫比的機會，可以開始一項屠殺計劃，就像他的計劃中的其他要點一樣，是根據「千年至福」(millennia)的觀點來策劃的。⑱自從全部歐洲歷史幾百年來實際上教會人們根據「什麼人得益」來判斷每一次政治行動，根據背後的具體利益來判斷一切政治事件，他們突然面對一種前所未有、無法預見的因素。由於極權主義宣傳的煽動性質——早在奪取權力之前很久就清楚地顯示出，羣眾很少受到的自保(self-preservation)本能的驅使——羣眾很少認眞對待這些宣傳。但是，極權主義宣傳的成功並不十分依賴它的蠱惑人心，而是依賴羣眾的知識，使他們明白，利益是一種集體力量，只有當穩定的社會在個人和羣體之間提供必要的傳送帶時，才

能感到利益所在。羣眾的主要特點是他們不屬於任何一個社會團體或政治團體，他們只代表個人利益混亂多變的現狀，因此在羣眾之中，以純粹利益爲基礎的宣傳不會生效。極權主義運動成員的狂熱和一些普通的政黨之成員的最大忠誠相比，明顯地具有十分不同的性質，他們是缺乏自我利益意識的羣眾的產物(他們隨時願意犧牲自己)。納粹黨人證明了一個人只需用一句口號——「否則我們就完了」——來引導整個民族進入戰爭(這種做法是 1914 年的戰爭宣傳小心地避免的)，而且此刻並不處於苦難、失業、或鼓噪民族野心的時代。同樣的精神出現在一場明顯失敗的戰爭的最後幾個月，納粹宣傳在安慰早已驚惶失措的民眾，許諾說：「領袖憑他的智慧，早已爲他的人民準備了一種簡易死亡法，假如戰敗，就讓他們進毒氣室。」[19]

極權主義運動利用社會主義和種族主義，並且取消它們的功利主義內容，即一個階級或一個民族的利益。在一貫正確的預言形式中提出這些概念，使形式變得比它們的內容更重要。[20]羣眾領袖的主要資格是永遠無誤；他絕不能承認錯誤。[20]再者，一貫正確的假設之基礎不是超人的智慧，而是正確解釋歷史或自然的根本可靠力量，失敗和毀滅都不能證明這些力量是錯誤的，因爲長遠來看，它會證明自已是正確的。[20]掌權的羣眾領袖在一切功利主義的考慮中只關心一件事：使他們的預言變爲現實。納粹黨人在戰爭結束時毫不猶豫地集中他們尙能掌握的組織，盡可能徹底毀滅德國，以實現他們的預言：如果戰敗，德國人民就遭毀滅。

「永遠無誤」的宣傳效果，以各種可預言的力量的唯一解釋者自居而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這些都鼓舞了極權主義的獨裁者們，習慣於以預言形式來宣布他們的政治意圖。最著名的例子是希特勒於 1939 年 1 月在國會的講話中所宣布的：「我今天再作一次預言：假如猶太金融家們……再一次成功地將民眾扔進一場世界大戰，結果將是……猶太種族在歐洲滅絕。」[20]用非極權主義的語言來解釋，這意味著：我想製造戰爭，我想殺死歐洲的猶太人。同樣地，斯大林於1930年在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一次演講中，他準

備清除黨內右派和左派分裂主義分子，形容他們是「垂死階級」的代表。[24]這一定義不僅具體地加重了論調的尖銳性，而且以極權主義的風格宣布從肉體上消滅的那些人，他們的「死亡」正是預言中的事。這兩個例子都達到同一個目標：清除對手都符合歷史過程的規律，根據永遠不變的規律，人的所作所受都是必然發生的。對犧牲者的迫害一旦執行了，「預言」就變成了一種回顧式的辯解：所發生的一切都只是早已預言的。[25]「歷史規律」是否詛咒階級及其代表的「毀滅」，或者「自然規律是否……消滅」一切不「適宜生存」的人——民主人士、猶太人、東歐次等民族、無法醫治的病人，這些都無關緊要。希特勒恰巧也說過「垂死的階級」應該被「消滅，這不用大驚小怪」。[25]

這種方法就像極權主義其他宣傳方法一樣，在運動奪取政權以後，只是極其簡單明瞭的事情。那麼，關於極權主義獨裁者預言之眞僞的一切爭論都是很古怪的，好比爭論一個潛在的殺人犯的未來受害者究竟是死是活一樣——因爲殺死這個人，殺人犯可以立即提出他是正確的證據。在這種情況下，唯一有效的爭論是立即拯救這個被預言判定將死的人。在羣眾領袖奪取權力以實現他的謊言之前，他們的宣傳就是以其極端地嘲弄事實爲標誌，[25]因爲根據他們的觀點，事實完全取決於能夠編造事實的人的力量。聲稱莫斯科地鐵是世界上唯一的地鐵，這個謊言只要布爾什維克還沒有力量摧毀別國的所有地鐵之前會一直存在。換言之，永遠無誤的預言方式和任何其他極權主義宣傳手段不一樣，違背了它最終統治世界的目的，因爲只有在一個完全處於他的控制之下的世界裡，極權主義統治者才有可能實現他的謊言，使他的一切預言變爲現實。

預言之科學性語言符合羣眾的需要，他們在世界上失去了家園，現在準備和永恒的、統治一切的力量合爲一體，這些力量本身可以將在險惡風浪中游泳的人帶到安全的岸上。「我們根據遺傳學的證明來塑造民族的生活和我們的法律，」[25]納粹此言，正如布爾什維克向他們的追隨者保證，經濟

力量有能力決定歷史。因此他們保證會有一種勝利，不受「暫時」的失敗和具體企業的失敗影響。因為羣眾與階級不一樣，他們只要勝利和成功，哪怕是最抽象的形式，他們被約束在一起，並非因為他們特殊的集體利益，那是他們感到作為一個羣體而生存不可或缺的，以及即使面對逆境也可以堅持的利益。對他們而言，比可能勝利的目標或可能成功的具體努力更重要的是：只要是勝利，無論是什麼目標；只要是成功，無論是何種企圖。

極權主義宣傳使羣眾宣傳的技巧更完備，然而它既不發明、也不創造宣傳的主題。這些現成的主題，是由五十年裡帝國主義的興起和民族國家的解體替它準備的。當時歐洲暴民進入了政治舞台。極權主義運動的代言人像早先的暴民領袖一樣，對一切事物具有準確無誤的直覺，這是普通的政黨宣傳或輿論不關心或不敢觸及的。隱藏的一切事物，悄悄地發生過的一切事物，都變得具有重大意義，而它們的內在重要性卻被忽略。暴民實實在在地相信，眞理就是體面的社會虛僞地忽略、或者腐敗地掩蓋的一切。

在選擇論題時，神秘性(mysteriousness)本身變成了第一條標準。秘密的起源無關宏旨；它可以是在合理的、政治上可以理解的渴求秘密(desire for secrecy)中，例如英國情報部或法國第二局(French Deuxieme Bureau)；或者革命團體的密謀需要，例如無政府主義和其他恐怖主義組織；或者在社會的結構中，它們原先的秘密內容長期以後卻變得十分出名，只有禮儀形式仍然保留著先前的神秘性，例如共濟會；或者在古老的迷信中，圍繞著某些羣體編織傳說，例如耶穌會士和猶太人。在選擇羣眾宣傳的這些題目時，納粹無疑棋高一著；但是布爾什維克逐漸學會了這些把戲，雖然他們不依靠傳統地被接受的神話，寧可選擇自己創造——自從三十年代中期以來，在布爾什維克的宣傳中，一個接一個地出現了神秘的世界陰謀，從托洛茨基的陰謀開始，接著是三百個家族的統治，再接著是英國和美國情報局凶惡的帝國主義（即全世界的）陰謀。[29]

這類宣傳的效果顯示了現代羣眾的主要特點之一。他們不相信自己的實在經驗中一切明顯可見的事物；他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像，這種想像可能被同時是普遍的、又是首尾連貫的任何事物捕捉住。使羣眾信服的不是事實，甚至也不是編造的事實，而是一種他們在其中成爲組成部分的系統一致性。重複手段的重要性常被高估，因爲在一般情況下都相信羣眾把握事物和記憶事物的能力很差，其實重複手段之重要僅在於它能及時使人相信事物是首尾一致的。

羣眾拒絕承認於充滿現實中的偶然性(fortuitousness)。他們生來傾向於各種意識形態，因爲他們將事實解釋爲只是一般規律的一個具體例子，否定事物的巧合，發明了一種適應一切的萬能解釋，假設它是一切偶然事物的根本。極權主義宣傳由於這樣地從現實逃避進虛構，從偶合逃避進一致性，遂顯得頗有生機。

極權主義宣傳的主要缺陷是它無法滿足羣眾的渴望——完全一致的、可以理解的、可以預見的世界，而不與常識(common sense)發生嚴重的衝突。例如，如果蘇聯的政治反對派的一切「告白」(confession)用語相同，承認同樣的動機，那麼追求一致的羣眾就會將虛構接受爲眞理的最高證明；而常識告訴我們，這種一致性恰恰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存在，而是編造出來的。說得形象些，似乎羣眾要求經常重複舊約聖經的奇蹟(the miracle of Septuagint)，根據古代傳說，有七名翻譯者各自獨立地翻譯出希臘文《舊約全書》，而內文完全一致。常識只能將這個故事當作一個傳說或一個奇蹟來接受；然而它也能說成是證明譯本都絕對忠實地譯出了每一個詞。

換言之，如果說羣眾受到一種逃避現實的願望所蠱惑，因爲在他們本質上無家可歸的存在中，他們不再能忍受事實的偶然性和不可理解，那麼同樣地，他們對虛構的渴望也與人類思維的能力有關，人類思維結構的一致性高於純粹的思維現象。羣眾逃避現實，這是對世界的一種判決，他們被迫在這個世界上生活，卻又不能在其中生存，因爲偶然性變成了這個世

界裡的最高主宰，人類需要經常地將混亂的、偶然的條件轉化爲一種相對地比較一致的人爲條件。羣眾反對「現實主義」、常識，以及「世界的表面眞實」(plausibilities of the world)（伯克語），原因是他們的分子化，他們失去社會地位，隨之失去整個社羣關係，而常識本來只有在它的範圍內才能產生意義。他們在精神上和社會上無家可歸的情況下，就無法以一定的尺度來深刻洞悉任意性與計劃性、偶然性與必然性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極權主義宣傳只有在常識失效的地方才能大量地侮辱常識。或者面對混亂的發展和完全任意性的衰落，或者服從於最嚴格的、異想天開的意識形態虛構的一致性，羣眾可能永遠只會選擇後者，隨時以犧牲個人來作爲代價——這並不因爲他們愚蠢或邪惡，而是因爲在總體的災難中，這種逃避至少給予他們一種最低限度的自尊。

納粹宣傳的特點是從羣眾渴望一致性中獲得好處，而布爾什維克的方法顯示出（如同在實驗室一樣）它對孤獨的羣眾中人的衝擊力。蘇聯秘密警察很願意使受害者相信他們有罪，儘管他們從未犯過這種罪，而且在許多例子中，他們根本不可能犯這種罪，秘密警察完全孤立和抹煞了一切眞正的事實因素，以使「故事」的邏輯一致性在預先準備好的懺悔書上顯得十分明白。在有些情況下，虛構和現實之間的分界線被駭人的指控和這些指控內在一致性弄模糊了，爲了抵制對罪狀純粹抽象的可能性屈服的誘惑，就不僅需要有抵抗經常性威脅的性格力量，而且也要求十分相信人類同伴的存在——他們絕不會相信這些「故事」。

無疑地，只有在極權主義的世界裡，虛假和僞造的蠢事才能達到極端。但是，這只是極權主義政府的宣傳手段之一部分，懺悔還不是必要的懲罰。「告白」是布爾什維克宣傳的特產，用追溯法來奇怪地使罪行成立則是納粹宣傳的特產。這兩者的目的都是一致的。

在根據它們的理論奪取權力和建立一個世界之前，極權主義運動想像出一個一致的謊言世界，與其說是滿足現實本身的需要，不如說是滿足了

人類思維的需要；其中通過純粹的想像，使失根的羣眾能夠感到自在，並且使他們的眞實生活和實際經驗在人類期望方面避免沒完沒了的震盪。極權主義宣傳所擁有的力量——在運動有力量降下鐵幕來防止任何人用最微小的現實來騷擾一個完全想像的世界中凝滯的平靜之前——在於它有能力將羣眾關閉在眞實世界之外。眞實的世界仍然提供給分化瓦解狀態的羣眾唯一能理解的跡象——每一次惡運的打擊都使羣眾受騙上當——這些跡象，可以說，是眞實世界中的空白，是它不想公開討論的一些問題，或者是它不敢否認的流言，因爲流言儘管誇大和扭曲，卻擊中了某些痛處。

極權主義宣傳從這些痛處中產生了它們需要用來塡平現實與虛構之間鴻溝的眞理成分和實際經驗。只有恐怖可以依靠純粹的虛構，即使是極權主義政府由恐怖支撑的謊言虛構也還未完全變得隨心所欲，儘管它們通常更粗魯，更厚顏無恥，而且比運動的謊言更有創造性。(俄國革命修正過的歷史不是靠宣傳技巧，而是靠權力來傳播的，書中沒有一個姓托洛茨基的人曾經當過紅軍總司令。)另一方面，運動的謊言更精細些。涉及羣眾眼睛看不到的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的每一個方面。在官方當局周圍布置了一種秘密氣氛時，謊言最能成功。在羣眾的眼裡，它們獲得了最「實在」的名聲，因爲它們觸及了隱秘存在的眞實狀況。上層社會中腐敗政治家的醜聞被揭露，一切屬於黃色小報的醜聞，在它們手裡都變成了一種不止是聳人聽聞的重要武器。

納粹宣傳中最有效的虛構是關於猶太人世界陰謀的故事。自從十九世紀末以來，集中於反猶主義宣傳一向是普遍的煽動手段，二十年代在德國和奧地利尤爲普遍。一切政黨和輿論喉舌越是一致避免討論猶太人問題，暴民就越是相信猶太人是所謂權力的眞正代表，在整個制度中，猶太人問題是虛僞和不誠實的象徵。

戰後反猶主義宣傳的實際內容既非納粹的獨白，亦非特別新的創造。關

於猶太人世界陰謀的謊言自從德雷富斯事件以後就一直在流傳，其基礎是迄今分散在全世界各地的一個猶太民族仍有相互之間的國際聯繫和互賴。關於猶太人的世界權力的誇張說法出現得更早，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末，當時猶太商業與民族國家的密切關係已變得很明顯。將猶太人描繪成惡的化身，通常只認爲這是中世紀迷信的殘餘記憶，但是實際上與其後來被解放以後，在歐洲社會中所扮演的曖昧角色密切相關。有一件事是無法否認的：在戰後，猶太人比先前任何時候都更出名。

猶太人本身在權力方面的影響和地位卻與他們日益出名和引人注目的狀況成反比。民族國家之穩定和力量每降低一分，對猶太人的地位都是一次直接的打擊。民族部分成功地超越國家，使政府機器有可能維持它高於一切階級和政黨的地位，因此也就貶低了與居民中的猶太人結盟的價值，猶太人或許仍處於社會各階層之外，並且對政黨政治不感興趣。資產階級具有帝國主義頭腦，它越來越關心外交政策，對國家機器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同時也就堅決地拒絕讓最大部分的猶太人財富進入工業企業，不讓它離開傳統的資本貿易。所有這些情況加在一起，幾乎終止了猶太人作爲一個羣體對民族國家經濟上有用的性質，以及社會隔離對他們本身的好處。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中歐猶太團體像法國猶太人在第三共和國的最初幾十年中一樣同化和歸化了。

對於變化了的形勢，相關的國家在意識上達到何種程度，到 1917 年就明朗化了，當時德國政府遵循著一種長期建立的傳統，試圖利用它的猶太人來一試與協約國的和平談判。它不和德國猶太社羣的領導人說話，相反卻與比較不具影響力的猶太復國主義小團體對話，根據舊的方式，這些小團體仍然受到信任，正因爲他們堅持猶太人獨立於公民身分之外存在，因此可望他們依靠國際關係網、從國際觀點出發來提供服務。然而德國政府在這一點上走錯了一步。猶太復國主義者們做了猶太銀行家們從來未做過的事；他們提出了自己的條件，並對政府說，他們只願談判一種不帶附加

條件和賠償條件的和平。㉚過去猶太人那種對政治問題的冷淡態度消失了；他們中的大多數由於不再游離於國家之上，所以不再有用，而猶太復國主義者這一小部分人的無用，則是因爲他們有自己的政治觀點。

中歐諸國的共和政體取代專制政府，瓦解了中歐猶太人羣體，正如五十年前法國第三共和國所做到的那樣。當新政府在缺少權力而無興趣保護猶太人的情況下建立時，猶太人早已失去了他們的大部分影響。在凡爾賽和約期間，猶太人主要被利用來當作專家，甚至連反猶主義者也承認，戰後時代的一幫猶太小騙子，大多數是新來者，（他們與當地的一些同宗教的人明顯不一樣，在他們的欺騙活動背後，有一種奇特的態度，和他們早先對周圍環境的標準持冷漠態度很相像）他們和假設中的猶太人國際聯繫網的代表沒有任何聯繫。㉛

在一大羣相互競爭的反猶主義團體中，在一種彌漫的反猶主義氣氛中，納粹的宣傳發明了一種對付這一題目的方法，與眾不同，而且比其他一切方法都高明。話說回來，納粹的口號沒有一條是新的——甚至連希特勒精明地描繪說猶太商人剝削工人，而他的兄弟在工廠裡煽動工人罷工引起的階級鬥爭的說法，也不是新的。㉜唯一的新內容是納粹黨要求它的黨員拿出證據來說明自己沒有猶太血統，儘管有費德爾計畫，但是關於納粹一旦掌權後針對猶太人會採取哪些實際措施方面仍然極端模糊。㉝納粹將猶太人問題置於宣傳中心，意味著反猶主義不再是針對少數人的觀點，或只與民族政治有關，㉞而是直接關係到每一個人的個人生存問題；誰也不可能成爲一個不成序列的「家族系譜」中的成員，而在納粹的層級制度中，層級越高，在家族系譜中就必須追溯得越遠。㉟還有，布爾什維克主義儘管不那麼始終一致，卻也改變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最後不可避免的勝利的理論，說它的成員是「天生的無產階級」，將其他階級出身說得很可恥。㊱

納粹宣傳很直率地將反猶主義轉變成一種自我定義的原則，因此消除了觀點動搖不定的狀況。它用蠱惑來說服羣眾，這只是一種預備步驟，而

且從不過分估計其鼓動演講或印刷出版物的持久影響力。[37]這提供給由分子化的、無法定義的、不穩定的、人數眾多的個人組成的羣眾，以一種自我定義和自我鑒別身分的方法，不僅恢復了他們先前產生於社會功能的部分自尊，而且也創造了一種欺騙性的穩定，使他們成爲一個組織的更好的候選成員。通過這種宣傳，運動可以使自身人爲地成爲羣眾聚結的擴延，並使一個分子化的社會裡孤立的個人被許諾獲得自尊，將歇斯底里地追求安全感的根本感情合理化。[37]

納粹在對待其他相關問題上也明顯地應用了別人製造的以及先前使用過的口號。當公眾的關注同等地集中在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上，認爲這兩者不能同等地比較，而實際上在右派和左派之間構成了意識形態的分水嶺時，「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納粹）提供了一種假設，彷彿要導致民族統一，這是口頭上的解決方案，它的雙重商標「德國」和「工人」將右派的民族主義和左派的國際主義串連起來。納粹運動之名偷自其他各政黨的政治內容，公開地藉口將這一切結合起來。先前也有將對立的政治理論成功地結合的例子，例如民族社會主義(national-socialist)、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social)，等等；但是納粹以一種方式實現了他們的結合，國會裡社會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的全部鬥爭，那些首先自認工人的人和那些首先是德國人的人之間的鬥爭，都顯得好像是一種設計，用來掩蓋背地裡有害的動機的欺騙——納粹運動的每一個成員不就是同時包括了這一切嗎?

有意思的是，納粹即使在起家時也不屑利用民主、共和、專政、專制這一類顯示一種具體的政府形式的口號。[37]這一點足以說明，他們一向懂得自己的一切將完全是創新的。每一次關於他們的未來政府形式的討論都淪爲空談純粹形式——根據希特勒的說法，國家只是保存種族的一種手段，根據布爾什維克宣傳的說法，國家只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工具。[40]

但是，納粹以另一種奇怪的和迂迴的方式，在其宣傳中回答了關於他

們的未來作用是什麼的問題，他們用「錫安長老們的草案」作爲模式，爲在將來組織德國羣眾建立「世界帝國」而作準備。他們不限於在納粹黨徒中利用這個密謀的說法作宣傳；他們還印刷了幾十萬冊在戰後德國出售，甚至公開採用來作爲政治手冊，這已不是新聞了。㊶然而這種造謠的目的主要是譴責猶太人，喚起暴民注意猶太人控制世界的危險。㊷就純粹宣傳而言，納粹發現羣眾並不很害怕猶太人統治世界，而是有興趣追究這一點如何實現，關於密謀的流傳實際上是歆羨和想知道內情，而不是基於仇恨，明智的做法是盡可能仔細研究他們的某些顯著的公式，例如著名的口號「凡是對德國人民有好處，就是正確的」，這條口號抄襲自「草案」中的「一切有利於猶太人民的事情，在道德上都是正確的和神聖的。」㊷

「草案」在許多方面都是很奇怪而且值得注意的。除了廉價的馬奇維利主義(Machiavellianism)方式以外，其重大政治特點是，以想入非非的方式觸及時代的每一個重大政治問題。它們在原則上是反民族的，而且將民族國家描繪成泥足巨人。它們無視民族主權，並且如希特勒曾經說過的那樣，相信建立在一個民族基礎上的世界帝國。㊶它們並不滿足於在一個特定國家裡的革命，而是將目標定在征服和統治世界。它們向民眾保證說，不管在人數、領土和國家權力方面優劣如何，它們只要通過組織手段就能達到對世界的征服。可以肯定，它們那種令人信服的力量部分是產生於非常古老的迷信成份。這種「草案」是古老的，㊷一個國際間的團體連續不間斷的存在，這種概念在自從法國革命以來的小道政治文學中就有了，即使這些十八世紀末的寫作者未曾想過，這個「革命的團體」，這個「一切文明民族中間的奇特民族」就是猶太人。㊷

對羣眾最有吸引力的是「草案」中一場世界性陰謀的動機，因爲它契合了新的權力形勢。(希特勒很早就允諾，納粹運動將「超越現代民族主義的狹隘界限」，㊷戰爭期間，黨衛軍試圖將「民族」〔nation〕這個詞從納粹的字彙中抹除。)只有全球列強看來仍有機會獨立生存，只有全球政治才

有機會產生永久結果。這種情況會使並非世界列強的小國家恐懼，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草案」似乎可以指出一條出路，不依靠不可改變的客觀條件，而只依靠組織的力量。

換言之，納粹宣傳從「由於強烈的民族性而變成超民族的猶太人」⑱中，發現德國世界主人的前驅，並向羣眾保證，「首先看清猶太人、首先向他們作鬥爭的民族，將會取代他們統治世界的地位。」⑲關於猶太人早已實行世界統治的幻覺，構成了德國在未來統治世界的幻想的基礎。當希姆萊指出「我們的政府統治藝術應歸功於猶太人」時，他心中想的就是這一點，也就是說，歸功於「領袖牢記在心」⑳的錫安長老草案。因此「草案」表現出征服世界在實踐上是可能的，整個事情只剩下是否受靈感啓發或技巧是否精明的問題，阻礙德國在全世界取得勝利的顯然只是一個小小的猶太民族，他們無需擁有暴力工具就能統治整個世界——因此，一旦他們的秘密被發現，其方法在一個更大規模中被仿效，他們就成了容易應付的對手。

納粹宣傳將這一切新的、充滿希望的前景集中在一個概念上，稱爲「德國民族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這個新的社羣在無產階級的氣氛下，在納粹運動中形成，其基礎是一切德國人絕對平等，這不是權力的平等，而是天性平等，以及他們與其他所有的人絕對不同。㉑自從納粹掌權之後，這種觀念漸漸失去它的重要性，讓位給一種態度；一方面蔑視德國民眾(納粹一向持此態度，但在以前不大顯露)，㉒另一方面非常熱心地從其他國家的「亞利安人」中擴大他們自己的隊伍，這種想法在納粹掌權之前階段的宣傳中並不很重要。㉓「德國民族共同體」的說法只是爲「亞利安人」種族社會製造輿論，它最終會毀滅各個民族，包括日耳曼民族在內。

在某種範圍內，「德國」是納粹嘗試考慮共產黨提出的關於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的諾言。如果我們不管一切意識形態含義，那麼就可以明顯地看到一種宣傳對另一種宣傳產生的魅力。兩者都許諾要平衡一切社會差異和財產差異，沒有階級的社會明顯地意指每一個都被平衡到工廠工人的地位，

而「德國民族共同體」的含義中有一種征服世界的陰謀，也延伸出每一個德國人最終可以變爲一個工廠主的合理希望。但是「德國民族共同體」的更大利益是它不必等到未來某個時刻，也不依靠客觀條件：在運動的虛構世界中它可以即刻實現。

極權主義宣傳的眞正目的不是說服，而是組織——「無須擁有暴力手段而能累積權力」。[54]出於這個目的，意識形態內容的創新只能被看作是一種不必要的障礙。我們這個時代的兩種極權主義運動，令人驚駭的「新」統治方法，組織方式中的獨創性，都沒有鼓吹一種新的理論，也都沒有發明過一種不曾流傳的意識形態，這並非偶然。[54]贏得羣眾的並非是成功的煽動，而是一種「有活力的組織」實實在在的力量。[54]希特勒作爲一名羣眾先知的輝煌天才並不在運動中使他贏得地位，而是使他的對手們誤以爲他是一個單純的羣眾煽動者，而斯大林是能夠擊敗俄國革命的偉大演說家。[54]極權主義領袖和獨裁者的顯著特徵是頭腦簡單和目標單一，他們以此來從現存的意識形態中選擇最適合於另一個完全虛構的世界的基礎因素。「錫安長老們的草案」和「托洛茨基的陰謀」都是虛構的，兩者都包含了看似有理的成分——猶太人在過去的非公開影響和托洛茨基與斯大林之間的權力鬥爭——極權主義捨此便不能安全地建立虛構的世界。它們的技巧包含著使用並超越現實因素和各種經驗因素，來選擇虛構，使這些因素在某些領袖裡普遍化，而這些領域在當時又無疑是個人經驗不可能控制的。極權主義宣傳靠這種普遍化建立的一個世界，適合於和現實世界競爭，後者的主要缺陷是無邏輯、無連貫性、無組織。虛構的連貫性和組織化的嚴格性可以使通則化的說法在具體的謊言揭穿後，最終仍能存在——認爲猶太人在孤立無援地遭屠殺之後仍有力量，而蘇聯的托洛茨基分子遭整肅和托洛茨基本人被謀殺之後，仍在全世界進行有害的陰謀活動，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

極權主義獨裁者們面對荒誕局面，仍然頑固地堅持原先的謊言，這種

態度遠不止是對詭計的迷信，至少在斯大林身上，心理學無法解釋說謊的原因，他的成功也許會使他自己成爲最後的犧牲品。宣傳口號一旦與「有活力的組織」結合，不破壞整個結構，就無法清除它們。關於猶太人世界陰謀的假設，被極權主義宣傳從一種客觀的、可爭議的事情轉變爲納粹的主要現實成分；重點在於納粹起而行動，假設世界已被猶太人統治，因而需要一種反陰謀來保護自己。種族主義對於他們來說已不再是一種在科學上價值可疑的、有爭議的理論，而是在政治組織功能階層中的每日現實，在這種組織的框架內，如果對現實產生疑問，那就會是非常「不現實」的。同樣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不再需要爭論階級鬥爭、國際主義、以及無產階級的福利無條件地依賴於蘇聯的福利；第三國際的功能組織比任何論爭或純粹意識形態都更能令人信服。

極權主義宣傳比其他政黨和運動的宣傳更優越，根本原因在於它的內容，對於運動的成員們而言，不再是一種人們有可能產生意見的客觀問題，而是像數學定律一樣，變成了他們生活中眞實的、而又不可觸及的成份。只有在極權主義政府統治下，才能完全實現整個生活結構的組織。在納粹德國，當只有種族出身至關重要，而一種職業取決於人是否具有「亞利安」相貌（希姆萊一向根據相片來挑選黨衛軍成員），食物發放量的多寡必須追究一個人的祖輩有幾個猶太人時，懷疑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的有效性，就好比懷疑世界是否存在一樣。

宣傳常常爲虛弱和不可靠的論爭「加入組織的力量」，而立即實現它所說的任何話，宣傳之優勢，不證而明。[58]明白之理可以駁斥以運動許諾要改變的現實爲基礎的論點，駁斥以純粹事實可以揭穿的反宣傳——純粹事實屬於或者維護一個任憑擺佈的羣眾不能也不會接受的世界——宣傳只有另一種更有力或更好的現實才能否定它。

極權主義宣傳只有在失敗的時刻才會顯現出它的虛弱本質。若無運動的力量，其成員立即就會不相信他們昨天還準備爲之獻出生命的敎條。當

運動（亦即庇護他們的虛構世界）被摧毀時，羣眾就會轉向他們原先作爲孤立的個人的地位，或者在一個已經變化的世界裡愉快地接受一種新的功能，或者沉淪於他們舊日絕望的多餘者地位。極權主義運動的成員們只要運動猶存，就會完全瘋狂地活動，但不會模仿宗教狂的榜樣作爲殉道者去死（儘管他們很願意像機器人一樣去死）。㊾相反，他們會放棄運動這種惡運，向四周尋找別一種有希望的虛構，或者等待前一種虛構重新獲得足夠力量來確立另一場運動。

同盟國想在德國民衆中找出一個自我懺悔或被說服的納粹分子而徒勞無功，他們中間百分之九十的人很可能在某一段時間裡是納粹的忠實同情者，這不能簡單地說是人類弱點或機會主義的標誌。納粹主義作爲一種意識形態，曾經被完全「實現」過，以致於其內容不再作爲一套獨立的學理而存在，失去了其所謂知識的存在地位，因此，現實被破壞無遺後沒有留下任何事物，信仰者不再那麼瘋狂。

㈡極權主義的組織

極權主義組織的形式與它們的意識形態內容和宣傳口號不同，組織形式完全是新的。㊾它們被設計來用於運動的謊言宣傳，圍繞著一個虛構的中心——猶太人陰謀、托洛茨基分子、三百個家族，等等——編造一個功能性的現實，甚至在非極權主義的環境裡也建立起一個社會，使這個社會的成員根據虛構世界的規律行動和作出反應。表面類同的政黨和運動——法西斯主義或社會主義，民族主義或共產主義——一旦達到某個極端階段（這大多取決於其成員的絕望程度），就會用恐怖來支撐其宣傳，相比之下，極權主義運動對於它的宣傳確實是很認眞的，其認眞態度大多表現在組織它的追隨者方面，而不在於從肉體上消滅對手。組織和宣傳（並非恐怖和宣傳）是相輔相成的。㊾

極權主義運動在奪取權力之前的階段最吸引人的新組織手段是創建了前鋒組織(front organization)，淸楚區分黨員和同情者(sympathizer)。與這一發明相比，其他典型的極權主義特徵，例如自上而下指定官員，任命權是最終壟斷在一個人手裡，這些都是次要的。所謂「領導者原則」(leadership principle)本身不是極權主義的；它從權威主義和軍事獨裁借用了某些特徵，極有助於隱蔽和縮小實質上的極權主義現象。如果上級指定的官員擁有眞正的權威和責任，我們就必須論及層級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在這個結構中，權威和權力由法律來委任和運作。根據這一模式建立的軍隊和軍事獨裁的組織，其情形也大致相仿，在這裡，從上到下的絕對指揮權力和從下到上的絕對服從，符合戰鬥中特殊情勢，這正是它們爲何並非極權主義的原因。按層級組織起來的指揮鏈意味著，指揮官的權力有賴於他在其中操作的層級體系。每一個層級，無論權威大小，每一條指揮鏈，無論其命令之內容如何恣意專橫，都傾向於穩定和限制一個極權主義運動領袖的總體權力。[62]根據納粹的語言，永不休止的、有力的「領袖意志」(Will of the Führer)——這並非意指一種固定的、限定的權威，即他的命令——變成了極權主義國家裡的「最高法律」。[62]由於極權主義運動獨特的組織方式，它將領袖放在一個位置上，只有從這個位置出發，領袖原則才產生了極權主義性質。希特勒和斯大林這兩個例子都說明，事實上的情況使眞正的領袖原則相當緩慢地集中形成，與運動的逐步「極權主義化」平行發生。[63]

有一本匿名著作用很大篇幅描述了這種新的組織結構在開始時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我們不知是誰首先決定將同路人組織進前鋒組織，誰最先從同情態度不明朗的羣眾——一切政黨在大選日都依靠他們，但是認爲他們太易動搖，不宜成爲黨員——中看到，它不僅是一個蓄水池，可以從中吸收黨員，而且本身也是一種決定性的力量。早期受共產黨鼓動起來的同情者組織，例如「蘇聯之友」(Friends of the Soviet Union)或「紅色支

援者」(Red Relief)協會，發展成前鋒組織，但是原先卻恰恰如它們的名稱所指出的：一羣從經濟上或其他方面（例如法律上）提供援助的同情者。希特勒最早說過，每一個運動都應該將它通過宣傳爭取到的羣眾分爲兩種人——同情者和正式成員。這本身就很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他這種劃分的基礎是一種比較普遍的哲學，認爲任何事情一超過純粹理論上的觀察，大多數人就變得太懶惰、太怯懦，只有少數人願意爲他們的信念而戰鬥。[65]相應地，希特勒第一個發明了一種有意識的策略，經常擴大同情者的隊伍，同時又使黨員人數嚴格限制在一定數目。[65]這種觀念——人數較少的黨員周圍環繞著人數多的同情者——非常接近於後來前鋒組織的現實。前鋒組織這個名稱的確很符合它們的實際作用，並且也指出了運動內部成員與同情者的關係。因爲同情者的前鋒組織在運動中所產生的重大作用絲毫也不亞於正式成員。

前鋒組織環圍著運動成員，像一堵保護牆，將他們和外部的正常世界隔開；同時，它們又組成一道返回正常狀態的橋樑，若非如此，運動成員在掌權之前的階段就會覺得，他們的信仰和那些普通人之間、自己的虛構謊言和正常世界之間，差異太大。在運動的奪權鬥爭中所使用的巧妙手段是，前鋒組織不僅孤立運動成員，而且也向他們提供一種外部世界正常狀態的樣子，比純粹的思想灌輸更有效地防止眞實現狀對他們產生衝擊。一個納粹或布爾什維克成員與同路人之間在態度上的區別，證明了他的信仰在對世界作虛構的解釋時是正確的，因爲同路人的信念也畢竟相同，形式比較混亂，儘管也比較「正常」(即較不瘋狂)；所以在黨員看來，凡是運動未明確指認爲敵人（猶太人、資本家，等等）者，都站在他一邊，世界上到處是秘密的同盟者，他們只不過是還未被喚起必要的精神力量和性格力量，來從他們自己的信念中得出符合邏輯的結論。[65]

另一方面，整個世界通常通過前鋒組織才最初看到極權主義運動。同情者們在非極權主義社會裡無論從那個方面來看都還只是無關的公民，很

難說是頭腦簡單的狂熱分子；透過他們，運動製造的瘋狂謊言更能被普遍接受，可以用比較溫和、比較令人尊重的形式來散布他們的宣傳，直到總體氣氛被極權主義的成分毒化，這些成分本身很難被覺察，而是顯現爲正常的政治反應或政治觀點。同路人組織用令人尊重的正常狀態迷霧籠罩極權主義運動，在外部世界本身眞實性質問題上欺騙運動成員，又用掩蓋運動實質的手法來愚弄外部世界。前鋒組織產生了兩方面的作用：既是極權主義運動面對非極權主義世界的門面，又是這個世界面對運動內部集團的門面。

比這種關係更吸引人的事實是，在運動本身內部的不同層級上也重複出現這種關係。正如黨員與同路人既聯繫又分隔一樣，運動中的菁英結構與普通成員之間也是既聯繫又分隔。如果說，同路人仍然像是外部世界的一個正常居民，他接受極權主義的命令就像一個人可能接受一個普通政黨的綱領一樣，那麼，納粹和布爾什維克的普通黨員在許多方面仍然屬於周圍的世界：他的職業關係和社會關係還未絕對地由他的黨籍決定，雖然他會明白——這與純粹的同情者不一樣——在他對黨的忠誠和他的私人生活之間發生衝突時，前者總是產生決定作用。另一方面，一個戰鬥集團的成員會完全同運動一致；他沒有獨立於運動之外的職業和私人生活。正如同情者構成了運動成員周圍的保護牆，向他們呈現外部世界一樣，普通黨員圍護著戰鬥集團，向他們呈現正常的外部世界一樣。

這種結構無疑具有優點，它鈍化了極權主義基本信條之一——世界分成兩大敵對陣營，其中一方就是極權主義運動，而運動能夠而且必須和全世界作戰——的衝擊力，因爲這種主張爲掌權的極權主義政府不加區別的侵略性鋪平了道路。透過一個逐級變化的戰鬥結構，(其中每一個階層都是上級眼裡非極權主義世界的形象，因爲它戰鬥性較差，它的成員組織得不夠徹底)，令人恐怖的極權主義將世界一分爲二的震盪效果受到削弱，未能完全實現；這類組織防止了它的成員直接面對外部世界，使外部世界的敵

意在他們眼裡仍然只是一種純粹的意識形態假設。在層層包圍之下，他們不知非極權主義世界的現實，也常常低估了極權主義政治的巨大危險。

極權主義運動對現狀的抨擊無疑比早先的一切革命政黨所做的更激烈。它們能夠如此激進，明顯地不適合於羣眾組織，這是因爲組織是普通非政治生活的暫時替代物——而這種生活是極權主義實際上想廢除的。整個非政治的社會生活世界——「職業的革命者」或者不得不逃避這個世界，或者必須接受它——在運動中以戰鬥性較弱的羣體的形式存在；在這個按層級結構組成的世界裡，從事征服世界或從事世界革命的戰鬥者們從來不會被「革命」信念和「正常」世界之間矛盾不可避免地產生的震盪所觸及。處於掌權之前的革命階段的運動爲何能吸引如此衆多的「非利斯丁」，原因是他們生活在一個蠢人的正常樂園裡；黨員被同情者的正常世界包圍著，普通黨員的正常世界又包圍了菁英結構。

極權主義形式的另一種優點是它可以無限地複製，使組織永遠處於一種流動狀態，使之經常可以插入新的層級，確定新的戰鬥性程度。納黨的全部歷史可以根據納粹運動內部新的組織形式來重述。衝鋒隊(SA; Sturmabteilung; the storm trooper)（建立於1922年）是納粹的第一個組織，它比納粹黨本身更好鬥；[68]到了 1926 年，黨衛軍(SS)，作爲衝鋒隊裡的精萃而組建起來；三年之後，黨衛軍脫離衝鋒隊，受希姆萊直接指揮；只消幾年，希姆萊就在黨衛軍裡又重複同樣的遊戲。一個接著一個，一個比前一個更好鬥，首先成立的是「突擊隊」(Shock Troops)，[69]然後是「敢死隊」(Dead Head)（係「集中營衛隊」），後來併入「武裝黨衛軍」(Armed SS; Waffen-SS)，最後又成立「保安局」(Security Service)（係「黨內意識形態情報機構」，黨內執行「負人口政策」的機構）和「種族與移民問題辦公室」(Office for Questions of Race and Resettlement; Rasse-und Siedlungswesen)，它的任務是「積極的」。所有這些組織都從黨衛軍中發展而來，它們的成員除了「領袖衛隊」(Fiuh rer Corps)以外，仍然

都只屬文職機構。一般黨衛軍成員和這一切新組織之間的關係，如同衝鋒隊面對黨衛軍一樣，或者像黨員對衝鋒隊員，或者像前鋒組織成員對黨員。[70]現在一般黨衛軍成員不僅受命「保衛……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的化身」，而且要「保護所有的黨衛軍特別幹部不脫離運動。」[70]

這種波動的層級制度經常加進新的層面，權威常常易手，它以秘密的控制機構而出名，即秘密警察或情報機關，爲了控制控制者，就總是需要新的控制。在戰前階段的運動中，還不可能有完全的間諜活動；但是不斷波動的層級制度與秘密警察同樣地使控制手段成爲可能，即使沒有實際上的權力，也有可能削弱任何一個動搖的或表現不像以往那樣激進的階層或羣體，其手段只需插進一個新的、更激進的階層，由此迫使舊有的團體自動地朝前鋒組織的層級下降，離開運動的中心。因此，納粹的菁英結構是黨內的主要組織：衝鋒隊上升到黨內超級地位，使黨失去激進性質，然後又由於同樣原因也由黨衛軍壓倒衝鋒隊。

極權主義菁英結構(elite formation)（尤其是衝鋒隊和黨衛軍）的軍事價值常常被評價過高，而它們在黨內的純粹意義卻有些被忽略了。[70]法西斯的一些穿制服的組織都不是爲了具體的防禦或進攻目的而建立的，儘管通常的說法是以保護領導人或普通黨員爲藉口。[70]納粹和法西斯菁英集團的類軍事形式，是它們作爲針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普遍蔓延的和平主義而建立的「運動的意識形態戰鬥工具」[74]的結果。從極權主義的目標來看，更重要的是作爲「一種進攻態度的表現」[70]建立一支假軍隊，盡可能像和平主義者的假軍隊(bogus army)（和平主義者們不能理解政治團體中的軍隊的憲法地位，他們譴責一切軍事機構是有意識的凶手集團），而不是建立一支訓練有素的士兵組成的軍隊。衝鋒隊和黨衛軍當然是恣意暴力和謀殺的典型組織；它們不像穿黑軍服的德國國防軍那樣訓練有素，也並未有足夠的武裝可以和正規軍對抗。在戰後德國，軍事化宣傳比軍事訓練更普遍，而制服並未使類軍隊提高軍事價值，儘管它們清楚地顯示出

在廢除平民的標準和道德方面是有用的；他們的制服在殺人時多少能在相當的程度上安慰自己的良心，使他們也更容易無條件地服從權威。納粹黨內的這個部分有軍事化的外貌，其主要特點是國家主義和軍事化，因此不能將這些類軍事部隊看作純粹的政黨組織，而是當作一種對國防軍的非法擴展(根據凡爾賽和約條款，軍隊規模是應受限制的)，這個部分首先應當被清除。在納粹掌權之後，衝鋒隊的首領羅姆的確夢想過，並且也談判過將他的衝鋒隊與國防軍合併。希特勒殺死了他，因爲他試圖將納粹新政權改變爲軍事獨裁政府。⑯在此之前幾年，希特勒明確表態，解除了羅姆的職務，認爲納粹運動並不期望這樣一種發展。羅姆是一名眞正的軍人，他在戰場上和在組織國防軍方面富有經驗，因此他認眞地推行軍事訓練計劃。他被解除衝鋒隊首領的職務後，希特勒選擇了毫無軍事經驗的希姆萊擔任黨衛軍的組織者。

菁英組織除了在運動的組織結構中產生重要作用之外，它們構成了運動中變動的戰鬥核心，它們的類軍事性質必須聯繫到政黨中其他專門組織機構來理解，例如涉及教師、律師、學生、大學教授、技術員、工人等等的機構。所有這些機構主要仿照既有的非極權主義職業社會，它們是類職業性質的，就像衝鋒隊是類軍事性質的。歐洲各國共產黨越是明顯地變成莫斯科指揮下的布爾什維克運動分支，它們也就越是利用他們的前鋒組織來和現存的純粹職業羣體競爭。在這一方面，納粹與布爾什維克之間的唯一區別是，納粹公開傾向於認爲這些類職業組織是黨內菁英的一部分，而共產主義者選擇從它們中間招募前鋒組織的成員。運動的重要因素是，即使在它們掌權之前，也使人感到社會的一切成分都在它們的隊伍中有代表。（納粹宣傳的最終目的是將德國民衆組織成爲同情者。）⑯在這種遊戲中，納粹多走了一步，設立了一些假部門，模仿正規的國家機構慣例，例如外交部，教育部，文化部，體育運動部，等等。和模仿軍隊的衝鋒隊一樣，上述機構都沒有職業價值，但是它們在一起創造了外表完美的世界，以虛假

的形式奴隸般地複製非極權主義世界的每一種現實。

這種複製技術對於直接推翻政府而言自然無用，而在積極破壞現存機構、在「使現狀解體」[78]（極權主義組織爲此必不可免地選擇公開顯示暴力）方面卻成果斐然。如果說，運動的任務是「無孔不入地進入一切權力職位」，[78]那麼它們必須隨時占據任何具體的社會職位和政治職位。根據它們對極權統治的要求，非極權主義的社會裡的每一個有組織的團體，都會對運動提出一種具體的挑戰，會摧毀它；可以這麼說，每一個人都需要一種具體的破壞性的工具。當納粹奪取了政權，隨時準備用另一種教師的組織來立即摧毀原有的教師組織，用納粹倡導的律師俱樂部來摧毀原有的律師俱樂部，等等，這時，假組織就顯現出了它的實用價值。它們可以在一夜之間改變德國社會的整個結構——不僅僅是政治生活——這是因爲它們在自己的隊伍中早就確切地準備了相應的結構。在這一方面，當戰爭到了最後階段，正規軍序列被置於黨衛軍將軍們指揮之下時，類軍事組織的任務就結束了。這一「協調」（co-ordination）的技術巧妙而不可抗拒，正如職業標準的退化之迅速和徹底一樣，這些結果在特殊的戰爭領域裡比在其他任何領域裡更能直接地顯現出來。

如果極權主義運動準軍事組織令人懷疑的軍事價值很難說是重要的，那麼它們對正規軍的虛假模仿也一樣。作爲菁英組織，它們比其他團體更嚴重地和外部世界隔開。納粹分子們很早就明白完全好戰和完全脫離正常狀態（normality）之間的密切關係；衝鋒隊從不接受國內的任務，執政以前階段的衝鋒隊領導人和納粹政府中的黨衛軍領導人經常流動更換，因此不可能習慣於普通世界及在其中發展。[78]它們是根據犯罪幫派的模式組織起來的，用於有組織的謀殺。[78]這種謀殺是公開進行的，得到納粹上層的官方承認，以致公開的共謀使其成員即使在非極權主義政府治下，即使不受到同伙的威脅（實際上是受威脅的），也不可能脫離運動。在這一方面，菁英組織的作用和前鋒組織的作用正相反：後者使運動具有一種令人尊敬的氣

氛，並且鼓舞了信心，前者用擴大共謀的方式使每一個黨員意識到，他已永遠離開視謀殺爲非法的正常世界，菁英們所犯的一切罪行中他也有份。[82]這一點即使在掌權前的階段也已經做到了，當時領導者系統地宣布對一切罪行負責，並且相信他們的犯罪是爲了運動的最終的善。

納粹人爲地創造了一種內戰條件，以此爲威脅而走上通向權力之路，其明顯的利益遠遠超過製造麻煩的效果。對於運動來說，有組織的暴力是它的虛構世界四周的許多保護牆中最有效的一種，當一個成員害怕離開運動，遠甚於他的非法活動造成的結果時，當他感到作爲一個運動的成員要比做一名反對者更安全時，這個虛構世界的「現實性」就得到了證明。這種安全感的產生，在於菁英組織用有組織的暴力來保護黨員不接觸外部世界，對於組織內部的虛構世界的完整性來說，安全感與恐懼感一樣重要。

領袖處於運動中心，是使整個運動運行不息的發動機。菁英組織是由合格者組成的內部圈子，在領袖周圍築起一種不透明的神秘氣氛來符合他那「不可觸及的優勢」，並將他隔絕開來。[82]他在這個緊密的小圈子中的地位取決於他在小圈子成員中玩弄計謀的能力和他經常更換部下的技巧。他上升至領袖地位，依靠的是一種處理黨內權力鬥爭的極端能力，而不是煽動家或官僚組織的性質。他與先前各類獨裁者之間的不同之處是他很少通過簡單的暴力來取得勝利。希特勒不需要衝鋒隊和黨衛軍來保障他在納粹運動中的領袖地位；相反，羅姆是衝鋒隊首領，能夠依賴衝鋒隊對他個人的忠誠，卻成了希特勒的黨內敵人之一。斯大林戰勝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羣衆中更有魅力，而且作爲紅軍總司令，手中握有當時蘇俄最大的潛在權力。[82]再者，俄國革命中最有組織天才的、最能幹的官僚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82]另一方面，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處理具體問題的能手，在他們的初期生涯中都致力於人事問題，所以幾年後，留在重要的位置上的人幾乎全倚仗他的恩賜。[82]

然而，這種個人能力儘管在此類生涯的最初階段，是一種絕對的先決

條件甚至在以後也同樣重要，但是當一種極權主義運動建立起來之後，確立了「領袖的意志就是黨的法律」時，當它的全部層級制度出於一種簡單目的而有效地訓練成功、能迅速地將領袖的意志傳達給一切階層時，個人能力就不再具決定性作用。達到了上述目標之後，領袖就不可取代了，因爲運動的整個複雜結構會由於缺少他的指揮而失去存在的理由。這樣，儘管永遠會有內部陰謀集團，永遠會有人事變動，他們積聚了巨大的仇恨、痛苦和怨怒，領袖的地位仍能在一次次混亂的宮廷革命中保持穩定，這並非由於他的超人天賦(他周圍最密切的人常常對此並不抱有幻想)，而是因爲這些人眞誠地、有意識地相信，若沒有他，一切都會在頃刻之間失去。

領袖的最高任務是使運動中每一個層次的雙重功能特點得到體現——作爲運動抵抗外部世界的奇妙防線，同時又是運動與外部世界之間的橋樑。領袖代表運動，其方式完全不同於一切普通的政黨領袖；他宣稱，他以官方的身分替任何一名成員或官員的行動或錯誤行爲負個人責任。這種完全負責的做法，是所謂領袖原則在組織方面的最重要原則，據此，每一名官員不僅由領袖指定，而且也是他的活的化身，每一道命令似乎都發自這一永恆的來源。領袖與每一個由他指定的下級領導人之間完全一致，壟斷一切責任，這也是極權主義領袖與一個普通獨裁者和暴君之間最顯著的關鍵區別。一個暴君絕不會將自己與下屬等同，更不用說包攬他們的行爲了；⑰他也許會利用他們做代罪羔羊，爲了使自己擺脫民衆的憤怒，他會很樂於見到他們受批評，他總是與他的所有下屬和臣民保持一段絕對的距離。相反，極權主義領袖不能容忍別人批評他的下屬，因爲他們總是以他的名義行動；如果他要糾正自己的錯誤，他就必須淸除犯下這些錯誤的人；如果他要將自己的錯誤歸咎於別人，他就必須殺死他們。⑰因爲在這種組織結構內，一個錯誤只能是一種騙局：騙子化身爲領袖。

對運動所做的一切事情負全部責任，它與它的每一個官員之間完全一致，這導致了非常實際的結果，使誰也不曾經歷過一種情況，也就是必須

對自己的行動負責，或者解釋這些行動的理由。由於領袖壟斷了解釋的權利和可能性，所以在外部世界看來，只有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是運動的唯一代表，人們仍能用非極權主義的語言和他談話，如果他受到責備或反對，他不可以說：別問我，去問領袖。領袖處於運動的中心，他可以表現得高於運動。因此，當局外人必須和極權主義運動或政府打交道時，一再將他們的希望寄托在和領袖本人的私下談話上，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無用的）。眞正的極權主義領袖神話是在組織之中，組織使他有可能聲稱對運動的菁英組織所犯的一切罪行完全負責，同時也有可能獲得最天眞的同路人眞誠而天眞地尊敬。[89]

極權主義運動曾被稱爲「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的秘密會社」。[89]的確，我們很少知道秘密團體的社會結構和近期歷史，運動的結構在先前的黨派歷史上未曾有過，只能讓人聯想起秘密社團的某些突出特徵。[89]秘密會社(secret society)也根據「加入」(initiation)的程度而形成層級，根據一種秘密的虛構假設來規範其成員的生活，使一切事物看上去就像別的東西一樣，採取前後連貫的欺騙策略，欺騙未加入的外部羣眾，要求加入運動的成員盲目服從，使他們效忠於往往不認識的、一向十分神秘的領袖，領袖本人被一小羣最初加入運動的人包圍著，這些人周圍是後加入者(half-initiated)，後來者來自一個「緩衝地帶」，它反對充滿敵意的世俗世界。[89]極權主義運動像秘密會社一樣，也將世界分成兩部分：「歃血爲盟的兄弟們」和隱藏不明的大批死敵。[89]以絕對敵視周圍世界的態度爲基礎的劃分界線，這與普通政黨將人劃分成「屬於」和「不屬於」的傾向做法大不相同。政黨和一般的公開社團只認爲那些公開反對它們的人是敵人，而秘密會社的原則一向是「凡是不公開表明歸屬的人都應排除在外」。[89]這種秘密原則對於羣眾組織似乎完全不適用；但是納粹至少使它的成員在加入時舉行一種與秘密會社在心理上產生相同效果的儀式，他們不是簡單地排斥猶太人，而是要求其成員證明自己的非猶太血統，建立了一種複雜的機器，透視八千

萬德國人祖系不淸的狀況。這當然是一齣喜劇，而且代價昂貴，它讓八千萬德國人行動起來，去查找自己祖先中有無猶太人；結果每一個人通過檢查後都感到，他屬於一個可靠的羣體，反對想像之中各種不合格的人。布爾什維克運動也證實了同樣的原則，通過黨內的反覆整肅，使每一個不被排除在外的人都再次肯定自己屬於羣體之內。

秘密會社與極權主義運動之間最吸引人的相同點是儀式的作用。在這一方面，莫斯科紅場的遊行在性質上與紐倫堡的慶祝政黨生日的盛大禮節完全一樣。在納粹儀式的中心是一面所謂「鮮血的旗幟」，布爾什維克儀式的中心是列寧的遺體，兩者都在儀式中注入崇拜偶像這一強有力的因素。這種偶像崇拜很難證明——正如有時被認爲那樣——是假宗教或異教傾向。「偶像」只是一種組織手段，在秘密會社中常用，也常用於以可怕的、令人恐懼的象徵物來威嚇其成員保守秘密。很明顯，人們是通過一種秘密儀式的共同經歷（而不是共享秘密本身）來更安全地團結在一起。極權主義運動的秘密即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不一定改變那種經驗的性質。[95]

這些相同之處當然絕非偶然；它們絕不能簡單地被解釋爲由於希特勒和斯大林在成爲極權主義領袖之前都曾是現代秘密會社成員——希特勒曾是國防軍秘密警察，斯大林是布爾什維克黨的密謀組織成員。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極權主義陰謀虛構的自然結果，建立極權主義組織的目的可能針對秘密團體——猶太人的秘密社會或托洛茨基陰謀集團。極權主義組織中引人注目的是，它們可以不將自己的目標當作秘密來隱藏，而採取許多秘密會社的組織手段。納粹想要征服世界，驅逐「異族」，消滅「可怕的生物遺傳」；布爾什維克致力於世界革命，這從來就不是秘密；相反，這些目的一向是它們的宣傳內容。換言之，極權主義運動模仿秘密會社的一切裝飾，唯獨放棄一條爲自己的方法辯解的途徑——保守秘密的需要。

納粹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因此儘管歷史起源十分不同，卻在組織手段方面達到了同樣的結果。納粹在開始時虛構一個陰謀，並且多少有意識地

模仿「錫安長老們」秘密團體的例子，而布爾什維克來自革命政黨，它的目標是一黨專政，經過了一個政黨「完全游離並且在一切之上」的階段，達到黨的政治局「完全游離並且在一切之上」；[95]最後，斯大林將密謀組織嚴厲的極權統治強加給這種政黨結構，直到此時，才發現需要用一種中心的虛構來維持羣眾組織條件下一個秘密會社的鐵的紀律。納粹的發展也許更符合本身的邏輯，但是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提供了一幅更好的畫面，顯示極權主義的虛構本質，因爲布爾什維克所反對及所根據的一種虛構的世界陰謀，在意識形態上並不固定。這種陰謀一直在改變——從托洛茨基派到三百個家族，再到各種「帝國主義」以及「無根的世界主義」——而且根據需要而調整；在大多數情況下，沒有這種虛構，布爾什維主義就不能成立。

斯大林將俄國的一黨專政改變爲極權主義政權，將全世界革命的共產主義政黨改變爲極權主義運動，其手段就是清除宗派，廢除黨內民主，將各國共產黨改造成由莫斯科指揮的共產國際各個支部。秘密會社，特別是革命政黨的陰謀工具，其特點一向就是沒有宗派，鎮壓不同政見，絕對中央化的領導。這一切措施都有明顯的功利主義目的，即保護其成員不受傷害，保護會社不受背叛的危害；要求每一個成員完全服從，使絕對權力掌握在首領手中，這些都只不過是實踐中必不可免的副產品。但是，麻煩在於陰謀者們有一種可以理解的傾向，認爲一般政治中最有效的方法是組織密謀式會社，如果誰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應用，用全國的暴力工具來支持這些方法，就有可能無限地積聚權力。[96]一個革命政黨中的密謀策劃部門可以和一個完整的政體中軍隊的角色相結合，只要政黨本身仍是完整的：儘管它自己的行爲規則與民政的規則大不相同，它爲政黨服務，從屬於政黨，並且由政黨控制。當軍隊不再爲政體服務，而是想控制政體時，就產生了軍事獨裁的危險，同樣地，當一個革命政黨中的密謀策劃部門從政黨的控制下解放了自身，獲得領導地位時，也就產生了極權主義的危險。斯大林政權下共產黨發生的就是這種情況。斯大林的方法一向是黨內密謀策劃部

門使用的典型方法：他專注於細節，強調政治中的個人面，無情地利用及消滅同志與朋友。在列寧去世後，在一系列鬥爭中，他的主要支持者是秘密警察，[98]秘密警察在當時早已成爲黨內最重要、最有權力的部門之一。[98]契卡(Cheka)自然會同情密謀策劃部門的代表，那個早已將之看成一個秘密團體，因此想保持並擴大其特權的人。

但是，用密謀策劃部門來掌握共產黨，這僅僅是向極權主義運動轉化的第一步。俄國秘密警察及其在國外共產黨裡的代理人在運動中扮演的角色，如同希特勒在類軍隊中組建的菁英組織一樣，但是這還不夠。假如秘密警察的統治保持穩定狀態，那麼政黨本身就必須改變。結果，清除宗派和取消黨內民主這件事，在俄國伴隨著大批政治上未受過教育的羣眾加入共產黨，這種統一戰線政策很快被各國共產黨仿效。

納粹極權主義從羣眾組織開始起步，後來漸漸地被菁英組織控制，而布爾什維克卻從菁英組織開始起步，然後組織羣眾。兩者的結果是一樣的。另外，納粹由於他們的軍事傳統，從一開始起就按照軍隊的模式和偏見來組建菁英組織，而布爾什維克從一開始起就由秘密警察來行使最高權力。然而在幾年之後，這種區別就消失了：黨衛軍首領變成了秘密警察首腦，黨衛軍組織逐漸併入並且取代了蓋世太保先前的人員，即使這些人員早已由可靠的納粹分子所組成。[98]

正是由於一個密謀者的秘密會社的功能和與之對抗而組織的秘密警察兩者之間本質上的親和性，使基於一種虛構的世界陰謀及以統治全世界爲目標的極權主義政府，最終集中一切力量於警察之手。但是，在它掌權之前階段，「光天化日之下的秘密會社」提供了其他一些組織工作方面的優點。羣眾組織和唯一可以信任其保密能力的排外性社團之間的明顯矛盾，比起密謀會社可以將極權意識形態的兩分法——羣眾對現存社會的盲目敵視，而無視社會中的歧異和差別——變成一種組織原則這一點相比，前者相形見絀。一個組織的作用依據於「凡是不歸屬者都應排除」、「誰不贊成我就

是反對我」的原則，從這樣一個組織的觀點出發，世界普遍地失去了一切細微的差別、差異和多元化，對於失去地位和方向的羣眾來說，這個世界的一切事情都是混亂的、難以容忍的。[101]秘密會社的成員毫不動搖的忠誠給予他們的啓發，不如那種區分「我們」和一切其他人的秘密更能鼓舞他們。這一點可以用模仿秘密會社的組織結構，取消它那種理性地保密目的來達到。如果密謀意識形態是這種事情的發展源頭，例如像納粹那樣，或者寄生在一個革命政黨中密謀部門，例如像布爾什維克那樣，其實也都無關緊要。極權主義組織的天生要求是運動之外的一切事物都「走向死亡」，這種要求在極權統治的有害條件下完全實現，但是即使在掌權以前階段，對羣眾而言也似乎十分有理，他們從分崩離析和迷失方向中逃進了運動的虛構家園。

極權主義運動一再證明了它們能夠同樣地掌握其成員的誓死忠誠，這一向是秘密會社的秘密特徵。[102]一支像衝鋒隊這樣徹底訓練和武裝的軍隊，面對著敬愛的首領（羅姆）和幾百名親密戰友被謀殺，居然不抵抗，這眞是一種奇怪的狀況。在當時，國防軍的力量支持的可能是羅姆，而不是希特勒。但是納粹運動的這些事件現在不爲人注目，人們過於注意了布爾什維克黨內自我告白的「罪犯」不斷重複出現的景象。根據荒謬的告白舉行的審判，成爲一種在內部成員看來非常重要、外人看來不可理喩的儀式。但是，無論今天如何製造犧牲品，這種儀式最初可能出現於 1936 年老布爾什維克衛士的並非揑造的告白。早在莫斯科大審判之前很久，被判處死刑的人會很平靜地接受判決，這種態度「在契卡成員中間特別流行」。[103]只要運動還存在，它的特殊組織形式就能保證至少使菁英組織不再相信一羣緊密團結的人之外的生活，他們即使被判罪，仍然覺得高於其餘未參加他們組織的人。由於這個組織的全部目的總是欺騙、戰鬥和征服外部世界，它的成員們情願付出生命，只要此舉能再次有助於欺騙世界。[104]

但是，秘密團體或密謀會社的組織結構和出於羣眾組織目標的道德標

準的主要價値，並不在於天然保障無條件的從屬和忠誠的內在保證，以及有組織地表現出對外部世界的盲目仇恨，而在於它們通過連續一貫的謊言來建立和維護虛構世界至高無上的能力。極權主義運動的整個層級結構，從無知的同路人到黨員、菁英組織、領袖周圍親密的小圈子、領袖本人，都可以被描述爲一種由易受欺騙(gullibility)和犬儒(cynicism)等不同態度的奇特混合，其中每一個成員依據他的階層和在運動中所處的地位，對領袖反覆無常的謊言和運動的中心永遠不變的意識形態虛構應該作出反應。

在暴民變成每日的羣眾現象之前，易受欺騙和憤世嘲弄的犬儒態度是暴民心態的顯著特點。在一個變化無常和難以理解的世界裡，羣眾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他們會同時相信一切和什麼都不相信，認爲一切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眞實。這種混合本身已足夠顯著，因爲它招致幻覺的終結，易受欺騙是不善懷疑的原始人之弱點，而犬儒卻是最高級的精明頭腦的惡習。羣眾宣傳發現它的聽眾都隨時準備相信最壞的東西，無論它多麼荒謬；他們並不特別地肯受欺騙，因爲他們認爲每一種宣言無論如何都是一種謊言。極權主義的羣眾領袖們從事宣傳的基礎是正確的心理學假設，即在此類條件下，可以在今天使人們相信最瘋狂的說法，並且相信，如果明天得到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這些說法是假的，他們就會遁入犬儒；如果領袖們對他們說謊，他們不會離開領袖，而是抗議說，他們什麼都知道，這宣言是謊言，但同時又佩服領袖們高超而聰明的手法。

羣眾作爲聽眾而能夠顯示的反應，變成了羣眾組織的一種重要的層級原則。易受欺騙和犬儒態度的混合流行於極權主義運動的一切階層，層次越高，犬儒態度就越是壓倒易受欺騙的情形。從同路人到領袖，一切階層的基本信念是：政治是一場欺騙遊戲，運動的「第一條誡律」是「領袖永遠正確」，這對於世界政治（即世界性欺騙）的目的而言是必要的，正如軍事原理的規則對於戰爭之目的是必要的一樣。[105]

極權主義運動產生、組織、傳播巨大謊言的機器也依靠領袖的地位。宣

傳聲稱，一切發生的事物根據自然規律或經濟規律是可以科學地預測的，極權主義組織又爲之增加一種觀點，說一個人若掌握了這種知識及其主要特性，他就是「正確的，而且永遠正確。」[105]對於極權主義運動的一個成員來說，這種知識和眞理無關，這種正確和客觀眞實性無關，領袖之宣言正確與否，不由事實證明，而由未來之成功或失敗來證實。領袖的行動總是正確，既然這些行動是爲往後幾百年而設計的，那麼，對他所做的一切的最終檢驗就不受他同時代人的經驗之約束了。[106]

假定能忠實地、逐字逐句地相信領袖言論的唯一團體是「同情者」，他們的信心使運動蒙上一層忠貞和頭腦簡單的氣氛，幫助領袖完成他的一半任務，即激發運動的信心。黨員們從來不相信公眾言論，不應該相信，而是對於其優越智能的極權主義宣傳，將他們和非極權主義的外部世界區分開來，因而受到恭維，而所謂的外部世界，他們只能從同情者易受欺騙的反常現象中認識。當希特勒在魏瑪共和的最高法庭面前作著名的法律宣誓時，只有納粹的同情者相信他；運動的成員淸楚地知道他在撒謊，但是比以往更信任他，因爲他顯然能夠愚弄公眾輿論和當局。後來希特勒又在全世界重複這一套表演，他發誓他用意良善，同時卻最公開地準備犯罪，但此時此刻，納粹卻受到人們很自然的無限佩服。同樣地，在戰爭期間，只有布爾什維克的同路人才相信共產國際的解散，只有俄國民眾中尚無組織起來的羣眾和外國的同路人，才會去相信斯大林贊同民主的言論。布爾什維克黨員們明確地得到警告說，別受策略行動的愚弄，他們應該欽佩領袖背叛盟國的精明做法。[106]

運動在組織結構上若無分成菁英組織、黨員、同情者，領袖的謊言就不會生效。在一種輕蔑態度的層級制度中表現出各種程度的消極嘲諷，至少在面對經常的駁斥時，是像普通的易受欺騙一樣必要。問題在於，前鋒組織中的同情者蔑視其他公民們完全缺乏積極性，黨員蔑視同路人易受欺騙和不激進，菁英組織同樣地蔑視黨員，而在菁英組織內部，隨著新結構

的建立和發展，同樣會依層級而蔑視菁英組織。⓭這種體系的結果是，同情者們易受欺騙，使謊言在外部世界看來是可信的，而在同時，黨員和菁英集團不同程度的犬儒態度卻解除了領袖被迫面臨的危險壓力，即他自己的宣傳必須言辭漂亮，裝出令人尊敬的模樣。外部世界在對付極權主義制度時的主要缺陷之一是它忽略了這種制度，因此信以為極權主義謊言之大一方面可以使之不攻自破，另一方面可以利用領袖的話（無論他的本意如何）來迫使他做好事。不幸的是，極權主義制度的偽善不會達到上述結果；它的巧妙之處恰恰在於取消了或者可以揭露謊言、或者可迫使領袖言行一致的現實。

黨員不相信為羣眾發表的言論，但是十分相信意識形態解釋的標準陳詞濫調，相信極權主義運動從十九世紀意識形態中得來的對過去與未來歷史的答案，並且通過組織手段將它們轉化為有效的現實。羣眾已經相信的這些意識形態成分，儘管相當模糊和抽象，卻轉變成謊言中的事實，具有完全可以理解的性質（例如不顧一般的種族理論而相信猶太人統治世界，無視一般的階級理論而相信華爾街陰謀論），並且納入總體行動綱領，似乎只有「垂死者」——資本主義國家的垂死階級或沒落的國家——才阻礙著運動的發展。與每日不同的運動謊言策略相比，這些意識形態謊言可以被看作是神聖的、不可觸及的眞理。它們的周圍是仔細編織的一系列「科學的」證明，當然並不一定要說服完全「無關之人」，但是仍用「顯示」猶太人的可怕之處或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們生活的苦難，來迎合某些人對知識的庸俗渴求。

菁英組織與普通黨員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並不需要看到這些內容，甚至也不需要相信意識形態陳詞濫調的字面眞理。這些都是編造來回應羣眾對眞理之探求的，它們不斷解釋和顯示的內容，與正常世界仍有許多共同之處。菁英階層並非由意識形態專家組成；對其成員的全部教育，目的是消除他們區別眞理與謬誤、現實與虛構的能力。他們的優勢是有能力將每

一種事實的陳述直接溶入目標宣言。羣眾成員需要事先知道猶太種族的可怕，才能保證叫他們去殺死猶太人，菁英組織卻理解那種說法——一切猶太人都是可怕的——意味著應該殺死一切猶太人；他們懂得，當他們聽說只有莫斯科才有地下鐵路，這句話的眞正含義是：應該摧毀其他一切地下鐵路，當他們發現巴黎有地下鐵路時，不一定會感到驚奇。當紅軍在征服歐洲的路上遭到失敗，幻滅的巨大震盪只有用集中營和大部分占領軍被迫撤退才能平復；但是與軍隊相配合的警察組織對於這種震蕩是有所準備的，這並非由於得到不同的和更準確的消息——蘇俄沒有秘密訓練學校可以接觸關於國外生活的正確事實——而只是由於一種一般的訓練，使他們極其蔑視一切事實和現實。

菁英的這種心理狀態並非單純的羣眾現象，並非社會失根、經濟災難和政治無政府主義的單純結果；它需要謹愼的準備和培養，形成極權主義幹部學校、納粹的黨衛軍奧登斯堡學校(Ordensburgen)、布爾什維克的共產主義國際代表訓練中心的一種更重要的課程,儘管這種課程不很明顯,但是比灌輸種族思想和傳授內戰訣竅更重要。若無菁英與由人爲造成的不懂事實、不能區別眞理和謬誤,運動就不可能向著實現它的虛構方向發展。極權主義菁英傑出的負面性格是，它從不停止思考世界的眞相，從不將謊言和眞理作比較。相應地，它最値得珍視的美德是忠於領袖，領袖像一個護身符，保證謊言的最後勝利，虛構終將戰勝眞理與現實。

極權主義運動的最上層組織是領袖周圍最密切的圈子，它可以是一個正式機構，像布爾什維克的政治局，或者是一個變動的人員集團，他們不一定要占據職位，例如希特勒的隨從。對於他們來說，意識形態的陳詞濫調只是一種組織羣眾的手段，只要組織原則仍有活力，他們不在乎根據情況需要而使自己發生變動。在這一方面，希姆萊的黨衛軍組織的主要優點是他發現了一種非常簡單的方法來「解決行動中的血緣問題」，即根據「優秀血統」來選擇菁英成員，讓他們「執行一種無情的種族鬥爭」，以反對一

切無法追溯「亞利安」祖先至 1750 年的人，或者身高不足五英尺八英寸的人（「我知道，凡是長到一定高度的人，一定擁有某種程度的理想血統」），或者並非藍眼金髮的人。[110]這種種族主義行動的重要意義在於它的組織活動獨立於任何一種種族「學說」的全部具體教條，也獨立於與猶太人的天性與角色有關的、作爲一種具體教義的反猶主義，猶太人的有用之處隨著他們人被消滅也就結束了。[110]一旦由「種族委員會」（race commission）挑選出一名菁英，將他置於一種特殊的「婚姻法」(marriage laws)管轄之下，種族主義就處於安全之中，不受宣傳必須具備的科學合理性的約束，[110]而在相反的一頭；在這種「菁英種族」的法律之下，集中營的存在是爲了「更好地顯示遺傳和種族法則」。[110]依靠這種「有活力的組織」的力量，納粹可以避免教條主義，向猶太人提供友誼，就像對待阿拉伯人一樣，或者和「黃禍」（Yellow Peril)的代表日本人結盟。種族社會的現實，從據說根據種族觀點選出的菁英組織，都確實很能維護種族理論，比精確的科學證據或假科學證據更有力。

布爾什維主義政策制訂者同樣比他們自己的立誓教義更高明。他們很能夠中斷每一種既存的階級鬥爭，突然和資本主義結盟，而不會破壞幹部隊伍的可靠性或者違背他們關於階級鬥爭的信念。階級鬥爭的二分法原理變成了一種組織手段，本身僵化到無法妥協地和整個世界敵對，通過俄國的秘密警察幹部與共產國際國外代表，布爾什維克的政策明顯地變得沒有「偏見」。

極權主義層級制度中的最高階層的特點正是不受它們自己的意識形態內容的束縛。這些人根據組織來思考一切事物和一切人，其中包括領袖，在他們看來，領袖既不是一個令人鼓舞的護身符，也不是一個永遠的人，而是這類組織的簡單結果；他的確不是作爲一個人，而是作爲一種功能，是運動中不可或缺的。但是，和其他專制形式(常常是一個集團實施統治，而暴君只扮演一個傀儡統治者的代表角色）相比，極權主義領袖事實上可以

隨心所欲，可以依賴隨從們的忠誠，甚至可以作出殺死他們的選擇。

這種自殺性的忠誠的具體原因是，最高職位之繼承並非由繼承法或其他法律規定的。成功的宮廷政變會對運動整體帶來災難性的結果，就像一場軍事失敗一樣。由於運動的性質，一旦領袖獲得執政權，整個組織就絕對地和他一致，若承認一項錯誤，或者喪失執政權，就會打破永遠無誤的神話，使領袖職位周圍的人一起失敗，一切與運動有關的人也會遭受毀滅的噩運。這種結構的基礎並非領袖的言論之眞理性，而是他的行動永遠無誤。若無這一條，在假設永遠無誤的激烈辯論中，極權主義的整個虛構世界就會四分五裂，立即被眞實世界的事實戰勝。只有領袖才能防止分裂和失敗，使運動朝著永遠無誤的正確方向前進。

但是，那些既不相信意識形態陳詞濫調、又不相信領袖永遠無誤的人，他們的忠誠另有深刻的原因。堅定地、眞誠地相信人類無所不能的信念使他們緊密聚集在一起。他們道德的犬儒，相信任何事物都是被允許的，這些態度的基礎都在於堅定地相信「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的確，這批人的人數很少，很難會發現他們在具體問題上說謊，他們不一定會相信種族主義和經濟學，也不一定會相信什麼猶太人或華爾街的陰謀之類。然而他們也是受欺騙者，他們誤以爲可以做一切事情，一切障礙都是暫時的，上級組織必定能擊破這些障礙。他們充滿信心地認爲，組織的力量可以摧毀物質的力量，(好比是一羣有良好組織的匪幫可以用暴力劫掠一個防衛很差的富人的財產，)因此常常低估了穩定社會的巨大力量，又太高估了運動的推動力。還有，由於他們實際上不相信眞的存在一種反對他們的世界性陰謀，而只是利用它作爲一種組織手段，他們就不會懂得，他們自己的陰謀最終會引起全世界聯合起來反對他們。

但是，無論這種人類透過組織而變得萬能的幻想最終如何受挫，在運動內部，它的實際結果是使領袖周圍的追隨者在和他意見分歧時，必然懷疑他們自己的觀點，因爲他們眞誠地相信，他們的意見無足輕重，只要組

織得當，即使最瘋狂的手段也有很好的成功機會。他們的忠誠不在於他們相信領袖永遠無誤，而是相信任何人只要用高超的極權主義組織方法來指揮暴力工具，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當極權主義政府擁有權力，顯示出成功與失敗的相對性，並且顯示物質上的失敗可以變成組織上的收穫時，就極大地增強了這些人的幻覺。(蘇俄工業活動發瘋似的錯誤管理導致工人階級的分化；納粹占領東歐各國時可怕地虐待平民囚徒，儘管造成了「勞動力的可悲損失」，「考慮到後代人，還是值得的」。⓮)再者，在極權主義環境裡，事關成敗的決策大多事關有組織的、令人恐怖的公眾輿論。在一個完全虛構的世界裡，不必記錄、承認和回憶失敗。實相若要繼續存在，必須取決於非極權主義世界的存在。

註釋

❶例如科恩-布拉姆斯坦特，《專政與政治警察：用恐懼實施控制的技巧》(倫敦，1945，164頁及其後) 解釋說，「若無宣傳，恐怖就會失去大部分心理效果，若無恐怖，宣傳就無法包含力量。」(175頁) 這一類說法忽略了一點循環影響的事實，即不僅是政治宣傳，而且現代的大眾宣傳都包含了一種威脅的成分；另一方面，即使不用宣傳，恐怖也一樣有效，只要它僅是一種暴政的傳統政治恐怖。只有當恐怖的意圖不僅從外部、而且從內部脅迫時，當政府所要的不只是權力時，恐怖才需要宣傳。在這個意義上，納粹理論家歐根·哈達莫夫斯基(Eugen Hadamovsky)才可能在《宣傳與國家政權》(*Propaganda und nationale Macht*) (1933) 中這樣說：「宣傳與暴力從來不會互相矛盾。使用暴力可以成爲宣傳的一部分。」(22頁)

❷「當時，官方宣布在蘇聯已『消滅』了失業現象。這種宣傳的結果是同樣地『消滅』了一切失業者的福利。」(安東·西利加，《俄國之謎》，倫敦，1940，109頁。)

❷所謂「草堆行動」(Operation Hay)開始於1942年2月16日希姆萊的一道命

令，「關於波蘭的德國血統（個人）」，他們的孩子應該送到「出於熱愛他們的優秀血統而願意毫無保留地接受他們」的家庭去。（紐倫堡文件 R 135）1944 年 6 月，陸軍第九軍綁架了四萬至五萬名兒童，並將他們運送到德國。一個名叫勃蘭登伯格的人向柏林的軍隊總參謀部報告這件事時，提到要在烏克蘭執行同樣的計劃。（紐倫堡文件 PS 031；收於波利雅可夫，《仇恨的豐收》）希姆萊本人幾次談到這個計劃。（參見《納粹陰謀與侵略》，第 3 卷，其中包含 1942 年 3 月希姆萊在克拉科夫〔Cracow〕的演講片段；亦見科恩·布拉姆斯坦特，前引書，244 頁）至於這些兒童是如何被挑選的，可見諸於 1942 年 8 月 10 日明斯克第二醫院所做的醫療證書：「娜塔莉・哈普夫(Natalie Harpf)，1922 年 8 月 14 日生，種族檢查證明其爲發育良好之女孩，屬東波羅的海類型，帶亞利安人特徵。」「阿諾德・康尼斯(Arnold Cornies)，1930 年 2 月 19 日生，種族檢查證明其爲發育良好之男孩，年十二歲，屬東歐類型，帶亞利安人特徵。」後有醫生簽名。（紐約意地緒學術研究所檔案）

根據希特勒的觀點，可以「毫無內疚地消滅」波蘭知識分子。（波利雅可夫，前引書，321 頁）

❹參見《希特勒的餐桌談話》。直到 1942 年夏天，他仍在談論「將最後一個猶太人踢出歐洲」（113 頁），將他們重新安置在西伯利亞或非洲（331 頁），或者馬達加斯加，而在實際上，他早在侵入俄國之前，可能在 1940 年就已決定「最後解決」，並下令於 1941 年秋天之前建立毒氣室。（見《納粹陰謀與侵略》，第 2 卷、第 3 卷及第 5 卷）希姆萊早在 1941 年春天就知道「到戰爭結束時，要滅絕猶太人到最後一個人。這是領袖的明確無疑的欲望和命令。」（猶太文件檔案中心克斯頓檔案）

❺與此相關的有一份非常有意思的報告，內容是 1940 年 7 月 16 日在希特勒總部的一場討論，拉默斯(Hans Heinrich Lammers)和凱特爾(Wilhelm Keitel)、羅森伯格在場，希特勒一開始就陳述「基本原則」：「現在重要的是在全世界面前不要擺出我們的最終目的；……因此不要太明顯地（使在占領區維持和平與秩序的命令）指向最後解決方案。一切必要的措施——處決、移民

——可以在避開這一點時執行。」接下來的討論，希特勒未參加，他們也未討論希特勒的話。很明顯，他們沒有「理解」希特勒的意思。(同上，文件 L 221)

❻斯大林相信希特勒不會進攻俄國。參見艾薩克・多伊奇，《斯大林政治傳記》，454 頁，尤見 458 頁註釋：「只是到了 1948 年，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副總理沃茲涅申斯基(N. Voznesensky)說，1941 年第三季度的經濟計劃是以和平時期爲基礎，而適應戰爭的新計劃的起草是在爆發敵對之後。」多伊奇的估計現在被赫魯曉夫報告中關於斯大林對德國進攻蘇聯的反應完全證實了。

❼「(集中營裡的) 教育包括紀律，但是從來沒有以意識形態爲基礎的指導，因爲囚犯大多只有奴隸般的靈魂。」(希姆萊語，見《納粹的陰謀》，第 4 卷，616 頁)

❽歐根・哈達莫夫斯基的前引書在論述極權主義宣傳的文獻中是一部傑作。哈達莫夫斯基並未明確指出，但在對希特勒本人在〈宣傳與組織〉(Propaganda and Organization)對這個主題的論述 (《我的奮鬥》，第 2 卷，第 11 章) 的解釋中提供了一種聰明而有揭示性意義的觀點，他的觀點是納粹主義的。亦可參見西克斯(F. A. Six)的《德國國社黨權力鬥爭的政治宣傳》(*Die politische Propaganda der NSDAP im Kampf um die Macht*) (1936)，21 頁及其後。

❽希特勒對「戰爭宣傳」的分析 (《我的奮鬥》，第 1 卷，第 6 章) 強調宣傳的商業角度，並且運用了肥皂廣告的例子。它的重要性普遍被高估，而他對「宣傳與組織」的實證觀點卻被忽略了。

❽參見《納粹的陰謀》，第 6 卷，1036 頁，馬丁・波爾曼(Martin Bormann)對「國家社會主義與基督教之關係」的重要記錄。黨衛軍爲向其成員「灌輸意識形態」而散發的小冊子中也一再可發現同樣的公式。「自然規律服從於一種不可更改的意志，它不會受影響。因此有必要認識這些規律。」這些話其實都是《我的奮鬥》中某些句子的翻版，其中有一句被引用作爲格言：「當人企圖和自然的鐵一樣的邏輯鬥爭時，他就和基本原則發生了衝突，而人之作爲人存在，正是由於這些基本原則。」

❽斯大林，《列寧主義》(1933)，第 2 卷，第 3 章。

❽埃利克・伏格林(Eric Voegelin)，〈科學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Scientism)，載《社會研究》，1948年12月。

⑬海耶克，〈科學主義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tism)，載《經濟學》，第8卷，1941年2月、5月及8月，13頁。

⑭同上，137頁。引文來自聖·西門派(Saint-Simonist)的雜誌《生產者》(*Producteur*)，第1卷，399頁。

⑮伏格林，前引書。

⑯威廉·埃本斯坦(William Ebenstein)，《納粹國家》(*The Nazi State*)(紐約，1943)談到「納粹國家的長期戰時經濟」，他幾乎是批評家中唯一明白這一點的人，他說：「沒完沒了地討論納粹政府的德國經濟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性質，大多脫離實際，因爲其中忽略了一個重大事實，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與西方福利經濟有關，只不過是類型不同而已。」(239頁)

⑰希特勒指控執行無痛苦死亡計劃的醫生之一卡爾·勃蘭特(Karl Brandt)的證詞在這一方面是很典型的。(參見1947年5月14日，《醫學的審判》〔*Medical Trial*〕美國對卡爾·勃蘭特等人的指控。)勃蘭特激烈地提出抗議，否認此計劃的動機是消滅多餘的食品消費者，他強調，指出這種論點的納粹黨員們一向受到嚴厲指責。他說，這些措施僅出於「道德上的考慮」。當然，驅逐出境的目的也一樣。檔案裡充斥著軍方備忘錄的一味抱怨，說驅逐幾百萬名猶太人和波蘭人是完全不顧一切「軍事和經濟的需要」。(參見波利雅可夫，前引書，以及相關的文件資料。)

⑱希特勒於1939年9月1日簽署這份開始大規模屠殺的決定性命令，當日戰爭爆發。文件不光提到精神病人，還包括一切「難以治癒者」，精神病人僅是要處理的第一批人。

⑲見弗里德里希·珀西伐爾·萊克—馬萊采文(Friedrich Percyval Reck-Malleczewen)，《絕望日記》(*Tagebuch eines Verzweifelten*)(斯圖加特，1947)，190頁。

⑳希特勒置意識形態運動於政黨之上的基礎是，意識形態一向「宣稱它們永遠無誤」。(《我的奮鬥》，第2卷，第5章)「希特勒青年團」官方手冊《納粹之本》(*The*

Nazi Primer)(紐約, 1938)的最初幾頁也強調, 世界觀的一切問題原本是「不實際」和「難以理解」,「現在很清楚、很簡單、很**明確**, 每一個同志都能理解它們, 並且協力解決它們。」

㉑最初的「黨員誓言」中說:「領袖永遠是正確的。」這句話出現在 1936 年《國社黨組織手册》(*Organizationsbuch der NSDAP*), 8 頁。但是 1932 年服務手册中的說法却是「希特勒的決定是最終決定!」用詞的差別值得注意。

「他們宣稱永遠無誤, 誰也不會眞誠地承認一條錯誤。」這是以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爲一方, 以列寧爲另一方的兩者之間的關鍵區別。(鮑里斯·蘇伐萊恩, 《斯大林: 布爾什維克主義批判研究》, 583 頁。)

㉑黑格爾辯證法能提供關於永遠合理的奇妙工具, 因爲它們可以將一切失敗解釋爲勝利的開端, 這是明顯的一例。這種詭辯的最美妙例子之一發生於 1933 年之後, 德國共產黨人在將近兩年時間裡拒絕承認希特勒的勝利是德國共產黨的失敗。

㉑引自《戈培爾日記》, 148 頁。

㉑斯大林, 前引書。

㉑當迫害猶太人達到高潮時, 希特勒在 1942 年 9 月的一次演講中明確地提及他先前的兩次演講 (分別在 1939 年 1 月 30 及 12 月 1 日), 當時他曾宣布「如果猶太人煽動國際間挑起一場世界大戰, 來消滅歐洲各亞利安民族, 那麼不是亞利安民族, 而是猶太民族將會……(以下的話被熱烈的掌聲淹沒)。」(見《領袖對戰時寒冬救濟組織的演講》〔*Der Führer zum Kriegswinterhilfswerk*〕, 見「國家社會主義文獻」, 第 14 卷, 33 頁。)

㉑ 1939 年 1 月 30 日演講。

㉑康拉德·海登, 《希特勒權力之路》強調指出希特勒的「現象的非眞實性」,「幾乎在他所有講話中都缺乏可見的事實,」他「在他認爲不重要的事情上漠不關心」。赫魯曉夫也以同樣說法描述「斯大林不願意考慮生活現實」, 他不關心「實際情況」。(見前引書) 斯大林關於事實之重要性的觀點, 最明顯地表現在他定期修改的俄國歷史書中。

㉘見《納粹之本》。

㉙值得注意的是，在斯大林時代，布爾什維克黨人收集陰謀事件，發現一樁新的陰謀並不意味著他們會放棄前一次發現的陰謀。托洛茨基派的陰謀開始於1930年前後，三百個家族發生於1935年以後的統一陣線時期，在斯大林與希特勒結盟期間，英國帝國主義間諜事件成了事實，「美國情報局」被發現於戰爭結束之後；猶太人的世界主義(Jewish cosmopolitanism)很明顯地與納粹的宣傳十分相像。

㉚切姆·魏茲曼(Chaim Weizmann)自傳《嘗試與錯誤》(*Trial and Error*)(紐約，1949)，185頁。

㉛奧托·邦哈德《猶太人的金錢統治還是世界統治?》(*Jüdische Geld- und Welterrschaft?*)(1926)，57頁。

㉜希特勒於1922年首次這樣描述：「摩西·柯恩(Moses Kohn)鼓勵他的商會拒絕工人們的要求，而他的兄弟艾薩克在工廠鼓動羣眾……」罷工。(《希特勒言論集：1922－1939年》〔*Hitler's Speeches: 1922-1939*〕，倫敦，1942，29頁)值得注意的是，納粹德國從未出版過他的言論集，因此只能參見英文版。這並非偶然，可參見菲利普·波勒(Philipp Bouhler)主編的著作索引《領袖掌權之後的言論集》(*Die Reden des Führer's nach der Machtübernahme*)(1940)；只有他的公開言論一字不變地印在《民族觀察員》(*Völkischer Beobachter*)中；至於對領袖衛隊和黨內其他單位的講話，則只在報紙上「提及」，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公開發表。

㉝費德爾的二十五點綱領只含有一切反猶主義團體所要求的標準措施：驅逐歸化的猶太人，將當地猶太居民看作僑民。納粹的反猶主義演說一向比它的綱領更極端。

沃德瑪·古里安(Waldemar Gurian)的〈現代德國的反猶主義(Anti-semitism in Modern Germany)〉(載《論反猶主義》〔*Essays on Antisemitism*〕，考佩爾·平森〔Koppel S. Pinson〕主編，紐約，1946)強調納粹的反猶主義缺乏創造性：「所有這一切要求和觀點都不以創新而引人注目——它們只在民族主

義的圈子裡證明自我正確；引人注目的只是它們顯示的蠱惑和鼓動人的技巧。」

㉞在納粹運動中純粹的民族主義反猶主義的典型例子是羅姆的話：「同樣在這裡，我的觀點與民族的『菲利斯丁』們觀點不同。不能將一切都歸咎猶太人！猶太人能有今日的統治，該責怪的是我們。」（恩斯特·羅姆，《一個反叛者的故事》，1933，284 頁。）

㉟申請加入黨衛軍者必須追溯祖先至 1750 年，黨內領導人的候選人只須回答三個問題：㈠你爲黨做了些什麼？㈡你的身體、心智、道德是否絕對健康？㈢你的家族系譜是否完整有序？（參見《納粹之本》）

兩種制度之間有相同特點，布爾什維克菁英和警察的構成同樣要求其成員證明他們祖先的情況。（參見貝克與戈丁，《俄國大整肅與逼供》，1951）

㊱美國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極權主義傾向最觸目地顯示了這種嘗試不僅是爲了清除共產黨人，而且逼迫每一個公民提出自己不是共產黨員的證明。

㊲「不應該過高估計出版物的影響……，當組織的影響上升時，出版物的影響便下降。」（哈達莫夫斯基，前引書，64 頁）「當報紙要和一個活動中的組織的侵略性力量作鬥爭時，它們是孤立無援的。」（同上，65 頁）「起源於純粹宣傳的權力構成是動搖不定的，會迅速消失，除非一個組織的暴力支持這種宣傳。」（同上，21 頁）

㊳「羣眾大會是最有力的宣傳形式，……每一個人都感到自己在大眾的團結中更自信，更有力。」（同上，47 頁）「暫時的熱情通過組織和系統的訓練與紀律約束而變成了一種原則和精神上的態度。」（同上，21－22 頁）

㊴在一些個別的例子中，希特勒本人也很關心這個問題，他經常強調：「我不是專制獨裁者式的國家元首，我是德國人民的領袖。」（見《領袖言論選集》〔*Ausgewählte Reden des Führers*〕，1939，114 頁）漢斯·弗蘭克有過同樣說法：「國家社會主義帝國不是獨裁的，更不是一個獨斷的政府。相反，它立基於領袖與人民的相互忠誠。」（見《權力與行政》〔*Recht und Verwaltung*〕，慕尼黑，1939，15 頁）

㊵希特勒多次重複說過：「國家只是達到目標的一種手段。這個目標就是：種族

的保存。」(同上，125 頁) 他也強調說，他的運動「並不建立在國家觀念上，而是首先基於緊密結合的『德國民族共同體』」。(見《領袖言論選集》，125 頁，以及對新一代政治領導人的談話，作爲附錄收在《希特勒餐桌談話》，446 頁)。這也是斯大林的所謂「國家理論」複雜的雙重含義言論的核心：「我們贊成國家消亡，同時我們也主張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它代表了迄今存在的國家最強有力的權威。國家權力的盡可能發展，其目的是準備國家消亡的條件；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公式。」(參見前引書)

㊶亞歷山大·斯坦因(Alexander Stein)，《希特勒，「錫安智者」的門徒》(*Adolf Hitler, Schüler der "Weisen von Zion"*)(1936) 是第一本從語言文字角度比較分析納粹的教義與「錫安長老們」教義在意識形態上一致性的著作。亦可參見勃朗克(B. M. Blank)，《希特勒與「錫安長老們的草案」》(*Adolf Hitler et les "Protocoles des Sages de Sion"*)(1938)。

第一個承認受惠於錫安長老們的教導的是特奧多·弗利奇(Theodor Fritsch)這位德國戰後反猶主義的「德高望重者」。他在他寫的那本《錫安長老們的草案》(1924) 後記中說：「我們未來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將必須向這些卑劣的東方大師們學習，甚至是學習關於政府的基本知識，因此，『錫安密謀草案』提供了一種最出色的預備教育。」

㊷關於這一「草案」的歷史研究，可參見約翰·寇蒂斯(John S. Curtiss)的《評錫安草案》(*An Appraisal of the Protocols of Zion*)(1942)。

僞造關於「草案」的事實和宣傳目的毫無聯繫。俄國政論家尼魯斯(S. A. Nilus)出版 1905 年俄文第 2 版時，早就充分意識到這一「文件」的可疑性質，並指出明顯可疑之處：「但是，如果有可能用文件或用可靠的證人之證詞來顯示文件的確鑿性，如果有可能揭露那些世界陰謀的領頭人……那麼……『不義行爲』就會破產……。」(寇蒂斯的譯本)。

希特勒不需要尼魯斯也能使用同樣的詭計。最可靠的證明是，它們已被證實是僞造的。希特勒還補充了巧言狡辯的論點：「許多猶太人可能無意識做的事情在這裡可以有意識地弄清楚。關鍵問題就在這裡。」(《我的奮鬥》，第 1 卷，

第 11 章）

㊸弗利奇在前引書中說：「（猶太人的）最高原則是：『凡是有利於猶太人民的，都是道德的和神聖的』。」

㊹「世界帝國產生於一種民族基礎，但是不久就擴展到超越民族基礎。」（見《領袖言論選集》）

㊺昂利・羅林(Henri Rollin)，《我們時代的啓示》（*L'Apocalypse de Notre Temps*）（巴黎，1939）認爲「密謀草案」的流傳僅次於《聖經》（40 頁），這本書指出它們與《秘密箴言》之間的相同性。後者出版於 1612 年，至 1939 年仍在巴黎街頭出售，宣布揭露了一個耶穌會的陰謀，「爲一切惡行和一切暴力的使用辯護。……這是一場反對既定秩序的眞正運動。」（32 頁）

㊻歇伐利埃・德馬萊（Chevalier de Malet）在《證實一個革命部分之存在的政治與歷史回顧》（*Recherches politiques et historique qui prouvent l'existence d'une secte révolutionnaire*）（1871）中完整地披露了這份文件，他廣泛引用了先前作者們的文字。他認爲法國革命的英雄們是一個「秘密組織」的幌子，是共濟會的代表。但是共濟會只是同時代人們給予一個存在於一切時代的「革命組織」的名稱，它的政策一向是攻擊「幕後的殘餘，操縱它認爲便利於放在舞台上的牽線木偶」。他說：「或許很難相信一個形成於古代並堅定持續的計劃……製造革命的人無論是法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英國人，都屬一樣。他們構成了一個奇特的民族，在一切文明民族中間，生長於黑暗之中，目的是使一切民族都屈從於它的統治。」

關於這份文獻的廣泛討論，可參見雷速爾（E. Lesueur）《十八世紀法國阿圖瓦省共濟會》（*La Franc－Maconnerie Artésienne au 18e siècle*），革命歷史圖書館，1914）。這些陰謀傳說本身的持久性，即使在正常情況下也可見諸於法國許多反共濟會的想入非非的文獻，幾乎與反猶主義的文獻一樣既多且廣。鮑德（G. Bord）主編的《法國共濟會從起源到 1815》（*La Franc-Maconnerie en France dès origines à 1815*）（1908）中收有各種理論的摘要，都認爲法國革命是秘密陰謀會社的產物。

㊼見1943年1月12日柏林黨衛軍勞動問題委員會會議記錄，上面提出，「民族」一詞的概念被隨意解釋，對日耳曼各民族不適用，應該刪除。（文件705，見《納粹陰謀與侵略》，第5卷，515頁）

㊽《希特勒言論集》，巴因斯(Baynes)主編，6頁。

㊾戈培爾，前引書，377頁。這一許諾包含在納粹型的一切反猶主義的宣傳中，源出於希特勒的話「同亞利安人形成最極端對比的是猶太人。」（見《我的奮鬥》，第1卷）

㊾克斯頓檔案，存猶太檔案中心。

㊾希特勒早先說「我絕不承認其他民族與日耳曼民族權利相同」，此話後來成爲正式理論：「國家社會主義的生命觀的基礎是深刻認識人與人的不同。」（《納粹之本》，5頁。）

㊾例如希特勒在1923年說：「德國人中有三分之一是英雄，另外三分之一是懦夫，剩下三分之一是叛徒。」（巴因斯主編，《希特勒言論集》，76頁）

在奪取政權以後，這種傾向更加赤裸裸地公開表現出來。例如戈培爾在1934年說：「應該批評誰？黨員？不。其他德國人？他們應該想到，自己還活著，這是他們的幸運。如果由於我們的憐憫而活著的人容許批評的話，那完全是一樁好事。」（引自科恩-布拉姆斯坦特，前引書，178-179頁）在戰爭期間，希特勒宣布說：「我只是一塊磁鐵，常常在德國移動，吸引這個民族中的鋼鐵。我常常指出，總有一天，德國一切有價值的人都會在我的陣營中。凡是不在我的陣營中的人都沒有價值。」即使在這時，希特勒周圍的人也明白，「沒有價值」的人將會命運如何。（見《偉大德國自由之戰：希特勒言論集1939年9月1日到1940年3月10日》(*Der grossdeutsche Freiheits Kamkf. Reden Hitlers vom 1. 9. 1939 -10. 3. 1940*)，174頁。）希姆萊也說過：「領袖不是想著德國，而是根據德國來思考。」（見克斯頓檔案）我們從《希特勒餐桌談話》中得知，他在當時早已開玩笑說，德國太「吵鬧」，他要用「亞利安語」來思考。(315頁)

㊾1943年4月，希姆萊在卡爾可夫(Kharkov)的一次黨衛軍領導人會議上說：「我很快地在各國建立德國黨衛軍。」希特勒在掌權以前提到過這種非民族的

政策:「我們當然也會在其他民族中接受新的主人階級的代表，他們享有這種資格，因爲他們加入我們的戰鬥。」

❺❹哈達莫夫斯基，前引書。

❺❹海登，前引書，139 頁:「宣傳並非一種在大衆中培植觀點的技藝。實際上它是從羣眾中接受觀點的技藝。」

❺❹哈達莫夫斯基，前引書。此語出自《我的奮鬥》，第 2 卷，第 11 章，其中將「有活力的組織」和官僚主義政黨的「僵死機制」作對比。

❺❹倘若用麥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超凡魅力的領袖品質」(charismatic leadership)來說明極權主義領袖，那將是一種嚴重的錯誤。漢斯•葛思(Hans Gerth)在〈納粹政黨〉(The Nazi Party)(載《美國社會學》〔*American Jurnal of Sociology*〕，第 45 卷，1940)中形容希特勒是一個官僚主義政黨的有超凡魅力的領袖，這和海登一樣犯了錯誤。他認爲這一點的原因是「無論公然的行動與言辭有多少矛盾，無論什麼事物都無法中斷紀律嚴格的組織。」斯大林的特點就是這種矛盾，他「總是很注意地說與他的行動相反的話，做與他的話相反的事」。見蘇伐萊恩，前引書，431 頁。

關於這種錯誤理解的根據，可參見阿爾弗雷德・馮・馬丁(Alfred von Martin)〈現代社會學〉(Zur Soziologie der Gegenwart)，(《文化史》〔*Zeitschrift für Kulturgeschichte*〕，第 27 卷)和阿諾德•科特根(Arnold Köttgen)〈領袖國家管理的合法性〉(Die Gesetzmaßigkeit der Verwaltung im Führerstaat)(《帝國管理小册》〔*Reichsverwaltungsblatt*〕，1936)，兩者的特點都是將納粹國家看成是由魅力超凡的領袖領導下的官僚政制。

❺❹哈達莫夫斯基，前引書，21 頁。就極權主義之目的而言，通過教導或說服來宣傳其意識形態是錯誤的。羅伯特•萊依說，意識形態既不能「教」，也不能「學」，而只能「實行」和「實踐」。(參見《奧登斯堡之路》)

❺❹納粹傑出的政治理論家之一霍恩(Hoehn)在《帝國共同體與民族共同體》(*Reichsgemeinschaft und Volksgemeinschaft*)(漢堡，1935)中對運動中缺乏原則或甚至只是一套理想和信念的現象作了解釋:「從德國民族共同體的觀

點來看，每一種有價值的社羣都是有破壞性的。」（83 頁）

⑥⓪希特勒在談到世界觀與組織之間關係時理所當然地承認，納粹從其他羣體和政黨那兒接受了「種族思想」（racial idea; die völkische Idee），以這種思想的代表自居，因爲他們最早以此爲一個戰鬥組織的基礎，並且爲了實際目的而建立這種基礎。（見前引書，第 2 卷，第 5 章。）

⑥⓪希特勒〈宣傳與組織〉，見前引書，第 2 卷，第 11 章。

⑥⓪希姆萊激烈而又急迫地要求「不發布與『猶太』一詞定義有關的任何命令」就是一例；因爲「這一切愚蠢的說法只會束縛我們的雙手」。（1942 年 7 月 28 日致伯格爾信，紐倫堡文件第 626 號）

⑥⓪在所有的納粹黨和黨衛軍的官方命令和規定中，都有「領袖的意志就是最高法律」這一條。最好的資料來源是奧托·高維勒（Otto Gauweiler）的《運動的權利組織和使命》（1939）。

⑥④海登，前引書，292 頁，指出《我的奮鬥》幾個版本之間的差異：第一版提出政黨的官員應該由選舉產生，他們只有在當選之後才能有「無限的權力和權威」；以後各個版本都確定，由上一級領導人來指定下級黨內官員。很自然，爲了極權主義政權的穩定，官員由上級指定，作爲一條原則，比被任命官員的「無限權威」更重要。在實踐中，由於領導者的絕對主權，使下級領導者的權威必然受到限制。

斯大林來自布爾什維克黨密謀組織，或許他從來不認爲這是一個問題。他認爲任命人員組成政黨機器是一個積聚個人權力的問題。（但只是在三十年代，他才模仿希特勒，接受「領袖」的稱呼。）但是必須承認，他可以引用列寧的理論「一切國家的歷史都指出，工人階級如果只靠自己的努力，就只能發展工會意識」輕易地證明自己正確。因此，這種領袖資格必然來自外部。（見《要做什麼？》〔*What is to be done?*〕，1902）關鍵在於，列寧認爲共產黨是工人階級中間「最進步」的部分，同時又是「政治組織的槓桿」，它「指導全體無產階級羣眾」，亦即階級之外和之上的一個組織。（見錢伯林〔W. H. Chamberlin〕《1919－1921 年俄國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17－1921*〕，紐約，1935，第

2 卷，361 頁）但是，列寧並不懷疑黨內民主的有效性，儘管他傾向於只將民限定在工人階級內部。

⑮希特勒，前引書，第 2 卷，第 11 章。

⑮同上。納粹一掌權就強化了這條原則。在七百萬名希特勒青年團(Hitler youth)團員中，1937 年只有五萬人被接受加入納粹黨。（參見《納粹之本》的前言，柴爾茲著）比較尼斯(Neesse)〈一黨制的憲法規定組織形式〉(Die verfassungsrechtliche Gestaltung der Ein-Partei)（載《總體國家學說研究期刊》，1938 年，98 卷，678 頁）中說：「即使是一黨制，也絕不能發展到它和全體居民不分界限。它是『全面的』(total)，原因在於它在意識形態方面對國家產生的影響。」

⑮參見希特勒的劃分法——「激進者」隨時準備成為黨員，而成千上萬的同情者太「怯懦」，不敢作出必要的犧牲。（同上）

⑮參見希特勒，前引書，第 2 卷，第 9 章，第 1 部分。

⑮德文原名為 Verfügungstruppe 這個黨衛軍中的特殊組織，原先擬由希特勒親自主持，名稱的譯法，此處從賈爾斯(O. C. Giles)，《蓋世太保》(*The Gestapo*)一文而來。由「牛津國際事務小冊」(Oxford Pamphlets on World Affairs)，第 36 號，1940 年。

⑮黨衛軍的組織和歷史的最重要資料來源是希姆萊的〈黨衛軍和警察局的組織與任務〉(Wesen und Aufgabe der SS und der Polizei)，載《演講與言論文選》(*Sammelhefte ausgewählter Vorträge*)(1939)。戰爭期間，由於前線失利，武裝黨衛軍不得不擴充，遂失去在黨衛軍的菁英性質，此刻一般的黨衛軍（即領袖衛隊）再次代表運動的眞正核心。

胡佛圖書館檔案裡希姆萊卷宗第 278 號文件材料可以揭示黨衛軍最後一階段的情況。黨衛軍模仿當年法蘭西外籍軍團的方法與規則，從外國工人和當地居民中招募人員。在德國人中間招募人員是根據希特勒 1942 年 12 月的一道命令，「1925 年出生者徵兵參加武裝黨衛軍」（希姆萊致鮑曼信）。報名應徵表面上以自願為基礎。根據這一任務，黨衛軍領導人的無數份報告顯示了事情的

結果。1943 年 7 月 21 日的一份報告敍述了警察如何包圍一座大廳，裡面都是要招募的法國工人，法國人先是唱《馬賽曲》，然後試圖跳窗逃跑。在德國青年中徵兵的嘗試也不見得有多大的成功。儘管他們受到非凡的壓力，並且被告知「他們當然不會是參加『骯髒的灰色』部隊，」但是據報告，希特勒青年團員中，二百二十人中只有十八人報名（根據武裝黨衛軍西南徵兵站站長豪斯勒〔Häussler〕1943 年 4 月 30 日報告）；其餘人寧可參加國防軍。很可能是黨衛軍比國防軍損失更慘重的事實，促使他們作出這樣的決定。（參見佩特爾，〈論黨衛軍〉，載《當代史季刊》，1954 年 1 月號）但是下述情況證明並非唯獨這一因素才是決定性的：早在 1940 年 1 月，希特勒下令在衝鋒隊員中招募武裝黨衛軍人員，科尼斯堡地方的報告說，號召一千八百零七名衝鋒隊員「加入警察」；其中一千零九十四人未報名；六百三十一人不合格；只有八十二人適合加入黨衛軍。

71 維納・貝斯特，前引書，99 頁。

72 但這不是希特勒的過錯，他一向堅持說，衝鋒隊的名稱意指它只是「運動的一個組織」，如同其他黨內機構，例如宣傳部、報紙、科學研究所，等等。他還想消除類軍事組織的可能軍事價值的幻想，希望它們符合黨的需要，而不是符合軍事原則。（見前引書）

73 建立衝鋒隊時的正式理由是警衛納粹會議，而黨衛軍的最初任務是保護納粹領導人。

74 希特勒，前引書。

75 恩斯特・貝耶，《論衝鋒隊》，柏林，1938。譯文引自《納粹的陰謀》，第 4 卷。

76 羅姆的自傳淸楚地顯示出他的政治信仰很少與納粹一致。他一向希望建立「軍人國家」(Soldatenstaat)，一向堅持「軍事是政治之首」（前引書，349 頁）。下面這段話尤其表明他的非極權主義態度，或者說，他根本不能理解極權主義和它的「極權」主張：「我不明白這三件事爲什麼不能相提並論：我忠於威特爾斯巴赫(Wittelsbach)家族的世襲君主和巴伐利亞王位繼承人；我欽佩世界大戰時的兵站總監（即魯登道夫），他在今天體現了德國人民的良心；我與政

治鬥爭的先驅者和鬥士阿道夫・希特勒之間的同志情誼。」(348 頁) 使羅姆最終掉腦袋的原因是，掌權之後，他幻想像意大利政府一樣建立法西斯獨裁，使納粹黨能「打破政黨鎖鏈，」「自己變成國家」，這正是希特勒在任何情況下都想避免的。(參見羅姆對外交使團的演講，1933 年 12 月。)

在納粹黨內，從未忘記過衝鋒隊與國防軍聯手陰謀反對黨衛軍和警察的統治。駐波蘭總督漢斯•弗蘭克在 1942 年 (羅姆和施萊徹將軍被殺後八年) 被懷疑圖謀「在戰後……靠軍隊和衝鋒隊支持，發起最大的正義鬥爭 (反對黨衛軍)。」(《納粹的陰謀》，第 6 卷，747 頁)

⑰希特勒指出，宣傳的目的是對全體民衆灌輸一種原則，而組織工作只能吸收人數相對較少的戰鬥成員。(見前引書)

⑰希特勒，前引書。

⑲哈達莫夫斯基，前引書，28 頁。

⑲黨衛軍敢死隊的紀律是：㈠在當地不執行任務。㈡每個單位在服務三星期後即改變任務。㈢成員絕不被單獨派遣上街，或公開露出敢死隊標誌。(參見希姆萊 1938 年對德軍參謀總部的秘密講話，但據《納粹的陰謀》第 4 卷披露的選段，其實際演說時間是 1937 年。講話由美國反納粹文獻編委會出版。)

⑲希姆萊在《反布爾什維克戰鬥組織的防衛階段》〔*Die Schutzstaffel als anti-bolschewistische Kampforganisation*〕(「黑色軍團」刊物，第 3 號，1936 年) 中公開地說：「我知道有些德國人討厭見到黑制服。我們理解，我們也並不期望受到太多人的愛戴。」

⑲希姆萊在對黨衛軍的講話中總是強調犯罪問題，指出其重要性。例如關於迫害猶太人，他會說：「我也想坦率地和你們談談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我們在自己人中間應該十分坦率，但是我們絕不會公開談論。」關於迫害波蘭知識分子，他說：「你們應該了解此事，但也要立即將它忘掉……」(《納粹的陰謀》，第 4 卷，558 及 553 頁。)

⑲蘇伐萊恩，前引書，648 頁。極權主義運動使它們的領袖(希特勒和斯大林)的私人生活絕對保密的做法，和一切民主國家公開總統、國王、首相等人私人生

活的宣傳價值的做法完全相反。極權主義方式不允許有一種基於信念的認識：我們之中地位最高的人也只不過是人罷了。

蘇伐萊恩引用最常用來描述斯大林的話：「斯大林是克里姆林宮的神秘主人」；「斯大林的個性難以捉摸」；「斯大林是共產主義的斯芬克斯」；「斯大林是一個謎」；他是一個「無法解釋的神話」，等等。

84「如果托洛茨基選擇軍事政變，他也許能擊敗三頭執政者。但是他絲毫不曾嘗試用他創建並領導了七年的軍隊來反抗，就交權了。」（多伊切，前引書，297 頁）

85托洛茨基領導的國防委員會「是一個模範機構」，當其他各部發生任何混亂時，也總是請托洛茨基解決。（同上，288 頁）

85圍繞著斯大林之死的情況看來與此有矛盾。斯大林很可能在去世前策劃過另一次大整肅，卻被他身邊的某人扼殺了，因爲人人感到自危。但是這件事雖有大量證據，卻無法證實。

85儘管希特勒說，他爲衝鋒隊於 1932 年在波坦巴的殺人事件負責，實際上他與此無關。這裡的關鍵在於確立一種認同原則，或者用納粹的語言來說，「帝國依靠領袖與民衆之間的相互忠誠。」（漢斯・弗蘭克，前引書）

84「斯大林的最著名特點之一……是系統地將他的罪行以及政治錯誤推給由於他的陰謀而敗壞名聲的人身上。」（蘇伐萊恩，前引書，655 頁）極權主義領袖明顯地可以自由選擇由誰來承擔他的錯誤，因爲下級領導人所做的一切行爲都是由他鼓動的，所以任何人都可能被迫扮演騙子的角色。

85是希特勒本人——而不是希姆萊或鮑曼或戈培爾——一向提出實際上「徹底的」措施；他們總是比他周圍的人所提的建議更激進；甚至當希姆萊受命「最後解決」猶太人問題時，他也被驚駭了——這一切現在已被無數的文件證實。關於斯大林比布爾什維克黨內左派更溫和的神話現在也無人再信了。最重要的是記住，極權主義領袖們都試圖向外部世界顯示他們比較溫和，而他們的眞正角色——推動運動前進，不惜任何代價，使之加速——卻被小心地掩蓋著。例如海軍上將埃里奇•拉達（Erich Raeder）的回憶錄〈我和希特勒及黨的關係〉（My Relationship to Adolf Hitler and to the Party）（載《納粹的陰

謀》，第 8 卷，707 頁)：「每當關於黨和蓋世太保的激烈措施的消息傳來時，人們就能從領袖的行爲中得出結論，說這些措施並非出自領袖本人的命令。……在後來的幾年中，我漸漸地得出結論：領袖本人總是傾向於比較激烈的方案，但從不向外人流露。」

在使斯大林崛起和掌權的黨內鬥爭中，他總是小心地表現得像個「中庸之人」(見多伊切，前引書，259 頁)；他當然不是「妥協之人」，但是他從來不完全放棄他的角色。例如在 1936 年，一名外國記者問他關於運動的世界革命目的，他回答說：「我們從來沒有這種計劃和意圖。……這是誤解的產物……是一種喜劇的、或者叫做悲喜劇的產物。」(多伊切，同上，422 頁)

⑩亞歷山大・科雷〈現代謊言的政治功能〉(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the Modern Lie)(載《當代猶太記錄》〔*Contemporary Jewish Record*〕，1945 年 6 月號。)

希特勒廣泛地談到關於秘密會社是否極權主義運動之原型的各種正反意見。他的想法實際上導致科雷的結論：採用秘密團體的原則，但不秘密活動，而在「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組織。在掌權之前階段，納粹運動幾乎沒有一件事情是一直保密的。直到戰爭期間，納粹政府完全極權主義化，黨內領導階層發現自己從各方面被軍隊包圍，因爲它要依靠軍隊來指揮戰爭，菁英組織接到明確指示，要使一切圍繞著「最後解決」方案——即驅逐和大規模屠殺——的事情絕對保密。這時，希特勒也開始表現得像一幫陰謀家的頭領，但也公開個人的言論和傳播這一事實。他在 1939 年 5 月和參謀總部談話時，規定了以下幾條紀律，這幾條看上去好像抄自某個秘密會社的入會須知條文：「第一，不准通知無須知道此事的人。第二，不許知道超過應該知道的範圍的事情。第三，該知道的事情，不到必要時候，不許事先知道。」(引自海因茨・霍爾達克〔Heinz Holldazk〕，《發生什麼事》(*Was wirklich geschah*)，1949，378 頁。)

⑩以下的分析接近蓋奧爾格・齊美爾(George Simmel)的〈秘密與秘密會社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Secrecy and of Secret Societies)，載《美國社會學》(*The American Sociology*)，第 11 卷，亦見他的《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1908)，第 5 章。引文選自克爾特・沃爾夫(Kurt H.

Wolff)1950 年譯本。

92「正因爲社會的下層構成了向實際上的秘密中心過渡的中介，所以它們在秘密中心周圍對離心傾向逐漸產生了強制力量，這比完全在外部或完全在內部持激進的生硬立場更具有安全的保護作用。」(同上，489 頁)

93在納粹文獻中充斥著「盟誓的兄弟」、「盟誓的同志」、「盟誓的團體」等等用語，部分原因是它們對德國青年運動中流行的浪漫主義傾向能產生魅力。希特勒以更特定的含義來使用這些語彙，使之成爲黨衛軍內部的「中心暗語」。(「因此我們集合成隊伍，走向前程的未來，以亞利安人的國家社會主義秩序和一個盟誓團體作爲不可更改的法律。」參見達爾昆，前引書。）以及使它們以含糊意義的「絕對敵視」來反對其他一切人：(參見齊美爾，前引書，489 頁)「然後當人類中有十億到十五億人集合起來反對我們時，德意志人人……」亦見希姆萊 1943 年 10 月 4 日在波森的黨衛軍少將會議上的講話，見《納粹的陰謀》，第 4 卷，558 頁。

94齊美爾，前引書，490 頁。這一條像其他許多原則一樣，被納粹在對「錫安長老們的密謀」作出小心翼翼的反應之後採用作爲原則。希特勒早在 1922 年就說過：「(右派先生們)從來不懂，我們不必成爲猶太人的敵人以便在某一天將你拖到斷頭台上，……只要**不是猶太人**就足夠了：這能保證你不上斷頭台。」(《希特勒言論集》，12 頁)當時誰也猜不出這種說法的眞正意思。他或許可以將其他民族的人最後也宣布爲「種族不適合」，由健康檢查機構宣布死刑。希姆萊相信並鼓吹黨衛軍全體人員只遵奉一條原則，「我們必須對自己血統的成員們忠實、有禮、忠誠、友好，而對其他人一律不是這樣。」(參見前引書)

95齊美爾，前引書，480-481 頁。

96布哈林語。見蘇伐萊恩，前引書，319 頁。

97蘇伐萊恩，前引書，113 頁提及斯大林「喜歡圓滿地完成『一件事情』的人。他視政治爲一種需要機敏手段去處理的『事情』。」

98在二十年代的黨內鬥爭中，「格別烏的合作者幾乎全是反對右派的人和斯大林的忠實追隨者。當時格別烏的各個部門都是斯大林掌握的。」(西利加，前引書，

48 頁）蘇伐萊恩前引著作第 289 頁說，斯大林甚至早已「繼續從事在內戰期間開始的警察活動」，他是政治局在格別烏裡的代表。

(99)俄國內戰之後，《眞理報》立即指出「關於『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說法已改成『一切權力歸契卡』。……武裝敵對的結束減弱了軍方的控制……但是分支密布的契卡用行動簡單化的方式使自己更完善。」（蘇伐萊恩，前引書）

(99)蓋世太保由戈林於 1933 年建立；1934 年，希姆萊被任命爲蓋世太保首腦，立即著手用他的黨衛軍人員占據蓋世太保的職位；至戰爭結束時，蓋世太保人員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黨衛軍人員。同時還應該想到，希姆萊組織的衝鋒隊即使在掌權以前階段也特別適應於這一工作，能在黨員中間負起監督職責。（海登，前引書，308 頁）。關於蓋世太保的歷史，可參見賈爾斯的前引書，以及《納粹的陰謀》，第 2 卷，第 12 章。

(99)這也許是羅森伯格之關鍵性的思想錯誤之一，他失寵於領袖，失去在運動中的影響力，讓位於希姆萊、鮑曼、甚至斯特萊徹等人，他的《二十世紀之神話》承認種族多元性，只排斥猶太人。因此他違反了凡是不屬於（日耳曼民族）者都應被排除（指人類羣眾）的原則。

(99)齊美爾，前引書，492 頁，列舉了秘密犯罪團體，其成員自願推舉一名首領，此後便聽命於他，對他不加批評和限制。

(99)西利加，前引書，96-97 頁。他還描述了在二十年代，即使是列寧格勒格別烏監獄中的囚犯被判處了死刑，也在臨行刑時「一言不發，不喊一句反對將他們處死的政府的話。」（183 頁）

(104)西利加報導過，被判處死刑的黨員「認爲如果這些死刑的執行能從總體上挽救官僚專政，如果能平息反叛的農民（或者說如果它們誤引他們走向恐怖），他們就不會白白犧牲生命。」（前引書，96-97 頁）

(99)戈培爾關於政治中外交的作用的觀點很典型：「誰若使外交人員不知政治背景，他無疑幹得最漂亮。……眞誠地扮演一種綏靖角色，有時對於他們在政治上取得信任是一種最能令人信服的論據。」（前引書，87 頁）

(99)魯道夫・海斯（Rudolf Hess）於 1934 年的一次廣播講話中有此言。

[107] 維爾納・貝斯特解釋說:「政府的意志是否定設下『正確的』規則……這不再是一個法律問題,而是命運問題。因為實際上的濫用將會在歷史面前受到命運更明確的懲罰,遭受不幸、被推翻、垮台,因為違反了『生命法則』,而不是由國家法庭來懲罰。」(見前引書)

[108] 見克拉夫欽柯,前引書,422 頁:「經過恰當的思想灌輸的黨員都不會認為,黨公開執行一套政策,而在私下裡又截然相反的做法是在『撒謊』。」

[109] 「國社黨蔑視普通德國人,衝鋒隊員蔑視其他國社黨員,黨衛軍蔑視衝鋒隊。」(海登,前引書,308 頁)

[110] 希姆萊起先根據照像來挑選黨衛軍成員。後來設置了「種族委員會」,申請者必須親自接受檢驗,決定其種族外貌是否被認可。參見希姆萊〈論黨衛軍和警察的組織和職責〉(Organization and Obligation of the SS and the Police)(載《納粹的陰謀》,第 4 卷,616 頁)。

[111] 希姆萊清楚地意識到一個事實:他將種族問題從「一個以毋庸置疑的反猶主義為基礎的否定概念」轉變為「一項建設黨衛軍的組織任務」,這是他「最重要的永久性成就」之一。因此,「種族問題第一次放進了(或者說變成了焦點、越過了)隱藏在對猶太人的天然仇恨之下的否定概念。領袖的革命思想溶進了溫暖的生命血液。」(引自納粹非公開出版物)

[112] 希姆萊於 1929 年被任命為黨衛軍首領之後,立即確定種族選擇原則和婚姻法,並說:「黨衛軍清楚地知道,這種秩序意義重大。我們任憑別人嗤笑和誤解;未來屬於我們。」(引自達爾昆,前引書)十四年後,希姆萊在卡爾可夫演講,提醒黨衛軍領導人們「我們是第一個真正用行動解決血緣問題的人,我們當然並不認為血緣問題是反猶主義的。反猶正如消滅虱子。擺脫虱子不是意識形態問題。這是衛生問題。但是血緣問題提醒我們注意自己的價值,提醒我們什麼是使日耳曼民族保持團結的真正基礎。」

[113] 希姆萊,同上,見《納粹的陰謀》,第 4 卷,616 頁。

[114] 希姆萊在波森的演講,見《納粹的陰謀》,第 4 卷,558 頁。

第十二章
執政的極權主義

當一種在組織上國際化、意識形態全面化、政治野心全球化的組織，在某一國家裡奪得政權時，它就明顯地使自己處於矛盾狀態。社會主義運動卻沒有這種危機，第一，因爲民族問題——指革命牽涉到的策略問題——被馬克思和恩格斯奇怪地忽略了；第二，因爲它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剝奪了第二國際對民族成員的控制之後，才面對建立政府的問題，而民族成員都認爲，民族感情高於國際團結是一個不容改變的事實。換言之，當社會主義運動在各自國家奪取政權的時機到來時，它們早已變爲民族的政黨。

極權主義運動中從未發生過這種轉變，包括布爾什維克和納粹運動。在它奪取政權時，它的危機在於一方面可能接管了國家機器而「僵化」成一種絕對政府形式，❶另一方面，運動的自由可能被它掌權之處的領土邊界所。對於極權主義運動來說，兩種危險同樣是致命的：走向絕對主義(absolutism)的發展會終止運動的內在驅動力，而走向民族主義的發展將會阻撓它的外部擴張，但是，若沒有外部擴張，運動就不能繼續生存。這兩種運動創建的政府形式，或者說，出自極權控制和全球統治的雙重要求而幾乎自動發展的政府形式，最典型的是托洛茨基的口號：「不斷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儘管托洛茨基的理論只不過是社會主義對一系列革命的預言，從反封建的資產階級革命到反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革命，它們將從一個國家傳播到另一個國家。❷只有這個術語本身意味著「不斷」，並完全帶有半無政府主義色彩，嚴格地說來，這是用詞不當；然而連列寧也比較感興趣於這個詞，而不是它的理論內容。在蘇聯，革命以全面整肅的形式，變成了 1934 年以後斯大林政權的永久措施；❷斯大林集中攻擊托洛茨

基那個已半被遺忘的口號，因爲他決定利用這種技巧。❹在納粹德國，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種同樣的不斷革命傾向，儘管納粹沒有時間將它實現到同樣的程度。他們的「不斷革命」也以清除黨內派別開始，而公開地只敢聲稱「革命的下一個階段」❺——因爲「領袖與他的老衛士們都知道，眞正的鬥爭還只剛剛開始。」❻我們在這裡發現的不是布爾什維克的不斷革命觀念，而是種族的「永遠不停的選擇」的觀念，因此就需要經常使標準劇烈化，便於據此執行種族選擇，亦即消滅不適於生存的種族。❼關鍵問題在於希特勒和斯大林都許諾要保持穩定局面，目的卻是掩蓋他們想製造永遠不穩定狀態的意圖。

極權主義的主張與在一塊有限領土上的有限權力，在相互尊重主權的國際禮讓中的一個成員與統治世界的要求，對這種政府與運動共存的內在混亂，較好的解決方案無異就是一種剝奪了原本內容的公式。因爲極權主義統治者面對著一種雙重任務，它最初顯得矛盾到荒誕的地步：他必須建立運動的虛構世界，作爲每日生活中可以觸及的有效現實，另一方面，他必須防止這個新的世界產生一種新的穩定；因爲這個世界的法律和制度的穩定必然會消滅運動本身，隨之也消滅了最終征服世界的希望。極權主義統治者必須不惜任何代價，防止一種正常化，使新的生活方式可能發展——它可能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失去混血性質，在全世界各民族廣泛不同而又深刻對立的各種生活方式中產生。當革命的制度變成了一個民族的生活方式時（當希特勒宣稱納粹主義不是一種出口商品，或斯大林聲稱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國內建成，這就不止是一種愚弄非極權主義世界的企圖了），極權主義就會失去它的「全面」性質，變成服從於各國法律，根據這種法律，每個國家擁有特定的領土、人民、歷史傳統，憑此與其他國家發生聯繫——多元化根據事實本身，否定關於某一種具體的政府絕對有效的論爭。

實際上，執政的極權主義的弔詭是，在一個國家內擁有全部政府權力工具和暴力工具對極權主義運動來說並非好事。它不顧事實，嚴格堅持虛

構世界的規則，使它越來越難維持，但又必須像以前一樣堅持自己的本質。權力意味著直接面對現實，而執政的極權主義時常要注意去克服這種挑戰。宣傳和組織再也無力宣稱不可能的事情可以成爲可能，或者不可思議的事物可以是事實，或者瘋狂的堅強可以統治世界；極權主義虛構的主要心理支撑——積極地厭惡現狀，羣眾拒絕將現狀當作唯一可能的世界來接受——不再存在；從鐵幕後面洩漏的每一點眞實信息，都對抗來自非極權主義一方帶有很大威脅性的現實洪流，比起反宣傳之對於極權主義運動來，這是對極權主義控制的更大威脅。

爲了對全部居民實行全面控制而作的鬥爭，想消除每一種與之競爭的非極權主義現實，這都是極權主義政體的內涵；如果它們不將追求全球統治當作最終目標，那麼它們只可能失去它們早已奪取的政權。在全世界極權主義的條件下，每一個個人都會絕對無疑地受到控制。因此，上升到權力地位首先意味著建立官方的、受到正式承認的運動總部（或在衛星國裡的分部），得到一個實驗室來對現實（或準確地說是反對現實）進行實驗，爲了最終目的而實驗如何組織民眾，無視個體性和民族屬性，承認儘管條件不完備，但是足以取得部分重要的結果。執行的極權主義利用國家機構來達到它長期以來的征服世界的目標，指揮運動的各個分部；它設置祕密警察作爲國內實驗的執行者和保鏢，不停地將現實轉變成虛構；最後，它建立起集中營，作爲特殊實驗室，來完成它的極權控制的實驗。

(一)所謂的極權國家

歷史教導我們，取得權力和擔負責任，會深刻地影響革命政黨的性質。經驗和常識很好地預示了執政的極權主義會慢慢地失去它的革命動量和烏托邦性質，政府的每日事務和擁有了眞正的權力，會減緩運動在執政前的主張，漸漸地摧毀它的組織的虛構世界。看來它畢竟具有事物的本性，無

論個人還是集體，極端的要求和目標總會受到客觀條件的阻撓；而現實作爲一個整體，只在一個很小的程度上取決於由分子化的個人組成的羣眾社會的虛構傾向。

非極權主義世界在它和極權主義政府的外交事務上許多錯誤（最顯著的例子是在慕尼黑條約時相信希特勒，在雅爾達協議時相信斯大林）可以淸晰地追溯，是由於經驗和常識突然失去了對現實的把握。與一切期望相反，重要的讓步和國際聲望的極大提高，無助於將極權主義國家重新納入國際禮讓，或使它們放棄謊言抱怨，說整個世界緊密聯合起來反對它們。外交勝利也遠不能阻止抱怨，反而促使它們利用暴力工具，導致在一切情況下都增加了對願意和它們妥協的其他大國的敵視。

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失望與早先慈善的觀察家和同情者對新革命政府的失望一樣。他們原先期望的是建立新的機構，創造新的法規，無論其內容多麼具革命性，都能導致穩定的狀態，由此至少在極權主義運動奪得政權的國家裡阻止它的勢頭。實際情形正相反，在蘇聯和納粹德國，恐怖的增加和國內政治反對派的存在成反比，所以，政治反對派看來不是實施恐怖的藉口（正如自由派批評者們對政府不會下這樣結論），而是它在盛怒時的最後障礙。❽

更令極權主義政體煩惱的是處理憲法問題。納粹在掌權初期發布過大量法律和命令，但是從不正式廢除魏瑪憲法；他們甚至讓政府部門多少還有點作用——這一事實引起當地和外國許多觀察家們希望對納粹黨有所限制，新政權能夠迅速正常化。但是，隨著紐倫堡法律的頒布，這種情況的發展就終止了，結果是納粹本身對自己的立法毫不關心。相反，「只有時常走向更新領域，」以致最後由納粹製造的「國家祕密警察的目標和範圍」以及其他一切國家或政黨機構的目標與範圍，能夠「不受針對它們而發布的法律與規定的約束」。❾這種持久的無法律狀態表現在「再也不公布一系列有效的法規」。❿從理論上說，這符合希特勒的名言：「全面國家(total

state)不知法律與倫理有別」；[11] 因爲如果假設有效的法律符合公眾倫理，出自他們的良心，那麼的確不再進一步需要公開的命令了。蘇聯革命前的內政官員們在革命中都被清除，在發生革命變化的時期，政府敏感地注意憲法問題，甚至不顧麻煩，在 1936 年發布了全新的、精心構思的憲法(「表面上自由的語句，背後以斷頭台爲前提」[11])，俄國國內和國外都歡呼這一事件，以爲革命時期結束了。但是，憲法的公布變成了超級大整肅的開端，在將近兩年時間裡，整肅了猶存的管理階層，抹去了一切正常生活和經濟復甦的跡象，這一切在消滅富農、對農村強制實行集體化之後四年本來已有較好的發展。[11]從那時起，1936 年的憲法的作用完全與納粹政權下魏瑪憲法的作用一樣：它完全被忽視，但從未遭廢止；唯一區別是斯大林經受得起另一種荒誕現象——除了維辛斯基(Vishinsky)以外，凡是參加起草這部從未遭受批判的憲法的人，後來都作爲叛國者被處決了。

吸引極權主義狀態觀察家注意的，當然不是它的獨一(monolithic)結構。相反，一切嚴肅的研究者至少都認爲有一種雙重權威——政黨和國家——並存（或衝突）的現象。再者，許多人強調極權主義政府奇特的「無形狀態」(shapelessness)。[14] 托瑪斯・馬沙利克(Thomas Masaryk)很早就發現「所謂布爾什維克制度從來就只是完全缺乏制度」；[11]實際上在第三帝國「即使是一位專家，如果他想闡明黨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他也會被逼瘋。」[11]也經常有人觀察到，這兩種權力源——國家與政黨——之間的關係是一種表面權力和實際權力之間的關係，所以政府機器通常被描繪成無權的一面，它掩蓋了、保護了政黨的眞正權力。[11]

第三帝國行政機器的各個層次屬於一種奇特的機構複製現象(duplication of offices)。納粹異想天開地根據黨的機構設置來徹底地規定國家機構的每一個部門設置：[11]魏瑪共和國將德國分成州或省，納粹則加以複製，分成大區(Gaue)，儘管邊界線不完全一致，但是每一個特定地區即使在地理上也歸屬兩個完全不同的行政單位。[11]在 1933 年，納粹主幹

占據了國家的官方各部之後，仍還未放棄機構複製；例如弗立克當了內政部長或格特納(Franz Guerthner)當上了司法部長。這些備受信任的老黨員一爬上官方的非黨職位，就失去了權力，變得與其他政府官員一樣毫無影響力。兩人都在希姆萊這位地位上升的警察首腦的實際權威的領導之下，按常規，希姆萊應該歸屬內政部長管轄。⑳ 位於威漢斯特勞斯(Wilhelmstrasse)的舊德國外交部的命運更是國外人所共知的例子。納粹幾乎未觸動它的人員，當然也從未廢除它；然而在同時，他們又保留了執政之前的黨內外交事務局，以羅森伯格爲局長；⑳由於這個機構專門從事與東歐和巴爾幹半島諸國法西斯主義組織的聯絡工作，他們就建立了另一個機構來和在威漢斯特勞斯的機構競爭，即所謂利本特羅普局(Ribbentrop Bureau)，它處理對西歐的外交事務，在局長被任命爲駐英國大使而離去（亦即他進入了威漢斯特勞斯的官方機構）之後仍還存在。除了這些政黨機構之外，外交部還遇到另一個以黨衛軍機構爲形式的複製機構，後者負責「和丹麥、挪威、比利時、荷蘭的所有日耳曼種族團體談判」。⑳這些例子證明，納粹的複製機構是一條原則，而不只是爲了向黨員提供工作機會。

實際政府與表面政府之間的區分，在蘇俄以非常不同的形式作爲開端而走向同樣的發展。⑳ 表面政府原先產生於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All-Russian Soviet Congress)，在內戰期間喪失影響力和權力，被布爾什維克黨取代。這一過程開始於紅軍獨立自主、重建祕密警察作爲黨的機構而不是蘇維埃代表大體的機構；㉔ 1923 年，斯大林任黨的總書記(General Secretary)的第一年，這一過程就完成了。⑳從那時起，蘇維埃成了影子政府，透過由布爾什維克黨員構成的細胞——由莫斯科的中央委員會指派，向中央委員會負責的實際權力代表——在政府中產生作用。後來發展中的關鍵要點不是黨征服了蘇維埃，而是「儘管做起來毫無困難，布爾什維克並不廢除蘇維埃，而是利用它們作爲自己權威的外部裝飾性象徵。」⑳

因此，表面政府與實際政府共存現象部份地是革命本身的結果，同時

也開始了斯大林的極權主義專政。然而，當納粹簡單地保留現有政府機構，卻剝奪了它的一切權力時，斯大林卻必須復活他的影子政府，它在三十年代失去了一切功能，並且在俄國半被遺忘，是斯大林使蘇維埃以蘇聯憲法作爲象徵，既存在又無權。（在俄國，憲法沒有一句話對生活和法律具有絲毫的實際意義。）表面上的俄國政府完全缺乏必要的輝煌傳統，因而明顯地需要成文法的神聖光輝。極權主義蔑視法律和合法性（「除了最大的變化之外……仍然留有永恆地期望秩序的表現」），㉗它在蘇聯成文憲法中（就像從未被遺棄的魏瑪憲法一樣）爲自己的無法律性找到永久背景，對非極權主義世界的永久挑戰，以及可以每天顯示它無援和無能的標準。㉗

機構複制與權威畫分，實際權力與表面權力共存，這些都足以製造混亂，但不足以解釋整個結構的「無形狀態」。人們不應忘記，只有一座樓房才能有結構，而一種運動——如果這個詞根據納粹意指的內容來認眞準確地理解——只能有一種方向，任何形式的法律結構或政府結構對於運動來說都只會是一種障礙，而運動卻需要朝著某一個方向增加其推進的速度。即使在執政之前，極權主義運動也代表了那些不願再生活在任何一種結構之中（更不用說它的性質）的羣眾；羣眾開始行動，目的無疑是衝破由政府保證和決定的法律和地理邊界。因此，根據我們對政府和國家結構的概念來判斷，只要這些運動發現自己仍然身受一塊特定領土的限制，必然需要嘗試摧毀一切結構，而出於這種有意摧毀結構之目的，單純地在黨內及國家機構內複制一切機構，都還嫌不足。由於複制牽涉到國家表面和政黨內核之間的關係，最終也會導致某種結構，而政黨和國家之間的關係會在一種法律規定中自動結束，這種法律規定限制並穩定了它們各自的權威。㉗

複製機構看來是一黨專政中「政黨—國家」合一的問題造成的結果，實際上只是一種更複雜的現象中最顯著的跡象，這個現象更好的定義是單位的多重衍生（multiplication），而不是複製。納粹並不滿足於在舊省份之外再建立大區，而且還根據黨內組織機構的不同設置來劃分和設立地域區：

衝鋒隊的分區單位既與大區不符合，也與省份不符合；另外，它們與黨衛軍的分區也不一樣，與希特勒青年團的分區機構也不對應。㉚這種地理上的混亂還須加上一種事實：實際權力和表面權力之間原先關係儘管是不斷變化，卻總是在重複自身。希特勒第三帝國的居民不僅同樣生活在權力競爭中經常互相衝突的各種權威之下，例如行政機構、政黨、衝鋒隊、黨衛軍；他從來不能肯定地、明確地知道他應該將哪一種權威置於其他權威之上。他必須開發第六感，以便在某一特定時刻知道該服從誰，該忽視誰。

另一方面，那些不得不執行上級根據運動的利益而認爲眞正必要的命令的人——這些命令和政府的措施有矛盾，當然只能托付給黨的菁英組織——情況也並不見得怎樣好。這些命令大多數「意圖模糊，發布時希望接受者會認出發令者的意圖，並且相應地作出行動。」㉛因爲菁英組織也並非只有義務服從領袖的命令(這在一切現存的組織中都是委託性質的)，而是「執行領導者的**意志**」。㉛而且，從黨內法庭中對「過分行爲」的長期審訊過程中可以蒐集到的情況來看，二者絕不是同一回事。唯一的區別是，菁英組織由於特別被這類目的所灌輸，早已被訓練得能理解到某些「暗示，意味的不只是單純的字面內容。」㉛

極權主義統治機構內部運動的動力產生於一個事實：領導者經常變換實際上的權力中心，將權力中心轉移到其他組織，但是並不解散或者甚至公開暴露被剝奪權力的羣體。在納粹政權初期，國會縱火案發生之後，衝鋒隊立即成爲眞正的掌權者，而黨卻成爲表面權威；然後權力從衝鋒隊轉移到黨衛軍，最後從黨衛軍轉移到保安局。㉛權力機構被剝奪權力，從來不假裝是領袖的意志。㉛但是，不僅領袖的意志如此反覆無常，如果與東方專制君主相比，後者的一時興致倒是穩定的範例了；實際祕密權力與表面公開表現之間連續變化的傾軋，使事實上的權力位置在定義上變成了神祕之物，統治集團成員本身在祕密的權力層級中也從來無法確信自己的地位。例如，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儘管在黨內資格很老，表面權力和職位

不斷上升，但是仍然談論要製造一系列東歐國家，作爲反對莫斯科時的安全屏障，當時握有實權者早已認定，無論何種國家結構都無法挽救蘇聯的失敗，東歐占領區居民已經變成了無國籍者，因此可以將他們消滅。[36]換言之，既然知道應該服從誰，一種相對穩定的層級制度會帶來極權主義統治眞正缺乏的一種穩定因素，那麼，納粹經常推翻眞正的權威，公開地製造新的統治樣式，相應地使舊樣式變成影子政府——這種遊戲明顯地可以無限玩下去。蘇維埃與國家社會主義制度之間的最重要區別之一是，每當斯大林在他的運動內部將權力重點從一個機構轉移到另一個機構時，傾向於將前一個機構連同它的人員一起淸除，而希特勒儘管嘲笑那些「無法跳過自己影子」的人，[36]但是很願意將這些影子調到另一個部門繼續使用。

多重設置的職務單位對於權力經常轉移是特別有用的；再者，極權主義政體留在權力位置上時間越長，單位就越多，完全依靠運動的工作機會也越多，因爲當在位者遭淸除時，並不廢止這個職位。納粹開始重複設置職務單位時，先協調各種現有的協會、團體和機構。全國範圍的多重設置中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協調並不是指合併入既存的黨內各個機構。結果，到納粹政權結束時，有兩個國家社會黨學生組織，兩個納粹婦女組織，大學教師、律師、醫生等等的納粹組織也都是兩個。[36]但是不能肯定在所有情況下，原先的黨內機構會比協調產生的對應機構更有權勢。[36]而且誰也不能肯定地預言，黨內哪一個機構會在內部層級制度中地位上升。[40]

有一個富於代表性的例子可以說明這種有計劃的無形狀態，這件事發生在科學界的一個反猶主義組織。1933 年，在慕尼黑成立了一個研究猶太人問題的機構（猶太問題研究所〔Institut Zur Erforschung der Juden-frage〕），由於猶太人問題總是被認爲決定了整個德國歷史，所以這個研究所很快地擴大爲近代德國歷史研究所。所長是著名歷史學家沃爾特・弗蘭克，研究所將傳統的大學改成外表上的學術機構。1940 年，在法蘭克福成立了另一家猶太問題研究所，所長是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他由於是黨

員，所以地位很高。結果，慕尼黑研究所變成一個影子機構，而法蘭克福研究所本應接收掠奪而來的歐洲猶太人收藏，所以應成爲規模頗全的猶太教圖書館所在地。但是幾年以後，當這批收藏品運到德國時，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沒有運到法蘭克福，而是去了柏林，被希姆萊的蓋世太保特別部門接收，目的是爲了徹底解決猶太問題(而不只是爲了研究)，這個部門的負責人是埃希曼(Adolf Eichmann)。舊有的研究所也並不廢除，所以在1944 年，情況變得如此：在大學歷史系的門面背後，存在著慕尼黑研究所更加實在的權力之威脅，在它之後，又是羅森伯格的法蘭克福研究所，而在這三塊門面的背後，才是由它們掩蓋和保護的眞正權力中心——蓋世太保特別分部「國家安全部」(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

蘇聯政府外表上儘管有成文憲法，但是不太引人注目，甚至很難從外部觀察它，不像納粹從魏瑪共和國繼承和保留的國家行政機構。蘇聯政權不像納粹那樣在協調時期就積累權力職位，所以更加依賴於創造新的職位，消除原先的權力中心。從這種方法產生的官僚機構劇增現象，受到了大整肅造成的反覆清除的阻止。但是我們至少也可以看出，俄國有三種嚴格分開的機構：蘇維埃或國家機構、黨的機構、內務人民委員機構(NKVD)，各自有獨立的經濟部門、政治部門、教育文化部門、軍事部門，等等。[41]

在俄國，政黨官僚的表面權力與祕密警察的實際權力與納粹德國政黨與國家的權力關係一樣，而多重衍生只在祕密警察身上顯得特別複雜，特務網廣泛密布，指定一個部門監控另一個部門。蘇聯的每一個企業都有祕密警察的特別部門，一視同仁地監視黨員和普通羣眾。與這個部門共存的是黨的另一個警察分支，它監視每一個人，包括內務部特務，它的成員是對手機構毫不知其名的人。除了這兩個間諜機構，更有作用的應數工廠工會，它負責監督工人完成預定工作額。但是，比這些機構更重要的是內務部的「特別部門」，它代表「內務部中的內務部」，即祕密警察內部的祕密警察。[41]這些相互競爭的警察機構的一切報告最後送交莫斯科中央委員會

和政治局(Politburo)。哪一份報告最重要，應該交給哪幾個警察部門去執行警察措施，都在這裡作出決定。當然，無論全國普通居民，還是任何一個警察部門，都不知道會有什麼決定；今天可能是內務部的特別部門，明天可能是黨的特務網；後天可能是地區委員會或一個地區部門。在所有這些部門中，沒有一個是根基合法的權力層級或權力機構；唯一確實的事情是，最後總有一個部門被選擇來體現「領導的意志」。

每一個在極權主義國家裡的人可能確信的唯一規律是，凡是政府機構，愈明顯可見，它們具有的權力就愈少，凡是存在的機構愈不爲人知，最終勢必權力愈大。根據這條規律，蘇維埃由成文憲法承認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權力卻比布爾什維克黨小；布爾什維克黨公開招收黨員，被承認是統治階級，權力卻小於祕密警察。祕密開始，實際權力也就開始。在這一方面，納粹國家和布爾什維克國家很相像；它們的差異主要在於，希姆萊的祕密警察機構壟斷而集權，另一方面俄國的警察活動混亂而互無關聯。

如果我們僅僅認爲極權主義國家是一種權力工具，將行政效率、工業能力、經濟生產力等等問題擱置一邊，那麼它的無形狀態就變成實現所謂領袖原則的最理想、最適合的工具了。重疊的、任務相同的職位之間不斷競爭，㊸造成對立和破壞，幾乎沒有機會產生效率；重點的迅速轉移使一個職位淪爲影子，另一個職位上升到權力，這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又不使任何人意識到變化或存在反對派的事實，這種制度的附加優點是對立的職位好像從來不知道它的失敗，原因或者是它並未被廢除（例如在納粹政權裡），或者到很晚才消滅，與具體事情表面上毫無任何關聯。由於除了少數幾個策畫者之外，誰也不知道權力機構之間的確實關係，所以事情可以輕而易舉地解決。非極權主義世界只偶爾有這些情況，例如一名高級外交官員承認大使館裡的一名小職員是他的頂頭上司。回顧歷史，倒常常可能看清爲何突然發生這樣喪失權力的現象，或者這種現象的原因。例如，今天我們不難理解，爲何在戰爭爆發時，像阿爾弗雷德・羅森伯格或漢斯・

弗蘭克這樣的人會轉到國家的職位上，因而被清除出眞正的權力中心，即領袖的內部小圈子。㊹重要的問題在於，他們不僅不知這些運動的原因，甚至可能也不懷疑這類明顯上升的職位（成爲波蘭總督或帝國東歐占領區事務部長）實際上不是意味著事業的頂峰，而是他們在國社黨內生涯的終結。

領袖原則在極權主義國家裡不再像在極權主義運動中那樣確立一種層級；權力並非像獨裁政體那樣從上到下滲透，直至政體的底層。實際原因是，沒有權力機構就不會有層級制度，除了對所謂「威權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的無數誤解之外，威權原則(principle of authority)在一切重要的方面是和極權主義統治針鋒相對。威權（與它在羅馬歷史中的起源大相徑庭）無論採取何種形式，總是意味著限制自由，但是並不廢除自由。但是極權主義統治的目的是廢除自由，甚至是消滅一般人類天性，無論多麼殘暴也要限制自由。技術上而言，極權主義制度中這種缺乏任何權威和層級制度的事實，顯示在最高權力（領袖）和被統治者之間沒有可靠的中間層次，各自接受規定的權力和服從的角色。領袖的意志可以隨時隨地體現，他自己不受縛於任何層級，甚至是確定自身的那個層級。因此，如果說運動在奪取權以後建立多元原則，在它的範圍內，每一個小領導者可以隨心所欲地行事，可以模仿在最高層的大領袖，那是不確切的說法。㊺納粹宣稱「黨就是領袖們的序列」，㊺這只是一個普通的謊言。正如無限地多重衍生職務和權威的混亂，導致每一個公民都感到自己直接面對領袖的意志（他任意地選擇執行他的決定的機構）一樣，整個第三帝國的一百五十萬名「領袖」㊺淸楚地知道，他們的權威直接來自希特勒，而沒有官員層級的中間層次。㊺直接依靠的現象是眞實的，而中間層次（當然具有社會重要性）卻是表面的、對一種威權式國家的虛假模仿。

領袖絕對壟斷權力與權力機構，最明顯地體現在他和他手下警察首腦的關係上，後者在極權主義國家裡占據了最有權勢的公開職務。但是，作爲一支眞正的警察部隊的首腦和菁英組織，儘管他掌握了巨大的物質力量

和組織權力，還是明顯地不可能奪取政權，使自己成爲國家統治者。因此，在希特勒垮台之前，希姆萊從未夢想過要問鼎希特勒的領袖地位，㊾也從未被提名爲希特勒的繼任者。更有趣的是貝利亞(L. P. Beria)在斯大林死後奪取權力未遂。雖然斯大林未允許他的警察首腦中任何人享有可與納粹統治的最後幾年中希姆萊享有的地位相比的職務，貝利亞也控制了足夠的軍隊，可以在斯大林死後向黨的統治挑戰，他只需占領莫斯科，封住通往克里姆林宮的一切道路；除了紅軍之外，誰也無法阻止他對權力的要求，但是這樣可能會引起流血的內戰，它的結果是誰也不敢保證的。關鍵在於貝利亞只在幾天之後便自動放棄了一切職務，雖然他必定知道，他將會喪命，因爲長期以來他竟敢玩弄警察的權力來同黨的權力對抗。㊾

缺少絕對權力，當然並未阻止警察首腦根據極權主義的權力原則來組織他的龐大機構。所以，最值得注意的是，觀察希姆萊接受任命以後如何著手重新組織德國警察，在祕密警察一向中央集權的機構中設置了多重職位，他明顯地做了極權政體之前的所有權力專家都害怕做的事，他們害怕權力分散會導致權力縮小。希姆萊首先在蓋世太保機構中增加了祕密警察，它原先是黨衛軍的一個部門，是作爲黨內警察力量建立起來的。當蓋世太保和保安局的主要職位最終集中於柏林時，這兩個巨大的祕密警察機構的地區分部保留了它們各自的身分，並且分別直接地向希姆萊自己在柏林的辦公室報告。㊾在戰爭期間，希姆萊又增加了兩個情報機構：一個由所謂的巡視員組成，控制與協調保安局與警察的關係，服從於黨衛軍的裁決；第二個是專門的軍事情報局，獨立於帝國軍隊之外而活動，最終成功地吸收了軍隊的軍事情報系統。㊾

極權主義專政最主要的特點之一是，完全沒有成功的或未遂的宮廷政變。(只有一次例外，1944 年 7 月，心懷不滿的納粹分子參加了反對希特勒的軍方陰謀。)表面上，領袖原則會招致在政權不變的情況下個人權力的血腥變化。這只是許多跡象之一，指出極權主義政府形式很少與渴望權力或

者甚至與欲求一個權力產生機制有關，也很少與帝國主義統治的最後階段的特點——爲權力而權力的遊戲——有關。但是，極權主義政府無論外表如何，都不是由一個集團(clique)或一個幫派統治的，這也是它最重要標誌之一。[53]希特勒獨裁和斯大林獨裁清楚地證明了一個事實：分子化的個人形成的孤立狀態，不僅爲極權主義統治提供了羣眾基礎，而且孤立狀態一直延伸到整個結構的頂層。斯大林幾乎槍殺了可以宣稱屬於統治集團的每一個人，每當一個小集團將要形成時，他將政治局成員隨意搬來搬去。希特勒摧毀納粹德國小集團的手段還不太可怕——唯一的一次血腥整肅是針對羅姆集團，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之間的堅強聯繫實際上依靠同性戀；他阻止小集團形成的辦法是經常轉換權力和威權，並且經常改變身邊最親近的人員，所以權力圈內的人和他之間先前的一切團結都迅速煙消雲散。很明顯，希特勒和斯大林性格中顯著的特點是可怕的背信，對此的報導用詞幾乎相同，這種性格不允許他們主宰像小集團這樣持久的事物。問題在於在位者之間不存在相互關係，他們的聚合不是由於政治層級中同等的地位，或者上下級關係，甚至也不是匪幫式的不穩定的忠誠。在蘇俄，每一個人都知道，一個大工業集團的總經理，外交部的部長，都可能在任何日子裡跌落到社會上和政治上的最底層，而一個毫不出名的人會取代他的位置。另一方面，在納粹專政的最初階段產生某些作用的幫派共謀，後來失去了延續的力量，因爲極權主義正是利用它的力量，將這種共謀蔓延到全國，在它的統治下策動全體民眾的犯罪。[54]

缺少一個統治集團，便使極權主義獨裁者的繼任者問題變得特別麻煩和爲難。這個問題的確使所有的篡位者困擾，而更有特點的是極權主義獨裁者從無一人試過建立一個王朝、指定兒子繼位的舊方式。希特勒作了無數次指定，爾後又自我否定，斯大林的方式是使繼位在蘇聯成爲一種最危險的榮譽。在極權條件下，懂得輸送帶(transmission belts)的迷宮便等同於最高權力，而每一個被指定的繼位者一旦開始明白實況，過一段時間他

就會被自動清除。有效的、相對長久的任命的確預設著集團的存在，它的成員們會分享領袖壟斷的內幕知識，而這正是領袖必須不惜一切予以防止的。希特勒有一次用自己的話向國防軍的最高將領們解釋這一現象，他們在戰爭的動亂中對這個問題可能深感苦惱，希特勒說：「作爲最終因素，我必須完全謙虛地(in all modesty)提出：我本人是不可取代的。……帝國的命運完全只靠我一人。」[55]無須在「謙虛」這個詞上尋找諷刺意義；極權主義統治者與先前的篡位者、專制君主、暴君不同，似乎相信繼位問題並不十分重要，這項工作不需要特殊品質和訓練，整個國家最終會在他死去時遵從偶然被任命的任何人，不會有渴望權力的反叛者否定此人的合法性。[55]

作爲統治的技巧，極權的設計看來簡單而具有實效。它們不僅保證絕對的權力壟斷，而且空前地確信一切命令都必定被執行：「輸送帶」的多元、層級的混亂，都讓獨裁者完全獨立於他的一切下級，有可能使政策變換迅速而出人意外，這一點是極權主義最爲人知的特色。國家政體可以防止震盪，因爲它根本無形。

這種異常的效率爲何以前從未試過，其原因與此設計本身一樣簡單。職務單位多重設置摧毀了一切責任感和競爭感；它不光使行政背上巨大負擔，能力下降，而且實際上使生產力下降。因爲各種互相衝突的命令常常使實際工作拖延，直到領袖的命令決定了事情爲止。菁英幹部的狂熱對於運動的功能至關重要，它系統地廢除了一切對具體工作的眞正興趣，產生了一種思想狀態，每一種可想見的行動都被看成某種完全不同事物的工具。[55]這種思想狀態不限於菁英，它逐漸擴大影響到所有的人，他們的生死問題中最具體的細節都依靠政治決定，亦即取決於和行動表現毫無關係的原因和外部動機。經常性的變動、降職和升級造成不可能有可靠的集體工作，阻止了事物的發展。從經濟角度來看，奴隸勞動是俄國沒有能力經受的奢侈做法；在技術能力嚴重短缺的時代，集中營裡關滿了「高水平的工程師，他們競相做管線鋪設、修鐘、電力照明、電話修理等等工作。」[55]從純粹功利

主義的觀點來看，當時蘇聯不會有能力承受三十年代的大整肅，它中斷了等待已久的經濟復甦，也不會有能力承受破壞紅軍總參謀部的行爲，它幾乎導致俄國對芬蘭戰爭的失敗。

德國的情況在程度上不同。開始時，納粹顯得很注意技術和管理技能，允許有商業利潤，在經濟上不過加干涉。在戰爭爆發時，德國還沒有完全極權主義化，如果認爲戰爭準備是一種合理的動機，那麼就必須承認，大致上到 1942 年，它的經濟還能夠合理地運作。戰爭準備本身不是反功利主義的，儘管它的成本花費非常高，❺但是「征服別國以奪取財富和資源，比從外國購買或在本國生產要廉價得多。」❺在任何情況下，如果意圖掠奪其他國家，來補充國內經濟之不足，那麼，投資與生產、穩定收益與利潤、資源枯竭等等經濟規章就不能適用；這是事實，而富有同情心的一些德國人也明白這一點，著名的納粹口號「大炮或者黃油」實際上意味著「通過大炮獲得黃油」。❺直至 1942 年，極權統治的法則開始壓倒一切考慮。

戰爭爆發時，極端化的作法立即開始了；人們甚至可能猜測，希特勒挑起這場戰爭的原因之一是，戰爭可以使他加快在和平時期難以想像的發展速度。❺但是，這一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經濟並未因爲像斯大林格勒那樣毀滅性的失敗而受阻，戰爭完全失敗的危險只是另一種刺激，使一切功利主義的考慮擺上桌面，全力以赴地嘗試通過無情的極權組織來實現極權主義種族意識形態之目標，而無論時間多麼短促。❺斯大林格勒戰役之後，一向與民眾嚴格隔開的菁英組織作了大規模擴展；軍隊的黨禁開放了，軍事指揮權從屬於黨衛軍指揮官。黨衛軍心懷嫉妒地保衛的犯罪獨佔權也被放棄了，士兵們任意被指派參加大規模屠殺。❺軍事、經濟、政治諸方面的考慮都無權干涉花費極高、麻煩極多的大規模屠殺和驅逐的計劃。

如果考慮到納粹最後幾年的統治和他們的「五年計劃」，儘管他們沒有時間執行，但是它的目標是消滅波蘭和烏克蘭民族，消滅一億七千萬俄國人(在一項計劃中提及此事)，西歐的知識分子，例如荷蘭人和阿爾薩斯與

洛林的人，以及根據即將執行的帝國健康法案或已制定的「社區外國人法」(Community alien law)指定無資格生存的德國人，就像布爾什維克 1929 年(俄國極權主義專政的第一年)的五年計劃一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是庸俗優生學的口號，另一方面是經濟高調，構成了「狂妄之舉，其中一切邏輯規則和經濟學原理都完全顚倒」的序曲。[65]

無疑，極權主義獨裁者並非有意識地走上通向瘋狂的道路。問題恰恰在於，我們對極權國家結構的反功利主義性質的迷惘產生自錯誤的觀念，以爲我們是在研究一個正常的國家——是官僚主義、暴政、獨裁的國家——我們忽略了極權統治者強調的話，他們將偶然奪得政權的國家看作是走向征服全世界的國際運動臨時司令部，他們從幾百年、幾千年的角度來認識勝利和失敗，全世界性的利益總是壓倒了它們自己領土的局部利益。[66]著名的口號「凡是對日耳曼民族有利，就是正確的」只是爲了大眾宣傳；納粹分子們聽到的是「凡是對運動有利，就是正確的，」[66]這兩種利益並不永遠相符。納粹並不認爲日耳曼人就是一個主人種族，世界屬於他們，而是認爲，他們應該由一個主人種族領導，就像其他一切民族一樣，而這個種族正在誕生。[66]主人種族的曙光不是日耳曼人，而是黨衛軍。[66]希姆萊所說的「日耳曼世界帝國」(Germanic world empire)，或者希特勒可能會說的「亞利安」世界帝國，無論如何總是幾百年以後的事。[66]對於「運動」而言，更重要的是顯示出，有可能用消滅其他「人種」來造出一個新種族，這比顯示贏得一場目標有限的戰爭更有意義。使外部觀察家感到這是「狂妄之舉」的，在於運動絕對高於國家、民族、人民和由統治者自己擁有的權力地位的結果。眞正的極權主義統治手段將絕對的、最高的權力集中於一人之手，先前從未試過這種手段的原因是普通的暴君從未發瘋到拋棄一切有限的局部利益——經濟的、民族的、人的、軍事的——以迎合一種無限遙遠的將來的純粹虛構現實。

由於執政的極權主義繼續忠於運動的原先宗旨，所以運動的組織手段

和所謂的極權主義國家之間驚人的相似性也就不會令人驚奇了。黨員與在前鋒組織中的同路人之間的區別遠未消失，導致已變成同情者的全體民眾「協調」。同情者人數大量增加，而黨內力量則限於由幾百萬人組成的一個特權「階級」，從中再製造一個由幾萬名菁英組織成員構成的超級黨。多重職位、職能複製、使黨員與同情者關係適應新的條件，都只意味著運動有一種奇特的洋葱式結構(onion-like structure)，其中每一層都遮著下一層更好鬥的組織。國家機器轉化爲一種同情者官僚構成的前鋒組織，它們在國內事務中的功能是在純粹被協調的公民大眾中傳播信心，在外交事務中愚弄外部的非極權主義世界。領袖作爲國家元首和運動領導者的雙重能力，又結合了他個人極度好鬥的無情性格和鼓舞人心的正常狀態。

極權主義運動和極權主義國家之間的重要區別之一是，極權主義獨裁者比運動領袖更能夠而且必須實踐經常性的、大規模地撒謊的藝術。這部分是同行者隊伍膨脹的自動結果，部分則由於一個政治家令人不愉快的話並不像煽動人心的黨領袖那樣容易撤銷。出於這一目的，希特勒選擇了直接回到舊式的民族主義，這是他執政之前多次譴責的；他裝作一個激烈的民族主義者，宣稱國家社會主義不是一種「出口商品」，他同樣撫慰日耳曼人和非日耳曼人，暗示當傳統的民族主義德國的外交政策要求——歸還根據凡爾賽和約割讓的領土，併吞奧地利及併吞波西米亞的德語地區——實現時，納粹的野心就會滿足。斯大林同樣地重視俄國公眾輿論和非俄羅斯世界，他發明了自己的理論「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將世界革命的重擔扔給了托洛茨基。[71]

只有在極權統治的條件下，每日現實的虛構性質使宣傳大多成爲多餘，才能安全地、有條不紊地向全世界撒謊。在執政之前，運動難以隱藏它們的眞正目的——它們畢竟要鼓動羣眾組織。但是，既然已有可能用毒氣室將猶太人像臭蟲一樣滅絕，就不再需要宣傳說猶太人是臭蟲了；[72]既然有權力在向全國教導俄國革命史時可以不提托洛茨基的名字，就不再需要宣

傳反對托洛茨基了。但是，只能「期望」那些「意識形態上完全堅定」的人來使用執行意識形態目標的方法——無論他們是在共產國際學校還是在特殊的納粹思想灌輸中心獲得這種堅定立場——即使這些目標還在被宣傳。在這種情況下，結果必然使單純同情者們從來不明白發生了什麼。[73]這就導致一種弔詭，「光天化日之下的秘密會社」在它被國際禮節承認爲正式成員之前，其性質和方法絕不會更帶有密謀氣息。希特勒在執政之前拒絕在密謀基礎上組織政黨甚至菁英集團，這完全符合邏輯；然而到了 1933 年，他十分熱心地幫助將黨衛軍改變成一種秘密會社。[73]同樣地，莫斯科指揮的各國共產黨與它們的前身完全相反，顯示出一種奇特的傾向，即使完全有可能處於合法態度，寧可選擇密謀狀態。[73]極權主義的力量愈顯著，它的眞正目的就愈變得秘密。要想知道希特勒在德國統治的最終目標，聰明的做法是研究他的宣傳演講和《我的奮鬥》，而不是他作爲第三帝國總理的預言；正如聰明的做法是別相信斯大林關於「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話，這是他在列寧去世之後出於奪權之目的權宜說法，而應該認眞看待他反覆表現出的對民主國家的敵視。極權主義獨裁者們十分清楚地知道他們的正常姿態中的內在危險，即一種眞正的民族政策或實際上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危險。他們想通過一再保證的話語和實際統治之間長期一貫的差異，通過有意識地發展一種總是言行相反的方法，來克服這種危險。[73]斯大林曾執行這種平衡藝術(它要求比普通的日常外交更多的技巧)，使外交政策和共產國際路線的緩和幾乎無一例外地伴隨著俄國黨內的整肅。統一陣線政策和較開明的蘇聯憲法的起草，伴隨著莫斯科大審判，這當然絕非偶然。

在納粹和布爾什維克的文獻中，可以反覆見到極權主義政府意在征服全世界、將一切國家置於它們統治之下的證據。然而這些出自前一極權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綱領（納粹超民族的反猶主義政黨，布爾什維克的國際革命社會主義概念）並不是決定性的。關鍵在於極權主義政權實施它們的

外交政策是根據一貫的假設，認爲它們最終能達到最後目標，無論顯得多麼遙遠，無論它的「理想的」要求會多麼嚴重地與現時需要發生衝突，它們都絕不放棄。所以它們認爲沒有一個國家會永遠是外國，而相反，每一個國家都是它們的潛在領土。上升到執政地位，在一個國家裡運動的虛構世界變成一種可觸及的現實，造成了一種和其他國家的關係，與非極權統治下極權主義政黨的情形相似：可觸及的虛構現實，由國際承認的國家政權支持，可以用同樣方式輸出，正如對議會的蔑視可以輸入到一個非極權主義的議會中去。在這一方面，戰前「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方案是納粹德國出色的出口商品：驅逐猶太人，這就把重要的一部分納粹主義帶到了其他國家；迫使猶太人沒有護照、身無分文地離開帝國，「流浪的猶太人」(Wandering Jew)的傳說就變成了現實，納粹迫使猶太人毫不妥協地仇視他們，因此製造了藉口，得以熱切地干預所有國家的內政政策。⑰

納粹帶著他們是世界的未來統治者的陰謀虛構，多麼認眞地在 1940 年露面——儘管是一種需要，面對一切戰勝歐洲占領區民族的確實機會——它們開始在東歐占領區實行人口驅逐政策，竟無視失去勞動力和嚴重的軍事後果，執行一種新的法律，帶有第三帝國在西歐占領區各國懲治條例追溯力的治外法律部分。⑰將反對第三帝國的每一句言論或每一種行動都當作最高叛逆罪來懲罰，不管何時、何地、何人，這幾乎是一種最有效的宣傳納粹征服世界的方式。納粹法律將全世界都視爲潛在地在其法律管轄之下，所以占領軍不再是帶著征服者的新法律的征服工具，而是強化一種假定早已爲每一個人而存在的法律的執行機構。

假設納粹法律爲超越德國疆界而設立，懲治的是非德國人，這些都已不止是壓迫手段了。極權主義政府即使用其他方法，有害於自己民族的利益，也不怕合乎邏輯的征服世界的含義。一項征服世界的計劃涉及到廢除征服者母國和被征服國家之間的差異，以及國外和國內政治之間的差異，這差異是一切既存的非極權主義機構和一切國際交往的基礎，在邏輯上是無

可辯駁的。如果極權主義征服者的行爲在到處都像在自己國家一樣，那麼同樣地，他對待自己的人民也會擺出外來征服者的姿態。⑲事實上，極權主義運動奪得政權，就好比是一個外來征服者可能占領一個國家，他統治這個國家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別的事情和別人的利益。納粹在德國行爲像外來征服者，他們不顧一切民族利益，嘗試並一半成功地將他們的失敗轉換成全體德國民眾的最後大災難；同樣地在勝利情況下，他們也意圖使種族滅絕的政治擴展到「種族不適合」的德國人。⑲

同樣的態度激發了戰後蘇聯的外交政策。它對俄國人民本身的挑釁，代價也是非常高的：它預定戰後向美國大筆貸款，以一種合理有效的方式使俄國重建劫後荒廢的地區，實現國家工業化。在巴爾幹半島諸國擴展共產國際政府和占領東歐大批土地，並未帶來實際利益，相反卻進一步消耗了俄國的資源。但是這種政策當然服務於幾乎遍布半個世界的布爾什維克運動。

極權主義獨裁者像一個外來征服者，將每一個國家（包括自己國家）的自然財富和工業財富看作戰利品，當作準備下一步侵略擴張的準備。由於這種系統地掠奪的經濟是爲了運動而不是爲了民族而進行的，所以作爲潛在受惠者的人民和領土都不可能成爲這一過程的飽和點。極權主義獨裁者像一個不知從何處來的外來征服者，他的掠奪不能使任何人受惠。到處造成的破壞也不是爲了加強本國經濟，而是一種暫時的策略手段。至於經濟目標，極權主義政權在自己國家裡隨心所欲，就像俗話說的一大羣蝗蟲。極權主義獨裁者像一個外來征服者一樣統治自己的國家，使事情越來越糟，因爲它用無情來達到效率，這在周圍國家的暴政中也是明顯少見的。三十年代初，斯大林對烏克蘭的戰爭比德國可怕的血腥侵略和占領更加有效率。⑲這就是極權主義爲何選擇傀儡政府來統治，而不顧這些政權有明顯危險的原因。

極權主義政權的麻煩不在於它們以一種特別無情的方式玩弄權力政治，而在於它們的政治背後隱藏著一種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權力概念，正如在它們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中存在著一種全新的、前所未有的現實觀念一樣。不是冷酷無情，而是以最高結果來藐視直接結果；不是民族主義，而是毫無根由地忽略民族利益；不是不考慮追求自我利益，而是嘲笑功利主義動機；不是渴望權力，而是「理想主義」，即對一種意識形態虛構世界毫不動搖的信念——這些都作為一種新的不安因素進入國際政治，比純粹的侵略更令人不安。

極權主義相信權力只存在於通過組織而產生的力量。正如斯大林把每一種機構看作獨立於它的實際功能之外的「聯繫黨和人民的傳送帶」，㉜眞誠地相信蘇聯的最寶貴財富不是豐饒的土地或巨大勞動力的生產能力，而是黨的「幹部」(cadres)㉜(即警察)，希特勒早在1929年就看出運動的「偉大事物」是六萬人「幾乎變成一個單位，實際上這些人不僅思想統一，而且面部表情幾乎也一樣。請看這些歡笑的眼睛，這些瘋狂的熱情，你就會發現……十萬人在運動中變成了一種類型。」㉜在西方人的思想中，無論權力同塵世的激情、財富、貴物發生聯繫，都已溶入一種非物質化的機制，它的每一個動作都產生力量，就像摩擦或直流電產生電力一樣。極權主義將國家分為富國和窮國，這還不止是一種煽動手段；製造這種說法的人實際上相信可以忽視物質財富的力量，因為它只會阻撓組織力量的發展。斯大林認為警察幹部的經常發展比巴庫的石油、烏拉爾的煤和鐵礦、烏克蘭的糧倉或西伯利亞潛在的財富都重要得多。同樣的想法使希特勒為了黨衛軍幹部而犧牲整個德國；當德國城市變成瓦礫、工業能力被摧毀時，他並不認為戰爭已經失敗，而當他得知黨衛軍部隊已不再可靠時，他才認為是戰敗了。㉜對於一個人來說，他相信組織力量無所不能，不相信純粹物質因素(事實的或經濟的)，還有，他根據幾百年時間來估算他的事業的最後勝利，那麼，失敗不在於軍事災難或人民挨餓的威脅，而只是菁英組織的毀

滅，他們本來是要通過一代代人來達到最後目的，完成統治世界的最後陰謀的。

極權主義國家的無結構狀態(structurelessness)，忽視物質利益，擺脫利潤動機，一般的非功利主義態度，都無與倫比地使當代政治變得不可預測。非極權主義世界無法把握這樣一種精神狀態：它不根據人和物、不依靠可估計的行爲來發生作用，完全漠視民族利益和人民的福利，使自己在判斷力上產生奇怪的兩難：凡是正確理解極權主義組織和警察之可怕效效的人，都可能會高估極權主義國家的物質力量，而凡是明白極權主義經濟之浪費及無能的人，卻都低估了可以無視一切物質因素時所創造的權力潛力。

(二)秘密警察

直到現在，我們還只知道極權主義統治的兩種正式形式：1938 年後的國家社會主義專政，1930 年以後的布爾什維克黨專政。這兩種統治形式與其他各種獨裁、君主專制和暴政統治的形式根本不同；它們儘管以某種連續的形式從政黨專政中發展起來，但是它們的極權主義根本特徵是新的，不可能產生於一黨制。一黨制的目標不僅是奪取政府行政權，而且用黨員充實所有的職位，達到國家和政黨的完全合併，以使黨在奪取政權後變成政府的宣傳組織。這種制度僅從反面意義上是「極權的」(total)，即占統治地位的政黨不會容忍其他政黨、反對派和自由政治觀點。一旦政黨專政掌握了政權，它就使原先國家與政黨之間的權力關係保持原狀；政府與軍隊像以前一樣行使權力，「革命」的事實只不過是一切政府職位現在都由黨員占據。在所有這些情況中，政黨的權力壟斷由國家保障，黨不再擁有自己的權力中心。

在極權主義運動執政之後發動的革命帶有相當激進的性質。從一開始

起，他們有意識地努力維持國家與運動之間的根本區別，努力防止運動的「革命」機構被政府吸收。㊱奪取國家機器而又不和它合併的問題得到了解決，其方法是允許在運動中只有次要作用的黨員上升至國家機構的層級體系。一切眞正的權力都在運動的組織機構裡，而在國家和軍事機器之外。在運動內部決定一切國家事務，運動始終是國家的行動中心；政府官員們常常不知道發生了什麼，而黨員若有野心想爬到部長位置，在一切情況下，他爲這種「資產階級的」願望付出的代價是失去他對運動的影響和領導者的信任。

執政的極權主義利用國家作爲它的外表，來代表它在非極權主義世界裡的位置。極權主義國家本身是極權主義運動的邏輯繼承人，它借用了後者的組織結構。極權統治者以對付非極權政府的方法，在執政之前對付議會各黨和黨內各派，在一個擴大了的國際舞台上，又一次面對那個雙重問題：在現實世界的衝擊力之下掩蓋運動（或極權主義國家）的虛構世界，向外部的正常世界顯示類似的正常狀態和常識。

在國家之上，在表面權力的背後、在眼花撩亂的職位之中，存在著一切權力更迭，而在無效率的混亂之下，存在著國家的權力核心、秘密警察的超級效率和超級工作能力。㊱強調警察是唯一的權力工具，相應地忽略表面上是更強的權力庫的軍隊，這是一切極權主義政權的特徵，其中一部分原因可以解釋爲極權主義統治世界的野心，以及它有意識地廢除外國與本國、外交與內政之間的區別。訓練來和外國侵略者作戰的軍隊向來是一種可用於內戰目的的可疑工具；即使在極權主義條件下，他們也發覺自己很難用外來征服者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民。㊱在這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即使在戰爭期間，他們的價值也變得很可疑。由於極權主義統治者以假設一種最終的世界政府爲基礎來推行他的政策，所以他對待自己的侵略所造成的受害者就好像他們是反叛者，犯了最高叛逆罪，結果選擇用警察來統治占領地區，而不是用軍隊。

甚至在運動奪取政權之前，它也擁有一支秘密警察和間諜機構，在各國建立分部。後來，它的代表得到比正規軍情報機構人員更多的金錢和權力，常常成爲駐外大使館和領事館的秘密首領。[89]它的主要任務包括組織第五縱隊，指揮運動的國外支部，影響各國內政，從總體上使極權主義統治者——在推翻政府或取得軍事勝利之後——能夠公開感到行動自如。換言之，秘密警察的國際支部是傳送帶，經常將極權主義國家的表面外交政策轉變成極權主義運動潛在的國內事業。

但是，秘密警察爲準備極權主義統治世界的烏托邦而完成的這些功能，對於那些要求在一個國家裡立即實際極權主義虛構的人來說，還是次要的。秘密警察在極權主義國家的國內政策上所產生的主控作用，自然地使人們普遍誤解極權主義。一切專制主義都倚重秘密警察，感到自己的人民比外國民族威脅更大。但是，極權主義和專制主義的這種相似之處只出現在極權主義統治的第一階段，這時還有政治上的反對派。在這一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樣，極權主義利用（並且有意識地支持）了非極權主義國家的誤解，而無論它們之間根本不能互補的程度如何。希姆萊在 1937 年對國防軍參謀總部那次著名講話中，假設了一個普通暴君的作用，他用假設存在一種「戰爭情況下的第四個舞台，即德國國內」，來解釋警察力量的不斷擴展。[89]同樣地，斯大林幾乎在同時也一半成功地說服了老布爾什維克衛士們（他需要他們的「告白」），使他們相信一場戰爭正威脅著蘇聯，因此，即使在暴君之後，全國必須在緊急狀態下保持結合。這些說法的最引人注目的是，兩者都發生在政治對立派被消滅以後，秘密警察擴展了，但是事實上已沒有需要監視的反對派。戰爭發生時，希姆萊在德國本土既不需要、也不使用他的黨衛軍部隊，只用於管理集中營和監視外國奴工；在東歐前線服務的武裝黨衛軍用於「特別任務」——通常是大規模屠殺——和強化經常同軍方以及納粹文官發生經常衝突的政策。黨衛軍組織就像蘇聯的秘密警察一樣，通常在軍隊平息了占領區之後到達，對付膽大的政治反對派。

但是在一個極權主義政權的最初幾個階段，秘密警察和黨的菁英組織仍然發揮了一種作用，它與其他形式的獨裁和歷史上著名的恐怖政權的作用一樣；他們的方法過於殘酷，在現代西方國家的歷史上卻是無與倫比的。深挖秘密敵人和追蹤前反對派的第一階段，通常是將全體居民都拉進前鋒組織，重新教育老黨員從事革命的特務工作，以使同情者們的同情雖然相當疑惑，卻無須懼怕受過專門訓練的警察幹部。在這個階段，如果誰偶然懷有「危險思想」，他的鄰居就會成爲比官方指定的政治代表更危險的敵人。清除了公開的或秘密的有組織的抵抗，這是第一階段的結束；這一階段的結束時間大致是德國的 1935 年和蘇俄的 1930 年。

只有在完全消滅了眞正的敵人，開始捕捉「客觀的敵人」(objective enemies)時，極權主義政權的恐怖才成爲眞正的內容。藉口在一個國家裡建成社會主義，或者利用某一塊領土作爲革命的實驗室，或者實現「德國民族共同體」，才開始實行極權主義的第二項主張，即要求極權統治。儘管從理論上講，全面統治(total domination)只有在統治全世界的條件下才有可能，但是極權主義政權卻證明了這一部分極權主義烏托邦幾乎可以完美地實現，因爲它暫時還不涉及到失敗或勝利。因此希特勒即使軍事上受挫，他仍能爲消滅猶太人和建立死亡工廠而感到高興；無論最後結果是什麼，若無戰爭，就絕不會有可能「燒燬橋樑」，實現極權主義運動的某些目標。[91]

納粹運動的菁英組織和布爾什維克運動的「幹部」是爲極權統治服務，而不是爲掌權政府的安全服務。正如極權主義號稱統治世界只是在外表上和帝國主義擴張一樣，極權統治也只是**似乎**像專制主義的學生。如果說，極權主義與帝國主義擴張之間的主要差異是，前者不承認國內和國外的區別，那麼，專制政治的秘密警察和極權主義的秘密警察之間的主要區別就是後者並不追蹤秘密思想，並不利用舊的秘密警察方法，即挑撥煽動的方法。[91]

由於極權主義秘密警察在一個國家平息之後才開始活動，在一切外面

觀察者看來，它總是顯得完全多餘——或者相反，誤導人們認爲有著某種秘密的抵制。⑬ 秘密警察的多餘性(superfluousness)也不是一個新問題；它總是被迫證明自己的有用性，在最初的任務完成之後保持自己的工作。出於這一目的而使用的方法，使對革命史的研究成了一件相當困難的事。例如，在路易・拿破侖統治下，似乎沒有一項反政府的行動不是由警察引起的。⑬同樣地，沙皇俄國一切革命政黨中特務的作用顯示出，若無他們「煽動」挑撥的行動，俄國革命運動就不會那樣成功。⑬換言之，挑撥行動極大地幫助維護傳統的延續性，也一再打斷革命的組織工作。

挑撥煽動的作用十分可疑，這也許是極權主義的統治者放棄它的原因之一。再說，挑撥行動只有在懷疑還不足以構成逮捕和懲罰時才明顯地需要。當然，沒有一個極權主義統治者會夢想有條件使他能訴諸挑撥行動，以使他認爲是敵人者落入陷阱。比這些技術問題更重要的是，事實上極權主義在執政之前，只根據意識形態來確定它的敵人是誰，以致各種「可疑分子」(suspects)的範疇也並不通過警方情報來確定。所以，納粹德國的猶太人或蘇俄的前統治階級的後代並不是任何一次敵對行爲的眞正嫌疑犯；他們已經根據意識形態，宣布了其政權「客觀的」敵人。

專制政權和極權主義的秘密警察之間的主要區別在於「可疑分子」和「客觀敵人」之間的區別。後者由政府的政策確定，而不是根據他是否有推翻政府的欲望。⑬他絕不是一個思想應該挑動，或其歷史很可疑的個人，而是一個「帶有傾向的人」(carrier of tendencies)，就像帶有一種傳染病一樣。⑬從實踐角度來說，極權主義統治者開始時像一個不斷侵擾別人的人，直到每一個人都知道後者是他的敵人，以使他能自圓其說地出於自衛而殺死他的敵人。這當然有點殘酷，但是很有效——因爲每一個目睹者都知道某些成功的陰謀家是如何消滅競爭對手的。

使用「客觀敵人」的概念，對於發揮極權主義政權的功能，比對於各種範疇的意識形態定義要重要得多。假如這只是一個仇恨猶太人或仇恨資

產階級的問題，那麼極權主義政權在犯了一次巨大的罪惡之後，便可以回到正常生活和正常政府的規則上來。而我們知道，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客觀敵人的範疇大大超過了運動最初在意識形態上確定的敵人；新的客觀敵人是根據變化的環境來發現的：納粹預見到完成滅絕猶太人，他們早已做好了預先的措施來消除波蘭民族，而希特勒甚至計劃除掉某幾類德國人；[98] 布爾什維克從過去的統治階級的後代開始著手，接著將完全的恐怖對準富農(在三十年代)，再接著是波蘭血統的俄國人(在1936年到1938年之間)，在戰時是韃靼人和伏爾加流域德國人，戰後紅軍占領軍中的前戰俘和單位，猶太建國後的俄國猶太人。對這些種類的選擇絕不完全是任意的；由於他們被用於在國外的運動中作宣傳，所以必然顯得是可能的敵人；選擇一個具體的種類，也許只是出於運動在總體上的某種宣傳需要——例如蘇聯政府突然出現前所未有的反猶主義，這也許是考慮要在東歐衛星國中贏得對蘇聯的同情。要求「客觀地」認定的敵人主動坦白罪行的公開審訊也是出於這些目的；在表演時，最好是那些接受過極權主義思想灌輸的人能夠「主動地」懂得自己「客觀上」有害於國家，並且「爲了事業起見」坦承自己的罪行。[98]「客觀反對者」(objective opponent)的概念根據流行的情勢而改變定義——所以，一旦清除了一種人，就會向另一種人宣戰——確切地符合實際形勢，由極權主義統治者一再重申：他們的政權不是一個任何一種傳統意義上的政府，而是一種**運動**，它的前進道路上經常遇到新的障礙，需要清除。只要誰能說出極權主義制度內部有何合法思想的話，「客觀反對者」必然是它的中心觀念。

與這種將嫌疑者轉化爲客觀敵人的做法密切相關的是秘密警察在極權國家內的地位變化。秘密警察向來被正確地稱爲國中之國，這不僅發生在專制主義國家裡，而且也發生在憲法政府和半憲法政府中。僅就擁有秘密情報而言，就永遠使這個部門決定性地高於政府的一切其他部門，而且對政府的成員構成公開的威脅。[98]相反，極權主義的警察完全服從領袖的意

志，只有領袖才能決定誰是下一個潛在的敵人，或者（像斯大林所做的那樣）誰可能挑選出秘密警察的幹部作爲清除的對象。由於不再允許警察使用挑撥的方法，他們就被剝奪了永遠使自己獨立於政府之外的唯一可用的手段，完全變成爲了維護自己的工作而完全依靠上級。就像非極權主義國家裡的軍隊一樣，極權主義國家的警察只執行政策，失去了他們在專制官僚政治體制下擁有的一切特權。[101]

極權主義警察的任務不是去發現罪行，而是當政府決定逮捕居民中某一類人時，它能立即出動。它的主要政治特徵是，只有它才受到最高當局的信任，並且知道要強化哪一條政治路線。這並非只在高級政策問題上有效，例如清除整個階級或種族羣體，（在三十年代初，只有格別烏幹部才知道蘇維埃政府的眞正目標，在四十年代初，只有黨衛軍組織才知道要清除猶太人）；在極權主義條件下，日常生活中的關鍵是工業企業中只有內務人民委員會代表才接到莫斯科的命令，知道要他們做什麼，例如加速生產鐵管——無論這道命令是簡單地需要鐵管，還是要整垮廠長，還是要清除全體管理人員，或者取消這家特殊工廠，或者在全國傳達這道命令，以便開始一場新的整肅運動。

複製秘密警察機構，使它的成員互不知情，這樣做的原因之一是極權統治需要最極端的靈活性：例如，莫斯科可能還不知道，當它發布要鐵管的命令時，究竟眞的是要鐵管——鐵管總是需要的——還是要一場整肅運動。增加秘密警察，就造成在最後一刻改變決定的可能，以致當一個部門可能正在向工廠廠長傳達列寧的指示，另一個部門卻正在布置逮捕他。這種矛盾的任務可能同時下達，警察的效率就可想而知了。

秘密警察在極權政體下和在其他政體下一樣，壟斷某些重要的情報。但是這種只有警察才能知道的情報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警察不再關心未來犧牲者腦子裡在想些什麼（在大多數時間裡他們不追問這些犧牲者會是誰），警察變成了國家最大秘密的託管人。這自然意味著極大地改善了聲譽

和地位，儘管這伴隨著失去一定的實際權力。領袖不知道的事情，秘密警察也不再會知道；他們下降到了權力執行者的層次。

從法律角度來看,比從可疑分子轉到客觀敵人這種變化更有趣的是,可疑的觸犯被極權主義置換爲可能的罪行(possible crime)。可能的犯罪不再是主觀的，而是客觀敵人。嫌疑的被捕，是因爲他被認爲可能犯的一樁罪行和他的人格（或者他被懷疑的人格）多多少少相符合，⑩極權主義所說的可能的罪，所根據的是邏輯推斷客觀發展。對老布爾什維克衛士和紅軍將領的莫斯科審判是懲罰可能罪行的範例。在異想天開地羅織的指控背後，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下面的邏輯推理：蘇聯的發展可能導致危機，這場危機可能導致推翻斯大林的獨裁，這可能會削弱國家的軍事力量，可能引起一種新的情況，新政府可能會簽署停戰協定，甚至會和希特勒結盟。而在當時，斯大林已開始宣稱存在著一個推翻政府的陰謀和一個與希特勒勾結的陰謀。⑩針對這種雖然完全不可能(impropable)的「客觀」可能性，只有「主觀」因素，例如被指控者值得信任、他們疲乏了、他們不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他們堅定地相信若沒有斯大林就會失去一切、他們確實仇恨法西斯主義——一系列事實細節，其中自然缺乏虛構的、邏輯的、可能的罪行的連貫性。因此，極權主義的中心假設——一切都是可能的——就通過不斷清除一切事實的束縛，得出荒唐可怕的結論，即統治者可以認定的每一樁罪行都必須受到懲罰，無論此罪是否已犯。可能罪行就像客觀敵人一樣，當然在警察的能力範圍之外，他們既不能發現、發明它，也不能挑動它。秘密警察在此又一次完全依靠政治權威。他們失去了國中之國的獨立性。

極權主義的秘密警察只有在一個方面仍然很像非極權主義國家的秘密警察。根據傳統做法（即自從福歇以來），秘密警察從它的受害者處得益，並從某些非正統的來源中擴大官方的國家批准的預算，只消在應該被禁止的活動中參與一角，如賭博和娼業之類。⑩這些自己籌款的非法方式各式

各樣，從友好地接受賄賂到大膽勒索，這在使秘密警察從公共權威當局下獲得自由、加強他們作爲國中之國的地位，是一個很突出的因素。奇怪的是，一切都變了，只有警察活動的經費和收入來自他們的受害者這一點沒有變。在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幾乎完全依靠剝削奴隸勞工，也確實別無利潤，經費也只用於巨大的秘密機構。[105]希姆萊最初通過劫掠猶太人的財產來提供他的黨衛軍部隊經費(他們是納粹秘密警察幹部)；然後他和農業部長達雷(Walter Darré)簽訂了一份協議，希姆萊從中得到幾億馬克，這是達雷每年從國外廉價買進農產品，又在德國以固定價格出售而賺來的。[105]戰爭期間，這種收入來源當然不見了；托德特(Todt)的繼任艾伯特·斯皮爾(Albert Speer)，德國 1942 年以後最大的勞動力雇主，於 1942 年向希姆萊提議同樣的交易；假如希姆萊同意黨衛軍將輸入的奴隸勞工（他們的工作非常低效）撥給斯皮爾的組織，後者就將利潤的一部分提供給希姆萊作爲黨衛軍經費。[105]在這種多少顯得常規化的收入來源之外，在經濟危機時，希姆萊又加用了秘密警察舊的勒索方法：黨衛軍各單位在自己周圍組織了「黨衛軍之友」的團體，它們必須爲當地黨衛軍的需要而提供「自願」基金。[105](值得注意的是，納粹秘密警察在它籌集資金的各種活動中並不剝削囚犯。除了在戰爭的最後幾年中，集中營的人力不再由希姆萊單獨決定，集中營裡的工作「沒有合理目的，只有對不幸的囚犯們增加負擔和折磨。」[105])

但是，這些不正規的財政現象是秘密警察傳統僅有的、但是很不重要的線索。這些現象是可能的，因爲極權主義政權的經濟和財政事務在正常條件下也採用非法方式，並且會使秘密警察有別於其他比較令人尊敬的行政部門，但是這並不是說，這個部門享有獨立，不受其他權威的控制，在不正規的、不受尊重的、不安全的環境裡生存。相反，極權主義秘密警察的地位完全是穩固的，它的事務也完全融入行政當局。這個組織不僅不在法律範圍之外，相反卻是法律的體現，它之受人尊敬是毫無疑問的。它不再根據自己的願望而組織屠殺，不再向國家和社會挑釁，它開始嚴厲地反

對一切形式的賄賂、勒索和不正規的財政收入。希姆萊在戰爭之中還能夠對他的部下用非常實際的威脅來進行道德教育——「我們在道德上有權利……消滅這些想消滅我們的（猶太）人，但是我們沒有權利以任何一種方式使自己發財，無論是一件毛皮大衣、一隻手錶、一個馬克，還是一支香煙」⑩——在秘密警察的歷史上從未能找到過這樣的情況。如果說這裡仍然牽涉到「危險思想」的話，他們不會是被懷疑爲危險者的人；一切知識生活和藝術生活都要求經常性地重新確立和修改標準，這就很自然地伴隨著反覆地清除一批批知識分子，他們的「危險思想」中通常包含著某些仍然完全屬於舊日正統的觀念。所以，當秘密警察的警察功能——在其可接受的語詞意義上——變成了多餘時，其的經濟功能（它有時被認爲已經取代了前者）就更加可疑了。無可否認，內務人民委員會定期圈定蘇聯人口中的一個百分比，將他們送進集中營，美其名曰強迫勞動營；⑩但是，這雖然很可能是蘇聯政府解決失業問題的方式，一般也知道，那些集中營裡的產量無限地低於普通蘇聯勞動力，很難滿足支付警察機構的開支。

秘密警察是政府一切部門中「組織得最好、最有效率」的部門，在極權主義政權的權力機構中，它的作用既不可疑，也不多餘。⑫它構成了政府中眞正的執行部門，一切命令都通過它發出。通過秘密警察網，極權主義統治者爲自己創造了一種直接執行的傳送帶，它與洋葱結構的表面權力層級不同，完全脫離和孤立於其他一切機構。⑩在這層意義上，秘密警察成員在極權主義國家裡是唯一公開的統治階級，他們的價值標準和價值衡量滲透了極權主義社會的整個結構。

從這個觀點來看，秘密警察的某些奇特性質是極權主義社會的一般性質，而不是極權主義秘密警察的特性，這也並不太令人驚奇。因此可疑分子的範疇包括了極權主義條件下的全體居民；每一種偏離官方制定的、永遠變化的路線的思想都早已受到懷疑，無論它發生在人類活動的哪一個領域。人類僅僅因爲有思想能力，就被定爲可疑分子，而且這種嫌疑不會由

於懲罰了他而改變，因爲人的思想能力也是一種能改變人的思維的能力。再者，由於無疑地不可能知道另一個人的心思——在這種情況下，酷刑只是一種想要達到無法達到的目的而作的絕望而無功的嘗試——如果相同的價值觀念和可預見的自我利益不能作爲社會的（不是純粹心理的）現實而存在，那麼懷疑就不可能消除。所以，相互懷疑的風氣滲透進極權主義國家的一切社會關係，創造出一種無所不在的氣氛，甚至在秘密警察的特殊眼界之外亦是如此。

在極權主義政權下，挑撥煽動這種以往只有秘密警察採用的專門手法，變成了一種對付鄰居的方法，每一個人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被迫學樣。也就是說，每一個人都是挑撥者(agent provocateur)；如果一個普通的「危險思想」（或者危險思想的傾向）的交換，會受到當局的注意，那麼很明顯，每一個人都會將自己當作是挑撥的特務。聯合民眾來譴責政治反對派，自願做囮鴿，這些當然都有先例可循，但是在極權主義國家裡，他們被組織得如此之好，致使專家們的工作反而成了多餘。在特務無所不在的制度下，每一個人都可以做一個警察，每一個個人都感到自己時常處於密探監視之下；在職業特別不保險、最著名的人物的浮沉成爲家常便飯的情況下，每一句都變得模稜兩可，任由回溯「詮釋」施加其上。

在職業問題上可以最清楚地看出極權主義社會裡秘密警察的方法和標準已經到處滲透。在極權主義政權下，兩面特務替他認爲值得爲之戰鬥的事業服務，就像爲當局服務一樣，有時比爲當局服務還要忠誠。他常常有一種雙重野心：他既想在革命政黨裡爬升，也想在秘密警察裡爬升。爲了在這兩處都獲得升職，他只能採取某些方法，這在正常的社會裡是那些依靠上司才能往上爬的小職員的秘密夢想：透過他與警察的關係，後者當然能夠消滅他的對手和黨內的上級，而透過他與革命政黨的關係，他至少可以有機會除掉他在警察組織內的上司。⑲如果考慮到當前俄國社會的職業情況，與此相同的方法就很明顯了。不僅所有的高級官員幾乎全靠大整肅

才獲得自己的地位，因爲他們的前任在整肅中被清除了，而且各行各業中的升職也因此加快。大約每隔十年，全國性的整肅就爲新的一代讓出了職位，這一代人大學畢業不久，正在急於尋找工作。政府本身確定的那些提供升遷機會的條件，正是警察以前必須去創造的。

定期地使用暴力推翻整個巨大的行政管理機器，防止了進一步的競爭，這無疑有許多好處：它使相對比較年輕的官員有了信心，防止了條件的僵死不變（這至少在和平時期隱藏著極權主義統治的危險；消滅了德高望重者，就防止發生通常將年輕成員綁在年長者身上的那種忠誠，因爲年輕人的升遷取決於他們的意見和善意；它一勞永逸地根除了失業的危險，保證每一個人有一份與他的教育程度相配的工作。因此，在 1939 年，當蘇聯的大整肅結束之後，斯大林可以很滿意地指出「黨能夠將五十萬名年輕的布爾什維克提升到國家和黨的事務的領導崗位上。」⓯ 這種要想取得一份工作，就得不公正地清除前任的做法是一種恥辱，與德國在職業問題上清除猶太人一樣，具有敗壞道德的效果：它使每一個有職業的人都有意識地成爲政府罪行的幫凶，無論他喜歡不喜歡政府的恩惠，結果是，卑順的個人愈是敏感，他愈會使勁地替政府辯護。換言之，這種制度是最完整的含義上領袖原則的邏輯發展，是最好的忠誠保證，使每一個新的世代都將它的生活依賴於爲創造工作機會而發動整肅的領袖之當前政治路線。它也實現了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一致，爲蘇聯辯護的人爲此感到十分自豪（或者在納粹那裡，是廢除了私人生活範圍），因爲每一個個人無論其結果如何，都將他的存在歸諸政權的政治利益；而當這種一致利益破產時，下一場整肅將他逐出職位，政府就必使他從生活的世界裡消失。兩面特務以一種區別不太大的方式認同革命事業（否則他會失去工作），而不是僅僅認同秘密警察；同樣在那個領域，轟動一時的升遷只會以一種默默死去作爲結局，因爲看來雙重遊戲是不可能一直持續下去的。當極權主義政府在一切職業上提供了如此升遷條件，就像先前只流行於被社會棄逐者中間的情況一樣時，

就在社會心理方面造成了影響深遠的變化。兩面特務的心理（他們願意以短命爲代價來換取幾年的絕頂風光）必然變成俄國革命後的一代在個人事情上的哲學觀，德國戰後情況稍好一些，但是仍然十分危險。

這就是極權主義秘密警察產生作用的社會，充滿著以往秘密警察壟斷時期的標準，靠那個時期的方法謀生。只有在最初的階段，當奪權鬥爭仍在進行時，只有受害者才被懷疑是反對派。隨後極權主義事業就集中在客觀敵人上，或者是猶太人，或者是波蘭人(這是納粹的情況)，或者是所謂的「反革命分子」(counter-revolutionaries)——這種指控「在蘇俄……建立在被指控者有具體行爲之前」——這些人可能在過去任何時候擁有過一家商店，或一幢房子，或者「父母或祖父母擁有過這類東西，」⑯或者曾屬於紅軍占領軍部隊，或者是波蘭血統的俄國人。只有在這最後的、完全極權主義的階段，關於客觀敵人的概念和邏輯上可能的罪行說法才被拋棄，受害者是完全隨意被選定的，即使未被指控，也被宣布爲不宜活著。這種「不理想者」(undesirable)的範疇，在納粹的例子中可以包括精神病人、肺病和心臟病患者，或者在蘇聯的例子中，會是碰巧被掃進百分比裡的人，各省的比例不一，凡劃進比例者即遭驅逐。

這種一意孤行的做法，比任何暴君都更有效地蔑視人的自由。一個人總要至少是暴君的敵人，才會受暴君懲罰。那些勇敢地以自己的頭顱來冒險的人並沒有放棄言論自由。從理論上來說，在極權主義政權下也還可選擇做反對派的；但是，假如自願的行動只帶來一種每一個別人都可能以任何方式承受的「懲罰」，這種自由就幾乎是無效的。這種制度下的自由不僅降低到它那最後一種獨特地仍不可摧毀的保障，即自殺的自由，而且也失去了它獨特的標記，因爲它的操作結果屬於完全無辜的人們所共有。如果希特勒有時間實現他的德國健康法案(General German Health Bill)的夢想，肺病患者的命運就會像納粹政權初期的共產黨員和後期的猶太人一樣。同樣地，俄國政權的反對者遭受的命運，像幾百萬關進集中營以符合

某種配額一樣，只減輕了警察做任意選擇的負擔。無辜者和有罪者一樣，不是理想的人。

關於罪行和罪犯的概念變化，決定了極權主義警察的新的恐怖方法。罪犯遭到懲罰，不理想的人從地面上消失；他們留下的唯一痕跡是認識和熱愛他們的人的回憶，而秘密警察最艱難的任務之一是保證甚至連這樣的痕跡也隨同倒楣的人一起消失。

奧克拉那(Okhrana)，格別烏在沙皇時代的前身，據說發明過一種檔案制度，每一個嫌疑犯都有一張大的記錄卡，中間是他的名字，用紅筆圈出；他在政治上的朋友們名字用小紅圈、他的非政治朋友用綠筆圈出；咖啡色的圈標明接觸過可疑分子的朋友的人，但是不認識此一可疑分子；可疑分子的朋友們之間的交叉關係(政治的或非政治的)以及朋友的朋友，用圓圈之間的直線連接起來。[117]很明顯，這種方法的侷限只由檔案卡尺寸大小決定，而且從理論上說，一張巨大的單頁紙就可以顯示出全體居民的關係和交叉關係。這是極權主義秘密警察的烏托邦目標。它放棄了傳統的舊警察夢想，那是測謊器仍然想達到的，而不再企圖發現誰是誰，或者誰在想什麼。(測謊器或許是最有趣的形象例子，這種夢想明顯地印在一切警察的腦子裡；很明顯，複雜的測量儀最多只能測定受害者冰冷的血或緊張的心情。事實上，使用這種機器背後智力耗弱的推理只能解釋爲非理性的願望，總想有可能讀出人們腦子裡的某些東西。)這種舊的夢想十分可怕，由於時間使人減退記憶，於是就一律訴諸嚴刑酷罰和最可鄙的殘忍手段。它只喜歡做一件事：要求做到不可能的事。極權主義警察使用現代技術想要達到的現代夢想眞是無比恐怖。現在的警察夢想叫人站在辦公室牆上的一幅巨大的地圖旁，看著地圖就隨時招供誰和誰有關係，親密程度如何；從理論上說，這種夢並非不能實現，儘管使用的技術手段比較困難。如果眞的有這樣一張地圖，那麼，連記憶也不會阻擋極權主義的統治要求；這樣一張地圖可以抹去任何人的任何痕跡，似乎他們從未存在過一樣。

假如被捕的內務人民委員會特務的報告可信，俄國秘密警察就令人很不安地接近了這個極權統治的理想。警察有這個廣袤國家裡每一個居民的秘密檔案，仔細地列出了人們之間的許多關係，包括偶爾相識的朋友、眞正的友情，直到家庭聯繫；只要去發現被告的這些關係，他們的罪行在他們被捕之前就已「客觀地」被確定了，這些關係就提供來作仔細審問之用。最後，至於記憶的天才對於極權主義統治甚有危險，外國觀察家們都感到，「如果說大象從不忘記事情這一點是眞的，那麼在我們看來，俄國人卻正好與大象相反……蘇俄人的心理似乎使遺忘眞的成爲可能了。」[118]

從一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受害者的完全消失對於極權統治機構來說是多麼重要，出於這種或那種原因，這種政權總是面對著倖存者的記憶。戰爭期間，一個黨衛軍司令官犯了一樁可怕的錯誤，通知了一位法國婦女關於她丈夫死在一個德國集中營裡的消息；這個失誤引起一陣紛至沓來的命令和指示，傳到各個集中營，警告各集中營在任何情況下不准將消息傳到外界去。[119]問題在於，就那位法國寡婦而言，她的丈夫可能在被捕時死去，或者後來死去。同樣地，蘇聯的警察官員們生來就習慣於這種制度，在占領波蘭之後，看著人們拼死地想弄明白，他們的朋友或親戚被捕之後究竟情況怎樣，只會大惑不解。[120]

在極權主義國家，由警察統治的一切拘禁之地都要成爲使人湮沒無聞的眞正黑洞，人們很偶然地踉蹌進來，身後不留下像屍體或墳墓之類表明先前存在過的普通痕跡。與這種將人徹底抹掉的最新發明相比，舊式的政治謀殺或犯罪謀殺的方法的確效率不高。謀殺者留下一具屍體，雖然他竭力掩飾他自己的蹤跡，但是他沒有能力從倖存者的世界裡抹去受害者的痕跡。相反，秘密警察的行動奇蹟般地留心使受害者在別人心目中似乎從來就不曾在這個世界上存在過。

秘密警察與秘密會社之間的關係是很明顯的。前者的建立總是需要並

且利用一種論調：後者的存在會產生危險。極權主義秘密警察在歷史上第一次既不需要、也不利用一切暴君使用過的這些舊式的藉口。受害人無名無影，不會給政權招來仇敵，他們的身分連執行者也不知道，直到政府決定將他們從活人的世界上消滅，並且也在死人的世界裡將他們清除，這已超越一切秘密手段，超越了最嚴格的保持沉默，超越了密謀式會社的紀律一向強加於其成員身上的雙重生活的巨大控制。

極權主義運動在奪權時，模仿過秘密會社組織的某些特徵，但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建立組織，只有在上升到統治地位之後，才創建真正的秘密會社。極權主義政權的秘密會社就是秘密警察；在極權主義國家裡唯一嚴守的秘密，唯一秘傳的知識，就是警察的行動和集中營裡的情況。[120]當然，廣大居民和黨員具體地知道所有的一般事實——集中營的確存在、人們失蹤、無辜者遭逮捕；同時，極權主義國家裡的每一個人也都知道，談論這些「秘密」就是最大的罪行。由於人對別人的了解總是依靠證實和理解，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各人自守秘密，這種從不溝通的信息失去了它的現實性質，似乎只有純粹的夢魘性質。只有那些掌握嚴格傳遞的訊息（例如有關最新一類「不理想的人」和幹部的行動方法）的人，才處於相互溝通的地位，才知道實際上的一切情況是什麼。唯有他們才有資格相信自己所知的是事實。這是他們的秘密，爲了嚴守這種秘密，他們就被編成一個秘密組織。即使這個秘密組織逮捕他們，逼迫他們坦白，最後消滅他們，他們仍然還是這個組織的成員。只要他們嚴守秘密，他們就屬於菁英組織，通常他們絕不背叛組織，即使他們自己被關進監獄和集中營。[121]

我們早已指出過，違反非極權主義世界常識的許多弔詭之一，是極權主義看來在非理性地運用陰謀方法。極權主義運動明顯地由警察執行，在他們奪權的鬥爭中很少使用陰謀方法來推翻政府，而執政的極權主義在它被各國政府承認，走出革命階段以後，卻建立了眞正的秘密警察，作爲它的政府與權力的核心。看來，得到正式承認，被當作是對極權主義運動的

密謀內容的更大威脅，即內部解體的威脅，這遠比非極權政權之下可有可無的警察措施對內部解體的威脅更大。

事實的眞相是，極權主義的領袖們儘管相信他們必須繼續一貫地虛構現實，以及統治這個虛構世界，這一點在他們爲奪取政權而鬥爭時曾被擱置一邊，但他們只是逐漸地才發現，如何完整地構築這個虛構世界並實行對它的統治。他們相信人無所不能，他們相信一切事情都可以通過組織手段來完成，這促使他們從事實驗，但是人類的想像力雖可發揮，但是人類的活動卻不能實現它。他們在可能範圍裡的駭人聽聞的發現，是由一種意識形態的科學性(ideological scientificality)激發的。意識形態的科學性比前科學和前哲學的沉思奇想更少由理性來控制，更不願意承認事實。他們建立的秘密會社，現在不再活動於光天化日之下，秘密警察、政治軍人、受過訓練的意識形態戰士組成的秘密會社，目的是爲了能執行不體面的實驗，使探究的事物成爲可能的事物。

另一方面，極權主義陰謀反對非極權主義世界，它要求統治世界，這種陰謀在極權主義統治的條件下，倒也像在極權主義運動中一樣，仍然是公開的，不作爲應該嚴守的秘密。它假說整個世界在反對它們的國家，很實際地使全體組織成爲「同情者」的人民有了殊深印象。在宣傳極權主義將世界一分爲二的思想時，讓每一個在國外的同胞感到向國內報告是他們的職責，一如他是一個特務，並且將每一個外國人看作是他自己國家政府的間諜。[123]正是爲了實際地達到將世界一分爲二，而不是因爲特殊秘密(軍事的，或其他)，鐵幕才將極權主義國家的居民和世界上其餘人隔開。他們的眞正秘密（集中營，即極權統治的實驗室）卻被極權主義政權遮掩起來，不讓自己的人民和其他國家的人看到。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正常世界的正常狀態最有效地保障極權主義大規模罪行不被揭露。「正常人不知道一切都是可能的，」[124]他們面對巨大的荒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正如羣眾之人在面對正常現實（他們在其

中沒有位置）時不相信他們的眼睛和耳朵一樣。[125]極權主義政權爲何能如此地實現一個虛構顚倒的世界，原因是外界的非極權世界也總是包含極權主義國家本身的很大一部分人，在面對眞實的狂妄時也抱持著一廂情願的想法，也逃避現實，正如羣眾在面對正常世界時的做法一樣。常識拒絕相信巨大的荒謬，這傾向也常常由極權統治者強化，他必使可靠的統計數字、能控制的事實和數據絕不公開，以致關於活死人的地點只有主觀的，難以控制的、不可靠的報導。

由於這種政策，我們所知的只有極權主義實驗的部分結果。雖然我們已有來自集中營的足夠報導，可資評估極權統治的各種可能性，瞥見「可能」的地獄，但是我們不知道極權主義政權性質轉變的程度。我們甚至不知道自己周圍有多少正常人會願意接受極權主義的生活方式——即付出縮短壽命的代價，確保完成他們的一切事業夢想。極權主義宣傳，甚至是某些極權主義機構，符合了新的無家可歸羣眾的需求，但是我們幾乎不可能知道他們中間有多少人，如果他們進一步受到失業的經常威脅，會高興地默許一種「人口政策」，其中包括定期消滅多餘的人，又有多少人一旦完全掌握了逐步承受現代生活重擔的能力，會樂於和一種制度保持一致，自發地消除責任感。

換言之，我們知道極權主義秘密警察的運作和特殊功能，但是我們不知道這個秘密會社的「秘密」如何有效地、在何種程度上符合了我們這個時代裡羣眾的秘密欲望和秘密共謀。

㈢全面統治

極權主義政權的集中營和種族滅絕營用作實驗室，極權主義的基本信念——「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在此經受驗證。與此相比，其他各種試驗都是次等重要的（包括醫學試驗，在對第三帝國醫生們的審判中，醫學

界的恐怖事件都有詳細記錄,）這些實驗室的特點是用來做每一種試驗。

極權統治努力組織無限多元和無限區別的人，似乎將全人類只看作是一個人，只有每一個個人的各種反應可以降低到一種絕對不變的一致，使每一組反應能夠與另一組反應隨意互換，才能使極權統治成爲可能。問題是要編造某種並不存在的事物，亦即人的種類，像其他動物種類一樣，其唯一的「自由」包含在「保存物種」之中。[126]極權主義統治嘗試透過菁英組織的意識形態灌輸和集中營裡的絕對恐怖來達到這個目的；菁英組織無情地從事暴行，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灌輸的實踐應用——菁英組織必須在這個試驗場上證明自身——而集中營相應的目標也設定爲完成對意識形態的「理論」證明。

集中營不僅意味著滅絕人和使人類喪失尊嚴，而且還用於在科學控制的條件下可怕的殺人試驗，消滅人類行爲的自發性表現，將人類個性轉變爲一種純粹的事物，轉變成連動物都不如的東西；因爲就我們所知，巴甫洛夫(Pavlov)的狗是一種倒錯的動物，它被訓練不是因飢餓而是因鈴聲而進食。

這種事在正常情況下絕不可能完成，因爲自發性不可能完全被消滅，因爲它不僅與人類自由有關，而且與生命本身有關，簡單說便是保持生命。只有在集中營裡，這種實驗才完全是可能的，所以它們不僅是「已實現的最極權的社會」（戴維·羅賽特語），而且也是全面統治中主導的社會理想。正如極權主義政權的穩定性依靠運動的虛構世界與外界隔絕一樣，在集中營裡的極權統治實驗依靠對外界（即一般生活的世界）封閉集中營，即使對其他極權統治下國家也是封閉的。這種孤立可解釋奇特的非現實和缺乏可信度（一切發自集中營的報導都具這種特徵），並且構成了眞正理解極權統治的主要困難之一，理解正確與否都取決於這些集中營和種族滅絕營的存在；因爲這些集中營是極權主義組織力量的眞正中心機構，這聽起來似乎不太眞實。

倖存者們有許多報導。[127]受苦越多的倖存者越不想敍說那些超過人類理解和經驗的事情——苦難使人變成了「不會抱怨的動物」。[128]這些報導都未能激起一向能發動人類正義感的激情和憤怒。相反，任何一個講起或寫到集中營情況的人仍然被看作有嫌疑；如果說話者堅決回到生活的世界，他所言的眞實性常常受到懷疑，自己因此也受到攻擊，好像他錯把噩夢當成了現實。[129]

人對自己、對自己的實際經歷的這種懷疑，只揭示了納粹一向懂得的道理：決心犯罪的人發現最有利的做法是在最廣泛、最罕見的規模上將人們組織起來。不僅因爲這件事說明了不完備的、荒唐的法律制度提供了這一切懲罰；而且因爲罪行之大，使殺人者能夠以各種各樣的謊言來宣布他們無罪，他們比敍述事實眞相的受害者更能令人相信。納粹們甚至認爲沒有必要去發現眞相。希特勒散發了幾百萬冊他的書，他在書中說，要想成功，就必須撒彌天大謊——這並未使人們不相信他，也未使人們不信納粹令人討厭的反覆宣言，說猶太人會像臭蟲一樣被消滅(即使用毒氣)，也未能使任何人**不相信**他們。

有人很想用自由主義的理性化方式解釋這種本質上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都潛伏著這種自由，受到常識的聲音的引誘。通向極權主義統治之路經過許多中間階段，走向我們可以發現許多類同現象和先例的地方。極權主義最初階段特別血腥的恐怖，確實是用來完全對付反對派的，以便不可能再遇到反對派；但是完全的恐怖只在克服了第一階段的障礙之後發生，這個政權不再害怕任何反對派。在這種情況下，常常有人評論說，手段變成了目的，但這畢竟只是以一種弔詭的說法，承認「目的正確，手段就正確」的範疇已不再適用了，恐怖已失去了它的「目標」，它不再是恐嚇民眾的手段了。這也不足以解釋革命（例如法國革命）吞噬了它自己的孩子，因爲即使在可以被說成是革命之子（他們以這種或那種資格——俄國革命派、政黨的權力中心、軍隊、官僚體制——來躋身革命

行列）的每一個人都被吞噬之後很久，恐怖卻還在繼續。從歷史研究中可以看到，如今變成極權主義政府特有的許多事物是人所共知的。歷史上幾乎總有侵略戰爭；勝利之後殺戮敵方居民的事，在羅馬人的懷柔政策(parcere subjectis)之後方才停止；幾個世紀來，美洲、澳洲、非洲的殖民化伴隨著對當地居民的滅絕屠殺；奴隸制是人類最老的制度之一，古代的一切帝國都以擁有的奴隸勞動爲基礎，靠奴隸建造起了公共大廈。甚至連集中營也並非極權主義運動的新發明。在布爾戰爭期間，在本世紀初，就首次出現了集中營，而且在南非、印度等地繼續被用來對付「不理想分子」；我們在這裡也發現第三帝國後來採用的「保護性拘禁」(protective custody)一詞。這些集中營在許多方面和極權主義統治初期的集中營一樣；它們被用於對付「可疑分子」，這些人的罪行無法得到證實，用普通的法律程序無法審判他們。所有這一切都清楚地指向極權主義的統治方法；所有這一切都是他們利用、發展和集中使用的成分，其基礎是虛無主義的原則「一切都是許可的」，他們繼承了這條原則，並且信以爲然。但是，凡在這些新的統治形式自稱正統的極權主義結構的地方，他們會超越這條原則(因爲它仍然出於功利主義的動機和統治者的自我利益)，並且將手試探到一個我們至今尚不完全清楚的範圍去：在那個範圍內，「一切都是可能的」。最具特徵的是，這個範圍不會受到功利主義動機和自我利益的限制，更不用說受自我利益內涵的限制了。

與常識背道而馳的不是「一切都是許可的」虛無主義原則，這條原則早已被十九世紀功利主義的常識概念所囊括。常識和「正常人」拒絕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130]我們嘗試理解那些超越我們理解能力的目前或收集到的經驗中的各種因素。我們嘗試區分我們都感覺到的犯罪事物，使之不被任何意圖所掩蓋。當我們面對著大量「生產」的屍體時，「謀殺」的概念還有什麼意義？我們嘗試從心理學角度理解集中營囚徒和黨衛軍人的行爲，必須明白的是，即使不摧毀人的肉體，心理也**可以**被摧毀。看來在某

些情況下，心理、性格和個性只有通過其瓦解速度的快慢才能表現自己。[131] 最終結果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失去活力的人，即在心理上不再能被別人理解的人，他們回到在心理或其他方面可以理解的人類世界，就會很像拉撒路的復活。一切常識的陳述，無論帶心理學性質還是帶社會學性質，只用來鼓舞那些認爲它「膚淺」到「獵取榮譽」的人的信心。[131]

假如說，集中營是極權主義統治最必然產生的機構這句話是對的，那麼「獵取榮譽」看來就是爲了理解極權主義而必不可少的要點。不過，靠收集資料還不如靠那種很難與人溝通的目擊者的報告。這兩種材料裡都有一種內在的傾向，想逃避經歷過的事情；這兩種類型的作者，或者憑直覺，或者憑理性，都很淸楚地意識到那個可怕的地獄隔開了活人的世界和活死人的世界，它們最多只能提供一系列記憶中發生的事，這些事情在敍述者和聽衆看來一樣不可思議。只有那些被這類報導喚起可怖的想像，但事實上自己的肉體未受過摧殘的人，只有那些未經歷過毫無人性的絕望恐怖的人，在面對實在的恐怖時，毫不動情地麻痺一切並非純粹反應的事物，才能「思考」什麼是恐怖。這類思想只有在觀察政治環境和帶動政治激情時才有用。任何一種個性的改變，不是由思考恐怖引起的，而是由眞實的恐怖經驗引起的。人之降低到一堆反應，像患精神病一樣，使他和自己內心的一切個性或性格也徹底隔絕。當他像拉撒路一樣起死回生時，他發現自己的個性或人格像他離開時一樣未變。

正如恐怖或者強調恐怖不會引起他改變性格一樣，也不能使人變好或變壞，所以不會變成狹義政治社羣或政黨的基礎。嘗試建立歐洲菁英，其綱領是歐洲內的相互理解，其基礎是歐洲共同的集中營經歷，這很像另一種嘗試，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從前線世代的國際經驗中得出的政治結論。這兩種情況的結果都是，經驗本身還不如虛無主義的陳詞濫調更能相互溝通。[131]例如，像戰後和平主義這類政治結果，產生於一般對戰爭的恐懼，而不是產生於戰爭經歷。不是產生出一種脫離現實的空洞和平主義，而

是洞察現代戰爭的結構，由恐懼引導和推動，才有可能明白，只有一條標準能夠證明一場戰爭是必要的——人們在某種狀態下不想再生活下去，戰鬥是爲了反對這種狀態——而我們關於極權主義集中營虐待人的地獄的經驗，使我們完全明白這種狀態的可能性。⑬因此，對集中營的恐懼和由此洞悉極權統治的性質，很可能有助於淡化一切從左派到右派的過時的政治差異，使它們獲得政治上最重要的尺度，用以判斷我們時代的各種事件：它們是否爲極權主義統治服務。

在任何情況下，恐懼的想像很有利於分解詭辯和辯證的政治學解釋，政治學的解釋都以迷信爲基礎，認爲惡能產生善。這種辯證雜耍至少有一種類似判斷，認爲人對人造成最大痛苦的事是謀殺。但是就我們所知，謀殺在今天只是一種有限的惡。殺人者殺死一個人——一個無論如何會死去的人——仍在我們熟悉的生與死範圍之內；兩者在辯證法的基礎上實際有一種必然聯繫，即使並非總是意識到這一點。殺人犯留下了一具屍體，並不假裝受害者從未存在過；如果他抹去了一切罪跡，這些卻是他自己身分的蹤跡，卻不是由受害者的人的記憶和悲哀構成的；他毀滅了一個生命，但是他毀滅不了存在本身的事實。

納粹用他們那種奇特的精確數字記錄了在集中營裡的行動，標題是〈在夜幕掩護下〉(Nacht und Nebel)。他們用徹底的措施對待民眾，似乎他們從未存在過，使他們完完全全眞正消失，這在初看時常常不明顯，因爲德國的制度和俄國的制度不一致，它們對待各種人也不一樣。德國的這些不同的人存在於同一個集中營，但不許他們互相接觸；各種人在集中營裡相互孤立隔絕，比他們和外界的隔絕更甚。所以，撇開種族問題不談，在戰爭期間，斯堪的納維亞的僑民們受德國人非常不同的區別對待，他們雖然是德國公開宣布的敵人，但是有別於其他民族。其他民族的人中間，猶太人在日程上要立即被「消滅」，波蘭人在預期的未來被消滅，俄國人和烏克蘭人亦歸這一類，法國人和比利時人還未被列入這種全面「最後解決」的

名單。在俄國的情況中，我們必須區別三種多多少少有些不同的獨立制度。第一種是正式的強迫勞動羣體，生活相對有些自由，判刑期有限。第二種是集中營，人被無情地剝奪一切物質，死亡率特別高，實際上的組織目的是勞役。第三種是死亡集中營，通過飢餓和遺棄，有計劃地分批消滅囚徒。

集中營和死亡集中營的眞正恐怖在於囚徒(即使他們能偶爾活下來)被有效地切斷同活人世界的聯繫，因爲恐怖使人更加容易忘卻。集中營裡殺人如草芥。有人會因爲不斷被拷打或飢餓而死亡，或者因爲集中營裡囚徒太多，多餘的人必須被清除。相反，也許會因爲缺少新運來的囚徒，集中營的危險就變成了囚徒人數太少，於是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任何代價減少死亡率。[135]戴維・羅賽特將他寫的德國集中營時期的報導稱作《我們死亡的日子》(*Les Jours de Notre Mort*)，事情的確好像有可能使死亡本身的過程持久下去，並且強化了一種條件，在這種條件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正是我們先前不知道的某種徹底的惡之出現，結束了關於性質發展與轉化的觀念。在這裏，既無政治標準，亦無歷史標準，更無簡單的道德標準，至多只使人明白，現代政治中似乎牽涉著某種事物，照我們對政治的理解，它實際上不應該被牽涉在政治之中，即或者一切，或者全無——說它是一切，因爲它是人類共同生存形式無法制定的無限，說它全無，是因爲集中營制度的勝利將意味著對人的無情毀滅，就像使用氫彈會意味著全人類的毀滅。

任何生活都無法同集中營的生活相比擬。它的恐怖絕不是人的想像力可以完全估計的，其原因是它處於生和死之外。對它的情形也不可能有完整的報導，其原因是倖存者回到活人的世界，他不可能完全相信自己過去的經歷。好像他要講一個外星球的故事，因爲在活人的世界裏，人的地位使人無法知道囚徒們是死了還是活著，似乎他們從未出生過。因此，一切比擬都會製造混亂，分散對實質問題的注意力。監獄裏，罪犯充軍地、流放地、奴隸制度下的強迫勞動，看來暫時都可以提供有用的比較，但是仔

細研究卻無一可比。

強迫勞役作爲一種懲罰，在時間和強度上都有限制。罪犯保留有人身權利；他並非絕對受折磨，也並非絕對被統治。流放只是從世界的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仍然與人類居住在一起；它並不將人完全排除出人類世界。歷史上的奴隸制曾是一種社會秩序中的制度；奴隸不像集中營囚徒那樣在人們視線中消失，因此也不會失去別人的保護；他們作爲勞動工具，有特定的價格，作爲財產，他們有特定的價值。集中營囚徒沒有價格，因爲他總是可以被取代；誰也不知道他屬於誰，因爲誰也沒見到過他。從正常社會的角度來看，他絕對是多餘的，儘管在勞動力嚴重短缺的時候（例如戰時的俄國和德國）他被用來勞動。

集中營作爲一種機構，它的建立不是出於任何勞動收益的目的；集中營唯一的永恆經濟功能是資養監督它的上級機關；因此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集中營大多是爲其自身而存在。那裏進行的任何工作，在不同的情況下可以更好地完成，成本更低。[135]尤其在俄國，集中營大多數被稱爲強迫勞動營，因爲蘇聯官僚們選擇這個名稱是爲了自己的尊嚴，清楚地顯示，強迫勞動不是主要的；強迫勞動是全俄國工人的正常情況，他們沒有行動自由，卻可以在任何時候被任意抽調到任何地方工作。令人難以置信的恐怖和他們在經濟上的無用緊密聯繫在一起。納粹將這種無用(uselessness)在戰爭期間推到反功利的極點，儘管缺少建築材料和圓木，他們仍然建造了巨大的、成本昂貴的死亡工廠，將幾百萬人運來運去。[136]在嚴格的功利主義世界眼中，這些行爲與軍事征伐之間的明顯矛盾使整個事業蒙上一層瘋狂的非現實氣氛。

由於明顯地缺乏目的而造成的這種瘋狂與脫離實際的氣氛，是眞正的鐵幕，掩藏了一切形式的集中營。從外界來看，集中營與其中發生的事情只能用死後的世界(life after death)圖景才能描繪，也就是說，這種生活遠離了地球上的目的。集中營可以分爲三類，對應於西方關於死後世界的

三種概念：冥府(Hades)、煉獄(Purgatory)、地獄(Hell)。冥府對應於那些相對溫和的形式，這甚至在非極權主義國家裏也曾經普遍有過，用來擺脫各種不理想的分子——難民、無國籍者、被社會拋棄者和失業者；例如難民營(DP)，無異於拘禁多餘者和麻煩者的集中營，他們在戰爭中得以倖存。煉獄以蘇聯的勞動營爲代表，人之被忽略與混亂的強迫勞動結合在一起。地獄，在最嚴格的意義上，體現爲那些由納粹來創造出來的最完美的集中營類型，在那裏，整個生活從一種盡可能折磨人的觀點出發來徹底地、系統地組織。

這三種類型有一點是共同的：封閉在其中的人類羣眾所受的待遇，似乎他們不再存在，似乎他們發生的事情不再使任何人感興趣，似乎他們早已死去，某個邪惡的精靈發瘋了，在讓他們進入永恆的寧靜之前，使他們在生與死之間，暫時滯留，以此來取樂。

並非只有帶刺的鐵絲網將人圈在裏面，技巧嫻熟地替他們製造了一種非現實，才使如此巨大的殘暴行爲和最終的滅絕看上去像一種完美的正常措施。我們知道，在集中營裏做的每一件事都出自顛倒的世界和惡意的奇想。使人難以理解的是，這些可怕的罪行像異想天開的遊戲，發生在一個幽靈的世界，但是本身又以物質實在的形式，進入一個由感官現實來完成的世界，然而又毫無結果、毫不負責，使現實對於我們來說只變成了一大堆無法理解的資料。它的結果是建立一個地方，人們在那裏受折磨、遭屠殺，但是，折磨人者和被折磨者，尤其是外界的人，都不能意識到所發生的事情遠遠不止是一種殘酷的遊戲或一場荒誕的夢。[138]

同盟國於戰後在德國和其他地方放映的電影，清楚地表明這種瘋狂和非現實的氣氛不是純粹的報導能夠驅散的。在毫無偏見的觀眾看來，這些影片正如在招魂術巫師作法時攝下的神秘現象照片一樣。[139]人們根據常識對布辛瓦德(Buchenwald)和奧許威茨(Auschwitz)發生的恐怖行爲提出表面上有理的看法：「這些人犯了什麼罪，竟要這樣對待他們！」或者在德

國和奧地利，在饑餓和人口過多時，普遍帶著仇恨的反應：「他們眞不該停止對猶太人使用毒氣。」而當宣傳無效時，在任何地方，人們只會懷疑地聳聳肩膀。

如果宣傳事實眞相因爲內容太可怕而不能使一般人相信，那麼，對於那些根據自己的想像來了解情況的人來說是很危險的，他們以爲自己也能想像，因此只願意相信自己看見過的現實。突然之間，幾千年來人類想像力無法企及的事物可以在地球上發生，煉獄和地獄，甚至它們永久延續的陰影，也可以用最現代化的毀滅和救治方法來建立。在這些人看來（他們的人數在任何大城市比我們願意承認的都多），極權主義的地獄只證明了人的力量比他們敢想到的要大得多，人不用天塌地陷，就能使想像中的地獄變成現實。

對垂死者世界的許多報導中一再重複的類似現象，⑭表達的內容似乎超過了那種絕望地試圖說出人類言語難以敍說的故事。或許沒有什麼東西能夠徹底地將現代大衆區別於先前幾百年裏不相信最後審判的人：最壞的人失去了恐懼，最好的人失去了希望。大衆暫時還不能脫離恐懼和希望而生活，他們受到每一種努力爭取的希望吸引，看到人爲地編造的渴望中的天堂和心中恐懼的地獄。馬克思所說的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的普遍特徵與彌賽亞先知的救世時代奇異地相像，而集中營的現實卻完全像中世紀時描繪的地獄圖景。

唯一不能複製的是構成人們承認的傳統地獄概念的成分：最後的審判，關於公正與無限可能之恩惠結合的絕對標準的觀念。因爲在人的估計中，根本沒有與地獄裏永久折磨相比的罪孽。因此，根據常識的詰難，人們會問：這些人究竟犯了什麼罪，要受這樣非人的苦難？絕對無辜的受害者也會想到：誰也不該受此苦難。而奇詭的偶然性在完全恐怖的狀態下選擇了集中營的受害者，這種「懲罰」無視公正或不公正，會同等地降臨到任何人頭上。

與瘋狂的最終結果——集中營社會——相比，人被安排於這一目的的過程，以及將個人改變到這種境況的方法，都是透明、符合邏輯的。歷史和政治明明白白地以製造活死人作準備，之後便瘋狂地大批製造屍體。這種史無前例的狀況的動力，以及更重要人們的默許，都是一些事件的產物，它們在一個政治瓦解的時期，突然出人意料地使千百萬人無家可歸，失去國籍，喪失公權，被社會遺棄，幾百萬人在經濟上看來是多餘的，對社會就業問題是個負擔。反過來說，這種情形必然發生，因爲人權在它的傳統形式上失去了有效性，它只是被提出，但從未在哲學上確定地位，它只是被宣布，但從未在政治上得到保障。

通向極權統治之路上重大的第一步是取消人的法律性格(juridical person in man)。這一步的完成是通過將某幾類民衆驅趕到法律保護之外，同時用剝奪公民國籍的辦法，迫使非極權主義國家認可無法律狀態(lawlessness)的現狀；另一方面，在正常的懲罰制度之外建立集中營，在那種根據懲治法條定罪的正常法律程序之外，挑選人充當集中營囚徒。因此，刑事犯（由於其他原因而應該成爲集中營成員的人）一般被送到集中營，只是爲了服完他們的刑期。在一切情況下，極權主義統治留心使集中關押的各類人——猶太人、病人、舊階級的代表——失去正常行爲和犯罪行爲的能力。從宣傳角度來說，「保護性拘禁」是「警察的預防措施」，[141]這種措施意味著剝奪人的行爲(犯罪)能力。俄國偏離這條規則，必定是由於監獄極缺，以及希望(雖然尙未實現)將整體的懲治制度轉變到集中營度。[142]

將刑事犯包括在內是必要的，目的是使運動宣傳中的說法——集中營機構的存在是對付社會上不合羣的人——顯得有理。[143]如果是因爲殺死一個犯了某種罪、但仍是法人的人比殺死一個無辜的人更難，那麼刑事犯就不應該關在集中營。如果他們長久地在集中營囚徒中形成一個種類，那麼這是極權主義國家對社會偏見的讓步，在這種方式下，社會就很容易習慣於集中營的存在。爲了使集中營制度天長地久，關鍵在於，這個國家裏有

一種懲治制度，爲了讓刑事犯服完刑期，就必須將他們送進集中營，這就是他們事實上有的所謂自由。集中營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變成對特定罪行可預想得到的懲罰。

刑事犯與其他各類囚徒混雜在一起，這有進一步的好處，有明顯震驚人的效果，可以讓新來者一踏進集中營就明白自己落到了社會最底層。這無疑不久就使他們完全有理由羨妒最低賤的小偷和殺人犯；而最底層卻是一個良好的開端。這也是一種有效的僞裝手段：這種事情只發生於刑事犯，不會有比刑事犯應得的更糟糕的事情。

刑事犯在每一個集中營裏都是貴族。（在戰時德國，他們的領導地位被共產黨人取代，因爲在刑事犯管理下，情況一片混亂，甚至連一點點合理的工作都無法進行。這只是集中營暫時轉變爲強迫勞動營，一種持續時間有限的完全非典型的現象。）[144]使刑事犯處於領導地位的因素不是監管人員與刑事罪犯之間的親緣關係——在蘇聯，監管人員明顯不是黨衛軍那種專門訓練來犯罪的特殊菁英[144]——事實上，刑事犯被送到集中營是與某種特別活動有關。至少他們知道自己爲什麼會在集中營，所以還留有一些法人的權利。至於政治犯，他們只有主觀上的認識；他們的行動（不是純粹的觀點，或別人模糊的懷疑，或偶然加入一個政治上不被承認的團體）通常不屬於國家的正常法律制度，也沒有法律上的定義。[144]

俄國和德國集中營開始混合政治犯和刑事犯，在較早時還增加了第三種成分，它不久就構成了集中營囚徒人數中的大半。這個最大的羣體從一開始就包括根本沒做過什麼事的人，無論在他們自己的意識中，還是在拷問者的意識中，都沒有任何事情和他們的被捕有合理的聯繫。在德國，1938年以後，這種人的代表是猶太羣衆，在俄國，可以是任何羣體，他們不曾有過任何行動，只不過是當局不喜歡他們。這些從每一個方面來說都是無辜者的羣體，最適合於徹底剝奪公權和摧毀法人資格的實驗，所以在集中營的人口中，他們在數量和性質上都是最主要的一類。在毒氣室裏，這條

原則得到了最充分的實現(只因爲它們的巨大能力)，它的意圖不是針對個人，而是針對一般人。在這一方面，有一段對話總結了個人的情況：「請問，毒氣室的目的是什麼?」——「你出生的目的是什麼?」[147]正是這第三個完全無辜的羣體，體現了集中營的最壞方面。刑事犯和政治犯都被納入這一類，因此他們被剝奪了由於他們做過某些事而應受的區別保護，他們徹底面對著被任意處置的可能性。最終目標部分地在蘇聯實現，在納粹恐怖的最後階段也明顯地顯示出來，這個目標就是使整個集中營內的囚徒都由這一類無辜的人組成。

囚徒的選擇完全出於偶然，分類自身並無意義，但是從組織的立場來看，分類是有用的，他們在到達集中營時被劃分開來。在德國集中營裏，分爲刑事犯、政治犯、不合社會羣體者、宗教反對派、猶太人，都由標幟來區分。西班牙內戰以後，法國建立了集中營，他們立即採用了將政治犯、刑事犯、無辜者（即無國籍者）混合的典型極權主義方式，儘管他們毫無經驗，但是在製造毫無意義的囚徒種類方面卻表現了出色的創造性。[147]這種技術的發明，目的是防止囚徒中產生團結，證明是特別有價值的，因爲誰也不可能知道他自己這個種類究竟比別的種類好一些還是壞一些。在德國，儘管死守成規的組織結構顯出固定的事實，在任何情況下，猶太人總是最底層的一種，但是情況永遠在變化。最可怕和最奇怪的是，囚徒們自己也分別認同這些分類，好像他們代表其法人身分的最後一種正式殘餘。即使我們不考慮其他一切情況，毋庸置疑，1933年從集中營放出來的一名共產黨員會比他進去時更像共產黨員，一名猶太人出來之後更是堅定的猶太人，在法國，一個外國軍團成員的妻子會更相信外國軍團的價值；似乎這些種類會保證可預測的待遇最後的殘餘，似乎他們體現了某種最後的、因此是最基本的法律身分。

囚徒分成種類，這只是一種組織技術措施，而任意選擇受害者卻表明了這種制度的根本原則。如果集中營取決於政治對手的存在，那麼它們就

很難在極權主義政權建立之後再存在下去。只消看一看 1936 年以後布辛瓦德囚徒的數字，就能明白無辜者對於集中營的繼續存在是絕對必要的。「如果蓋世太保在逮捕人時只考慮政治對手，那麼集中營就都會消失。」⑭到了 1937 年底，布辛瓦德的囚徒不到一千名，接近關門大吉，直到 11 月迫害猶太人時又送進來二萬多名新囚徒。⑭在德國，1938 年以後，無辜者中大量是猶太人；在俄國，無辜者包括居民中的各種各樣羣體，它們的不幸完全與他們的行動無關。⑮但是，如果在德國，眞正極權主義類型的集中營中囚徒絕大多數是完全「無辜者」，這要到 1938 年才建立，那麼在俄國，建立的日期更是早在三十年代初，因爲直到 1930 年，集中營裏大多數仍是刑事犯、反革命分子和「政治犯」（此處意指分裂派集團成員）。從那時起，集中營關押了如此衆多的無辜民衆，他們很難分類——有些人與某一個外國有某種接觸，有些是波蘭血統的俄國人（這尤其發生在 1936 年到 1938 年之間），有些是農民，他們的村莊由於某種經濟原因而被撤銷，有些是驅逐出境的少數民族，有些是紅軍的復員軍人，他們碰巧屬於占領軍，在外國待的時間太長，或者在德國當過俘虜，等等。對於集中營制度來說，政治反對派的存在只是一個藉口，即使在最巨大的恐怖之下，全體居民或多或少自願被「協調」（即被解除各種政治權利），這種制度的目標仍未達到。一種恣意妄爲的制度的目的是摧毀全體居民的公民權，使他們最終在自己的國家裏像無國籍者和無家可歸者一樣，失去法律保護。摧毀人的權利，剝奪他的法人身分，這是完全控制他的先決條件。而這一點不僅應用於一些特殊類型的人，例如刑事犯、政治反對派、猶太人、同性戀，對他們的實驗早已做過了，而且也應用於一個極權主義國家中的每一個居民。對於極權主義統治來說，自由贊同與自由反對一樣是一種障礙。⑮任意在無辜民衆中選擇逮捕對象，破壞了自由贊同之有效性，正如嚴刑——與死亡不同——摧毀了反對的可能性一樣。

即使在最殘暴的專制國家裏，這種恣意迫害也侷限於對某種宗教或政

治性質的觀點，某種類型的知識分子，或色情的社會行爲，或某些新發明的「罪行」，這就會使集中營變得多餘，因爲長期以來，沒有哪一種態度或觀點能禁得起這麼多恐怖的威脅；而且它首先會形成一種新的公正制度，完全具有穩定性，也不會無法獲得一種新的法人身分，避免極權統治。納粹的所謂「民衆利益」(Volksnutzen)常常變動（因爲今天有用的東西明天會變成有害的），永遠變動的蘇聯黨的路線（常常是逆動的）幾乎每天都在爲集中營製造新的民衆羣體，它只保證了集中營能繼續存在，由此繼續完全剝奪人的公民權。

在製造活死人的過程中，下一步關鍵是摧毀人身上的道德人格(moral person in man)。這主要靠在歷史上第一次使殉難成爲不可能的事：「這裏有多少人仍然相信，一次抗議會具有歷史重要性?」這種懷疑主義就是黨衛軍的眞正傑作。他們的偉大成就。他們破壞了一切人類團結。這裏的夜幕爲未來降臨。不留下目擊者，就不會有見證人。死亡不再延遲，這是給死亡一種意義，行動才能超越人自己的死亡。爲了能成功，連一個手勢也必須具有社會意義。我們有成千上萬人，都生活在一種絕對孤寂中。這就是無論發生什麼，我們都會屈從的原因。[153]

集中營和殺害政治對手都只是「有組織的遺忘」的一部分手段，不僅包括公衆輿論的載體，例如口頭和書面文字，而且甚至延伸到受害者的家庭和朋友。悲哀和紀念是禁止的。在蘇聯，一個女人在丈夫被逮捕後肯定會提出離婚，目的是拯救孩子的生命；假如她丈夫有機會生還，她會憤怒地將他推出屋外。[154]西方世界至今（即使在它最黑暗的時期）允許殺死的敵人有權被紀念，作爲承認一種事實的自證——我們都是人(而且**只是**人)。甚至連阿奇里斯(Achilles)也出發去參加海克托(Hector)的葬禮，最專制的政府也給殺死的敵人以榮譽，羅馬人允許基督徒寫自己的殉教者列傳，教會在對人的悼念中也讓異教徒復活，正因爲如此，所以一切都沒失去，也永遠不會失去。集中營製造匿名的死亡（使人們不可能發現囚徒的死活），

使死亡作爲完成人生的終結也被剝奪了意義。總而言之，他們奪走了個人自己的死亡，證明從此以後一切都不屬於他，他也不屬於任何人。他的死只對一種事實——他從來未眞正存在過——打上了封印。

這種對人的道德人格的攻擊可能仍然遭到人類良心的反對，良心會告訴他，寧可作爲一個受害者而死，也不作爲一個劊子手官僚而活著。當極權恐怖成功地切斷了道德人格的個人退路，使良心的決定絕對成問題和曖昧可疑時，它就取得了最令人可怕的勝利。當一個人面對選擇，或者背叛(因此要謀殺他的朋友)，或者使他的妻子兒女（他在任何一種意義上都要對她們負責)去送死；即使他自殺，也意味著直接謀殺他自己的家庭——他如何作選擇？這種選擇不再在善與惡之間進行，而是在謀殺與謀殺之間作選擇。納粹分子們允許那位希臘母親選擇，她的三個子女中有一個必須被殺死，有誰能夠解決她的難題？[155]

通過創造一些條件——在這些條件下不再有足夠的良心，也已完全不可能行善——極權政體的罪行中所有的人有意識地組織的共謀延伸到了受害者，因此造成了眞正的極權。黨衛軍將集中營囚徒——刑事犯、政治犯、猶太人——牽連進他們的罪行，使他們對很大一部分的管理負責，使他們面對毫無希望解決的難題，或者送他們的朋友去死，或者幫助謀殺陌生人，在任何事情中都逼迫他們像殺人者一樣行事。[155]問題在於，不僅對有罪之人的仇恨被扭轉了（仇恨「頭目」比仇恨黨衛軍更甚)，而且迫害者和被迫害者、殺人者和受害者之間的界限也常常變得模糊不淸。[155]

一旦道德人格被消滅了，仍然能阻止人被變成活死人的，只有個人的差異化和他的獨特性。在嚴格的形式上，這種個體性只有通過持恆的禁欲主義態度才能保持，當然在極權統治下，許多人已經採取、並且每天都逃避到個人的絕對孤獨中，沒有了權利和良知。無疑，正因爲人的這一部分人格從根本上依靠天性和意志無法控制的力量，所以最難摧毀（而當它被摧毀時，又最容易修復)。[155]

對付這種獨特的人格的方法有無數種，在此就不一一列舉了。它們開始於被押送到集中營來的路上種種可怕的條件，幾百個人被赤條條地塞進一節運牛的貨車車廂，互相緊貼，在鄉村的路上左搖右晃幾天來到目的地；到了集中營仍然如此，最初時刻的震驚是精心安排的，剃光頭，奇怪的集中營服裝；最後是完全難以想像的折磨，折磨計算精確到不殺死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很快死去。這一切方法是用來擺佈人的身體——有無限痛苦的可能——無情地摧毀人，就像對付器官性精神病一樣。

正是在這裏，整個過程的徹底瘋狂變得最明顯。折磨無疑是整個極權主義警察和司法機構的根本特徵；它每天被用於逼人開口說話。由於這類折磨追求一種特定的理性目的，所以就有某些侷限：或者囚徒在某一時間開口，或者被殺死。除了這種理性地操作的折磨外，在最初的納粹集中營和蓋世太保的刑訊室裏，還有一種非理性的、虐待式的折磨。這大部分由衝鋒隊執行，它並無目的，也不成系統，大多由反常因素來開始的。它的致死率相當高，1933 年進集中營的囚徒中，最初幾年便只剩寥寥無幾的倖存者。這類折磨似乎不像是經過策劃的政治制度，而是政體對其犯罪分子和反常者的默許，他們由此得到授予職務的獎賞。在衝鋒隊盲目獸性的背後，常常埋藏著對那些社會地位、知識、身體條件比他們好得多的人的仇恨和厭惡，他們現在好像要完成最狂野的夢想，要顯示他們的權力。在集中營裏，這種厭惡從未完全消失，使我們感到它是人類可理解的一種最後殘存的情感。[159]

但是，眞正的恐怖開始於黨衛軍接管集中營。那種舊的自發性獸欲讓位給一種絕對冷酷且有步驟的毀滅，毀滅人的肉體，精心摧毀人的尊嚴；死亡被避免，或被無限延遲。集中營不再是人形野獸的樂園，不屬於那些精神不正常的人了；情況倒了過來：集中營變成了「操場」，完全正常的人被訓練成標準的黨衛軍成員。[159]

消滅人的個體性，消滅均衡地由天性、意志、命運形成的獨特性，變

成了一切人類關係中十分自明的前提。它創造出一種恐怖，罩住了法律—政治人格(judicial-political person)的憤怒和道德人格的絕望。正是這種恐怖引起了普遍的虛無主義，使它足以支撐一種表面有理的說法：所有的人都一樣是野獸。[160]實際上，集中營的經驗顯示出人類可以被轉變成獸性人的種類(specimens of the human animal)，而人的「天性」是「人」(human)，只有當它爲人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可以變成某種高度非自然之物，——一個人(a man)。

摧毀了道德人格，取消了法律人格，毀滅個體性就幾乎永遠是成功的。也許可以找到羣眾心理學的某些規律，來解釋爲何幾百萬人竟會毫無抵抗地排隊走向毒氣室，儘管這些規律會解釋說，這只是個體性的毀滅。更有意思的是，那些個別地被判死刑的人很少嘗試與執行者之一同歸於盡，也很少有認眞的反抗，即使在被解放的時刻，也很少有人自發地去殺死黨衛軍人員。因爲毀滅了個體性就是毀滅了本能，毀滅了人的力量，從他自身的源泉中開始出現了某種新的東西，它不能以對環境和事件的反應爲基礎來被解釋。[161]剩下的只是人面傀儡，行爲都像巴甫洛夫實驗中的狗，一切反應都很可靠，即使走向自己的死亡，所做的也只是反應而已。這就是這種制度的眞正勝利：「黨衛軍的勝利，要求受折磨的人毫不反抗地走向絞架，他宣布放棄自身，擯棄其身分。這不是沒有目的的，黨衛軍人希望他失敗，不是純粹出於虐待。他們懂得，這種制度成功地在受害者走上斷頭台之前就已摧毀了他……這種無可比擬的最佳方法能使一整個民族處於奴役之中，處於投降地位。人類像啞吧傀儡一樣走向自己的死亡，任何事情都比不上這種過程更可怕。看到這一切情形的人對自己說『他們就這樣沒落了，在主人的手裏必然藏著多麼大的力量，』他轉身而去，內心充滿痛苦，而且徹底被擊垮了。」[162]

假如我們嚴肅地看待極權主義的抱負，不被常識誤引著斷言它們是烏托邦和不現實的，就會發現，集中營裏建立的垂死者社會是唯一的社會形

式，有可能完全統治人。渴望全面統治的人必須清除一切自發性，如個體性總會產生的純粹存在，並且追溯到最原始的形式，無論這些自發性如何非政治化、如何無害。巴甫洛夫的狗，降低到最基本的反應的人類樣本，一組反應總是可以被另一組以完全相同方式表現出來的反應清除和取代，這些就是極權主義國家裏的模範「公民」；這種公民如果是在集中營之外製造的，就會不完美了。

集中營的無用性、它們嘲諷地承認的反功利性(anti-utility)，已很明顯。在現實中，就維護政權的力量而言，它們比任何其他機構更重要。若無集中營，若無它們引起的那種難言的恐懼，以及它們在極權主義統治中提供的意義完整的訓練（這在其他地方都不可能以最徹底的可能性來完全檢驗），那麼一個極權國家就既不能以瘋狂手法刺激核心軍隊，也不可能使全體民衆處於完全冷漠的狀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都只可能十分迅速地沈回「舊的資產階級常規生活」；它們在早期的「過激」(excess)之後，會根據人類法則來屈服於日常生活；總之，它們會走上的發展方向，一切以常識來觀察的人都會預言這樣的方向。所有這些預言的可悲謬誤產生於一個仍舊安全的世界，都假設有一種每一個時代都確立的人性，將這種人性與歷史等同，於是宣布全面統治的思想不僅是非人道的，而且也是不現實的。同時我們也知道，人的力量如此之大，使他確定能想到做到。

要求無限權力正是極權政體的本質。只有當所有的人都無一例外地在他們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都可靠地受統治，這種權力才有保障。在外交事務領域，必須經常征服新的中立地區，而在國內，必須經常擴大集中營，來控制不斷產生的新的人類羣體，或者當情況需要時，就將它們消滅，以便替其他羣體騰出地盤。在外交事務和國內事務中，反對派的問題並不重要。任何一種中立，實際上是任何一種自發產生的友誼，從極權統治的立場來看，都像公開敵對時一樣危險，正因爲自發性本身不可估量，它是極權統治的一切障礙之中最大的一種。非共產主義國家中的共產黨人逃向或被召

喚到莫斯科，痛苦的經驗使之瞭解到，他們構成了對蘇聯的威脅。忠誠的共產黨人是在這個意義上對俄國政權構成了荒謬的威脅，正如羅姆派的忠誠納粹分子對於納粹一樣。

在極權主義條件下使信念和觀點變得荒謬和危險的原因是，極權主義政權以不需要他們的幫助或任何人的幫助爲最大的自豪。只要人不只是動物之反應和功能之完成，那麼他們對於極權政體來說就是多餘的人。極權主義並不致力於對人的專制統治，而是致力於一種使人在其中成爲多餘者的制度。只有在一個使人像毫無自發性的傀儡一樣，僅能作出有所限的反應，只有在這種世界裏，極權的權力才能獲得和維護。正因爲人的資源如此之大，所以只有當他變成一種獸性人的種類時，他才會完全被統治。

所以，性格是一種威脅，甚至最不公平的法律規定也是一種障礙；但是，使一個人不同於另一個人的個體性，卻令人無法容忍。只要所有的人都還未被造成同等的多餘之物——這只能在集中營裏才能做到——就難以達到極權主義的理想。極權主義國家常常努力（儘管從未成功）確定人的多餘性質，其方法是任意選擇各種羣體送進集中營，經常整肅統治機構，大規模地消滅人。常識極力地提出抗議，認爲大衆不是易於順從的，只有這一切巨大的恐怖機器才是多餘的；如果他們能夠說出眞理，極權主義統治者們就會回答：這機器只對你是多餘的，只是因爲它用來使人成爲多餘。

極權主義嘗試將人變成多餘，這反映出現代大衆對於地球上人口過剩的經驗。在垂死者的世界裏，人被教導說，有一種生活方式使他們成爲多餘，在這種生活方式裏，懲罰不是與罪行聯繫在一起來衡量的，剝削的實施並不考慮到利潤，工作而沒有產品，在這塊地方，每天重新製造無意義。然而，在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範圍之內，根本沒有什麼有意義、有邏輯之事；假如集中營囚徒都是歹徒，他們就應該被殺死或被毒氣毒死，這是符合邏輯的；如果他們是墮落的，就不允許他們玷污世人；如果他們具有「奴

隸般的靈魂」(希姆萊語),那麼誰也不應浪費時間對他們進行再教育。從意識形態的眼光來看,集中營裏的麻煩問題差不多就是因為他們太具有意義,而原則的執行又是太連貫一致了。

極權政體如此堅決、世故地替這個世界廓清對於常識的功利期望唯一有意義的東西,他們同時強加了一種超意義(supersense)——當他們假裝發現了歷史的關鍵或解決宇宙之謎的鑰匙時,意識形態的確總是有意義的。在極權主義社會的毫無意義之上,懸置著意識形態迷信的荒謬超意義。只要不去認眞地相信意識形態,它就是無害、不持批判態度、任意的觀點。一旦它們自稱完全有效,就變成了邏輯系統的核心,在這種邏輯系統中,就像在偏執狂的邏輯系統中一樣,每一種事物統統被包括在內,一旦大前提被接受,一切都會被強制地包括在內。這種系統的錯亂原因不僅在於大前提,而且在於他們建構的那種邏輯性。一切主義的奇怪邏輯性,他們頭腦簡單地相信頑固奉獻的救世價值,而不顧及具體的、變化的因素,這裏面早已埋伏了極權主義蔑視事實的最初細菌。

功利主義思想中訓練出來的常識,無助於反對這種意識形態的超意義,因為極權主義政權建立了一種毫無意義的功能世界。意識形態之蔑視現實性,還包括了驕傲地提出人類主宰世界;這畢竟是蔑視現實——使得改變世界、豎立起人類建制成為可能的現實。摧毀在極權主義對現實的蔑視中的自豪因素的是超意義(因此使它與革命的理論和態度有了徹底區別),超意義賦予蔑視現實的作法以說服力、邏輯性和連貫性。布爾什維克宣稱俄國目前的制度優於其他一切制度,其中的眞正極權主義手法是,極權統治者從這一宣言中得出無瑕的結論,即,若無這種制度,人們絕不可能建造奇妙的東西,比方說,一條地下鐵路;他從這一點中又得出邏輯結論,任何人只要知道巴黎有地下鐵路,他就是可疑分子,因為他可能引起人們懷疑只有根據布爾什維克的方式,人才能做事。這就導致了最終結論,為了繼續忠於布爾什維克,你必須去搗毀巴黎地下鐵路。什麼都不重要,只有

始終一貫的態度最重要。

運用這些新的結構，以超意義的力量爲基礎，由邏輯性作爲驅動力，我們的確到了資產階級時代利潤和權力的末日，也到了帝國主義與擴張時代的末日。極權主義的侵略性並非產生自對權力的渴望，如果它狂熱地追求擴張，其目的既不是爲了擴張，也不是爲了利益，而只是出於意識形態的理由：使世界達到連貫一致，證明它的各方面超意義是正確的。

正是主要爲了這種超意義，爲了邏輯的連貫一致，極權主義就有必要摧毀被普遍稱爲人類尊嚴的一切迹象。因爲尊重人類尊嚴意味著承認我的同伴或其他民族都是主體，是世界的建造者，或共同世界的共同建造者。凡是目標在於解釋以往一切歷史事件、指出未來一切事物的道路之意識形態，都不能承受從事實產生的不可預測性，這個事實是，人有創造性，他們可以製造出無人預見過的新事物。

因此，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目標不是改變外部世界，或者社會的革命性演變，而是改變人性。集中營是實驗室，在集中營裏試驗改變人性和羞恥心，所以集中營不光是囚徒們的事情，也不光是根據嚴格的「科學」標準來管理他們的人的事情；它關係到所有的人。苦難一向是地球上最多的，但這不是問題，受害者的數目也不是問題。危險的問題倒在於人的天性(human nature)，即使這些實驗的結果不是改變人，倒像是摧毀人，其方法是創造一個社會，在這個社會裏虛無主義陳詞濫調中所說的人性(homo homini lupus)不斷被實現，我們也應該記住，需要全世界控制以顯示最終結果的實驗必然有侷限性。

極權主義關於「一切都是可能的」信念，至今看來仍只證實了「一切都可以被摧毀」。然而，爲了證明一切都是可能的，極權主義政權在無意中發現，有一些罪行是人們既不能懲罰、又不可寬恕的。當不可能的事情成爲可能時，它就變成不能懲罪的、不可饒恕的絕對罪惡，不再能被理解，也不再能由自我利益、貪婪、渴望、怨怒、權力慾望、怯懦等等罪惡動機來

解釋；因此，憤怒不能向它報復，愛不能忍受它，友情不能原諒它。正如死亡工廠或被遺忘的洞穴裏的受害者，他們在執刑人眼裏不再是「人」，於是這一類新的罪犯就處於使人類因原罪而結合的範圍之外了。

在我們的全部哲學傳統中，我們本來就不能相信一種「徹底的惡」，在基督教神學裏，魔鬼本人也是天使出身，康德(他用自己的語言解釋惡)至少懷疑這種惡的存在，即使他立即用理性化的概念將之解釋成「反常的惡意」(perverted ill will)，但是也可以用可理解的動機來闡釋。所以，我們實際上不必藉助任何事物，就可以理解一種用十分有力的現實來和我們對抗、打破我們所知的一切標準的現象。只有一件事情似乎是可以辨別出來的：我們可以說，徹底的惡與一種制度同時出現，在這種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樣變成了多餘的。操縱這個制度的人相信自己和其他人一樣是多餘的，極權主義的殺人者最爲危險，因爲他們連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不關心自己是否生活過、是否出生過。死屍工廠和遺棄人的洞穴的危險性在於，如今人口到處在增長，無家可歸的現象也到處在增長，如果我們繼續根據功利主義來思考世界，那麼，人民羣眾仍然會變成多餘者。在每一個地方，政治事件、社會事件、經濟事件正在悄悄地和使人變成多餘物的極權主義工具共謀。羣眾的功利主義常識能明白暗藏的誘惑，在大多數國家裏，大衆仍然十分恐懼死亡。納粹和布爾什維克可以確信，他們的殺人工廠顯示了能夠迅速解決人口過剩問題，清除從經濟上來看是多餘的、在社會上是無根的人類羣衆，這既是一種吸引，也是一種警告。在極權主義政權垮台之後，極權主義的方案仍能存在，它以一種具有強烈誘惑的形式，將會在可能的時候，以對人有利，並且能夠解除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悲苦的姿態出現。

註釋

❶納粹分子完全明白，奪取政權可能導致絕對主義(absolutism)制度。「但是，國家社會主義並不爲了陷入絕對主義和從頭開始遊戲，而將鬥爭的矛頭指向自由主義。」(維納·貝斯特，《論德國警察》〔*Die deutsche Polizei*〕，20 頁）這裡提出的警告，就像在其他許多地方一樣，直接反對國家的專制要求。

❷托洛茨基的理論最初公布於 1905 年，當然和一切列寧主義者的革命戰略一樣，他們認爲「俄國只是國際革命的第一塊領域，第一個堡壘：它的興趣是從屬於戰鬥的社會主義的超越民族戰略。但是俄國和勝利的社會主義的邊界暫時還是相同的。「(多伊切，《斯大林政治傳記》，1949，243 頁。)

❷ 1934 年具有意義，因爲這座新的黨內塑像在第十七次黨代會上宣布「要實行階段性的整肅，系統地使黨保持清潔。」(引自阿夫托爾哈諾夫〔Avtorkhanov〕〈黨內的社會分化與矛盾〉〔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Party〕，載《蘇聯研究所通報》〔*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USSR*〕，慕尼黑，1956 年 2 月號。)俄國革命初期黨內整肅與後來極權主義將它顚倒爲永恆的反覆無常工具根本不同。最初的整肅由地區執行委員會在公開場合執行，黨員和非黨員都可以自由發言。按照原計劃，它們是黨內反官僚腐敗的民主控制機構，「用來代替眞正的選舉。」(多伊切，前引書，233-234 頁)阿夫托爾哈諾夫的一篇文章簡明扼要地評述了整肅的發展過程，文中也駁斥了關於基洛夫(Sergei M. Kirov)被刺引起新政策的傳說。在基洛夫死前，全面整肅已經開始，這件事只是一種「使之升級的便利藉口」。圍繞著基洛夫之死的許多「不明不白的神祕」情況，人們會懷疑「便利藉口」是斯大林本人仔細謀劃和執行的。(見赫魯曉夫，〈關於斯大林的報告〉，載紐約《時代周刊》，1956 年 6 月 5 日。)

❹多伊切，前引書，282 頁，描述了最初對托洛茨基「不斷革命」的攻擊和斯大林的反駁公式「一國建成社會主義」(Socialism in one country)是一種政治操作中的事件。在 1924 年，斯大林的「直接目的是使托洛茨基名譽掃地。」……追溯托洛茨基的歷史時，執政的三頭馬車遇到了「不斷革命」，這是托洛茨基在 1905 年提出的。……在論爭的過程中，斯大林提出了自己的理論「一國建

成社會主義」理論。

❺ 1934年6月清除羅姆派之前有一段短時間的穩定。這一年的年初，柏林政治警察首腦魯道夫·迪埃爾斯(Rudolf Diels)報告說，衝鋒隊不會再非法(「革命的」)逮捕人，原先逮捕的犯人也正在審訊。(見《納粹的陰謀》，第5卷，205頁) 1934年4月，納粹黨的老黨員、帝國內務部長威廉·弗立克(Wilhelm Frick)頒布一道命令，對實施「保護性拘捕」作了限制。(見《文獻》〔*Das Archiv*〕，1934年4月，31頁)但是這道命令並未公布。普魯士政治警察遞交了一份專門報告，內容是衝鋒隊爲希特勒做的一些過分行爲，並建議起訴報告中提及的衝鋒隊一些領導人。

希特勒解決事態的辦法是不經過法律程序而殺死了這些沖鋒隊領導人，**同時**將反對衝鋒隊的警方官員全部撤職。他以這種方式維護自己的完全合法和穩固的地位。在無數名熱誠服務於「國家社會主義思想」的法官中間，只有極少數人理解實際上這是在冒何種險。這少數人中間首推特奧多·芒茲(Theodor Maunz)，他的論文《警察的形式與權限》(*Gestalt und Recht der Polizei*)(漢堡，1943)常被正面引用，甚至包括黨衛軍高級成員保羅·維納等作者。

❻羅伯特·萊依，《奧登斯堡之路》(1936)。「此書不公開出售，專供黨內領袖衛隊成員閱讀。」

❼希姆萊，〈防衛階段〉(Die Schutzstaffel)。種族選擇原則的經常劇烈化可以見諸納粹政策的一切方面。因此，首先要被消滅的是純種猶太人，然後是一半血統和四分之一血統的猶太人；或者首先消滅精神病人，然後是無法治癒的病人，最後是凡有「無法治癒疾病」者的所有家庭成員。「永遠不會停止的選擇」在黨衛軍本身內部也不會停止。1943年5月19日的領袖命令規定，凡是通過家庭關係、婚姻、朋友關係而與外國人有密切關係者，都應從國家、政黨、國防軍、經濟界清除出去；這道命令影響到一千二百名黨衛軍領導人。(見胡佛圖書館檔案室，希姆萊檔案，卷宗第330號)

❺根據常識，在俄國，「對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的鎮壓之嚴厲，與國家變

平靜成正比。」(西利加，《俄國之謎》，224 頁)多伊切(前引書，218 頁)認爲，在勝利時刻，「革命的解放精神」消失的原因可以見諸於農民態度的改變：他們轉而反對布爾什維主義，」他們愈是堅決，愈相信地主和白俄將軍們的力量已經破滅。」根據 1930 年發生恐怖的方向來看，這一解釋似乎相當無力。它也沒說淸完全的恐怖並非開始於二十年代，而是開始於三十年代，當時農民階級的反抗在這種情勢下不再是一種積極的因素。赫魯曉夫也指出：「在反對托洛茨基的鬥爭中，當時並未使用極端的鎮壓措施」來對付反對派，對付布哈林時也未用極端的鎮壓措施，而是在他們被擊敗之後很長時間，「才開始對他們鎮壓」。

納粹政府的恐怖在戰時達到巓峰，當時德國民族實際上「已經統一」。恐怖的準備階段回溯到 1936 年，當時一切有組織的內部抵抗都已停止，希姆萊提議擴建集中營。1943 年希姆萊在卡爾可夫對衝鋒隊領導人的演講表明這種壓迫的特點是無視反抗：「我們只有一項任務，毫不留情地執行種族鬥爭。我們絕不會讓那種優秀武器，亦即在卡爾可夫戰役中開始的可怕名聲黯然失色，相反會是使它經常增添新的意義。」(《納粹的陰謀》，第 4 卷)

❾見芒茲，前引書，5 頁和 49 頁。納粹很少想到自己頒布的法律和法規，這可以從他們的一名憲法法官的隨意評論中看到。他覺得儘管缺少全面的法律新秩序，但是有一種「全面的改革」。(見恩斯特·休伯〔Ernst R. Huber〕，〈論德國警察〉〔Die deutsche Polizei〕，載《總體國家學說研究期刊》，第 101 卷，1940 年 1 月，273 頁。)

❿芒茲，前引書，第 49 頁。據我所知，納粹著作家中只有芒茲提及這一情況並作了充分強調。只有讀完了五卷本的《法令、規定與公告》(*Verfügungen, Anordungen, Bekanntgaben*)(戰根據馬丁·鮑曼的指導由納粹黨法院彙編印發)，才有可能深刻觀察到這種事實上統治德國的祕密立法的情況。前言中說，這幾卷文件「只對黨內工作有意義，只在內部使用。」其中四卷資料很少見。

⓫這是領袖於 1933 年對法官們的「警告」。引自漢斯·弗蘭克，《新德意志刑法中的國家社會主義指導原則》(*National sozialistische Leitsätze für ein*

neues deutsches Strafrecht）（1936），第 2 部分，8 頁。

⑫多伊切，前引書，381 頁。在 1918 年和 1924 年都有過確立憲法的早期嘗試。1944 年的憲法改革讓某幾個蘇維埃共和國擁用自己的外交代表和自己的軍隊，這是一種策略行為，目的是保證蘇聯在聯合國多幾票。

⑬同上，375 頁。仔細閱讀了斯大林關於憲法的講話（1936 年 11 月 25 日第八次非常蘇維埃代表大會）之後，可以明顯看到，這憲法絕不意味著是特別限定的。斯大林明確地說：「這是我們在特定歷史時刻的憲法結構。因此新憲法草案代表了我們走過的全部道路，代表了早已存在的全部成就。」換言之，這部憲法在頒布的時候就標示了日期，但這只能引起歷史興趣。莫洛托夫證明，這不是一種獨斷詮釋，他在談論憲法時採用了斯大林的話，強調其未來性質：「我們只實現了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即低級階段。即使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也完全未完成；它只突顯了基本架構。」（見《工農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Die Verfassung des Sozialistischen Staates der Arbeiter und Bauern*〕，1937，42 及 84 頁）

⑭「因此德國的憲法生命特點是完全無形無狀，與意大利相反。」（弗朗茨・諾曼《政治巨獸》，1942，附錄，521 頁。）

⑮蘇伐萊恩，《斯大林：布爾什維主義批判研究》（1959），695 頁。

⑯斯蒂文・羅伯茨（Stephen H. Roberts），《希特勒所建之屋》（*The House that Hitler Built*）（倫敦，1939），72 頁。

⑰羅伯特・傑克森（Robert H. Jackson）法官在紐倫堡審判的開始講話中，時常將他對納粹德國政治結構的描述基於共存的「德國的兩個政府——實際的和表面的。德意志共和國的形式維持了一段時間，它是外表上可見的政府。但是國家眞正的權威在法律之外，高於法律，在納粹黨的領導集團手中。《納粹的陰謀》，第 1 卷，125 頁）羅伯茨，前引書，101 頁，也區分了黨和影子國家：「希特勒明顯地傾向於增加機構的複制。」

研究納粹德國的人看來都認為國家只是表面權威。唯一的例外是恩斯特・弗萊恩克爾（Ernst Fraenkel）的《論雙重國家》（*The Dual State*）（紐約，倫

敦，1941），他認爲共存的「一個標準的和一個特權的國家」經常磨擦，是「和德意志帝國競爭的而不是互補的部分」。納粹維持標準的國家，是爲了保護資本主義秩序和私有財產，對一切經濟事務具有完全的權威，而黨的特權國家是一切政治事務的最高統治者。

⑱「至於國社黨人無法用自己人去占據的那些國家權力職位，他們設立了相應的「影子部門」，以此在自己的黨組織內建立了國家之外的第二個國家……」（海登，《希特勒權力之路》）

⑱賈爾斯的《蓋世太堡》描述了政黨和國家部門經常重疊的情況。

⑱內政部長弗立克的一份備忘錄記述了一個事實，即黨衛軍首領希姆萊應該擁有最高權力。（《納粹的陰謀》，第3卷，547頁）在這一方面值得一提的還有羅森伯格1942年與希特勒的一次討論的記錄：羅森伯格在戰前從未獲得國家職務，但是屬於希特勒身邊最親近的小圈子內。現在他成了東歐占領區帝國部長，他常常面對其他全權委員（主要是黨衛軍成員）的「直接行動」，他們藐視他，因爲他現在屬於可見的國家機器。（同前引書）還有漢斯·弗蘭克，波蘭的總督，其情形也一樣。獲得部長級職位而未有任何權力和聲譽損失的只有兩個例外：宣傳部長戈培爾和內政部長希姆萊。希姆萊1935年的備忘錄描述了納粹在調整黨國關係時一向頭腦簡單。這份備忘錄明顯地出自希特勒身邊，係對領袖和蓋世太保的採訪記錄中發現的，包括一項警告，反對任命希姆萊爲內政部長，因爲在這種情況下，「他不能再當政治領袖，與黨離異。」我們從中可以看到，這裡提及規定黨和國家之間關係的技術原則：「黨的高級官員（Reichsleiter）不應該從屬於一個國家高級部門（Reichsminister）。」（這份未註明日期、未署名的備忘錄，題目是《秘密的國家警察》〔*Die geheime Staatspolizei*〕，存胡佛圖書館檔案室，魏德曼卷宗之內。）

⑱參見《納粹的陰謀》，第3卷，27頁，〈1933年至1943年羅森柏格的外交事務局活動簡要報告〉（Brief Report on Activties of Rosenberg's Foreign Affairs Bureau of the Party from 1933 to 1943）。

⑱根據1942年8月12日領袖命令。見《法令、規定與公告》。（同註⑩）

㉓「表面政府背後是實際政府」，這是維克多・克拉夫欽科在「秘密警察制度中所見」。（維克多・克拉夫欽科〔Victor Kravchenko〕，《我選擇自由：一個蘇聯官員的個人生活》〔*I Chose Freedom: The Personal Life of a Soviet Official*〕，紐約，1946）

㉔阿瑟・羅森柏格，《布爾什維克主義史》，第 6 章：「在俄國，實際上有兩個政治結構平行上升：蘇維埃影子政府和布爾什維克黨實際政府。」

㉕多伊切，前引書，255 至 256 頁總結了斯大林在第十二次黨代會上關於他當總書記的第一年人事部門工作的報告：「一年前，地區工會領導人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七是黨員。現在他們之中有百分之五十七是共產黨員。合作社管理人員中共產黨員的比例從百分之五上升至百分之五十；軍隊指揮員中從百分之十六上升至百分之二十四。在所有的其他機構中，情況也一樣，斯大林形容爲聯結黨和人民的『傳送帶』。」

㉖羅森柏格，前引書。

㉗芒茲，前引書，12 頁。

㉘大法官霍恩教授說：「還有另一件事情，外國人和德國人都應該習慣：國家秘密警察的任務……由一羣人接管，他們原先是運動中的人，現在仍以運動爲本。國家警察這個詞實際上不允許這一事實在此被一筆帶過。」（《德國警察的基本問題》〔*Grundfragen der deutschen Polizei*〕，1936 年 10 月 11 日在德國法律學會〔Academy for German Law〕警察法委員會憲法討論會上的報告。漢堡，1937）

㉙例如，漢斯・弗蘭克在《法律與行政》中嘗試闡明兩者的分別責任，以反對「權威的混亂」，另外，他在一篇《國家術》（*Technik des Staates*）(1941) 的演講中表達了一種觀點：「法律保障」不是「自由政府制度的特點」，行政應該像以前一樣，繼續由帝國的法律統治，帝國法律現在受國社黨黨綱的啓發和指導。正因希特勒想不惜一切代價防止新的法律秩序，所以他絕不承認納粹黨的綱領。對於提出這種建議的黨員，他總是嘲諷地形容他們「永遠綁在過去歷史上」，他們「無法跳過自己的影子」。（費利克斯・克斯頓〔Felix Kersten〕，《骷髏與忠誠》〔*Totenkopf und Treue*〕，漢堡）

㉚「三十二個大區並不對應行政區與軍事區，也不對應衝鋒隊的二十一個分區，

或黨衛軍的分區，或希特勒青年團的二十三個分區。這種矛盾比較突出，因爲它們本身存在就不合理。」（羅伯茨，前引書，98頁）

㉛參見巴黎文獻中心，紐倫堡檔案，PS 3063。這份檔案的內容是黨內最高法庭關於「與1938年11月9日反猶示威有關的事件和黨內法庭的審訊」。根據警方和大法官辦公室的調查，最高法庭得出結論，「帝國宣傳部長的口頭指示應該由全體黨內領導人理解爲：對於外界來說，黨並不希望顯出實際上組織和執行了這件事，是示威的鼓動者。」對指揮者階層的重新審查指出，在執政前的鬥爭中磨鍊過的積極的國社黨黨員理所當然地認爲，在行動中，黨不希望顯出組織者的角色，行動的命令不會清楚到細節問題。於是他習慣於根據黨的利益去理解一道命令的言外之意，發令者一向不會把一切事情說清楚，只暗示他的命令所要達成的結果。所以，當發布的命令是「黨內同志馮·拉特之死不應只歸咎於猶太人葛倫斯邦，而應歸咎於全體猶太人，……帶好槍支，……每一個衝鋒隊員都應該知道他必須做什麼」時，一些下級領導人理解爲現在必須讓猶太人血債血還。特別有意義的是這份報告的末尾，黨內最高法庭十分公開地對這些方法提出異議：「根據原則，這道意圖模糊的命令在發布時，是否希望接受者認出發令者的意圖並據此行動，這是另一回事，不應和過去聯繫起來。」用希特勒的話來說，這裏有人「無法跳過自己的影子」，還在堅持法律條文，因爲他們不懂，最高的法律不是領袖的命令，而是他的「意志」。在這裏，菁英組織的心理和政黨機構之間的差異就特別清楚了。

㉛貝特斯（見前引書）是這樣說的：「只要警察執行領袖的這項意志，他們的行動就是合法的；如果領袖的意志被違背了，那麼犯此罪的就不是警察，而是警察中的一個成員。」

㉛參見註㉛。

㉛ 1933年國會縱火案以後，「衝鋒隊比納粹黨大區領袖更有權。他們也拒絕服從戈林。」（見魯道夫·迪埃爾斯宣誓證詞，載《納粹的陰謀》，第4卷，224頁）迪埃爾斯是戈林手下的政治警察首領。

㉛衝鋒隊顯然不滿於在納粹層級制度中喪失地位和權力，拼命想保持權勢。在他

們的刊物上可以看到許多隱蔽的或公開的和黨衛軍徒勞地爭權的現象。更有意思的是，1936 年，當衝鋒隊早已失勢時，希特勒仍然在演講中向他們保證：「你們的存在全依靠我，而我的一切也只依靠你們。」（恩斯特·貝耶，《論衝鋒隊》，柏林，1938，譯文引自《納粹的陰謀》，第 4 卷，781 頁。）

㉟羅森柏格 1941 年 6 月演講說：「我認爲我們的政治任務包括……以某些類型的政治實體來組織這些民族……使它們起來反對莫斯科。」可和〈東歐占領區無日期備忘錄〉比較：「蘇聯戰敗後解體，東歐占領區不會再有政體，所以……其居民不會有公民權。」（《主要戰犯的審判》〔*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紐倫堡，1947，第 26 卷，616 及 604 頁。）

㊱《希特勒的餐桌談話》（波恩，1951，213 頁）。希特勒通常指的是納粹某些高級官員，他們對屠殺一切不肯悔過者持保留態度，希特勒形容被屠殺者是「人類廢物」。（248 頁）

㊲關於各種重疊的黨內機構，可參見《國社黨的層級與機構》（*Rang- und Organisationsliste der NSDAP*）（斯圖加特，1947）和《國社的陰謀》（第 1 卷，178 頁），其中區分四個主要類型：㈠國社黨分部（Gliederungen der NSDAP），從執政前起就已存在；㈡國社黨聯盟（Angeschlossene Verbände der NSDAP），其中包括被「協調」的團體；㈢國社黨指導組織（Betreute Organisationen der NSDAP）；㈣國家社會主義外圍組織（Weiter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Organisationen）。幾乎在這每一類裏都有不同的學生組織，婦女組織，教師組織，工人組織。

㊳先由托德特組織（Todt organization）、後由艾伯特·斯皮爾（Albert Speer）領導的大型公共事務組織，是由希特勒在黨外創建的。這個組織可以用來對抗黨的權威或警察機構。值得注意的是，斯皮爾在 1942 年的大會上敢於向希特勒指出，在希姆萊執政下不可能組織生產，甚至還要求對奴役勞動和集中營進行司法調查。（見《納粹的陰謀》，第 1 卷，916-917 頁）

㊵這類不重要的對應機構，例如國社黨機動軍團（NSKK）（成立於 1930 年）在 1933 年突然上升到菁英組織的地位，與衝鋒隊和黨衛軍一樣享有黨內獨立直

屬單位的地位。自此之後，黨內層級制度中再也沒有第二個例子：它是對衝鋒隊和黨衛軍的一種威脅。

㊶貝克與戈丁，《俄國大整肅與逼供》，153 頁。

㊷同上，159 頁。根據其他資料，蘇聯警察機構還有其他搖擺的多頭現象的例子，主要是內務部的地方性和地區性協會，它們各自獨立工作，並且與地方性和地區性的黨的特務網對峙。就對事物性質的了解而言，我們對俄國情況不如對納粹德國情況熟悉，尤其是牽涉到組織機構的細節問題。

㊷根據一名前雇員的證詞（《納粹的陰謀》，第 4 卷），「希姆萊專門將一項任務交給兩個不同的人」。

㊶漢斯・弗蘭克在某種程度上顯示出他想使運動穩定下來，而他在駐波蘭的總督職位上發出的無數抱怨，證明他完全不理解納粹政策中精心構成的反功利主義傾向。他不理解爲何不是剝削被征服的民族，而是消滅他們。在希特勒眼裏，羅森柏格在種族問題上不可靠，因爲他想在東歐占領區建立衛星國，不懂得希特勒的人口政策目標是消滅這些占領區的人口。

㊷關於分成「小權威」（little principalities），形成「在法律之外、以領袖爲頂層的權力金字塔」的概念，是羅伯特・傑克森提出的。（見《納粹的陰謀》，第 2 卷，第 12 章）。希特勒爲了避免建立這樣一種獨裁主義國家，早在 1934 年，就發布了這樣的黨內命令：「致詞形式『我的領袖』只用於領袖一人。在此，我禁止國社黨的各級領導人接受這樣的致詞，無論是口頭還是書面形式。致詞形式應該是『黨內同志』或『大區領袖』等等。」（見《法令、規定與公告》，1934 年 8 月 20 日命令）

㊷見《國社黨組織手册》。

㊷見《納粹的陰謀》，第 8 卷，第 14 章。

㊷黨內以及菁英組織的宣誓都必須在希特勒本人在場時舉行。

㊷希姆萊朝此方向跨出的第一步發生在 1944 年秋，他根據自己的意志下達命令，在集中營裏拆除毒氣室，阻止了大規模屠殺。這是他提出和西方列強舉行和平談判的方式。有意思的是，希特勒明顯地從來不知道這些準備工作；看來

無人敢告訴他，他的最主要的戰爭目的之一早已被放棄了。（見列昂·波利雅柯夫），《仇恨的豐收》，1951，232 頁。）

㊿關於斯大林死後的事件，可參見哈利森·薩利斯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的《美國人在俄國》（*American in Russia*），1955，232 頁。

㊿參見《納粹的陰謀》，第 2 卷，250 頁和 256 頁對納粹警察結構的出色分析。

㊿同上，252 頁。

㊿弗朗茨·紐曼（前引書，521 頁）懷疑「德國能否被稱作一個國家。而領導人之間永遠被迫在分歧之後同意，這就不止是一個幫派了。」康拉德·海登論納粹德國由一個集團統治的著作很有代表性。關於希特勒周圍形成的幾個集團，《鮑曼通信集》（*The Bormann Letters*）很有啓發作用。在對醫生們的審判中（美國起訴卡爾·勃蘭特等人，1947 年 5 月 13 日聽證會），維克多·勃拉克（Victor Brack）作證，早在 1933 年，鮑曼無疑根據希特勒的命令，開始組織一個高於國家和政黨的團體。

㊿參見筆者對德國人罪行的探討文章〈論有組織的犯罪〉（Organized Guilt），載《猶太前線》（*Jewish Frontier*），1945 年 1 月號。

㊿ 1939 年 11 月 23 日演講。（引自《主要戰犯的審判》，第 26 卷，332 頁）這次宣布的話不是歇斯底里錯亂，從希姆萊的演講（1944 年 3 月在波森的市長會議上）中可以明顯看出：「歷史的天平上價值何在？我們自己民族的價值。……第二，我敢說，更大的價值在於我們的領袖阿道夫·希特勒這個獨一無二的人，二千年來第一次送給日耳曼種族來充當偉大領袖。……」

㊿《希特勒的餐桌談話》說過這個問題：新領袖將被選爲「參議員」；選舉領袖的指導原則應該是，參加選舉的人中間任何爭論都必須爲了選舉程序能延續而停止。在三個小時之內，國防軍、黨和全部政府機構都必須作盟誓。「他並不幻想在這次國家最高首腦的選舉中，肯定會有一種傑出領袖的個性能爲帝國掌舵。」但是這不會帶來危險，「只要管轄一切的機器運轉正常，發揮它的恰當作用。」

㊿黨衛軍的指導原則之一由希姆萊本人制定：「沒有一項任務是出於它本身目的

而存在的。」參見根特•達爾昆，《論黨衛軍：國社黨防衛階段的歷史、使命與組織》(*Die SS: Geschichte, Aufgabe und Organisation der Schutzstaffeln der NSDAP*) (1939)

❺見達維•達林(David J. Dallin)和鮑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Boris I. Nicolaevsky)，《俄國的強迫勞動》(*Forced Labor in Russia*) (1947)。他們還報導說，戰爭期間，當戰爭動員造成人力的嚴重問題時，集中營的死亡率在一年內是百分之四十。根據一般估計，集中營裡一個工人的產量是自由勞動的百分之五十以下。

❺托馬斯•雷維葉(Thomas Reveille)，《歐洲之破壞》(The Spoil of Europe) (1941) 估計德國在戰爭第一年可以收回它在 1933 至 1939 年間的全部備戰開支。

❺威廉•埃本斯坦，《納粹國家》，257 頁。

❺同上，270 頁。

❺戰爭爆發那天發布了關於殺死一切無法治癒的病人之命令，戰爭期間，希特勒還有過類似的言論。戈培爾在他的日記中說，「戰爭使我們有可能解決在正常時期不可能解決的全部問題，」無論戰爭的結果如何，「猶太人必定是輸家」。(314 頁)

❺國防軍自然向各種黨的機構一再解釋，完全無視軍隊、平民、經濟的一切需要而發布命令，這種戰時行爲很危險。(參見波利雅可夫，前引書，321 頁)甚至連納粹的許多高級官員都很難理解，在這種形勢下爲何還忽視一切客觀的經濟和軍事因素。他們一再被告知，「在解決猶太人問題時，應該根本不考慮經濟問題。」(《納粹的陰謀》，第 6 卷，402 頁) 但是他們仍然抱怨，在波蘭的一座大廈工程計劃中斷，「如果爲此工作的幾千名猶太人不被驅逐出境，事情就不會發生。現在又下達了命令，將武器工程中的猶太人驅逐出去。我希望這項命令很快會被取消，因爲到那時情況會更糟糕。」漢斯•弗蘭克的這一希望未能實現，就像他後來對於軍事上更有牽連的波蘭人和烏克蘭人政策的期望一樣。他的抱怨很有意思(參見《納粹的陰謀》，第 4 卷，902 頁的日記)，因爲他對納粹戰

時政策的反功利主義性質感到害怕。「我所關心的是，一旦我們贏得戰爭，在這裡周圍的波蘭人、烏克蘭人和其他人都會被剁成肉醬。……」

❻❹原先，只有黨衛軍的特殊單位——敢死隊——才用於集中營。後來黨衛軍武裝部門取代之。從 1944 年起，也起用了正規軍單位，但是通常歸併入武裝黨衛軍。（參見《納粹的陰謀》，第 7 卷，211 頁，紐恩伽默集中營一位前黨衛軍軍官的證詞。）至於國防軍如何積極參與集中營事務來表現自己，奧德南森集中營日記《一天又一天》(*Day after Day*)（倫敦，1994）對此有所敍述。不幸的是，集中營日記顯示出這些正規軍部隊的殘忍程度至少不亞於黨衛軍。

❻❺多伊切，前引書，326 頁。這句話出自一位非共產黨的、最寬厚的傳記作家之口，因此頗有份量。

❻❻納粹分子尤其喜歡從千年至福來認識問題。希姆萊宣布說，黨衛軍只對於「具有幾十年、幾百年重要意義的意識形態問題」感興趣，他們「獻身於二千年只發生一次的事業」，這句話在黨衛軍思想灌輸的材料中幾乎一成不變地多次重複。在布爾什維克方面，最好的參考資料是 1928 年莫斯科的黨代會上斯大林提出的共產國際綱領。特別有意思的是將蘇聯評價爲「世界運動的基地、國際革命的中心、世界歷史最大的動力因素。在蘇聯，世界無產階級第一次獲得了一個國家……」（引自錢伯倫，《征服世界的藍圖》〔*Blueprint for World Conquest*〕，1946，其中共產國際的綱領全文照印。）

❻❼官方口號的這一變化可見諸於《國社黨組織手冊》，7 頁。

❻❽海登，前引書，722 頁。1937 年 11 月 23 日，希特勒在奧登斯堡的未來政治領袖會議上說：「不是奇特的小部落、小國家，不是國家或王朝……而是種族，才能產生世界征服者的作用。然而至少在有意識的觀念中，我們還有待於成爲一個種族。」（《希特勒的餐桌談話》，445 頁）與此相符的說法是 1941 年 8 月 9 日的命令，其中希特勒禁止再使用「日耳曼種族」這一說法，因爲它會導致「犧牲種族思想本身，以迎合一種單純的民族原則，破壞我們總體種族和民族政策的重要概念先決條件」。（見《法令，規定與公告》）很明顯，一個日耳曼種族的概念會構成對於進步的「選擇」過程的障礙，以及消滅不適合的日耳曼人，這在那

幾年裡正是一項關於未來的計劃。

⑩結果希姆萊「很快在各國組建了日耳曼人黨衛軍」，他對他們說：「我們並不希望你們變成機會主義的日耳曼人。我們希望你們使民族理想服從於更偉大的種族理想和歷史理想，服從於日耳曼帝國。」（海登，前引書）它的未來任務將是通過「最豐富的繁育」構成「種族超級層次」，再過二十或三十年，將能「向全歐洲提供它的領導階級」。（希姆萊 1943 年在波森的黨衛軍少將會議上講話）

⑩希姆萊，同上。見《納粹的陰謀》，第 4 卷。

⑩多伊切形容斯大林著名的「感受一切心理潛流的能力，他使自己成爲代言人。」（前引書，292 頁）「托洛茨基的理論『不斷革命』之名對於疲倦的一代人來說，正是預兆不祥的警告。斯大林直接訴諸恐怖的冒險和疑惑，這些都早已存在於許多布爾什維克的心中。（291 頁）

⑩因此希特勒可以在 1941 年用他最喜愛的老生常談「像樣的猶太人」來開始消滅他們。（見《希特勒的餐桌談話》，346 頁）

⑩所以希特勒在 1937 年 11 月對總參謀部成員布隆伯格(Werner von Blomberg)、弗里奇、拉德爾和高級文官紐拉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戈林談話時公開地說，他需要無人地區，否定征服外國民族的想法。這種觀點自然會導致滅絕外國民族的政策，而當時聽他談話的人顯然誰也未能理解。

⑭這件事開始於 1934 年 7 月的一道命令，將黨衛軍的級別提高到國社黨內的獨立組織，完成於 1938 年 8 月的一道最高機密令，宣布黨衛軍裡的特別組織敢死隊和突擊隊既非軍隊亦非警察；敢死隊「完成警察性質的特殊任務」，突擊隊是「一個完全受我指揮的特別武裝單位」。（《納粹的陰謀》，第 3 卷，459 頁）1939 年 10 月和 1940 年 4 月兩道與此有關的命令設立了處理全體黨衛軍成員中一般事情的特別法庭。（同上，第 2 卷，184 頁）從這時起，黨衛軍思想灌輸辦公室印發的一切小冊子都標上「只供警察使用」、「內部讀物」、「只供領導人和思想教育都使用」。值得編一本印行於納粹時代的卷帙浩繁的秘密文獻目錄，包括大量法律措施。有趣的是，在這一類文獻中竟然沒有一本衝鋒隊的小冊子，或許是因爲自從 1934 年以後，衝鋒隊不再是一個菁英組織的緣故。

⑮弗朗茨·柏克諾(Franz Borkenau),〈新共產國際〉(Die neue Komintern),載《月刊》,柏林,1949年,第4期。

⑮例子不勝枚舉。但是,這種策略不應簡單地等同於關於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傳記報導中所說的,極大地缺乏忠實和眞實是他們性格中最明顯的跡象。

⑮參見外交部1939年1月發給德國國外辦事處的通報。(納粹的陰謀,第6卷,87頁)

⑮ 1940年,納粹政府發布命令,「惡意鼓動反對國家或納粹黨領導人的言論」都可以論作最高叛逆罪,在所有的德國占領區國家都應根據法律追溯力加以懲罰,無論犯罪的是德國人還是這些國家的當地居民。(參見賈爾斯,前引書)關於納粹在波蘭和烏克蘭「移民政治」(Siedlungspolitik)的災難性後果,可參見前引《審判》,第24卷和第29卷中有關內容。

⑮這是克拉夫欽科的話(前引書,303頁),他在形容1936年至1938年大整肅之後俄國的情況時說:「如果一個外來征服者接管了蘇聯生活的機器……也不會有更徹底或更殘酷的變化。」

⑮在戰爭期間,希特勒考慮過制訂「國家健康法案」爲全國人民作X光檢查,向領袖交一份病人名單,尤其是肺病和心臟病人。根據新的「帝國健康法」,這些人的家庭不宜繼續留在公共生活內,不准再生孩子。如何處理這些家庭,有待於領袖的下一步命令。」無須想像以後的命令會是什麼。不再被允許「留在公共生活內」的人數會構成德國人口中相當大的一個部份。(《納粹的陰謀》第6卷,175頁)

⑮在四年戰爭中,俄國死亡總人數估計在一千二百萬至二千一百萬之間。僅在烏克蘭,斯大林一年消滅了八百萬人(估計數字)。(見《共產主義行動》,美國政府編,華盛頓,1946,眾議院文件第754號,140~141頁)納粹政府對它所造成的犧牲者統計數字相當精確,而在俄國制度下,成百萬被害的人數統計卻不可靠。但是蘇伐萊恩(見前引書,669頁)估計的數字卻有某種份量,因爲它來自沃爾特·克利維茨基直接取自格別烏檔案的情報。根據蘇聯1937年調查數字,蘇聯統計工作者原估計人口是一億七千一百萬,調查結果是實際只有一億四

千五百萬。這表明失去人口二千六百萬，這一損失還不包括上述數字。

[82] 多伊切，前引書，256 頁。

[83] 蘇伐萊恩，前引書，605 頁，引述斯大林在 1937 年恐怖高潮時說的話：「你們應該懂得，在世界上一切寶貴的東西中，最寶貴、最重要的是幹部。」所有的報導都顯示，在蘇俄，秘密警察必須被看作黨內眞正的菁英組織。警察性質的這種特點是自從二十年代初開始，內務人民委員會「招募人員不是以自願爲基礎」，而是從黨內抽調。再者，「內務人民委員會不能作爲一種職業來選擇。」（貝克與戈丁，前引書，160 頁）

[84] 引自海登，前引書，311 頁。

[85] 根據對最後一次會議的報導，希特勒在得知不再能信任黨衛軍部隊之後決定自殺。（特雷弗-羅珀〔Trevor-Roper〕，《希特勒的最後日子》〔*The Last Days of Hitler*〕，1947，116 頁）

[86] 希特勒經常評論國家與政黨的關係，總是強調說，不是國家，而是種族，或「聯合民族共同體」，才是最重要的。（參照前面引用的話，收在《希特勒的餐桌談話》的附錄）1935 年紐倫堡黨代表大會上，希特勒對這一理論作了最清晰的概括：「不是國家指揮我們，而是我們指揮國家。」不言而喻，在實踐中，只有當黨的機構始終保持獨立於國家機構時，才可能有希特勒所說的這種指揮權力。

[87] 奧托・高維勒（Otto Gauweiler），《運動的權利組織和權利任務》（*Rechtseinrichtungen und Rechtsaufgaben der Bewegung*）（1939）明確指出，希姆萊的帝國領袖黨衛軍的特殊地位，以及德國警察首腦的特殊地位，都依賴於警察當局實現了「黨和國家的眞正統一」，這在政府其他部門都還未嘗試過。

[88] 俄國二十年代農民造反時，據說伏羅希洛夫（K. Voroshilov）拒絕紅軍支持；這就形成了格別烏特別分部的懲罰行動的職責。（西利加，前引書，95 頁。）

[89] 1935 年，蓋世太保的國外代表接受了二千萬馬克，而國防軍的正規間諜機構只能動用八百萬馬克的預算。見皮耶・德依約特（Pierre Dehillotte），《蓋世太保》（*Gestapo*）（巴黎，1940），11 頁。

[90] 見《納粹的陰謀》，第 4 卷，616 頁。

(91)參見本章註(92)。

(92)莫里斯・拉波特(Maurice Laporte),《奧克拉那歷史》(*Histoire de l'Okhrana*)(巴黎,1935)正確地稱這種挑撥煽動的方法爲秘密警察的「基石」。在蘇俄,挑撥煽動的方法遠遠不止是秘密警察的秘密武器,曾被用作廣泛宣傳的公開方法,供政府估量公共輿論的程度。民眾不願意使自己間歇不斷地應邀批評或對恐怖政權的「自由」(liberal)干涉作出反應,這顯示出此類做法是人們熟知的大規模挑撥煽動的手段。挑撥煽動確實變成了極權主義模式的民意測驗。

(93)這方面有意思的是納粹政府官員在德國試圖減少蓋世太保的能力和人員,理由是國家的納粹化已經完成,以致希姆萊想在此刻(1934年前後)擴展秘密警察,就不得不誇大來自「內部敵人」的危險。(《納粹的陰謀》,第2卷,259頁;第5卷,205頁;第3卷,547頁。)

(94)高利葉-波瓦西埃爾(Gallier-Boissiere),《法國秘密警察之謎》(*Mysteries of the French Secret Police*)(1938),234頁。

(95) 1880年奧克拉那之建立,導致俄國革命的頂峰時期,這畢竟絕非偶然。爲了證明它有用,它不時地策動謀殺,它的密探「捨身服務於他們譴責的那些人的思想。如果警察散發小冊子,或者如果謀殺一位部長是由阿柴夫(Azev)策劃的,結果都會一樣。」(拉波特,前引書,25頁)比較重要的謀殺看來都是警察幹的,例如斯托雷平(Peter Arkadievitch Stolypin)和馮・普萊赫夫(Von Plehve)。革命傳統中產生決定性作用的是,在平靜時期,警察必須激起革命者的「新能量和熱情。亦見沃爾夫(Bertram P. Wolfe),《三人革命: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Three Who Made A Revolution: Lenin, Trotsky, Stalin*)(1948),他稱這種現象是「警察的社會主義」(Police Socialism)。

(96)後來做了駐波蘭總督的漢斯・弗蘭克比較典型地區分,一個人究竟是「對國家有危險」還是「與國家敵對」。前者意指獨立於願望和行爲之外的客觀性質;納粹的政治警察關心的不僅僅是與國家敵對的行動,而且還有「一切實際上對國家有危險的企圖,無論出於什麼目的」。(《納粹的陰謀》,第4卷,881頁)根據

芒茲(前引書，44 頁)的說法，「至於消滅危險人物，保安措施……意味著防止對民族社羣產生危險的情況，不受這些危險人物可能做出的侵犯。這是一個防止**客觀**危險的問題。」

❾納粹法官和黨衛軍成員霍恩在雷恩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此人是霍恩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前任統治者，希姆萊的親密合作者之一)的訃告上說，海德里希將對手看作「並非個人，而是帶著危害國家的傾向，因此是在民族社羣的範圍之外。」(見《德意志報》〔*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1942 年 6 月 6 日；轉引自科恩-布拉姆斯坦特，《獨裁與政治警察》〔*Dictatorship and Political Police*〕，倫敦，1945。)

❾早在 1941 年，在一次希特勒總部成員的會議上，提出對波蘭民眾強加一些規定，其中包括將猶太人送進死亡集中營；如果這些波蘭人是德國血統，就讓他們改名換姓；德國人與波蘭人性交，則判處死刑；在德國的波蘭人必須佩戴「P」字母標誌，類似於猶太人佩戴黃星。(《納粹的陰謀》，第 8 卷，237 頁)很自然，波蘭人不久就開始擔憂自己會發生什麼事，因為德國人已經完成了驅逐猶太人。(同上，第 4 卷，916 頁)關於希特勒對德國人的計劃，參見本章註⓼。

❾貝克與戈丁，前引書，87 頁，談到在蘇聯的「客觀性質」引起的逮捕；其中有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成員(153 頁)。主觀地看到客觀地需要逮捕和告白，這最容易在秘密警察的前成員身上發生。用一位內務人民委員會特務的話來說：「我的上級清楚地了解我和我的工作，如果黨和內務人民委員會要我坦白這些事情，他們一定會有很好的理由。作為一個忠實的蘇聯公民，我的責任是不拒絕要我做的告白。」(同上，231 頁)

❿在法國的情況中，比較著名的例子是部長們常常處於恐慌之中，害怕警察的秘密「檔案」(dossiers)。關於沙皇俄國的情況，可參見拉波特，前引書，22-23 頁：「最後，奧克拉那的權力遠遠高於正常的行政當局的權力。……奧克拉那只通知沙皇它選擇要做什麼。」

❿「奧克拉那是國中之國，格別烏卻只是蘇維埃政府中的一個部門；……它的活動較少獨立性。」(羅傑·鮑德溫〔Roger N. Baldwin〕，〈政治警察〉〔Political

Police)，見《社會科學百科全書》。)

⑩典型的「可疑分子」概念如同波別耶多諾茨也夫在《俄國獨裁者：1881 年至 1894 年政治回憶錄、官方新聞發布與未發表過的文件》(*L'Autocratie Russe Memoires politiques, correspondance officiele et documents inédits, 1881 -1894*)（巴黎，1927）中講的故事：秘密警察「奧克拉那」將軍契列文受命介入一樁案件，幫助一個將要敗訴的貴婦，因爲反對黨雇用了一名猶太律師。將軍說：「同一個夜裡，我下令逮捕這個該死的猶太人，說他是所謂政治上可疑人物。說到底，我是否能夠以同樣方式對待朋友們和一個骯髒的猶太人，他們可能今天是清白的，但是誰昨天有罪，或者明天會有罪?」

⑩莫斯科審判中的指控「是根據一種奇怪粗暴和歪曲事實而預測可能發展的事情。(斯大林的) 理由可能從此而來：他們可能想在一場危機中推翻我——我要指控他們懷有這種企圖。……指控政府，可能會削弱俄國的戰爭能力；假如他們成功了，他們就會和希特勒簽訂停戰協議，或許還會同意割讓領土。……我要指控他們早已和德國卑鄙地勾結，出賣蘇聯領土。」這是多伊切對莫斯科審判的出色解釋，見前引書，377 頁。

納粹所說的可能罪行，在漢斯・弗蘭克的著作中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完全不可能列出一張完整的名單，說是企圖『危害國家』的人，因爲絕不可能預見什麼事情可能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危害領袖和人民。」(引自《納粹的陰謀》，第 4 卷，881 頁)

⑩秘密警察的犯罪方法當然不只是法國的傳統。在奧地利，瑪麗亞・特蕾莎 (Maria Theresa)領導下的令人恐懼的政治警察，是由考尼茨(Kaunitz)從曾以勒索來謀生的所謂「廉潔代理人」的幹部中挑選人組成。(見莫里茨・伯曼〔Moritz Bermann〕，《瑪麗亞・特蕾莎和約瑟夫二世》〔*Maria Theresia und Kaiser Joseph* II〕，維也納-萊比錫，1881)

⑩巨大的警察組織的收入是奴隸勞動，這是無疑的；令人驚奇的是，警察的預算看來不完全靠它來解決；克拉夫欽科提到過內務人民委員會向仍然自由生活和工作的市民強徵特別稅。(見前引書)

⑩弗里茨·泰森(Fritz Thyssen),《我付錢給希特勒》(*I Paid Hitler*),倫敦,1941。

⑩參見《納粹的陰謀》,第1卷,916-917頁。黨衛軍中央經濟與行政事務辦公室加強了它的經濟活動。黨衛軍向財政和國內稅務部宣布,它的財政預算是「用於特殊目的的政黨財產」。(1943年5月5日信,引自沃爾夫森〔M. Wolfson〕《納粹組織分部犯罪活動概要》〔*Uebersicht der Gliederung verbrecherischer Nazi-Organisationen*〕,1947。)

⑩科恩-布拉姆斯坦特,前引書,112頁。如果我們想到這種基金籌措向來是由黨衛軍地區單位在當地組織的,勒索動機就很清楚了。(見黨衛軍中央訓練班散發的《黨衛軍之路》〔未署年份〕,14頁。)

⑩同上,第124頁。在這一方面,根據維持集中營的要求和黨衛軍的個人需要而作了某些妥協。(見沃爾夫森,前引書),奧斯瓦爾德·波爾(Oswald Pohl),經濟與管理總局(WVH)的主管1941年9月19日致帝國特派員的信中要求控制物價。看來集中營裡的所有這些經濟活動,只有在戰爭期間,面臨勞動力嚴重短缺的壓力下才會發展。

⑩希姆萊於1943年10月在波森的演講,見《國際軍事審判》(*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als*)(紐倫堡,1945-1946),第29卷,146頁。

⑩「貝克·布拉特(Bek Bulat)(一位前蘇聯教授的筆名)曾能有機會研究北高加索內務人民委員會的文件。從這些文件可以明顯看到,1937年6月,當大整肅達到高潮時,政府預定要地方內務人民委員會逮捕一定比例的人。各省份的比例不同,在那些最不忠實的地區,比例高達百分之五。全蘇聯的平均比例是百分之三左右。」(1949年1月8日《新領袖》〔*The New Leader*〕上戴維·達林的報導)貝克與戈丁,前引書,239頁,作了稍有不同但十分可靠的估計,「逮捕計劃如下:內務人民委員會檔案裡實際上將所有的居民都分了類。因此每一個城鎮的統計數字都顯示出當地居民中有多少前白俄分子、反對黨成員,等等。一切犯罪調查材料收集起來,並且從囚犯的告白中收集歸檔,每一個人的檔案卡上都標明當局認爲他有多危險的程度;這取決於他的檔案中可疑的材

料數目。由於統計數字定期報告給上級，就有可能安排要清除多少數目的人，因爲完全知道每一種人的準確數字。」

(112)鮑德溫，前引書。

(113)俄國秘密警察幹部由斯大林「親自控制」，黨衛軍突擊隊由希特勒親自控制。即使在戰爭時期，它們都與軍隊配合行動，卻都受自己的法律節制。特別「婚姻法」是希姆萊接管並改組黨衛軍時制訂的第一個和最基本的規定，用於將黨衛軍和居民中的其他人分開。在希姆萊制訂婚姻法之前，1927 年，正式命令黨衛軍「不許在黨員會議上（參加）討論」。（《黨衛軍之路》）據報導，內務人民委員會成員同樣保持謹慎，特別注意不與黨內貴族的其他部分聯絡。（貝克與戈丁，前引書，163 頁）

(114)警察成員馬林諾夫斯基(Roman V. Malinovsky)的輝煌事業是一個典型，他最後成爲布爾什維克在議會裡的代表。（沃爾夫，前引書，第 31 章）

(115)引自阿夫托爾哈諾夫，前引書。

(116)《月亮的黑暗一面》（*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紐約，1947。

(117)拉波特，前引書，39 頁。

(118)貝克與戈丁，前引書，234 及 127 頁。

(119)《納粹的陰謀》，第 7 卷，84 頁。

(120)《月亮的黑暗一面》。

(121)黨衛軍裡幾乎凡事皆秘密。最大的秘密是集中營裡的行爲。甚至連蓋世太保成員不經特許也不得入內。（歐根·戈貢〔Eugen Kogon〕《黨衛軍國家》〔*Der SS-Staat*〕，慕尼黑，1946，297 頁。）

(122)貝克與戈丁，前引書，169 頁敍述逮捕內務人民委員會官員時「盡最大的小心不洩漏內務人民委員會的秘密」。

(123)《月亮的黑暗一面》中的對話很有典型性：「一個人承認自己從未到過波蘭以外的地方，別人必問他：『你替誰做間諜?』一個人問：『你們也有外國來訪者，你認爲他們都是間諜?』回答是：『你認爲呢？你以爲我們天眞地不意識到這一點嗎?』」

[124]戴維・羅賽特，《另一個王國》（*The Other Kingdom*），紐約，1947 年。

[124]納粹十分注意圍繞著他們的事業，針對著懷疑築起保護牆。羅森伯格關於 1943 年屠殺五千名猶太人的秘密報告明確地指出：「只要想一想，這些發生的事情會被對方知道，會被他們利用。這樣的宣傳很可能毫無效果，只因爲聽到或讀到的人根本不會相信。」（《納粹的陰謀》，第 1 卷，1001 頁。）

[124]在《希特勒的餐桌談話》中，他幾次提到自己「致力於使每一個人都知道，他的生與死是爲了保持他的物種。」（349 頁）。亦見 347 頁：「一隻蒼蠅生幾百萬隻卵，全都死了。但是蒼蠅還活著。」

[124]對納粹集中營所作的最好報導有戴維・羅賽特《我們死亡的日子》；歐根・戈貢，前引書；布魯諾・貝特萊姆（Bruno Bettelheim），〈達豪和布辛瓦德集中營〉（On Dachau and Buchenwald）（《納粹的陰謀》，第 7 卷）。關於蘇聯集中營，可見波蘭倖存者們出色的報告文集《月亮的黑暗一面》；戴維・達林，前引書，儘管他的報導有時不太可信，因爲它們來自「著名人物」，他們的意圖是發表宣言和控訴。

[124]《月亮的黑暗一面》的引言中也強調這種奇特的缺少溝通的情況：「他們作記錄，但是互相不交流。」

[124]尤見布魯諾・貝特萊姆，前引書，「我好像變得相信了，這些可怕的、屈辱的經歷似乎並不發生在作爲主體的『我』身上，而是發生在作爲客體的『我』身上。這一經歷從其他囚徒的話中得到證實。我好像在觀察自己朦朧地參與的事情。『這不可能是眞的，這類事情並未發生過』。……囚徒們必須說服自己，這是眞的，的確發生過，不只是一場惡夢。但是它們從未完全成功。」

亦見羅賽特，前引書，213 頁。「凡是親眼看見過的人都不能相信竟有此事。在你來之前，你自己是否聽說過關於毒氣室的傳說？」

「沒有聽說過。」我說。

「……你明白了？他們都像你一樣。在巴黎，倫敦，紐約，甚至在比肯瑙，尤在焚屍室外邊，他們的命，仍然很奇怪，就在他們被送進焚屍爐前五分鐘……」

(130)羅賽特,《集中營的世界》(*Univers Concentrationnaire*)(1947),最先理解這一點。

(131)羅賽特,前引書,587 頁。

(132)參見格奧格•巴達葉(Bataille)在 1948 年 1 月號《批評》(*Critique*)上的文章。

(133)羅賽特的書中有許多處如此「洞察」人類「本性」,主要依據是觀察到只要過一段很短時間,集中營裡囚徒的心理狀態就很難和衛兵的心理狀態區別開來。

(134)爲了避免誤解,最好補充一點,由於發明了氫彈,全部戰爭問題就產生了另一種決定性的變化。對這個問題的討論當然不在本書範圍之內。

(135)這種情形於1942年底發生在德國,希姆萊向所有的集中營司令官發出通知「不惜一切代價減少死亡率」。因爲新到的十三萬六千名囚徒中,有七萬人死於途中或到集中營之後不久。(《納粹的陰謀》,第 4 卷,附錄 2)後來從蘇俄集中營的報告中也一致證實,從1949年(斯大林還在世)以後,集中營的死亡率(先前高達百分之六十)逐漸下降,可能是由於蘇聯的勞動力普遍嚴重短缺。這種生活條件的改善不應該和斯大林死後的政權危機混淆,這次政權危機很有典型特徵地首先在集中營裏被感受到。(見威廉•斯塔林格〔wilhelm starlinger〕《蘇聯的邊界》(*Grenzen der Sowjetmacht*),烏爾茲堡,1955。)

(136)見戈貢,前引書,58 頁:「集中營裏的大部分工作是無用的,或者因它多餘,或者計劃糟糕,一項工作不得不做兩次或三次。」亦見貝特萊姆,前引書,831-832 頁:「新囚徒尤被強迫做無意義工作,他們覺得丟臉,寧可選擇更苦的、但是有用的工作。」達林的著作雖然認爲俄國集中營是爲了提供廉價勞動力,但也被迫承認集中營勞動無效率。(前引書,105 頁)假如最近關於大赦和取消集中營的報導是眞的,那麼就駁斥了關於俄國集中營制度是一種提供廉價勞動力的經濟措施的流行理論。因爲如果集中營用於重要的經濟目的,政府當然不會願意因其迅速廢除而承受整體經濟制度中的嚴重後果了,這一點十分明顯。

(137)納粹除了將幾百萬人運送到死亡集中營之外,還經常嘗試新的殖民計劃,出於殖民化目的而將德國人從德國或占領區運送到東歐去。對於軍事行動和經濟剝削來說,這當然是一種嚴重的不利條件。關於這些問題的無數爭論,以及納

粹在東歐占領區的文職官員和黨衛軍官員的衝突，尤可參見《主要戰犯的審判》，第 29 卷，紐倫堡，1947。

[138]貝特萊姆指出，集中營的衛兵對這種氣氛所持的態度與囚徒們的態度相同。（見前引書）

[139]必須明白，關於集中營的影片都有錯誤導向，因爲它們顯示的都是盟國軍隊開進集中營時所攝的最後階段景象。德國本土沒有死亡集中營，而且當時一切殺人的器具早已拆除。另外，最能起盟軍憤怒、使電影裡充滿特殊恐怖的是人的骷骨場面，但這不是德國集中營的典型；滅絕行動是有計劃地使用毒氣，而不是飢餓致死。在最後幾個月裡，集中營裡的情狀是戰事的結果：希姆萊下令在東歐撤除一切集中營，德國的集中營因此就擁擠不堪，而希姆萊當時所處的地位已不足以使他有能力保證證德國的食物供應。

[139]羅賽特強調，集中營裡的生活只不過是垂死者被奪走生命的過程。（見前引書）

[138]芒茲（前引書，50 頁）堅持認爲，在刑事犯的正常服刑期內，不應該將他們送進集中營。

[139]俄國缺少監獄空間，在 1925 至 1926 年，法庭宣判只有百分之三十六可執行。（達林，前引書，158 頁）

[140]「蓋世太保和黨衛軍一向注重混淆集中營囚徒的種類。沒有一個集中營當中的囚徒只屬於一個種類。」（戈貢，前引書，19 頁）

在俄國，從一開始就依慣例將政治犯與刑事犯混在一起。在蘇維埃政權的最初十年中，左派政治集團享有某些特權；直到政權的極權主義性質充分發展，「從二十年代末以後，甚至官方也將政治犯當作刑事犯一樣惡劣對待。」（達林，前引書，177 頁。）

[144]羅賽特的著作過高地估計了德國共產黨人的影響。在戰爭期間，這批人主管了布辛瓦德集中營的內部勞動。

[143]見布伯-紐曼夫人(Mrs. Buber-Neumann)（德國共產黨人海因茨・紐曼〔Heinz Neumann〕之妻）的證詞。她是蘇聯和德國集中營的倖存者。她說：「俄國人從不顯示出納粹的虐待狂傾向。俄國衛兵們都是一些正派人，不是虐

待狂，但是他們忠實地履行那種非人性制度的要求。」(《在兩個獨裁者之下》〔*Under Two Dictators*〕)

[146]貝特萊姆，〈極端情形下的行爲〉(Behavior in Extreme Situations)(載《變態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雜誌》〔*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第38卷，第4期，1943年))描述了刑事犯與政治囚徒和正常人相比的自尊心。正常人「不能忍受初次震驚，」刑事犯和政治犯不能分辨這種震驚。貝特萊姆將這一點歸咎於其中產階級根源。

[147]羅賽特，前引書，71頁。

[148]關於法國集中營的情況，可參見阿瑟·科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大地上的渣滓》(*Scum of the Earth*)(1941)。

[149]戈貢，前引書，6頁。

[150]《納粹的陰謀》，第4卷，800頁。

[151]貝克與戈丁指出「反對派只占(俄國)監獄犯人中很小一部分」，而且「一個人的入獄與任何犯法行爲」之間沒有任何關聯。(前引書，87及95頁。)

[152]貝特萊姆《達豪和布辛瓦德集中營》在討論到大多數囚徒「用蓋世太保的價值觀來取得安寧」時，強調「這並非宣傳的結果……蓋世太保堅持認爲，這能防止他們任意表達自己的感情。」(834-835頁)

希姆萊明確地禁止集中營裡的任何宣傳。「教育的內容是紀律，絕不是以意識形態爲基礎的任何一種指示。」〈論黨衛軍與警察的組織和職責〉(1937)，引自《納粹的陰謀》，第4卷，616頁。

[153]羅賽特，前引書，464頁。

[154]馬拉科夫(Sergi Malakhov)的報導。見達林，前引書，20頁。

[155]艾爾伯特·卡繆(Albert Camus)，《一年兩次》(*Twice A Year*)(1947)。

[156]羅賽特前引著作中包含囚徒們對這一難題的大量討論。

[157]貝特萊姆(前引書)描述過衛兵和囚徒都受到集中營生活的「制約」，害怕回到外面世界中去的過程。

所以，羅賽特堅持認爲，事實上「受害者和迫害者同樣卑鄙；集中營的教

訓是兄弟情誼之卑劣」，他說得很對。(588 頁)

⑩貝特萊姆(前引書)描述「新囚徒主要關心的是如何保持個性」，而老囚徒的問題是「如何在集中營裡盡可能生活得好一些」。

⑩羅賽特(前引書，390 頁)報導說，一個黨衛軍士兵叱責一個教授：「你過去是個教授。好了，你現在不是教授了。你不再是個大人物了。你現在只是一頭小小的癟牛。小到不能再小了。現在我是大傢伙了。」

⑩戈貢(前引書，6 頁)談到集中營將有可能維持下來，成爲黨衛軍的訓練和實驗場。他也很好地報導了早先由衝鋒隊管理的集中營和後來由黨衛軍管理的集中營的差別。「最初這些集中營裡，囚徒人數都不超過一千名。裡面的生活眞是無法描述。那幾年裡倖存下來的幾名老囚徒的叙述都談到，獸性發作的形式，幾乎沒有一種不被衝鋒隊實踐過。但這都是個人的獸性行爲，還沒有充分組織過的冷酷制度來對付大衆。這是黨衛軍的成就。」(7 頁)

這種新的機械化的制度盡可能從人性角度緩和了責任感。例如，當命令下達要每天殺死幾百名俄國囚徒時，屠殺進行的方式是通過一個小洞開槍，看不見受害者。(參見恩斯特・費德爾〔Ernest Feder〕〈論恐怖心理學〉〔Essai sur la Psychologie de la Terreur〕，載《綜論集》〔*Synthèses*〕，布魯塞爾，1946。)另一方面，又在其他方面都屬正常的人身上，人爲地製造反常心理。羅賽特報導過一個黨衛軍衛兵的情況：「通常我不停地手淫直到射精。我有妻子和三個孩子在布萊斯勞。我過去很正常。是他們把我變成這樣的。現在如果他們要我離開這裡，我也不回家。我不敢看我妻子的臉。」(273 頁)希特勒時代的許多文件中，有許多測試受信任而執行希特勒種族滅絕政策的人平均正常情況的報告。列昂・波利雅可夫的〈反猶主義的武器〉(The Weapon of Antisemitism)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載《第三帝國》，倫敦，1955)中收集了不少篇。用於這些目的的大多數人不是志願者，是從普通警察中抽調來執行特殊任務的。但是，連受過訓練的黨衛軍士兵也發現這種職責比在前線打仗更壞。一位目擊者報導黨衛軍執行大屠殺時，高度稱讚這支部隊「很理想」，能承受「整個滅絕任務而不用喝酒壯膽」。

想消滅一切個人動機和激情，以在「滅絕」時盡量少一點殘酷性。於是，一羣醫生和工程師受命安裝毒氣設施，經常作改進，這不僅爲了提高死亡工廠的能力，也是爲了加速死亡和減輕痛苦。

(161)這在羅賽特的著作中非常突出：「集中營生活的社會條件，已將大量囚犯——德國人及被驅逐者皆然，不管其先前的社會地位和教育——轉變成墮落的烏合之眾，完全屈服於動物本能的原始反射。」(183 頁)

(161)在這一方面，集中營內自殺率之少亦令人驚奇。自殺情形發生在被捕之前和押解途中大大多於發生在集中營內，當然，部分原因是集中營用各種措施來防止自殺，這畢竟是本能的自發行動。從布辛瓦德的統計數字來看，只有大約百分之一點五的死亡者是自殺的，通常每年只發生兩起自殺事件，儘管同年中，這個集中營裡死亡人數達三千五百十六人。(《納粹的陰謀》，第 4 卷，800 頁及其後。)來自俄國集中營的報告也提到同樣的現象，例如斯塔林格，前引書，57 頁。

(161)羅賽特，前引書，525 頁。

第十三章
意識形態與恐怖：一種新的政府形式

我們在前面各章裡反覆強調，極權統治的手段不僅比較嚴厲，而且其極權主義形式與我們所知的其他政治壓迫形式(例如專制政府、僭主暴政、獨裁)有本質區別。凡是在它崛起執政的地方，它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摧毀一個國家所有的社會、法律和政治傳統。無論它的意識形態來自何種具體的民族傳統或特殊的精神根源，極權主義政府總是將階級轉變成羣眾，撤換了政黨制度(不是用一黨制，而是用羣眾運動來替代政黨制度)，將權力中心從軍隊轉移到警察，建立一種公開走向宰制全世界的外交政策。目前的極權主義運動從一黨制度中發展起來；每當這些制度變成了眞正的極權主義，它們就開始按照價值觀念與其他一切制度都完全不同的一種制度來運作，我們的傳統法律、道德或常識中的功利主義範疇都不再能幫助我們處理其行動路線、對之作出判斷或者預言。

如果說，從追溯歷史和分析我們通常所謂的本世紀危機，可以發現極權主義的成分，那麼結論就不可避免：這種危機並非來自外部的純粹威脅，並非德國或俄國某種侵略性的外交政策的純粹結果，它不會隨著納粹德國的垮台而消失，也不會隨著斯大林之死而消失。甚至只有當極權主義成爲陳跡時，我們這時代的眞實困境才會顯現其眞正形式——儘管不一定是最殘酷的形式。

正是根據這種思考才提出一個問題：極權主義政府誕生於這種危機，同時表現出最淸晰的徵兆，它究竟是否一種權宜之計的安排，從暴政、專制和獨裁的著名政治彈藥庫中借來了威嚇方法、組織手段和暴力工具，它的存在是否只歸因於各種傳統政治力量——自由派或保守派，民族主義或

社會主義，共和制或寡頭制，獨裁主義或民主主義——可悲的但或許是偶然的失敗。或者是否相反地有一種叫做極權主義政府**本質**的東西，它是否具有自己的本質，可以與其他政府形式（例如自從古代哲學以來的西方思想已熟悉和認可的政府形式）相比較，像它們一樣下定義。如果這是眞的，那麼，全新的、史無前例的極權主義組織形式和行動路線必定依賴很少的幾種基本經驗之一，只要人生活在一起並且關注公共事務，這些經驗就會產生。如果有一種基本經驗在極權主義統治中找到了它的政治表現途徑，那麼，考慮到極權主義政府的創新形式，不管出於什麼原由，這種經驗以前必定從未用作一種政體的基礎，它的一般情緒——儘管在其他每一個方面也可能是人們熟悉的——從未流行過，從未走指引過公共事務的處理方向。

如果我們從思想史的角度來思考，那麼它似乎絕對是不可能的。因爲人們經驗過的政府形式一向很少；這些形式很早就被發現，希臘人對它們作了分類，它們早已存在很長的時間。假如我們應用這些發現（它們的基本思想儘管有許多不同，但是在從柏拉圖到康德的兩千五百年以來並無變化），我們就立即會傾向於去解釋極權主義是一種現代形式的暴政，是一個毫無法紀的管理形式，權力只歸屬於一人。一方面是濫用權力，不受法律節制，屈從於統治者的利益，敵視被統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恐懼作爲行動原則，統治者害怕人民，人民害怕統治者——這些在我們全部的傳統中都是暴政的標誌。

我們不說極權主義政府是史無前例的，我們也可以說，它探索了一種可能的選擇，在政治學中，關於政府本質的一切定義都以此爲基礎，這種選擇是在守法的和不守法的政府之間，在任意獨斷的和合法的權力之間的選擇。一邊是守法政府和合法權力，另一邊是不守法的政府和恣意的權力，兩者互屬而不可分，這從來就毫無疑問。然而極權主義統治使我們面對一種完全不同的政府。它實際上蔑視一切成文法，甚至走極端到蔑視自己制訂的法律（例如，最有名的例子是 1936 年的蘇聯憲法），或者並不關心是

否要廢除法律(例如納粹政府從未廢除魏瑪憲法)。但是它的運作既非沒有法律指導，亦非恣意行事，因爲它宣布嚴格遵從自然法則和歷史法則，而一切成文法都從這兩者而來。

極權統治的畸形主張似乎是沒有回應餘地的，它不是「毫無法紀」，而是訴諸威權之源泉（積極的法律從中獲致最終的合法性)；它不是恣意妄爲，而是比以前的任何政府形式更服從這種超人類的力量；它也不是使權力從屬於一個人的利益，而是隨時準備犧牲每一個人的重大直接利益，來執行它認定的歷史法則和自然法則。它之蔑視積極的法律，宣稱這是一種更高形式的合法性，因爲它出自法律之源，那麼就可以踢開小小的法律。極權主義的法律性(lawfulness)是假裝發現了一條在地球上建立公正統治的道路——這是成文法承認永遠不可能達到的法律性。法律性與正義之間的落差不可能泯除，因爲正確與錯誤的標準（成文法以此爲自己的權威根據——「自然法則」統治整個宇宙，或者在人類歷史中揭示神的律法，或者以習俗和傳統表達一切人共同情感的法則——必然是普遍的，必須對無數的、無法預計的案件都有效，所以每一個具體的個別案件有許多不重複的情況，因而多少會避開普遍標準的適用。

極權主義之法律性是蔑視合法性(legality)，假裝建立地球上的直接法治，執行歷史法則或自然法則，而不落實到個人行爲的正確與錯誤標準。它不麻煩地針對人的行爲而直接將法律運用到人類。假如恰當地執行，那麼自然法則或歷史法則就能製造人類作爲它的最終產物；而這種可能性存在於一切極權主義政府統治全世界的要求背後。極權主義政策宣稱要將人類物種轉變成一種積極的、永不失敗的法律載體(carrier of law)，否則人就只會消極地、不情願地服從法律。如果說，極權主義國家與文明世界之間的聯繫由於極權主義政權的巨大罪行而中斷，那麼也可以說，這種罪行不應歸咎於簡單的侵略性、冷酷無情、戰爭和陰險，而應該歸咎於有意識地打破組成如西塞羅所謂「民族」的「共識法規」(consensus iuris)，而

且只要國際法繼續作爲國際關係的基石，哪怕是在戰爭條件下，它已在現代構建了文明世界。道德審判和法律懲治預設這種基本的容認(consent)；正因爲罪犯參加了「共識法規」，所以他才能被審判，甚至連上帝啓示的法規也能在人際中產生作用，只要他們聽從和贊同它。

在這一點上，極權主義的法律概念和其他各種法律概念之間的基本差異就顯現了。極權主義政策並不用一套法律來取代另一套法律，並不建立它自己的「共識法規」，並不用一次革命來創造一種新形式的法律。它蔑視一切法律，甚至包括它自己的成文法，這意味著它相信自己能夠不要任何「共識法規」而行事，並且仍然不使自己落入毫無法紀、恣意妄爲和恐懼的專制暴君狀態。它可以不需要「共識法則」而行事，因爲它保證使執法不受行動和人的意志束縛；它也保證大地上的公正，因爲它宣稱要使人類自身成爲法律的化身。

人與法律的一致性似乎取消了法律與公正之間的差異（這種差異自從古代以來就困擾著法學思想)，這種一致性也根本不同於自然法則或良知的呼聲（自然或神性作爲權威之源或者上帝的命令，會在人身上宣布它們的權威性)。這絕不會使人成爲法律的活的化身，而相反仍然有別於作爲要求贊同和服從的權威之人。自然或神性作爲成文法之權威源，這一點曾被認爲是永恆的；成文法根據環境變化，而且是可變的，但是與人的變化更迅速的行動相比，成文法具有相對的持久性；成文法的持久性產生於它們永遠存在的權威來源。所以，成文法旨在針對人的永恆變化運動，作爲一個穩定因素。

在解釋極權主義時，一切法律都變成了運動的法律。當納粹談論自然法則，當布爾什維克談論歷史法則時，自然或歷史都不再是塵世人的行動之穩定的權威來源；它們本身成了運動。納粹相信種族法則是自然法則在人身上的表現，其背後是達爾文關於人是一種自然發展的產物的觀念，認爲自然發展並不一定停止於人類的目前種類；布爾什維克相信階級鬥爭是

歷史法則的表現，其背後是馬克思關於社會是巨大的歷史運動的產物的觀念，歷史運動根據它自身的運動規律奔向歷史時代的終結，到那時消除自身。

常常有人指出馬克思的歷史學方法與達爾文的自然研究方法之間的區別，一般都正確地傾向於馬克思的方法。這一點會使我們忘記馬克思對達爾文理論積極的興趣；恩格斯在想到馬克思學術上的偉大成就時，稱他爲「歷史學界的達爾文」。❶如果不是考慮這兩個人的實際成就，而是考慮這兩個人的基本哲學，就會發覺歷史運動和自然運動最終是一回事。達爾文將發展的觀念引進對自然的研究，他堅持認爲，至少在生物界，自然運動不是循環的，而是始終循著一條直線前進，朝向一個無限前進的方向運動，這意味著自然本身被歸入歷史，自然生命被當作歷史來考慮了。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正如歷史法則，可以用於種族主義，也可以用於馬克思的法則：最先進的階級才能生存。另外，馬克思所說的階級鬥爭是歷史的動力，只不過是生產力發展的外化表現，而生產力卻源自人的「勞動力」。根據馬克思的說法，勞動不是一種歷史力量，而是一種生物自然力量——通過人的「自然新陳代謝」而釋放出來，人依靠「自然新陳代謝」而保存他的個人生命，複製物種。❶恩格斯很淸楚地看到這兩個人的基本信念的密切關係，因爲他理解關於發展的觀念在這兩種理論中所產生的決定性作用。在十九世紀中期，知識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包括拒絕看待或接受任何事物的「本身所是」概念，一致解釋每一種事物都只是進一步發展之前的一個階段。這種發展的動力究竟稱作自然還是歷史，相對地說來是次要的。在這些意識形態中，「法則」(law)一詞本身含義改變了：原先將它看作一種穩定性架構的表現，人的行動和運動在其中發生，現在卻看作是運動本身的表現。

極權主義政治開始遵循意識形態的秘訣，揭露了這些運動的眞正性質，淸楚地顯示出這個過程永遠不會結束。如果說，自然法則是消滅一切有害

的和不適宜生存的事物，那麼假如不能發現有害的和不適宜生存的新種類，就會意味著自然本身的終結。如果說，歷史法則是階級鬥爭中某些階級會「萎縮消失」，那麼如果初步的新階級並未形成，不能反過來在極權主義統治者手中「萎縮消失」，就意味著人類歷史到了末日。換言之，極權主義運動藉以奪取和行使權力的屠殺法則如果能成功地使全人類服從於它的統治，那麼就會繼續成爲運動的法則。

根據我們的理解，合法的政府是一種政體，需要成文法在其中解釋和實現永遠不變的自然法則(ius naturale)，或者上帝的永恆誡律，成爲正確或錯誤的衡量標準。只有根據這些標準，根據每一個國家的成文法本體，才能從政治上實現自然法則或上帝的誡律。在極權主義政府的政體中，成文法的位置被極權恐怖占據，極權恐怖旨在將歷史運動或自然運動的法則變爲現實。正如成文法（雖然它們界定侵越範圍）獨立於自然和歷史之外——任何社會裡即使沒有犯罪現象，也不意味著法律是多餘的，相反，這意味著法律的最完美統治——極權主義政府的恐怖也不再是一種純粹壓迫反對派的手段，儘管它還用於這種目的。當極權獨立於一切反對派之外時，恐怖(torror)變成了全面(total)；當誰也不阻擋它的道路時，它就是最高統治。如果守法是非暴政體制的本質，而不守法是暴政的本質，那麼恐怖就是極權主義統治的實質。

恐怖即運動法則的現實化；它的主要目的是使自然力量或歷史力量有可能自由地急行穿過人類，不落後於任何自發的人類行動。恐怖本身尋求「穩定」的人，以便解放自然力量或歷史力量。正是這種運動剔選出了人類的敵人，恐怖針對他們而發作，不允許反對或同情之類的自由行動去干涉歷史或自然，階級或種族清除其「客觀敵人」的工作。有罪和無罪變成了毫無意義的概念；「有罪」就是阻擋對「劣等種族」、對「不適宜生存」的個人、對「垂死階級和沒落民族」進行審判的自然進程或歷史進程。恐怖執行這些審判，在其法庭前，一切有關的人主觀上都是無罪的：被殺者並

沒有做任何反對這個制度的事情，殺人者並非眞正謀殺，而是執行某種更高法庭宣判的死刑命令。統治者並不自稱公正或聰明，而只是執行歷史的或自然的法則；他們並不運用法則，而只是根據內在法則進行一場運動。假如法律就是某種超人類力量——自然或歷史——的運動法則，那麼恐怖便是守法的。

恐怖即執行運動法則，運動的最終目的不是人的福利或一個人的利益，而是建設人類，爲了物種而清除個人，爲了「整體」而犧牲「部分」。自然或歷史的超人類力量有其自身的開端和終結，因此只有用新的開端和每一個個人實際生命的終結才能阻撓這種力量。

立憲政府的成文法是爲了在人際設置界線，建立溝通渠道，因爲人際社會由於新成員的出生加入而不斷受到威脅。隨著每一個新生兒的出生，對於世界來說是產生了一個新的開端，一個潛在的新世界開始形成。法律的穩定性對應於人類一切事務的恆常運動，人的生生死死使這種運動絕不停止。法律對每一個新的開端設置障礙，同時也保證它的運動自由，這種自由是某種全新的、無法預言的事物的潛在力量；成文法的界限說明人的政治存在，如同記憶說明他的歷史存在；它們保證一個共同世界的預先存在，某種連續的實在，它超越每一代人的生命跨度，吸收一切新的起源，並由它們來滋養。

全面恐怖很容易被誤解爲暴政的徵兆，因爲極權主義政府在它的最初階段必然表現得像暴政，削除人爲的法律界線。但是極權恐怖之後並無恣意的無法律現象，沒有出於某種任意的意志而發怒，或者爲了一個人的專制權力而反對一切人，更不是爲了一場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它在個人之間替界線和溝通渠道換上了一條鐵帶，將他們緊緊聯結在一起，似乎他們的多元現象已經消失，變成了大方向中的一個人一樣。撤除人際法律的藩籬——例如專制暴政所做的那樣——意味著奪走人的自由，摧毀作爲一種活生生的政治現實的自由；因爲由法律圈圍出來的人際空間，是自由

的生活空間。極權恐怖利用這種舊的暴政工具，同時也摧毀了暴政留下的恐懼和懷疑的毫無法則、毫無阻隔的荒野。這塊荒野無疑不再是一種自由的生活空間，但是它仍然爲它的居民提供了由恐懼引導的運動和滿心狐疑地行動的空間。

極權恐怖用迫使人們互相反對的方法來摧毀他們之間的空間；與它在鐵帶之中的條件相比，即使是暴政的荒野，只要它仍然是某種空間，它就會顯得好像是自由的一種保證。極權主義政府並不只是剝奪自由權利或廢除眞正的自由；在我們的有限知識中，它也未能成功地從人們心目中抹去對自由的熱愛。它在一切自由中摧毀了一種重大的先決條件，即是活動的能力(capacity of motion)，這種能力沒有空間即不能存在。

極權恐怖這種極權主義政府的本質的存在，旣不贊同人也不反對人。它假設是提供自然力量或歷史力量的，以那無與倫比的工具加速運動進行。這種運動根據它自身的法則開始運作，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不會停滯不前；它的力量最終總會比由行動和人的意志產生的最強的力量更有力。但是它可能減慢速度，而且幾乎不可避免地已被人的自由減緩了，甚至連極權主義統治者也不能否定自由，因爲這種自由——他們以爲是不恰當的、任意妄爲的——與一種事實相符，即人的出生使每一個人**成爲**一種新的開端，在某種意義上使世界開始更新。從極權主義的觀點來看，人的出生與死亡這種事實只能被看作一種令人煩惱的對更高力量的干涉。因此，恐怖作爲自然運動或歷史運動的順從奴僕，必須在運動過程中清除具體意義上的自由，也清除自由的源泉，自由的源泉隨著人的出生而獲得，並且處在他創造一個新開端的能力之中。恐怖摧毀人的多元性，從多中選一，使他那種永不失敗的意志產生作用，似乎他自己就是自然進程或自然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一種被發現來解放歷史力量和自然力量的手段，而且加快那由他們自己永遠不可能達到的速度。從實際角度來說，這意味著恐怖當場執行自然對「不適宜生存」的種族或個人、歷史對「垂死階級」宣判的死刑，根本

不等待自然或歷史本身比較緩慢和較少效果的進程。

根據這種觀念，凡在政府本質變成活動(motion)的地方，一種很古老的政治思想問題似乎找到了一種答案，類似於一種早已被注意到能解決合法性和正義之間的差異的答案。假如政府的本質定義爲守法，假如能夠明白，法律是人類公共事務中的穩定力量（自從柏拉圖在他的《法律篇》裡向大神宙斯祈求以來便一直如此），那麼就產生了政體的運動及其公民之行動的問題。爲法律性行動設定了界限，但是並不激發行動；法律在自由社會裡的偉大性（同時也是錯綜複雜）在於它們只說人不應該做什麼，從來不說人應該做什麼。如果一種政體的必要運動的本質——同樣自從柏拉圖以來——一向根據它的永久性來定義，那麼就永遠不可能發現這種本質。衡量一個政府的優點的明確標準之一是它的延續性。根據孟德斯鳩的看法，暴政的壞處之最高證明是它們能從內部被摧毀，會自己衰落，而其他政府是從外部環境被摧毀的。所以，我們歷來需要的關於政府的定義是孟德斯鳩所說的「行動的原則」，這在各種政府中是不同的，會同樣激勵政府和公民對待公共活動，它用作一種判斷一切公共事務活動的標準，超越了純粹消極的守法標準。根據孟德斯鳩的看法，這類指導原則和行動標準是君主政治的光榮、共和政體的優點、暴政的恐懼。

在完全極權主義的政府裡，所有的人都變成了「一個人」，所有的行動都旨在加速自然運動或歷史運動，每一項行爲都是在執行自然或歷史早已宣判的死刑，也就是說，在可以完全依賴恐怖來保持運動的經常性的條件下，根本不需要與其本質相分離的行動原則。然而，只要極權主義統治還沒有征服全世界，還沒有用恐怖來使每一個單個的人成爲統一的人類之一部分，那麼，無法完全實現的不是行動，而是活動。正如立憲政府的守法不足以激勵和引導人的行動一樣，極權主義政府的恐怖也不足以激勵和引導人類行爲。

在目前條件下，極權主義統治仍然和其他形式的政府一樣，在公共事

務中都需要有一種對它的公民的行爲指導，它不需要、甚至也不能夠利用一種嚴格意義上的行動原則，因爲它恰恰會消除人的行動能力。在極權恐怖的條件下，甚至連恐懼(fear)也不再能用作一種如何行事的忠告，因爲恐怖在挑選受害者時並不涉及個人的行動或思想，完全根據自然進程或歷史進程的客觀需要。在極權主義條件下，恐懼或許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普遍存在；但是，當恐懼引導的行動不再有助於避免人所害怕的危險時，恐懼就失去了它的實際用處。同情政權或支持政權的情形也是如此；因爲極權恐懼不僅根據客觀標準來選擇受害者；它在選擇執行者時，也盡可能不顧其信念和同情。自從蘇俄及其衛星國的大整肅以來，一直不斷地在清除作爲行動之動機的信念。極權主義教育的目的從來就不是培植信念，而是破壞形成信念的能力。希姆萊在組織工作方面的最大發明是在挑選黨衛軍成員的制度中採用純粹客觀的標準；他只看照片，根據純粹種族的標準選人。自然本身不僅決定誰該被清除，也決定誰應該被訓練成殺人者。

一個政體不再使用恐怖作爲威嚇手段，而它的本質**就是**恐怖，要使這個政體開始運動的話，沒有哪一種來自人類行動範圍的行爲指導原則——例如美德、榮譽、恐懼——是必要的和有用的。相反，它在公共事務中採用一種全新的原則，完全不用人類的行動意志，只渴求洞悉運動的法則，根據這種法則，恐怖產生了作用，所以使一切個人命運全取決於恐怖。

極權主義國家的居民完全被扔進和受制於自然過程或歷史過程，這是爲了加速它的運動；於是根據它的內在法則，他們只能做殺人者或者被害者。這個過程可以決定誰可以在今天做殺人者，清除種族與個人、垂死階級的成員和沒落民族，而明天他們自己也成爲犧牲品。極權統治在指導它的臣民的行爲時，所需要的是只是準備將每一個人同等地歸入殺人者角色和被害者角色。這種兩面的準備，取代了行動原則的，是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即令信奉者滿意的，可以解釋一切事物和所發生的一切

現象的各種主義，它們的解釋方法是從一個簡單的前提出發來推論——是一種非常新近的現象，許多年來，它在政治生活中只扮演了一種無足輕重的角色。我們只有憑後見之明，才能從中發現某些使它們對於極權主義統治十分有用的因素。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前，意識形態的巨大政治潛力還未被發現過。

各種意識形態都以它們的科學特性而聞名：它們將科學方法和相關的哲學結果結合起來，僞裝成科學哲學。「意識形態」這個詞似乎意指一種觀念可以變成一門科學的題材，正如各種動物是動物學(zoology)的題材一樣，意識形態(ideology)也有一個附尾字 logy，所指的正是 logoi，一門「邏輯知識」，關於其題材的科學陳述。如果眞是這樣，那麼一種意識形態事實上就會變成一門僞科學和一門僞哲學，在同時跨越了科學和哲學兩者的界限。例如，自然神論(deism)就此會變成意識形態，它研究關於神的觀念，與此相關的是哲學，而它又以神學(theology)的科學方式出現，其中上帝是一種啓示的實在。(如果神學不以啓示作爲既定的實在，而只是將上帝當作一種觀念，那麼神學就會像動物學一樣瘋狂，不再確定各種動物是否有肉體的、可觸及的存在。)然而我們知道，這只是部份眞理。自然神論雖然否定神的啓示，但是並不簡單地將只是一種「觀念」(idea)的上帝處理成「科學的」陳述，而是爲了解釋世界的進程而利用上帝這個觀念。各種主義中的「觀念」——種族主義中的種族，自然神論中的上帝，等等——從不構成各種意識形態中的題材，而 logy 這一附尾字，也從不簡單地指一個「科學的」陳述。

根據「意識形態」的原詞含義，它是一種觀念的邏輯。它的題材是歷史，從「觀念」的角度運用這種主題材料的結果，不是關於某種事物「是什麼」的一套陳述，而是展開一個經常變化的過程。意識形態對待事件的過程的態度，是將它們看作應該遵循它的「觀念」所揭示的邏輯「法則」。各種意識形態都僞裝知道整個歷史過程的各種秘密——過去的秘密，現在

的纏結，將來的無法預測——其原因是各自觀念中內在的邏輯。

各種意識形態對存在的奇蹟從來不感興趣。它們關注的是歷史，關注生成與毀滅、文化的興衰，甚至試圖用某種「自然法則」來解釋歷史。種族主義中的「種族」一詞並不意指將人類各種族當作一個科學探索領域的任何眞正興趣，而是指將歷史運動解釋爲一種連貫過程的「觀念」。

一種意識形態的「觀念」既不是柏拉圖所說的靠思維的眼睛把握的永恆本質，也不是康德所說的理性規範原則(regulative principle of reason)，而是一種解釋工具。對於一種意識形態來說，歷史並不顯示爲一種觀念（這裡指的是將歷史看作某種超越歷史運動的理想的永恆狀態下從屬的一個分類)，而是某種可以用觀念來估算的事物。使這種「觀念」適合於這種新角色的是它自身的「邏輯」，它是「觀念」本身引起的運動，無須外界因素使它啓動。種族主義因此是相信種族觀念有內在運動，正如自然神論是相信上帝的觀念有內在運動一樣。

歷史運動和這種觀念的邏輯過程被假設是互相對應的，所以無論發生什麼，都是根據一種「觀念」的邏輯發生的。但是，在邏輯領域裡，唯一可能的運動是從一個前提出發的推論過程。一旦一種意識形態掌握了辯證邏輯，其原理也是相同的，辯證邏輯的過程是從命題(thesis)通過反題(antithesis)走向合(synthesis)，隨即又變成下一步辯證運動的命題；第一個命題變成前提，它在意識形態的解釋中的有利之處是，這種辯證手法可以將實際矛盾解釋爲一種一致的、連貫的運動的各個階段。

一旦邏輯作爲一種思想運動(movement of thought)——而不是作爲對思維的必要控制——應用於一種觀念，這種觀念就轉變成一種前提。意識形態的世界從事這一類邏輯推理，早在它出於極權主義之因而變得富有成果之前就開始了。純粹否定性的邏輯強制（禁止矛盾）變得「多產」，以致於能開始一整套思想路線，壓制思想，用單一的辯論來得出結論。這種辯論過程既不會被新觀念(它會變成另一個前提而得出完全不同的結果)打

斷，也不會被新經驗打斷。各種意識形態一向假定，用一種觀念便足以解釋從前提發展出來一切事物，經驗不能說明任何事物，因爲對一切事物的理解都在這種邏輯推論的連貫過程中。在從整體上解釋一種意識形態及其世界觀(Weltanschauung)時交換必要的哲學思想，其危險主要並不在於冒跌入通常庸俗的、非批判性的假設之險，而是將人能力中的內在自由換成簡單的邏輯外衣，人以此可以幾近粗暴地強迫自己，就像他被某種外部力量強迫一樣。

十九世紀的世界觀與各種意識形態本身都不是極權主義的，雖然種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在二十世紀變成了主要的意識形態，但是它們在原則上並不比其他各種意識形態「更極權主義」；極權主義之發生，原因是它們原先根據的經驗成分——各種族之間爭奪世界統治權，各國內部的各階級爭奪政權的階級鬥爭——在政治上比其他各種意識形態所根據的經驗成分更重要。在這個意義上，種族主義和共產主義對其他各種主義的勝利，在極權主義運動抓住這兩種意識形態之前就已經決定了。另一方面，一切意識形態都包含了極權主義成分，但是這些成分只有在極權主義運動中才充分發展，因此這一情況造成了一種欺騙性的印象，好像只有種族主義和共產主義才是極權主義性質的。而事實是，一切意識形態的眞實本性只有在它們扮演極權統治工具的角色時才暴露出來。從這一方面可以看到，對於一切意識形態思想來說，有三種具體的極權主義因素顯得很奇特。

第一，各種意識形態在宣布它們的總體解釋時，傾向於解釋的並非「是什麼」，而是「變成什麼」，凡生者皆死。它們在一切情況下都只關心運動因素，即只關心歷史這個詞中的通常含義。各種意識形態總是傾向於歷史，即使當它（例如種族主義）表面上從自然這個邏輯前提開始，情況亦如此；自然在這裡只用於解釋歷史事件，並將它們降低到自然問題。宣稱從總體上解釋，許諾解釋歷史上發生的一切事情，對過去作總體解釋，提供關於現在的總體知識，以及對未來作可靠預言。

第二，根據這種能力，意識形態思想變得獨立於一切經驗，它從這些經驗中學不到任何新的東西，即使它剛剛發生過。於是，意識形態思想擺脫了我們憑五官感知的現實，認爲有一種「更眞實」的現實隱匿在一切可感知事物的背後，從這個隱匿的地方來控制事物，並且要求有一種第六感，使我們能意識到它。第六感正是意識形態提供的，教育機構提供特別的意識形態灌輸，教育機構的設立也完全出於這個目的，在納粹的奧登斯堡裡或在共產國際和共產黨情報局裡訓練「政治軍人」。極權主義運動的宣傳也用於將思想從經驗和現實中解放；它總是設法在每一樁公開、可見的事件中塞進秘密含義，懷疑每一種公開政治活動背後都有秘密意圖。一旦運動取得權力，他們就著手根據自己的意識形態主張來改變現實。陰謀的概念取代了敵意，這就產生了一種心態，使現實——眞實的敵視或眞實的友誼——不再憑本來面目被體驗和理解，而是自動地假設有別的含義。

第三，旣然意識形態無力改變現實，那麼它們從經驗之下達到思想解放就必然通過某些方法來顯示。意識形態思維將事實都組織進一種絕對邏輯過程，這種邏輯過程從公理上接受的前提開始，從中推論一切事物；也就是說，它展開的那種連續性在現實範圍裡根本不存在。推論可以從邏輯角度或辯證角度展開；在這兩種情況中，它都涉及一種連貫一致的論證過程，因爲這種論證是根據過程來思考的，假定它能夠理解超人類運動、自然過程或歷史過程。理解是靠心智的模仿來達到的，無論是邏輯思維還是辯證思維，模仿的是「科學地」建立的運動法則，通過模仿過程使理解整合起來。意識形態的論證一向是一種邏輯推論，對應於前面提及的兩種意識形態因素——運動的因素和從現實與經驗中解放出來的因素——首先因爲它的思想運動並不產生於經驗，而是自我產生的，其次，因爲它將取自經驗的現實中唯一的要點轉變成一個公理的前提，從此以後就使論證過程完全脫離進一步的經驗。一旦確定了它的前提和它的出發點，經驗就不再干涉意識形態思維，它也不能由現實來敎導。

極權主義統治者用來將他們各自的意識形態轉變爲武器的手法（它可以迫使他進入恐怖運動）欺人耳目地簡單而且不顯眼：他們極其認眞地採用這些手法，將它們奉爲自己的最高天才——「冷冰冰的推理」（希特勒語）和「辯證法的無情規律」——著手驅使意識形態的含意進入邏輯上連貫一致的極端，在旁觀者看來，這簡直「原始」到荒謬的地步：一個「垂死的階級」包括該死的人；「不適宜生存的種族」應該被消滅。誰若同意有「垂死的階級」這一種東西存在，但是不得出應該殺死它們的成員的結論，或者同意生存權與種族有關，卻又不得出殺光「不適宜的種族」的結論，那麼很明顯地不是愚蠢就是膽怯。這種嚴格的邏輯性作爲行動的指導，滲透到極權主義運動和極權主義政府的整個結構。希特勒和斯大林雖然並沒有爲他們的運動的觀念和宣傳口號增加任何一種新思想，但是僅憑上述原因，就應該認爲他們是最重要的意識形態專家。

這些新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專家與他們的先驅者之間的區別是，吸引他們的首先不是意識形態的「觀念」——階級鬥爭與對工人的剝削，或種族鬥爭與關心日耳曼民族——而是從中可以發展的邏輯過程。根據斯大林的說法，不是觀念，也不是預言，而是「不可抗拒的邏輯力量完全征服了（列寧的）聽眾。」馬克思認爲，當觀念抓住了羣眾時，就產生了力量；發現力量，不是爲了用於觀念，而是爲了用於它的邏輯過程，「好像一種強有力的觸角從四面八方抓住你，你好像被老虎鉗夾緊了，你無力逃脫；你要麼投降，要麼下決心徹底輸盡。」❸只有當實現極權主義的主張——實現無階級社會，或成爲主人種族——到了緊要關頭時，這種力量才顯示出來。在實現的過程中，意識形態爲了吸引羣眾而賴以爲基礎的原初實質問題——剝削工人，或德國的民族抱負——慢慢地失去了，好像已被過程本身吞噬：正是根據「冷冰冰的推理」和「不可抗拒的邏輯力量」，工人們在布爾什維克統治下甚至失去了過去在沙皇壓迫下都能准許的那些權利，德國民眾蒙受戰爭苦難，這場戰爭根本不考慮日耳曼民族生存的最低需要。正

是在意識形態政治的本質中——不是爲了自我利益或渴望權力而產生背叛——意識形態的眞正內容(工人階級或日耳曼民族)原先引起了「觀念」(階級鬥爭是歷史法則，或種族鬥爭是自然法則)，現在卻被用來執行觀念的邏輯吞噬了。

極權主義要求取代孟德斯鳩的行動原則，但是製造受害者和殺人者的卻不是意識形態本身——種族主義或辯證唯物主義——而是它的內在邏輯性。在這一方面，希特勒像斯大林一樣，非常喜歡那種最有說服力的論證：你若不說B和C等等，一直說到無數字母的末尾，你就不能說A。在這裡，邏輯性的強制力量看來有其根源；它產生於我們對自相矛盾的恐懼。布爾什維克的整肅成功地使它的受害者坦白他們從未犯過的罪行，在這個程度上，它主要依靠這種基本恐懼，並且爭辯如下：我們都同意一個前提，即歷史就是階級鬥爭，也同意黨在從事階級鬥爭中的角色。所以你知道，從歷史角度來說，黨是永遠正確的。(托洛茨基說：「我們只有和黨在一起，並且依靠黨，才會正確，因爲歷史提供的唯一正確道路就是這樣。」)在這個歷史時刻，根據歷史法則，一定會犯某些罪，而黨知道歷史法則，必須懲罰之。至於這些罪行，黨需要罪犯；也許是黨知道罪行，但是不知道誰是罪人；比淸楚地知道誰是罪犯更重要的是懲治罪行，因爲倘若沒有這種懲罰，歷史就不會進步，而只能在它的過程中倒退。所以，你要麼是犯了罪，要麼響應黨的召喚，去扮演罪犯的角色——在這兩種情況下，你都在客觀上變成了黨的敵人。如果你不坦白，你就不再能通過黨來推動歷史，就變成了眞正的敵人。這種論證的強制力量是：如果你拒絕，你就自相矛盾，由於這種自相矛盾，就使你的整個生命毫無意義；你說的A，透過它邏輯地產生的B和C，主宰了你的整個生命。

極權統治者依靠強迫力(compulsion)，使我們能夠強迫自己，爲了有限動員那些統治者仍然需要的羣眾；這種內在的強迫力是邏輯性的暴政(tyranny of logicality)，除了人開始創造新事物的偉大能力之外，任何

東西都不能和它對抗。邏輯性的暴政開始於思維服從邏輯這一個永不終止的過程，人依靠這個過程，產生他的思想。由於這種服從，在他向外在的暴君低頭，放棄他的行動自由時，也放棄了自己的內心自由。自由作爲人的一種內在能力，與他開始做人的能力是一致的，正如自由作爲一種政治現實，與人際活動的空間一致。邏輯和有說服力的推論無法控制事物的開始，因爲邏輯之鍊是以前提的形式，假設了開端。就像需要恐怖，以免每一個新人的誕生會產生一個新的開端，提高他在世界上的聲音，邏輯性的自我強制力量也必須動員起來，以免有人會開始思考——思考作爲人類一切活動中最自由、最純粹的行動，恰恰是推論的強迫性過程的反面。極權主義政府只有在這種程度上才能太平；它能發動人自己的意志力量，以便迫使他進入歷史或自然的巨大運動，這種運動很可能利用人類作爲它的材料，而根本不知生與死爲何物。

極權恐怖的強制力量用它的鐵掌，迫使孤立的人組成的羣眾集合起來，**並且**在一個對於他們而言已變成荒野的世界裡支持他們，而另一方面，邏輯推論的自我強制力量使每一個個體在他獨自的孤立狀態中反對一切他人，又相互對應，相互需要，目的是啓動恐怖統治的運動，並且使它不停地運動。正如恐怖（即使在極權之前還僅僅是暴政形式）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一切關係，邏輯思維的自我強制破壞了和現實的一切關係。當人們與同伴們失去接觸，也和周圍的現實失去接觸時，極權恐怖的準備工作就完成了；因爲在失去這些接觸的同時，人們也失去了經驗和思想的能力。極權主義統治的理想主體不是忠誠的納粹或忠誠的共產黨人，而是民眾，對於他們來說，事實與虛構（即經驗的眞實）之間的區別，眞與僞（即思想的標準）之間的區別已不復存在。

我們在做這些考慮的一開始提出的問題，以及我們現在回來討論的問題，就是在人們的共同生存中，什麼樣的基本經驗滲透進了一種政府形式，

這種政府的本質是恐怖，它的行動原則是意識形態的邏輯性。很明顯，在先前各種形式的政治統治中，從未使用過這種組合。還有，它所倚仗的基本經驗必定是人類經驗和人們熟悉的經驗，因爲在一切政體中，即使這種最「有創造性的」政體也是由人發明的，多少回應了人的需要。

我們經常觀察到，恐怖只有對那些相互隔離孤立的人才能實施絕對統治，所以，一切專政政府主要關注的事情之一就是造成這種孤立。孤立會成爲恐怖的開端；它當然是恐怖的最肥沃土壤；它總是恐怖的結果。這種孤立本身就是極權主義的前兆；它的標誌是無能，在這個範圍內，力量總是來自於人的共同行動，即「一致行動」(acting in concert)(伯克語)；根據定義，孤立的人是無力的。

孤立(isolation)和無能(impotence)，亦即根本沒有行動能力，一向是暴政的特點。人與人的政治接觸在專制政府之下被切斷了，人類的行動能力和力量落空了。但是，並非人際一切聯繫都被切斷，並非一切人類能力都被摧毀。私人生活的整個領域，以及經驗能力、建造能力、思想能力都還未觸動。我們知道，極權恐怖的鐵掌不留這種私人生活的空間，極權主義邏輯的自我強制摧毀了人的經驗能力和思想能力，正如它當然摧毀了人的行動能力一樣。

在政治領域，我們所說的孤立是指社會交往方面的孤獨。孤立與孤獨(loneliness)不一樣。我可以是孤立的——處於我無法行動的情景，因爲誰也不會與我共同行動——但是不孤獨；我也可以是孤獨的——處於我作爲一個人而感到自己被所有的人類同伴遺棄的情景——但是不孤立。孤立是一種人被驅入的絕境，他們的政治生活、他們追求一種共同目的的共同行動都被摧毀。然而孤立（儘管會摧毀力量和行動能力）不僅未影響人的所謂生產性活動(productive activities)，而且也是這種活動所必需的。人只要他是一個製作工具的人(homo faber)就會傾向於使自己孤立，暫時離開政治範圍。製造(fabrication; poiesis，指製作物品)，一方面與行動(action;

praxis)有區別，另一方面與單純的勞動有區別，總是在某種脫離共同關注的孤立狀態下進行，無論其結果是一件工藝品還是一件藝術品。人在孤立中仍然與作爲人類建制的世界保持接觸；只有當最基本形式的人類創造活動（人在共同世界裡增加自己的某種東西的能力）被摧毀了，孤立才變得令人完全無法忍受。當一個世界的主要價值受勞動支配，一切人類活動都被轉變成勞動時，才會發生這種情形。在這種條件下，只有純粹的勞動努力（即努力保持生命）被拋棄，而人與作爲人類建制的世界的關係也被打破。在政治行動方面失去地位的孤立的人也會被物的世界拋棄，其前提是他不再被看作是製作工具的人，而被看作是勞動的動物(animal laborans)，他的必要的「自然新陳代謝」與任何人無關。孤立因此就變成了孤獨。以孤立爲基礎的暴政一般不觸及人的生產能力；但是，對「勞動者」的暴政（例如古代對奴隸的統治）會自動地成爲對孤獨（而不僅僅是對孤立）的人的統治，而且傾向於變成極權主義。

孤立只涉及生活的政治方面，而孤獨涉及整體的人類生活。極權主義政府像一切暴政一樣，不摧毀公共生活，亦即假如不用使人孤立的方法來摧毀人的政治能力，就無法存在。但是，極權統治作爲一種政府形式是不同於以往的，因爲它不滿足於這種孤立，並且要摧毀私人生活。它的自身基礎是孤獨，是根本不屬於世界的經驗，這是人類經驗中最徹底、最絕望的一種。

孤獨是恐怖的共同基礎，是極權政府的實質，而對於意識形態與邏輯性（即準備它的殺人者和受害者）來說，與無根和成爲多餘的情境緊密相關；自從工業革命開始以來，這已成爲對現代羣眾的詛咒；而在十九世紀末，隨著帝國主義的興起，它變得更加尖銳；在我們這個時代，卻成了政治制度和社會傳統的崩潰。無根意味著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立足之地，不受別人的承認和保障；成爲多餘者意味著根本不屬於這個世界。無根可以成爲變成多餘者的先決條件，正如孤立可以（但並不一定）成爲孤獨的先決

條件一樣。孤獨自身並不考慮其最近的歷史原因與它在政治中的新作用，它同時與人類的基本要求相反，**也**與每一個人生活的根本經驗之一相反。即使是物質與感官的世界的經驗，也取決於我同其他人的接觸，取決於我們的**共同**感覺(common sense)，共同感覺規範並控制其他一切感覺，若無共同感覺，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被封閉在自己特殊的感覺資料中，而這種感覺資料自身是不可靠的。正因爲我們有共同感覺，正因爲不是一個人，而是許多人生活在地球上，我們才能相信自己的直接感覺經驗。然而，我們必須提醒自己，終有一天，我們將不得不離開這個共同世界，而它卻一如既往地存在，爲了實現孤獨狀態這種被一切事物和每一個人拋棄的經驗，相對於共同世界的繼續存在而言，我們都是多餘者。

孤獨不是孤寂(solitude)。孤寂要求獨處，而孤獨卻在和其他人在一起時最明顯地顯示出來。除了幾句離題的話之外——通常包裝著一種弔詭的氣氛，例如古圖(Cato)的話：「他從來沒有比他獨處時更少孤獨，」或者說，「他從來沒有比他在孤寂中更少孤獨」——似乎希臘血統被解放的奴隸哲學家埃皮克提圖(Epictetus)首先區別孤獨和孤寂。從某種方面來看，他的發現是很偶然的，他的主要興趣既不是孤寂，也不是孤獨，而是獨處，其義爲絕對獨立。埃皮克提圖認爲(《論文集》〔*Dissertations*〕，第 3 卷，第 13 章)，孤獨的人發現他被其他人包圍，他和他們無法建立聯繫，也不知究竟與誰敵對。孤寂的人卻相反，他是孤獨的，因此「可以自顧自」，因爲人有能力「自言自語」。換言之，在孤寂中，我和「自我」(self)共處，因此合二爲一，而在孤獨中，我實際上是被眾人拋棄的一個人。嚴格說來，一切思維都在孤寂中進行，是我與自己的對話；但是這種合二而一的對話並不失去與我的同類夥伴世界的接觸，因爲他們在自我中表現出來，我和這個自我進行思想的對話。孤寂的問題是，這種合二爲一需要他者，以便再度變成一個人：一個不可改變的個體，他的身分從來不會與其他任何一個人的身分搞錯。爲了確認我的身分，我完全依靠其他人；正是對孤寂者的同伴情

誼這種偉大的救世恩惠使他們重新變成「整體」，使他們免於進行其身分曖昧不明的思想對話，恢復了使他們用一個不可改變的個人的單獨聲音說話的身分。

孤寂可以變爲孤獨；這發生於我完全靠自己來拋棄自我之時。孤寂的人永遠處於變成孤獨的危險之中，他們不再發現同伴情誼的拯救恩惠可以使他們免於兩重性、曖昧和懷疑。從歷史角度來看，似乎這種危險變得巨大到足以引起別人注意，僅在十九世紀的歷史中才有記錄。它清楚地顯示出，當哲學家們(只有對他們來說，孤寂才是一種生活方式和工作條件)不再滿足於「哲學只是爲少數人的」，開始說出，沒有人能「理解」他們。在這一方面，最典型的軼事發生在黑格爾臨死之前，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偉大的哲學家都說不出這樣的話來：「除了一個人之外，誰也不瞭解我；而他也誤解了我。」相反，一個孤獨者發現了自己並開始孤寂中思想對話的機會總是有的。這似乎發生在尼采在席斯瑪莉亞(Sils Maria)構思查拉圖斯特拉之時。在兩首詩中(〈席斯·瑪莉亞〉〔Sils Maria〕及〈來自高山〉〔Aus hohen Bergen〕)，他敍說了落空的期待和孤獨者在渴望中的等待，突然「到了中午，一變成二……確信一致的勝利，我們用最大的盛宴賀慶；我友查拉圖斯特拉蒞臨，他是嘉賓之中的嘉賓。」

孤獨令人無法忍受的原因是，失去了可以在孤寂中實現的自我，但是又只能靠同類的信任才能肯定自己的身分。在這種情形下，人失去了對自身的信任(自身本應是他的思想的合夥人)，也失去了存在於一個爲提供經驗而必須有的世界中的基本信心。自我與世界，思維能力與經驗，都同時失去了。

人類思維的唯一能力（人類思維爲了平安地發揮功能，就既不需要自我，也不需要別人，也不需要世界，當它與思維有關時，它獨立於經驗之外）是前提自明的邏輯推理能力。有說服力的證據之基本規則（二加二等於四之類的自明之理）是即使在絕對孤獨的條件下也不能顚倒的。這是人

類一旦失去相互保證時可以依靠的唯一可靠「眞理」，這也是常識；人爲了經驗、生存，懂得他們在共同世界裡的道路，就需要依靠這種「眞理」。但是這種「眞理」是空的，或者說根本沒有眞理，因爲它並不揭示什麼。（如果像某些現代邏輯學家那樣將無矛盾定義爲眞理，這是否定了眞理之存在。）所以在孤獨的條件下，自明之理再也不只是知識的手段，而開始多產地發展它自己的各種「思想」路線。以嚴格的自證邏輯爲特點的思維過程（這明顯地是毫無例外的）與孤獨有某種聯繫，這是路德(Martin Luther)曾經注意到的問題。（他對孤寂和孤獨現象的經驗是獨一無二的，他曾經敢於說「應該有一個上帝，因爲人需要一個上帝，以便讓人能夠相信」。）他對於《聖經》文本有一句鮮爲人知的評價。《聖經》上說：「人若孤獨，是不好的。」路德說，一個孤獨的人「總是從一件事來推斷另一件事，並且將一切事情想到最壞處。」極權主義運動的著名的極端主義中的確包含了這種「將一切事情想到最壞處」，在這一推論過程中，總是得出最壞的可能結論。

在非極權主義世界裡使人走向極權統治的是，孤獨（過去只是一種邊緣經驗，通常是在像老年這樣的邊緣社會條件下經歷的）變成了我們這個世紀裡日益增多的羣眾的一種日常經驗。極權主義驅使和策動羣眾進入的無情過程，像是對這種現實自殺式地逃避。「冷冰冰的推理」和「抓住你，好像被老虎鉗夾緊」的辯證法「強有力的觸角」似乎像一個無人可信賴、無物可倚靠的世界裡的一種最後的支撐物。正是這種內在強制（它唯一的內容是嚴格避免矛盾）似乎能在與其他人的一切關係之外證明一個人的身分。即使當他處於孤獨，這種內在強制也使他陷入恐怖的鐵掌，而極權統治嘗試絕不讓他獨處，除非是讓他處於孤寂的幽閉之中。運用摧毀人際一切空間、迫使人們相互反對的手法，甚至消滅了孤立的生產潛力。運用教導並且美化孤獨的邏輯推理的手法，使人知道，如果他放棄了整個過程由此開始的大前提，他就會完全失敗，連最小的機會——孤獨可以轉化爲孤寂，邏輯可以轉化爲思想——也被抹去了。如果將這種做法同專制政治的做法相

比，似乎是找到了一種方法可以使荒漠運動起來，讓一陣沙暴掩埋地球上各個部分的居民。

我們今天在政治領域生存的條件的確受到了這種吞噬一切的沙暴的威脅。它們的危險不在於它們可能建立一個永恆的世界。極權統治像專制政治一樣，帶有它自己的毀滅性細菌。正如恐懼和產生恐懼的虛弱無能是反政治的原則，將人扔進一個與政治行動相反的情景，而孤獨和從孤獨中產生的最壞的邏輯——意識形態推理，代表了一種反社會的情景，包藏著一種摧毀一切人類共居的原則。但是，有組織的孤獨更是危險，遠甚於被一個人的殘暴和恣意妄爲的意志統治下造成的未經組織之人的無能。它的危險在於威脅要向我們所知的世界報復——在那個這個世界裡，到處似乎都走到終點——在那一個從終結中產生的新的開端有時間宣告自己誕生之前。

除了這一類思考——它們作爲預言，無甚效用，也很少給人安慰——以外，仍然存在著一個事實：我們時代的危機及其中心經驗帶來了一種全新的政府形式，它作爲一種潛勢、一種始終存在的威脅，十分有可能從現在起就伴隨著我們，正如在不同的歷史時刻出現的其他形式政府，依靠不同的基本經驗，總是與人類相伴隨——無論有多少暫時的失敗——君主政治、共和政體、專制政治、獨裁政體及暴政。

但是仍然存在著一種眞理，歷史的每一次終結必然包含著一個新的開端；這種開端就是一種希望，是終結所能夠產生的唯一「神示」。開端在變成一個歷史事件之前，就是人的最高能力；從政治角度來說，它與人的自由是一致的。奧古斯丁說：「創造了人，一個開端形成。」❹這個開端由每一次新生來保證；這個開端確實就是每一個人。

註釋

❶恩格斯在馬克思的葬禮上演說：「正如達爾文發現了有機生命發展的法則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法則。」同樣的說法還見諸恩格斯爲 1890 年版《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寫的序言，以及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Ursprung der Familie*)，他一再並提「達爾文的進化論」和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學說」。

❷馬克思關於勞動的概念是「一種永恆的自然之必然性，捨此不可能有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不會有生命。」(參見《資本論》〔*Capital*〕，第 1 卷，第 1 部分，第 1 章和第 5 章。引文出自第 1 章第 2 節。)

❸斯大林於 1924 年 1 月 28 日的講話；引自《列寧選集》，第 1 卷，33 頁（莫斯科，1947)。值得指出的是，斯大林的「邏輯」是赫魯曉夫在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作毀滅性打擊的演說中所稱讚的優點之一。

❹《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第 12 卷，第 20 章。

參考書目

第一部：反猶主義

Alhaiza, Adolphe, *Vérité sociologique gouvernementale et religieuse. Succinct résumé du Sociétarisme de Fourier comparé au socialisme de Marx*, Paris, 1919.

Anchel, Robert, "Un Baron Juif au 18e siècle,"*Souvenir et Science*, vol. 1.

Arendt, Hannah, "Why the Crémieux Decree Was Abrogated," *Contemporary Jewish Record*, April, 1943;"The Jew as Pariah. A Hidden Tradition,"*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6, no. 2, 1944; "Organized Guilt,"*Jewish Frontier, January*, 1945.

Arland, Marcel, "Review of F. Céline's *Bagatelle pour un Massacre*,"*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February, 1938.

Aron, Robert, *The Vichy Regime 1940－1944*, New York, 1958.

Bainville, Jacque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1935.

Baron, Salo W., *Die Judenfrage auf dem Wiener Kongress,*Vienna, 1920; *A Soci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the Jews*, New York, 1937; "The Jewish Question in the19th Century,"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X, 1938; *Modern Nationalism and Religion*, 1947.

Barrès, Maurice, *Scènes et doctrines du nationalisme*, Paris, 1899.

Basnage, J., *Histoire des Juifs*, La Haye, 1716.

Batault, Georges, *Le Problème juif. La renaissance de l'antisémitis-*

me, Paris, 1921.

Bauer, Bruno, *Die Judenfrage*, 1843.

Beaurepaire, Guesnay de, *Le Panama et la République*, 1899.

Bécourt, Renault, *Conspiration universelle du Judaisme, entièrement dévoilée; dédiée à tous les souverains d'Europe, à leurs ministres, aux hommes d'Etat et généralement à toutes les classes de la société, menacée de ces perfides projets*, 1835.

Bédarridea, Jassuda, *Les Juifs en France, en ltalie et en Espagne*, 1859.

Benjamin, René, *Clémenceau dans la retraite*, Paris,1930.

Bernanos, Georges, *Las grande peur des bien-pensants*, Paris, 1931; *Les grands cimetières sous la lune*, Paris, 1938.

Bernodorff, H. R., *Diplomatische Unterwelt*, 1930.

Bertholet, Alfred, *Die Stellung der Juden zu den Fremden*, 1896; *Kulturgeschichte Israels*, 1919.

Bismarck, Otto von, *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 1909−1921.

Bloom, R. I.,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Jews of Amsterdam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1937.

Bloy, Léon, *Le Salut par les Juifs*, 1892.

Boehlich, Walter, ed., *Der Berliner Antisemitismusstreit*, Frankfurt ∕ M., 1965.

Boehmer, Heinrich, *Les Jesuites. Ouvrage traduit de l'alemand avec une introduction et des notes par G. Monod*, Paris, 1910.

Boerne, Ludwig, *Über die Judenverfolgung*, 1819; *Für die Juden, 1819; Briefe aus Paris, 1830−1833*.

Boh, Feix, *Der Konservatismus und die Judenfrage*, 1892.

Bondy-Dworsky,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Boehmen, Maehren und Schlesien,* Prague, 1906.

Boom, W. ten, *Entstehung des modernen Rassen-Antisemitismus,* Lepzig, 1928.

Bord, Gustave, *La Franc—Maçonnerie en France dès origines à 1815,* 1908.

Botzenhart, Erich, "Der politische Aufstieg des Judentums von der Emanzipation bis zur Revolution 1848," in *Forshungen zur Judenfrage,* vol. 3, 1938.

Bourgin, Georges, "Le Problème de la fonction économique des Juifs,"*Souvenir et Science,* vol. 3, nos. 2—4, 1932.

Brentano, Clemens v., *Der Philister vor, in und nach der Geschichte,* 1811.

Brogan, D. W.,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France 1870—1939,* 1941. *The French Nation: From Napoleon to Pétain 1814—1940,* New York, 1958.

Bronner, Fritz, "Georg, Ritter v. Schoenerer,"*Volk im Werden,* vol. 7, no. 3, 1939.

Brugerette, Joseph, *Le Comte de Montlosier,* 1931.

Buch, Willi, *Fünfzig Jahre antisemitische Bewegung,* Munich, 1937.

Buchholz, Friedrich, *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Geburtsadel,* Berlin, 1807.

Buelow, Bernhard von, *Denkwürdigkeiten,* Berlin, 1930—1931.

Buelow, Heinrich von, *Geschichte des Adels,* 1903.

Busch, Moritz, "Israel und die Gojim,"*Die Grenzboten,* 1879—1881; *Bismarck: Some Secret Pages of his History,* London, 1898.

Byrnes, Robert, *Antisemitism in Modern France,* New Brunswick, 1950.

Capefigue, Jean, *Histoire des grandes opérations financières,* 1855–1858.

Capéran, Louis, *L'Anticléricalisme et l'Affaire Dreyfus,* Toulouse, 1948.

Caro, Georg,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Juden im Mittelalter und der Neuzeit,* 1908–1920.

Caro, Joseph, "Benjamin Disraeli, Juden und Judentum," *Monatsschrift für Geschichte und 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 1932.

"Il caso di Alfredo Dreyfus," *Civiltà Cattolica,* February 5, 1898.

Cassel, Selig,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Ersch und Gruber, Allgemeine Enzyklopädie der Wissenchaften und Künste,* Section 2, vol. 27, 1850.

Céline, Ferdinand, *Bagatelle pour un massacre,* 1938; *L'Ecole des cadavres,* 1940.

Chamberlain, Houston Stewart, *The 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66, translation of the German edition of 1899.

Charensol, Georges, *L'Affaire Dreyfus et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Paris, 1930.

Chesterton, Gilbert K., *The Return of Don Quixote,* 1927.

Chevrillon, André, "Huit Jours à Rennes," *La Grande Revue,* February, 1900.

Clarke, Edwin, *Benjamin Disraeli,* London, 1926.

Clémenceau, Georges, *L'Iniquité,* 1899; *Vers la Réparation,* 1899;

Contre la Justice, 1900; *Des Juges,* 1901.

Corti, Egon Cesar, Conte, The *Rise of the House of Rothschild,* New York, 1927.

Dairvaell, Mathieu, *Histoire édifiante et curieuse de Rothschild, Roi des Juifs, suivi du récit de la catastrophe du 18 Juillet par un témoin oculaire, 1846; Guerre aux fripons, chronique secrète de la Bourse et des chemins de fer par l'auteur de "Rothschild I, Roi des Juifs,"* 1846, 3rd ed.

Daudet, Léon, *Souvenirs des milieux littéraires, politiques et médicaux,* Paris, 1920; *Panorama de la Troisième Republique,* Paris, 1936.

Davidsohn, Ludwig, *Beiträge zu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Berliner Juden vor der Emanzipation,* 1920.

Delitzch, Franz, *Sind die Juden wirklich das auserwählte Volk?* Leipzig, 1890.

Delitzsch, Friedrich, *Die grosse Täuschung,* 1920－1921.

Demachy, Edouard, *Les Rothschilds, une famille de financiers juifs au 19e siècle,* 1896.

Desachy, Paul, *Répertoire de l'Affaire Dreyfus,* 1894; *Bibliographie de l'Affaire Dreyfus,* 1905.

Diderot, Denis,"Juif,"in *Encyclopédie,* vol. 9, 1765.

Diest Daber, Otto von, *Bismarck und Bleichroeder,* Munich, 1897.

Dilthey, Wilhelm, *Das Leben Schleiermachers,* 1870.

Dimier, Louis, *Vingt Ans d'Action Française,* Paris, 1926.

Disraeli, Benjamin, *Alroy,* 1833; *Coningsby,* 1844; *Tancred,* 1847; *Lord Geogrge Bentinck. A Political Biography,* 1852; *Lothair,*

1870; *Endymion*, 1881.

Dohm, Christian Wilhelm, *Über die bürgerliche Verbesserung der Juden*, 1781－1783; *Denkwürdigkeiten meiner Zeit*, Lemgo, 1814－1819.

Drumont, Edouard, *La France Juive*, 1885; *La dernière Bataille*, 1890; *La Fin d'un monde. De l'or, de la boue, du sang. Du Panama à l'anarchie*, 1897; *Le Testament d'un antisémite*, Paris, 1891; *Les Tréteaux du succès: les héros et les pitres*, Paris, 1901.

Dubnow, S. M., *Weltgeschichte des jüdischen Volkes*, 10 vols., 1929; *History of the Jews in Russia and Poland*. Translated from the Russian by I. Friedlaender, Philadelphia, 1918.

Duehring, Eugen Karl, *Die Judenfrage als Frage der Rassenschädlichkeit für Existenz, Sitte und Cultur der Volker mit einer weltgeschichtlichen Antwort*, 1880.

Dutrait-Crozon, Henri(pseudonym), *Précis de l'Affaire Dreyfus*, 1909, 2nd ed., 1924.

Ehrenberg, Richard, *Grosse Vermögen, ihre Entstehung und ihre Bedeutung*, Jena, 1902.

Eisemenger, J. A., *Entdecktes Judentum*, 1703, New edition by Schieferl, 1893.

Elbogen, Ismar,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35; "Die Messianische Idee in der alten jüdischen Geschichte," *Judaica* 1912, *Festschrift Hermann Cohen*.

Emden, Paul H., "The Story of the Vienna Creditanstalt," *Menorah Journal*, vol. 28, no. 1, 1940.

Ewald, Joh. Ludwig, *Ideen über die nötige Organisation der Israeliten in christlichen Staaten,* 1816.

Fernandez, Ramon, "La Vie sociale dans l'œuvre de Marcel Proust," *Les Cahiers Marcel Proust,* no. 2, 1927.

Foucault, André, *Un nouvel Aspect de l'Affarie Dreyfus* (Les Oeuvers Libres), 1938.

Fourier, Charles, *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1808.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1829.

Frank, Walter, *Demokratie und Nationalismus in Frankreich,* Hamburg, 1933; *Hofprediger Adolf Stoecker und die christlich-soziale Bewegung,* lst ed., 1928, 2nd revised ed., 1935; "Neue Akten zur Affäre Dreyfus," *Preussische Jahrbucher,* 1933, vol. 233; "Apostata. Maximilian Harden und das wilhelminische Deutschland" *in Forschungen zur Judenfrage,* vol. 3, 1938; "Walter Rathenau und die blonde Rasse,"*ibidem,* vol. 4, 1940; "Die Erforschung der Judenfrage. Rückblick und Ausblick," *ibidem,* vol. 5, 1941.

Frantz, Constantin, *Der Nationalliberalismus und die Judenherr-*schaft, Munich, 1874.

Freemasonry, the Highway to Hell, London, 1761.——*Freimaurerei, Weg zur Hölle,*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1768.——*La Franche Maçonnerie n'est que le chemin de l'enfer,*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Frankfurt, 1769.

Freund, Ismar, *Die Emanzipation der Juden in Preussen,* Berlin, 1912.

Fries, Jacob Friedrich, *Über die Gefährdung des Wohlstandes und*

Charakters der Deutschen durch die Juden, Heidelberg, 1816.

Fritsch, Theodor E., *Antisemiten-Katechismus,* 1892; editor, *Die Zionistischen Protokolle,* mit einem Vor und Nachwort von Theodor Fritsch, 1924; *Handbuch der Judenfrage,* revised edition, 1935.

Froude, J. A., *Lord Beaconsfeld,* London, 1890.

Gentz, Friedrich, *Briefwechsel mit Adam Müller,* Stuttgart, 1857.

Gide, André, "Review of F. Céline's *Bagatelle pour un massacre,*"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 April, 1938.

Giraudoux, Jean, *Pleins Pouvoirs,* 1939.

Glagau, Otto, Der Börsen— und *Gründungsschwindel,* Leipzig, 1876; *Der Bankrott des Nationalliberalismus und die Reaktion,* 8th ed., Berlin, 1878.

Goethe, Joh. Wolfgang von, "Isachar Falkensohn Behr, Gedichte eines polnischen Juden, 1772, Mietau und Leipzing," *Frankfurter Gelehrte Anzeigen; Wilhelm Meister.*

Goldberg, Isidor, "Finanz— und Bankwesen," *in Encyclopedia Judaica,* 1930.

Goldstein, Moritz, "Deutsch-Jüdischer Parnass," *Kunstwart,* March, 1912.

Graser, I. B., *Das Judentum und seine Reformen als Vorbedingung der vollständigen Aufnahme der Nation in den Staatsverband,* 1828.

Grattenauer, C. W. F., *Über die physische und moralische Verfassung der heutigen Juden. Stimme eines Kosmopoliten,* 1791. Reviewed in *Allgemeine deutsche Bibliothek,* vol. 112, 1792;

Wider die Juden, 1802.

Grau, Wilhelm, *Die Judenfrage als Aufgabe der neuen deutschen Geschchte,* 1935; *Wilhelm v. Humboldt und das Problem der Juden,* Hamburg, 1935; "Geschichte der Judenfrage,"*Historische Zeitschrift,* vol. 153, 1936.

Greenstone, Julius H., *The Messiah ldea in Jewish History,* Philadelphia, 1906.

Gressmann, Hugo, *Der Messias,* Göttingen, 1929.

Gruen, Karl, *Die Judenfrage,* 1844.

Grunwald, Max, *Samuel Oppenheimer und sein Kreis,* Vienna, 1913; "Contributions à l'histoire des impôts et des professions des Juifs de Bohême, Moravie et Silésie depuis le 16e siècles," *Revue des Etudes Juives,* vol. 82.

Gueneau, Louis, "La Première Voie Ferrée de Bourgogne,"*Annales de Bourgogne,* 1930, 1931.

Gumplowicz, Ludwig, *Der Rassenkampf,* Innsbruck, 1883.

Gurian, Waldemar, *Die politichen und sozialen ldeen des französischen Katholizismus,* Munich-Gladbach, 1929; *Der integral Nationalismus in Frankreich: Charles Maurras und die Action Française,* Frankfurt, 1931;"Antisemitism in Modern Germany,"*Essays on Antisemitism,* ed. by K. S. Pinson, 1946.

Haeckel, Ernst, *Lebenswunder,* 1904.

Halévy, Daniel, "Apologie pour notre passé." *Cahiers de la Quinzaine,* sér. 11, no. 10, 1910.

Halperin, Rose A., *The American Reaction to the Dreyfus Case,* Master's Essay, Columbia University, 1941.

Harden, Maximilian, "Händler und Soldaten,"*Die Zukunft,* 1898; "Zum Schutz der Republik,"*ibid.,* July, 1922; "Tönt die Glocke Grabgesang?"*ibid*., July－August, 1922; Köpfe, Berlin, 1910.

Hauser, Otto, *Die Rasse der Juden,* 1933.

Heckscher, Eli F., *Mercantilism,* London, 1935.

Herder, J. G., *Briefe zur Beförderung der Humanität,* 1793－1797;" Über die politische Bekehrung der Juden, in his *Adrastea und das 18. Jahrhundert,* 1801－1803.

Herzog, Wilhelm, *Der Kampf einer Republik,* Zurich, 1933; and Rehfisch, Hans José(pseudonym: René Kestner), *L'Affaire Dreyfus,* a play, 1931.

Hoberg, Clemens August, "Die geistigen Grundlagen des Antisemitismus im modernen Frankreich," in *Forschungen zur Judenfrage,* vol. 4, 1940.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 Chlodwig von, *Denkwürdigkeiten der Reichskanzlerzeit,* edited by Karl Alexander v. Müller(Deutsche Geschichtsquellen des 19. Jahrhunderts. vol. 28), Stuttgart, 1931.

Holst, Ludolf, *Das Judentum in allen dessen Teilen. Aus einem staatswissenschaftlichen Standpunkt betrachtet,* Mainz, 1821.

Humboldt, Wilhelm von, "Gutachten,"1809, in: J. Freund, *Die Emanzipation der Juden in Preussen,* Berlin,1912; *Tagebücher,* ed. Leitzmann, Berlin, 1916－1918; *Wilhelm und Caroline von Humboldt in ihren Briefen,* Berlin, 1910.

Hyamson, A. M.,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England,* 1928.

Jahn, F. L. *Deutsches Volkstum,* 1810.

Jöhlinger, Otto, *Bismarck und die Juden,* Berlin, 1921.

Jost, J. M., *Neuere Geschichte der Israeliten. 1815－1845,* Berlin, 1846.

Karbach, Oscar, "The Founder of Modern Political Antisemitism: Georg von Schoenerer,"*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7, no. 1, January, 1945.

Katz, Jacob, *Exclusiveness and Tolerance, Jewish－Gentile Relations in Medieval and Modern Times,* New York, 1961.

Kleines Jahrbuch des Nützlichen und Angenehmen für Israeliten, 1847.

Koch, Ludwig, S. J., "Juden"in *Jesuitenlexikon,* Paderborn, 1934.

Koehler, Max, *Beiträge zur neueren jüdischen Wirtschaftsgeschichte. Die Juden in Halberstadt und Umgebung* (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r Wirtschaft und Geisteskultur, vol. 3), 1927.

Kohler, Max, J., "Some New Light on the Dreyfus Case,"*Studies in Jewish Bibiliography and Related Subjects in Memory of A. S. Freidus,* New York, 1929.

Krakauer, J.,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Frankfurt / Main. 1150－1824,* 1925－1927.

Kraus, Karl, *Untergang der Welt durch schwarze Magie,* 1925.

Krueger, Hans K., *Berliner Romantik und Berliner Judentum,* Dissertation, 1939.

Krug, W. Traugott, "Über das Verhältnis verschiedener Religionsparteien zum Staate und über die Emanzipation der Juden," *Minerva,* vol. 148, 1828.

K.V.T., "The Dreyfus Case: A Study of French Opinion,"*The Con-*

temporary Review, vol. 74, October, 1898.

Labori, Fernand, "Le Mal politique et les partis,"*la Grande Revue,* October—December, 1901; "Notes de Plaidoiries pour le procès de Rennes,"*ibid.,* February, 1900.

Lachapelle, Georges, *Les Finances de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Paris, 1937.

La Serve, Fleury, "Les Juifs à Lyon,"*Revue du Lyonnais,* vol. 7, 1838.

Lazare, Bernrd, *L'Antisémitisme, son histoire et ses causes,* 1894; *Une Erreur judiciaire; la vérité sur l'affaire Dreyfus,* 1896; Contre *l'Antisémitisme; histoire d'une polémique,* Pairs, 1896; *Job's Dungheap,* New York, 1948.

Lazaron, Morris S., *Seed of Abraham,* New York, 1930.

Lecanuet, Edouard, *Les Signes avant—coureurs de la séparation, 1894—1910,* Paris, 1930.

Lemoine, Albert, *Napoléon I et les Juifs,* Paris, 1900.

Lestschinsky, Jacob, "Die Umwandlung und Umschichtung des jüdischen Volkes im Laufe des letzten Jahnbundert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vol. 30, Kiel, 1929.

Lesueur, E., *La Franc—Maçonnerie Artésienne au 18e siècle*(Bibliotheque Révolutionnaire), 1914.

Leuillot, Paul, "L'Usure judaïque en Alsace sous l'Empire et la Réstauration,"*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vol. 7, 1930.

Levaillant, I., "La Genèse de l'antisémitisme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Revue des Etudes Juives,* vol. 53, 1907.

Levinas, E., "L'Autre dans Proust,"*Deucalion,* no. 2, 1947.

Lewinsohn, Richard, *Jüdische Weltfnanz?,* 1925; *Wie sie gross und reich wurden,* Berlin, 1927.

Lombard de Langres, Vincent, *Sociétés secrètes en Allemagne…de l'assassinat Kotzebue,* Paris, 1819.

Lombroso, César, *L'Antisémitisme,* 2nd edition, 1899, Paris.

Lucien-Brun, Henry, *La Condition des Juifs en France depuis 1789,* Paris, 1900.

Luxemburg, Rosa,"Die sozialistische Krise in Frankreich,"*Die Neue Zeit,* vol. I. 1901.

Maier, Hans, "Die Antisemiten,"*Deutsches Parteiwesen,* no. 2, Munich, 1911.

Maistre, Comte J. M. de, *Les Soirées de St. Petersburg,* 1821.

Malet, Chevalier de, *Recherches politiques et historiques qui prouvent l'existence d'une secte révolutionnaire,* 1817.

Marburg, Fritz, *Der Antisemitismus in der deutschen Republik,* Vienna, 1931.

Marcus, Jacob R., *The Rise and Destiny of the German Jews,* 1934.

Marr, Wilhelm, *Sieg des Judentums über das Germanentum vom nicht konfessionellen Standpunkt aus betrachtet,* 2nd ed., Berlin, 1879.

Martin du Gard, Roger, *Jean Barois,* 1913.

Marwitz, Fr. August Ludwig von der, "Letzte Vorstellung der Stände des Lebusischen Kreises an den König," 1811, *Werke,* ed. Meusel, Berlin, 1908; "Über eine Reform des Adels, "1812, *ibid.*; "Von den Ursachen des Verfalls der preussischen

Staaten," *ibid*.

Marx, Karl, "Zur Judenfrage,"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1843.

Maurras, Charles, *Au Signe de Flore; Souvenirs de la vie politique; L'Affaire Dreyfus et la fondation de l'Action française*, Paris, 1931; *Oeuvres Capitales*, Paris, 1954.

Mayer, Sigmund, *Die Wiener Juden; Kommerz, Kultur, Politik, 1700－1900*, 1917.

McDermot, Geroge, C.S.P., "Mr. Chamberlain'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Dreyfus Case," *Catholic World*, vol. 67, September, 1898.

Mehring, Franz, *Die Lessinglegende*, 1906.

Mendelssohn, Moses, "Schreiben and Lavater," 1769, *Gesammelte Schriften*, Berlin, 1930, vol. 7;"Vorrede zur Übersetzung von Menasseh ben Israel, *Rettung der Juden*,"1782, *Gesammelte Schriften*, Leipzig, 1843－1845, vol. 3.

Meyer, Rudolf, *Politische Gründer und die Korruption in Deutschland*, 1877.

Mirabeau, H. G. R. de, *Sur Moses Mendelssohn*, London, 1788.

Mommsen, Theodor, *Reden und Aufsätze*, Berlin, 1905.

Monypeny, W. F., and Buckle, G. E., *The Life of Benjamin Disraeli, Earl of Beaconsfeld*, New York, 1929.

Morley, John, *Life of Gladstone*, 1903.

Much, Willi, *50 Jahre antisemitischer Bewegung*, Munich, 1937.

Mulert, Hermann, "Antisemitismus," *Die Relig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Tübingen, 1909.

Müller, Adam, *Ausgewählte Abhandlungen*, ed. J. Baxa, Jena, 1921.

Neuschäfer, Fritz Alberecht, *Georg, Ritter von Schoenerer*, Ham-

burg, 1935.

Nipperdey, Thomas, *Die Organisation der deutschen Parteien vor 1918,* Düssseldorf, 1961.

Paalzow, C. L. *Über das Bürgerrecht der Juden, übersetzt von einem Juden,* Berlin, 1803.

Paléologue, Maurice, "L'Antisémitisme, moyen du gouvernement sous Alexandre II et Alexandre III,"*Annale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vol. 112, July, 1938; *Tagebuch der Affäre Dreyfus,* Stuttgart, 1957.

Parkes, James W., *The Emergence of the Jewish Problem, 1878–1939,* 1946.

Paulus, Heinrich, E. G., *Beiträge von jüdischen und christlichen Gelehrten zur Verbesserung der Bekenner des jüdischen Glaubens,* Frankfurt, 1817; *Die jüdische Nationalabsonderung nach Ursprung, Folgen und Besserungsmitteln,* 1831.

Péguy, Charles, "Notre Jeunesse,"*Cahiers de la Quinzaine,* 1910; "A Portrait of Bernard Lazare,"in Bernard Lazare, *Job's Dungheap,* New York, 1948.

Philipp, Alfred, *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 Eine anti-kritisch–bibilographische Studie zu W. Sombart, 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 Strasbourg, 1929.

Philippsohn, Ludwig,"Tagescontrolle," *Allgemeine Zeitung des Judentums,* 1839.

Picciotto, James, *Sketches of Anglo–Jewish History,* London, 1875.

Pichl, Eduard(pseudonym Herwig), *Georg Schoenerer,* 1938.

Pinner, Felix, *Deutsche Wirtschaftsführer,* 1924.

Praag, J. E. van, "Marcel Proust, Tēmoin du Judaisme dējudaisē," *Revue Juive de Genève,* nos. 48, 49, 50, 1937.

Prēcis historique sur l'Affaire du Panama, 1893.

Pribram, Alfred François, *Urkunden und Akten zur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Wien,* Vienna, 1918.

Priebatsch, Felix, "Die Judenpolitik der fürstlichen Absolutismus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Forschungen und Versuche zur Geschichte des Mittelaters und der Neuzeit,* 1915.

Proust, Marcel,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1932—1934.

Quillard, P., *Le Monument Henry,* Paris, 1899.

Rachel, Hugo, *Das Berliner Wirtschafsleben im Zeitalter des Früh-kapitalismus,* Berlin, 1931; "Die Juden im Berliner Wirtschafts-leben zur Zeit des Merkantilismus,"*Zeitschrift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vol. 2.

Rachfahl, Felix, "Das Judentum und die Genesis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 *Preussische Jahrbücher,* vol. 147, 1912.

Ramlow, Gerhard, *Ludwig von der Marwitz und die Anfänge kon-servative Politik und Staatsauffassung in Preussen*(Historische Studien, no. 185).

Rathenau, Walter, *Staat und Judentum. Zur Kritik der Zeit,* Ber-lin, 1912; *Von kommenden Dingen,* 1917.

Raymond E. T., *Disraeli. The Alien Patriot,* New York, 1925.

Reeves, John, *The Rothschilds. The Financial Rulers of Nations,* London, 1887.

Rehberg, August Wilhelm von, *Über den deustschen Adel, Berlin,* 1804.

Reinach, Joseph, *L'Affaire Dreyfus,* Paris, 1903 – 1911; "Le rôle d'Henri,"*La Grande Revue,* 1900, vol. 1.

Reinach, Théodore, *Histoire sommaire de l'Affaire Dreyfus,* Paris, 1924.

Riesser, Gabriel, *Über die Stellung der Bekenner des mosaischen Glaubens a die Deutschen aller Konfessionen,* 1831;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Verhältnisse der jüdischen Untertanen in der Preussischen Monarchie,* 1834.

Robinson, John, *Proofs of a Conspiracy against the Religions and Governments of Europe,* London, 1797. American edition, 1798; German translation, 1800; French translation, 1798–1799.

Roth, Cecil, *The Magnificent Rothschild,* 1939.

Ruehs, Christian Friedrich, "Über die Ansprüche der Juden auf das deutsche Bürgerrecht,"*Zeitschrift für die neueste Geschichte der Völker und staatenkunde,* Berlin, 1815; *Die Rechte des Christentums und des deutschen Volkes verteidigt gegen die Ansprüche der Juden und ihrer Verfechter,* 1815.

Ruppin, Arthur, *Soziologie der Juden,* Berlin, 1930.

Samter, N., *Judentaufen im 19. Jahrhundert.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Preussens,* 1906.

Savigny, Friedrich Karl von, *Beitrag zur Rechtsgeschichte des Adels im neueren Europa,* 1836.

Sayou, André, "Les Juifs,"*Revue Economique Internationale,* 1912.

Schaeffle, A. E. Fr., "Der 'grosse Börsenkrach' des Jahres 1873,"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vol. 30, 1874.

Scharf-Scharffenstein, Hermann von, *Das geheime Treiben, der Einfuss und die Macht des Judentums in Frankreich seit 100 Jahren(1771−1871)*, Stuttgart, 1872.

Schay, Rudolf, *Juden in der deutschen Politik,* 1929.

Scheffer, Egon, *Der Siegeszug des Leihkapitals,* 1924.

Scheidler, K. H., "Judenemanzipation," *in Ersche und Gruber, Allgemeine Enzyklopae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1850, 2nd section, vol. 27.

Schlegel, Friedrich, *Philosophische Vorlesungen aus den Jahren 1804−1806,* Bonn, 1836.

Schleiermacheer, Friedrich, *Briefe bei Gelegenheit der politischen theologischen Aufgabe und des Sendschreibens jüdischer Hausväter,* 1799, *Werke,* section Ⅰ, vol. 5, 1846.

Schnee, H., *Die Hoffinanz und der moderne Staat,* 3vols., Berlin, 1953−1955.

Schneider, K. H., "Judenemanzipation,"in *Ersch und Gruber, Allgemeine Enzyklopaed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Künste,* section 2, vol. 27, 1850.

Schudt, Johann Jacob, *Jüdische Merkwürdigkeiten,* Frankfurt, 1715−1717.

Schwertfeger, Bernhard, *Die Wahrheit über Dreyfus,* 1930.

S.F.S., "The Jesuits and the Dreyfus Case," *The Month,* vol. 93, February, 1899.

Shohet, D. M., *The Jewish Court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1931.

Silbergleit, Heinrich, *Die Bevölkerungs-und Berufsverhältnisse der*

Juden im Deutschen Reich, Berlin, 1930.

Silberner, Edmund, "Charles Fourier on the Jewish Question," *Jewish Social Studies*, October, 1946.

Simon, Yves, *La grande Cris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observations sur la vie politique française de 1918–1938*, Montreal, 1941.

Sombart, Werner,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im 19. Jahrhundert*, 1903; *Die Juden und das Wirtschaftsleben*, 1911; *Die Zukunft der Juden*, 1912; *Der Bourgeois*, 1913; *Studien zu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 1913.

Sonnenberg–Liebermann, Max vo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antisemitischen Bewegung vom Jahre 1880–1885*, Berlin, 1885.

Sorel, Georges, *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Paris, 1908; *La Révolution dreyfusienne*, Paris, 1911.

Stahl, F. J., *Der christliche Staat und sein Verhältnis zu Deismus und Judentum*, 1847.

Steinberg, A. S., "Die weltanschaulichen Voraussetzungen der jüdischen Geschichtsschreibung," *Dubnov–Festschrift*, 1930.

Stern, Selma, "Die Juden in der Handelspolitik Friedrich Wilhelms I. von Preussen,"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vol. 5; *Der preussische Staat und die Juden*, 2 vols., Tübingen, 1962; *Jud Suess*, 1929; "Die Judenfrage in der Ideologie der Aufklärung und Romantik," *Der Morgen*, vol. 11, 1935; *The Court Jew*, Philadelphia, 1950.

Stoecker, Adolf, *Reden und Aufsatze*, Leipzig, 1913.

Strauss, Raphael, "The Jews in the Economic Evolution of Central

Europe,"*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III, no. 1, 1941.

Suarez, Georges, *La Vie orgueilleuse de Clémenceau,* Paris, 1930.

Sundheimer, Paul, "Die jüdische Hochfinanz und der bayrische Staat im 18. Jahrhundert,"*Finanzarchiv,* vol. 41, 1924.

Thalheimer, Siegfried, *Macht und Gerechtigkeit—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Falles Dreyfus,* München, 1958.

Théo—Daedalus(pseudonym), *L'Angleterre juive: israël chez John Bull,* Bruxelles, 1913.

Thibaudet, Albert, *Les idées de Charles Maurras,* Paris, 1920.

Toussenel, Alphonse, *Les Juifs, rois de l'époque. L'histoire de la féodalité financière,* 3rd ed., 1846.

Treitschke, Heinrich von, "Unsere Aussichten," *Preussische Jahrbücher,* vol. 44, no. 5, 1879; "Herr Graetz und sein Judentum," *ibid.,* no. 6; "Erwidrung and Mommsen,"*ibid.,* vol. 46, no. 6, 1881.

Ucko, Siegfried, "Geistesgeschichtliche Grundlagen der 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Zeitschrift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Juden in Deutschland,* vol, 5, no. 1.

Vacher de Lapouge, George, *L'Aryen, son rôle social,* Paris, 1896; *Les Selections sociales,* Paris, 1896.

Vallée, Oscar de, *Manieurs d'argent, 1720—1857,* 1857.

Varigny, C. de, "Les grandes Fortunes en Angleterre,"*Revue des deux Mondes,* June, 1888.

Varnhagen, August, *Tagebücher,* Leipzing, 1861.

Vernunft, Walfried, "Juden und Katholiken in Frankreich,"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October, 1938; "Die Hinter-

gründe des französischen Antisemitismus,"*ibid.*, June, 1939.

Voltaire, F. M. Arouet de, *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Oeuvres complètes*, vol. 9, 1878); *Philosophie génerale: métaphysique, morale et Théologie*(*Oeuvres complètes*, vol. 40, 1785); *Essai sur les moe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Oeuvres complètes*, vol. 12, 1878).

Waetjen, Hermann, "Das Judentum und die Anfänge der Moder nen Kolonisation," *Vierteljahrsschrift fü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ete*, vol. 11.

Wagener, Hermann, "Das Judentum und der Staat,"*in Wagener Staatslexikon*, 1815—1889;"Das Judentum in der Fremde,"*ibid.*

Wawrzinek, Kurt, *Die Entstehung der deutschen Antisemitenparteien 1875—1890*, Berlin, 1927.

Weber, Eugen, *Action française—Royalism and Reac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 Stanfrod, 1962.

Weber, Max, "Die Börse," in his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ologie und Sozialpolitik;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23; *Parlament und Regierung*, 1918.

Weil, Bruno, *L'Affaire Dreyfus*, Paris, 1930.

Weill, Alexandre, *Rothschild und die europäischen Staaten*, 1844.

Weill, George, "Les Juifs et le Saint—Simonisme,"*Revue des Etudes Juives*, vol. 31.

Weinryb, S. B., *Neueste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Juden in Russland und Polen*(*Historische Untersuchungen*, vol. 12), Berlin, 1934.

Zaccone, Pierre, *Histoire des sociétés secrêted politques et religieuses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reculés jusqu'ã nos jours*,

1847—1849.

Zielenziger, Kurt, *Die Juden i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1930.

Zola, Emile, "J'Accuse,"*L'Aurore,* January 13, 1898; *Correspondance: lettres ã Maitre Labori,* Paris, 1929.

Zweig, Stefan, *The World of Yesterday: An Autobiograpy,* 1943.

第二部：帝國主義

American Feiends Service Bulletin, General Relief Bulletin, March, 1943.

Andler, Charles, *Les Origines du Pangermanisme,* 1915.

Angus, H. F., editor, "Canada and the Doctrine of Peaceful Chang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 Demographic Questions. Peaceful Changes,* 1937.

Arndt, Ernst Moritz, *Ein Blick aus der Zeit auf die Zeit,* 1814; *Phantasien zur Berichtigung der Urteile über künftige deutsche Verfassungen,* 1815; *Erinnerungen aus Schweden,* 1818.

Azcarate, Pablo de, "Minorities. League of Nations," in *Encyclopaedia Briannica,* 1929.

Bangert, Otto, *Gold oder Blut,* 1927.

Barker, Ernest, *Political Theory in England from Herbert Spencer to the Present Day,* 1915; *Ideas and Ideals of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41.

Barnes, Leonard, *Caliban in Africa. An Impression of Colour Madnesss,* Philadelphia, 1931.

Barrês, Maurice, *Scênes et doctrines du nationalisme,* Paris, 1899.

Barzun, Jacques, *Race. A Study in Modern Superstition,* New York, 1937.

Bassermann, Ernst, "Nationalliberale," in *Handbuch der Politik,* vol. 2, 1914.

Bauer, Otto, *Die Nationalitätenfrage und die österreiche Sozialdemokratie,* Vienna, 1907.

Beamish, Henry Hamilton, *South Africa's Kosher Press,* London, 1937.

Becker, Paul, *Carl Peters, die Wirkung der deutschen Kolonialpolitik,* 1934.

Bell, Sir Hesketh, *Foreign Colonial Adminstration in the Far East,* 1928.

Benedict, Ruth, *Race, Science and Politics,* 1940.

Benians, E. A., "The European Colonies,"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The Latest Age,* vol. 12, 1934.

Benjamin, Walter, *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 in *Werke,* Frankfurt, 1955.

Bentwich, Norman, "Sovth Africa. Dominion of Racial Problems,"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10, no. 3, 1939.

Bérard, Victor, *L'Empire russe et le tsarisme,* 1905.

Bergstraesser, Ludwig, *Geschichte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 1921.

Bibl, Viktor, *Der Zerfall Österreichs,* 1924.

Bluntschl, Johann Caspar, *Charakter und Geist der Politischen Parteine,* 1869.

Bodelsen, C. A., *Studies in Mid-Victorian Imperialism,* 1924.

Bodin, Jean,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 1576.

Bonhard, Otto, *Geschichte des alldeutschen Verbandes,*1920.

Boulainvilliers, Comte Henri de, *Histoire de L'Ancien Gouvernement de la France,* 1727.

Braun, Robert, "Political Parties. Succession States," i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Brie, Friedrich, Imperialistische Strömungen in der englischen Literatur, Halle, 1928; *Der Einfluss der Lehren Darwins auf den britischen Imperialismus, 1927.*

Bronner, Fritz,"Georg, Ritter v. Schoenerer," Volk im Werden, vol. 7, no. 3. 1939.

Bruecher, Heinz, "Ernst Haeckel. Ein Wegbereiter Biologischen Staatsdenken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no. 69, 1935.

Bruun, Geoffrey, *Europe and the French Empire,* 1938.

Bryce, Viscount James, *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 1901.

Bubnoff, Nicolai, *Kutur und Geschichte im russischen Denken der Gegenwart* (Osteuropa: Quellen und Studien, no. 2), 1927.

Buffon, 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Historie Naturelle,* 1769—1789.

Burke, Edmund,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ce* (1790), Everymain's Library; *Upon Party,* 1850, 2nd ed.

Burns, Elinor, *British Imperialism in Ireland,* 1931.

Cambridg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 5, *The Indian Empire 1858—1918,* 1932; vol. 8, *South Africa,* 1936.

Carlyle, Thomas, "Occasional Discoure on the Nigger Question," in *Critical and Miscellaneous Essays.*

Carr—Saunders, A. M., *World Population, Oxford,* 1936.

Carthill, Al.(pseudonym), *The Lost Dominion,* 1924.

Chamberlin, W. H., *The Russian Revolutin 1917－1927,* New York, 1935.

Cherikover, E. "New Materials on the Pogroms in Russi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ies," *Historishe Shriften,* vol. 2, Vilna, 1937.

Chesterton, Cecil, and Belloc, Hilaire, *The Party System,* London, 1911.

Chesterton, Gilbert K., *The Crimes of England,* 1915.

Childs, Stephen Lawford, "Refugess－a Permanent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War is not Inevitable, Problems of Peace,* 13th series, publis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London, 1912.

Clapham, J. H., *The Abbé Siéyès*, Lomdon, 1912

Class, Heinrich (pseudonym Einhart), *Deutsche Geschichte,* Leipzig, 1910; *Zwanzig Jahre alldeutscher Arbeit und Kämpfe,* Leipzig, 1910;(pesudonym Daniel Fryman), *Wenn ich der Kaiser wär. Politische Wahrheiten und Notwendigkeiten,* 1912.

Cleinow, Georg, *Die Zukunft Polens,* Leipzig, 1914.

Comte, Auguste, *Disours sur l'Ensemble du Positivisme,* 1848.

Conditions of India (no author, preface by Bertrand Russell), London, 1934.

Conrad, Joseph, "The Heart of Darkness," in his *The Youth and Other Tales,* 1902; *Voctory,* 1915.

Cooke, George W., *The History of Party,* London, 1836.

Coquart, A., *Pisarev et l'idéologie du nihilisme russe,* Paris, 1946.

Cromer, Lord, Evelyn Baring, "The Government of Subject Races," *Edinburgh Review,* January, 1908; "Disraeli," *Spectator,* November, 1912.

Crozier, John B., *History of Interllectual Development on the Lines of Modern Evolutin,* 1897–1901.

Crozier, W. P., "France and her 'Black Empiere,'" *New Republic, Janury* 23, 1924.

Curzon, Lord Georgn N., *Problems of the Far East,* 1894.

Damce, E. H., The Victorian Illusion, London, 1928.

Danilewski, Nikolai Yakovlevich, *Russia and Europe,* 1871.

Darcy, Jean, *France et Angleterre, Cent années de rivalité coloniale,* 1904.

(Davidson, John), *Testament of John Davidson,* 1908.

Deckert, Emil, *Panlatinismus, Panslawismus und Panteutonismus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ie Weltlage,* Frankfurt, 1914.

Delbrück, Hans, "Die Alldeutschen," *Preussische Jahrbücher,* vol. 154. December, 1913; *Ludendorffs Selbstportrait.*, Berlin, 1922.

Delos, J.-T., *La Nation,* Montreal, 1944.

Detweiler, E. G., "The rise of modern race antagonism,"*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32.

Dike, Charlew W., *Problems of Greater Britain,* 4th ed., London, 1980.

Dornath, J. v., "Die Herrschaft des Panslawismus," *Preussische Jahrbücher,* vol. 95, Berlin, 1898.

Dreyfus, Robert, "La Vie et les prophéties du Comte de Gobineau," *Cahiers de la Quinzaine,* ser. 6, cahier 16, 1905.

Dubuat-Nançay, Comte Louis Gabriel, *Les Origines; ou, l'Ancien Gouvernement de la France, de l'Allemagne et de l'Italie,* 1789.

Duesberg, Jacques,"Le Comte de Gobineau,"*Rêvue Génêral,* 1939.

Duverger, Maurice,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New York 1959.

Ehrenberg, Hans, and Bubnoff, Nicolai, editors. *Östliches Christentum. Dokumente,* 1925.

Emden, Paul H., *Jews of Britain, A Series of Biographies,* London, 1944.

Erdstein, David, *Le Statut juridique des minorités en Europe,* Paris, 1932.

Estêve, Louis, *Une nouvelle Psychologic de l'Impêrialisme, Ernest Seillière,* 1913.

Faure, Elie, "Gobineau et le Problème des races,"*Europe,* 1923.

Fiala, Vaclav, "Les Partis politiques polonais," *Monde Slave,* February, 1935.

Fischel. A., *Der Panslawismus bis zum Weltkriege,* 1919.

The French Colonial Empire(Information Department Papers, no. 25), published by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1941.

"Friedlosigkeit," in *Schweizer Lexikon,* 1945.

Froude, J. A., *Short Studies on Great Subjects,* 1867-1882.

Gagarin, Ivan S., *La Russie sera-t-elle catholique?,* 1856.

Galton, Sir Francis, *Hereditary Genius,* 1869.

Gehrke, Achim, *Die Rasse im Schrifttum,* 1933.

Gelber, N. M., "The Russian Pogroms in the Early Eighties in the

Light of the Austrian 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Historishe Shriften,* vol. 2, Vilna, 1937.

George, David Lloyd, *Memoirs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Yale, 1939.

Gobinean, Clément Serpille de, "Le Gobinisme et la Pensée moderne," *Europe,* 1923.

Gobineau, Comte Joseph-Arthur de, *Essai 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 1853; *The Inequality of Human Races.* English ed., translated by Adrien Collins, 1915; "Ce qui est arrivé à la France en 1870," *Europe,* 1923.

Goerres, Josef, *Politische Schriften,* Munich, 1854—1874.

Gohier, Urbain, *La Race a parlé,* 1916.

Grégoire, Abbé Henri, *De la Littérature des Nègres, ou recherches sur leurs qualités morales,* Paris, 1808; *De la Noblesse de la peau ou du préjugé des blancs contre la couleur des Africains,* Paris, 1826.

Gregory, Theogore, *Ernst Oppenheimer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Africa,* New York, 1962.

Grell, Hugo, *Der alldeutsche Verband, seine Geschichte, seine Be-*strebungen, seine Erfolge(Flugschriften des alldeutschen Verbandes, no. 8), Munich, 1898.

Gunenin, E., *L'Épopée coloniale de la France,* 1932.

Hadsel, Winifred N., "Can Europe's refugees find new Homes?", *Foreign Policy Reports,* vol. 10, no. 10,1943.

Halévy, Elie, *L'Ere des Tyrannies,* Prais, 1938.

Hallgarten, W., *Vorkriegsimperialismus,* 1935.

Hancock, William K., *Survey of British Commonwealth Affairs,*

London, 1937—1942; *Smuts: The Sanguine Years, 1870—1919, New York, 1962.*

Hanotaux, Gabries. "Le Général Mangin," Reve des Deux Mondes, vol. 27, 1925.

Harlow, Vincent, *The Character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939.

Harvey, Charles H., *The Biology of British Politics,* 1904.

Hasse, Ernst, *Deutsche Weltpolitik* (Flugschriften des Alldeutschen Verbandes, no. 5), 1897; *Deutsche Politik,* 1905—1906.

Hazeltine, H. D., "Excommunication," i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Heinberg, John Gilbert, *Comparative Majar European Governments, an Introductory Study,* New York, 1937.

Herrmann, Louis, *History of the Jews in South Africa,* 1935.

Hilferding, Rudolf, *Das Finanzkapital,* Vienna, 1910.

Hobbes. Thomas, *Leviathan* (1651), Cambridge Edition, 1935.

Hobson, J. H., "Capitalism and Imperialism in South Africa," *Contemporary Review,* 1900; *Imperialism* (1905), unrevised edition, 1938.

Hoetzsch, Otto, *Russland; eine Einführung auf Grund seiner Geschichte von 1904—1912,* Berlin, 1913.

Hoffmann, Karl, *Ölpolitik und angelsächsisches Imperium,* 1927.

Holborn, Louise W., "The Legal Status of Political Refugees, 1920—1938,"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38.

Holcombe, Arthur N., "Political Parties," i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Hotman, François, *Franco—Gallia,* 1573.

Huebbe—Schleiden, *Deutsche Kolonisation,* 1881.

Huxley, Thomas,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Human Society,* 1888.

Ipseri, H. P., "Vom Begriff der Partei,"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1940.

James, Selwyn, *South of the Congo,* New York, 1943.

Janeff, Janko, "Der Untergang des Panslawismu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no 91, 1937.

Janowsky, Oscar J., *The Jews and Minority Rights,* New York, 1933; *Nationalities and Natioal Minorities,* New York, 1945.

Jermings, R. Yewdall, "Some International Aspects of the Refugee Question,"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39.

Kabermann, Heinz, "Das internationale Flüchtlingsproblem,"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vol. 29, no. 3, 1939.

Kaehler, Siegfried, editor, *Deutscher Staat und deutstche Parteien,* Munich, 1922.

Karbach, Oscar, "The Founder of Modern Political Antisemitism: Georg von Schoenerer," *Jewish Social Studies,* vol. 7, no. 1, January, 1945.

Kat Angelino, A. D. A. de, *Colonial Policy, Chicago,* 1931.

Kehr, Eckart, *Schlachtflottenbau und Parteipolitik,* 1930.

Kidd, Benjamin, *Social Evolution,* 1894.

Kiewiet, C. W. de, *A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Social and Economic,* Oxford, 1941.

Kipling, Rudyard, "The First Sailor," in his *Humorous Tales,* 1891; "The Tomb of His Ancestor," in is *The Day's Work,* 1898;

Stalky and Company, 1899; *Kim,* 1900.

Klemm, Gustav, *Allgemeine Kultur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 1843—1852.

Klyuchevsky, V. O., *A History of Russia,* London, 1911—1931.

Koebner, Richard, and Schmidt, Helmut Dan, *Imperialism: The 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a Political Word, 1840—1860,* New York 1964.

Koestler, Arthur, *Scum of the Earth,* 1941.

Kohn, Hans, *Nationalism,* 1938; *Panslavism: History and Ideology,* Notre Dame, 1953.

Koyré, Alexander, *Etudes sur l'histoire de la pensée philosophique en Russie,* Paris, 1950.

Kruck, Alfred, *Geschichte des alldeutschen Verbandes 1890—1939,* Wiesbaden, 1954.

Kuhlenbeck, L., *Rasse und Volkstum* (Flugschriften des alldeutschen Verbandes, no. 23).

Kulischer, Eurene M., *The Displacement of Population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Montreal, 1943.

Kulischer, J., *Allgemeine Wirtschaftsgeschichte,* 1928—1929.

Landsberg, P. L., "Rassenideologi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1933.

Langer, William,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

Larcher, M., *Traité Elémentaire de Législation Algérienne,* 1903.

Lawrence, T. E., "France, Britain and the Arabs," *The Observer,* 1920;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1926; *Letters,* edited by David Garnett, New York, 1939.

Lehr, *Zwecke und Ziele des alldeutschen Verbandes* (Flugschriften des alldutschen Verbandes, no. 14).

Lemonon, Ernest, *L'Europe et la politique britannique, 1882-1911,* 1912.

Levine, Louis, *Pan-Slavism and Europeon Politics,* New York, 1914.

Lewis, Sir George Cornewall, *An Essay on the Government of Dependencies,* Oxford, 1844.

Lippincott, Benjamin E., *Victorian Critics of Democrac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38.

Lossky, N. O., *Three Chapters from the History of Polish Messianism*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Library, vol.2, no. 9), Prague, 1936.

Lovell, Reginald Ivan, *The Struggle for South Africa, 1875-1899,* New York, 1934.

Low, Sidney, "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Cecil Rhodes," *Nineteenth Century,* vol. 51, May, 1902.

Ludendorff, Erich, *Die überstaatlichen Mächte im letzten Jahre des Weltkrieges,* Leipzig, 1927; *Die Judenmacht, ihr Wesen und Ende,* Munich, 1938; *Feldherrnworte,* 1939.

Luxembrug, Rosa, *Die Akkumulation des Kopitals* (1913), Berlin, 1923.

Macartney, C. A., *The Social Revolution in Austria,* Cambridge, 1926; *National States and National Minorities.* London, 1934.

Mahan, Alfred T., *The Problem of Asia and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cies,* Boston, 1900.

Maine, Sir Henry, *Popular Government,* 1886.

Mangin, Charles Marie Emmanue, *La Force noire, 1910; Des Hommes et des Faits,* Paris, 1923.

Mangold, Ewald K. B., *Frankreich und der Passegedanke; eine politicshe Kernfrage Europas,* 1937.

Mansergh, Nicholas, *Britain and Ireland* (Longman's Pamphlets on the Brtish Commonwealth), London, 1942; *South Africa 1960–1961,* New York, 1962.

Marcks, Erich, editor, *Lebensfragen des britischen Weltreichs,* 1921.

Marx, Karl,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1852), 1898.

Masaryk, Th. G., *Zur russischen Geschichts- und Religionsphilosophie,* 1913.

Mauco, Georges, "L'Emigration, problème révolutionnaire,"*Esprit,* 7th year, no. 82, July, 1939.

Maunier, René, *Sociologie colonial,* 1932–1936.

Metzer, E., *Imperialismus und Romantik,* Berlin, 1908.

Michaelis, Alfred, editor, *Die Rechtsverhältnisse der Juden in Preussen seit dem Beginn des 19. Jahrhundert,* Berlin, 1910.

Michel, P. Charle, "A Biological View of Our Foreign Policy," *Saturday Review,* London, February, 1896.

Michell, Lewis, *Rhode,* London, 1910.

Michels, Robert, "Prolegomena zur Analyse des nationalen Leitgedankens," *Jahrbuch für Soziologie,* vol. 2, 1927; *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Glencoe, 1949.

Millin, S. Gertrued, *Rhodes,* London, 1933.

Molisch, Paul, *Geschichte der deutschnationalen Bewegung in Österreich,* Jean, 1926.

Montesquieu, C. L. de Secondat de, *Esprit des Lois,* 1748.

Morrison, T., *Imperial Rule in India,* 1899.

Multatuli (pseudonym for Eduard Douwes Dekker), *Max Havelaar,* 1868.

Nadolny, R., *Germansierung oder Slavisierung?,* 1928.

Naumann, Friedrich, *Central Europe,* London, 1916.

Neame, L, E., *The History of Apartheid,* London, 1962.

Nettlau, Max, *Der Anarchismus von Proudhon zu Kropotkin,* 1927.

Neumann, Sigmund, *Die Stufen des preussischen Konservativismus* (Historische Studien, no. 190), 1930; *Die deutschen Parteinen,* 1932.

Neuschäfer, Fritz Albrecht, *Georg, Ritter von Schoenerer,* Hamburg, 1935.

Nicolson, Harold, *Curzon: The Last Phase 1919–1925,* Boston, New York, 1934.

Nippold, Gottfried, *Der deustsche Chauvinismus,* 1913.

Novalis (pseudonym for Friedrich Hardenberg), *Neue Fragmentensammlung,* 1798.

Oakesmith, John, *Race and Nationality, an Inquiry into Origin and Growth of Patriotism,* 1919.

Oertzen, A. F. von,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Kolonialfrage,* Berlin, 1935.

Oesterley, W. O. E., *The Evolution of the Messianic Idea,* London, 1908.

Le Panlatinism, Confédération Gallo-Latine et Kelto-Gauloise...ou projet d'union fédérative..., Paris, 1860.

Pearson, Karl, *National Life*, 1901.

Peters, Carl, "Das Deutschtum als Rasse," *Deutsche Monatsschrift*, April, 1905; *Die Gründung von Deutsch-Ostafrika. Kolonialpolitische Erinnerungen*, 1906.

Pichl, Eduard (pseudonym Herwig), *George Schoenerer*, 1938.

Pinon, René, *France et Allemagne*, 1912.

Pirenne, Henri, *A History of Europe from the Invasions to XVI Century*, London, 1939.

Plucknett, Theodore F. T., "Outlawry," i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Pobyedonostzev, Constantin, *L'Autocratie russe. Mémoires politiques, correspondance officielle et documents inédits...1881-1894*, Paris, 1927; *Reflections of a Russian Statesman*, London, 1898.

Preuss, Lawrence, "La Dénationalisation imposée pour des motifs politiques," *Revue Internationale Française du Droit des Gens*, vol. 4, nos. 1, 2, 5, 1937.

Priestley, H. J., *France Overseas; a study of modern imperialism*, New York, 1938.

Propyläen Weltgeschichte, vol. 10, *Das Zeitalter des Imperialismus*, 1933.

Pundt, Alfred, *Arndt and the National Awakening in Germany*, New York, 1935.

Reimer, E., *Pangermanischer Deutschland*, 1905.

Reismann－Grone, Th., *Überseepolitik oder Festlandspolitik?* (Flugschriften des alldeutschen Verbande. no. 22), 1905.

Renan, Ernest, *Historie générale et système comparé das langues,* 1863; *Qu'est－ce qu'une nation?,* Paris, 1882. English translation in *The Poetry of the Celtic Races, and Other Studies,* translated by William G. Hutchison, London, 1896.

Renner, Karl, *Der Kampf der österreichischen Nationen unter dem Staat,* 1902; *Österreichs Erneuerung. Politisch－programmatische Ausätze,* Vienna, 1916; *Das Selbstbestimmungsrecht der Nationen,* Leipzig, 1918.

Richard, Gaston, *Le Conflit de l'autonomie nationale et de l'impérialisme,* 1916.

Ritter, Paul, *Kolonien im deutschen Schrifttum,* 1936.

Robert, Cyprienne, *Les deux Panslavismes,* 1847; *Le Monde slave,* 1852.

Robespierre, Maximilien de, *Oeuvres,* 1840; *Speeches,* 1927.

Robinson, Jacob, "Staatsbürgerliche und wirtschaftliche Gleichberechtigung," *Süddeutsche Monatschefte,* July, 1929.

Roepke, Wilhelm, "Kapitalismus und Imperialismus," *Zeitschrift für Schweizerische Statistik und Volkswirtschaft,* vol. 70, 1934.

Rohan, Henr, Duc de, *De l'Intérêt des princes et Etats de la Chrêtienté,* 1638.

Rohden, Peter R., editor, *Demokratie und Partei,* Vienna, 1932.

Rohrbach, Paul, *Der deutsche Gedanke in der Welt,* 1912; *Die alldeutsche Gefahr,* 1918.

Roscher, Wilhelm, *Die Grundlagen der Nationalökonomie,* 1900.

Rosenkranz, Karl, *Über den Begriff der politischen Partei,* 1843.

Roucek, Joseph, *The Minority Principle as a Problem of Political Science,* Prague, 1928.

Rozanov, Vassilij, *Fallen Leaves,* 1929.

Rudlin, W. A., "Political Parties. Great Britain," in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Russell, Lord John, *On Party,* 1850.

Samuel, Horace B., *Modernities,* London, 1914.

Schnee, Heinrich, *Nationalismus und Imperialismus,* 1928.

Schultze, Ernest, "Die Judenfrage in Südafrika," *Der Weltkampf,* vol. 15, no. 178, 1938.

Schumpeter, Joseph, "Zur Soziologie der Imperialismen,"*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 vol. 46, 1918–1919.

Schuyler, Robert L., *The Fall of the Old Colonial System. A Study in British Free Trade, 1770–1870,* New York, 1945.

Seeley, John Robert,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1883.

Sellière, Ernest, *La Philosophie de l'impérialisme,* 1903–1906; *Mysticisme et domination. Essais de critique impérialiste,* 1913.

Sieveking, H. J., "Wirtschaftsgeschichte," in *Enzyklopädie der Rechts– und Staatswissenschaften,* vol. 47, 1935.

Sieyès. Abbé, E. J., *Qu'est-ce Critique sur la formation de la doctrine des races au 18e et son expansion au 19e siècle,* Bruxelles, 1922.

Simpson, John Hope, *The Refugee Problem*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xford, 1939.

Sitzungsbericht des Kongresses der organisierten nationalen

Gruppen in den Staaten Europas, 1933.

Solovyov, Vladimir, *Judaism and the Christian Question,* 1884.

Sommerland, Theo, *Der deutsche Kolonialgedanke und sein Werden im 19. Jahrhundert,* Halle, 1918.

Spiess, Camille, *Impérialismes. Gobinisme en France,* Paris, 1917.

Sprietsma, Cargill, *We Imperialists. Notes on Ernest Sellière's Philosophy of Imperialism,* New York, 1931.

Staehlin, Karl, *Geschichte Russlands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1923—1939; "Die Entstehung des Panslawismus," *Germano-Slavica,* no. 4, 1936.

Stephen, Sir James F.,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1873; "Foundation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Nineteenth Century, vol. 80, 1883.

Stoddard, Th. L., *Rising Tide of Color,* 1920.

Strieder, Jakob, "Staatliche Finanznot und Genesis des modernes Grossunternehmertums," *Schmollers Jahrbücher,* vol. 49, 1920.

Strzygowski, Josef, *Altai, Iran und Völkerwanderung,* Leipzig, 1917.

Suarès, André, *La Naiton contre la race,* Paris, 1916.

Sumner, B. H., *Russia and the Balkans,* Oxford, 1937; *A Short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1949.

Sydacoff, Bresnitz von, *Die panslawistische Agitation und die südslawich Bewegung in Österreich—Ungarn,* Berlin, 1899.

Szpotański, Stanislaw, "Les Messies au 19e siècle," *Revue Mondiale,* 1920.

Talleyran, C. M. de, "Essai sur les avantages à retirer des col-

onies nouvelles dans les circonstances présentes"(1799), *Académie des Sciences Coloniales. Annales,* vol. 3, 1929.

Thierry, A., *Lettres sur l'historie de la France,* 1840.

Thompson, L. M., "Afrikaner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and the Policy of Apartheid,"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III, no. 1, 1962.

Thring, Lord Henry, *Suggestions for Colonial Reform,* 1865.

Tirpitz, Alfred von, *Erinnerungen,* 1919.

Tocqueville, Alexis de, "Lettres de Alexis de Tocqueville et de Arthur Gobinean," *Revue des Deux Mondes,* vol. 199, 1907; *L'Ancien Regime et la Rêvolution,* 1856.

Tonsill, Ch, C., "Racial Theories from Herder to Hitler," *Thought,* vol. 15, 1940.

Townsend, Mary E., *Origin of Modern German Colonialism, 1871—1885,* New York, 1921; *Rise and Fall of Germany's Colonial Empire,* New York, 1930; *European Colonial Experience since 1871,* New York, 1941.

Tramples, Kurt, "Völkerbund und Völkerfreiheit," *Süddeutsche Monatshefte,* July, 1929.

Tyler, J. E., *The Struggle for Imperial Unity,* London, Toronto, New York, 1938.

Unwin, George, *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 ed. by R. H. Tawney, 1927.

Vichniac, Marc, "Le Statut international des apateides,"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ê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vol. 33, 1933.

Voegelin, Erich, *Rasse und Staat,* 1933; *Die Rassenidee in der Geistes-*

geschichte, Berlin, 1933; "The Origins of Scientism," *Social Research,* December,1948.

Voelker, K., *Die religiöse Wurzel des englischen Imperialismus,* Tübingen, 1924.

Vrba, Rudolf, *Russland und der Panslawismus; statistische und sozialpolitische Studien,* 1913.

Wagner, Adolf, *Vom Territorialstaat zur Weltmacht,* 1900.

Weber, Ernst, *Volk und Rasse, Gibt es einen deutschen Nationalstaat?,* 1933.

Webster, Charles Kingsley, "Minorities. History,"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29.

Wenck, Martin, *Alldeutsche Taktik,* 1917.

Werner, Bartholomäus von, *Die deutsche Kolonialfrage,* 1897.

Werner, Lothar, *Der alldeutsche Verband, 1890－1918* (Historische Studien, no. 273), Berlin, 1935.

Wertheimer, Mildred S., *The Pan-German League, 1890-1940,* 1924

Westarp, Graf Kuno F. V. von, *Konservative Politik im letzten Jehrzehnt des Kaiserreiches,* 1935.

White, John S., "Taine on Race and Genius," *Social Research,* February, 1943.

Whiteside, Andrew G., "Nationaler Sozialismus in Österreich vor 1918,"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9. Jg. (1961).

Williams, Basil, *Cecil Rhodes,* London, 1921.

Williams, Sir John Fischer, "Denationalisation,"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7, 1927.

Winkler, Wilhelm, *Statistisches Handbuch der europäischen*

Nationalitäten, Vienna, 1931.

Wirth, Max, *Geschichte der Handelskrisen,* 1873.

Wolmar, Wolfram von, "Vom Panslawismus zum tschechisch-sowjetischen Bändnis,"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 no. 104, 1938.

Zetland, Lawrence J., *Lord Cromer,* 1932.

Ziegler, H. O., *Die moderne Nation,* Tübingen, 1931.

Zimmermann, Alfred,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Kolonialpolititk,* 1914.

Zoepfl, G., "Kolonien und Kolonialpolitik," in *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eenschaften,* 3rd edition.

第三部: 極權主義

感謝加州史丹福的胡佛圖書館，巴黎的當代猶太人文獻中心，及紐約的意地緒學術研究所，允許我閱讀及引用其檔案資料。紐倫堡審判中所使用的文件引用時會標示卷宗號碼，其他指涉到的文件會標示出處和檔案號碼。

Abel, Theodore, *Why Hitler Came into Power; an Answer Based on the Original Life Stories of Six Hundred of His Followers,* 1938.

Adler, H. G., *Theresienstadt 1941-1945,* Tübingen, 1955.

Alquen, Gunter d', *Die SS. Geschichte, Aufgabe und Organisation der Schutzstaffeln der NSDAP* (Schriften der Hochschule für Politik), 1939.

Anweiler, Oskar, *Die Räte-Bewegung in Russland 1905-1921,*

Leiden, 1958; "Lenin und der friedliche Übergang zum Sozialismus," in *Osteuropa,* 1956, vol. VI.

Armstrong, John A., *The Soviet Bureaucratic Elite: A Study of the Ukrainian Apparatus,* New York, 1959; *The Politic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1961.

Avtorkhanov, A.,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Contradictions in the Party,"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USSR,* Munich, February, 1956; *Stalin and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A Study in the Technology of Power,* New York, 1959; (pseudonym Uvalov), *The Reign of Stalin,* London, 1953.

Bakunin, Michael, *Oeuvres,* Paris, 1907; *Gesammelte Werke,* 1921-24.

Balabanoff, Angelica, *Impressions of Lenin,* Ann Arbor, 1964.

Baldwin, Roger N., "Political Police," i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Bataille, George, "Le Secret de Sade," *La Critique,* vol. 3, nos. 15, 16, 17, 1947; "Review of D. Rousset, *Les Jours de notre mort,*" *La Critique,* January, 1948.

Bauer, R. A., Inkeles, A., Kluckhohn, C., *How the Soviet System Works,* Cambridge, 1956.

Bayer, Ernest, *Die SA,* Berlin, 1938.

Bayle, François, *Psychologie et Ethique du National-Socialisme. Etude Anthropologique des Dirigeants SS,* Paris, 1953.

Beck, F., and Godin, W., *Russian Purge and the Extraction of Confession,* London and New York, 1951.

Beckerath, Erwin von, "Fascism," i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

ences; Wesen und Werden des faschistischen Staates, Berlin, 1927.

Benn, Gottfried, *Der neue Staat und die Intellektuellen,* 1933.

Bennecke, H., *Hitler und die SA,* München, 1962.

Berdyaev, Nicolas, *The Origin of Russian Communism,* 1937.

Best, Werner, *Die deutsche Polizei,* 1940.

Bettelheim, Bruno, "On Dachau and Buchenwald," in *Nazi Conspiracy op. cit.,* vol. 7; "Behavior in Extreme Situation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38, no.4, 1943.

Black, C. E., editor, *Rewriting Russian History,* New York, 1956.

Blanc, R. M., *Adolf Hitler et les "Protocoles des Sages de Sion,"* 1938.

Boberach, Heinz, editor, *Meldungen aus dem Reich,* Neuwied and Berlin, 1965.

Bonhard, Otto, *Jüdische Geld- und Weltherrschraft?,* Berlin, 1926.

Borkenau Franz, *The Totalitarian Enemy,* London, 1940;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London, 1938; "Die neue Komintern," *Der Monat,* no 4, 1949.

Bormann, Martin, "Relationsship of National Socialism and Christianity," in *Nazi Conspiracy, op. cit.,* vol. 6; *The Bormann Letters,* ed. by H. R. Trevor-Roper, London, 1954.

Bouchart, Robert, *Les Dessous de l'Intelligence Service,* 1937.

Bracher, Karl Dietrich, *Die Auflös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55; 3rd ed., Villingen, 1960.

——, Sauer, Wolfgang, and Schulz, Gerhard, *Die nationalsozialistiche Machtergreifung,* Köln & Opladen, 1960.

Bramsted, Ernest K., *Goebbels and National Socialist Propaganda 1925-1945,* Michigan, 1965.

Brecht, Bertolt, *Stücke,* 10 vols., Frankfurt, 1953-1959; *Gedichte,* 7 vols., Frankfurt, 1960-1964.

Broszat, Martin, *Die Nationalsozialismus,* Stuttgart, 1960.

——, Jacobson, Hans-Adolf, and Krausnick, Helmut, *Konzentrationslager, Kommissarbefehl, Judenverfolgung,* Olten／Freiburg, 1965.

Brzezinski, Zbigniew, *Ideology and Power in Soviet Politics,* New York, 1962; *The Permanent Purge-Politics in Soviet Totalitarianism,* Cambridge, 1956.

Buber-Neumann, Margarete, *Under Two Dictators,* New York, 1951.

Buchheim, Hans, "Die SS in der Verfassung des Dritten Reiches,"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April, 1955; *Das Dritte Reich,* München, 1958; *Die SS und totalitäre Herrschaft,* München, 1962; *Die SS—das Herrschaftsinstrument—Befehl und Gehorsam,* Olten／Freiburg, 1965.

Bullock, Alan, *Hitler, a Study in Tyranny,* rev. ed., New York, 1964.

Camus, Albert, "The Human Crisis," *Twice a Year,* 1946-1947.

Carocci, Giampiero, *Storia del fascismo,* Milan, 1959.

Carr, E. H.,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 7 vols. New York, 1951-1964; *Studies in Revolution,* New York, 1964.

Céline, Ferdinand, *Bagatelle pour un massacre,* 1938; *L'Ecole des cadavres,* 1940.

Chamberlin, W. H., *Blueprint for World Conquest,* 1946;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935), 1965.

Childs, H. L., and Dodd, W. E., editors, *The Nazi Primer,* New York, 1938.

Ciliga, Anton, *The Russian Enigma,* London, 1940.

Clark, Evelyn A. "Adolf Wagner. From National Economist to National Socialis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40, vol. 55, no. 3.

Cobban, Alfred,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London, New York, 1945; *Dictatorship; Its Histroy and Theory,* New York, 1939.

Communism in Acti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House Documents, no. 754), Washington, 1946.

Crankshaw, Edward, *Gestapo, Instrument of Tyranny,* London, 1956.

Curtiss, J. S., *An Appraisal of the Protocols of Zion,* New York, 1942.

Dallin, David J., *From Purge to Coexistence,* Chicago, 1964; "Report on Russia," *The New Leader,* January 8, 1949.

— and Nicolaevsky, Boris I., *Forced Labor in Russia,* 1947.

Daniels, Robert, *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Communist Opposition in Soviet Russia,* Cambridge, 1960.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preface by T. S. Eliot), New York, 1947.

Deakin, F. W., *The Brutal Friendship,* New York, 1963.

De Begnac, Yvon, *Palazzo Venezia-Storia di un regime,* Rome, 1950.

Dehillotte, Pierre, *Gestapo,* Paris, 1940.

Delarue, Jacques, *Historie de la Gestapo,* Paris, 1962.

Deutscher, Isaac, *Stalin: A Political Biography,* New York, and London, 1949; *Prophet Armed: Trotsky, 1879-1921,* 1954; *Prophet Unarmed: Trotsky, 1921-1929,* 1959; *The Prophet Outcast: Trotsky, 1929-1940,* 1963.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Revolution," *Dokumente der deutschen Politik,* vol. I.

Dobb, Maurice, "Bolshevism," in *Encyco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Dokumente der deutschen Politik und Geschichte, vol. IV.

Domarus, Max, *Hitler-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1945,* 2 vols., 1963.

Doob, Leonard W., "Goebbels' Principles of Propaganda," in Katz, Daniel *et al., Public Opinion and Propaganda,* New York, 1954.

Drucker, Peter F., *The End of Economic Man,* New York, 1939.

Ebenstein, William, *The Nazi State,* New York, 1943.

Ehrenburg, Ilya, *Memoirs: 1921-1941,* Cleveland, 1964; *The War: 1941-1945,* Cleveland, 1965.

Engels, Friedrich, Introduction to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90; introduction to the *Ursprung der Familie;* Funeral Speech on Marx.

Erickson, John, *The Soviet High Command 1918-1941,* New York, 1961.

Eyck, Erich, *A History of the Weimar Republic,* Cambridge, 1962.

Fainsod, Merle, *How Russia Is Ruled,* 1963; *Smolensk under Soviet*

Rule, 1958.

The Fascist Era, published by the Fascist Confederation of Industrialists, Rome, 1939.

Feder, Ernest, "Essai sur la Psychologie de la terreur," *Synthèses,* Bruxelles, 1946.

Feder, Gottfried, *Das Programm der N.S.D.A.P. und seine weltanschaulichen Grundgedank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ibliothek, no. 1).

Fedotow, G. P., "Russia and Freedom,"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8, no. 1, January, 1946.

Fest, J. C., *Das Gesicht des Dritten Reiches,* München, 1963.

Finer, Herman, *Mussolini's Italy,* New York, (1935) 1965.

Fischer, Louis, *The Soviets in World Affairs,* London, New York, 1930; *Life of Lenin,* New York, 1964.

Flammery, Harry W.,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Fascism," *Free World,* September, 1943.

Florinsky, M. T., *Fascism and National Socialism. A Study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tics of the Totalitarian State,* New York, 1938.

Forsthoff, Ernst, *Der totale Staat,* Hamburg, 1933.

Fraenkel, Ernst, *The Dual State,* New York and London, 1941.

Frank, Hans, *Nationalsozlialistische Leitsätze für ein neues deutsches Strafrecht,* Berlin, 1935-1936; *Die Technik des Staates,* München, 1940; (editor) *Grundfragen der deutschen Polizei* (Akademie für deutsches Recht) Hamburg, 1937; *Recht und Verwaltung,* 1939; *Die Technik des Staates,* München, 1942; *Im*

Angesicht des Galgens, München, 1953; editor, *Nationalsozialistisches Handbuch für Recht und Gesetzgebung,* München, 1935.

Freyer, Hans, *Pallas Athene, Ethik des politischen Volkes,* 1935.

Friedrich, C. J., editor,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1954.

——, and Brzezinski, Z. K.,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1956.

Gallier-Boissière, Jean, *Mysteries of the French Secret Police,* 1938.

Gauweiler, Otto, *Rechtseinrichtungen und Rechtsaufgaben der Bewegung,* 1939.

Geigenmüller, Otto, *Die politische Schutzhaft im nationalistischen Deutschland,* 2nd ed., Würzburg, 1937.

Gerth, Hans, "The Nazi Par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5, 1940.

Gide, André, *Retour de l'URSS,* Paris, 1936.

Giles, O. C., *The Gestapo* (Oxford Pamphlets on World Affairs, no. 36), 1940.

Globke, Hans, *Kommentare zur Deutschen Rassegesetzgebung,* Munich-Berlin, 1936.

Goebbels, Joseph, *Wege ins Dritte Reich,* München, 1927; "Der Faschismus und seine praktischen Ergebnisse," *Schriften der deutschen Hochschule für Politik,* vol. I, Berlin, 1935; *Vom Kaiserhof zur Reichskanzlei,* 19. ed., München, 1937; "Rassenfrage und Weltprogramm," *Pädagogisches Magazin,* Heft 139, 1934; *The Goebbels Diaries 1942-1943,* Louis Lochner, editor, New York, 1948; *Wesen und Gestalt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Berlin, 1935.

Goslar, Hans, *Jüdische Weltherrschaft. Phantasiegebilde oder Wirklichkeit,* Berlin, 1918.

Grauert, Wilhelm, "Die Entwicklung des Polizeirechts in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 in *Deutsche Juristenzeitung,* 39, 1934.

Griffith, William E., editor, *Communism in Europe, Continuity, Change 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 Cambridge, 1964.

Gross, Walter, *Der deutsche Rassengedanke und die Welt* (Schriften der Hochschule für Politik, no. 42), 1939; "Die Rassen- und Bevölkerungspolitik im Kampf um die geschichtliche Selbstbehauptung der Völk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no. 115, October, 1939.

Guenther, Hans, *Rassenkunde des jüdischen Volkes,* 1930; *Rassenkunde des deutschen Volkes,* 1st ed., München, 1922.

Gul, Roman, *Les Maîtres de la Tcheka,* Paris, 1938.

Gurian, Waldemar, *Bolshevism: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1932; *Bolshevism. An Introduction to Soviet Communism,* Notre Dame, 1952.

Hadamovsky, Eugen, *Propaganda und nationale Macht,* 1933.

Hafkesbrink, Hanna, *Unknown Germany,* New Haven, 1948.

Hallgarten, Georg Wolfgang F., *Hitler, Reichswehr und Industrie. Zur Geschichte der Jahre 1918-1933,* Frankfurt / M., 1955.

Hamel, Walter, "Die Polizei im neuen Reich," in *Deutsches Recht,* vol. 5, 1935.

Hammer, Hermann, "Die deutschen Ausgaben von Hitlers 'Mein Kampf,'" in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4* (1956).

Hartshorne, Edward G., *The German Universities and National*

Socialism, Cambridge, 1937.

Hayek, F. A.,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Economics,* vol. 8, 1941.

Hayes, Carllton J. H., *Essays on Nationalism,* New York, 1926; Remarks on "The Novelty of Totalitarianism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Symposion on the Totalitarian State, 1939.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82, Philadelphia, 1940; *A Generation of Materialism,* New York, 1941.

Heiden, Konrad, *Der Führer. Hitler's Rise to Power,* Boston, 1944; *A History of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1935; *Adolf Hitler. Das Zeitalter der Verantwortungslosigkeit. Eine Biographie,* vol. 1, Zürich, 1936; *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Karriere einer Idee,* Berlin, 1932; *Geburt des Dritten Reiches. Die Geschichte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bis Herbst 1933,* 2nd ed., Zürich, 1934.

Hesse, Fritz, *Das Spiel um Deutschland,* Munich, 1953.

Heydrich, Reinhard, "Die Bekämpfung der Staatsfeinde," in *Deutsches Recht,* vol. 6, 1936.

Hilberg, Raul,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Chicago, 1961.

Himmler, Heinrich, "Männerbund auf rassischer Grundlage," *Das Schwarze Corps,* 38. Folge; *Die Schutzstaffel als antibolschewistische Kampforganisation* (Aus dem Schwarzen Korps, no. 3), 1936; "Organization and Obligation of the SS and the Police," published in *Nationalpolitischer Lehrgang der Wehrmacht vom*

15.-23. Januar 1937. Excerpts translated in *Nazi Conspiracy, op. cit.,* vol. 4; English edition: *Secret Speech by Himmler to the German Army General Staff,*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Committee for Anti-Nazi Literature, 1938; *Grundfragen der deutschen Polizei,* Hamburg, 1937; "Denkschriften Himmlers über die Bchandlung der Fremdvölkiscnen im Osten" (May 1940),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5. Jg. (1957); "Die Schutzstaffel," *Grundlagen, Aufbau und Wirtschaftsordnung des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Staates,* Nr. 7b.

Hitler, Adolf, *Mein Kampf,* 1925-1927. Unexpurgated English edition, New York, 1939; *Reden,* ed. by Ernst Boepple, München, 1933; *Hitler's Speeches, 1922-1939.* ed. by N. H. Baynes, London, 1942; *Ausgewählte Reden des Führers,* 1939; *Die Reden des Führers nach der Machtübernahme,* 1940; *Der grossdeutsche Freiheitskampf,* Reden Hitlers vom 1.9.1939-10.3.1940; *Hitler's Table Talks,* New York, 1953; *Hitler's Secret Book,* New York, 1962; *Der grossdeutsche Freiheitskampf-Reden Adolf Hitlers,* vols. I and II, 3rd ed., München, 1943.

Hocke, Werner, ed., *Die Gesetzgebung des Kabinetts Hitler,* vol. 1, Berlin, 1933.

Hoehn, Reinhard, *Rechtsgemeinschaft und Volksgemeinschaft,* Hamburg, 1935.

Hoettl, Wilhelm, *The Secret Front: The Story of Nazi Political Espionage,* New York, 1954.

Holldack, Heinz, *Was wirklich geschah,* 1949.

Horneffer, Reinhold, "Das Problem der Rechtsgeltung und der

Restbestand der Weimarer Verfassung," in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99,* 1938.

Höss, Rudolf,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New York, 1960.

Hossbach, Friedrich, *Zwischen Wehrmacht und Hitler 1934-1938,* Wolfenbüttel-Hannover, 1949.

Huber, Ernst R., "Die deutsche Polizei,"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vol. 101, 1940／1.

Hudal, Bischof Alois, *Die Grundlag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1937.

Inkeles, A., and Bauer, R. A., *The Soviet Citizen: Daily Life in a Totalitarian Society,* Cambridge, 1959.

Jetzinger, Franz, *Hitlers Jugend,* Wien, 1956.

Jünger, Ernst, *The Storm of Steel,* London, 1929.

Keiser, Guenther, "Der Jüngste Konzentrationsprozess," *Die Wirtschaftskurve,* vol. 18, no. 148, 1938.

Kennan, George F., *Russia and the West under Lenin and Stalin,* Boston, 1961.

Khrushchev, N., "The Crimes of the Stalin Era," edited and annotated by Boris Nicolaevsky, New York, *The New Leader,* 1956.

Klein, Fritz, "Zur Vorbereitung der faschistischen Diktatur durch die deutsche Grossbourgeoisie 1929-1932,"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1.Jg, 1953.

Kluke, Paul, "Nationalsozialistische Europaideologie," *Vierteljahrsshefte fur Zeitgeschichte,* 8. Jg. (1960).

Koch, Erich, "Sind wir Faschisten?," in *Arbeitertum* 1, H. 9 (1.Juli

1931).

Koellenreuter, Otto, *Volk und Staat in der Weltanschauung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1935; *Der deutsche Führerstaat,* Tübingen, 1934.

Koettgen, Arnold, "Die Gesetzmässigkeit der Verwaltung im Führerstaat," *Reichsverwaltungsblatt,* 1936.

Kogon, Euge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ell,* 1956.

Kohn-Bramstedt, Ernst, *Dictatorship and Pdolitical Police; the Technique of Control by Fear,* London, 1945.

Koyré, Alexandre, "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the Modern Lie," *Contemporary Jewish Record,* June, 1945.

Kravchenko, Victor, *I Chose Freedom.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Life of a Soviet Official,* New York, 1946.

Krivitsky, W., *In Stalin's Secret Services,* New York, 1939.

Kuhn, Karl G., "Die Judenfrage als weltgeschichtliches Problem," in *Forschugen zur Judenfrage,* 1939.

Laporte, Maurice, *Histoire de l'Okhrana,* Paris, 1935.

Latour, Contamine de, "Le Maréchal Pétain," *Revue de Paris,* vol. 1.

Lebon, Gustave, *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 1895.

Lederer, Zdenek, *Ghetto Theresienstadt,* London, 1953.

Lenin, V. I., *What Is to Be Done?,* 1902; *State and Revolution,* 1917; *Imper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Capitalism,* 1917.

Leutwein, Paul, editor, *Kämpfe um Afrika; sechs Lebensbilder,* Luebeck, 1936.

Lewy, Guenter,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Nazi Germany,* New

York and Toronto, 1964.

Ley, Robert, *Der Weg zur Ordensburg,* no date.

Lösener, Bernhard, *Die Nürnberger Gesetze,* Berlin, 1936.

Lowenthal, Richard, *World Communism. The Disintegration of a Secular Faith,* New York, 1964.

Luedecke, Winfred, *Behind the Scenes of Espionage. Tales of the Secret Service,* 1929.

Luxemburg, Rosa, *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n Arbor, 1961.

Martin, Alfred von, "Zur Soziologie der Gegenwart," *Zeitschrift für Kulturgeschichte,* vol. 27.

Massing, Paul W., *Rehearsal for Destruction,* New York, 1949.

Mathias, Erich, and Morsey, Rudolph, editors, *Das Ende der Parteien 1933,* Düsseldorf, 1960.

Maunz, Theodor, *Gestalt und Recht der Polizei,* Hamburg, 1943.

McKenzie, Kermit E., *Comintern and World Revolution 1928-1934,* New York, 1964.

Micaud, Charles A., *The French Right and Nazi Germany. 1933-1939,* 1943.

Moeller van den Bruck, Arthur, *Das Dritte Reich,* 1923; English edition *Germany's Third Empire,* New York, 1934.

Moore, Barrington, *Terror and Progress USSR; Some Sources of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viet Dictatorship,* Cambridge, 1954.

Morstein Marx, Fritz, "Totalitarian Politics," *Symposion on the Totalitarian State, 1939.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82, Philadelphia, 1940.

Mosse, George J., *The Crisis of German Ideology: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Third Reich,* New York, 1964.

Muller, H. S., "The Soviet Master Race Theory," *The New Leader,* July 30, 1949.

Müller, Josef, *Die Entwicklung des Rassenantisemitismus in den letzten Jahrzehnten des 19. Jahrhundert* (*Historische Studien,* H. 372), Berlin, 1940.

Mussolini, Benito, "Relativismo et Fascismo," *Diuturna,* Milano, 1924; *Four Speeches on the Corporate State,* Rome, 1935; *Opera Omnia di Benito Mussolini,* vol. IV, Florence, 1951.

Nansen, Odd, *Day after Day,* London, 1949.

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Off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ef of Counsel for the Prosecution of Axis Criminality, U. S. Government, Washington, 1946.

Nazi-Soviet Relations, 1939-1941. Documen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edited by Raymond James Sontag and James Stuart Beddie, Washington, 1948.

Neesse, Gottfried, *Partei und Staat,* 1936; "Die verfassungsrechtliche Gestaltung der Ein-Partei,"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vol. 98, 1938.

Neumann, Franz, *Behemoth,* 1942.

Neusüss-Hunkel, Ermenhild, *Die SS,* Hannover-Frankfurt a.M., 1956.

Newman, Bernard, *Secret Servant,* New York, 1936.

Nicolaevsky, Boris I., *Bolsheviks and Bureaucrats,* New York, 1965; *Power and the Soviet Elite,* New York, 1965;(——), *Let-*

ter of an Old Bolshevik, New York, 1937.
Nicolai, Helmut, *Die rassengesetzliche Rechtslehre. Grundzüge ein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Rechtsphilosoph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Bibliothek, H. 39), 3rd ed., München, 1934.
Nomad, Max, *Apostles of Revolution*, Boston, 1939.
Olgin, Moissaye J., *The Soul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17.
Organisationsbuch der NSDAP, many editions.
Orlov, A., *The Secret History of Stalin's Crimes*, New York, 1953.
Ortega y Gasset, José,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New York, 1932.
Paetel, Karl O., "Die SS," *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January, 1954; "Der schwarze Orden. Zur Literatur über die 'SS,'" in *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 3. 1958.
Parsons, Talcott, "Some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the Fascist Movement," *Essay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Glencoe, 1954.
Pascal, Pierre, *Avvakum et les débuts du raskol* (Institut Français de Leningrad, Bibliothèque, vol. 18), Paris, 1938.
Paulhan, Jean, "Introduction" to Marquis de Sade, *Les Infortunes de la Vertu*, Paris, 1946
Payne, Stanley G., *A History of Spanish Fascism*, Stanford, 1961.
Pencherlo, Alberto, "Antisemitism," in *Encyclopedia Italiana*.
Petegroski, D. W., "Antisemitism, the Strategy of Hatred," *Antioch Review*, vol. 1, no. 3, 1941.
Pfenning, Andreas, "Gemeinschaf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vol. 96.
Poliakov, Léon, *Bréviaire de la Haine*, Paris, 1951; "The Weapon

of Antisemitism," *The Third Reich,* London, 1955, UNESCO.

——, and Wulf, Josef, *Das Dritte Reich und die Juden,* Berlin, 1955.

Poncins, Léon de, Les Forces secrètes de la Révolution; F∴M∴-Judaïsme, revised ed., 1929(translated into German, English, Spanish, Portuguese); *Les Juifs Maîtres du Monde,* 1932; *La Dictature des puissances occultes; La F∴ M∴,* 1932; *La mystérieuse Internationale juive,* 1936; *La Guerre occulte,* 1936.

Rauschning, Hermann, *Hitler Speaks,* 1939; *The Revolt of Nihilism,* 1939.

Reck-Malleczewen, Friedrich Percyval, *Tagebuch eines Verzweifelten,* Stuttgart, 1947.

Reitlinger, Gerald, *The Final Solution,* 1953; *The SS-Alibi of a Nation,* London, 1956.

Reveille, Thomas, *The Spoil of Europe,* 1941.

Reventlow, Graf Ernst zu, *Deutschlands auswärtige Politik. 1888-1914,* 1916; *Judas Kampf und Niederlage in Deutschland,* 1937.

Riesman, David, "The Politics of Persecutio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6, 1942; "Democracy and Defamation," *Columbia Law Review,* 1942.

Riess, Curt, *Joseph Goebbels: A Biography,* New York, 1948.

Ripka, Hubert, *Munich: Before and After,* London, 1939.

Ritter, Gerhard, *Carl Goerdeler's Struggle against Tyranny,* New York, 1958.

Roberts, Stephen H., *The House that Hitler Built,* London, 1939.

Robinson, Jacob, and Friedman, Philip, *Guide to Jewish History under Nazi Impact,* a bibliography published jointly by YIVO Institute for Jewish Research and Yad Washem, New York and Jerusalem, 1960.

Rocco, Alfredo, *Scritti e discorsi politici,* 3 vols., Milan, 1938.

Roehm, Ernst, *Die Geschichte eines Hochverräters,* Volksausgabe, 1933; *Die Memoiren des Stabschefs Roehm,* Saarbrücken, 1934; *Warum SA?,* Berlin, 1933; "SA und deutsche Revolution," in *National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Nr. 31, 1933.

Rollin, Henri, *L'Apocalypse de notre temps,* Paris, 1939.

Rosenberg, Alfred, *Die Protokolle der Weisen von Zion und die jüdische Weltpolitik,* München, 1923; *Der Mythos des zwanzigsten Jahrhunderts,* 1930.

Rosenberg, Arthur, *A History of Bolshevism,* London, 1934;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Republik,* 1936.

Rousset, David, *Les Jours de notre mort,* Paris, 1947; *The Other Kingdom,* 1947.

Rush, Myron,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the USSR,* New York, 1965; *The Rise of Khrushchev,* Washington, 1958.

SA-Geist im Betrieb. Vom Ringen um die Durchsetzung des deutschen Sozialismus, edited by Oberste SA-Führung, München, 1938.

Salisbury, Harrison E., *Moscow Journal: The End of Stalin,* Chicago, 1961; *American in Russia,* New York, 1955.

Salvemini, Gaetano, *La terreur fasciste 1922-1926,* Paris, 1938; *The Fascist Dictatorship in Italy* (1927), New York, 1966.

Schäfer, Wolfgang, *NSDAP, Entwicklung und Struktur der Staatspartei des Dritten Reiches,* Hannover-Frankfurt a.M., 1956.

Schapiro, L.,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1960;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1965.

Schellenberg, Walter, *The Schellenberg Memoirs,* London, 1956.

Schemann, Ludwig, *Die Rasse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Studie zur Geschichte des Rassengedankens,* 3 vols., München, Berlin, 1928.

Scheuner, Ulrich, "Die nationale Revolution. Eine staatsrechtliche Untersuchung," in *Archiv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1933/34).

Schmitt, Carl, *Politische Romantik,* Munich, 1925; *Staat, Bewegung, Volk,* 1934; "Totaler Feind, totaler Krieg, totaler Staat," *Völkerbund und Völkerrecht,* vol. 4, 1937; *Verfassungsrechtliche Aufsätze aus den Jahren 1924-1954. Materialien zu einer Verfassungslehre,* Berlin, 1958.

Schnabel, Raimund, *Macht ohne Moral. Eine Dokumentation über die SS,* Frankfurt/M., 1957.

Schumann, Fr. L., *The Nazi Dictatorship,* 1939.

Schwartz, Dieter, *Angriffe auf die nationalsozialistische Weltanschauung* (Aus dem Schwarzen Korps, no.2), 1936.

Schwartz-Bostunitsch, Gregor, *Jüdischer Imperialismus,* 5th edition, 1939.

Seraphim, Hans-Günther, *Das politische Tagebuch Alfred Rosenbergs aus den Jahren 1934/5 und 1939/40,* Göttingen-Berlin-Frankfurt/M., 1956; "SS-Verfügungstruppe und Wehrma-

cht," in *Wehrwissenschaftliche Rundschau 5,* 1955.

Seraphim, P. H., *Das Judentum im osteuropäischen Raum,* Essen, 1938; "Der Antisemitismus in Osteuropa," *Osteuropa,* vol. 14, no. 5, February, 1939.

Seton-Watson, Hugh, *From Lenin to Khrushchev,* New York, 1960.

Simmel, Georg, "Sociology of Secrecy and of Secret Societ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 no. 4, 1906;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translated by K. H. Wolff, 1950.

Six, F.A., *Die politische Propaganda der NSDAP im Kampf um die Macht,* 1936.

Smith, Bruce, "Police," in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Souvarine, Boris, *Stalin. A Critical Survey of Bolshevism,* New York, 1939;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Staline, Aperçu historique du Bolshévisme,* Paris, 1935.

Spengler, Oswal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1928-1929.

SS-Hauptamt-Schulungsamt, *Wesen und Aufgabe der SS und der Polizei; Der Weg der SS; SS-Mann und Blutsfrage. Die biologischen Grundlagen und ihre sinngemässe Anwendung für die Erhaltung und Mehrung des nordischen Blutes.*

Stalin, J. V., *Leninism,* London, 1933; *Mastering Bolshevism,* New York, 1946;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s): Short Course,* New York, 1939.

Starlinger, Wilhelm, *Grenzen der Sowjetmacht,* Wüzburg, 1955.

Starr, Joshua, "Italy's Antisemites," *Jewish Social Studies,* 1939.

Stein Alexander, *Adolf Hitler, Schüler der "Weisen von Zion,"*

Karlsbad, 1936

Stein, George H., *The Waffen SS: Hitler's Elite Guard at War; 1939-45,* Ithaca, 1966.

Stuckart, Wilhelm, and Globke, Hans, *Reichsbürgergesetz, Blutschutzgesetz und Ehegesundheitsgesetz*(*Kommentare zur deutschen Rassengesetzgebung*), vol. 1, München, Berlin, 1936.

Tasca, Angelo(pseudonym Angelo Rossi), *The Rise of Italian Fascism, 1918-1922*(1938), New York, 1966.

Thyssen, Fritz, *I Paid Hitler,* London, 1941.

Tobias, Fritz, *The Reichstag Fire,* New York, 1964.

Trevor-Roper, H.R., *The Last Days of Hitler,* 1947.

The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42 vols., Nürnberg, 1947-1948.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 15 vols., Washington, 1949-1953.

Trotsky, Leon, *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New York, 1932.

Tucker, Robert C., *The Soviet Political Mind,* New York, 1963.

——, and Cohen, Stephen F., editors, *The Great Purge Trial,* New York, 1965.

Ulam, Adam B., *The Bolsheviks: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riumph of Communism in Russia,* New York, 1965; *The New Face of Soviet Totalitarianism,* Cambridge, 1963.

Ullmann, A., *La Police, quatrième Pouvoir,* Paris, 1935.

Vardys, V. Stanley, "How the Baltic Republics Fare in the Soviet Union,"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66.

Vassilyev, A. T., *The Ochrana,* 1930.

Venturi, Franco,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1952), New York, 1966.

Verfassung, Die, des Sozialistischen Staates der Arbeiter und Bauern, Strasbourg, 1937.

Volkmann, Erich, Elster, Alexander, and Küchenhoff, Günther, editors, *Die Rechtsentwicklung der Jahre 1933 bis 1935／6,* Handwörterbuch der Rechtswissenschaft, vol. Ⅷ, Berlin, Leipzig, 1937.

Warmbrunn, Werner, *The Dutch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5,* Stanford, 1963.

Weinreich, Max, *Hitler's Professors,* New York, 1946.

Weissberg, Alexander, *The Accused,* New York, 1951.

Weizmann, Chaim, *Trial and Error,* New York, 1949.

Wighton, Charles, *Heydrich: Hitler's Most Evil Henchman,* Philadelphia, 1962.

Wirsing, Giselher, *Zwischeneuropa und die deutsche Zukunft,* Jena, 1932.

Wolfe, Bertram D., *Three Men Who Made a Revolution: Lenin—Trotsky—Stalin,* New York, 1948.

Wolin, Simon, and Slusser, Robert M., editors, *The Soviet Secret Police,* New York, 1957.

Zielinski, T., "L'Empereur Claude et l'idée de la domination mondiale des Juifs," *Revue Universelle,* Bruxelles, 1926-1927.

BD. 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叢書

①－③**資本論(共三卷)**不分售　2000元
馬克思/恩格斯⊙著

④**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　馬克思⊙著　200元

⑤**寫作的零度**　羅蘭・巴爾特⊙著　200元
李幼蒸⊙譯

⑥**政治：論權勢人物的成長、時機和方法**　200元
拉斯威爾⊙著　鯨鯤・和敏⊙譯

⑦**不斷革命論**　托洛斯基⊙著　150元
林驤華等⊙譯

⑥**社會科學方法論**　200元
韋伯⊙著　黃振華／張與健⊙譯

⑨**就業、利息和貨幣的一般理論**　330元
約翰・梅納遜・凱恩斯⊙著
陳林堅／王星／朱浩／范斌⊙譯

⑩**權力的剖析**　170元
加爾布雷斯⊙著　劉北成⊙譯

⑪**神話學：生食和熟食**　500元
李維斯陀⊙著　周昌忠⊙譯

⑫**神話學：從蜂蜜到煙灰**　550元
李維斯陀⊙著　周昌忠⊙譯

⑮**後現代的轉向**　400元
——後現代理論與文化論文集
伊哈布・哈山⊙著　劉象愚⊙譯

⑩**走向語言之途**　馬丁・海德格⊙著　300元
孫周興⊙譯

⑰**眞理與方法**　600元
——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
漢斯-格奧爾格・加達默爾⊙著
洪漢鼎⊙譯

⑲**複合思想導論** 艾迦・莫翰⊙著 160 元
施植明⊙譯
⑳**革命：理論與實踐** 220 元
查默斯・詹隼⊙著 郭基⊙譯
㉑**合法性危機** 尤爾根・哈伯瑪斯⊙著 250 元
陳學明⊙譯
㉒**邏輯研究(第一卷)** 380 元
——純粹邏輯學導引
埃德蒙特・胡塞爾⊙著 倪梁康⊙譯
㉕**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 450 元
塞繆爾・杭廷頓⊙著 張岱云等⊙譯
㉖**不確定的年代** 約翰・加爾布雷斯⊙著 350 元
杜念中⊙譯
㉗**林中路** 馬丁・海德格⊙著 350 元
孫周興⊙譯
㉖**臨床醫學的誕生** 米歇爾・傅柯⊙著 320 元
劉絮愷⊙譯
㉖**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 210 元
道格拉斯・諾斯⊙著 劉瑞華⊙譯
㉚**噪音：音樂的政治經濟學**
賈克・阿達利⊙著 宋素鳳/翁桂堂⊙譯 300 元
㉛**嫉妒與社會**
赫爾穆特・舍克⊙著 王祖望/張田英⊙譯 380 元
㉜**經濟史的結構與變遷** 250 元
道格拉斯・諾斯⊙著 劉瑞華⊙譯
㉝**極權主義的起源** 700 元
漢娜・鄂蘭⊙著 林驤華⊙譯

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㉝

極權主義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著　者——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譯　者——林驤華
校　訂——蔡佩君
發行人——孫思照
出版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108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四樓
發行專線—(〇二)三〇六六八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〇二) 三〇二四〇九四
(如果您對本書品質與服務有任何不滿意的地方，請打這支電話。)
郵撥——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七九～九九信箱

主編——吳昌杰
編輯——蔡佩君
校對——蒲麗月／許任伯
排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源耕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嘉雨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定價——七〇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二一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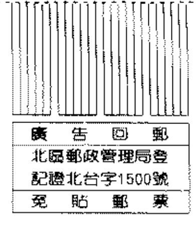
ISBN 957-13-1678-4
Printed in Taiwan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極權主義的起源 /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原著 ; 林驤華譯. --初版. --臺北市 : 時報
文化, 1995 [民84]
面 ; 公分. -- (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 ;
33)
譯自: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13-1678-4(平裝)

1. 極權主義 2. 帝國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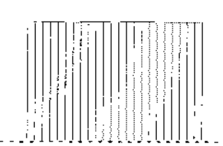
571.76 84003387



時報出版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地址：台北市108和平西路三段240號 4 F
電話：(02)3024094・(02)3086222轉8412～13(企劃部)
郵撥：0103854-0時報出版公司



請寄回這張服務卡(免貼郵票)，您可以
- 隨時收到最新的出版訊息。
- 參加專為您設計的各項回饋優惠活動。

編號：B D33	書名：極權主義的起源
姓名：	性別：＿＿＿ ①男 ②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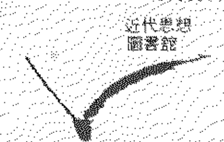
學歷：①小學 ②國中 ③高中 ④大專 ⑤研究所(含以上)

職業：①學生 ②公務(含軍警) ③家管 ④服務 ⑤金融 ⑥製造 ⑦資訊 ⑧大眾傳播 ⑨自由業 ⑩農漁牧 ⑪退休

地址：＿縣/市＿鄉鎮/區＿村＿里＿鄰＿路(街)＿段＿巷＿弄＿號＿樓

郵遞區號：

請沿虛線摺下裝訂，謝謝！



以圖書館的幅度與深度，重新呈現十九世紀以來最具關鍵性影響的思想鉅著

寄回本卡，您將掌握本系列的最新訊息

（下列資料請以數字填在每題前之空格處）

1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 88.11.21

1書店 2報紙廣告 3報紙專欄 4雜誌廣告
5親友介紹 6DM廣告傳單 7其它／

___ 您希望我們爲您出版哪一類的思想鉅著／

1經濟學 2政治 3社會 4哲學 5藝文 6史學
7心理 8人類學 9其它／

您對本書的意見／

___ 內容／1滿意 2尚可 3應改進
___ 編輯／1滿意 2尚可 3應改進
___ 封面設計／1滿意 2尚可 3應改進
___ 校對／1滿意 2尚可 3應改進
___ 翻譯／1滿意 2尚可 3應改進
2 定價／1偏低 2適中 3偏高

您希望我們爲您出版哪些思想鉅著（書名或作者）／

1 ___ 2 ___ 3 ___

您的建議／

請沿虛線撕下後對折裝訂寄回，謝謝！

漢娜．鄂蘭，當代最重要的女性政治哲學家之一，於1949年完成《極權主義的起源》這部鉅著的手稿，結合歷史的探討與概念的形構，論述極權主義在西方現代社會中形成的條件及其本質。

本書分為三部分：〈反猶主義〉從猶太人的文化特殊性和民族國家的關係，說明西歐反猶主義的興起；〈帝國主義〉檢視歐洲帝國主義的政治組織及殖民擴張；〈極權主義〉處理極權主義運動與支配方式。作為一種前所未有的統治形態，極權主義暗示著現代羣衆社會中，人類不同於以往的存在處境及道德狀況。本書可說是對於西方現代性困境的反省及批判。

鄂蘭博覽羣籍，為她所處的時代及文化境況，提出複雜而精緻的分析，書中處處閃現著高度的歷史想像及對人性的洞識。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HANNAH ARENDT

漢娜．鄂蘭，當代最重要的女性政治哲學家之一，於1949年完成《極權主義的起源》這部鉅著的手稿，結合歷史的探討與概念的形構，論述極權主義在西方現代社會中形成的條件及其本質。

本書分爲三部分：〈反猶主義〉從猶太人的文化特殊性和民族國家的關係，說明西歐反猶主義的興起；〈帝國主義〉檢視歐洲帝國主義的政治組織及殖民擴張；〈極權主義〉處理極權主義運動與支配方式。作爲一種前所未有的統治形態，極權主義暗示著現代羣衆社會中，人類不同於以往的存在處境及道德狀況。本書可說是對於西方現代性困境的反省及批判。

鄂蘭博覽羣籍，爲她所處的時代及文化境況，提出複雜而精緻的分析，書中處處閃現著高度的歷史想像及對人性的洞識。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HANNAH ARENDT

ISBN 957-13-1678-4 (571.76)
00700
9 789571 316789
時報出版
BD33 NT$700

極權主義的起源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原著—漢娜·鄂蘭

譯者—林驤華

近代思想圖書館系列

033



極

The O

原著／漢娜

